

**顧問：**

大庭脩 田餘慶 永田英正 何茲全 林甘泉 徐蘋芳  
張政烺 裘錫圭 魯惟一(Michael Loewe) 饒宗頤

**主編：**李學勤 謝桂華\*

**編委：**卜憲羣 邢文 江林昌 李天虹 馬怡  
侯旭東 孫曉 陳松長 陳勇 楊振紅  
趙平安\* 劉樂賢\*

**說明：**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劃為序排列

注“\*”號者為本輯執行編輯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烺學書



# 目 錄

信陽楚簡“樂人之器”研究 .....	李家浩	( 1 )
楚文字考釋(三組) .....	李守奎	( 23 )
釋包山楚簡中的“筐”字 .....	裴大泉	( 30 )
望山楚簡校讀記 .....	劉信芳	( 35 )
說郭店簡“道”字 .....	李學勤	( 40 )
郭店楚簡《緇衣》的分章及相關問題 .....	彭 浩	( 44 )
楚簡《老子》校釋(二) .....	廖名春	( 50 )
楚簡續紹 .....	黃錫全	( 77 )
九店楚簡日書補釋 .....	劉樂賢	( 83 )
讀幾種出土發現的選擇類古書 .....	李 零	( 96 )
仰天湖竹簡選釋 .....	何琳儀	(105)
楚國第二批司法簡芻議 .....	陳 偉	(116)
子彈庫楚帛書“推步規天”與古代宇宙觀 .....	江林昌	(122)
簡帛叢札二則 .....	王志平	(129)
從簡帛文獻看古代生態意識 .....	陳偉武	(134)
從雲夢秦簡看秦社會有關捕盜概況 .....	賀潤坤	(141)
秦簡《日書》與秦漢時期的生殖文化 .....	吳小強	(152)
秦簡偶札 .....	劉 桓	(164)
簡帛文字考釋札記 .....	施謝捷	(168)
秦至漢初簡帛形近字辨析 .....	黃文傑	(182)
論簡帛文獻的詞彙史研究價值 ——兼論其漢語史研究價值 .....	張顯成	(193)

論帛書《要》篇巫史之辨 .....	邢 文	(218)
帛書《十大經》補箋 .....	魏啟鵬	(235)
帛書《刑德》丙篇試探 .....	陳松長	(242)
帛書《周易》《老子》虛詞札記 .....	吳辛丑	(248)
《阜陽漢簡·周易》概述 .....	胡平生	(255)
銀雀山漢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釋證 .....	胡文輝	(267)
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 .....	永田英正	(279)
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 .....	邢義田	(295)
簡牘文書稿本四則 .....	李均明	(312)
漢代文書的收發與啓封 .....	汪桂海	(320)
居延漢簡吏卒“廩名籍”探析 .....	李天虹	(328)
漢簡中有關印章的資料 .....	趙平安	(339)
漢簡草書辨正舉隅 .....	謝桂華	(357)
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 .....	高 恒	(382)
漢令甲、令乙、令丙辨正 .....	徐世虹	(428)
收孥法的變遷 .....	于振波	(434)
試論居延“酒”“麴”簡：漢代河西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	王子今	(438)
漢簡中所見的鬼神迷信 .....	吳榮曾	(448)
田章簡補釋 .....	裘錫圭	(455)
河北定州出土西漢簡本《論語》性質新探 .....	王 素	(459)
尹灣六號漢墓 6 號木牘所書其它文字初探 .....	李解民	(471)
八十年來漢簡的發現、整理與研究 .....	張春樹	(481)
羅振玉、王國維與流沙墜簡 .....	羅 琨	(508)
林劍鳴教授與簡牘學研究 .....	王子今	(523)
戰國時期國別文字構形系統研究的開拓之作		
——讀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 .....	蘇 瑞	(534)
讀《簡帛藥名研究》 .....	苟曉燕 余 濤	(544)
尹灣漢墓簡牘學術研討會述畧 .....	東 山	(549)



# 信陽楚簡“樂人之器”研究

李家浩〈北京大學中文系〉

信陽一號楚墓竹簡 2-018 號、2-03 號，是相連的兩簡，記的是“樂人之器”。①現將其文字釋寫於下：

- (1) 樂人之器：一槩坐②前鐘，少（小）大十又三；柷，籒（漆）象；金玦。一槩坐〔前磬〕，少（小）大十又九；柷，籒（漆）象；緋維。二□。一□□。一筮。二笙，一簫，皆又（有）條。③一□□。一彫（雕）鼓，二囊。四櫛。一威盟之柜□土螻，籒（漆）青黃之象。三籒（漆）瑟，恭。一良嬰，一嬰。

在能辨認的“樂人之器”中，本文要討論的是以下七種：

一、前鐘 二、笙 三、囊 四、櫛 五、瑟 六、嬰 七、土螻  
因“笙”、“筮”、“鼓”是大家熟習的樂器，字又好認，故不予討論。又因“土螻”比較特別，故放在最後談。

## 一 前鐘

“前”字原文作“𦣻”。據《說文》所說，“𦣻”是前進之“前”的本字，“前”是“剪”的本字。但是，文獻中多以“前”為“𦣻”。為了書寫方便，釋文把“𦣻”徑釋寫作“前”。

天星觀楚墓竹簡卜筮類記有一種鐘叫“鏞鐘”，“鏞”字原文所从“前”旁也寫作“𦣻”。原簡說：

- (2) 舉禱巫豬需酉（酒），鏞鐘樂之。④

(1) 的“前鐘”跟 (2) 的“鏞鐘”，顯然是指同一種鐘。因“前鐘”是鐘名，故“前”或从“金”作“鏞”。

《爾雅·釋器》：

大鐘謂之鑪，其中謂之剗，小者謂之棧。

“前”、“棧”音近古通。《詩·召南·甘棠》“勿翦勿伐”，陸德明《釋文》引《韓詩》“翦”作“剗”。《禮記·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鄭玄注：“踐，當為‘翦’，聲之誤也。”《周禮·夏官·量人》鄭玄注引《禮記·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陸德明《釋文》引劉昌宗本“琖”作“湔”。《玉篇》木部：“槩，子田切，古文棧。”《爾雅·釋草》等所說的草名“車前”，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作“車踐”、“車棧”。⑤據此，(1)的“前鐘”之“前”和(2)的“鉶鐘”之“鉶”，皆應當讀為《爾雅·釋樂》小鐘謂之棧之“棧”。

《爾雅·釋樂》對棧鐘之“棧”的解釋十分簡畧，祇是從體積大小的角度說它是小鐘，至於“棧”究竟是什麼意思，卻未作進一步說明。于鬯對棧鐘之“棧”發表過很好的意見，他說：

“棧”有“編”義。《莊子·馬蹄》“編之以卑棧”，陸釋云：“編木作靈似牀，曰棧（盧文弨《考證》云“靈”即“櫺”字）。”是木之編者為“棧”。故鐘之編者亦名“棧”。“小者謂之棧”，即編鐘是也。《周禮》鐘師職云：“擊編鐘。”“鍾”、“鐘”通用。賈釋云：“此鍾編之十六枚，在一簋。”然則編鐘，小鐘也（朱駿聲《說文通訓》云“大鐘曰鑪，次曰鐃，小者曰編鐘”）。⑥

信陽一號楚墓前室出土編鐘十三枚（詳下），報告指出與簡文“一槩坐前鐘，小大十又三……”的記載相符。⑦可證“棧鐘”確實是編鐘，于鬯的說法是非常正確的。

在此需要說明一下，唐蘭先生在《古樂器小記》一文裏，也認為《爾雅·釋樂》所說的“小者謂之棧”之“棧”指編鐘。原文說：

“小者謂之棧”者，殆《周禮》鐘師所謂編鐘也。編、棧聲得相轉，義亦類似。編木為棧，猶編竹為簋也。⑧

按上古音“編”屬幫母真部，“棧”屬崇母元部，二字聲韻皆不相同，唐氏說“編、棧聲相轉”，顯然是有問題的。黠鐘銘文說：

黠擇吉金，鑄其反鐘，其音羸（羸）少（小）則湯（蕩）。⑨

“反”或寫作从“音”从“反”。“反”、“編”古音相近，可以通用。《戰國策·秦策四》楚人黃歇說秦昭王曰：“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

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史記·春申君傳》、《新序·善謀上》記此語，“半”作“徧”。《莊子·秋水》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陸德明《釋文》：“反衍——本亦作畔衍。”據此，“徧”聲之字與“半”聲之字相通，而“半”聲之字又與“反”聲之字相通，那麼“徧”聲之字與“反”聲之字也應該相通。疑鐘銘的“反鐘”應當讀為“徧鐘”。⑩在楚國文字中既有“徧鐘”，又有“棧鐘”，可見“棧鐘”和“徧鐘”是同一種鐘的異名，並非是聲轉。

下文的“一槩坐——緋維”，記的當是磬。“前磬”二字原文殘泐，釋文是根據“前鐘”的文例補出的。如上文所說，“前鐘”應當讀為“棧鐘”，即徧鐘的異名，那麼“前磬”應當讀為“棧磬”，即徧磬的異名。

位於“前鐘”和“前磬”之前的“槩坐”，從文義來看，似是量詞。古代鐘磬的量詞有“堵”、“肆”。例如：

邵簠鐘：“大鐘八肆(肆)，其竈四堵。”《金文總集》(九)7136—7149號

子犯鐘：“用為龠(和)鐘九堵。”《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三卷第一期。

邾公掙鐘：“鑄辭(台)龠(和)鐘二錯(堵)。”《金文總集》(九)7084—7087

《國語·晉語七》“歌鐘二肆”，韋昭注：“肆，列也，凡懸鐘磬全為肆，半為堵。”

《周禮·春官·小胥》“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注：“編懸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在這裏有幾點需要說明一下。第一，據邵簠鐘“大鐘八肆”和《國語》“歌鐘二肆”之語，鐘自為“肆”，並非像鄭玄注所說那樣“鐘一堵、磬一堵”才“謂之肆”。第二，學者多認為邵簠鐘的“竈”應該讀為當副講的“造”，“其造”指與鐘相配的磬。⑪既然鐘是“八肆”，那麼與之相配的磬也應該是“八肆”，銘文說是“四堵”，顯然是出於修辭的需要，為了避免文字重複而改的。如此，《小胥》“半為堵，全為肆”的說法就有問題了。唐蘭先生曾根據邵簠鐘銘文，疑《小胥》之文本作“全為堵，半為肆”。⑫我們認為唐先生的意見是可取的。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從下面第三、四兩點得到證明。第三，《晉語七》韋昭注“凡懸鐘磬，全為肆，半為堵”，顯然是襲用《小胥》文，疑韋昭所見本本作“半為肆，全為堵”，

今本韋昭注當是後人據誤本《小胥》文而改的。第四，從現在知道的先秦編鐘的組合情況看，多以八枚為一組，合兩組為一套。<sup>⑬</sup>這說明編鐘的“半”數當是八枚，“全”數當是十六枚。鄭玄注以十六枚謂之堵，正符合鐘磬的“全”數。

先秦時期，不同階級的人，使用的鐘磬數目和懸掛方式都不相同。根據鐘磬數的多寡，可以分為宮懸、軒懸、判懸和特懸四種。《周禮·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玄注：“樂縣，謂鐘磬之屬於筦簫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周書·大匡》“樂不牆合”，孔晁注：“牆合，即所謂宮縣。”

“堵”有“牆義”。<sup>⑭</sup>所以賈公彥於上引《周禮·春官·小胥》之文下說：“云堵者，若牆之一堵。”王國維在《漢南呂編磬跋》一文中也說：“案堵之名出於垣牆。”<sup>⑮</sup>“肆”有“列”義，見上引《國語》韋昭注。於此可見，鐘磬量詞的“堵”是由於鐘磬懸掛於室內的牆垣上邊而得名，“肆”是由於鐘磬懸掛的行列的而得名。那麼上引邵公鐸鐘的“四堵”，即《小胥》所說的“宮懸”；邾公鉞鐘的“二堵”，即《小胥》所說的“判懸”。“九”是“三”的三倍。子犯鐘的“九堵”可能是三套，即三套《小胥》所說的“軒懸”。

“樂”从“將”聲，“將”和“牆”皆从“牀”之象形初文“爿”得聲，<sup>⑯</sup>所以“將”、“牆”二字可以通用。《左傳》成公三年《經》“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廐咎如”之“廐”，《穀梁傳》作“牆”，《公羊傳》作“將”。疑簡文“樂”應當讀為“樂不牆合”之“牆”。“一牆坐”之“牆”與“肆堵”之“堵”的意思是相通的。“坐”大概讀為“座”。“一牆座棧鐘”猶言“一牆列棧鐘”，相當《小胥》所說的“特懸”。墓葬的木槨是地上居室的象徵。信陽一號楚墓編鐘出於木槨東方前室，與上引《小胥》鄭玄注所說“特縣縣於東方”相合。賈誼《新書·審微》：“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直”、“特”古音相近，可以通用。<sup>⑰</sup>“直縣”即《小胥》所說的“特縣”。《新書》以大夫特縣，與《小胥》以士特縣不同。從信陽一號楚墓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組合關係等情況看，墓



主人的身份是大夫一級。⑩看來賈誼《新書·審微》“大夫直(特)縣”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現在我們進一步討論“棧鐘”的附屬物“柸檠，漆象；全玅”。

“柸檠，漆象”還見於下文所記編磬的部份。“柸”字原文作A：

A 柸

此字舊有“柸”、“柸”等不同釋法，皆不可信。按秦漢簡帛文字“瓜”字和从“瓜”之字或作如下之形：

𠂔 瓜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14頁

𠂔 孤 同上219頁

𠂔 狐 《文物》1983年2期33頁圖三·3

柸 柸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圖版四一

𠂔 孤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圖版二五頁二二五行

柸 柸 同上圖版三二頁三五二行

把A所从右旁跟這些“瓜”字和所从的“瓜”旁進行比較，不難發現應當是“瓜”。那麼A無疑是“柸”字。據《說文》所說，“柸”指有棱之木。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陳忌問壘》：“將戰書柸，所以哀正也。”此處的“柸”即指棱形的木簡，古書往往借“觚”為之。⑪上揭貴縣羅泊灣漢墓木牘的“柸”用為“觚”。

信陽楚墓竹簡2-021號也有“柸”字。原文說：

(3) 一柸頁(首)因(網)。⑫

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所記隨葬物有“豹首車網”。《急就篇》“豹首落莫兔雙鶴”，顏師古注：“豹首，若今獸頭錦。”⑬疑“柸首”應當讀為“狐首”。“狐首網”猶鳳凰山漢墓竹簡“豹首車網”，指綉有狐首之類圖案的網。

“檠”字原文作B：

B 檠

此字舊有“檠”、“檠”等不同釋法。按當以釋作“檠”為是，此字上半所从“丰”的寫法與戰國鷹節銘文的“丰”相似，⑭可以比較。“檠”字應該分析為从“木”从“支”从“丰”聲，頗疑是“檠”字的異體。

古代懸鐘磬的架子叫作“筓虞”。《考工記·梓人》“梓人為筓虞”，鄭玄注：“樂器所縣(懸)，橫曰筓，植(直)曰虞。”“筓”或作“箕”，《禮

記·明堂位》“夏后氏龍筭虞”，鄭玄注：“筭虞，所以縣（懸）鐘磬也。橫曰筭，飾之以鱗屬；植（直）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我們認為簡文的“松梨”就是指懸鐘磬的筭虞。上古音“松”屬見母魚部，“虞”屬群母魚部，二字聲母都是喉音，韻部相同。“筭”屬心母真部，“梨”屬溪母月部。從表面上看，“筭”、“梨”二字的讀音不類。但是，杜子春關於“筭”字的讀音頗值得注意。《周禮·春官·典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鄭玄注引杜子春云：“筭讀為博選之選。”“選”跟“筭”字的異文“筭”，都从“巽”聲。可見杜子春對“筭”字的注音是有所本的，不是隨便說的。上古音“巽”、“選”都是心母元部字。在形聲字裏，溪，心二母有通諧的現象。例如“契”屬溪母，从“契”得聲的“楔”、“楔”屬心母。元月二部陽入對轉。頗疑“松梨”應當讀為“虞筭”。

“漆象”之“象”，舊讀為“緣”，非是。“象”還見於2-01、2-03、2-026號等簡（詳下文〔六〕）。這些“象”都是指器物上繪畫的紋飾。《莊子·達生》“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偻之中則為之”，玄成英疏：“豚，畫飾也；楯，策車也。謂畫輜車也。”我們認為簡文的“象”皆應當讀為《莊子·達生》“豚楯”之“豚”，訓為“畫飾也”。

“虞筭，漆豚”的意思是說，棧鐘的虞筭上，有漆繪的花紋。信陽一號楚墓出土的鐘架，是由兩根帶足枌的立柱的虞和一根橫樑的筭構成。足枌的外側有浮雕對稱卷雲紋和朱色彩繪。立柱上端兩側有浮雕獸面紋和朱色彩繪。橫樑也有彩繪。<sup>②③</sup>簡文所記“虞筭，漆豚”與之相合。

前面說過，“虞筭，漆豚”還見於下文所記編磬的部分。在信陽一號楚墓出土物中，未見有編磬，是簡文所記的編磬沒有隨葬。但是，位於一號墓東側的二號墓，出土木質編磬十八枚和磬架一件。磬架的形制與一號墓的鐘架大致相同，唯磬架的筭是兩層。磬架上有雕刻的花紋和漆繪的花紋。<sup>②④</sup>估計簡文所記的磬架形制與二號墓的磬架相同或相似。若此，與簡文所記編磬的“虞筭，漆豚”也是相合的。

“玦”字不見於字書，字當从“乃”得聲。信陽一號楚墓出土的編鐘，是用銅鍵固定在鐘筭上的。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的同志認為“金玦”，就是指這種把鐘固定在筭上的銅鍵。<sup>②⑤</sup>其說可從。

在棧磬文字部分，與棧鐘的“金玦”相當的文字作“緋維”，學者多謂指懸

掛磬的繩帶。甚是。古書中把這種懸掛磬的繩帶，稱為“紃”。《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紃”，鄭玄注：“紃，編磬繩。”

## 二 竺

“竺”字見於《說文》竹部，訓為“厚也”，古籍中多作“簞”。不過從形、音、義三個方面來說，“竺”與“竹”本是同一個字的異體。從字形來說，古文字下面加二橫跟不加二橫，往往無別，例如“齊”字作𠂔或𠂕。從字音來說，《玉篇》說“竺”“又音竹”。從字義來說，《廣雅·釋草》訓“竺”為“竹也”。

關於“竺”與“竹”本是同一個字的異體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信陽2-022簡的“箎”字得到證明：

### （4）二箎。

此簡的“箎”字原文作从“竺”从“甲”。仰天湖楚墓竹簡一二號也有“箎”字，原文作从“竹”从“甲”。於此可見，信陽楚簡“箎”字所从的“竺”旁是作為“竹”來用的。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在考釋仰天湖一二號竹簡時說，“箎”應當讀為“柺”或“匣”。②（4）的“箎”是器物之名，也應當讀為“柺”或“匣”。

古代有樂器叫“筑”。《說文》說“筑”所从“竹亦聲”，所以“竹”與“筑”可以通用。《說文》竹部：“箎，鼓弦竹身樂也。”《太平御覽》卷五七六引此，“竹身”作“筑身”。《爾雅·釋草》“竹，篇蓄”，陸德明《釋文》：“竹，本又作筑。”九店楚墓竹簡13號下欄“凡建日，大吉，利以——竺室”；57號“□□不竺東北之遇（寓）”。③此二“竺”字皆讀為“築”。“築”从“筑”聲，據此，簡文“竺”應當讀為“筑”。

“筴”字見於《玉篇》竹部和《集韻》侯韻等，是“豆”字的異體。簡文“筴”與此字當非一字。“筴筑”是一種筑名，跟簡文“簞箎”是一種箎名同類。

筑這種樂器早已失傳。關於它的形制，文獻裏有零星的記載，例如：

《說文》竹部：“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从竹，从珣。珣，持之也；竹亦聲。”

《淮南子·泰族》“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許慎注：

“筑曲二十一弦。”<sup>②⑥</sup>

《漢書·高帝紀》“上擊筑”，顏師古注：“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郭沫若在1942年曾寫過一篇《關於筑》的文章，對筑的形制作過考證。<sup>②⑦</sup>郭氏根據有關文獻和他在日本見到的一種用半邊竹子做的古樂器，勾畫出了筑的大致輪廓。郭氏認為筑是半邊竹子製作的，設有音箱，並且還認為筑“既是打擊樂器，弦就應該是金屬弦”。這些意見都是可取的。不過我們對筑真正的認識，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考古發現的實物。

1976年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曾出有一件木質筑，發掘報告是這樣描述的：

標本M1:600，出於槨室。殘存筑身一段，細長條狀，正面平，上部兩側起棱，形成納弦的槽道。筑頭往後頭彎，已殘去，但仍存弦孔部分，有弦眼五孔。下端殘，殘長42.4，寬2.9—3釐米……木牘“從器志”載有“越筑”，可能即指此。<sup>②⑧</sup>

據此筑的弦眼，其弦數與《說文》所說是一致的。

此外，還有學者指出，長沙馬王堆漢墓彩繪漆棺和連雲港西漢侍其繇墓漆奩的繪畫中，都有擊筑的圖像。<sup>②⑨</sup>圖像中的筑，頭部往下彎曲，跟羅泊灣漢墓殘筑形制相合。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去，再看上引《說文》對筑的形制的說解。說解開頭的“以竹曲”三字不太好懂，所以注釋《說文》的人有不同的說法。根據上述羅泊灣漢墓出土的筑的實物和漢漆器畫像中的筑的圖像，我們認為在《說文》諸注釋家裏，當以朱駿聲的解釋符合原義。朱氏說：

按曲其竹以受弦，以竹尺擊之成聲。似箏，細項圓肩。<sup>③①</sup>

大概筑原以竹為之，以其頭部彎曲為特徵，故《說文》說“以竹曲五弦之樂也”。《文選》卷五左太沖《吳都賦》“蓋象琴筑并奏”李善注引《說文》“以竹曲”作“似箏”，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二引《說文》“以竹曲”作“以竹擊之成曲”，都是不明白“以竹曲”三字之義而改的。跟《說文》對照，上引《淮南子·泰族》注“筑曲”二字當是“竹曲”之誤。

根據以上所說，筑這種樂器原本以竹為之，頭部彎曲，五弦。大概



因為五弦音域不廣，後來增加到十三弦或二十一弦，筑身或以木為之。

在信陽一號楚墓出土的隨葬物中，未見到像筑這樣的樂器。該墓在發掘之前，農民打井時曾穿透過墓葬，墓內的器物受到破壞，有可能筑在被破壞之列。

### 三 橐

簡文“橐”位於“雕鼓”之後。鼓槌在古代叫作“桴”。“橐”、“桴”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所以我們過去在《信陽楚簡“澮”字及从“𠂔”之字》一文裏寫此簡釋文時，於“橐”後括注“桴”字。<sup>⑤</sup>那時陰法魯先生曾經指出此種說法有問題，桴是附屬於鼓的，不應該獨立出來與鼓並列。這一意見很有道理。因此，簡文的“橐”到底是什麼，還應該重新討論。

一般來說，簡文往往把同類的器物記在一起，拿（1）開頭的“笙”、“箏”來說吧，就是如此。既然“橐”位於“雕鼓”之後，就說明它有可能是鼓一類的樂器。古代有一種形如鼓的樂器，叫“拊”。《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玄注：“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糠。”這種樂器又稱為“搏拊”或“撫拍”。《釋名·釋樂器》：“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舊唐書·音樂志》：“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節樂也。”這種樂器在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上可以看到。沂南漢畫像石墓中室畫像七盤舞的右側，有四個女伎，在他們的前方各有一件鼓形樂器，其中三個女伎張手作撫拍狀。<sup>⑥</sup>馮漢驥先生認為畫像裏的鼓形樂器就是拊。<sup>⑦</sup>上古音“橐”屬滂母幽部，“拊”屬滂母侯部，二字的聲母相同，幽侯二部字音關係密切，可以通用。例如《玉篇》刀部：“劒，刀握也。或為拊，”“橐”、“劒”二字皆從“𠂔”聲，“拊”、“拊”二字皆從“付”聲。此是“橐”、“拊”可以通用的例子。《說文》虫部“蠹”字的重文作“蟬”。《尚書·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漢《嘉平石經》等“孚”作“付”。<sup>⑧</sup>此也是“橐”、“拊”二字可以通用的例子。據此，頗疑簡文的“橐”應當讀為“拊”。因拊形如鼓，故簡文將其記在“雕鼓”之後。

在這裏需要說明一下包山楚墓竹簡遺冊部分的一個从“𠂔”之字。

包山楚簡遺冊所記的正車，有一種車馬器的名字作“𠂔”。原文說：<sup>⑨</sup>

（5）一輓（乘）正車……馭、右二真朝（捷）庫（甲），皆首軸（胄），紫

紉(膝)。一彫(雕)鞞。一緞絨之紉。一彫(雕)栝。一鈇，纓組之紉。二罽(繩)鞞(鞞)。靈(靈)光之縹。 271、270號

湖北方面的考古工作者認為，簡文的“雕栝”指該墓出土的一件漆木鼓。<sup>①</sup>“囊”、“栝”二字都从“缶”得聲。按照湖北考古工作者的說法，我們把信陽楚簡的“囊”讀為“拊”是否有問題呢？我們認為湖北考古工作者對包山楚簡“栝”的說法有問題。

包山遺冊所記的正車又見於同墓的竹觚。竹觚跟上引(5)相當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6) 一軛正車——馭，右二真鞞(鞞)摩(甲)，皆首鞞(胄)，紫膝。四馬皓罽(銜)，繡茅結項，告紉。縶(繩)絛(鞞)。一周(雕)輶(輶)。緞秋(紉)之紉。一綢(雕)榑。一□，縶組紉，番茅之童。

兩相對照，(5)的“雕鞞”、“雕栝”即(6)的“雕輶”、“雕榑”。《說文》“潮”字古文作“淖”，“从水，朝省聲。”<sup>②</sup>簡文“鞞”字所从左旁與“淖”字所从右旁相同，應當分析為从“支”“朝”省聲。“朝”與“輶”、“缶”與“榑”古音相近，可以通用。“輶”从“有”聲，《說文》篆文“輶”也从“有”聲。上古音“缶”屬幫母幽部，“榑”屬並母覺部，幫並二母都是唇音，幽覺二部陰入對轉，《方言》卷九：“輶，楚衛之間謂之輶。”如果簡文的“輶”用的是此義，那麼“栝”、“榑”二字大概都應當讀為“輶”，指伏兔。《周易·小畜》“九三，說輶”，陸德明《釋文》：“輶，音福，本亦作輶……鄭云伏兔(兔)。”《左傳》僖公十五年“車說其輶”，孔穎達疏引子夏《易傳》云：“輶，車下伏兔也。”

湖北的考古工作者為什麼會認為(5)的“栝”指漆木鼓呢？我們推測可能跟他們把簡文“鈇”誤釋為“鏡”有關。因為湖北的考古工作者把“鈇”誤釋為“鏡”，認為是指墓內出土的樂器銅鏡。<sup>③</sup>從而認為位於其前的“雕栝”也是樂器，指墓內出的另一種樂器漆木鼓。其實簡文的“鈇”不是“鏡”字。此字見於信陽楚簡 2—05、2—017號，用為“鋪首”之“鋪”。<sup>④</sup>

總之，湖北的考古工作者認為(5)的“雕栝”是樂器，指墓內出的漆木鼓，是沒有根據的，不能用來否定我們對(1)的“囊”的讀法。

#### 四 檮

簡文所記的“檮”這一種樂器，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它是“鐻”，因為這兩個字都從“蜀”得聲。事實上我們在上文三提到的那一篇文章裏，就是這樣認為的。其實把“檮”說成“鐻”是有問題的。(1)的2-03號簡所記的樂器，多是匏、木、革等製作的。“檮”字從“木”，與這一情況是一致的，說明它是木製作的樂器，而不是金屬製作的樂器“鐻”。

《周禮·春官·笙師》“掌教敔、竽、笙、塤、箛、簫、簞、篴、篳、篥、管、春牘、應、雅”，鄭玄注引鄭司農說：“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縣畫，以兩手築地。”鄭玄說：“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於此可見，鄭司農與鄭玄對“春牘”的意見有分歧。鄭司農認為“春牘”是名詞，而鄭玄認為“春”是動詞，“牘”是名詞。清人金鶚說：“‘春’字統‘牘、應、雅’三件，猶上以‘敔’字統‘竽、笙、塤、箛、簫、簞、篴、篳、篥、管’也。先鄭以‘春牘’二字共為器名，則亦當以‘敔’字統之，此豈可敔之器邪？”④金鶚的意見很有道理，當以鄭玄的說法為是。古代“檮”、“牘”二字音近可通。《文選》卷四八揚子雲《劇秦美新》“布濩流行而不韞韞”，李善注：“檮與韞古字通。”同書卷四六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歷牘相尋”，五臣本“歷牘”作“軌檮”。疑簡文“檮”應當讀為《周禮·春官·笙師》“牘、應、雅”之“牘”。

信陽一號墓出土白形漆木器一（1-794），“柱狀，上粗下細，兩側由上到下有似階梯的鋸齒形。其上端平面鑿圓窩（似白窩）。通體髹黑漆，繪精緻而勻稱的朱色圖案，高20、圓徑6-8釐米”。⑤該墓隨葬的樂器都集中在前室。此白形漆木器出於前堂，大概也是樂。其形態頗似上引鄭司農所說的“牘”，唯白形漆木器是木做的，只一端有空。白形漆木器長度約相當當時的一尺符合鄭司農所說的短牘長一、二尺的說法。如果白形漆木器是牘，那麼實物跟簡文所記“檮（牘）”的數字不符。

#### 五 瑟

“瑟”字原文作“瑟”，其上部所從的“叒”旁，與戰國貨幣某些參川空首布“叒”的寫法相似；⑥其下部所從的“必”旁，與同墓竹簡1-05

號“必”的寫法相同。<sup>④</sup>所以將此字隸定作“瑟”。

我們在上文三提到的那篇文章裏，曾把(1)的“瑟泰”二字連續，並懷疑“泰”應該讀為“管”。包山楚墓竹簡的發現，證明這一意見是錯誤的。包山楚墓竹簡260號說：

(7) 一瑟，又(有)泰。

兩相對照，不難發現(1)的“瑟”與(7)的“瑟”，是同一個字的異體。(7)的“泰”字之前有“又(有)”字，說明“泰”是附屬於“瑟”的。也就是說，“泰”是“瑟”上的附件。於此可見，(1)的“泰”字之前省略了“又(有)”字，它不應該跟“瑟”連讀。

《說文》說“瑟”从“必”聲。“瑟”、“瑟”二字應該从“必”得聲，疑它們都是“瑟”字的異體。信陽一號楚墓前室出土瑟三，<sup>⑤</sup>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瑟一，<sup>⑥</sup>皆與簡文所記相合。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證明把“瑟”、“瑟”看作“瑟”字的異體是合理的。

《說文》木部：“泰，牛鼻上鐶也。”簡文“泰”當非此義，從此字从“木”來看，簡文的“泰”應該是瑟上木製的附件。瑟上木製的附件有軫、柱。軫又稱為柄，是調弦的鈕。柱是承弦用的，軫有轉義。《文選》卷三四枚叔《七發》“菱軫谷分”，李善注引許慎《淮南子注》：“軫，轉也。”故名轉動捲弦的鈕為軫。<sup>⑦</sup>跟“泰”所从聲旁相同的“卷”等字有收捲義，與軫的意思相通。《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鄭玄注：“卷，猶收也。”《說文》手部：“捲，收也。”頗疑簡文的“泰”是軫的別名。

望山二號楚墓竹簡也記有瑟，但文字的寫法跟信陽楚簡和包山楚簡都不相同。原簡說：

(8) 二瑟，共，一尨衣，元(其)一瑟丹秋(絃)之附瑟(繼)，元(其)一瑟肅(靈)光之附瑟(繼)。<sup>⑧</sup> 49.50號

(9) 二瑟，皆絃衣。 47號

(8)、(9)的“瑟”字从三“元”。(7)的“瑟”字上半从三“兀”。“元”、“兀”是同一個字的異體。很顯然，(8)、(9)的“瑟”就是(7)的“瑟”，也就是(1)的“瑟”。《集韻》卷九櫛韻“瑟”字下收有三個古文，其中兩個古文作“爽”、“瑟”。“瑟”與“瑟”的關係跟“爽”與“瑟”的關係相同。於此可見，(8)、(9)的“瑟”也應該讀為“瑟”。



(8)的“𦵏”就是(1)、(7)的“𦵏”。(8)的“𦵏”字之前省略了“又(有)”，與(1)的情況相同。因“𦵏”是“𦵏”所从的聲旁，故二字可以通用。因“𦵏”是瑟的附件，故(9)的“𦵏”後沒有記“𦵏(𦵏)”。

(8)的“一𦵏衣”以下文字和(9)的“皆𦵏衣”，都是對它們前面“二瑟”的說明。

“𦵏”與“旭”的字形結構相同。《說文》說“旭”“从日，九聲”。那麼“𦵏”應該分析為从“𦵏”，“九”聲。“九”、“秋”古音都是幽部字。疑(8)的“𦵏衣”即(9)的“𦵏衣”的異文。“𦵏”屢見於楚簡，是一種絲織品。

古人為了保護瑟上不粘灰塵等，往往把它裝在用絲織品作成的袋子裏。這種裝瑟的袋子古人叫作“衣”。馬王堆一號漢墓276號簡說：

瑟一，越閨錦衣一，赤掾(緣)。

“越閨錦衣”是指用“越閨錦”做的裝瑟的袋。㉞(8)、(9)的“𦵏衣”與馬王堆漢墓竹簡“越閨錦衣”文例相同，當是指用“𦵏”做的裝瑟的袋子。

“其一瑟丹𦵏之𦵏繼，其一瑟靈光之𦵏繼”，是說(8)所記的那兩件瑟中，有一件的“𦵏繼”是用“丹𦵏”作的，有一件的“𦵏繼”是用“靈光”作的。“丹𦵏”、“靈光”都是楚國的絲織品名稱。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漆瑟，共二十五弦，分為三組，靠近尾岳處外九弦和內九弦，分別纏有絲帶。㉟望山二號楚墓出土漆瑟一，據該瑟的弦孔，也是二十五弦，分為三組，㊱原來近尾岳處外九弦和內九弦，也應該像馬王堆漢墓漆瑟那樣分別纏有絲帶。(8)的“𦵏繼”可能是指那種纏弦的絲帶。《廣韻》卷四霽韻“繼”、“係”二字都音古詣切，可以通用。《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纆”，《穀梁傳》宣公二年范甯注引此，“係”作“繼”。疑簡文“繼”應該讀為“係”，其義同《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三·陌上桑》“青絲為籠係”之“係”，指帶子或繩子。字或作“繫”。《儀禮·士喪禮》“着組繫”。

上面提到望山二號墓出土漆瑟一，比簡文所記少三件，看來簡文所記的四件瑟沒有全部隨葬。不過此墓曾被盜過，另外三件瑟也可能在被盜之列或盜墓時被破壞。

## 六 瑟

“瑟”字原文作C：

C 瑟

其上半是“羽”，其下半作為獨體字見於戰國璽印文字和陶文：

D<sub>1</sub> 𠂔 《古璽彙編》331.3562

D<sub>2</sub> 𠂔 《古陶文字徵》123頁

D 舊有“歲”、“戴”等不同釋法，皆不可信。

在戰國璽印字裏，有一個與D的結構相同的字作E：

E 𠂔 《古璽文編》296.1760

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根據侯馬盟書“𠂔”字寫法，認為E是“𠂔”字的簡體。<sup>⑫</sup>陳邦懷先生也認為E是“𠂔”字的簡體。<sup>⑬</sup>《說文》“𠂔”字篆文本从“𠂔”，隸變省作“𠂔”。D所从的偏旁與E所从的偏旁相同，顯然是一個从“肉”从“𠂔”省聲的字。《說文》以“𠂔”為籀文“𠂔”。<sup>⑭</sup>疑D是“𠂔”字的具體。為書寫方便起見，下面徑把D釋寫作“𠂔”。

信陽楚簡裏也有一個獨體的“𠂔”字，但其寫法與D<sub>1</sub>、D<sub>2</sub>略有不同：

D<sub>3</sub> 𠂔 1—01

李學勤先生懷疑D<sub>3</sub>从“𠂔”省，讀為“𠂔”，<sup>⑮</sup>是十分正確的。《古璽彙編》445頁著錄的4999號印“昌”字，把“日”旁寫作一橫，與D<sub>3</sub>把“口”旁寫作一橫的情況同類。D<sub>3</sub>當是D<sub>1</sub>、D<sub>2</sub>的進一步簡省的寫法。1—01號簡原文說：

(10) 周公𠂔(𠂔)然(然)𠂔(作)印(色)曰：易，夫𠂔(賤)人各(格)上，則型(刑)𠂔(𠂔)至。

“𠂔然作色”是古人常用語，例如：《韓詩外傳》卷十第十二章“平公𠂔然作色曰”，《莊子·天地》“謂己道人，則𠂔然作色”。字或作“𠂔”。《韓詩外傳》卷八第十一章“景公𠂔然作色曰”。由此可見，我們對D的釋讀是可信的。

在包山楚簡裏，B所从“𠂔”也有不省的，唯二“或”皆順寫：

𠂔 8號

此字在簡文裏用為人名。<sup>⑯</sup>上揭戰國璽印文字D<sub>1</sub>也用為人名。

根據以上所說，簡文C應該是一個从“羽”从“𠂔”聲的字。C與笙、箏、鼓、瑟等記在一起，說明它是跟樂器有關的器物。不過從C从“羽”來看，它又不可能是樂器，因為古代製作樂器的材料有金、石、

土、革、絲、木、匏、竹八類，沒有用羽之類製作的。古代樂舞不分。在中國古代的舞蹈裏有羽舞，其舞具是羽毛製作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簡文的C應該是一種羽舞用的舞具。

古代羽舞的種類很多，其中有一種叫“翬”。許慎《說文》羽部：

翬，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从羽，𠂔聲。讀若紱。

字或作“帔”、“袂”、“紱”。《周禮·地官·舞師》：

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史記·孔子世家》：

定公十年春……會齊侯夾谷……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  
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劍撥，鼓噪而至。

桓譚《新論》：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sup>⑤7</sup>  
《周禮·春官·樂師》“凡舞帔舞”鄭玄注引鄭司農云：“帔舞，全羽。”與上引許慎的說法是一致的。但是鄭玄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於《舞師》注：“帔，列五采繒為之，有秉。”於《樂師》注“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此顯然是從“帔”字从“巾”而立論的。從桓譚《新論》“躬執羽紱”之語來看，當以鄭司農、許慎說符合當時翬舞的實際情況。

翬舞是因跳這種舞的人所執舞具“翬”而得名。“翬”、“𠂔”、“𠂔”古音相近，可以通用。《爾雅·釋水》“緇繡維維”，陸德明《釋文》：“緇，本或作紉，又作紱。”《詩·小雅·采芣》“芣芣濫泉”，《說文》水部“芣”字說解引此，“芣”作“澤”。《禮記·王藻》“一命緇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說文》韋部“韍”字說解引此，“韍”作“韍”。疑簡文C應該是“翬”字的異體。上引桓譚《新論》與簡文相互證明，楚國確實有翬這種羽舞。

簡文所記的“翬”這種舞具有兩種，一種是加有修飾語的“良翬”，一種是沒有加修飾語的“翬”。信陽楚簡2-04號說：

(11)一良圓(圓)軒，截紡，劉紱(鞭)，良寫首，翠哉。一良女乘，一乘良□，二乘緣遠□。

此簡所記的車共有四種五乘。前兩種車分別見於曾侯乙墓竹簡203號和望山二號墓竹簡2號。“圓軒”指有圓形藩屏的軒車，<sup>⑤8</sup>“女乘”指婦女所乘的有

惟慢的車。<sup>⑤</sup>後兩種車的車名之字相同，左半是“車”，右半不識。《周禮·春官·巾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鄭玄注：“作之有功有沽。”賈公彥疏：“云‘作之有功有沽’者，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沽則曰散也。”據此，(11)的“良圓軒”、“良女乘”、“良□”之“良”，是製作精良的意思。(1)的“良嬰”之“良”與(11)的“良圓軒”、“良女乘”、“良□”之“良”用法相同，其義也應該相同。看來如有修飾語的“良嬰”，要比沒有加修飾語“嬰”製作得精良一些。

## 七 土螻

“螻”字原文寫作从“虫”从“婁”省。“婁”旁省寫的形式，與戰國中山王銅器銘文“婁”字所以从“婁”旁的省寫相似，<sup>⑥</sup>可以比較。按古文字往往把“虫”旁寫作“虫”，例如包山楚墓竹簡的“蛙”、“虫”、“蝕”等字，原文“虫”旁皆寫作“虫”。<sup>⑦</sup>所以我們過去經把此字釋為“螻”。<sup>⑧</sup>

根據文義，位於“土螻”之前的“威盟之柜□”大概是“土螻”的修飾語，其義待考。

位於“土螻”之後的“青黃之象”是對“土螻”的說明。“青黃之象”還見於下列同墓竹簡：

(12) 二囙(圓)監(鑑)，屯青黃之象。<sup>⑨</sup> 2-01號

(13) 一□□□□，邴(漆)青黃之象。 2-028號

上文曾指出，簡文“象”應該讀為《莊子·達生》“豚楬”之“豚”，訓為“畫飾也”，舊讀為“緣”，非是。古書中屢見“青黃”之語。例如：

當今之主……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墨子·辭過》

百年之木，破而為犧尊，青黃而文之（成玄英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也……既削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莊子·天地》

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削刷，雜之青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青黃，采色文飾）。《淮南子·俶真》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綯以綺繡，纁以朱絲，尸祝初袞，大夫端冕以送迎之。《淮南子·齊俗》

“青黃之豚”猶言青黃之飾，是說繪有青黃彩色的紋飾。



根據以上所說，位於“瑟”之前的“樂人之器”叫“土螻”。在古文獻裏，樂器有土鼓，另外還有泥土燒製的樂器埙、甬、缶等，未見有與“土螻”相當的。但是，在古文獻裏卻有一種神獸叫“土螻”，與簡文文字完全相同。《山海經·西山經》說：

昆侖之丘——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sup>④</sup>

因為這種神獸似羊，所以“土螻”之“螻”或从“羊”作“𦍋”。《廣韻》卷二侯韻“𦍋”字下說：

土𦍋，似羊，四角，其銳難當，觸物則斃，食人。出《山海經》。

假設簡文的“土螻”，就是文獻中的“土螻”，看看在信陽一號楚墓出土物中能否找到跟它相合的東西。我們對該墓出土物作了一一考察，發現祇有鎮墓獸可能是簡文所記的“土螻”。《信陽楚墓》對該鎮墓獸作了如下的描述：

標本1—694出於後室，是一個極大的彩繪木雕鎮墓獸。獸身高128釐米，作蹲坐狀。頭頂插有兩個殘長15釐米的彩繪鹿角，角外髹以成組的黑色卷雲紋——兩耳翹起，頭部似獸，雙目圓大，張口吐舌，舌垂至腹，胸部繪出雙乳，背部雕有四個對稱的卷雲紋。前肢上舉，兩爪持蛇，作吞食狀——全身除眼、舌髹紅漆、耳、爪髹黃漆外，其餘各部皆髹褐漆並有紅、黃相間的鱗紋。雙尾外捲，雕法精巧，色彩鮮艷。<sup>⑤</sup>

把文獻和簡文所記的“土螻”跟鎮墓獸比較，不難發現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土螻和鎮墓獸都有角，唯角的數目不同而已。第二，簡文所記的土螻和鎮墓獸都有彩漆繪畫的花紋。第三，土螻不僅其角銳利難當，觸物則斃，而且還食人，用它來作鎮墓獸是十分合適的，鬼魅見之不敢入，能達到避除土咎令禍殃不行的目的。除了這三點外，還有一個情況也值得注意。有人曾作過統計，楚墓中出土的鎮墓獸近300件，往往有鼓伴隨出土。反過來說，“凡出土有鼓的墓葬必然出‘鎮墓獸’”。這說明鎮墓獸跟樂器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sup>⑥</sup>簡文正是把“土螻”和“鼓”記在一起的，跟鎮墓獸與鼓同出的現象是一致的。根據這些情況，簡文所記的“土螻”，很可能是指該墓出土的鎮墓獸。

關於鎮墓獸的內涵和意義，長期以來爭論不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如果我們對簡文的“土螻”就是鎮墓獸這一推論符合事實的話，那麼對於認識鎮墓獸的真正面目，無疑是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

以上是我們對信陽楚簡所記“樂人之器”提出的一些不很成熟的意見，其

中有許多推測的成份，錯誤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附記：

本文是1996年7月暑假期間據舊稿改寫而成的。此後見到劉信芳、劉國勝先生分別也釋出了信陽楚簡、包山楚簡和望山楚簡的“瑟”，與我們的意見不謀而合。劉信芳先生的考釋見《楚簡文字考釋五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86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劉國勝先生的考釋見《曾侯乙墓E61號漆箱書文字研究—附“瑟”考》，《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699—705頁，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

1997年11月22日

## 注 釋

-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以下簡稱爲《信陽》）圖版一一九、一二四，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② 關於“坐”字考釋，參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89頁（一九），中華書局，1995年。
- ③ “條”字原文作从“絲”从“衣”省。關於此字的釋讀，請看《朱德熙古文字論集》64—66頁，中華書局，1995年。
- ④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002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⑤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圖版60頁七一、七二行，釋文注釋106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⑥ 于省：《香草校書》下冊1122頁，中華書局，1984年。
- ⑦ 《信陽》21頁。
- ⑧ 《唐蘭先生金文論集》335頁，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263頁圖一九七、217頁圖二〇三等，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⑩ 關於獸鐘銘文的釋讀，詳拙作《獸鐘銘文考釋》（待刊）。
- ⑪ 參看《金文詁林》第九冊4806頁引孫詒讓曰、4809頁引郭沫若曰、4810頁引容庚曰，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
- ⑫ 同注⑧363頁。

- ⑬ 參看李朝遠《從新出青銅鐘再議“堵”與“肆”》，《中國文物報》1996年4月14日第14期第3版。
- ⑭ 《說文》土部：“堵，垣也。”“垣，牆也。”
- ⑮ 《觀堂集林》第四冊1217頁，中華書局，1961年。
- ⑯ 參看《說文解字詁林》第七冊6029頁引徐灝《說文解字注箋》，6030頁引孔廣居《說文疑疑》，6031頁章炳麟《小學問答》，6032頁引林義光《文源》，中華書局，1988年。
- ⑰ 參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407頁，齊魯書社，1989年。
- ⑱ 《信陽》121、122頁。
- ⑲ 《孫臏兵法》51頁，52頁注⑩，文物出版社，1975年。武威漢簡《儀禮》酒器的“觶”，也以“柸”為之。參看《武威漢簡》164頁校記三十六、167頁校記八等，文物出版社，1964年。
- ⑳ 此“頁”字之上，原文从“之”。這種寫法的“頁”還見於信陽楚墓竹簡2-04號和包山楚墓竹牘。“頁”、“首”古本一字。參看湯餘惠《包山楚簡讀後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2期79頁；李家浩《包山楚簡中的旌旆及其他》，《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集續編》377、378頁，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
- ㉑ 參看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6期70頁。
- ㉒ 羅振玉：《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1·1·2，1925年；《三代吉金文存》18·31·7、32·1，1937年。關於此字的考，詳見另文。
- ㉓ 《信陽》25頁，圖版七。
- ㉔ 《信陽》89頁圖六〇，圖七七·2。
- ㉕ 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戰國楚簡研究（二）》22頁，1977年。
- ㉖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1期77頁。
- ㉗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507、509頁，科學出版社，1995年。
- ㉘ 據前人考證，傳本《淮南子》的《泰族》等篇為許慎所注。參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二冊827—833頁，中華書局，1980年。
- ㉙ 《郭沫若全集·文學篇》第七卷113—1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 ③⑩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63頁，圖五一·2，圖版三二·5，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③⑪ 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圖版11，湖南出版社，1992年。  
南波：《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3期173頁圖四·1。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38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蕭元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113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③⑫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第六）290頁，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
- ③⑬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反从“𠂔”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97頁，1982年。
- ③⑭ 《考古通訊》1955年2期圖版壹。
- ③⑮ 馮漢驥：《論盤舞》，《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8期10、11頁。又《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54、55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③⑯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冊370頁，下冊圖版二〇六，二〇七，文物出版社，1991年。關於包山遺冊正車簡的連接，我們與《包山楚墓》有所不同。參看注②⑩引李家浩文。
- ③⑰ 《包山楚墓》上冊118頁。
- ③⑱ 此徐鍇本，徐鉉本無“聲”字。
- ③⑲ 《包山楚墓》上冊113頁，398頁（637）。
- ③⑳ 參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103頁（一〇九），中華書局，1995年。
- ㉑ 見孫詒讓《周禮正義》第七冊（卷四六）1898頁，中華書局，1987年。
- ㉒ 《信陽》69頁，圖版三一·4。
- ㉓ 參看《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178、179頁，中華書局，1995年。
- ㉔ 參看湯餘惠《楚器銘文八考》，《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古文字論集（一）》66頁，1983年。
- ㉕ 《信陽》25—31頁。

- ④⑥ 《包山楚墓》上冊116頁，117頁圖七一，下冊圖版三大·1。
- ④⑦ 戴侗《六書故·工事二》：“軫，借其聲為軫轉之軫，琴下轉弦者因謂之軫。”
- ④⑧ “繼”字原文作《汗簡》古文“繼”之省寫。關於此字的考釋，看《望山楚簡》119頁〔四二〕。
- ④⑨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71頁、151頁，下集團版二〇七，文物出版社，1973年。
- ⑤⑩ 同集④⑨上集104頁，105頁圖九四，下集團版二〇六。
- ⑤⑪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149頁，147頁圖九八·4，文物出版社，1996年。
- ⑤⑫ 朱德熙、裘錫圭：《關於侯馬盟書的幾點補釋》，《文物》1972年8期38頁。
- ⑤⑬ 陳邦懷：《一得集》284頁，齊魯書社，1989年。
- ⑤⑭ 《說文》角部“觥”字說解，以“觥”為古文“詩”，與此異。
- ⑤⑮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339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古文字學初階》56頁，中華書局，1985年；《長臺關竹簡中的《墨子》佚文》，《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2頁，巴蜀書社，1990年。
- ⑤⑯ 何琳儀《包山竹簡選擇》也認為此字是“肱”（《江漢考古》1993年4期61頁），可以參看。
- ⑤⑰ 《太平御覽》卷五二六、七三五引。
- ⑤⑱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曾侯乙墓》上冊509頁④⑨，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⑤⑲ 《望山楚簡》114頁〔五〕。
- ⑥⑰ 容庚：《金文編》151頁，中華書局，1985年。
- ⑥⑱ 同注④ 948頁。
- ⑥⑲ 同注③③。
- ⑥⑳ “屯”，義同“皆”。參看《朱德熙古文字論集》32—35頁，173—177頁。

- ⑥④ 《逸周書·王會》：“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嚙。”王念孫指出，“翕”是“翕”之誤，“吐嚙”本作“土螻”。同時還指出，《王會》的“土螻”與《西山經》的“土螻”“同名而異物”。上引《王會》文字之後有“北方臺正東，高夷嚙羊。嚙羊者，羊而四角”之語，有人認為“食人，北方謂之吐嚙”即此處之錯簡。參看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下冊 927、928、933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⑥⑤ 《信陽》60、61 頁，圖四一，圖版八五、五九。
- ⑥⑥ 邱東聯：《“鎮墓獸”辨考》，《江漢考古》1994 年 2 期。



## 楚文字考釋（三組）

李宇奎（吉林大學文學院）

### 一、釋足與足聲字

包山二號墓 155 號簡有字作“𠂔”形，《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釋為“足”，①為學者所信從，現有的幾部有關楚文字的字編均例在“足”字頭下②。

“𠂔”釋“足”無據，當是“𠂔”字。

“足”與“𠂔”不論其來源如何，在楚文字中是有區別的。在字形上的主要區別特徵是足字作𠂔（信陽 2—20③）或是𠂔（包山 112），上部从口形，足字作𠂔（包山 36）或𠂔（包山 70），上部所从與口形有別。釋“𠂔”為足可能就是看到了足、𠂔二字上部的區別，但忽視了下部的不同。𠂔、𠂔二形顯然有明顯的不同。在構字功能上，足主要用作形旁，𠂔主要用作聲旁，二者也有所不同。

釋𠂔為足的主要依據有三：一是凡从𠂔之字，皆用作聲旁，與足字構字功能一致；二是凡“𠂔”聲讀為相應的足聲字均可通讀辭例；三是“𠂔”與“𠂔”有通用之例證。下面試加以說明。

𠂔字在下例東字中用作偏旁：

① 𠂔 包山 259    𠂔 包山 260

② 𠂔 仰天湖 2    𠂔 仰天湖 4    𠂔 仰天湖 6    𠂔 仰天湖 33

③ 𠂔 曾侯乙 137

④ 𠂔 包山 125    𠂔 包山 219    𠂔 包山 220

①形包山楚簡《考釋》隸作“𠂔”，讀作“梳”，④甚是。“𠂔”字與“𠂔”字同出一簡，二字均見於《集韻》，分別是“梳”、“𠂔”二字的異

寫。包山二號墓出土物中有此二物，與簡文所記相合。

②形饒宗頤、郭若愚先生釋“紵”⑤，陳直、商承祚先生釋“紵”，⑥當以釋“紵”為是。仰天湖2、6、33號簡之“紵衣”當讀為“疏衣”，蓋與典籍所見之“疏服”⑦相當，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獻書趙王章》作“疎服”。四號簡之“紵布之冒”當讀為“疏布之冒”。《後漢書·文苑傳下·祢衡》：“衡乃著布單衣，疏巾”。疏布之冒大概與疏巾相當。

③形《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釋為“𡗗”，似有未安。“𡗗”字見於包山楚簡，作𡗗（包山162），也見於侯馬盟書，作𡗗、𡗗⑧等形，均與此形不類。而且“紫𡗗之滕”不易讀通。

曾侯乙墓竹簡所載馬甲之滕，除此“紫𡗗之滕”外，還有“紫組之滕”、“黃紡之滕”、“紫縵之滕”、“玄市之滕”等等，“滕”前的修飾語均是指製作此“滕”的紡織品名稱及其顏色。“紫𡗗”也當是紫色的某種紡織品。“𡗗”字當是從欠、足聲，字可隸作“𡗗”，讀仰天湖簡“紵衣”之“紵”是很順暢的。漢字形聲字雖然以左形右聲為主，但有些形旁卻慣於居右，“欠”旁字即是其例。

④形包山楚簡考釋均隸作“𡗗”，甚是。包簡125、219、220之“𡗗易”，125號簡作“𡗗易”。“𡗗”即“𡗗”之異寫，可見“𡗗”旁與“𡗗”旁相通。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凡从“𡗗”之字皆當讀為足聲，𡗗當即足字異寫。包山155號簡之“𡗗足”當讀為“𡗗胥”，即𡗗之胥吏。

楚文字中，有以文字形體下部變形構成區別特徵之例，如女字與安字省體之別就是女字作𡗗，安字作𡗗，二字的區別特徵與足字作𡗗，足字作𡗗相類。

## 二、釋陸與陸聲字

包山楚簡有下列字形

A 陸 陸 包168      B 陸 陸 包22      C 陸 陸 包167  
D 陸 陸 包62      E 陸 陸 包163      F 陸 陸 包171

上列六個形體中，B、C、D、E、F五形用灋相通。

郢司馬之州加公李瑞，里公B得 包22



邛司馬之州加公孝逗，里公F得 包24


邛司馬之州加公孝端，里公D得 包30

B得，F得，D得顯系同一人名，B，F，D異文。

邛郢C 包167


邛郢人F 包171

C、F為同一人名之異寫。

从辭例上看，B、C、D、E、F可以系聯在一起，互為通用。包山楚簡《考釋》據《汗簡》隋之古文作，把A、D、E、F並釋為“隋”<sup>⑨</sup>，學者多承其說。<sup>⑩</sup>通用未必同字，上例諸字，尚需區別。

A形當是《說文》“陞”字之來源。

《說文·阜部》：“陞，敗城府曰陞，从阜差聲。塹，篆文。”前人已經指出，《說文》無“差”字。今據楚簡可知，陞當系由“陞”訛變而來，陞之篆文从土，尚存古意。

《說文·肉部》：“隋，裂肉也。从肉，从陞省。”《汗簡》之，實為陞字，以陞為隋，屬同聲假借。《汗簡》所錄古文多借字，不煩舉例。




B形是在陞字上增加邑旁，成為姓氏專字，楚文字中大量的邑部字大都是分化出的姓氏專字。

邛實際上就是今隨州之“隨”，隋姓之“隋”。

《說文·辵部》：“隨，从也，从辵、塹省聲。”塹即陞之篆文，隨、陞古音極近。《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杜預注：“隨國、今義陽隨縣。”《通志·氏族畧二》：“隨氏、侯爵，今隨州是其地。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至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走作隋。”

隋字《廣韻》有徒果切，今音duò；又有旬為切，今音suí。古音皆在歌部，當是一聲之轉。从諧音系統看，也可證隋、隨古本音同或音近。隋从陞省聲，隨从塹省聲，塹為陞字篆文，隋、隨理當音同或音近。

从以上分析我們可知，隋姓之隋，本由隨國之隨省變而來，在楚文字中，本作陞，後加邑成專字邛。

C形是B形的省形，即省去一個“圣”形。D形則是C形的進一步省略，省去了“土”上的“又”形。

E形當是《說文》之“陞”字。

《說文·山部》有隤、隤二字。

隤，山兒，从山，隤聲。

隤，山之隤隤者，从山 从隤省聲。

大徐已指出隤、隤一字，段玉裁更詳申一字之說<sup>⑪</sup>。包山簡帛字當即隤字之來源，字从阜，从山，所从𡵓當是C形𡵓所从𡵓的變形。

隤（篆文作𡵓，今隸作隤）與隤、隤、隤衆字音義並近，後者皆以隤為聲，當是一字之分化。

F形隤與C形異文，其構字原理與D相同，當是从田，从隤聲，字可釋作隤，與隤字可能是一字異寫，也可能並不完全相同，但从隤省聲當是沒有什麼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所列A、B、C、D、E、F六形分別釋為隤（A）、隤（B—D）、隤（E）、隤（F）。隤、隤二字見於《說文》，隤為隨國之隨和隋姓之隋的本字，隤可能是隤字的異體。

最後談一下“隤”字的結構。

《說文》據訛變之形，以為从阜，从“𡵓”聲，前人已指出其非。楚簡之隤字，嚴格隸定，當是“隤”，字从阜，从二“𡵓”，用作偏旁，可以省作“𡵓”和“𡵓”，所从之土旁可能兼有表意和表音的作用。隤在定紐歌韻，土在透紐魚韻，聲紐同屬舌頭音，韻部據王力先生擬音，魚韻為[ɑ]，歌韻為[ɑi]，主要元音相同，似可旁轉。

《說文》由於不明“隤”字的結構，所以在分析“隤”聲字時頗為混亂。如隤从隤省聲，隤从隤省聲，隤、隤从隤省聲。就楚文字而論，未見隤形，隤、隤、隤、隤諸形，皆可視為从隤聲或隤省聲，依照《說文》當是从隤聲或隤省聲。

### 三、釋隤與隤聲字

在包山楚簡中，有下列一組字：

𡵓 包山183

𡵓 包山183

𡵓 包山183

三字在簡文中均用作人名或地名，《釋文與考釋》分別隸作“隤”、“隤”、“隤”<sup>⑫</sup>，後之學者或從前說<sup>⑬</sup>，或隸作隤、隤、隤<sup>⑭</sup>，均未解決這組字的識讀。

我們以為這組字應當隸作堆、鯀、鯀，釋作堆、鯀、鯀。

下面我們先從《說文》“鯀”、“屍”二字與其或體間的形、音關係說起。

《說文·鳥部》：“鯀，祝鵠也。从鳥，佳聲。隼，鯀或从佳一。一曰鵠字。”“隼”字既然是“鯀”字的或體，讀音當然應當相同，由此可知，在造字時，“隼”與“佳”的讀音應是很近的。

《說文·尸部》：“屍，髀也，从尸下卩，居几。髀，屍或从肉隼。髀，屍或从骨，殿聲。”《說文》所說的“屍”、“髀”、“髀”就是現在的“髀”字。《說文》又在肉部有“肱”字。“肱，屍也，从肉、佳聲。”“屍”字異體作“髀”，“鯀”字異體作“隼”，據此可知“肱”、“髀”二字音義無別，當是一字異寫。《說文》中相類的異部同字的例子為數不少。文獻中“佳”、“隼”作同一個字的聲符構成異體字的例子還有“堆”與“隼”。《漢書溝洫志》“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隼。”顏師古注引晉灼曰：“隼，古堆字也。”

“佳”是微部字，“隼”是文部字，微、文陰陽對轉，古音關係密切，兩部字例可通假。《周禮·春官·司尊彝》“裸用虎彝雉彝。”鄭注：“鄭司農云：雉或讀為射隼之隼。”

總之“佳”“隼”二字古音相近，可以用作同一字的聲旁構成異體。

下面我們回到字形上來。

在楚文字中，有下列四個形體相近的文字或偏旁，在構字中經常出現。

- |   |        |        |        |        |       |          |
|---|--------|--------|--------|--------|-------|----------|
| 1 | 𠂔      | 帛書     | 𠂔      | 禽志鼎    | 𠂔     | 包簡 202   |
| 2 | 𠂔 (偏旁) | 𠂔      | 鄂君啟節   | 𠂔      | 包簡 24 | 𠂔 包簡 173 |
| 3 | 𠂔 (偏旁) | 𠂔      | 曾簡 174 | 𠂔      | 曾 89  |          |
| 4 | 𠂔      | 包簡 183 | 𠂔      | 包簡 183 | 𠂔     | 包簡 183   |

第一個字釋“佳”確鑿無疑，且構字能力最強。除所列隻、雀外，還有雁、雇、雇、雇、雙、難、難、難等。佳在較早的楚文字中，多作𠂔形，由四斜筆構成。自戰國初期之後，無論是銅器銘文還是竹簡帛書，都一律簡化為𠂔或𠂔形，由三斜筆或三橫筆構成。

第二個形體舊多釋“佳”，現在看來是有問題的。鄂君啟節之𠂔字从“隼”不从“佳”，是“髀”字，即《說文》“屍”字或體，今之髀字，前文雖然申述了“肱”“髀”一字之異的論點，但如果依《說文》體例編排字表，依舊

應置於“𪔐”字頭下。“𪔐”在鄂君啟節中用為人名，古人有以𪔐（𪔐）為名者，如《左傳宣公六年》之“黑𪔐”。包山簡之𪔐與𪔐應隸作𪔐與𪔐。《龍龕手鑑》有“𪔐”字，云為𪔐字之俗體，不一定與楚簡之“𪔐”有關係。“𪔐”字不見於後世字書。

第三組字均見於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云：“‘𪔐旗’亦見於86號、89號二簡，‘𪔐’从‘鳥’从‘隹’，‘隹’即‘堆’字。174號簡‘難’字所从‘隹’旁原作‘隹’，與此字右半相同。據此，‘𪔐’當是‘𪔐’字的異體。望山二號墓竹簡記車上的旌旗有‘隹（堆）𪔐（旌）’，‘堆’亦當讀為‘𪔐’。《說文·鳥部》：‘𪔐，祝鵠也。从鳥隹聲。隹，𪔐或从隹一。一曰鵠也。’<sup>⑮</sup>

曾簡《考釋》所論之“𪔐”字所从偏旁作“𪔐”形，與望山二號墓第13號簡“隹”字作𪔐形畧有不同。所从“隹”旁在三斜筆之下尚有一橫貫豎劃的長曲筆，與同墓所出衣箱漆書“隹”字作𪔐亦明顯不同。曾侯乙164號簡之舊字作“𪔐”，中部所从“隹”形與衣箱漆書同而與“𪔐”旁有別。曾簡《考釋》所釋“𪔐”“難”二字聲旁，當隸作“堆”。上文已詳論“隹”與“佳”聲可通轉，用為聲旁可構成異體，“堆”可視為“堆”字異體，“𪔐”“難”二字最終依舊可釋為“𪔐”“難”二字。

第四組字就是我們開頭所例的三字，“𪔐”字是在上述𪔐形上多加了一筆，將橫曲筆變成了“九”形。

𪔐、𪔐、𪔐是一字異寫，均是“隹”字。這種在豎上加橫，又變橫為“又”的文字演變現象不乏其例<sup>⑯</sup>。如“萬”字、“禽”字等演化過程均與此相類。“佳”“隹”最初當是音義並同的一字，後來纔音隨義轉，有所區別。“佳”字縱筆上所加的筆劃也就成了區別符號，雖然形體有別，但表音作用一樣。

依上所論，第四組字當隸作“堆”、“𪔐”、“鳥堆”，分別釋為“堆”、“𪔐”、“𪔐”。堆字見於《廣韻·灰韻》，𪔐字見於《說文·鳥部》，𪔐字見於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三》：“𪔐魚，心肝及頭毒如野葛。”是否與楚簡之“𪔐”字有關尚不可確知，待考。

## 注 釋

- ① 見《包山楚簡》第51頁，考釋（291）。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 ② 參看張光裕、袁國華《包山楚簡文字編》，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
- ③ 指《信陽楚墓》竹簡第二組二十號簡，下文字形後所注（包山112）、（曾侯乙37）等，均是指發掘報告圖版上的竹簡編號。
- ④ 見《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考釋之（552）。下文簡稱包簡《釋文與考釋》。
- ⑤ 饒宗頤《戰國楚簡箋證》見《金匱論古綜合刊第一期》；郭若愚《戰國楚簡文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 ⑥ 陳直《楚簡解要》，見《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商承祚《戰國楚簡匯編》齊魯書社1995年第一版。
- ⑦ 《北史·房景伯傳》：“以父非命，疏服終身。”
- ⑧ 參《侯馬盟書字表》，見《侯馬盟書》第326頁。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第一版。
- ⑨ 見《包山楚簡》第42頁，考釋（64）。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 ⑩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將B、C、D、E、F並釋為“隋”，歸入肉部。
- ⑪ 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九篇下·山部》隋、鹽二字注。
- ⑫ 見《包山楚簡》第31頁，183號簡釋文。
- ⑬ 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
- ⑭ 見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
- ⑮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見《曾侯乙墓》第516頁考釋（113）。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 ⑯ 承蒙何琳儀先生面示。參閱唐蘭《古文字學導論》。

初稿於1997年9月

二稿於1997年12月



## 釋包山楚簡中的“𠂔”字

裴大泉〈中山大學中文系〉

包山楚簡中有“𠂔”這樣一個字，凡四見，句例如下（在以下所引例句中，此字的古文字形用符號“~”表示，例句釋文均作寬式處理）：

- (1) 陰之載客或執~之兄惺 包135反
- (2) 義~ 包49
- (3) 大廐登~ 包164
- (4) 陳人龔~之人 包192①

“~”字諸家隸為“𠂔”，在第(2)(3)(4)例中作人名用字，在第(1)例中，從簡文句意看，應該是第一人稱代詞，《包山楚簡》“注釋”(252)云：“𠂔，讀作僕。”中山王響壺銘文也有此字，其形體作“𠂔”，從構形上看，它與包山楚簡的“~”是一個字，所以，一般也把該字隸為“𠂔”。其所在句例是：

- (5) 作斂中則庶民~ 中山
- (6) 佳德~民，佳義可長 中山②

《金文編》卷三：“𠂔，《說文》所無，从臣付聲，有臣服歸附之意。”③有人以為此字是“歸附”之“附”的本字④。那麼，“𠂔”到底是什麼字呢？《包山楚簡》中有一條與第(1)例句式相同的簡文，句例如下：

- (7) 會之正國執𠂔之父邈 包135

把例(1)和例(7)對讀，可以發現，兩例句式一致，語法功能完全相同，顯然，“𠂔”和“𠂔”完全可以互換。這可以讓我們下一個判斷：“𠂔”和“𠂔”都是“僕”的異體字，下面就對此試作解釋，並請讀者指正。

先說“𠂔”字，此字《包山楚簡》直接注為“僕”，是正確的，有學者認

為是“臣僕”的合文⑤，可能性並不太大，其所从之“臣”應該是“僕”字贅加的義符。為了表意準確而贅加義符的現象，在戰國文字中極為常見，如“敬”字，蔡侯盞作“敬”，楚帛書作“敬”，石鼓文作“敬”，中山王響壺則作“敬”，《汗簡》也作“敬”，後兩形附加了“心”旁，以強調“敬意”要發自內心；再如“戶”字貨幣文作“戶”，小篆作“戶”，《汗簡》作“戶”，陳貽戈則作“戶”，《說文》古文作“戶”，《汗簡》也作“戶”，後三形贅加“木”旁是強調窗戶的質料。“僕”字當然也是贅加義符“臣”所致。但如此疊床架屋，明顯不便於書寫，我們根據《楚系簡帛文字編》作一小計，“僕”字條下收錄了34個形體⑥其中包山楚簡25個，江陵磚瓦廠楚簡8個，望山楚簡1個，從形體上來看，包山有14例，“人”“業”“臣”各偏旁形體之分還判然有別，包山的另外11例和江陵磚瓦廠楚簡8例以及望山的1例，“僕”字所从之“人”旁卻已省變為“丿”，甚至與“臣”旁合為一體，與“蹠”字已形相彷彿，這應該是“僕”之《說文》古文“蹠”的形體祖本。《望山楚簡》就直接把這一形體隸為“蹠”（望二第11號簡）⑦，可謂卓識。

那麼，蹠和賃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應該是聲符代換的關係，在戰國文字中，文字異形的情况相當複雜，就形聲字而言，就有一種很常見的用字形象，即：兩個形旁相同，聲旁音近或音同的字可以互用，這些通用的字相當一部分是異體關係；有的作為常用字保留下來，其異體則未傳於後世。如：

譙 譙 《說文》小篆 譙 《說文》古文

賃 《古璽滙編》：668⑧

先秦古音“焦”屬精母宵部，“肖”則屬心母宵部，二字韻同，聲紐為同一聲類，其文獻通用例極多。《史記·黥布列傳》：“數使使者謂讓呂布”。《漢書·英布傳》“謂”作“譙”。《方言·七》：“譙·讓也。”郭璞注：“譙或作謂”。

鑄

鑄 小篆

鑄 中山王響壺“針為鑄壺”

“𠄎”，“據文義，這個字用為動詞，當是‘鑄’字的異體，不少从‘寸’的字古音在幽部，與从‘壽’得聲的字相通。”⑨張政烺先生也說：“𠄎字見上官鼎、大梁司寇鼎，从金、肘省聲，鑄之異體”⑩。《詩經·小弁》“怒焉如擣”，《釋文》：“擣”，本或作壽，《韓詩》作“疔”，可以作為旁證⑪。戰國以後，“鑄”仍為常用之字，“𠄎”字則未見於字書，失傳。

這樣的例子在戰國文字中還很多⑫，“𠄎”字正屬此類，其形體和音讀，如《金文編》所言，是“从臣付聲”，而“𠄎”（也即僕字），則是“从臣業聲”；古音“付”屬幫母侯部，“業”屬并母屋部，兩字聲紐同屬唇音，韻可陰入對轉。先秦文獻中，从付之字，从業之字與从卜之字都有通用之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執捶拊以鞭笞天下”，《集解》引徐廣曰：“捶拊一作槁朴。”《史記·酷吏列傳》：“斲雕而為朴。”《漢書·酷吏傳》朴作樸。《老子》：“敦兮其若樸。”河上本樸作朴。可見𠄎、僕通用不成問題。

在詞義上，“𠄎”有“附屬”之意（見前舉中山王響壺之例句），“僕”也有“附屬”之意，《詩·大雅·既醉》：“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莊子·人間世》：“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王念孫《讀書雜誌·十六·余論編上》：“蚤蚤僕緣……僕之言附也，言蚤蚤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着於人”。可見，將中山王響壺銘文中的“𠄎”換成“僕”也文從字順，義無滯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僕、𠄎、𠄎”都是“僕”字的異體。

從我們現在所掌握的材料看，“僕”字一直作為正體使用，兩周金文習見。在戰國文字中，為了表意準確，“僕”贅加了義符“臣”、繁化為“僕”，⑬在書寫習慣趨簡的支配下，省簡成“𠄎”，此字既比“僕”簡化，又比“僕”表意性強。然而，其筆畫仍不勝其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𠄎”作為一個新字應時而生，它保留了形旁“臣”，其聲旁則作了簡化處理，將“業”換為“付”。所根據的用字規律是：聲旁音近或音同的形聲字可以通用。從中山王響壺銘文和包山楚簡中的“𠄎”所揭示的形音義來看，把“𠄎”看成是“僕”之異體，毫無問題。這正像現代人抄寫漢字，仍繁簡兼用一樣。作為正體，“僕”字的使用時間最長，從古至今一直在用，“𠄎”祇是一個短時的過渡用字，“僕”見於包山楚簡，但其所從之“僕”形已有省變，這可能是由於過



繁所致，“𠄎”則見於中山王𦣻器、包山楚簡，也見於古璽文<sup>⑩</sup>，可能是當時使用頻率較高，範圍較廣的一個字，秦統一後的規範字運動卻將它廢而不用了。

## 注 釋

- ① 以上簡文皆見《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楚國歷史文化辭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人物卷”將〈2〉〈3〉〈4〉例的“義～”、“登～”、“龔～”直接隸為“義仆”、“登仆”、“龔仆”但並未解釋為何將“～”隸為“仆”。
- ② 參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𦣻器文字編》第55頁，中華書局1981年。
- ③ 容庚編撰，馬國權、張振林纂補《金文編》第206頁，中華書局1985年。
- ④ 參見陳漢平《金文編訂補》第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 ⑤ 參見陳煒湛《包山楚簡研究》（七篇）第8頁，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暨中國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994年8月·廣州·東莞），關於“𠄎”字的釋義，陳煒湛先生於該文有詳細的解說。
- ⑥ 詳見滕壬生主編《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⑦ 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
- ⑧ 吳振武先生根據裘錫圭先生釋“韓三年脩余令戈”銘之“韓𦣻”為“韓譙”（《戰國貨幣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2期）之例，把《古璽文編》第55頁“譙”字條下所收的1668等號璽文改釋為“譙”，可從。詳細參見吳振武博士論文第54—55頁。
- ⑨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第42頁。
- ⑩ 張政烺《中山王𦣻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1輯第209頁，中華書局1979年。

- ⑪ 參見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第48頁，中華書局1985年。
- ⑫ 詳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四章有關內容，中華書局1989年。
- ⑬ 見《古璽滙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461、1907號姓名私璽，《古璽滙編》將“𠂔”“𠂔”隸為“取”“僕”，吳振武則改隸為“𠂔”（《〈古璽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古文字學論集》初編第498頁第1461條、第502頁第1907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83年。）可從，但括注為“附”則未安，應改釋為“僕”。

附記：本文蒙曾憲通師撥冗指正，謹志謝忱。

# 望山楚簡校讀記

劉信芳（湖北省博物館）

## 1 羝、𦍋

望1·55：“句（后）土、司命各一羝。”1·123：“□ 羝各一羝。”1·125：“舉禱遂（遂）一羝。”或釋“羝”為“羝”<sup>①</sup>，恐未妥。按字從羊戌聲，“戌”應是女字其上有裝飾筆畫，有如楚簡“太”之作“𡗗”。以辭例比勘，羝應是“𦍋”之異體。包山簡所記祀神之牲有“𦍋”無“羝”<sup>②</sup>，而望山簡有“羝”無𦍋。包202：“興禱於官陞（地）室一𦍋。”214：“賽禱官侯（后）土一𦍋。”237：“舉禱楚先老僮、祝融、媼禽各兩𦍋。”文例可對照。

望1·109 釋文：“賽禱官陞（地）室（主）一和。”“和”應是“𦍋”字之殘。“𦍋”與“𦍋”應是一字之異。楚簡祀官地室用“𦍋”（包202）或“𦍋”（包207、219），尚未見有例外。

## 2 𦍋

望1·63：“𦍋𦍋𦍋之禱。”考釋云：“此當是‘興’字省寫，其義待考。”按包簡“𦍋”（興）、“逌”為互文，簡203：“𦍋石被常之禱。”簡214：“逌石被常之禱。”“逌”即“逌”，讀如“施”，謂按卜筮所顯示的結果施行祭祀。《詩·周南·葛藟》：“施於中谷。”毛傳：“施，移也。”移、逌古書不甚別，是音近通用。《史記·田叔傳》：“如有移德於我。”集解：“徐廣曰：移猶施也。”

## 3 𦍋

望1·70 釋文：“□ 𦍋𦍋，庚申□”。“𦍋”前一字原簡已泐蝕不清，然據殘畫分析，應是“𦍋”（𦍋）字，不可能是“𦍋”字。“𦍋”謂疾病有好轉。惟楚簡凡疾病禱辭“𦍋”字前後皆用于支字，包簡、望簡習見。

#### 4 王孫臯

望1·89：“賽禱王孫臯。”119：“罷禱王孫臯。”“臯”字簡文作“臯”，商承祚先生隸定作“臯”<sup>③</sup>，是也。報告隸定作“臯”，且釋云：“‘王孫臯’之‘臯’原文作‘臯’。119號簡有‘王孫臯’，與‘王孫臯’當是一人。‘臯’、‘臯’音近，此字字形又與‘臯’相近，故釋作‘臯’。”按《說文》有“臯”字，又有“卓”之古文作“卓”，乃簡文“臯”而字形稍訛。是“卓”、“臯”並非失傳字形，自不必輟轉釋“臯”。姓氏之“卓”包山牘作“鄣”，字從邑作。王孫卓乃墓主愨（卓）固之父，楚愨（悼）王之孫。古代族姓分派，孫以王父之字為氏，是楚國卓（字或作悼、渾）氏本於楚悼王，王孫臯乃其族祖，以王父諡稱為氏。簡文“臯”是本字，“臯”是通假字，與“臯”不相涉。

#### 5 同祝

望1·88釋文：“痾目黃靈習之，尚祝。”注云：“疑‘尚祝’是尚有鬼神作祟之意。”按：“尚”字商承祚先生隸定為“同”，是也。包200記貞人苛光之占辭，有“同繫”之語，而在苛光之前已有晉（許）吉為邵蛇貞，其說辭有：“又繫，袂見琬，目亢古繫之。”苛光之“同繫”者，與晉（許）吉之“又繫……”之語相同也。上引望簡之“同祝”是習卜之辭，因與前一貞人所占之“祝”相同，故記為“同祝”。迄今為止，楚簡帛尚未見有“尚祝”之語。

#### 6 先君

望1·90：“乙丑之日，賽禱先□”。簡132：“□君戡牛。”此二簡可拼合為一簡，其依據有三：其一，望山簡之“先”祇有兩種構詞之例，即“先君”和“楚先”，簡90“先”之後無疑接“君”字。且該組簡以“先”字起首之殘簡僅有132簡。其二，簡90與132寬度相合，闕口亦相合。其三，簡112：“罷禱先君東邸公戡牛。”一為“罷禱”，一為“賽禱”，用牲皆為“戡牛”，前後相呼應。“罷禱”後有“賽禱”，此乃楚簡疾病祈禱之固定格式。

#### 7 冢中有惠志

望1·180釋文：“□惠（惠）之□”。按該殘片“惠”字長達1.7釐米，“之”字僅0.6釐米。從字的間距看，“之”應是“志”字之殘。“惠”、“志”之間或脫一“於”字，簡26：“期中又惠於志。”可證。

簡185殘片“𠂔”應是“𠂔”（期）字（摹本稍有走形）；簡196殘存一“中”字；簡189殘存一“又”字。此三殘片與簡180文義相屬，或可綴連為“𠂔中又惠志”。

## 8 𠂔

望1·17：“既心𠂔目癢（𠂔），善𠂔𠂔”。37：“目不能𠂔，目心𠂔，目𠂔，𠂔（胸）𠂔（脊）疾”。38：“目心惡，不能𠂔，目聚𠂔，足骨疾”。39：“聚𠂔，足骨疾，尚毋死”。按“𠂔”讀如“便”，有如包山簡256“糗四簣𠂔”，“簣”即《說文》“𠂔”；信陽簡2·9“簣箕”即“便箕”。“便”謂大便，《漢書·韋賢傳》：“卧便利。”“便利”謂大小便。簡文“善𠂔（便）”謂腹泄，“聚（驟）𠂔（便）”謂腹泄之重症。卓固應死於因腹泄脫水而引起的尿毒症，我們可以將尿毒症的主要症狀與卓固的病症對比如下：

食欲減退。簡38“不能𠂔”，簡9“不內（入）𠂔”。

進而惡心，嘔吐。簡文屢見“惡心”、“心惡”④。

足麻木和麻痺，大腿和小腿肌肉痠攣。簡38、39均記有“足骨疾”。

頑固性嘔逆。簡17“心惡以塞”，中醫“塞”謂壅塞不通。簡文“塞”應指胸悶嘔逆。簡37“胸骨疾”，句意尤為明白。

晚期有失眠、疲勞、驚厥。簡13“不可以𠂔（動）”，簡41、42“首疾”，應屬此類症狀。

從卓固的病程分析，釋“𠂔”為“便”也是很合理的。

## 9 𠂔

望1·13釋文：“不可目（以）𠂔（動）思𠂔身𠂔”。按此句應讀作“不可目（以）𠂔（動），思（使）𠂔（舉）身𠂔（疲）”。“思”讀如“使”，包山簡習見。“舉身”謂周身、全身。《漁父》：“舉世皆濁。”“舉世”猶言“與世”。《左傳》襄公六年：“君舉不信羣臣乎？”杜預注：“舉，皆也。”“疲”謂周身疲軟。蓋卓固既患尿毒症，臨床表現有嚴重的疲勞感，故“不可以動”，周身疲軟。

10 望1·113釋文：“𠂔晉甲戌。祭𠂔”。139釋文：“𠂔祭寶。祭𠂔”。經筆者檢核原簡，湖北省博物館望山一號墓竹簡藏品5·1687為“𠂔晉甲戌。祭𠂔𠂔寶。祭𠂔”。“祭寶”二字間雖已斷開，但開口尚可密合。據此，報告之簡113與簡139應是一簡之殘斷，整理者據照片裁剪編排，遂誤為二簡，



且“祭”字重出。望山簡之整理數移其手，目前該簡藏品之拼接是正確的，惟不知出於哪一位的意見。

### 11 辛童、辛馬

望 2·6 釋文：“丹厚緇之□童。”注云：“‘童’上一字亦見於 9 號簡，似‘辛’非‘辛’疑是‘兩’字變體。”

按該字簡文作“序”，信陽簡 2·28：“八累童。”⑤，童字作“塵”，所从之“序”與該字無疑是一字。《說文》“童”字从“辛”作，故上引簡文空圓之字應隸定作“辛”。

望 2·9 釋文：“辛馬，皆又（有）臣。”按“又臣”二字應是“音”字。“音”字包山簡作“帽”，字讀如“翻”（另考）⑥。

簡文“辛童”、“辛馬”述喪車之制，疑“辛”讀如“唁”。

12 望 2·8 釋文：“貍貉之韞，□純，丹緇之戟安。”原簡“純”上無字，“純丹緇（繆？）之戟安”作一句讀。

13 望 2·13 釋文：“秦高之翌翬。”“翌”字商承祚先生釋“霽”，是。

14 望 2·20 釋文：“□之笱，綰（錦）純。卂（其）遐□”。經檢核原簡，“遐”應是“遁”之誤釋。

15 望 2·43 釋文：“□八□□”。“八”下原簡有點號，釋文此處應有相應的標點符號。空圓應是“卂”（其）字。

16 望 2·45 釋文：“二旂，二□，一敝（雕）桎”。空圓之字原簡上从金，下从木，應隸作“桎”，字讀如“禁”。

17 望 2·45 釋文：“二居鼎，一有，号廿：（二十）。”注云：“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佚書《九主》篇‘號’字左旁作𠂔，臨沂銀雀山西漢墓所出竹書‘号’字亦作‘𠂔’，與簡文同。此‘号’字疑當讀為‘驢’。《說文》：‘驢，土駘也。’”

按：此注雖能自圓其說，然望簡“𠂔”字不當讀“号”，字應从“于”聲，江陵鳳凰山 168 號漢墓簡 18：“杆八枚。”出土實物有漆盂八枚。望山二號墓出土陶盂四件，見報告頁 127。“居鼎”、“有”、“𠂔”是配套器物，筆者已另考。

### 18 𡗗𡗗

望 2·47：“四𡗗，皆𡗗𡗗。”報告於“𡗗”字未隸定，且注云：“此

字亦見48號簡，或疑為‘麋’（苴）之簡體，但仰天湖簡此二字並見，是否一字異體尚未能定。”

按該字又見於包簡190，劉釗先生謂“字从鹿省从取，應釋為‘麋’”，是正確的。《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麋”乃鹿屬動物名。“麋宮”者，以麋之皮所作“膚”之“宮”也。楚簡凡“宮”字用作器物名，皆謂包裹器物之外套，字讀如“裹”。

望2·48：“二韋國，二麋筭。”“韋國”謂熟牛革（韋）所製之“國”。“麋筭”謂麋皮所衣之“筭”。“麋筭”之器形未詳，然古有竹器而衣者，則“麋筭”應是非常講究的器物。

### 19 魯白之舉

望2·48釋文：“五□白之舉。”“舉”字補正改隸作“舉”，是正確的。“舉”讀為“簠”，竹器之名。

按空圍之字尚可辨是“魯”字，“魯白”讀“魯帛”，此謂竹器之衣。

20 望2·57釋文：“□軻，一紅緇之恒細□”。“恒”後一字原簡尚可辨是“縷”字，“恒縷”讀如“短屨”（另考）。

望2·49釋文：“一緇□。”注云：“此字左从‘系’，右下从‘女’，右上不清，有可能也是‘縷’（屨）字。”

按釋“縷”是。

## 注 釋

- ① 《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頁264，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所引望山簡釋文、考釋、補正，凡未注明者，均據此書。
- ② 《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 ③ 商承祚《戰國楚簡匯編》，齊魯書社1995年版。
- ④ 簡文“惡”字作“𡗗”（簡9）或從子作“𡗗”（簡37）、“𡗗”（簡38）。商承祚先生隸作“字”或“悖”，報告則照摹未釋。字形可參包簡213“亞”。我們目前主要依文意暫釋作“惡”，關於此字之隸定及釋義，均有待更多的辭例纔能明確。
- ⑤ 《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 ⑥ 說參拙文《楚簡器物釋名》，《中國文字》待刊。

## 說郭店簡“道”字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荊門郭店楚墓竹簡公布後，在國內外都引起了非常熱烈的討論。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竹簡佚籍的學術史性質及價值上，對竹簡本身的古文字學意義，研究還不很多。我在幾次研討會上，曾拈取簡中“衍”字，畧作論述，也是由於這個字的釋讀同學術史的問題大有關係。在一篇小文裏，我說：

例如簡中多見“衍”字，均讀為“道”。此字曾見秦石鼓文和馬王堆帛書，讀為“行”，而《汗簡》和《古文四聲韻》記為“道”字古文，云出“古《尚書》”、“古《老子》”，正與竹簡相合。……由此說明，古人流傳的《尚書》、《老子》等古文實有所本，當時人們確曾見過像郭店簡這樣的戰國簡帛書籍。<sup>①</sup>

意思基本說出來了，但語焉未詳。由於這個字確實很關緊要，本文想專門探討一下。

郭店簡中的“衍”字很多，遍及於道家、儒家書籍。前者如《老子》甲組：“以衍差人室者，不谷（欲）以兵強於天下”，即傳世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後者如《六德》：“——繇（由）其衍，唯（雖）堯求之，弗得也。”亦無疑應讀為“道”。

簡中“道”字也有作別的寫法的，如《五行》：“善，人道也；惠（德），天道也”，有長沙馬王堆帛書本可對照，其“道”字均從“頁”作“逌”。但作“衍”的，一律都是“道”字。

“衍”字在較晚的古文字裏，例子是石鼓文。石鼓的時代歷來有着爭論，近年由於秦文字發現日多，其演變脈絡逐漸清楚，可以判定石鼓文的書寫時間當在春秋晚年<sup>②</sup>。石鼓的《霽雨》一石，有這樣幾句：

□□自鄺，徒馭湯湯，  
惟舟以衍，或陰或陽。  
極深以□，□于水一方。

詩以“湯”、“衍”、“陽”、“方”為韻，皆屬古陽部③。因此，學者論此字云：

薛尚功釋“道”，楊慎云：“音道”，均誤。鼓文有“道”字，此篆當釋“行”，戶郎切，與“湯”、“陽”為韻。象形會意，行，衢道也。道中有人，行走也。④

石鼓“道”字作“衢”，分見《作原》、《吾水》二石，證明“衍”不能再讀為“道”。

馬王堆帛書有所謂“篆書陰陽五行”，實際是一種式法，卷中也有“衍”字，察其上下文，同樣須讀為“行”。

已有著作指出，“衍”字見於殷墟甲骨文⑤，然而沒有考釋說明。

甲骨文的“衍”字，或寫作“𠂔”、“𠂕”。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可能已意識到這一點，從而將幾個字形排在一起⑥。不過，他仍沿用傳統釋讀，把“𠂔”釋為“派”。該字左側確與“辰”、“永”相似，但對校文例，讀“派”或“泳”都不可通。

“衍”的幾種寫法，祇要對看《綜類》所引幾條卜辭，就不難明白了：

惠𠂔田，湄（彌）日亡𠂔（灾），禽，𠂔王。

《殷契拾掇》1, 401

惠𠂔田，弗每（悔），亡𠂔（灾），𠂔王，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2049

王其田，惠乙，湄（彌）日亡𠂔（灾），衍王，禽。

《甲骨續存》1, 1965

除這類田獵卜辭外，這個字還有別的用法，如《綜類》引用的：

癸巳卜兄貞，丁、辛吉，𠂔于並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542

辛未卜夏貞，今日王𠂔。

《甲骨卜辭七集》P81

戊戌卜貞，才（在）鷄 □ 告 □，……王其從……往來亡咎（灾），  
王其從。

《殷契佚存》995

惠康（鏞）奏，王衍。

《殷虛文字甲編》641

在這些條卜辭里，“衍”是動詞，容易看出應讀為“行”，即行走的行。“行於並”，“今日王行”，“王其行”等，都是文通字順。

前引田獵卜辭的這個字，其實也讀為“行”，不過意思不是行走，而是賜予。“行”訓為賜，古書屢見，如《周禮·羅氏》注：“行，謂付賜”，《禮記·月令》注：“行，猶賜也。”辭意是說該次田獵，神以獵物賜王，故云賜王有擒。

“行”字這一訓詁，還見於商代金文，如《商周金文錄遺》507—508方彝：

竹宁（予），父戊，告彩。

竹即孤竹國⑦。揣係孤竹君對器主有所賜予，於是作器祭祀父戊，以告這次賞賜。

總之，甲骨文的“衍”，包括其不同寫法，都是“行”字，不能釋作“道”。“行”、“道”有時可以互訓，但不是一個字，在音上也不能通假。郭店簡以“衍”為“道”，乃是一種晚起的現象。過去學者見“衍”讀“行”，懷疑其字不讀為“道”，或以為假為道⑧，都不準確。

《汗簡》及《古文四聲韻》中，“道”字有好多種形體，大別之為：

一 从辵从首

與《說文》篆文同

二 从行从首

三 从首从寸

與《說文》古文同

四 从行从首、寸

五 从辵从頁

六 从行从頁

七 从彳从頁

八 从行从人

其一、二、四三體，都見於金文⑨。“道”本从“首”聲，其或从“頁”⑩。



可理解為在“首”下从“人”。由此不妨提出一個設想，讀為“道”的“衍”是上述第六體省去聲符“首”而形成的。它和讀為“行”的“衍”是人步於衢道之間的會意字，來源本不一樣<sup>⑩</sup>。

《汗簡》記“衍”出自《尚書》，《古文四聲韻》則說出自古《尚書》和古《老子》。在本文開頭提到的小文裏，我已經說明，古《尚書》指孔壁《尚書》，本係竹簡；古《老子》指項羽妾塚《老子》，也屬簡帛，它們所使用的都可能是楚文字，因而有讀為“道”的“衍”，不足為異<sup>⑪</sup>。

“衍”讀為“道”在郭店簡發現，充分證明《汗簡》、《古文四聲韻》的古文確實來自先秦簡帛，為古文《尚書》、《老子》的可信增添了證據。

## 注 釋

- ① 李學勤：《郭店簡與儒家經籍》，《人民政協報》1998年8月3日第3版。
- ② 同上：《東周與秦代文明》，第18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增訂本。
- ③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第47—48頁，科學出版社，1982年。
- ④ 李鐵華：《石鼓新鐫》，第126頁，三秦出版社，1994年。
- ⑤ 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14頁，中華書局，1980年。
- ⑥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第323頁，汲古書院，1977年增訂版。
- ⑦ 李學勤：《試論孤竹》，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⑧ 黃錫全：《汗簡注釋》，第12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 ⑨ 容庚：《金文編》，第105頁，中華書局，1985年。
- ⑩ “首”、“頁”偏旁互換，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206頁，中華書局，1989年。
- ⑪ 《汗簡》另有从“衍”从“寸”一體，云：“道”，出《碧落文》。查碧落碑拓本未見。參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H14 b、附《碧落碑》。
- ⑫ 同①。

## 郭店楚簡《緇衣》的分章及 相關問題

彭 浩〈荊州博物館〉

郭店楚簡《緇衣》篇（刊於《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是該墓十六篇古籍之一。與這批竹簡共存的文物具有標準的楚文化風格，年代約為戰國中期偏晚（約公元前三世紀）。竹簡的年代應早於墓葬，但其文字仍為東周時期風格，估計不會早到春秋時期。

郭店楚簡《緇衣》（以下稱簡本）原無篇題，由整理者擬加，取自簡本的第一句。在簡本中，稱作“茲衣”，“茲”通作“緇”。同時，簡本文字與今本《禮記·緇衣》（以下稱今本）大體相合，故簡本《茲衣》仍沿用《緇衣》作篇名。它是目前所見《禮記·緇衣》的最早抄本。

《緇衣》的作者是春秋時期的子思。《漢書·藝文志》列有“子思子二十三篇”，宋人王應麟云：“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子作《中庸》。學界除對《中庸》的作者曾有過分歧外，對《緇衣》為子思所作則多無異議。子思名伋，孔子之孫，為魯繆（穆）公師。在郭店楚簡中還有一篇《魯穆公問子思》，可證史書之說不無出處。《孟子》中有數處記載魯繆（穆）公見子思之事，亦可為佐證。由此可知，《緇衣》是子思所作。其說屬思孟學派。在郭店楚簡的十六篇古籍中，除《老子》等道家學說外，思孟學派的著作亦佔有相當的比例。可見東周時期的楚地流行多種學派，並非道家學派的一統天下。

簡本《緇衣》現存四十八支竹簡，全篇文字完整，無缺損。簡長三十二點五厘米，每簡字數不等，但均在三十字以內，共一千一百七十四字。文字多書於竹黃一面，僅一簡的竹青面書有文字。每章文字之首皆為“子曰”，

章末的右下角皆有如小方塊形的分章符號，可據此確定全篇的分章。簡本共分二十三章，最末一簡的正文之後書“二十又三”，係全篇章數的總結，與全篇實際分章之數相合。今本的分章有三種。第一種是鄭玄的分法，全篇分作二十四章。《禮記·緇衣》鄭注：“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後皆作子曰。”由於今本已不存漢代原貌，故無法得知鄭氏是如何分章的。是否在簡本二十三章之外又增了“子言之曰……”一章，也祇能是一種推測。第二種是孔穎達疏《禮記·緇衣》，除去題疏，全篇是二十二個疏。其中有一章無疏，另有兩處是把兩段以“子曰”開頭的文字合併在一個疏之中。按孔疏來分，實際該篇是二十三章。第三種是以陳皓《禮記集說》和孫希旦《禮記集解》為代表，全篇分作二十五章，除第一章外，其餘各章皆以“子曰”開頭。這種分章方法與鄭玄之說相合，但所分章數比鄭說多出一章。孔疏所得雖然為二十三，但採用了合併章節的辦法才得到的，其法顯然不合鄭玄所指出的分章方法。今本出現的分章不一，祇能說明它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了變化。現將簡本與今本（依陳皓、孫希旦分章）的章次對應如後：

簡本章次	今本章次
一	二
二	一一
三	一〇
四	一二
五	一七
六	六
七	五
八	四
九	九
一〇	一五
一一	一四
一二	三
一三	一三
一四	七、八
一五	七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八  
二四  
一九  
二三  
二二  
二〇  
二一  
二五

從上表可以看出，簡本無今本的第一、十六、十八章。今本第七、八章分見於簡本第十四、十五、十六章，即簡本的這三章在今本中合於兩章之內。

今本的第一章以“子言之曰”開頭，與其它各章不符。同時，該章也未引用《詩》和《尚書》，也與其它各章不符。簡本各章體例一律，皆以“子曰”開頭，章末以引《詩》或《尚書》結束，引文一般不超過兩段。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今本第一章是戰國以後增入的文字，鄭玄為《禮記·緇衣》作注時已注意到該章的開頭與它章不同。可見這章文字極可能是在漢代增入的。

今本第十六章的文字是最多的，章末同時引用《尚書·泰甲》、《克命》和《尹吉》，與上述簡本各章體例顯然不同，估計是後人增入此章時添加了文字。

今本第十八章的文字較短，在“子曰”之後祇有數句短語，內容為“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其後也沒有引《詩》和《尚書》，與諸節多有不合。其文字與今本第四章“下之事上也”相重複。因此，我們判定，今本第十八章是後增入的。

以簡本與今本作比較，可以看出，今本各章次序已經錯亂。較明顯的如與簡本第六、七、八章對應的是今本的第六、五、四章；與簡本第十、十一章對應的是今本的十五、十四章。以上今本各章次序顛倒，極可能是竹簡編連次序錯亂所致。又如，與簡本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章對應的是今本的第二十四、十九、二十三、二十二章。今本的第二十四章至二十二章本來已次序顛倒，又在第二十四章後插入第十九章，致錯亂更甚。

簡本第十四章是今本第七章的前半，即“子曰：王言如絲——故大人不昌

（倡）流言”，與今本第八章的後半，即“詩云：誓（慎）爾出話，敬爾畏（威）義（儀）”合成的。這種文序較之今本顯然更為合理，文義也更順暢。簡本第十五章相當於今本的後半段，即“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寺（詩）員（云）：穆穆文王，於斯（緝）逎（熙）敬止”，所不同於今本之處在於章首有“子曰”二字，而且今本此章中的“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移入簡本的第十四章內。

簡本與今本相對應的各章的文字完全相同的是少數。除大量出現的通假字外，也還有音義不同於今本者，有的則是文句的增減不同，它們對文意的理解不能不產生影響。從總體上來看，今本的文字明顯多於簡本，而且修飾之詞增多，存在着衍文、文句錯置等現象。

簡本第一章的首句是：“夫子曰：好媿（美）女（如）好茲（緇）衣”。今本第二章與之對應的文句作：“子曰：好賢如緇衣”。鄭玄注：“緇衣，巷伯皆詩篇名。……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這種解說適合於今本的“好賢如緇衣”，而不適用於簡本，簡本的“好媿（美）”者，自然是作為人們所喜好的朝服的“緇衣”，而非是稱贊賢者鄭武公的《詩·緇衣》。一字之差，意思迥然相異。簡本“亞（惡）惡（惡）女（如）亞（惡）巷伯（伯）”句，今本無“巷伯”前的一個“惡”字。裘錫圭先生指出：“如簡文‘惡惡如惡巷伯’句‘巷伯’上‘惡’字非衍文，則孔子或《緇衣》編者似以為《巷伯》作者‘寺人孟子’在詩中所指斥之讒人，即地位較寺人為高之奄官巷伯。”此說甚是。

今本第十九章有“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鄭玄注：“質，猶少也。”陳皓《禮記集說》和孫希旦《禮記集解》均釋“質”為“正”。《詩·小宛》：“人之齊聖”，傳：“正也”。在與今本相對應的簡本第十八章中皆作“齊”，釋作“正”，可證鄭說失之。今本第二十章有：“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對文中的兩個“正”字，鄭玄認為“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簡本第二十一章這兩句中均作“駢”，從必聲，讀作“匹”。證明鄭說正確。

今本第十七章有“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簡本第五章卻無此兩句。簡文在“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句後直接“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忿（欲）之”，文意緊湊，銜接自然。今本的“心莊”、“心肅”句與



下文之“心好之”、“君好之”句意思重複，有疊牀架屋之感，故極可能是後來摻入正文的。今本還有“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簡本作“古（故）心以體法（廢），君以民芒（亡）”。今本的“心以體全”、“君以民存”句似為衍文。今本該章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其中的後三句見於《詩·小雅·節南山》，前五句既不見於簡本，亦不見於《詩》，有人曾推測為逸詩。它們也可能是後來加入正文中的。今本第十七章如果刪去以上所說的多餘文句，那麼就會使它與其它章的文字相去不遠。

今本第十四章與其相對應的簡本第十一章的文句有多處不同，它們的前半部份對照如後：

（簡）子曰大臣之不新○○○○則忠敬不足

（今）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

（簡）而賄貴已逃也邦蒙之不寧也則大臣不

（今）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簡）台而執臣忤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

（今）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

（簡）民之莠也○○○○○○○○○○

（今）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簡）古君不與少悔大○○○○○○○○

（今）○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

（簡）○則大臣不情○○○○○○○○

（今）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也

今本的“百姓不寧”，簡本作“邦蒙（家）之不寧”；前者位於“大臣不親”句後，後者位於“而賄（富）貴以逃（過）也”句後，從上下文看，“邦蒙之不寧”顯然比“百姓不寧”更貼切。因為該章所論為君臣的關係，它涉及國家的安危：由於君臣之間的疏遠，君不敬臣，臣不忠君，轉而追求個人的富貴。邦蒙不寧，則大臣不治政事，褻臣比黨。由此看來，簡本之序更優於今本。今本的“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和“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不見於簡本。有關“邇臣”的文句兩次見於今本，而簡本皆無，可知這並不是脫抄，而是以後加入的。今本的“毋以遠言近，

毋以內圖外”似為下文所引《葉公之願命》“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事”的解說，以後摻入正文的。

今本第二十五章有三處引文，分別是：《詩·小雅·小旻》的“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尚書·堯（說）命》的“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恒》爻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貞），婦人吉，夫子凶”。與今本對應的簡本第二十三章祇有《詩·小雅·小旻》的兩句引文。比較今本的引文，唯“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與上文，即“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銜接密切。同時，今本和簡本也無引《易》的它例，引《尚書》之語句在一章中也祇限於一處。從這些現象判斷，今本此章中其餘的引文是後人增加的。

今本第四章是全篇最短的：“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與之對應的簡本第八章不僅包含了以上文字，並於其後還有《詩·小雅·節南山》的兩句詩“虡（赫）虡（赫）尹（師）尹，民具爾瞻（瞻）”。在今本中，這兩句詩位於第五章。在該章中，還引有《詩·大雅·下武》和《尚書·甫刑》的句子。今本各章引文一般不超出兩處，如有超出，大多是錯置或衍文。在今本第四章中沒有《詩》或《尚書》的引文，這也不合全篇各章之例。證以簡本，本應歸入今本第四章的“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被錯置於第五章中。

## 楚簡《老子》校釋(二)

廖名春(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簡。考古專家從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徵判斷，郭店一號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因而斷定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至前3世紀初，其墓主人的身份為有田祿的上士。其竹簡的字體有明顯的戰國時期楚國文字的特點。<sup>①</sup>這些論定，都是可信的。承蒙荊門博物館領導的厚意，筆者多次親眼觀摩了這批珍貴的楚簡及其照片，對其中的《老子》簡，先行作了一些探討。爾後《郭店楚墓竹簡》一書出，又據此加以訂補。下面先列出釋文，再與帛書甲乙本、王弼本等進行比較，逐字逐句進行考釋，以求《老子》故書之原貌。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丌安也，易桀也；丌未菹也，易恐也；丌竈也，易畔也；丌幾也，易侵也。  
丌安也，易桀也：

“丌”，帛書甲本同，王弼本等作“其”，“丌”為“其”之古文，故書當作“丌”。

“也”，帛書甲本同，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桀”，帛書甲本，王弼本等作“持”。“桀”上從“止”下從“木”。《說文·手部》：“持，握也。從手，寺聲。”容庚曰：“（金文）持不從手。”<sup>②</sup>“桀”從“止”與“持”同，但形符為“木”則與“持”異，當為“持”之別構。故書當作“持”。

“也”，帛書甲本同，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丌未菹也，易恐也：

“丌”，王弼本等作“其”。“丌”為“其”之古文，故書當作“丌”。

“菹”，王弼本等作“兆”。“菹”不見於《說文》等字書，其從“萌生”義而

增艸頭，當為“兆”字的繁化。故書當作“兆”。

“也”，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悉”，王弼本等作“謀”。《說文·言部》：“謀，慮難曰謀。從言，某聲。晉，古文謀，晉亦古文。”段玉裁注：“母聲某聲同在一部。”《中山王響大鼎》：“悉慮皆從，克又工，智施。”“悉慮”即“謀慮”。“謀”字古文“晉”從言乃從心之誤，故“悉”實即“謀”之古文。故書當作“悉”。

“也”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元霏也，易畔也：

“元”，王弼本等作“其”，“元”為“其”之古文，故書當作“元”。

“霏”，王弼本、敦煌文書P2420等作“脆”，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作“毳”，《釋文》引河上公本作“脆”，范應元本作“脆”。朱謙之曰：“‘脆’即《說文》‘脆’字”，“‘脆’‘脆’為一字”，“惟‘脆’當從范本作‘脆’，作‘脆’俗。‘毳’當從古文作‘脆’”。夏竦《古文四聲韻》卷五引《古老子》正作“脆”。③高明曰：“‘毳’與‘脆’音近，‘脆’字乃‘脆’字之別構。”④案“霏”當從“毳”得聲，故亦能與“脆”通用。《荀子·議兵》：“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楊倞注：“毳，讀為脆。”《漢書·丙吉傳》：“數奏甘毳食物。”顏師古注：“毳，讀與脆同。”從楚簡“霏”看，故書當作“脆”。

“也”，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畔”，王弼本等作“泮”，景龍碑本、遂州本、樓觀臺本、樓正本、河上公本、碯溪本、顧歡本、司馬光本、林志堅本、敦煌文書S2420等作“破”，傅奕本，范應元本、焦竑本等作“判”，吳澄本作“伴”。范應元曰：“判，分也。王弼司馬公同古本。”⑤朱謙之曰：“是范所見王本作‘判’。‘泮’‘判’字通。”⑥高明曰：“作‘破’是也。後人不明古音改‘破’為‘泮’，以韻下句‘其微易散’之‘散’，殊有未當。……《說文》：‘脆，易破也。’亦可為此文不應作‘泮’之證，古韻‘破’歌部，‘散’元部，‘歌’、‘元’對轉。”⑦案高說誤。從楚簡“畔”看，故書當作“判”。“判，分也”，故下句曰“散”。“破”為“判”之同義辭，當為後人所改。“畔”、“泮”、“伴”皆“判”之借字。

“也”，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元幾也，易幾也：

“元”，王弼本等作“其”。“元”為“其”之古文，故書當作“元”。

“幾”，各本皆作“微”。《說文》：“幾，微也，殆也。”“幾”、“微”義同，故可通用。故書當作“幾”。

“也”，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踐”，各本皆作“散”。《說文·彳部》：“踐，迹也。從彳，戔聲。”段玉裁注：“按，踐同踐。”《正字通·彳部》：“踐，踐同。”“踐”由踐踏義引申而有殘毀壞義。《釋名·釋姿容》：“踐，殘也，使殘壞也。”而“散”有喪失義。“散”古音為元部心母，“踐”為元部從母。兩字音近義同，故可通用。故書當作“踐”。

“也”，王弼本等無。故書當有“也”字。

由此可知，以上四句當作：元安也，易持也；元未兆也，易恐也；元踐也，易判也；元幾也，易踐也。

為之於元亡又也，絀之於元未亂。

為之於元亡又也：

“於”，傅奕本，范應元本作“乎”，嚴遵本無。“於”、“乎”義同，故書當作“於”。

“元”，傅奕本，范應元本作“其”，王弼本等無。“元”為“其”之古文，故書當作“元”。

以上為一簡，編號為25.⑧共29字，原文為：“元安也易朱也元未兆也易恐也元踐也易判也元幾也易踐也為之於元”。

“亡”，各本皆作“未”。“亡”為“無”字之借，“無”、“未”皆表否定，義同，故可通用。故書當作“無”。

“又”，各本皆作“有”。“又”、“有”通用，故書當作“有”。

“也”，王弼本等無。從下句“亂”後無“也”字看，此“也”字當屬衍文。“也”後有小黑點，當為斷句的標志。

絀之於元未亂

“絀”，各本皆作“治”。“絀”為“治”之別構，《汗簡》、《古文四聲韻》所載《義雲章》所載“治”字與楚簡“絀”形極近。⑨故書當作“治”。

“於”，傅奕本、范應元本作“乎”，嚴遵本無。“於”、“乎”義同，故書



當作“於”。

“元”，傅奕本、范應元本作“其”，王弼本等無。“元”為“其”之古文，故書當作“元”。

“亡”，各本皆作“未”。“亡”為“無”字之借，“無”、“未”皆表否定，義同，故可通用。故書當作“無”。

由此可知，以上兩句當作：為之於元無又，治之於元未亂。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甲〔於臺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字以下楚簡有殘損，據帛書乙本和王弼本，當補“抱之木生於毫”6字。

“末”字上部殘，據帛書甲乙本和王弼本而推定。

九成之臺，甲〔於臺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

“成”，帛書甲、乙本、傅奕本、范應元本，焦竑本同，王弼本等作“層”，嚴遵本、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等作“重”，敦煌文書P2420、敦煌壬本作“曾”。“曾”為“層”之借字。朱謙之曰：“《說文》：‘層，重屋也。’《呂覽·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高注：‘成，猶重也。’又《爾雅》以丘一重、再重為一成。《楚辭·天問》：‘璣臺十成。’十成即十重也。成、層、重義同。”<sup>⑩</sup>其說是。但從楚簡、帛書甲乙本皆作“成”看，故書當作“成”。

“甲”，疑“乍”字形誤。林義光《文源》以為“乍”“即作之古文”。《甲骨文合集》14201：“貞，勿乍邑、帝若。”《宰甫簠》：“王光宰甫貝五朋，用乍寶鬯。”《墨子·兼愛下》：“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乍”即“作”。“作”乃後起孳乳字。故帛書甲乙本皆作“作”，王弼本等作“起”，同義互用。故書當作“乍”。

“甲”後楚簡有殘損，據帛書甲、乙本與嚴遵本，<sup>⑪</sup>當補“於臺土百仞之高始於”9字。

以上為一簡，編號為26，殘存16字，原應有31字。原文為“亡又也絢之元未亂合□□□□□末九成之臺甲□□□□□□□□”。

由此可知，以上幾句當作：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乍〔於臺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

“下”字後有黑點，但較平常一章結束的標志正方形黑點小，當為一段結束的標志。以上屬於王弼本第六十四章。但帛書甲乙本和王弼本等今本後有“為者敗之”至“而不敢為”一段，楚簡所接卻非此段，而直接王弼本第56章。

以上“朱”〔持〕、“恣”為韻〔之部〕，“畔〔判〕”、“後”，“亂”、“末”為韻〔元、月合韻〕，殘損部分據帛書甲、乙本補，當是“土”、“下”為韻〔魚部〕。

智之者弗言，言之者弗智。

智之者弗言：

“智”，各本均作“知”。“智”、“知”古通用，但故書當作“知”。

“之”，各本皆無。當為衍文。

“弗”，帛書甲、乙本同，王弼本等皆作“不”。“弗”、“不”古通用，但故書似應作“弗”。“言”字後傳奕本，范應元本後有“也”字，從楚簡和帛書甲乙本看，當屬衍文。

言之者弗智：

“言”，依重文符“二”轉寫。

“之”，各本皆無，當為衍文。

“弗”，帛書甲、乙本同，王弼本等皆作“不”。“弗”、“不”古通用，但故書當作“弗”。

“智”，各本均作“知”。“智”、“知”古通用，但故書當作“知”。

傳奕本，范應元本“治”後有“也”字，從楚簡和帛書甲乙本看，當屬衍文。

由此可見，此兩句當作：智者弗言，言者弗智。

閔汧說，賽汧門，味汧光，迴汧斲，剡汧禽，解汧紛，是胃玄同。

閔汧說：

“閔”，各本皆作“塞”。“閔”當為“閉”字之誤。今本第五十二章的“塞汧兌，閔汧門”，楚簡就作“閔〔閉〕汧門，賽〔塞〕汧說”。“閉”、“塞”義

同，故可通用。

“元”，帛書甲、乙本同，其它各本作“其”。“元”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元”。

“送”，帛書甲本作“悶”，乙本作“堯”，其它各本作“兑”。俞樾曰：“‘兑’當讀為‘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闕來風’。‘闕’從‘兑’聲，‘闕’可段作‘穴’，‘兑’亦可段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⑫ 孫詒讓曰：“‘兑’當讀為‘隧’，二字古通用。襄二十三年《左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禮記·檀弓》鄭注引之，云：‘隧，或為兑。’《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篇又作‘茲於兑’，是其證也。《廣雅·釋室》云：‘隧，道也。’《左傳·文元年》杜注云：‘隧，徑也。’‘塞其兑’，亦謂塞其道徑也。”⑬ 奚侗曰：“《易·說卦》：‘兑為口。’引申凡有孔竅者皆可云‘兑’。《淮南·道應訓》：‘王者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兑。’高注：‘兑，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兑’是也。”⑭ 案俞、奚說是。“兑”可訓作“穴”，故耳目鼻口凡有孔竅者皆可云“兑”。楚簡的“送”、帛書乙本的“堯”，皆為“兑”之假借。帛書甲本作“悶”，帛書整理小組疑是“闕”字之誤。⑮ 高明以為“此字絕非作‘悶’解的‘悶’字。甲本中之‘悶’字乃‘闕’之省，正體當寫作‘闕’，讀音必與‘兑’字相同。‘闕’字由二、門、心三者組成。《說文·門部》：‘兩，登也。从門=，‘=’，古文‘下’字，讀若軍陳之‘陳’。”段玉裁注：‘按从“門=”當作“从門二”，篆當作“兩”。《篇韻》“闕”字可證。直刃切十二部，從此為聲者有“闕”、“闕”。’按《玉篇》有‘迺’字，良刃切。《字匯補》有‘闕’字，良刃切。皆舌音字。‘兩’即‘闕’字之聲符‘問’，‘問’與‘兩’乃同字異形，讀音如‘陳’（陣）。古聲在定紐，韻在真部，恰與‘兑’字同音。‘兑’古亦定紐字，韻為入聲月部，‘真’、‘月’乃一聲之轉。”⑯ 高說是。

### 賽元門：

“賽”，各本皆作“閉”。“賽”為“塞”之借字。王念孫曰：“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為之。”⑰ “塞”、“閉”義同，故各本以同義詞“閉”代“塞”。

“元”，帛書甲、乙本同，其它各本作“其”。“元”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元”。

咏元光：

“咏”，各本作“和”。《說文·口部》：“和”作“咏”，《玉篇·口部》：“咏古文和。”楚簡“和”字皆作“咏”。故書當作“咏”。

“元”，帛書乙本同，其它各本作“其”。“元”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元”。

迴元斡：

“迴”，各本皆作“同”。“迴”為“同”之借字，故書當作“同”。

“元”，帛書甲、乙本同，其他各本作“其”。“元”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元”。

“斡”，帛書甲本作“𡗗”，帛書乙本作“𡗗”，其他各本作“塵”。《說文·麤部》：“𡗗，鹿行揚土也。從麤，從土。”段玉裁注：“群行則塵土甚，引申為揚土之偁。”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𡗗，亦省作塵。”帛書乙本“𡗗”字乃“𡗗”字之省寫，上部三“鹿”都簡寫為“井”狀。“塵”則將“𡗗”上部三“鹿”省為一“鹿”。“𡗗”乃“𡗗”之借字。《說文·走部》：“趁，讀若塵。”可為一證。“斡”，或作“斡”。“斡”、“斡”，楚簡多與“慎”通。《禮記·緇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楚簡“慎”作“斡”，又“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楚簡“慎”也作“斡”。引《詩》“淑慎爾止”，楚簡“慎”作“斡”。引《詩》“慎爾出話”，楚簡“慎”也作“斡”。而“塵”與從“真”之字亦可相通。《爾雅·釋詁下》：“塵，久也。”《詩·大雅·桑柔》毛傳：“填，久也。”《正義》：“古塵填字同。”由是可知，“塵”與“慎”、“斡”、“斡”自然亦可通用，今本“塵”，王弼注意釋為“賤”，⑩後人本之釋為“一般”；⑪高亨以本字釋之，訓為“行動塵迹”。⑫皆有問題。比較之下，當以楚簡“斡”為是。“斡”，《說文·言部》：“斡，喜也。从言，斤聲。”段玉裁注：“此與《欠部》‘欣’音義皆同。”上兩句“閉元兌”與“塞元門”義近。此兩句“咏元光”與“同元斡”亦當義近。“光”為榮光，“斡”為欣喜，大致相配。“斡”後原有重文符號“=”，當屬衍文。因為前後都是三字句，此獨為四字句，不協。由此可知，故書當作“斡(斡)”，“𡗗”、“𡗗”(𡗗、塵)皆為借字。

剡元壽：

“剡”，帛書甲本作“坐”，帛書乙本作“銓”，王弼本等作“挫”。“剡”、

“銑”、“挫”同源，皆可通用，但故書當作“剡”。《說文·刀部》：“剡，析傷也。从刀，坐聲。”段玉裁注：“與《手部》‘挫’音同義近……經史‘剡析’字多作挫。”從賓詞“銳”看，“剡”、“銑”皆可，但“銑”後起。“坐”為“剡”之借字。

“元”，帛書甲、乙本同，其它各本作“其”，“元”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元”。

“彘”，帛書甲本作“閼”，帛書乙本作“兌”，王弼本作“銳”。“彘”，上部為“金”之省文，下從兩“尹”，“尹”古音與“允”同，而從“允”之字與從“兌”之字可通用。《書·顧命》：“一人冕執銳。”《說文·金部》引“銳”作“銳”。《書·禹貢》：“濟河惟衮州。”《史記·夏本紀》作：“濟河維沅州。”《周禮·夏官·職方氏》：“河東曰衮州。”《說文·艸部》引“衮州”作“沅州”。《史記·天官書》：“角、亢、氏、衮州。”《漢書·天文志》“衮”作“沅”。《集韻·獮韻》：“抗，動也，揣也，或从抗。”今本《老子》第九章：“揣而銳之。”帛書乙本“抗”作“允”，而楚簡本則作“羣”。是“尹”、“允”、“兌”相通之證。“彘”字下從兩“尹”與下從兩“允”同，而“允”、“兌”形近，從“兌”字與從“允”常混，故下從兩“允”實即下從兩“兌”，其字當作“彘”，“彘”為“銳”字的繁化，“閼”、“兌”為“銳”之借字，故書當作“銳”。

### 解元紛

“解”，前帛書乙本有“而”字，當為衍文。

“元”，帛書甲、乙本同，其它各本作“其”。“元”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元”。

“紛”，帛書甲乙本、河上公注本、碯溪本、趙孟頫本、樓正本、傅奕本、范應元本、司馬光本、邵若愚本、蘇轍本、吳澄本、彭紹本、焦竑本同；王弼本作“分”；景龍本、景福碑本、樓觀臺本、遂州本、嚴遵注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等作“忿”。馬叙倫、<sup>②①</sup>蔣錫昌、<sup>②②</sup>高亨<sup>②③</sup>皆從河上公注本作“紛”。武內義雄則以為“紛”為“忿”之借字。<sup>②④</sup>古棣本之，並加以申論，認為“作‘忿’，解除其忿恨，與本文順理成章，與老子精神全合。七十九章‘報怨以德’，‘和大怨’與此相通，‘解其忿’亦即‘和大怨’，這是老子的一個重要思想。本章上句‘挫其銳’即鈍其鋒芒之意，亦與‘解其忿’義近，兩者又與‘勇於不



敢則活’相通”<sup>②⑤</sup>。朱謙之則說：“案《呂覽·慎大篇》‘紛紛分分’，注：‘恐恨也。’疑‘分’字為‘禁’字之省字。《左》隱四年傳‘猶治絲而禁之也’，《釋文》：‘亂也。’王本‘解其分’，即解其紊亂也。敦、景、遂本作‘忿’。按《廣雅·釋詁》三：‘忿，怒也。’《易·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楚辭·懷沙》‘懲改忿兮’，注：‘恨也。’‘改忿’亦即‘解其忿’。二說均通。”<sup>②⑥</sup>案“紛”、“分”、“忿”雖通用，但從楚簡和帛書甲乙本看，故書應作“紛”。武內義雄、古棣、朱謙之說不確。

王弼本等“剋其銳，解其分”兩句在“和其光，同其塵”之上，而楚簡本與帛書甲乙本“剋其銳，解其紛”則在“味其光，迴其斂”後。張松如、<sup>②⑦</sup>古棣<sup>②⑧</sup>以王弼本之序為是，誤矣。當以楚簡本與帛書本之序為是。

此外，關於以上六句還有種種異說。馬叙倫認為：“‘塞其兌’二句乃五十一章文，讀者因‘門’字與‘紛’‘塵’音協，因而誤記於此，校者不敢刪，遂復出矣。‘剋’‘銳’‘解’‘紛’‘和’‘光’‘同’‘塵’，正說‘玄同’之義，不得無此四句。”<sup>②⑨</sup>易順鼎說：“按此六句皆已見前，疑為復出。‘挫其銳’四句與上篇第四章同，乃上篇無注，而此皆有注，疑此注亦上篇第四章之注也。《文選·魏都賦》、《運命論》兩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並無此六句，可證其為衍文矣。”<sup>③①</sup>石田羊一郎說同。<sup>③②</sup>蔣錫昌曰：“四章王注‘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是明係‘挫其銳’四句之注，何得謂無注，又《選》注乃約引此文，亦不可舉以為證也。易說非是。”<sup>③③</sup>古棣說：“《魏都賦》李善引《老子》是注‘世篤玄同’的，本文與‘塞其兌’等六句無干，自可節引，省此六句。《運命論》之言曰：‘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這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可以攀扯得上，而跟‘塞其兌’等則連邊也不沾。如是，李善注自可節引，省此六句，古人引文本來不甚嚴格，又沒有刪節號，豈可據李善注而斷言《老子》‘塞其兌’等六句為衍文。既是假定李善所見《老子》確無此六句，那也祇是《老子》唐本中有一種本子無此六句，也不能證明《老子》原本無。……不能一見有兩句重出就斷言一定有一處是衍文或錯簡，而應具體分析。”<sup>③④</sup>從楚簡和帛書看，其說是。馬叙倫、易順鼎、石田

羊一郎說皆有所不確。

“紛”字以上為一簡，編號為27，共30字，原文作：“為下智之者弗言=之者弗智閱元送賽元門咏元光迴元斲=剝元斲解元紛”。

是胃玄同：

“胃”，帛書甲乙本同，王弼本等作“謂”。“胃”為“謂”之借字。

由此可知，以上七句當作：閉元兌，塞元門，咏元光，同元斲，剝其銳，解元紛，是謂玄同。

古不可尋而新，亦不可尋而足，不可尋而利，亦不可尋而害，不可尋而貴，亦可不可尋而妄，古為天下貴。

古不可尋而新：

“古”，帛書甲乙本、王弼本等皆作“故”。“古”、“故”同源通用，金文即以“古”為故，長沙子彈庫帛書亦有借“故”為“古”者。此處應以“故”為是。傅奕本、嚴遵本、范應元本、宋徽宗本、邵若愚本、彭耜本無“故”字，不可從。

“尋”，各本皆作“得”。“尋”、“得”古通，甲骨、金文皆有此二構。但“尋”應為初文，“得”恐係後出。

“而”，敦煌文書S6453、遂州本、景福碑本無，不可從。

“新”，各本皆作“親”。“新”、“親”古通。《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新，馬本作親。”《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唐石經》“新”作“親”。《逸周書·官人》：“誠忠必有可新之色。”《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新”作“親”。《史記·孝文本紀》：“親與朕俱棄細過。”《漢書·文帝紀》“親”作“新”。此處應作“親”。

帛書乙本“親”後有“也”字，不可從。

亦不可尋而足

“亦”，帛書甲乙本、景福碑本、傅奕本、范應元本、河上公注本、司馬光本同，王弼本、宋徽宗本、邵若愚本、彭耜本、嚴遵本、遂州本、景龍碑本、敦煌文書S6453無，不可從。顧歡本“亦”作“故”，蓋涉上句而誤。

“尋”，各本皆作“得”。“尋”、“得”古通，但“尋”應為初文，“得”恐係後出。

“而”，敦煌文書S6453、遂州本、景福碑本無，不可從。

“足”，帛書甲本等皆作“疏”，王弼本、<sup>②④</sup>敦煌文書P2420、河上公注本、司馬光本作“疏”。《說文·足部》：“足，足記也。”段玉裁注：‘記’下云‘足也’，是為轉注，後代改足為疏耳，足、疏古今字。”其說是。甲骨文、楚簡、古璽中多見“足”字而不見“疏”字，睡虎地秦簡和馬王堆帛書中“疏”字始見，可知“疏”字當後出。而“疎”為“疏”之異體。《廣韻·魚韻》：“疏，俗作疎。”故“疏”、“疎”皆後起字，故書應作“足”。

不可得而利：

“得”，各本皆作“得”。“得”、“得”古通，但“得”應為初文，“得”恐係後出。

“而”，敦煌文書S6453、遂州本、景福碑無，不可從。

亦不可得而害：

“亦”，帛書甲本、傅奕本、河上公注本、景福碑本、景龍碑本、司馬光本、顧歡本同，王弼本、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無，不可從。

“得”，各本皆作“得”。“得”、“得”古通，但“得”應為初文，“得”恐係後出。

“而”，敦煌文書S6453、遂州本、景福碑本無，不可從。

畢沅曰：“王弼‘害’作‘劇’。蘇靈芝書作‘穢’。《說文解字》：‘劇，利傷也。’無‘穢’字。”<sup>②⑤</sup>易順鼎曰：“王注曰：‘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是王亦作‘害’。畢說不知何據？”<sup>②⑥</sup>易說是。王弼本作“害”不作“劇”，畢沅所見當為別本。“穢”為“劇”之別寫，而“穢”與“害”義近。當以“害”為是。

“害”字以上為一簡，編號為28，共27字。原文作“是胃玄同古不可得而新亦不可得而足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

“得”，各本皆作“得”。“得”、“得”古通，但“得”應為初文，“得”恐係後出。

“而”，敦煌文書S6453、遂州本、景福碑本無，不可從。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趙孟頫石刻本無此句，不可從。

亦可不可得而蔑：

“亦”，帛書甲本、傅奕本、范應元本、河上公注本、景福碑本、景龍

碑本、司馬光本、顧歡本同，王弼本、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無，不可從。

“亦”後之“可”字，各本皆無，當屬衍文。

“得”，各本皆作“得”。“得”、“得”古通，但“得”應為初文，“得”恐係後出。

“而”，敦煌文書S6453、遂州本、景福碑本無，不可從。

“淺”，兩淺原作左右結構，信陽楚簡皆如此。<sup>③</sup>帛書甲本作“淺”，其它各本作“賤”、“淺”，“淺”、“賤”古通，信陽楚簡“淺人”兩見，“淺”即“賤”之借字。<sup>④</sup>當以“賤”為正。

古為天下貴：

“古”，嚴遵本無，其它各本作“故”。“古”、“故”同源通用，但此處故書應作“故”。

“貴”下有正方形黑點，但未留空，當是一章結束的標志。

由此可知，以上七句當作：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足，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自“智之者弗言”至“古為天下貴”相當於王弼本的第五十六章。

此章“門”、“斷”、“紛”為韻（文部）。

以正之邦，以戢爾兵，以乍事取天下。

以正之邦：

“正”，傅奕本、易玄本、磻溪本、唐玄宗本等作“政”。馬叙倫曰：“各本及《尹文子·聖人篇》引作‘正’，是。正與奇對文。”<sup>⑤</sup>其說是。“正”、“政”同源通用，但故書應作“正”。

“之”，帛書甲乙本、遂州本同，王弼本、傅奕本、易玄本、磻溪本等作“治”，唐玄宗本、顧歡本等作“理”。馬叙倫曰：“‘治’，臧疏作‘理’，蓋避唐高宗諱改也。秦卷館本作‘之’。嶮河上注曰：‘以，至也。’似以‘至’字釋句首‘以’字。‘以’字古無至訓。秦卷引河上注曰：‘之，至也。’則以為‘之’字之譌。是河上‘治’作‘之’。今作‘治’者，後人據別本改也。”<sup>⑥</sup>其說是。高明認為‘之’字假借為‘治’，當作‘以正治國’。<sup>⑦</sup>恐不確。《戰國策·齊策三》：“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竟亦有所不及矣。”高誘注：“之，猶用也。”“以正之國”，即“以正用國”。楚簡、帛書甲乙本皆作“之”，絕非偶然，是“之”字不誤之證。後人不明“之”有“用”義，遂改為“治”，



唐人又避唐高宗李治諱改為“理”。原本當從楚簡、帛書甲乙本作“之”。

“邦”帛書甲本同，帛書乙本、王弼本等作“國”。案故書當作“邦”，“國”係漢人避漢高祖劉邦諱改。

以戢用兵：

“戢”，帛書甲、乙本作“畸”，王弼本等作“奇”、易玄本作“其”。“戢”，不見於字書，當為“奇”字的繁化。“畸”、“奇”古通，此處故書當作“奇”。“其”為“奇”之別字。

“用”，各本皆作“用”。“用”、“用”本為一字，後遂分化，故可通用。《曾姬無卣壺》“用”字兩見，<sup>⑫</sup>皆讀為“用”；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民勿用”，“用”也當為“用”之借字因此故書當作“用”。

以乍事取天下：

“乍”，帛書甲本作“无”，其它各本作“無”。楚簡中“乍”與“亡”形近，如“為亡為，事亡事，未亡未”之“亡”，與“乍”字區別極少。“亡”上一橫往左一出頭就成了“乍”字，所以此“乍”字絕非“詐”之借字。而是“亡”之誤書。“亡”為“無”之借字，古書習見，“无”“無”古通。故書當作“無”。

“事”，達真子《老子》作“為”，<sup>⑬</sup>不可從。

“事”字以上為一簡，編號為29，共28字。原文作：“不可尋而貴亦可不可尋而貴古為天下貴■以正之邦以戢用兵以乍事”。

由此可知，以上三句當作：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虐可以智示狀也？夫天多異章而民爾畔，民多利器而邦慈昏。

虐可以智示狀也：

“虐”，各本作“吾”。“虐”字不見於《說文》，當為“吾”之借字。“虐”從虐從壬，壬當為義符。《說文·壬部》：“壬，善也，從人土。”甲骨文“壬”像人挺立土上之形，故從壬猶從人。“吾”為第一人稱代詞，故“虐”字義符從壬。虐為“虐”字之聲符，古音與“吾”同屬魚部，故可通用。信陽楚簡“虐聞周公”，<sup>⑭</sup>“虐”當讀為“吾”，用法與此同。

“可”，傅奕本、范應元本作“奚”，其它各本皆作“何”。“可”、“何”同源，“奚”、“何”義同，故能通用。但此處故書當作“何”。

“智”，各本皆作“知”。“智”、“知”古通。但此處故書當作“知”。



傅奕本、范應元本、磻溪本、樓正本、焦竑本、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知”後有“天下”二字。馬叙倫以為“涉上句而衍”。<sup>④</sup>其說是。

“忼”，帛書乙本同，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作“之”，其它各本作“其”。“忼”為“其”之古字，故書當作“忼”。“之”係據“其”改，不足為憑。

“狀”，各本皆作“然”。《說文·肉部》：“然，燒也。從火狀聲。”“狀，犬肉也，從犬、肉。讀若然。”《玉篇·肉部》：“狀，然字從此。”天星觀楚簡中“然”多作“狀”，信陽楚簡、望山楚簡亦有。<sup>⑤</sup>此處故書應作“然”。

“也”，帛書甲本作“也哉”，帛書乙本作“也才”，王弼本、傅奕本、范應元本、磻溪本、樓正本、顧歡本、焦竑本作“哉”，景龍本、景福碑本、易玄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無。“哉”、“才”與“也”皆為語氣詞，可以通用。“也哉”、“也才”恐係綜合二本之作，景龍本等恐係為求簡潔刪去語氣詞。當以楚簡本作“也”為是。

王弼本等“哉”後有“以此”二字，楚簡、帛書甲乙本、嚴遵本、宋徽宗本、邵若愚本、司馬光本、蘇轍本、吳澄本、彭耜本無。俞樾曰：“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一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為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為一章，今誤合之。”<sup>⑥</sup>馬叙倫說與俞同。<sup>⑦</sup>勞健則將“以此”與下文“夫”連讀。<sup>⑧</sup>蔣錫昌曰：“‘此’乃指下文一段文字而言，俞謂下文別為一章，非是。此言吾何以知天下必無事為治乎？以此下文知之也。”<sup>⑨</sup>高明曰：“俞、蔣二氏所講彼此意見雖然不同，但各有一定道理。俞氏舉二十一章與五十四章‘並用“以此”二字為章末結句’，故而提出‘自“以正治國”至此數句當屬上章’，亦當用‘以此’作章末結句。這是很見解的看法。說明本章在中間出現‘以此’二字，是違《老子》書中常例的。故而懷疑‘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為一章，今誤合之’。換而言之，本章此文既非章末結句，即不當出現‘以此’二字。誠然，帛書甲、乙本與嚴遵等世傳今本均無‘以此’二字，說明無‘以此’二字是符合《老子》書中通例的。《老子》云：‘吾何以知其然也哉？’正如蔣錫昌所云：‘此言吾何以知天下必以無為治乎？以此下文知之也。’因蔣氏不知‘以此’二字為衍文，故用‘以此下文知之’解之。實際上《老子》是以下面四句極富有哲理的論點直接解答‘何以知其然’的疑問的，前後語氣連貫，詞義明確，流暢。可見‘以此’

二字非老子原本所有，乃由後人妄增，當據帛書甲、乙本刪去。”<sup>⑤</sup>從楚簡本看，其說是。“夫”當屬下讀，勞健說不確。在看到帛書甲、乙本後，張松如、<sup>⑥</sup>陳鼓應、<sup>⑦</sup>馮達甫、<sup>⑧</sup>古棣等仍堅持“《老子》故書應有‘以此’二字”，<sup>⑨</sup>其誤甚。

夫天多具韋而民爾畔：

“夫”，帛書甲乙本、傅奕本、范應元本、樓觀臺本、邵若愚本、宋徽宗本、彭耜本、司馬光本、吳澄本同，王弼本、河上公注、遂州本、景龍碑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無。王弼本等恐為求簡潔而刪，當從楚簡有“夫”為是。

“天”，各本皆作“天下”。楚簡非脫“下”字，此“天”與“民”相對乃作君解。《爾雅·釋詁》：“天，君也。”《詩·大雅·蕩》：“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毛傳：“天，君。”《儀禮·喪服》：“夫者，妻之天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偷安天位。”薛綜曰：“天位，帝位。”後人不解“天”有君義，乃妄增一“下”字。而“天下”與“邦”、“國”義近，而人遂不疑。蔣錫昌曰：“‘天下’，謂天下之人主也。”是從文例看出了問題，故有“人主”之訓。但不知“下”為衍文，以“天下”為“天下之人主”，屬增字為訓，故書當從楚簡作“天”。

“具”，各本作“忌”，“具”乃“期”字異體，多見於包山楚簡、天星觀楚簡。<sup>⑩</sup>上“日”表義，下“丌”表音。“日”、“月”作義符通用，“丌”即“其”，包山楚簡中字又多作“𠂔”。<sup>⑪</sup>“日”則居於“丌”中。《說文》：“𠂔，古文期。”可知“具”、“𠂔”都是“期”在戰國文字中的異寫。“具”（期）為“忌”之借字。《戰國策·齊策一》“田忌”，《竹書紀年》作“田期”就是證明。文獻中，從“丌”、從“其”之字與從“己”之字多相通。如“其”與“己”、“其”與“記”、“恭”與“忌”、“慕”與“期”、“慕”與“忌”、“期”與“詔”等。<sup>⑫</sup>此處應以“忌”為正。

“韋”，各本皆作“諱”。“韋”、“諱”古通，此處當作“諱”。

“民”，景龍碑本、遂州本作“人”，當為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諱改。

“爾”，傅奕本作“爾”，其他各本皆作“彌”。《說文》：“彌，久長也，從長爾聲，今字作彌。”《小爾雅·廣詁》：“彌，益也。”“爾”、“彌”古通，故書應作“彌”。

“畔”，各本皆作“貧”。“畔”，即“叛”。“忌諱多”指法令嚴酷，故言民“叛”。官逼則民反，政苛則民叛。作“貧”則“忌諱多”不解。“畔”古音為元部並母，“貧”為文部並母。<sup>⑤</sup>聲同韻近。《禮記·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呂氏春秋·慎大覽》“衅”作“釁”。<sup>⑥</sup>是從“分”與從“半”之字可通之證。疑“貧”、“畔”音近，後人遂以“貧”代“畔”，故書應作“畔（叛）”。

### 民多利器而邦茲昏：

“民”，景龍碑本、遂州本、樓觀臺本、邵若愚本、宋徽宗本、彭耜本作“人”。傅奕本無。蔣錫昌：“民”當從諸本作“人”。蓋“天下多忌諱”，“人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四句皆指人主而言，以明有事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三十六章：“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亦指人主而言，可為證也。《道德真經取善集》引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是羊本亦作“人。”<sup>⑦</sup>從楚簡和帛書甲、乙本看，蔣說不確。景龍碑本等作“人”當為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諱改。傅奕本無，其主語當承上省。

“而”，帛書甲本、范應元本同，<sup>⑧</sup>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注本、景龍碑本、遂州本、樓觀臺本、邵若愚本、宋徽宗本、彭耜本、司馬光本、吳澄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等皆無。王弼本等當因求簡潔而刪。故書當有“而”字。

“邦”，帛書甲本作“邦家”，王弼本等作“國家”。“國家”從“邦家”而來，當為漢人避漢高祖劉邦諱改。從漢語詞匯發展看，單音詞早於複音詞。因此“邦家”當從“邦”衍生出。故書當作“邦”。

“茲”，帛書甲本作“茲”，王弼本等作“滋”。馬叙倫曰：“‘滋’當為‘茲’。”《說文》曰：“茲，艸木多益。”<sup>⑨</sup>其說是。“茲”為初文，“滋”為後起字，“茲”為“茲”之借字。故書當從帛書甲本作“茲”。

由此可知，以上三句當作：吾何以知忒然也？夫天多忌諱而民彌叛，民多利器而邦茲昏。

人多智而弼勿慈忒，灋勿慈章，眡息多又

### 人多智而弼勿慈忒：

“人”，傅奕本、范應元本、司馬光本、陸希聲本等作“民”。“人”、“民”

義同，故可通用。但據楚簡和帛書甲本，故書當作“人”。

“多”字以上為一簡，編號為30，共29字。原文作：“取天下虛可以智示朕也夫天多兵革而民爾畔民多利器而邦慈昏人多”。

“智”，帛書甲本作“知”，傅奕本作“知慧”，范應元本作“知惠”，陸希聲本作“智慧”，遂州本、敦煌文書S6453作“知巧”，王弼本、河上公注本、敦煌文書P2420作“伎巧”，易玄本、樓觀臺本、邵若愚本、焦竑本作“技巧”，司馬光本作“利巧”。“智”、“知”古通，但依楚簡，故書當作“智”。“惠”、與“慧”通。“智慧”、“知惠”、“知巧”為複合詞皆由單音詞“智”衍生，係後人的增添，“伎”、“技”韻與“智”、“知”同，“技巧”、“伎巧”恐皆從“知巧”、“知慧”、“智慧”來，“利巧”同。鄭良樹認為“與上文‘忌諱’、‘利器’及下文‘法物’相對為文，帛書甲本恐有奪文”，④高明認為帛書“甲本‘知’後奪一字”，“所奪的當為‘巧’字”。⑤說皆不確。帛書乙本此處有殘損，可置而不論，但楚簡作“智”，帛書甲本作“知”，皆無“巧”字，當非巧合。

“而”，帛書甲本、傅奕本、范應元本同，王弼本、易玄本、樓觀臺本、邵若愚本、陸希聲本、焦竑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等無，據楚簡，故書當有“而”字。

“𡗗”，帛書甲本作“何”，王弼本、河上公注本、易玄本、樓觀臺本、邵若愚本、焦竑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等作“奇”，傅奕本、范應元本作“衰”，陸希聲本作“邪”。“𡗗”，亦作“𡗗”，“奇”之別寫。“何”，“奇”之借字。三字皆從“可”得聲，故可通用。“奇”有奇邪，詭異不正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擅興奇祠，皆二甲。可如為奇？王室所嘗祠固有矣，擅有鬼立殿為奇，它不為。”“奇”作奇邪解。《禮記·祭儀》：“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奇邪”連言，可見“奇”與“邪”同義。“衰”、“邪”義近，皆“奇”之同義詞，故可代用。朱謙之以為“傅范誼古而理勝，當從之”，⑥不確。據楚簡和帛書，故書當作“奇”。

“勿”，帛書甲、乙本、王弼本等作“物”，傅奕本、范應元本、陸希聲本作“事”。“勿”、“物”古通，“事”與“物”義同。朱謙之以為當從傅奕本、范應元本，⑥不確。據楚簡和帛書，故書當作“物”。

“慈”，帛書甲本作“茲”，王弼本等作“滋”。“茲”為初文，“滋”為後



起字，“慈”為“茲”之借字，故書當從帛書甲本作“茲”。

“迺”，各本作“起”。“迺”為“起”之異寫。《說文·走部》：“迺，古文起，從辵。”從辵、從走義近，故可通用，俞樾曰：“‘起’，古文作‘迺’。《漢書·孝哀帝紀》：‘……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迺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起於側陋’，謂從微賤起家，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

④ 故書當作“迺”。

## 灋勿慈章

“灋”，各本皆作“法”。《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法，今文省。”“灋”為本字，“法”為後起簡化字。故書當作“灋”。

“勿”，帛書乙本、景龍碑本、景福碑本、河上公注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等作“物”，王弼本、樓觀臺本、范應元本、蘇轍本、吳澄本、焦竑本等作“令”。馬叙倫曰：“‘令’字是，‘物’字涉上‘哀事’一本作‘奇’而譌”

⑤ 蔣錫昌曰：“‘令’字景龍碑、河上本皆作‘物’，以《老》校《老》，當從之。三章‘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十九章‘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五十三章‘財貨有餘，是謂盜夸’，皆以貨物與盜賊連言，均其例證。”礪冰據帛書乙本進一步證明原作“法物滋彰”，今本作“法令滋彰”者，乃淺人所改。⑥ 高明說同。⑦ 鄭良樹則曰：“古本老子此文蓋有二系統耳。前一系統‘法物’作‘法令’……帛書乙本作‘法物’……此別一系統也，與前者有異。法，謂法令；物，謂權勢所召來之備物也。《國語·周語中》載周襄王語晉使曰：‘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物，即王者所備之物。《左》昭公七年傳‘用物精多’杜注云：‘物，權勢也。蓋權勢可召各種物備，故杜氏訓‘物’為‘權數’也，老子此文‘物’字，與國語及左傳同；河上注：‘法物，好物也。’訓‘法’為‘好’，作‘珍好之物’解，恐非老子本義。”⑧ 案，蔣、礪、高說是，馬、鄭說不確。楚簡“勿”為帛書乙本等“物”之借字，足證故書不作“令”。河上公注：“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饑寒並生，故盜賊多有也。”其說是。《後漢書·光武帝紀》下：“益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李賢注：“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此指帝王用於儀仗。



祭祀的器物，當為狹義；珍好之物當為一般義。

“慈”，帛書乙本作“茲”，王弼本等作“滋”。“茲”為初文，“滋”為後起字，“慈”為“茲”之借字，故書當從帛書甲本作“茲”。

“章”，帛書乙本、景龍碑本、河上公注本、樓觀臺本、傅奕本、蘇轍本、吳澄本、焦竑本同。王弼本、范應元本、敦煌文書S6453、P2420等作“彰”。“章”為初文，“彰”為後起字。金文、楚簡中“章”字多見，而“彰”字不見於金文、楚簡，似乎秦漢時纔流行。故書當作“章”。

黠 恩 多 又：

帛書乙本、范應元本、“盜賊”前有“而”字，王弼本等無。楚簡前幾句皆有“而”字，此處無，“黠恩”前當脫一“而”字。

“黠”，各本皆作“盜”。“黠”、“盜”音同，文獻中從兆之字“桃”、“駢”皆與“盜”通用。《列子·周穆王》：“左驂盜驪”。“盜驪”之“盜”《玉篇·馬部》作“桃”。《廣雅·釋獸》作“駢”。《史記·秦本紀》：“得驥溫驪”。《集解》引徐廣曰：“溫一作盜。”《索隱》：“盜，鄒誕生本作駢。”《說文·次部》：“盜，私利物也。从次，次欲皿者。”徐灝注箋：“次欲皿者，說從次之意，垂次其皿，欲私其物也。”“盜”在先秦文獻中是常用字，但甲骨文、金文、楚簡中不見。睡虎地秦簡始出。疑“盜”字在先秦當有其它寫法。“黠”字從貝從兆，“貝”為義符，“兆”為音符，也許亦兼表義，可能就是“盜”字的古文。故書似當作“黠”。

“恩”，各本皆作“賊”。《說文·戈部》：“賊，敗也，从戈，則聲。”段玉裁注：“此云則聲。《貝部》又云：‘敗賊皆從貝會意。’據从貝會意之云，是賊字為用戈若刀毀貝會意，而非形聲也，說稍不同。以周公《誓》《命》言，則用戈毀則，正合會意。今字从戎作賊。”而“恩”當為“惻”之省文。上“貝”實為“則”省去側刀旁。“恩”為“賊”之借字，故書當作“賊”。

“又”，各本皆作“有”。“又”、“有”古通。故書當作“有”。

由此可知，以上當作：人多智而奇物茲迟，濃物茲章而黠賊多有。

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寔，我亡為而民自蠱，我好青

而民自正，我谷不谷而民自樸。

是以聖人之言曰：

“是”，帛書乙本、吳澄本同，王弼本等作“故”，嚴遵本無。“是以”、“故”義同，嚴遵本無當為省略。高明白：從句型考察，類似帛書“是以聖人”云云者，乃老子習用之語，書中出現的次數最多。如第三章、七章、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四十七章、六十三章、六十六章、七十二章、七十三章、七十七章、七十九章等。“說明”“更接近原作”，其說是。故書當作“是以”。

“之言曰”，帛書乙本同，王弼本等作“云”，嚴遵本作“之言云”。“云”同“曰”，王弼本等無“之言”二字，蓋因求簡潔而省，故書當作“言之曰”。

我無事而民自寔：

“無”，王弼本等同，帛書甲乙本作“无”。“無”、“无”古通，故書當作“無”。

“而”，景龍碑本無，當為求簡潔而刪。

“民”，景龍碑本，遂州本作“人”，當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故書當作“民”。

“寔”，各本皆作“富”。“寔”為“富”之繁化，《邾大宰鐘》“富”即寫作“寔”，祇不過是“福”在“宀”下而已，故書當作“富”。

“寔”字以上為一簡，編號為31，共28字，原文作：“智而暇勿慈迺灋勿慈章耽思多又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寔”。

我亡為而民自蠱：

“亡”，王弼本等作“無”，帛書甲乙本作“无”。“無”、“无”古通，“亡”為“無”之借。故書當作“無”。

帛書甲本“无為”後有“也”字，當屬衍文。

“而”，景龍碑本無，當為求簡潔而刪。

“民”，景龍碑本、遂州本作“人”，當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故書當作“民”。

“蠱”，各本皆作“化”。“蠱”字不見於《說文》，字从二虫（即昆字）从為。今本《老子》第三十七章“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兩“化”字，楚簡皆作“惑”。“惑”字从心，從為。從心與從虫，楚簡中常混。故“蠱”、“惑”

本一字，皆“為”字之繁化。“為”、“化”二字音同通用，文獻中多有痕迹可尋，如《書·梓材》“厥亂為民”。《論衡·效力》引“為”作“化”。《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程南為。”《周禮·春官·馮相氏》鄭玄注引作“辯秩南譌”。《詩·小雅·沔水》：“民之訛言。”《說文·言部》。《宋書·五行志》引“訛”作“譌”。《老子》六十四章：“不貴難得之貨。”帛書甲本“貨”作“騰”。《說文》：“騰，或曰：‘此古貨字。’”“自蠱”即“自為”亦即“自化”，意為自然而成。由此看來，“為”當為本字，“蠱”係“為”的繁化，“化”是“為”同源字。奚侗、⑤古棣、周英將“化”解為歸化，⑥誤矣。“為”有作、成義，無歸化義。“化”有生化義、隨順義。“賓”有歸順義，陳、列義。將“化”解為歸化，固然能說通“自賓”，但說不通楚簡和帛書甲本的“自蠱”、“自慈”。“自為”作為成辭，屢見於先秦文獻，如《莊子·天地》：“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沒有作自我歸化解的。如依楚簡，三者皆可說通。“自為”，即自然而成；“自化”即自生自成；“自賓”即自陳、自列。意義都相近。因此，故書當作“為”。

### 我好青而民自正：

“青”，傳奕本作“靖”，其它各本皆作“靜”。“靖”、“靜”皆從“青”得聲，故能通用。《漢書·敘傳》：“靖潛處以永思兮。”顏師古注：“靖，古靜字也。”《老子》二十六章：“靜為躁君。”帛書甲本“靜”作“清”，三十七章：“無欲以靜。”帛書甲本“靜”作“情”。皆可為證。故書當作“靜”。

“而”，景龍碑本無，當為求簡潔而刪。

“民”，遂州本作“人”，當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傳奕本一作“天下”，⑦不可從。故書當作“民”。

“正”，遂州本作“政”。“正”、“政”古通，故書當作“正”。

### 我谷不谷而民自樸：

“谷不谷”，帛書乙本作“欲不欲”，王弼本等作“無欲”。《說文·欠部》：“欲，貪欲也，从欠，谷聲。”“欲”從“谷”得聲，故可借作“谷”。《周易·象傳·損卦》：“君子以懲忿窒欲。”呂祖謙《古易音訓》：“欲，晁氏曰：‘孟作谷。’”“無欲”即“不欲”，上當脫一“欲”字。嚴遵《指歸》：“人主該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氣平。”說明嚴遵本原作“欲不欲”。王弼注：“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是王弼本原作“欲無欲”。⑧

故書當作“欲不欲”。

“而”，景龍碑本無，當為求簡潔而刪。

“民”，景龍碑本，遂州本作“人”，當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故書當作“民”。

“樸”，敦煌文書S 6453、P 2420作“樸”，羅振玉曰景龍、景福本作“朴”。⑥“樸”為“樸”之借字，“樸”、“朴”古通。從楚簡和帛書乙本看，故書當作“樸”。

“樸”字後畢沅曰明《道藏》河上公本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⑦羅振玉曰敦煌本亦有。⑧從楚簡和帛書甲乙本看，當為後人竄入。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亡為而民自蠶，我好青而民自正，我谷不谷而民自樸”四句，帛書甲乙本與王弼本等“我無事而民自富”句皆在“我好靜而民自正”後，而嚴遵本、遂州本、易玄本、樓觀臺本、顧歡本、司馬光本、林志堅本等四句依次為“無為”句、“無事”句、“好靜”句、“無欲”句，而《鹽鐵論·周秦篇》引《老子》“無欲”句又在“無事”句上。高明以帛書甲乙本與王弼本等為是，⑨恐不確。“無事”、“亡為”、“好青”、“谷不谷”的排列似更有序，楚簡與嚴遵本等基本一致決非偶然，當以楚簡之序為是。

楚簡“樸”字後有～的標記，後皆無字，約有六字空，從“以正之邦”至此相當於王弼本第五十七章。

以上為一簡，編號為32，共22字，原文作：“我亡為而民自蠶我好青而民自正我谷不谷而民自樸～”。

由此可知，以上五句當作：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為而民自為，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此章“畔”、“昏”為韻（元、大合韻），“迢”、“有”為韻（之部），“事”、“富”為韻（職、之合韻）。“為”、“為”為韻（歌部），“靜”、“正”為韻（耕部），“欲”、“樸”為韻（屋部）。

這8枚楚簡大致含王弼本第六十四章的前一部分和第五十章、第五十七章，從章末的標記和留空看，至少這三章是一大單位，王弼本第六十四章的前一部分，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各是這一大單位的一部分。“樸”字後標記“～”就是這一大單位結束的標志。“智之者弗言”章



下接“以正之邦”章，這與帛書甲乙本、王弼本等今本是相同的；但“智之者弗言”章、“以正之邦”章緊接今本第六十四章的前一部分，則是各本所無的現象。由此可見，楚簡本《老子》的次序與帛書甲乙本、王弼本等今本有相當大的不同。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 主要參考文獻

- 1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圖版》，《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 2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 3 《老子甲本釋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 4 《老子乙本釋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 5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王弼集校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 6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7 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續古逸叢書》子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 8 羅振玉影印《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老子殘卷》，分別簡稱爲“敦煌甲本”、“敦煌乙本”、“敦煌丙本”、“敦煌丁本”、“敦煌戊本”、“敦煌己本”、“敦煌壬本”。
- 9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圖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9。
- 10 奚侗《老子集解》、《老子注三種》本，合肥：黃山書社，1994。
- 11 焦竑《老子考異》，《老子翼》卷六，長澤規矩也編《諸子大成》第九輯，東京：汲古書院，1976。
- 12 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長澤規矩也編《諸子大成》第九輯，東京：汲古書院，1976。
- 13 陳柱《老子集訓》，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 14 蔣錫昌《老子校詁》，成都：成都古籍書店 1988 年影印 1937 年商務印書館本。
- 15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



- 16 馬叙倫《老子校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 17 高亨《老子正詁》，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影印1943年開明書店本。
- 18 高亨《老子注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 19 鄭良樹《老子新校》，臺北：《大陸雜誌》第54卷第4期，第57卷第3期、第5期，第58卷第4期，第6期，第59卷第1至第4期，1976—1981。
- 20 嚴靈峰《老子章句新編》，《道家四子新編》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
- 21 嚴靈峰《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 22 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
- 23 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 24 劉殿爵《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初探》（上、下），香港：《明報》月刊總第200、201期，第11—17、35—40頁，1982年8—9月。
- 25 張松如《老子說解》，濟南：齊魯書社，1987。
- 26 盧育三《老子釋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27 許嘯天《老子》，北京：中國書店，1988。
- 28 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 29 古棟、周英《老子通·老子校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 30 馮達甫《老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31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 32 荊門博物館《郭店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本文多得徐寶貴、李運富先生之助，特此致謝！

## 注 釋

- ①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7期。
- ② 《金文編》卷十二，第77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③ 《老子校釋》第258、259頁。
- ④ 《帛書老子校注》第136頁。
- ⑤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第63頁。

- ⑤ 《老子校釋》第258頁。
- ⑦ 《帛書老子校注》第136頁。
- ⑧ 從《郭店楚墓竹簡》一書，下同。
- ⑨ 《汗簡·古文四聲韻》第35、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 ⑩ 《老子校釋》第259、260頁。
- ⑪ 《老子指歸》第79頁，王德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4。
- ⑫ 《諸子平議》第154頁，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本，1988。
- ⑬ 《札迺》第130、131頁，齊魯書社，1989。
- ⑭ 《老子集解》下卷，見《老子注三種》第120頁。
- ⑮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7頁。
- ⑯ 《帛書老子校注》第76頁。
- ⑰ 《讀書雜誌》第97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 ⑱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第148頁。
- ⑲ 馮達甫《老子譯注》第120頁。
- ⑳ 《老子注譯》第123頁。
- ㉑ 《老子校詁》第155頁。
- ㉒ 《老子校詁》第346頁。
- ㉓ 《老子正詁》第119頁。
- ㉔ 轉引自朱謙之《老子校釋》第228頁。
- ㉕ 《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493頁。
- ㉖ 《老子校釋》第228頁。
- ㉗ 《老子說解》第350頁。
- ㉘ 《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493頁。
- ㉙ 《老子校詁》第155、156頁。
- ㉚ 見蔣錫昌《老子校詁》第345頁引。
- ㉛ 見馬叙倫《老子校詁》第155頁引。
- ㉜ 《老子校詁》第346頁。

- ③① 《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492頁。
- ③② 樓守烈《王弼集校釋》第148頁。
- ③③ 《老子道德經考異》卷下，《諸子大成》第10輯第251頁。
- ③④ 轉引自馬叙倫《老子校詁》第156頁。
- ③⑤ 見《信陽楚墓》圖版113第1-01、1-02簡，圖版117第1-064簡。
- ③⑥ 見《信陽楚墓》圖版113第1-01、1-02簡。
- ③⑦ 《老子校詁》第157頁。
- ③⑧ 《老子校詁》第157頁。
- ④① 《帛書老子校注》第102頁。
- ④② 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4卷454頁，文物出版社，1990。
- ④③ 轉引自蔣錫昌《老子校詁》第349頁。
- ④④ 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信陽楚墓》第125頁。
- ④⑤ 《老子校詁》第158頁。
- ④⑥ 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第771、772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④⑦ 《諸子平議》第156頁。
- ④⑧ 《老子校詁》第157頁。
- ④⑨ 《老子古本考》，轉引自張松如《老子說解》第354頁。
- ⑤① 《老子校詁》第350頁。
- ⑤② 《帛書老子校注》第103頁。
- ⑤③ 《老子說解》第353頁。
- ⑤④ 《老子注譯及評介》第284頁。
- ⑤⑤ 馮達甫《老子譯注》第131頁。
- ⑤⑥ 《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320頁。
- ⑤⑦ 例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第583頁。
- ⑤⑧ 例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第581頁。
- ⑤⑨ 例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第377-380頁，齊魯書社，1989。

- ⑤9 見唐作藩《上古音手冊》第94、9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 ⑥0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第145頁。
- ⑥1 《老子校詁》第351頁。
- ⑥2 范應元曰：“古本有‘而’字。”《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續古逸叢書》子部第57頁。
- ⑥3 《老子校詁》第158頁。
- ⑥4 《老子新校》（六），《大陸雜誌》第59卷第1期，1978。
- ⑥5 《帛書老子校注》第105、106頁。
- ⑥6 《老子校釋》第232頁。
- ⑥7 《老子校釋》第232頁。
- ⑥8 《古書疑義舉例》卷七《不識古字而誤改例》，見《古書疑義舉例五種》第134頁，中華書局，1956。
- ⑥9 《老子校詁》第159頁。
- ⑦0 《“法令滋彰”還是“法物滋彰”》，《歷史研究》1976年第2期。
- ⑦1 《帛書老子校注》第106頁。
- ⑦2 《老子新校》（六）
- ⑦3 《帛書老子校注》第107頁。
- ⑦4 《老子集解》見《老子注三種》第104頁。
- ⑦5 《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詁》第113頁。
- ⑦6 見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卷下。
- ⑦7 說本鄭良樹《老子新校》（六）。
- ⑦8 朱謙之《老子校釋》第233頁引。
- ⑦9 《老子道德經考異》卷下。
- ⑧0 朱謙之《老子校釋》第233頁引。
- ⑧1 《帛書老子校注》第108頁。

## 楚簡續貂

黃錫全（中國錢幣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為保護祖國文化遺產，費了很大周折，收藏了一批戰國楚簡，據說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很多古書，可惜一直無緣見到實物。近悉該館書法館印有壹本宣傳圖冊，刊有兩條楚簡，承蒙李零先生借閱此冊，又蒙唐友波先生惠寄一冊，不勝感謝。近幾年，楚簡不斷出土，而且有不少古書，據說與今書相對，很多難字不用考證就能辨識，真令人快慰。荊門、上海楚簡很快就要印出來了，相信這些材料的公佈，一定能解決很多疑難問題。近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簡帛研究》編輯部來函約稿，本欲改舊稿《戰國楚簡與傳鈔古文》，又覺材料還欠充分，最好等幾批楚簡正式公佈後再說，故擬就剛剛見到的上海博物館書法館刊佈的兩條楚簡率先談一點學習體會。待此論文集正式印出時，估計上海簡已經公佈。所以，小文聊作“續貂”而已。

第一條竹簡，從照片看，上端平齊，似不殘；下端殘斷。上有34字，末一字殘闕。文字清晰可辨。其文云：

呂邵百耆則民至行呂呂兌上告員又戡惠行四或川之子曰壘立參年百耆呂惠  
類圖

按此條簡文，見於《禮記·緇衣》。《緇衣》原文云（據中華書局1980年10月影印《十三經注疏》本1648頁）：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竹簡與今本先後順序不同，蓋各據傳本有異，暫且不論。現主要談談其中的文字。













文字確如有關專家所云，祇要與今本古書對照，多能辨識。如至即致，兌










即說，品即參，惠即仁等。但有的文字，雖據今本能够讀出，而其形體的演變及如何假借，則頗令人尋味。



《詩云》二字作“告員”，已見香港中文大學藏楚簡，饒宗頤先生有精到的研究<sup>①</sup>。該條殘簡云：“民惠一，告（詩）員（云）：兀（其）咎（容）不改，出言……。”見後附圖。員字寫法小有區別，作。而此簡作，从貞。員本从鼎，後變从貝。貞、鼎古本一字。金文員作（員父尊），石鼓文作，曾侯乙墓竹簡圓作（203簡），《說文》員字正篆作。香港簡如該字下的泐痕不是筆劃，是員字已變从貝。“云”或作“員”者，也見於典籍<sup>②</sup>。詩字从止从口，之為聲符。口、言偏旁義近，如《說文》讀或作嘖，吟或作吟，謀或作嘬，信或作佖，詠或作咏等。因此，告可能為詩字省形，但也可能是借訛為詩。《玉篇》訛，“詐也”。《集韻》訛，“訐也”。曾侯乙編鐘多見“時”字，借為“持”<sup>③</sup>。

川即川。《說文》順字，小徐本認為“从頁，川聲”，應有所本。竹簡借川為順，音義皆合。中山王鼎與方壺銘之“順”作，从心从川。又方壺之讀為訓<sup>④</sup>。思當訓之或體，如同方壺警作懲，史頌鼎德从言作德，郢王子鐘悠作警等。是鼎、壺又借“思（訓）”為順。直接借“川”為“順”者，典籍少見。

楷作，則當是與“楷”音同或音近之字。其形究竟應為何字，還需要作些分析。古文字中有誥字，从言从収，已見於何尊、史賁殷及王孫誥鐘，三體石經古文譌變从告从兀作⑤。簡文所从之“𠂔”恐非“言”省。金文“共”字有作、、⑥，或許即填實形。楷，今本《詩·大雅·抑》作覺。共，群母東部。楷、覺屬見母覺部。共與楷、覺聲韻相近。是簡借共為楷或覺。但戰國楚“共”字多作、或⑦，則也可能不是“共”字。此形究竟應該釋為何字，還有待確定。

遂字作，右形是頁字，左形則頗費解，但肯定是一個與“遂”音同或音近的借字。經過反復琢磨，懷疑其形為“韋”字⑧，原當作或，是下部“丰”形之上“乚”與“𠂔”或“𠂔”形下部之或相互借用。這種借筆，在古文字或楚文字中並不鮮見。如⑨：

古璽“公孫”合文作，公下與子上口相互借用。（璽文P359）

古璽“敦于”合文作、，于即于，又兼充“敦”下“𠂔”之筆劃。

(璽文P362)

楚簡“之市”合文作𠄎，是“之”與“市”上部相互借用。(包山簡63)

楚簡𠄎作𠄎，是“牛”又兼充“夕”中的“匕”。(包山簡243)

楚簡𠄎作𠄎，羊下形與言上形相互借用。(包山簡168:191)

楚陳往戈陳作陸，土上一橫兼充東下一橫。

因此，這個字可以隸作𠄎，與古璽續作𠄎、漬作𠄎等類同，當是從頁  
𠄎聲之形聲字。字書中不見𠄎或𠄎字，人與頁形義相近，頗疑其為𠄎之或  
體。𠄎即今之覲字。𠄎，《唐韻》“余六切”，古屬定母屋部(覲屬定母覺部)  
遂，《唐韻》“徐醉切”，古屬邪母屋部。二字古音相近。如从𠄎得聲的續  
古屬邪母屋部；从𠄎得聲的隊，古屬定母物部。《易·困·初六》：“三歲不  
覲。”長沙馬王堆漢帛書本覲作𠄎。《易·豐·上六》：“三歲不覲。”馬王堆漢  
帛書本覲作遂<sup>⑩</sup>。是𠄎、覲(𠄎)、遂諸字在楚地可通之證。

至于仁字作𠄎的確定，則可據此將過去難定或釋為“信”字的古璽“𠄎”  
等戰國文字，全定為“仁”字<sup>⑪</sup>。

第二條竹簡，上下均有殘斷。其上有31字，其中合文一字。文字亦較清晰。  
其大云：

𠄎解於孔子謂曰幾弟君子民之父母敢解可女奔可胃民之父母孔子會曰民

按此條簡文，見於《禮記·孔子閒居》。其原文云(同前《十三經注疏》  
本1616頁)：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  
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

與今本相校，文句大體相同，所不同者，當是所據傳本不同。其中有幾個  
文字，也很值得注意。

𠄎字作𠄎，如果不是與今本能夠對照，是很難確定其為“𠄎”字的。根據  
文義，其為“𠄎”字無疑。楚文字的“𠄎”有下列形<sup>⑫</sup>：

一、𠄎(璽滙3444) 𠄎(璽滙3643) 𠄎(楚帛書) 𠄎(包山簡67) 𠄎(包山簡212)

二、𠄎(鄂君啟舟節) 𠄎(鄂君啟車節) 𠄎(包山簡128)

三、𠄎(包山簡115) 𠄎(包山簡200)

四、𠄎(包山簡240) 𠄎(上海簡)

根據上列諸字，第三形可能為一形演變，四形則為三形簡省。包山簡 240 是借夏為“夜”。夜屬喻母鐸部，夏屬匣母魚部。古喻母三等字讀如匣母，魚鐸二部陰陽對轉。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將其列入“夏”字條，無疑是正確的。《包山楚簡》隸作𠂔，注 475 以為“夜字之誤”，正確。其字形省變當為：

𠂔 > 𠂔 → 𠂔 𠂔

夏竦《古文四聲韻·馬韻》錄《籀韻》夏一形作𠂔，可能就是由𠂔形省變，來源頗有根據。據此，不難看出，傳鈔古文中的某些至今還難以理解的形體，隨着材料的日益豐富，將會逐漸得到合理的解釋。由於此字簡省隨意，我們懷疑包山簡 224、225 號的人名𠂔𠂔和𠂔𠂔，也可能就是“夏選”。

問字作𠂔，即問字古體𠂔，已見包山楚簡 157 號。《包山楚簡》釋文作“𠂔”，不確。此字並非从𠂔。其字形演變當為：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利簋 孟鼎 王孫喜鐘 陳侯因資鐘 上海簡 天星觀簡 說文古文

“詩”作𠂔，左从言，右形則有些特別。上條簡文詩作𠂔。此形右旁則可能為“𠂔”，是“𠂔”借用“言”右邊的筆劃以為“止”。但也可能是“詣”字，借為詩。

“幾弟君子”，今《詩·大雅·公劉》作“豈弟君子”，前引《孔子問居》作“凱弟君子”（或引作“愷悌”），是幾、豈等音近假借。《戰國策·楚策四》：“則豈楚之任也哉。”漢帛書本豈作幾。幾省从一幺，已見於長沙五里牌 406 號楚簡<sup>⑬</sup>。

斯作𠂔，从元即其，从斤。古从其之字或从斤者多見。如金文箕作𠂔，古陶器作𠂔、基作𠂔、古璽旗作𠂔等。《汗簡》錄《古尚書》斯即作𠂔<sup>⑭</sup>。

《緇衣》傳為公孫尼子所作，饒公經過研究後認為“尚難獲確證”，說詳饒文。《孔子問居》是以篇首語名篇，記孔子為子夏引《詩》以論禮樂之原，兼及三王之德。或以為《禮記》“四十九篇多采他書”<sup>⑮</sup>。有關問題，目前還難以作出決斷，相信隨着出土文獻的不斷豐富，將會逐漸明瞭。

僅從以上兩條殘簡，不難看出其內容及文字是多麼重要，不僅可以校注流

傳至今的古書，考其源流，而且有關文字對於釋讀至今難識之字及認識文字的演變、通假等等方面，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值得人們從多方面去分析、研究。

## 注 釋

- ① 饒宗頤《緇衣零簡》，載《學術集林》卷九，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2月。
- ② 云、員通假之例，可參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107頁，齊魯書社，1989年。
- ③ 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④ 可參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響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年。
- ⑤ 真字从告作𠂔，可參考唐蘭《史駱殷銘考釋》，《考古》1972年5期。
- ⑥ 見新版《金文編》164頁，中華書局，1985年本。
- ⑦ 同注⑥ 165頁。
- ⑧ 牽字的考釋，見曹錦炎《釋牽——兼釋續、瀆、竇、鄧》，載吉林大學《史學集刊》1983年3期。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
- ⑨ “璽文”即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包山簡”見《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⑩ 見《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3期。或以為“遂”當作“逐”，可參見前注② 345頁。
- ⑪ 劉翔《釋仁》，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1997年10月。
- ⑫ 字形取自《古璽彙編》、《包山楚簡》、《金文編》等書。
- ⑬ 參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32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⑭ 可參黃錫全《〈汗簡〉注釋》473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 ⑮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3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香港,他的最大理想

## 2 基本

觸染上

2



## 九店楚簡日書補釋

劉樂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江陵九店五十六號墓出土的日書，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發現的楚簡日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照片和釋文一經公佈<sup>①</sup>，迅即引起熱烈討論，有關論著相繼問世。據筆者所知，主要有如下幾種：

1. 武家璧，《楚用亥正曆法的新證據》，載《中國文物報》1996年4月21日。

2. 劉樂賢，《九店楚簡日書研究》，載《華學》第二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

3. 饒宗頤，《說九店楚簡之武彊（君）與復山》，載《文物》1997年6期。

4. 劉信芳，《九店楚簡日書與秦簡日書比較研究》，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10月）。

5. 陳松長，《九店楚簡釋讀札記》，同上。

6. 李家浩，《包山楚簡“箴”字及其相關之字》，同上。

7. 陳偉，《新發表楚簡資料所見的記時制度》，同上。

8. 李零，《古文字雜識（二則）》，同上。

9. 陳偉武，《戰國楚簡考釋輯議》，同上。

10. 徐在國，《楚簡文字拾零》，載《江漢考古》1997年2期。

此外，從上列有關文章的註腳知道，還有如下幾種論著即將發表：

11. 夏德安，《論戰國兵死者禱辭》，係作者1997年春於芝加哥大學宣講之論文，將由陳松長翻譯後刊於《簡帛研究譯叢》第二輯。

12. 陳偉，《九店楚日書釋文校讀與幾個相關問題》，將刊於《人文論叢》一九九七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

13、李家浩，《九店楚簡》，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上引拙文《九店楚簡日書研究》定稿於1996年2月，寫得比較倉促，又未及參考諸家論著，故頗有疏漏之處。這裏想做些補訂，並就某些有爭議的問題談點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教。

## 一、“盈志”補釋

第26號簡有如下一段文字：

……（以）為上下之禱（祠），□神鄉（饗）之，乃咍兀（其）志。

上引拙文曾指出，咍與第47號簡“尻（處）之不逞（盈）志”的逞為一字，即盈字。這裏可以補充一點，即馬王堆帛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經正亂》②：“〔太〕山之稽曰：子勿言佑，交為之備，〔吾〕將因其事，盈其寺……”整理組註云：“寺，讀為志。盈其志，即滿足其欲望，使之驕傲自滿。”

不過，盈志讀為逞志，似更為合適③。逞志多見於《左傳》，與簡文句式最近者，如昭公二十五年“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焉得逞其志”？另外，古璽中亦有類似的說法。《古璽彙編》“吉語璽”類4517至4524號，印文皆為“星志”，吳振武先生都讀為“逞志”④。

大家知道，古代盈、逞二字音義皆近（例如，《左傳》的“樂盈”，《史記》之《晉世家》、《田敬仲世家》作“樂逞”），所以，無論讀盈志還是逞志，都應是同樣的意思。

## 二、關於第32號簡

整理者的釋文是：

〔栖（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是胃（謂）外害日，不利目（以）行復（作）、迺（趙）四方埜（野）外，必無，塢（遇）寇逃（盜），必兵。

睡虎地秦簡日書相應的簡文為：

外害日，不可以行作、之方野外，必耦（遇）寇盜，見兵。

據睡虎地秦簡，外害日不可以勞作，去四方野外，如果勞作、去四方

野外，必將撞上盜寇，或碰上兵事。九店日書雖然用字畧有差異，但含義應是一樣的。如按整理者的釋文，將“必無”連上讀，簡文意義似乎有些費解。我們的意見，簡文似可如此斷句：

——是胃（謂）外害日，不利呂（以）行復（作）、迺（起）四方塋（野）外，必無遇（遇）寇逃（盜），必兵。

“必無遇寇盜，必兵”，當是“必無遇寇盜，必遇兵”的省畧。文中的“無”字，相當於“不”（參見《經傳釋詞》卷十）。古書常有“不……必……”這樣的句式，如馬王堆帛書《刑德》乙篇後所附星占書說：

——赤絳出，其短如杵，其赤如堵（赭），下不有拔邑，必有流血之戰。歲十二月露雨至，不有流民，必有兵少□⑤

簡文在“無遇寇盜，必兵”之前再加了一個“必”，大概是為了加重其語氣。簡文的意思當與上引睡虎地日書基本一致：外害日不利於勞作，去四方野外，若勞作、去四方野外，必將不是遇上盜寇，就會遇上兵事。

### 三、關於第37至44號簡的一些問題

第37至44號諸簡所載，皆為睡虎地秦簡日書所無，值得深入研究。關於這幾支簡的釋字和句讀，上引拙文及陳松長文曾在整理者釋文的基礎上談了一些看法，李家浩、李零文則為第43、44簡做了新的釋文，皆可資參看。下面要討論的，是這幾支簡的排列順序。不妨先看一下大家的意見：

《江陵九店東周墓》率先對日書的內容做了簡畧的分類，這幾支簡分別被歸入C、d類：

(c) 37號簡至40號簡⑥，記每季三個月中，哪些天干是不吉日，哪些天干是吉日，以及五子日、五卯日、五亥日、城日、吉日、不吉日等利於作什麼，不利於作什麼。如“凡秋三月，庚、辛、壬、癸不吉，丙、丁吉，甲、乙城日”（39號）。“凡吉日，利以祭祀、禱祠”（41號）。

(d) 43號、44號二簡記的大概是對某某神之子武彊的一種巫術活動……

上引拙文對日書的分類較《江陵九店東周墓》稍詳，這幾支簡分別被歸入3類和4類：

3. 不吉日、吉日等簡，包括第37號至42號等六枚簡。簡文先按季

節列出不吉日、吉日、城（成）日等三種日名的天干，然後描述值此三日的行事吉凶。令人奇怪的是，“不吉日”從字面上看無疑是兇日，但其占文卻說“利目（以）見公王與貴人，利目（以）取貨於人之所，毋⑦舍人貨於外”。看來，當時選用日名尚不如後來的日者那樣講究。

簡文還有一段講五子、五卯、五午（原文無五字）、五亥所忌行的諸事……

4. 祝語，第43號和44號是一段祝辭，所祝告的神是某某（名字為二字，皆不識）之子武彊，其職掌為“司兵死者”……這種祝辭與擇日實無關係，但其趨吉避兇的意圖與擇日相同，故擇日類書籍中時有收錄。睡虎地秦簡日書的驅夢祝辭及馬禱祝辭，性質與此相同。

《九店楚簡釋讀札記》不同意上述意見，並舉出三點理由：

一是第41、42簡的內容連接不妥……

二是第40簡的文意未完……很明顯，“帝之所以戮六脂（擾）之日”這句話尚沒說完，也就是說，日書中擇此日到底利不利、吉不吉，沒有什麼交待。

三是第43、44兩簡的祝辭內容起首太突然，與上面的擇日，與後面的相宅不相連繫。其實，第41簡中的“凡吉日，利目（以）祭祀、禱榷（祠）”是與第43、44簡的祝辭多少有些關係的。所謂祝辭，無非是祝告神靈以求趨吉避兇，實際上與祭祀、禱祠是一碼事。因此，第43、44簡完全可以與第41簡連接。而且這祝辭的內容正是祝告“司兵死者”……為兵死者禱告顯然是兇日的活動，故正可承第41簡的“凡不吉日”而來。

基於這三點理由，《九店楚簡釋讀札記》將簡文的順序做了調整，其釋文為：

凡五亥，不可目（以）畜六牲 39下 脂（擾），帝之所目（以）琴（戮）六脂（擾）之日，40下 利目（以）見公王與貴人，利目（以）取貨於人之所，毋目（以）舍人貨於外。41 凡城（成）日，利目（以）取（娶）妻，象（嫁）女、完（冠），利目（以）城（成）事，利目（以）內（入）邦甾（中），利目（以）內（納）室，利目（以）內（納）田邑，利（以）內（入）人民，利。凡吉日，利目（以）祭祀，禱榷（祠）。凡不吉日，42 敢□□之子

武彊……

《說九店楚簡之武彊（君）與復山》沒有明確論及簡文的順序，但文中有這麼一段：

九店簡39：“午，不可目（以）櫬（樹）木。”言午日不宜木。此事蓋指社木。《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稷與其野。”鄭註：“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說文》：“社，地主也。”《左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木。所以武夷君被稱為土地神。《封禪書》武夷君與澤山君并列，自來作地主，簡言午日不宜樹木，自昔已有社神，樹木之事。馬王堆太一圖繪武弟子，又該圖書一“社”字，又其必為社神之證。

細揣文意，作者似乎認為第43、44簡的內容，與其前面的第39簡的“午不可以樹木”相連。

本文的看法，與上引諸說都不盡相同，我們認為，這幾支簡至少應分為三類不同的內容。

首先，第43、44簡應與前面的簡文分開，二者不能相連。此二簡為一段祝辭，其前面的簡為擇日文，二者性質有別，雖然目的同為趨吉避兇，內容上卻無關聯。上述將二者連起來解釋的說法，並無可靠的依據，不能成立。正如上引拙文所說，睡虎地秦簡日書中也有類似的祝辭，如驅夢祝辭和馬棓祝辭，亦與擇日無關。在這裏，有一點必須予以強調：即日書雖然是以選擇時日吉兇為主要內容，但其中並非祇有擇日條文，相反，總是有一些非擇日類的內容。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研究睡虎地秦簡日書時曾做過討論<sup>⑥</sup>，此不贅述。知道了日書的這個特點後，就可以斷定，將祝辭與擇日文連起來解釋的說法是不對的。

其次，第37至42簡的內容至少應分為二類：一類講何為不吉日、吉日、成日，以及值此三種日的行事宜忌；另一類講五子、五卯等的行事宜忌及原因。前一類的釋文為：

〔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壬癸吉，庚、辛城（成）日。

〔凡夏三月〕，丙、丁、庚、辛不吉，甲、乙吉，壬、癸城（成）日。

凡秋三月，庚、辛、壬、癸不吉，丙、丁吉，甲、乙城（成）日。



凡冬三月，壬、癸、甲、乙不吉，庚、辛吉，丙、丁城（成）日。

凡城（成）日、利目（以）取（娶）妻、象（嫁）女、冕（冠），利目（以）城（成）事，利目（以）內（入）邦中（中），利目（以）內（納）室，利目（以）內（納）田邑，利目（以）內（入）人民，利。凡吉日，利目（以）祭祀、禱（禱）（祠）。凡不吉日。

後一類的釋文為：

凡五子，不可目（以）倭（作）大事，不城（成），必毀兀（其）身⑨，又（有）大咎口兀（其）身，倭（長）子受兀（其）咎。凡五卯，不可目（以）倭（作）大事，帝目（以）命盭（益）淒塢（禹）之火，午，不可目（以）檀（樹）木。凡五亥，不可目（以）畜六牲廂（擾），帝之所目（以）琴（戮）六廂（擾）之日。

前一類以成日、吉日、不吉日（由天干定日）為選擇的依據，後一類則據五子、五卯等地支講行事宜忌，其原理及方法都不一樣，乃各自獨立，互不相涉。據我們的推測，很可能是先寫了第一類，第二類則是為填滿第一類留下的空白處而補入的。抄寫者大概是為了讓讀者易於查知哪一天是不吉日、吉日、成日，有意將春、夏、秋、冬各書一簡，以排成一張表格；而占測文字，又寫到了另外的簡上。這樣，在前面四支簡的下部留下了空白。於是，便用另外的內容補入。這種現象，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較為多見⑩，可以參看。

其三，第42號簡的歸類尚待研究。從行文格式看，該簡很像是接着第41簡講的。因此，《江陵九店東周墓》和《九店楚簡日書研究》都將之與第41簡連讀。可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凡不吉日，利以見公王與貴人，利以取貨於人之所……”的奇怪說法。我們以前曾以“當時選用日名尚不如後來的日者那樣講究”解之，《九店楚簡校讀札記》批評這種解釋是“曲合簡文”。現在看來，以前的解釋確實難以令人信服。因此，將第41簡與42簡連讀是可疑的。

如上文所引，《九店楚簡校讀札記》提出了一種新的讀法，即將第42簡接在40號簡的後面。我們認為，這種讀法同樣可疑。《九店楚簡校讀札記》說40號簡下部的文意未完，正可與42號簡相接。其實，“凡五亥，不可以畜六牲擾，帝之所以戮六擾之日”的意思是說，五亥日是上帝

殺六擾的日子，所以不能畜養六牲。簡文前面講五亥所忌行之事，後面說忌行的原因，文意是完整的。這樣的句式，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也有。例如，“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夫所以張生時。”<sup>①</sup>又如，“正月不可垣，神以治室”<sup>②</sup>。另外，九店簡第37至40號簡下部都是以“不可以……”講忌行之事，後面不大可能接“利以……”這樣表示宜做某事的句子。

看來，將第42簡與41簡或40簡連讀，都有可疑之處。比較穩妥的辦法，是將它擱置起來，暫且不做結論。由於其行文格式與講“不吉日、吉日”一類簡相似，可以暫時將它附置於那一類之後。

講完了簡文的順序後，再就第38、39號簡下部的文字談一點看法。簡文看似簡單，細究起來卻頗有疑問。整理者的釋文是：

凡五卯，不可目（以）倭（作）大事，帝目（以）命益淒塢之火，  
午不可目（以）檀（樹）木。

簡中的益、塢分別讀為益、禹，是沒有問題的。《說九店楚簡之武彊（君）與復山》說：

益即伯益，益烈山澤而焚之。此處淒字為動詞，讀為齋，借作齋。《說文》：“齋，持遺也。”謂伯益齋（持）禹之火。《墨子·尚賢》下<sup>③</sup>：“禹舉益於陰方之中。”

案：益烈山澤而焚之之事，見《孟子·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頗疑簡文“帝以命益淒禹之火”，與《孟子》所說的益“掌火”有關。在《尚書》中，帝堯亦省為“帝”。簡文的“帝以命益淒禹之火”，是否可以理解為帝舜命益接替禹“掌火”？不過，從下文“凡五亥，不可以畜六牲擾帝之所以戮六擾之日”看，簡文的“帝”似不大可能是指帝舜。這句簡文的意思，尚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午不可以樹木”是否應與前面的文字連讀。初看起來，將二者連讀似乎很有道理。因為“帝以命益淒禹之火”，很像是“午不可以樹木”的原因。實際上，“帝以命益淒禹之火”應是前面“不可以作大事”

的原因。而且，簡中的“午”如果視為地支，按照釋日文的體例，午日的宜忌決不會與卯日的文字有什麼關係。所以，如果要將“午不可以樹木”與前面的文字連讀，則“午”字不宜解為地支。那麼，是否可以將“午”與前面的“火”連讀？從原簡看，在“火”與“午”之間有一讀斷的符號，說明二字不能連讀。看來，“午不可以樹木”不見得與前面的簡文有關。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認為，上論簡文宜標點為：

凡五卯，不可目（以）復（作）大事，帝目（以）命益（益）漢塢（偶）之火。午，不可以樹木。

另外，簡文的“樹木”，不一定要解釋為樹社木。睡虎地秦簡日書：“未不可以樹（樹）木，木長，樹（樹）者死。”<sup>④</sup>樹木，即種樹的意思。九店簡的“不可以樹木”，也可能就是一般意義中的“不可以種樹”。

#### 四、由九店日書再論睡虎地日書乙種“十二支占卜篇”

上引拙文談到九店日書為進一步研究睡虎地日書提供了線索時，曾以兩種簡文的“十二支占卜篇”為例，更正了我們以前對“晝夕”的誤解。其實，以前對“朝兆”的解釋也不正確。九店簡的“十二支占卜篇”見第60至93號簡（第87至91號除外），多已殘斷，《九店楚簡日書與秦簡日書比較研究》曾做過一些綴合工作，可以參看。這裏祇舉內容較完整的兩條：

□南又（有）得。丑，朝啓夕闕（閉）。凡五丑，朝逃得，晝得，夕不得。目（以）內（入），見疾。目（以）又（有）疾，□□

□□又（有）□。辰，朝啓夕闕（閉）。凡五辰，朝〔逃不〕不得，晝得，夕得。目（以）內（入），□。目（以）又（有）疾，栖（酉）少（小）琴（瘳），戌大琴（瘳），死生才（在）子。

睡虎地簡秦簡日書乙種的相應文字，我們曾標點為：

丑以東吉，西先行，北吉，南得，〔朝〕閉夕啓，朝兆得，晝夕不得，以入，得。〔以有〕疾，卯少（小）琴（瘳），巳大琴（瘳），死生<sup>⑤</sup>，肉從東方來，外鬼為姓（管），巫亦為管。

辰以東吉，北咥，先行<sup>⑥</sup>，南得，朝啓夕閉，朝兆不得，夕晝得。以入，吉。以有疾，酉少（小）琴（瘳），戌大琴（瘳），死生在子，乾肉從東方來，把者精（青）色，巫為姓（管）。

並將朝兆釋為同義復詞，將晝夕釋為偏義復詞<sup>⑪</sup>。現有九店日書做比較，睡虎地日書的晝夕顯然應分讀為晝、夕，朝兆也應讀為朝逃<sup>⑫</sup>。“凡五丑，朝逃得晝得，夕不得”之類，是占測逃亡者的文字。

九店日書的文字表明，該類每一條占文明顯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據此，睡虎地日書的“朝開夕啓”等，應與前後的文字分開，獨立為一項。例如，辰日的占文應標點為：

辰，以東吉，北兇，先行，南得。朝啓夕閉。朝兆（逃）不得，夕、晝得。以入，吉。以有疾，酉少（小）琴（瘳），戌大琴（瘳），死生在子，乾肉從東方來，把者精（青）色，巫為生（姓）。

## 五、釋“歲”

第94號簡整理者釋作：

□歲。十月、屈柰、享月□□□遠柰、□柰□□獻馬、留尿□

《九店楚簡日書與秦簡日書比較研究》認為，其月份的排列順序與睡虎地秦簡《日書·歲》篇相似，因而將簡文校補為：

□歲。十月、屈柰、享月□，夬（爨）月、遠柰、夏柰□，肖（八月）、獻馬、留尿□

並說“甚至‘留尿’後還可補上‘九月、冬柰、夏尿□’。”

今案：該文指出簡文的月序與睡虎地秦簡日書“歲篇”類似，對我們很有啓發；但它對簡文的釋讀和復原，是有問題的。細審照片，“享月”後面的兩字似為“才(?)<sup>⑬</sup>西”，“西”字輪廓比較清楚，其後尚有一個表示讀斷的符號。“遠柰”至“獻馬”之間共有四字，前二字為“夏柰”，“夏柰”後的兩字似為“才(?)北”，“北”的輪廓也可大致看出，“北”之後也有一個表示讀斷的符號。據此，該簡可以釋為：

□歲：十月、屈柰、享月才（在）西，夬月、遠柰、夏柰才（在）北，獻馬、留尿□

其月份和方位的關係是：

十月、屈柰、享月，在西

夬月、遠柰、夏柰，在北

獻馬、留尿



上文提到簡文月序與睡虎地日書“歲篇”相應，“歲篇”的相應文字為：

刑夷、八月、獻馬，歲在東方

夏夷、九月、冬夕，歲在南方

紡月、十月、屈夕，歲在西方

七月、爨月、援夕，歲在北方

大家知道，同一個楚月名，有時有幾種不同的寫法。例如，享月又作紡月，七月又作夏柰，遠夕又作援柰，爨月又作爨月<sup>②0</sup>。

將上列兩表比較，可以看出，它們所記的是一回事。據此，第104簡“□柰、夏爨□”很可能是94號簡的一段殘簡。如果上面的說法不誤，則此簡的內容似可復原為：

□歲：十月、屈柰、享月才（在）西，爨月、遠柰、夏柰才（在）北，獻馬、習爨、〔八月才（在）東，冬〕柰、夏爨、〔九月才（在）南〕。

儘管簡文“歲”字之前可能還有別的文字，但此處的“歲”無疑就是睡虎地簡日書“歲篇”的“歲”。睡虎地秦簡日書的“歲”，以前被誤釋為歲星或太歲，後來胡文耀先生指出，其實應是《淮南子·天文訓》的“大歲”<sup>②1</sup>。

從此簡的內容可斷定，睡虎地秦簡日書的“歲篇”，應是根據楚日書編寫成的。其後面的“楚秦月名對照表”，大概是為了方便使用新曆法（即秦曆）的人而附入的。

## 六、釋“往亡”

第97號簡是一支祇存六字的殘簡，整理者的釋文為：

□往（往）上邊（歸）死，習爨□

《九店楚簡日書與秦簡日書比較研究》說該簡“‘上’乃‘亡’字誤書（楚簡‘上’、‘亡’字形相近。秦簡《日書》786反：‘是謂出亡歸死之日也。’‘出亡’即‘往亡’”。又在註腳中說：“經筆者重審照片，細繹其筆勢，該字應直接隸定作‘亡’。”

我們初讀九店日書時，也很懷疑釋文的“上”應是“亡”之誤，但因理由不夠充分，沒有將這個意見發表。近來重讀日書，發現該簡似與第105、106、107三殘簡有關，從而堅定了信心。三支殘簡的釋文分別是：



☐月旬，屈柰內（入）月二旬，遠柰內（入）☐ 105

☐內（入）月旬，貧（爨）月內（入）月☐☐ 106

☐一日，☐柰內（入）月八日，八月☐ 107

根據第13至24號簡所載的月序，可以補出一些月名的缺字：

第107號：“八月”前面的兩個月名必為“享月”、“夏柰”；

第106號：“貧月”前面的月名必為“十月”；

第105號：“屈柰”前面的月名必為“冬柰”。

這樣，月名與數字的對應是：

享月 夏柰 十月 冬柰 屈柰

一日 八日 旬 旬 二旬

如果按睡虎地秦簡日書“歲篇”所附的“楚秦月名對照表”換算成秦月名，則為：

三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十一月

一日 八日 旬 旬 二旬

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共有四處提到了“往亡”的日期，據我們的研究，祇有甲種一〇七背、一〇八背抄寫無誤④，其月與日的對應為：

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日 七 十四 廿一 十八 十六 廿四 九 十八 廿七 十 廿 卅

兩種日書比較，四月、十月、十一月三個月的日數完全一致；秦簡三月為廿一日，楚簡三月（即享月）的“一日”前有缺字，補齊應為“享月八月二旬一日”，也應與秦簡一致。秦簡七月為九日，而楚簡（即十月）為“旬”，二者不一致。從照片看，十月後的字釋為“旬”是可信的。不過，簡文的“旬”字都寫得與“九日”的合文相近，此處視為“九日”的合文，似乎也有可能。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原簡把“九”錯抄成了“旬”。

總之，說上述三支殘簡所記為“往亡日”的日期，大概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它們原來很可能與第97號是同一支簡。我們認為，根據這四支殘簡可以作如下的復原：

☐連（往）亡遯（歸）死：留居〔內（入）月七日，夏居內（入）月旬四日，享月內（入）月旬〕一日，夏柰內（入）月八日，八月〔入月旬六日，九月內（入）月二旬四日，十月〕內（入）月旬，貧（爨）月內（入）

月旬（八日，獻馬內（入）月二旬七日，冬柰內（入）月旬，屈柰內（入）月二旬，遠柰內（入）〔月三旬〕。

從出土日書和傳世選擇類書籍看，描述“往亡”時，總是從正月開始，依次列出十二月的日數。引人注目的是，九店日書第94號簡“往亡歸死”後的第一個月名是“留辰”。這說明，楚日書的編抄者是把“留辰”當作每年的第一個月。上文復原出的月序，正好與日書另外兩處的月序相合（關於另外兩處的月序，前面所列陳偉文已做了詳細討論）。包山楚簡162號至170號，以及171號至178號兩段文字中，也有同樣的月序。結合這些證據，我們認為，楚月名的月序是：留辰、夏辰、享月、夏柰、八月、九月、十月、貧月、獻馬、冬柰、屈柰、遠柰。弄清楚楚月名的月序，對確定楚國的用曆是很有用處的。由於楚國用曆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裏就不涉及了。

## 注 釋

- ① 照片和釋文刊佈於《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 ② 關於帛書的篇題，請參看李學勤《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
- ③ 此點蒙李零先生提示，謹此致謝。
- ④ 參看吳振武《〈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中國古文字論集（初編）》。
- ⑤ 見《馬王堆漢墓文物》第140、141頁（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 ⑥ 從下文及該書所附的日書釋文看，此處“40號簡”當為“42號簡”之誤。
- ⑦ 此處脫釋一“以”字，參看上文所列陳松長文。
- ⑧ 參看拙書《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第418至421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 ⑨ 從上文所引論著看，此字目前有釋“壬”、“身”、“廷”等說。

- ⑩ 參看鄭剛《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結構特徵》（《中山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及拙書《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408頁至412頁。
- ⑪ 見《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甲種一〇二至一〇六背。
- ⑫ 見《睡虎地秦墓竹簡》甲種一四八背。
- ⑬ 經查，此處“下”當是“上”之誤。
- ⑭ 見《睡虎地秦墓竹簡》甲種一二四正之第三欄。
- ⑮ 簡文此處脫二字。
- ⑯ 簡文“先行”前有脫字。
- ⑰ 見拙書《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370頁、372頁。
- ⑱ “朝兆”讀為“朝迷”經李家浩先生提示，謹此致謝。
- ⑲ 照片上此字比較模糊，釋讀不一定可靠。
- ⑳ 參看劉彬徽《從楚簡記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包山楚簡》附錄二一）及拙書《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04頁至106頁。
- ㉑ 參看胡文輝《釋“歲”——以睡虎地秦簡〈日書〉為中心》，《文化與傳播》第四輯。
- ㉒ 參看拙文《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往亡”與“歸忌”》，《簡帛研究》第二輯。

#### 附記：

本文定稿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稿寫成後，曾請李學勤師審閱，謹此致謝。看校時，又見到一篇關於九店楚簡的考釋文章，即：李守奎，《江陵九店56號墓竹簡考釋四則》，載《江漢考古》1997年4期。另外，李零先生最近也撰有一篇集釋九店楚簡的文章——《讀九店楚簡》（待刊）。作者，一九九八年三月記於北京。

## 讀幾種出土發現的選擇類古書

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

擇日之術，後世叫“選擇”，自漢以降為數術大宗，傳統從未斷絕。其術出於星曆、式法，向有建除、叢辰、太一、天一、刑德、堪輿、風角、五音等眾多分支，名稱也有“陰陽”、“五行”、“時令”、“月令”、“日書”、“曆書”、“曆注”、“曆忌”等不同叫法。<sup>①</sup>現在講這類數術，出土之書日增，然發表早而討論多，唯睡虎地《日書》，<sup>②</sup>由於此書有自題書名，學者往往把類似古書統稱“日書”，但對不太一樣的書則無以名之，內容結構的分析也還存在不少問題，很有必要做匯總研究。在《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中，我已扼要分析過子彈庫帛書和放馬灘、睡虎地、旱灘坡出土的日書，這裏是對其他材料的進一步討論。

### 一、子彈庫楚帛書的殘片<sup>③</sup>

中國早期的選擇書，“陰陽”、“五行”是模糊說法，“曆注”、“曆忌”也是籠統名稱，王充把它們分為“歲月之傳”和“日禁之書”（《論衡·譏日》），出土發現也有這兩類，如楚帛書就是屬於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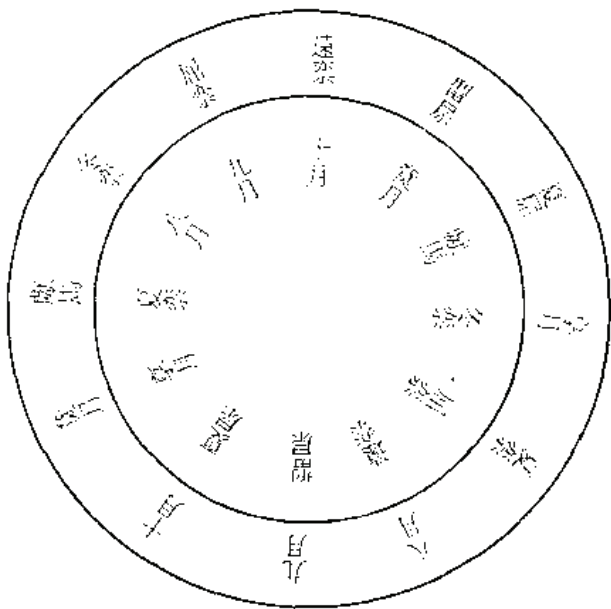
子彈庫帛書是1942年出土於湖南長沙，原為蔡季襄收藏，1946年由柯強帶到美國。帛書原來不祇一件，但長期以來，大家討論全是賽克勒藏比較完整的一件，其他殘片祇是近年纔為人所知，前者，學者習稱為“楚帛書”，這是不知道帛書還有其他殘片。現在有了這些殘片，應當各自命名。

子彈庫帛書，完帛是按“四時十二月”來組織畫面：十二月神分成四組，各居四方十二位，按左旋排列；四隅是以四色木相隔，按右旋排列，與“式圖”屬於同類設計。文字，也是圍繞着四時十二月，中間兩篇、是講“歲”、“時”，

邊文是講“月”。關於此篇，我們已多次討論，這裏不必再講，現在祇着重講一下其他帛書。

正在整理的子彈庫殘帛，已經揭開的殘片，大約占總量的三分之二，從內容上看，它們包含以下四類：

(1) 朱欄黑色小字類。它包含一幅圖畫（圖一），圖畫由兩個同心圓組成，圓圈的外緣是黑色，內緣是紅色，沿兩個圓圈的內側各書楚國的十二月名。兩套月名，同樣的月名和同樣的月名，彼此相差五位。圖的下面畫有朱絲欄，欄內文字是以紅色粗短橫分章，按“居木如何”、“居火如何”（尚未發現）“居金如何”（尚未發現）“居水如何”、“居土如何”，分別講其配色配物，如“元備（服）某色”、“乘某色車”、“元味某”、“元畜某”、“樹某某某”、“元皿某”、“元色某”“元蟲某”、“元兵某”、“元緒（綬）某玉”，以及時令禁忌等。商承祚先生舊藏的帛書殘片（10片）就是屬於這一類。<sup>④</sup>



圖一

(2) 無欄黑色大字類。分別書於四方，格式作“寗（掩）某方，從干支某某以至于支某某”，另有一些文字則提到“逆之曰生氣，從之曰死氣”等辭。

(3) 鉤形符號（作直角形）標干支類。鉤形符號用紅色畫成，干支為墨書。如其中一片是標“甲□”於折角外、“乙亥”於折角內，一片是標“□□”於角外、“丙□”於折角內，兩片是標“丁未”於角外，而另書文字（兩字）於折角內，甚至還有不書文字者。形式似與下面的尹灣《博局占》相似。

(4) 其他。還有朱欄紅色大字、墨欄黑色小字的若干殘片。

由於上述帛書尚未揭完，已揭殘片難以拼復，現在還無法判斷這四類是什麼關係，但我們的模糊印象是，子彈庫帛書是屬於“歲月之傳”：完帛與《月令》類古書（如《逸周書·時訓》、《大戴禮·夏小正》、《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相似,似可定名為《四時令》;殘帛與《玄宮》類古書(如《管子》的《幼官》和《幼官圖》)相似,似可定為《五行令》。從《淮南子·時則》我們不難發現,古代時令正好是由這兩個系統構成。它們和下述日書不同的地方是,它們是以“時”、“月”和節氣的劃分為主,並不落實到“日”,因而也就沒有後者那種複雜的干支排列。<sup>⑤</sup>參考王充的說法,我們不妨稱之為“時令類古書”。

## 二、九店楚簡《日書》<sup>⑥</sup>

現已發現的選擇書,除上所述,還有不少是屬於“日禁類古書”,即通常所說的“日書”。過去我以為,這種古書主要是由建除或叢辰類的曆忌總表(以日類忌)和按選擇事項分類排列的雜忌而構成(以忌類日),現在看來還有不少門類值得推敲。它們或以星別(如歲、斗、玄戈、二十八宿、天李、天陷),或以曆異(如朔望弦晦、朝夕啓閉和反支),有時還以占夢、相宅、厭劾、祠禳等術插附其中,如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56)出土的日書就是年代較早的標本。它的抄寫年代不晚於戰國晚期的早段,內容形式與放馬灘和睡虎地出土的秦日書相似,可以相互比勘。

九店《日書》的曆忌總表分兩種,一種是按“建”、“斲(陷)”、“敗(破)”、“坪(平)”、“寧”、“工”、“坐”、“盍(蓋)”、“城(成)”、“復”、“菟(宛)”、“敝(微)”排列,一種是按“秀”、“結”、“陽”、“交”、“口(害)”、“陰”、“達”、“外陽”、“外害”、“外陰”、“絕”、“光”排列。這兩套日名見於睡虎地《日書》,都是放在講建除的部分,使人以為是建除術。但拙見以為睡虎地《日書》的曆忌是分四種:

### (一) 建除

(1) 楚除。即甲種《除》篇的第一套日名和乙種首篇復合日名的前半名稱;

(2) 秦除,即甲種《秦除》和乙種《徐(除)》篇的日名。

### (二) 叢辰。

(1) 楚辰。即甲種《除》的第二套日名和乙種首篇復合日名後半名稱(是以叢辰與建除對照);

(2) 秦辰。即甲種《稷(叢辰)》和乙種《秦》篇的日名。

對比睡虎地《日書》，我們認為，九店《日書》的兩套日名，“建”字類是楚國的建除，“秀”字類是楚國的叢辰。

除曆忌總表，九店《日書》還有幾個小類是與歲徙和歲徙的方向吉凶有關。這也是秦代日書所有：

(1) 四時吉凶。是以四時配四方，按太歲所在的迎背左右講十二支吉凶（從“五子”到“五亥”）即所當方和左方為“不吉”（相當“大凶”和“小凶”），右方為“吉”（相當“小吉”），對方為“成”（相當“成”）。

(2) 相宅。是講屋舍布局的方向吉凶。

(3) 朝夕啓閉。是以朝夕啓閉占方向吉凶、逃、人、疾、管。

(4) 歲。是講歲徙的辰位組合和出入移徙的吉凶。

(5) 行。是講出行的吉凶。

這類數術與修築起蓋（動土）、出入移徙關係最大，與一般雜忌有別，我們懷疑，它們或與漢代的太一術或天一術有關。

在九店《日書》中，真正屬於雜忌，祇有講“裁衣”的一段簡文。

此外，簡文中還有講“陰陽死生”的一種，類似後世講“四時休王”的數術，以及禱告武夷君的一段祝辭。

### 三、馬王堆帛書中的有關材料①

馬王堆帛書是1973—1974年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M3)，帛書抄寫於秦漢之際，下限不晚於漢文帝十三年（前168年）。其中與選擇有關，主要是以下兩種：

(1) 《陰陽五行》分甲、乙兩種，發表者為甲本；

(2) 《刑德》，分甲、乙、丙三種，發表者為乙本；

《陰陽五行》甲本是講天一術，包括九宮圖和上朔表，九宮圖是以米字綫表示九宮，“天一”居中，四周為八神和二十八神。內圈八神為：北方“十二支”、“上奇”，東方“天涓”、“地涓”，南方“地”、“能”，西方“天樞”、“蒼”。外圈二十八神為：北方“沕(文)昌”，“四其”、“北海”、“三奇”、“除衝”、“天白(陷)”、“天獄”、東方“天李”、“伏靈”、“耕能”。

“□□”、“輿鬼”、“大(泰)山”、“天維”，南方“司陳”、“恒陳”、“日月”、“青龍”、“白虎”、“虹宮”、“上立”，西方“刑”、“德”、“□□”、“□□”、“大陰”、“大陽”。圖中界綫似以五色別(照片是黑白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

案：“八神”是九宮之神：“十二支”，即地支十二；“上奇”，《史記·天官書》有“騎官”(後世叫“騎星”)；“天涓”、“地涓”，下字右半從網從目，可能是“盲”字的異體，疑讀“天網”，“天網”即“天羅”；“地”，疑即《天官書》“地侯”(“鎮星”的別名)；“能”，疑即《天官書》“能星”(“兔星”的七種別名之一)；“天樞”，即北斗第一星；“藟”，疑即《天官書》“天廁”。“二十八神”是對應於二十八宿；“沕昌”，讀為“文昌”(“沕”是明母物部字，“文”是明母文部字)；“四其”，不詳；“北海”，居北，與下“大山”是類似名稱；“三奇”，遁甲式有“三奇四儀”；“除衝”，六壬十二神有“太衝”；“天召”，讀為“天陷”，睡虎地《日書》甲種有《天閭》篇，篇中“天閭”作“天召”，即此；⑧“天獄”，《天官書》叫“賤人之牢”；“天李”，即“天理”，《天官書》叫“貴人之牢”，睡虎地《日書》甲種有《天李》篇；⑨“伏靈”，見《晉書·天文志》，是一種彗星(據說是從太白散出)；“耕能”，《天官書》有“三能”(即“三臺”)；“輿鬼”，即朱鳥七星中的“輿鬼”；“大山”，居東，應即“泰山”；“天維”，疑即《天官書》“天睢”；“司陳”、“恒陳”，六壬十二神有“鉤陳”；“日月”、“青龍”、“白虎”，皆常見星官；“虹宮”，《天官書》有“宮星”；“上立”，不詳；“刑”“德”，即刑德術的“刑”、“德”；“大一”、“大陰”、“大陽”，疑即“天一三星”。⑩

《刑德》乙本是講太陰的刑德大游和刑德小游。⑪此書也有一幅九宮圖：中宮為圓圖，二分再五分圓面，黃色，代表土行，字迹殘泐，周圍八宮，則是四分再二分，各以方圖標於米字綫的八個方向：北方二宮，黑色，標“水”字於子位；東方二宮，青色，標“木”字於卯位；南方二宮，赤色，標“火”字於午位；西方二宮，白色，標“金”字於酉位(照片缺)。其圖配五帝、五神。五帝，“湍(顓)玉(頊)”在北，“大(太)皋(昊)”在東，“炎帝”在南，“少皋(昊)”在西(“少”誤“大”)，“黃帝”應在中宮(看不清)。五神，八宮皆具，為“豐隆”、“風伯(伯)”、“大音”、“雷公”、“雨師”。此外四

正標“刑德”、“大天、夏至”、“北昌、冬至”和鉤繩圖，四隅標“刑”，東北標“予強”、東南標“青澤”、西南標“聶（攝）氏（提）”和“司鬪”、西北標“青澤”和“氣雲”。②

案：“大音”，《天官書》：“涪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似非此所當。③道教有風、雲、雷、電、雨“五神”，是與金、木、水、火、土“五行”對應，如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道教玉牌，上為“風”、“雲”、“雷”、“電”、“雨”，下為“金”、“木”、“水”、“火”、“土”，左右為二十八宿名。疑“大音”即電神，④“大天”或即“大一”、“天一”之省，“北昌”或即“北斗”、“文昌”之省。“青澤”，《天官書》“其色大圖黃澤”，《集解》謂末字“音澤”，蓋形近易混。

#### 四、其他有關材料

##### （一）銀雀山漢簡：

這批竹簡是1972年出土於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M1），簡文抄寫於西漢初年的文、景時期，下限不晚於漢武帝元狩六年（前118年）。簡文包含與數有關的書十二種：⑤這十二種古書，其中與選擇有關，主要是以下五種：

（1）《禁》（篇題存），是以木、火、金、水配四時，土配季夏、季秋，講四時禁忌。

（2）《三十時》（篇題存）。是以6日為一節，12日為一時，講三十時節。

（3）《迎四時》（篇題補加）。是講天子於東、南、西、北四堂分迎四時，屬古“明堂月令”之說。

（4）《四時令》（篇題補加），是講天子命四輔授時於民，亦古“明堂月令”之說。

（5）《五令》（篇題補加）。是以德、義、惠、威、罰“五令”配麟（木）、羽（火）、羸（土）、毛（金）、介（水）“五蟲”，講五行生克，互為德刑。

這五種書都是“時令類古書”，其中（1）（3）（4）是一類，屬“四時令”；（2）（5）是另一類，屬“五行令”。它們是楚帛書之後的重要標本。



## (二) 尹灣簡牘。

這批竹簡和木牘是1993年出土於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M6)，簡文抄寫於西漢成帝永始、元延年間(前16—前9年)，簡文包含數術書六種，其中與選擇有關，主要是以下五種：<sup>⑥</sup>

(1)《神龜占》(篇題補加)。書於9號木牘正面的上部，下附神龜圖，是以神龜的頭尾、四肢和兩脅表示米字形的八方，從左後足(東北)始，以該位為月朔，右行數日，依次經尾(北)、右後足(西北)、右脅(西)、左前足(西南)、頭(南)、左前足(東南)、左脅(東)，每八日為一圈，至今日止，問亡盜得與不得、姓名和所之方向(即所至之位的方向)，其有關規定是按左行的順序條列，不與數日之法同。

(2)《六甲占雨》(篇題補加)。書於9號木牘正面的下部，祇有略如龜形的六十甲子圖(圖六)和“占雨”二字，缺占雨之辭。

(3)《博局占》(篇題補加)。書於9號木牘的背面，上面是博局圖，下面是占文。博局圖分內外兩層。內層為一方框，中標“方”字，外有四組T形綫(代表四方)；外層省去方框，內標L形綫於四正，V形綫於四隅(代表八方)。內外兩層之間形成一條走廊，外層四隅與內層四隅有綫相連，書六十甲子於各條綫的內外兩側(抄寫有誤)。占文分五欄十行，其中第一行是每欄的占問項目，作“占娶婦嫁女”、“問行者”、“問穀(系)者”、“問病者”、“問亡者”，其他九行都是以“方”、“廉”、“揭”、“道”、“張”、“曲”、“詘”、“長”、“高”起首，橫豎互為經緯。李學勤先生指出這裏的九名相當許博昌口訣的“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sup>⑦</sup>甚確。它們的位置，我懷疑，“方”即標注“方”字的方框內側(“方”指方形)，“廉”即方框外側(古代算家稱方形的邊為“廉”，角為“隅”，“廉”與“畔”同義)，“揭”即T形綫的縱綫(“揭”是植木為表，此象其形，“揭”是通假字)，“道”即T形綫的橫綫(綫外有道)，“張”即四隅連綫(象其四揚，出土六博局多以四個圓圈代之)，“曲”、“詘”即外層四正的L形綫(象其曲折)，“究”讀“糾”，與“曲”含義相近，“屈”同“詘”，“長”、“高”即外層四隅的V形綫(象其高長，“玄”有遠義，與“長”含義相近)。

(4)《刑德行時》(篇題存)。書於竹簡。簡文是按“端”、“令”、“罰”、“刑”、“德”占“請謁見人”、“行”、“穀(系)者”、“疾者”、“生子”五事，



形式與銀雀山漢簡《五令》相近。

(5)《行道吉凶》(篇題存)。書於竹簡。簡文是按六十甲子占行道吉凶，每日皆注“得幾陰幾陽”(“三陽”、“三陰”、“二陽一陰”、“二陰一陽”)和“得某方之門”。前者可能是所當卦氣，後者則是所出之門。

這五種古書，除(4)可歸入“時令類古書”，其他都是“日禁類古書”。其占問形式(如神龜占、博局占)頗具特色，但所問事項不多，祇是雜忌式的短篇。

1998年4月11日寫於北京薊門里

## 注 釋

- ① 參看《史記·日者列傳》所述漢武帝所聚占家及《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史志的有關著錄。
- ② 有關研究狀況，參看劉樂賢《陝西秦簡〈日書〉研究二十年》(《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10期，2—10頁)
- ③ 李零《楚帛書的再認識》，《中國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42—62頁。
- ④ 商志輝《記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楚國殘帛書》，《文物》1992年11期，32—33轉35頁。
- ⑤ 李零《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194—210頁
-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年，附錄二：李家浩《江陵九店五十六號墓竹簡釋文》(506—511頁)，案：關於簡文釋讀，我有《讀九店楚簡》一文(待刊)作專門討論，這裏祇講一般印象。
- ⑦ 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132—145頁。
- ⑧ 《孫子·行軍》也有“天陷”，為五種凶煞之地的一種，但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行軍》、《孫子兵法》佚篇《地形二》和《孫臏兵法·地葆》相當於“天陷”的“陷”字皆從召作。

- ⑨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299頁引鄭剛說以為“天獄”即“天李”，可商。
- ⑩ 馬王堆帛書《避兵圖》上的三龍是“天一三星”，三星相當“三一”，即青龍為“天一”，黃龍為“地一”，黃首青身龍為“太一”，我們懷疑這裏的“大一”即“太一”，“大陽”即“天一”，“大陰”即“地一”，參看饒宗頤《圖詩與辭賦——馬王堆新出〈太一出行圖〉私見》（收入《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79—82頁）。
- ⑪ 馬克（Marc Kalinowski）《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第1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2—110頁。
- ⑫ 饒宗頤《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江漢考古》1993年1期，84—87頁。案：饒文“北昌”作“甘昌”，東南“青澤”作“青皋”，西南“青澤”作“言三”，此不同。
- ⑬ 注10引馬克文95頁引《天官書》此條，謂“我們幾乎對大音一無所知”，“饒宗頤先生認為大音可能僅是太陰的一個異稱，但缺乏足夠的證據”。
- ⑭ 王育成《中國古代道教奇異符牌考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2期，25—50頁。
- ⑮ 整理本尚未發表，我們祇能從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發表的按簡號排列的簡文試為鈎稽。拙作《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收入《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194—210頁）是專論這十二種古書中的《三十時》，並對其他十一種也做了介紹。
- ⑯ 連雲港市博物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123—126, 145—147頁。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數術文獻初探》（作者所贈待刊稿）對這五種數術書有很好的討論，拙作此節是參考該文而畧作補充。
- ⑰ 李學勤《〈博局占〉與規矩紋》，《文物》1997年1期，49—51頁。

# 仰天湖竹簡選釋

何琳儀

一九五三年，在湖南省長沙市仰天湖M 25出土一批戰國楚簡，計40餘枚①，內容為“遣策”。四十年來，有關著作、論文相繼發表，成績斐然可觀，然而有許多問題未能得到徹底解決。本文擬就其中若干釋讀予以探討，凡得六則。

## 縵

中君之一縵(䄂)②衣，△純，紆(紆)縵之縵(紆)③ (2)

一縵(䄂)布之縵，大縵(縵)④之縵(紆)，△純，又(有)紅組之縵(縵)⑤又(有)骨夾。(15)

從(䄂)羅⑥△之縵(縵)。(10)

一紫縵(縵)之縵(席)⑦，縵(黃)縵(裏)，大△之純 (11)

以上“△”分別作下列各形：⑧

縵

縵

縵

縵

羅福頤⑨、史樹青⑩均釋“縵”，饒宗頤釋“縵”，余鎬堂釋“縵”，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釋“縵”⑪，郭若愚釋“縵”⑫，至為紛歧。

羅福頤最早注意到仰天湖簡“和魏三體石經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所著《汗簡》上的書體也很接近”，頗有見地。檢“縵”字傳鈔古文作：

縵 《汗簡》下之二·七七

縵 《古文四聲韻》上聲十五

後者右旁與上揭10號簡“△”右旁形體吻合無間，故“△”應隸定“縵”。

《說文》“𦃟，所依據也。从爻、工。讀與隱同。”然而楚簡文字“縵”

右下並不从“又”，卻从“止”。這類“又”、“止”相混的現象古文字中習見，茲僅舉楚文字二例：

𠄎 𠄎 禽 𠄎 𠄎 信陽 101

寺 𠄎 𠄎 包山 234 𠄎 包山 232

下面將秦系文字、楚系文字、傳鈔古文中的“𠄎”旁字做一番比較：

𠄎 十鐘 3 𠄎 秦簡 994 𠄎 說文

𠄎 仰天 11 𠄎 仰天 2 𠄎 仰天 10

𠄎 汗簡下 2.77 𠄎 𠄎 聲韻上 15

從中不難看出“𠄎”中間“工”旁可能是由“干”旁演化而成，即：

𠄎 — 𠄎 — 工

𠄎 — 𠄎 — 工

迄今尚未發現殷周文字“𠄎”，（散盤爰舊釋“𠄎”，不一定可信。）因疑“𠄎”本从“𠄎”，从“干”會意。“干”金文作𠄎，象盾形。《詩·大雅·公劉》“干戈戚揚”，箋“干，盾也”。戰國文字“干”增飾筆作𠄎、𠄎等形。“𠄎”表示雙手持盾，與《說文》所謂“依據”正相通。另外，“𠄎”的同源字“隱”《說文》訓“蔽”，“干”的同源字“扞”《左·成十二年》注亦訓“蔽”。“𠄎”與“干”的內在聯繫不言而喻。仰天湖簡 11 𠄎形，《汗簡》𠄎雖均收縮中間豎筆，尚能保存𠄎或𠄎的主體部分。雲夢秦簡“干”借用“𠄎”左旁一筆，𠄎猶未失原義。秦、楚文字“𠄎”所从“干”最後都演變為“工”，被小篆承襲。秦陶文中還有省“工”的“隱”作𠄎（《陶彙》5368），則被隸書承襲。

仰天湖簡“𠄎”即“𠄎”。檢《廣雅·釋詁》二“𠄎，緝也”。王念孫云：“𠄎者，《衆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云，合佚曰𠄎。《說文》云，𠄎，緝也。”⑬ 檢《集韻》“𠄎，一曰，緝衣相合”。

2 號簡“𠄎純”，謂疏衣有縫合邊緣。15 號簡“𠄎純”，謂𠄎有縫合邊緣。仰天湖墓中出土“皮帶”一件，“由兩層皮革合製而成，皮帶的邊緣有縫合的針孔。”⑭ 即所謂“𠄎”（詳下文）之“𠄎純”。“𠄎純”猶“𠄎緣”，見《急就章》“鍼縷補縫綻佚緣”補注“細刺謂之𠄎，純邊謂之緣”。10 號簡“促羅𠄎”，謂疏羅有縫合邊緣。11 號簡“大𠄎之純”，謂席子四周有縫合的寬緣。

𠄎

紕(疏)布之△二疊(偶)(4)其中“△”原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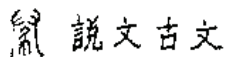
史氏釋“羅”，饒、余二氏釋“組”，郭氏釋“紕”。筆者曾隸定“羅”釋“原組”合文⑤今補充說明：

“△”右下“=”兩端平齊，應是合文符號。仰天湖簡“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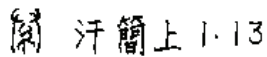


其右下兩橫長短不齊，當然也不排斥“△”。右下合文符號也兼有“組”右下筆畫的功能，不過“=”更側重表示合文。

“縻”，甲骨文作𠂔(《甲骨文編》13·1)，字書所無，傳鈔古文“尹”則得其仿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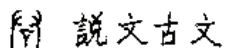


說文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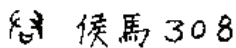


汗簡上1·13

後者“尹”下从“系”，楚簡“系”或作系，可以互證。至於“尹”譌變作“𠂔”形，參見“君”作：



說文古文



侯馬308

帛書《老子》乙本“縹”⑥，疑亦“縻”之繁文。今本《老子》作“混”，屬音轉。

“縻組”合文疑讀“絢組”。《詩·大雅·韓奕》“維筍及蒲”，釋文“筍字或作笋”。可資佐證。“絢組”，見《儀禮·聘禮》“朱絳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今文絢作絢”。

“縻”又疑讀“綹”。《書·洪範》“鯀陟洪水”，漢石經“陟”作“尹”。而《說文》“煙或作烟”可資旁證。疑“縻組”即“綹組”，見《穆天子傳》六載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衣九領。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女主叔姪贈，用綹組”。郭注“綹禱”。“綹”指籍棺之席。《儀禮·既夕禮》“加綹，用疏布，緇翦有幅。”注“綹所以籍棺者。翦，淺也”。疏“加綹者，謂以綹加於抗席之上。此說陳器之時。云用疏布者，謂用大功疏麤之布……有幅緣之者，別用一幅布為之縫合兩邊”。

## 笄

一△柜(櫃)、玉頁(首)。一櫟(棗)柜(櫃)，又(有)綵(錦)綉。(8)



“△”原篆作：

↑  
K

李學勤釋“筭”①⑦，中山大學隸定“筭”而不釋，郭氏釋“竹”。

按，“△”从“竹”，从“片”（即半“木”），中山大學隸定“筭”，甚確。中山王方壺“筭”，于豪亮釋“策”，于氏引《老子》二十七章“善數者無籌策”，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作“善數者不以禱筭”，乙本作“善數者不用禱筭”為證，謂“筭、筭是策字，則筭也是策字。因為片為半木，斫或析都是表示以斤劈木的會意字，故都是析字，因此筭字就是筭字，筭字則為筭字之省。由此知筭、筭都是策字”。①⑧于說分析至為精當。“筭”字亦見：

𠄎 望山簡①⑨

𠄎 帛書《老子》②⑩

楚簡與帛書“筭”一脈相承，均“筭”之省簡，讀“策”。

“柜”即“櫃”。《正韻》：“柜，篋也。亦作匱。”《集韻》：“匱，《說文》匣也，或作櫃。”《廣韻》：“櫃，篋。”

簡文“筭柜”讀“策櫃”或“冊匱”，“冊匱”見《書·金縢》“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指盛放竹簡的匣子。仰天湖墓中所出的這件玉首匣子一定十分精緻，估計竹簡出土以前早已被盜。

## 𠄎

一𠄎(枚)韋之𠄎，綌綌(縫)，又(有)二𠄎(環)。(9)

饒氏引《龍龕手鑑》土部“𠄎，古文梅字。”謂“𠄎通枚。《方言》簡，枚也。一𠄎殆即一枚。”甚確。“𠄎”亦見馬王堆3號墓出土帛書“策書陰陽五行”。

“𠄎”，諸家多隸定而不釋，唯郭氏釋“𠄎”。

按，古文字“止”或僅表行動，並無確切含義，往往可有可無。例如信陽簡“上”作“止”，“𠄎”作“𠄎”等。故“𠄎”亦可隸定“𠄎”即“𠄎”。

《廣雅·釋詁》—“𠄎，表也”。王念孫云：“《說文》𠄎，戾也。又云𠄎，表也。又云，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故借以為皮韋。《爾雅》婦人之褱謂之綌。注云，褱邪交落，帶繫於褱，因名為褱，義亦與𠄎同。”②⑪楚簡“𠄎”雖不必為“婦人之褱”，但王氏謂“𠄎”、“褱”

音義並通，則無疑義。按，楚簡“𦣻”應讀“褱”，《說文》：“褱，蔽衽也。从衣，韋聲。”《方言》四：“蔽衽，江淮之間謂之褱，或謂之袂，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衽，齊魯之郊謂之褱。”《穆天子傳》一：“天子大服冕褱。”蔽衽為裳前之佩巾，質料多為皮革，故“袂”亦作“𦣻”，“褱”亦作“𦣻”。簡文“韋之𦣻”更能說明“𦣻”為“韋”製。

《廣雅·釋器》“綌，索也。”簡文“綌綌”（亦見37號簡）疑讀“綌綌”，指蔽衽用繩索縫合。

9號簡文意謂“一條皮革製的蔽衽，用繩索縫合，上有二環”。

## 夊

一紕（䟽）布之繪，大纓（纓）之韙（韙），纓純，又（有）紅組之綌（綌），又（有）骨△。（15）

“△”原篆作：

夊

史氏釋“耳”，余氏釋“扭”，郭氏釋“又”。

按，“△”應釋“夊”，參見下列楚簡文字：

史 包山 260 ②

史 望山

包山簡“夊盂”應讀“夊韙”。②《集韻》：“夊，所以闡弦者。”《廣雅·釋詁》四：“韙，裏也。”“夊韙”指盛放夊之袋。“夊”即“扳指”，詳下文。包山墓出土兩件帶皮墊的骨刺“指套”即“夊”，“皮墊”望山簡“丹鞅之𦣻（車）夊”、“□鞅聃（聃）秦之夊”。其中“夊”均讀“轂”。《禮記·禮運》：“三五而闕。”《孔子家語·禮運》“闕”作“缺”。前者“轂”與“車”聯言，應指車鉤心木。《漢書·王吉傳》“其樂豈徒銜轂之閒哉”，注“師古曰，轂，車鉤心也”。後者與馬具聯言，應指馬銜。《莊子·馬蹄》“前有轂飾之患”，釋文：“轂，司馬云，銜也。崔云，鑣也。司馬云，飾，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簡文“□鞅聃”即馬銜之飾。

戰國文字从“夊”字有：

缺② 𦣻集成300.5 𦣻輯證217.1 𦣻集成310.3

快	𠂔 包山82	𠂔 包山169	𠂔 包山118
𠂔	𠂔 包山138	𠂔 包山150	𠂔 包山194
𠂔	𠂔 包山74	𠂔 包山152	

曾侯乙墓所出鐘、磬銘“𠂔”讀“缺”，疑是變律的專門術語，如“濁坪皇之𠂔”、“濁獸鐘之𠂔”、“割牂（洗）之𠂔”等。

包山簡“快”、“𠂔”、“𠂔”三字均為人名。

秦漢文字“𠂔”及从“𠂔”之字習見，參《秦漢》：

𠂔	𠂔 195	𠂔	𠂔 195
𠂔	𠂔 688	𠂔	𠂔 801
𠂔	𠂔 867	𠂔	𠂔 1042
快	𠂔 745	𠂔	𠂔 432

由戰國秦漢文字“𠂔”還可推溯舊所不識的商周文字“𠂔”：

𠂔 𠂔 類纂358 𠂔 𠂔 宜桐孟

甲骨文“𠂔”多見甲橋刻辭，為方國之名。《說文》“決，廬江有決水，出於大別山。”刻辭中“𠂔”似與“決水”有關，估計在河南固始一帶。

春秋晚期徐器桐孟銘“郟王季畀之孫宜桐乍鑄釂孟以賓缺妹”。其中“賓”為動詞，不識；“缺”可讀“厥”，物主代詞。參上文引“缺”與“關”相通之證。

《說文》“𠂔，分決也。从又，𠂔象決形。”關於“𠂔”的構形及本義，清代學者多有揣測之辭，茲不具載，詳《說文詁林》。朱駿聲云“本義當為引弦彊也。从又、𠂔象彊，𠂔象弦。今俗謂之扳指，字亦作𠂔。《周禮·繕人》決拾。注，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箸右手巨指。以挾為之。《詩·車工》𠂔拾既攸。釋文，𠂔本作挾。”②朱氏根據小篆分析字形，殊不可據；但以“𠂔”為“挾”之初文，十分正確。《集韻》“𠂔，所以閫弦者。”“𠂔”从“又”，“挾”从“手”。“又”、“手”本一字分化，故“𠂔”與“挾”為古今字。《廣韻》：“挾，縱弦彊也。”

甲骨文𠂔正像右手套扳指之形，屬於所謂“借體象形字”。扳指有“如環無端”和“如環而缺”兩種。②上文所引《集成》箸錄曾侯乙編鐘“𠂔”所从𠂔屬“如環無端”，𠂔屬“如環而缺”。上文所引漢代《縱橫家書》𠂔亦屬“如環而缺”者，後來被小篆𠂔所承襲。或囿於小篆以為“𠂔”从“又”，从“𠂔”②

殊誤。“夫”的體演變列表如次：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在典籍中，“夫”除作“扶”、“𠂔”、“決”外，亦作“玦”，即“鞬”，乃先秦成年男子經常佩帶之物。《詩·衛風·芄蘭》：“芃蘭之葉，童子佩鞬：傳“鞬，玦也。能射御則佩鞬”。箋“鞬之言沓，所以驅沓手指”。《說文》：“鞬，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箸右巨指。”《儀禮·大射儀》“袒決遂”，注“以象骨為之，箸右手巨指，所以鉤弦而闡之”。仰天湖簡文“骨夫”即“象骨”所製之“夫”。扳指在考古遺物中習見<sup>②</sup>，望山M1出土2件，望山M2出土20件<sup>③</sup>，多為骨製。凡此說明，本文“骨夫”的釋讀是可信的。

15號簡文意謂“一件有畫飾之衣，寬邊緣的蔽膝，（《釋名·釋衣服》‘褻，緣也。青絳為之緣也。’）縫合邊緣，有紅色絲組編織的繫帶，（《爾雅·釋器》‘緇，綫也。’注‘綫，繫也。’）有骨製的扳指”。

## 𠂔

黃□之△八，又（有）檜（栝）。（20）

“△”原篆作：

𠂔

諸家多闕釋，此字亦見下列楚系竹簡：

𠂔 籛五東

隨縣3

夫 盟（韞）……四𠂔…… 包山260

或釋隨縣簡此字為“羊”，疑“箭”字之古文<sup>④</sup>，甚有理緻。今試為補充說明。

首先應說明，像倒矢形的上揭竹簡文字隸定為“羊”不够精確，這是因為《說文》“羊”與“△”形音均無關。《說文》“羊，微也，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𦍋。讀若能。言稍甚也。”信陽簡2·023有从羊形的字：

一綫（錦）索（素）𦍋…… 緼績（練）又（有）𦍋，緼𦍋朴，  
皆……

此字似可隸定“𦍋”，其右上與小篆形體吻合無間。小篆“𦍋”从“干”，此字右上从戰國文字“干”。由此可見，小篆“羊”應是“干”的變體。信陽簡

“楯”，从“木”，“倝”聲。（《廣韻》“倝，倝儻，小人兒。”）簡文“楯”應讀“楯”。《廣韻》“楯，重緣。”隨縣簡 2.12 或釋“敵”<sup>②</sup>，其實應釋“敵”（“倝”見《說文》），詳另文。《說文》“羊”聲系有“𦍋”，或作“𦍋”（見《詩·小雅·節南山》“憂心如𦍋”釋文）。這也是“羊”為“干”之證。至于“羊”聲系的“南”，為獨體象形字，顯然不从“羊”。總之，古文字並無“羊”及从“羊”之字，《說文》“羊”的形音不一定可靠。“羊”（或“干”）與上揭楚系竹簡三字無關。

如果參照从倒矢“至”字的構形，似乎可隸定“△”為“𡗗”。由此類推，从倒矢的“函”亦應隸定“𡗗”，不應隸定“函”。

仰天湖、包山簡與隨縣簡“𡗗”比較，前者多一橫，應屬飾筆。

“𡗗”，為倒矢形，屬“變體象形字”，疑“晉”之初文。甲骨文从“𡗗”者習見，如“至”、“函”、“𡗗”、“晉”等。其中“晉”與“𡗗”關係最為密切。

“晉”，據《說文》分析从“日”，从“𡗗”。然而古文字“晉”多从“𡗗”，而很少从“𡗗”。《集成》著錄曾侯乙編鐘銘“晉”从“𡗗”，从“𡗗”者并見。

𡗗

290.6

𡗗

322.6

這一現象似乎說明，“晉”本从“𡗗”，後演變為从“𡗗”。古文字部件往往“單複無別”，《貨系》著錄“晉陽”尖首布“晉”或从“𡗗”或从“𡗗”：

𡗗

904

𡗗

920

可資佐證。“𡗗”如果是“箭”之初文，則“晉”應从“𡗗”聲。“箭”，精紐元部；“晉”，精紐真部。聲紐相同，韻部旁轉。諧聲吻合。其實“𡗗”、“𡗗”、“晉”有可能是一字分化。《說文》“楯，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楯。”《周禮·夏官·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為晉”。《儀禮·大射儀》“綴諸箭”，注“古文箭為晉”。凡此可證，典籍“晉”（或作“楯”）與“箭”實則一字。从古文字分析，“晉”从“𡗗”或“𡗗”。然則“𡗗”為“箭”之初文，似無疑義。

上揭仰天湖、包山、隨縣諸簡中“𡗗”均讀“箭”。

仰天湖簡“楯”，應讀“楯”。《書·禹貢》“柁榦栝柏”其中“栝”即



“檜”，木名。《廣韻》“檜，木名，柏葉松身。栝，上同”是其確證。簡文“栝”則指箭栝。《集韻》：“栝，一曰矢栝，築弦處。”

楚文字从“平”者有：

二十 鈺 包山 277  
一 季 信陽 2.024  
彭 鄂君啟舟節

包山簡“鈺”，“平”之繁文，仍然讀“箭”。信陽簡左旁不詳，右从“平”。鄂君啟舟節“弜”，从“弓”，从“平”會意，“射”之異文。“彭射”即“彭澤”，<sup>⑬</sup>地名。

## 注 釋

- ① 《長沙仰天湖戰國墓發現大批竹簡及彩繪木桶雕製花板》，《文參》1954.3.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仰天湖第25號木槨墓》，《考古學報》1957.2圖版肆——陸。
- ② 饒宗頤《戰國楚簡箋證》，《金匱論古綜合刊》1期。
- ③ 朱德熙、裘錫圭《信陽楚簡考釋》（五篇），《考古學報》1973.1。
- ④ 史樹青《長沙仰天湖楚簡研究》，群聯出版社，1954。
- ⑤ 同注②
- ⑥ 余鎬堂《鎬堂楚簡釋文》（晒藍本），1957。
- ⑦ 同注②
- ⑧ 承蒙陳松長先生核對照片，謹致謝意。
- ⑨ 羅福頤《談長沙發現的戰國竹簡》，《文參》1954.9。
- ⑩ 史樹青《談1954年第9期文物參考資料筆記》，《文參》1954.12。
- ⑪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戰國楚簡研究（六）》，（油印本），1977。
- ⑫ 郭若愚《長沙仰天湖戰國竹簡文字的摹寫和考釋》，《上海博物館集刊》3期，1986。
- ⑬ 王念孫《廣雅疏證》。

- ⑭ 同注①
- ⑮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193, 中華書局, 1989。
- ⑯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圖版229上, 文物出版社, 1980。
- ⑰ 李學勤《談近年新發現的幾種戰國文字資料》, 《文參》1956·1
- ⑱ 于豪亮《中山三器銘文考釋》, 《考古學報》1979·2。
- ⑲ 《文物》1966·5 圖版伍。
- ⑳ 同注⑯ 241下。
- ㉑ 同注⑳。
- ㉒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38, 文物出版社, 1991。
- ㉓ 何琳儀《吳越徐舒金文選釋》, 待刊。
- ㉔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262, 又圖版89·3, 文物出版社, 1991。
- ㉕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 《音樂研究》1981·1。
- ㉖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 ㉗ 陳奐《詩毛氏傳疏》引胡承珙說。
- ㉘ 嚴可均《說文校議》, 引《說文詁林》三下1241。
- ㉙ 《洛陽中州路》圖版捌拾10、《曾侯乙墓》圖版154·1。
- ㉚ 承蒙劉彬徽先生函示, 謹致謝意。
- ㉛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 《曾侯乙墓》504, 文物出版社, 1989。
- ㉜ 同上注503。
- ㉝ 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啟節考釋》(八篇),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長春)論文, 1988。

### 引用書目簡稱表

類纂 — 姚孝遂等《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集成 — 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  
輯證 —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  
貨系 — 汪慶正等《中國歷代貨幣大系》  
侯馬 — 山西文管會《侯馬盟書》  
十鐘 — 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  
陶彙 — 高明《古陶文彙編》  
仰天 — 史樹青《長沙仰天湖楚簡研究》  
信陽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  
包山 —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  
隨縣 — 湖北博物館《曾侯乙墓》  
秦編 — 張世超等《秦簡文字編》  
秦漢 — 徐中舒等《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文參 — 文物局《文物參考資料》

附言：

1. 本文提綱已於1992年中國古文字學術研討會（南京）宣讀。
2. “𠂔”或據《包山楚簡》“冒”作𠂔 132、134、136、137 釋“緝”，然據“君”作𠂔 133、134、138 似“司”與“尹”旁有別。誌此備參。

## 楚國第二批司法簡帛議

陳偉（武漢大學歷史系）

1992年在江陵磚瓦廠370號戰國楚墓中出土殘簡6支（段）。雖然資料迄今還沒有正式發表，但在滕壬生先生所撰《楚系簡帛文字編》中①，已經作了較多的披露。關於這批簡書的性質，滕先生說是“卜筮祭禱記錄”②。但看所引述4支簡的內容，卻都與司法有關，實當是繼包山簡之後出土的第二批楚國司法簡，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現據滕先生書中所引，對竹簡文字加以復原，並略作討論。由於資料依據的特殊，討論帶有較大的試探性。

據初步統計，這批簡書資料分別見於“一”、“天”、“下”、“告”、“舍”等39個字頭之下，共有80條。由於“文字編”的特定性質和引述句例的標準不盡一致，引自江陵磚瓦廠楚簡的文句往往重復或部分重合。這使我們有可能通過相互比勘，把零散的簡文拼合起來。有些文句大致相同，但個別字有出入。其原因或是釋字前後不一，或是抄錄有誤，文中將作必要的說明。以下分段寫出4支簡的復原文字及其主要出處（“～”符號之前的數字為簡號，之後的數字為筆者推測的同一支簡中各段文字的順序號）：

[1～1] 𠄎與付門之里人一發告僕言胃（P343“胃”字下、P654“人”字下、P669“付”字下、P846“門”字下、P975“里”字下）

[1～2] 某翌與僕兄之下 𠄎𠄎𠄎（P211“與”字下、P483“某”字下、P705“兄”字下）

[1～3] 競梁天殺之僕不敢不告（P452“梁”字下）

[2～1] 夏辰之月（P425“夏”字下、P489“之”字下等）

[2～2] 庚子之夕（P585“夕”字下、P489“之”字下等）

[2～3] 覲殺僕之兄（P202“僕”字下、P259“殺”字下、P489“之”字下、P705“兄”字下、P708“覲”字下）

[2~4] 孝昏僕未智其人今僕對 (P292 “智”字下、P1075 “昏”字下。部分見於 P200 “對”字下、P202 “僕”字下、P372 “其”字下、P654 “人”字下、P705 “兄”字下、P1094 “未”字下)

[3~1] □人孝□敢告於見日 (P335 “敢”字下、P691 “孝”字下。部分見於 P90 “告”字下、P324 “於”字下、P563 “日”字下、P707 “見”字下)

[3~2] 夏原之月 (P425 “夏”字下、P578 “月”字下等)

[3~3] 庚子之夕 (P585 “夕”字下、P1066 “庚”字下等)

[3~4] 規殺僕之兄 (P202 “僕”字下、P259 “殺”字下、P705 “兄”字下、P708 “規”字下)

[3~5] 孝昏僕不智其人今僕敢之某 (P293 “智”字下。部分見於 P90 “舍”字下、P336 “敢”字下、P372 “其”字下、P483 “某”字下、P489 “之”字下、P1075 “昏”字下)

[4~1] □□□人孝□敢告於□ (P691 “孝”字下。部分見於 P336 “敢”字下)

第90頁“告”字下引簡文與1~1畧同，但在“一餐”與“告僕”之間多出一個“敢”字。查第335—336頁“敢”字下無相應文句。因而“告”字下所引可能衍一“敢”字，而不是與1~1不同的簡文。

第202頁“僕”字下引簡文與1~2畧同，但在“與”與“僕兄”之間多出一個“慶”字。查第795—796頁“慶”字下無相應文句。因而“僕”字下所引可能衍一“慶”字，而不是與1~2不同的簡文。

第16頁“天”字下，第196頁“競”字下、第259頁“之”字下、第834頁“不”字下所引與1~3畧同。但“梁”均寫作“利”。查第349—350頁“利”字下無相應文句。上述各條所引均應與1~3相同。看第452頁“梁”字下摹寫的字形，釋為“汾”、讀為“梁”應無問題。不過由於其他各處都引作“利”字，這個字原本是“利”而摹寫失真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排除。

第654頁“人”字下引簡文與3~1畧同，但“孝”與“敢告”之間的缺釋之字寫作“捍”。查第855頁“捍”字下並無相應簡文。因而“人”字下所引實應與3~1相同，而不是別的一段文字。又第90頁“告”字下引3號簡



文字作“人孝□敢告於□”這段簡文與書中所引3號簡其他各條均不相符而與第691頁“孝”字下所引4號簡一段文字的後半部分重合，因而所標“簡3”應是“簡4”之誤。

第202頁“僕”字下所引與3～5畧同，但少一“晉”字。“孝晉”是人名，“孝”為姓，“晉”為名，相同人名以及與3～5大致相同的簡文亦見於2～4。因而“僕”字下所引當是脫一“晉”字，而不是另外一段文字。3～5中的“今”字有時寫作“含”。看第90頁“含”字下摹寫的字形，此字應釋為“含”，讀為“今”。第654頁“人”字下所引亦與3～5畧同，但“今”字寫作“句”。查第179頁“句”字下並無相應簡文，因而“人”字下所引當是將“含(今)”誤釋或誤寫成“句”，實與3～5相同。

上列每支簡中各段文字的順序，大多是依照包山簡中類似記載及簡文的邏輯關係推定的。只有第691頁“孝”字下所引2、3號簡文均作“觀殺僕之兄孝”，從而可知2～3與2～4以引及3～4與3～5的连接較為可靠，其他順序或許並非如此。

下面按我們的理解，將各支簡文連貫寫出，並加上標點：

□與行門之里人一賢告僕，言曰：某嬰與僕兄之下□□□競梁而殺之。僕不敢告。（1號簡）

夏祭之月庚子之夕，覩(盜)殺僕之兄字晉。僕未智(知)其人。今僕辯（2號簡）

□人字□敢告於見日：夏祭之月庚子之夕，覩殺僕之兄字晉。僕未智(知)其人。今僕敢之某（3號簡）

□□□人字□敢告於□（4號簡）

在文字釋讀方面，有幾點應作說明。1號簡中有句話原作“競梁天殺之”。按這種讀法，“競梁天”為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就是殺害字晉的凶手。但原釋為“天”的字，與包山簡85號95號中的“而”字寫法相同，更可能是“而”字。《爾雅·釋言》：“競，強也。”強梁是強悍蠻橫的意思，“競梁而殺之”是說悍然殺人。如果按《楚系簡帛文字編》大多數場合的處理，把“梁”釋為“利”，則“競利而殺之”應該是說爭奪利益而行凶。在這些場

合，凶犯可能是與李晉同行的某翌。

2、3、4號簡中的“李”原釋為“孝”。這個字在包山簡中多次出現，學界存在不同理解。我們贊成把這個字釋為“李”<sup>③</sup>，在這裏為姓氏用字。

2、3號簡中的“覲”應讀為“盜”。“覲”從“非”聲，“非”、“盜”上古音都在宵部定紐<sup>④</sup>，或可通假。九店楚日書32號簡“必無竭寇逃（盜）必兵”，即借“逃”為“盜”<sup>⑤</sup>。《史記·楚世家》記“盜殺聲王”，可相比照。正因為說是“盜殺”，所以簡文隨後說“僕未知其人”。

2號簡中的“辯”字原釋為對。這個字在包山簡中多次出現，是重要的司法用語。釋“對”是沿用包山楚簡整理小組的意見，近年又有釋為“譖”、“譖”等見解<sup>⑥</sup>。這個字的寫法與《古文四聲韻》卷三、卷四所引古《老子》“辯”及“辯”字近似<sup>⑦</sup>，恐當釋為“辯”或“辨”。“辯”、“辨”有治理明察的意思，包山簡中用作動詞，有時也用作名詞或副詞。126號簡說“子左尹命漾陵之憲大夫辯州里人陽錯之與其父陽年同室與不室”；27號簡說“乙亥之日不以死於其州者之辯告”；137號簡說“信辯聞智舒慶之殺宣卯，逃，惺與慶皆；辯聞智苛冒，宣卯不殺舒昭”，就分別是這三種用法的句例。江陵磚瓦廠3號簡中的這個字可能是動詞，也可能是副詞。就現有資料看，像包山137號簡一樣用作副詞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即其下也有“聞”或類似動詞，合在一起是明確聽到的意思。1號簡前面一段則可能是“辯聞”的內容。

2號、3號簡的內容大致相同，顯然是講同一樁案件。1號簡中自稱為“僕”的人，也聲稱其兄被殺；其中提到的涉案人“某翌”，與3號簡中說到的“某”（下殘）可能是同一個人。因而這支簡與2號、3號簡所記大致也應是同一事件。4號簡僅存數字，但與3號簡開頭一句畧同，尤其是當事人均為“李□”，所記亦當為一事。這樣，在江陵磚瓦廠370號墓中出土的這幾支簡都與同一起案件有關。

就現有資料看，1、3號簡都在30字以上。2號簡只有23字，顯然有部分殘斷。如果把4號簡與2號簡相接，則字數與1、3號簡相當，格式與3號簡畧同。看來這兩支殘簡很可能原本屬於一支。

按照從包山簡得到的經驗，3號簡以及4接2號簡各是一篇文書的前面一段，1號簡則是一篇文書的後面一段。1號簡極有可能與3號簡或者4接2號簡合為一篇完整的文書。依照前述對“辯”字的分析，4接2號簡與1號簡

合為一篇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如然，我們在江陵磚瓦廠竹簡中所看到的是一篇基本完整的文書和另外一篇文書的前面一部分。

上面我們一再將江陵磚瓦廠竹簡與包山簡相比。在包山簡中，與江陵磚瓦廠竹簡格式相同的有兩篇文書。一篇是15—17號簡，即五師宵倌司敗若指控邵行之大夫盤荅岑拘押其倌人的文書；一篇是132—134號簡，即秦競夫人之人舒慶指控苛冒、趙卯殺害其兄昀的文書。我們曾經談到：包山簡中的這兩篇文書“在程式、用語上基本一致，均為楚人訴狀的實物。其中訴主以‘僕’自稱，先通報身份，接着用‘敢告見日’引出訴訟對象和事由，最後以‘不敢不告於（一無“於”字）見日’結束”。<sup>⑤</sup>江陵磚瓦廠所出也正是這樣的訴狀。由於其格式與包山簡所見完全一致，更使我們相信這代表了當時楚人向“見日”提出訴狀的固定格式。

“見日”是楚人對當世楚王的尊稱<sup>⑥</sup>。分析包山司法簡的案例可見，對地方居民的訟案，楚王和作為中央官員的左尹均有較多涉及<sup>⑦</sup>。江陵磚瓦廠楚簡又提供了這方面的新例證。《左傳》莊公十年記曹劌問魯公何以與齊人作戰。魯莊公回答時說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評價說：“忠之屬也，可以一戰。”這反映出上古君主對訟獄的重視。楚王和楚國中央官員較多切入地方上的訟案，大概正是這一傳統的反映。

包山簡中包含較多的司法文書，是因為墓主左尹生前曾處理大量的司法事務。江陵磚瓦廠楚墓所出司法簡，數量少而內容單一，大概是墓主私人的文書。這座墓的墓主，有可能就是一再向楚王提出訴訟的李□。

## 注 釋

①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② 第9頁，“序言”。

③ 參看拙著《包山楚簡初探》，43—4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④ 唐作藩：《上古音手冊》，168、2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 李家浩：《江陵九店五十六號墓竹簡釋文》，《江陵九店東周墓》508頁，科學出版社1995年。

- ⑥ 葛英會：《包山楚簡釋詞三則》，載《于省吾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論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胡平生：《說包山楚簡的“諫”》，載《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
- ⑦ 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43頁、60頁，中華書局1983年。
- ⑧ 《包山楚簡初探》，137—138頁。
- ⑨ 同上29—30頁。
- ⑩ 同上146—148頁。

## 子彈庫楚帛書“推步規天”與古代宇宙觀

江林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的文字部分，李學勤先生的意見，稱中間八行的一篇為《四時》，十三行一篇為《天象》，環周十二段為《月忌》。其中《四時》篇有“推步規天”之說：

雷戲、女皇：“是壤天踐，是各參化法逃。”

禹、契：“以司堵襄，晷天步，乃上下騰傳。”

四神：“步以為歲，是惟四時。”

帝俊：“日月爰生”，“帝爰乃為日月之行。”

共工：“共攻夸步，十日四時”，“乃踐日月，以傳相□思。”

從文化史角度看，這些“推步規天”的傳說，實際上是我國原始宇宙觀的一種反映，隱含着豐富的內容。本文試圖就此畧作闡釋，以求教於方家。

### （一）

帛書說，雷戲、帝俊、共工諸神“推步規天。”這些神靈實際上都是宇宙創世神，與日月歲時等天文曆法有關。

雷戲、女皇

帛書開篇即說：“曰古黃熊雷戲。”這雷戲即伏羲，當為羲和之變。在神話傳說裏，最早出現的宇宙創世神便是太陽女神羲和。《山海經·大荒南經》：“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和者，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歸藏·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尚書·堯典》則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且，還將“羲和”



一分為四，分管東南西北四方和春夏秋冬四時，並與日月星辰的出沒運轉有關：

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申命羲叔，——平秩南訛，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分命和仲，——寅饒納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大約到了父系社會，女性的羲和變成了男性的伏羲。伏羲又寫作伏犧，宓戲；因為古無輕唇音，故詞又作電戲，電羲，炮犧等。但其為日月神則不變。輯本《帝王世紀》：“太昊帝電犧氏。”昊字从日从天，亦透露出電戲與太陽的關係。發現於重慶的漢石棺石闕中，有伏羲捧日之象，直接揭示了伏羲（電戲）的太陽神性質。

帛書電戲之妻為女皇。“皇”字得義，亦與日光有關。金文“皇”字上部作日光閃閃狀。張舜徽《鄭學叢著》據以指出：“皇，煌也，謂日出土上，光芒四射也。”秦漢以後，女皇與女媧合二為一。《路史·太昊紀》。“女皇氏炮媧”，又曰：“炮媧氏乃立，號曰女皇氏。”《三皇紀》引《春秋世譜》則曰：“華胥生男子為伏羲，女子為女媧。”《淮南子·覽冥訓》則記載了女媧補天的創世經過：“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燭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鰥民，鸞鳥攬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鰥民生。”高誘注：“女媧，陰帝，佐虞戲治者也。”帛書不稱“女媧”而曰“女皇”，當為較原始之說。

#### 帝俊

《山海經·大荒南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使四鳥。”可見，俊也是日月神。帛書說：“日月爰生”，“帝俊乃為日月之行。”與《山海經》相一致。而且，爰字本

有日月運行之義。《說文》：“爰，行爰爰也。”爰字又作“逡”，《方言》卷十二：“躔，逡，循也。……日運為躔，月運為逡。”

### 共工

帛書說：“共攻夸步，十日四時”，“乃踐日月，以傳相口思，有霄有朝，有晝有夕。”說明共工與日月四時有關。帛書第二段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之說。《呂氏春秋·孟夏記》：“孟夏之月，日在畢，……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高誘注：“丙丁，火日也。”《白虎通·五行》：“其帝炎帝者，太陽也。”而祝融之得名，據《史記·楚世家》可知，是因為他“能光融天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正義》引賈逵曰：“祝，甚也。融，明也。”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蓋祝融為火神，亦即日也。《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此以為較原始之開天辟地神話。謂開天辟地者，為太陽也。”而共工正是這太陽神祝融的兒子。《山海經·海內經》：“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後土，后土生噓鳴，噓鳴生歲十有二。”帛書說：“共工夸步”，而《山海經》有夸父逐日神話。《大荒北經》說：“夸父珥兩黃蛇，以追日景，至於崦嵫。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前引《海內經》說，后土是共工所生，而此說夸父是后土所生；因此，推究起來，夸父是共工的孫輩。《大荒西經》還說：“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噓，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長之行次。”《史記》索隱說，黎即是祝融。因此，我們可以將上述關係歸納如下：

祝融	→	共工	→	后土	{	信 — 夸父逐日
						噓 — 行日月星長之次
						噓鳴 — 生歲十有二

由此可見，所謂共工家族，實際是一個日月神家族。這個家族創造了天地空間和歲月時間。

## (二)

由上述討論可知，帛書“推步規天”是與靈戲、帝俊、共工諸神所施行的日月星辰運行等天文曆象緊密相關。《尚書·洪範》說：“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初民們認為，由於日月星長的運行，才有天地陰陽之分，才有春夏秋冬四時和東西南北四方。帛書《月忌》篇中“春”“夏”“秋”“冬”四字均

從日旁作“𠄎”“𠄎”“𠄎”“𠄎”，可以為証。由於缺乏地理科學常識，初民們總是把地球繞太陽運轉誤認為是太陽繞地球運轉。他們把日月星辰人格化，於是天體的運行被看作是天神巨人在推步行走，丈量天地。李學勤先生指出：“‘步’有度量之義，天文曆算上的度量也稱為‘步’，所以《尚書大傳》注云：‘步，推也。’推步一詞，沿用於我國的傳統天文曆象著作。”<sup>①</sup>

帛書“晷天步”，學者均謂當作“規天步”。《爾雅·釋天》：“晷，規也，如規畫地。”在漢代出土的伏羲女媧石刻畫像裏，伏羲持規捧日，女媧持矩捧月。這規矩原是由日月行走、丈量天地的神話思維而來。《周髀算經》：“環規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伏羲（電戲）與女媧（女皇）是日月神，而又有分工。伏羲負責丈量圓天，故持規；女媧負責丈量方地，故持矩。

帛書“為禹為契，以司堵裏，晷天步，□乃上下騰傳，山陵不殺”數句，說的是禹與契在電戲指令下推步規天。關於禹“推步”的傳說，還見於其它文獻典籍。《山海經·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還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淮南子·墜形訓》：“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五百七十五步。”禹為太陽龍圖騰，所謂禹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其實正是太陽東昇西落的擬人化說法。至於《淮南子》說禹命太章豎亥步東西南北四方，則與古人認識太陽循環而有四方四時的宇宙觀有關。

日月神推步規天、丈量天地，原是一個古老而普遍的神話母題。以前因材料不足，還不曾有人揭發其文化意蘊。帛書《四時》篇的公布，極大地開拓了我們的視野。除禹推步規天傳說還見於《山海經》、《淮南子》等文獻外，其它諸如伏羲、帝俊、四神、共工“推步”“夸步”傳說，不見於其它任何典籍。帛書材料之珍貴由此可見。

附帶提及，古代的“禹步”，還與巫醫治病、巫舞祈雨有關。帛書《五十二病方》：

魃：禹步三，取桃東枳（枝）

癩：取……羽……二□二，禹步三。

頽：操柏杵，禹步三。日……

楊雄《法言·重黎》云“巫步多禹”。《洞神八帝元變經·禹步致靈第四》：“禹步者，蓋是夏禹所為術，召役神靈之行步。此為萬術之根源，玄機之要旨。”據劉宗迪考證：“禹步為巫步，而巫源於舞。巫師之法術伎倆源於原始舞蹈之舉手投足。禹步亦不當例外，它實在不過是一種舞蹈步態。”其說可從。<sup>②</sup>在遠古時代，巫醫史不分，禹步原為神話傳說中之日月神“推步規天”之術，推而衍之，而有原始禹步之巫舞、原始禹步之巫醫治病驅鬼之術。帛書“禹步”是較原始的說法。

### (三)

在帛書《四時》篇裏，宇宙的創造過程正是通過電戲、帝俊等日月諸神的“推步規天”而完成的。現試作簡釋。

帛書寫電戲女皇推步創造宇宙前有“夢夢墨墨、亡章弼弼”之說。這是因為古人認為在天地開闢之前，宇宙原是混沌一片的。《淮南子·精神訓》曰：“芒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芒漠漠，頌蒙頌洞，莫知其門。”《楚辭·天問》也說：“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莊子·應帝王》裏也有一則大致相同的寓言：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袁珂先生對這一寓言有很好解釋：“倏與忽，譬喻的是一瞬間的時間，當宇宙還是渾沌一團的時候，就連一瞬間的時間觀念也不會產生；直要到渾沌開闢，才有時間觀念的產生。這雖然是寓言，其實也是古老的開天辟地神話在寓言形式下的再現。”<sup>③</sup>這渾沌神，正是帛書“夢夢墨墨”《天問》“冥昭瞢闇”《淮南子》“窈窈冥冥”的擬人化說法。

太陽東昇西落，於是有天地陰陽的變化和四方與四時的區分。前引《山海經》郭璞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帛書電戲、帝俊、禹、契、共工都是太陽神，他們在空中“裏天踐”，“晷天步”，“上下騰傳”，“夸步”，於是有了“熏氣”和“魄氣”，有了“歲”和“四時”，“有



霄有朝，有晝有夕”。饒宗頤先生認為，帛書裏的熏氣為陽氣，魄氣為陰氣。<sup>④</sup>《淮南子·天文訓》“天地之襲精為陰陽。”《精神訓》則曰：“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於是乃別為陰陽。”帛書之“熏氣”“魄氣”正是天地陰陽二氣。

帛書說，“以涉山陵，瀧汧幽漫，朱又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為歲，是惟四時。”我師李學勤先生指出：瀧汧幽漫，指大海浩漫之義；朱當讀為殊，有分別之義。<sup>⑤</sup>至為正確。神話傳說中，日月的出沒常與山陵大海有關。《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言，日月所出。”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合虛，日月所出。”又曰：“湯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帛書“以涉山陵，瀧汧幽漫，殊有日月”正與此合。因為日月從大海山陵處彼此昇降推步，於是有了時間變化，所謂“步以為歲，時惟四時”。

古人觀測，我國的地形特點是西北高而東南低，天上的日月星辰則是由東往西運行。《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列子·湯問》所載與此大致相同。《楚辭·天問》也說：“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帛書則言“九州不平，山陵各側”，於是“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 ]思教，奠四極”。前引《史記》索隱已指出，傳說中的祝融即重黎即是分開天地的宇宙創始神。帛書說炎帝命祝融以四神降，結果是“奠三天”“奠四極”，重新建立了宇宙。最後祝融回報炎帝說：“非九天則大猷，則毋敢蔑天靈。”高明先生認為，這裏的“非當假為排，列也。如《楚辭·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sup>⑥</sup>猷字，饒宗頤先生讀為恤，義為靜。<sup>⑦</sup>天靈即天命。則全句是說：已安置了九天，使之安然無恙，這是因為絲毫不敢違背天帝之命。宇宙既已恢復了正常，於是“帝爰乃為日月之行”，日月星辰又在空中推步運行了。

眾所周知，由創造到毀滅到再創造的循環是世界性創世神話裏的普遍模式。帛書《四時》篇裏的創世神話亦大致如此。其第一章言霄戲、女皇鑿開渾沌，並命禹和契諸神晷天步、推日月，於是有了熏氣（陽氣）與魄氣（陰氣）



反四時，是為宇宙之創始。第二章言“九州不平，山陵備側”，如同《淮南子》所謂“天柱折，地維絕”，是為宇宙之毀滅。於是炎帝又命祝融降神“奠三天”“奠四極”，結果是帝爰又重為“日月之行”；第三章繼寫共工夸步，從而有了“十日四時”，“有霄有朝、有晝有夕”，是為宇宙之再創造。在此期間，諸神推步日月星長是創造宇宙的主要途徑；這說明古人認識時間和空間是觀測天象的運行而來。推步規天原是我國古代宇宙論中的主要內容，這一點在其它書面文獻裏已零碎不全，而在帛書《四時》篇裏則保存完整，頗值珍愛。

## 注 釋

- ① ⑤ 李學勤《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版。
- ② 劉宗迪《角步·商羊舞·焚巫尪》，《民族藝術》1997.4。
- ③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巴蜀書社1991年版。
- ④ ⑦ 饒宗頤《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
- ⑥ 高明《中國古文字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 簡帛叢札二則

王志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信陽長臺關竹簡中的“剛恃”

信陽長臺關竹簡有如下文字：

曰：狄！夫蔑人剛恃，天送于刑咎（者），有主（尚）擊（賢）

學者們早已指出簡文與《太平御覽》卷八〇二所引《墨子》佚文“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及《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蓍臻’”內容相似。但簡文中“剛恃”一語費解。李學勤先生曾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一書中把“剛恃”讀為“剛志”，認為“簡文‘剛志’就是‘強氣’，兩者是相合的”①。

最初我們以為“剛志”不見於文獻，所以想讀為“彊志”。“彊志”一詞見《國語·晉語七》“祁奚曰：‘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韋昭注：“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細審《國語》文義，這裏的“彊志”實與博閭彊志之“彊志”並不相干，而應是剛毅果敢、志氣剛強之意。《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傳》：“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此“彊志”同樣也祇能作如是解，而不可解為博閭彊志之“彊志”。《論語·公冶長》“吾未見剛者。”劉寶楠《論語正義》云：“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皋陶謨》‘剛而塞，彊而毅’，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引者按：見《孟子·滕文公下》），所以能無欲也。”按：劉寶楠誤讀鄭《注》，將“彊志”一詞誤分為二，但其引《孟子》語證“彊志、不屈撓”則甚是。這也即《禮記·儒行篇》所說的“儒有

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數也。其強毅有如此者。”“彊志”“彊毅”是同義語。與此相對的則是“降志”。《論語·微子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彊志”雖然見於文獻，但多是用於描述君子的褒詞，而“強氣”從語氣上看，則顯然是一個貶義詞，所以我們雖釋為“彊志”，但仍然心有未安。還有一度曾想把“剛恃”釋為《禮記·樂記》之“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及《孟子·公孫丑上》之“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之“剛氣”。後來也由於上面所說的同樣理由，而終於放棄了。

最近我們閱讀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發現其中的《五名五恭》篇有如下文字：“兵有五名：一曰威強，二曰軒驕，三曰剛至，四曰助忌，五曰重榮。……剛至之兵，則誘而取之。”<sup>②</sup>，纔恍然悟到“剛恃”應該讀為“剛至”。“恃”為禪母之部字，“至”為章母質部字，聲母均屬照系三等字，韻母雖然稍隔，但“至”字及從“至”得聲之字與之部字頗多通假之例。如《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其行為至亂也。”注：“至意當為志意。”又《詩·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漢書·昌邑王傳》引“止”作“至”。《荀子·禮論》：“而社止於諸侯。”《史記·禮書》“止”作“至”。又如：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一曰治氣”，下文云“一曰致氣”。《史記·李斯列傳》：“趙高案治李斯”，《漢書·何武傳》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之“案治”，《漢書·尹翁歸傳》“案致其罪”，《魏相傳》“收捕案致其罪”，《後漢書·蓋勳傳》“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作“案致”，顯為一詞之異寫。可見“至”字及從“至”得聲之字與之部字有較密切的關係。我們懷疑長臺關簡文中的“剛恃”，即銀雀山簡《五名五恭》中的“剛至”。因為簡文中的“剛至”顯然是一個貶義詞，放到長臺關簡文的語境中看也顯得比較通順。

銀雀山漢簡《五名五恭》篇之“剛至”，整理小組舊注為：“‘至’疑借為怪。剛怪，剛愎自用。”所注甚是。《廣雅·釋詁三》：“怪，愎，很也。”又《玉篇·心部》：“怪，徒結切，惡性也。”顯然“怪”、“愎”同義，“剛怪”即“剛愎”。《左傳》宣公十二年“剛愎不仁”，杜預注：“愎，很也。”<sup>③</sup>是“剛怪”、“剛愎”均為“剛狠”之意。

總之，長臺關簡文中的“剛恃”恐當讀為銀雀山漢簡《五名五恭》中的“剛至”，也即“剛怪”，義同“剛愎”，均為“剛狠”之意。以此訓詁，文從字順。

### 馬王堆房中書中的“寺羸”與“定頃”

馬王堆出土竹簡《天下治道談》有如下的文字：

“氣有八益，有（又）有七損（損）”。

“八益：一曰治氣，二曰致沫，三曰智（知）時，四曰蓄氣，五曰和沫，六曰竊氣，七曰寺羸，八曰定頃。”

又：“一曰致氣，二曰定味，三曰治節，四曰勞（勞）實，五曰必時，六曰通才，七曰微謹（動），八曰侍盈，九曰齊生，十曰急刑（形），此謂十脩。”

帛書中一曰“寺羸”、“定頃”，一曰“侍盈”，“寺盈”顯即“侍盈”。“羸”、“盈”均為影母耕部字，可得通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以羸諸侯”。《正義》：“羸，賈、服、王肅皆讀為盈。”“侍”從“寺”得聲，更可通假無疑。《詩·秦風·車鄰》：“寺人之令。”《釋文》：“寺本亦作侍。”此例甚多，可參看《古字通假會典》405頁。但“寺羸”、“定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帛書本來有一段說明：“幾已，內背，毋謹（動），翕氣，印（抑）下之，靜身須之，曰侍羸；已而洒之，怒而舍之，曰定頃。”

整理小組大約因為簡文“靜身須之”之語，故把“侍羸”讀為“待羸”，下文的“侍盈”也讀為“待盈”。讀“定頃”為“定傾”，則甚是。但於此二語均無注。

我們認為此當與《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相對照。韋昭注：“持，守也。盈，滿也。定，安也。傾，危也。節，制也。”則“持盈”、“定傾”甚明，《越絕書·吳內傳》亦有“天貴持盈”、“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等語。顯然簡文的“寺羸”、“侍羸”、“侍盈”均當讀為“持盈”。“持”、“侍”均從“寺”得聲，可以通假。《戰國策·燕策一》：“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史記·燕召公世家》“持”作“侍”，《索隱》引《戰國策》亦作“侍”，是其證，“持盈”為先秦常語。《老子》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荀子·宥坐》：“子路曰：‘敢問’

持滿有道乎？”《淮南子·道應訓》文畧同，惟作“持盈”。漢代避惠帝劉盈諱，常改盈為滿，此例甚多，茲不贅。《說苑·敬慎篇》：“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隸釋》卷十一《巴郡太守樊敏碑》：“持滿億盈。”並其證。“定傾”，由於整理者已經釋讀，我們這裏就不多饒舌了。“定傾”亦見《鹽鐵論·備胡》：“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抱朴子·貴賢》：“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千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外。”這些“定傾”都與《國語》韋昭注用法相同，都是“扶危”之意。簡文的“定傾”與上述意義並不相同，細審文義，實為“決於傾刻”之意。

## 注 釋

- ①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339頁。文物出版社，1991。
- ②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孫臏兵法》，103頁。文物出版社，1975。此篇不當收《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的《編輯說明》第八頁云此篇等將收入第二輯“佚書叢殘”中（文物出版社，1985年）。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之《銀雀山漢簡校注本分類目錄》收入《論政論兵之類》第一六（文物出版社，1985，第241頁）。所引簡文亦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0115+0084簡，可參看。
- ③ “剛愎”古籍中也作“剛復”。《孔叢子·叙世》：“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者也。”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章云：“其為人也剛履，疵在頰。”“剛履”顯即“剛愎”。《韓非子·十過》：“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是剛、愎可分用。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五“蘇秦謂燕王章”之“自復之術，非進取之道也。”《戰國策·燕策一》蘇秦章作“覆”，蘇代章作“自完”。下文云：“王曰：‘自復不足乎？’對曰：自復而足，……。”云云，《燕策》蘇代章作“自憂”，依文意，均當釋為“自愎”，“復”、“愎”通用之例頗多。除上舉外，其他如《戰國策·趙策》：“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驚復。”《韓



非子·十過》亦作“驚悞”，是其證。“驚”即“怪”。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三上《釋詁》云：“驚亦怪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驚’，顏師古注云：‘驚，很也。’《管子·五輔篇》云：‘下愈覆驚而不聽從。’《趙策》云：‘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史記·酷吏傳贊》云：‘馮翊殷周蝮驚。’覆、復、蝮皆悞之借字耳。”所言極是，可從。

## 從簡帛文獻看古代生態意識

陳偉武（中山大學中文系）

生態學為窮究生物與其生存環境相互關係之學，古代雖無所謂生態學，而先民早有生態意識，知道如何保護自然環境及合理開發自然資源。十年前，已有學者對中國古代生態意識學說作過初步探索，李耕夫先生指出：“在《周禮》、《國語》、《易經》、《中庸》、《孟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以及公元六世紀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和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等著作中，都有關於生態意識方面的記述。”<sup>①</sup>其所依據材料均是傳世典籍。而出土簡帛文獻與日俱增，其中亦有涉及生態意識學說者，適可與傳世文獻相印證，頗為珍貴，故稍事比次，並作疏釋。

### （一）

有關生態意識學說的簡帛材料大致有如下這些：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丙篇（邊文）是有關一年十二個月物候及宜忌占斷的記述，如有關孟陬之月的一段：“曰取（陬），乙（飢）則至，不可以一殺。”<sup>②</sup>“乙（飢）”指燕子，是春天的物候，春天為萬物生長的季節，故《周禮》、《禮記》、《呂氏春秋》均有禁止殺戮的相關條文。楚帛書帶有濃鬱的數術色彩，而有學者則指出丙篇十二段邊文專論十二月之宜忌，是中國古代月令的雛形。<sup>③</sup>

九店楚簡第25號：“〔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是胃（謂）結日，——以獵田，邑□。”<sup>④</sup>第31號：“〔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是謂外陽日，利以行作四方野外，吉；以田獵，獲。”第39、40號下部：“凡五亥，不可以畜六牲腹，帝之所以戮六牲之月。”原整理者將“牲腹”讀斷，劉樂賢先生指出：“而《集韻·尤韻》說腹字或從頁，則腹字讀音亦當與柔近。總之，腹與擾在古時讀音相近，可以通假，六腹可讀

為六擾——古代六牲和六擾所指實同。故簡文的‘六牲腹’是指馬、牛、羊、豕、犬、鷄等六畜，牲腹不可讀斷。”⑤所論近是。《說文》：“擾，煩也。”又：“擾，牛柔謹也。”錢玄和錢興奇兩先生認為：“馴擾之擾，本字為‘擾’，經傳常借用‘擾’。擾又指馴順之家畜，如‘六擾’。”⑥今按，傳世文獻作“六擾”，楚簡“六牲腹”，當以“腹”為本字，《玉篇·肉部》：“腹，腹輒也。”柔軟與馴順義相涵。腹、柔、擾其實是同一語源分化出來的。劉氏還指出：“本簡格式與38、39簡下部‘凡五卯，不可以作大事，帝以命塏（益）淒塏（禹）之火’相類，亦與睡虎地甲種日書‘忌殺篇’‘春三月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等相類。”第46號簡：“西方高，三方下，其中不壽，宜人民、六腹。”以此簡與39、40號下部簡文合觀，六畜之宜忌關乎人之宜忌，故為方術占驗所注意。而簡文稱“帝以命塏（益）淒塏（禹）之火”，語意雖不甚明，但亦有相關材料可資比照。《書·堯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史記·五帝本紀》：“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于是以益為朕虞。”集解引馬融《書》注：“虞，掌山澤之官名。”頗疑九店楚簡所用當即《尚書》中舜帝任命益為虞官的典故。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第13簡：“建日，良日矣。可為耆夫，可以視詞，可以畜六牲。不可入黔首。”⑦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除篇》：“（外）陽日，利以建野外，可以田獵。”⑧《秦除篇》：“閉日，可以劈決池，入臣徒、馬牛、它牲。”又：“秀，……利見人及畜畜生。”又：“危陽，……不可取婦、嫁女、出入貨及牲。”《星篇》：“昂，獵、賈市，吉。不可食六畜。”又：“畢，以獵置網及為門，吉。……不可食六畜。”《音篇》：“殺日，勿以殺六畜。”在不同的日子，無論是飼養、屠宰、食用家養牲畜，還是捕獵野生動物，都是有所宜，有所不宜。《忌殺篇》：“春三月甲乙日，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秋三月庚辛，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此皆不可殺，小殺小殃，大殺大殃。”在春夏秋冬特定的日子，忌殺的對象恐怕不止是動物植物，而且包括人在內。

睡虎地秦簡《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墾墾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麋卵，毋□□□□□□毒魚鱉，置阱網，到七月而

縱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槨者，是不用時。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虞時毋敢將犬以之田。”整理小組注：“縱，開禁。《逸周書·大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與簡文到七月而縱之相合。”此注是。

而整理小組注“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云：“夜，疑讀為擇。夜草為灰，意為取草燒灰，作為肥料。《禮記·月令》：仲夏月‘毋燒灰’。”筆者嘗在一小文指出此注之誤，並從訓詁學的角度論證“夜”可讀作“畚”（義為“燒榛種田”），<sup>⑨</sup>今畧作申述補充。《居延新簡》EPT5：100：“□山林，燔草為灰，縣鄉所□□□□”<sup>⑩</sup>“燔草為灰”，與秦簡的“夜（畚）草為灰”語意正同。據秦簡，知夏耕方可實行火耕，《田律》稱“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是說除了夏季之月，不敢畚草為灰，語意恰與《月令》相反。其實，《月令》所謂仲夏之月“毋燒灰，毋暴布”，孫希旦《禮記集解》卷十六云：“灰，謂所用以凍布者也。……是月陽氣大盛，不可燒灰凍布，暴之日中，恐脆傷其布也。”此與燒草為灰以肥田自是不同。細覈《月令》原文，知秦簡之“夏月”實指季夏之月，《月令》云：“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鄭玄注：“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

銀雀山漢簡《晏子春秋》七：“景公問晏子曰：‘寡人志氣甚痿，身體甚病。今吾欲具圭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上下，意者體可干福乎？’晏子□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故節宮室，毋敢大斬伐，毋以逼山林。節飲食，毋敢多畋漁，以毋逼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入祿。今君之政反乎民，行悖乎神。大宮室而多斬伐……□是以神民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至而祝宗祈福。意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止海食之獻，斬伐者〔□□□□〕者有數，居處飲食，節□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整理小組注：“此章在傳本中為《內篇問上》第十章。”<sup>⑪</sup>晏子以齊國先君之政與齊景公之政作對比，制止了景公反乎民、悖乎神的行為，從而起到保護生態環境、安民敬神的作用。傳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八章內容與此相近：“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

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

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竹簡《儒家者言》第十七章：“張網者四面張如祝之□□□者四方來者皆麗予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者下請受其犯命者□〔奇之□〕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故吾卅餘國來服”<sup>⑫</sup>。這個故事旨在美化上古聖王的德政，亦見於《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有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又見《藝文類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紀》，文字畧有出入。

《居延新簡》E P F 22: 46—48：“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時禁者。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移使者□所詔書曰：毋得屠殺馬牛，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屠殺馬牛者。敢□□。掾譚。”“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候事敢言之。詔書曰：吏民毋得伐樹木，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伐樹木者。敢言之。掾譚。”

今按，“四時”即四季，所謂“四時禁”有其來自，《呂氏春秋·上農》：“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戮，繯網罟罾不敢出於門，罟罾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譚戒甫先生釋“澤人不敢灰戮”云：“蓋上句言山不敢伐材下木，此句言人不敢殺草燒灰。”<sup>⑬</sup>“四時禁”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散見於十二月令之中。

## （二）

陰法魯和許樹安兩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指出：“禮法規定，田獵不捕幼獸，不采鳥卵，不殺有孕之獸，不傷未長成的小獸，不破壞鳥巢。另外，圍獵捕殺要圍而不合，留有餘地，不能一網打盡，斬草除根。這些禮法對於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維持自然界生態平衡是有積極意義的，祇是不可能嚴格實行。”<sup>⑭</sup>古代有關生態保護的禮法是否真正嚴格實行，當然尚可論證，但是，這些禮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嚴肅性卻是不容置疑的。儒家經典對古代管理山、林、川、澤之官有許多記載，如有所謂“四監”，《禮記·月令》季冬之月：“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鄭玄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再如《周禮·地官·山虞》：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鄭注：“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又《地官·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又《地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又《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建置這類職官的主要目的在於“平其守”，又以“衡”為名，既“平”且“衡”，可知古人對生態保護之關切。在《周禮》中，虞衡之類官吏歸屬大司徒統管。大司徒的一部分重要職責，就是“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秦以嚴刑峻法治國，既然將生態保護的內容寫進田律條文，各級官吏自然會認真地貫徹執行，平民百姓也斷斷不敢視同兒戲。雲夢龍崗秦簡中有關禁苑及馬牛羊的律文，亦甚苛繁<sup>⑤</sup>，禁苑固然是統治者的游樂場，但也是野生動物的自然保護區，假如認為這批秦簡與古代生態意識學說有關，那也未嘗不可。再從居延漢簡看來，“四時禁”是由皇帝下達的詔令，邊境官員有責任督促軍民共同遵守，並須定期向上級報告有關四時禁的依違情況。

囿於見聞，筆者羅致有關古代生態意識的簡帛材料並不多，而其中所蘊涵的內容已頗為豐富。人僅僅是自然生物鏈中的一環，人類的活動必須與身處其中的生態環境和諧相應，大自然的運行變化，也時時關乎人世間的休咎禍福。這是中國古代人民生態意識學說的出發點。令人驚奇的是，儘管先秦各種思想流派的政治背景和哲學主張往往大相逕庭，然而，生態保護的樸素思想卻是儒、墨、法、道、陰陽家等主要思想流派難得的共同點之一。古代生態意識學說的表現形式最值得注意的是，生態意識學說有表現為數術占驗的形式，有表現為禮制的形式，有時又表現為法令的形式。可知維護生態平衡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並滲透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去了。這些不同表現形式之間有無先後發展的順序呢？我們以為，數術形式也許產生的時代層次會更早些，可能根植於遠古的自然崇拜，其中包括植物崇拜和動物崇拜。禮制形式產生的時代次之，法令的形式又次之。古代生態意識學說，是我國古代人民長期生產鬥爭實踐的經驗結晶。先民最初重視生態保護，當是祈求生活資源的

持續保障，而後則期望生產資料的不斷供給。在萬物有靈的宗教氣氛瀰漫的時代，人類對身邊的一草一木、一鷄一犬都懷有難以割舍的情愫，生態意識與原始宗教思想也就揉合在一起。後來，生態意識隨着人類文明的足跡而進化為禮制、法律等表現形式，甚至與仁義道德等抽象的哲學觀念相附會。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虐待大自然者，必將付出慘重代價。當代生態環境日漸惡化，人類文明要持續穩定高速地發展，前景堪虞。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重溫古代生態意識學說，祖先留下的精神財富彌足珍視。

## 注 釋

- ① 李耕夫：《中國古代的生態意識學說》，《學習與探索》1987年4期。
- ② 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本文援引簡帛文獻，釋文均用寬式。
- ③ 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1984年2期；曹錦炎：《楚帛書〈月令〉篇考釋》，《江漢考古》1985年1期。
- ④ 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年。五十六號墓竹簡由李家浩先生釋文。
- ⑤ 劉樂賢：《九店楚簡日書研究》，《華學》第二輯，第6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
- ⑥ 《三禮辭典》第1197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⑦ 釋文為放馬灘秦簡整理小組所作，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 ⑧ 釋文據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篇名從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
- ⑨ 陳偉武：《睡虎地秦簡核詁》，待刊。

- ⑩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⑪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⑫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第559—564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⑬ 轉引自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第1724頁，學林出版社，1984年。
- ⑭ 《中國古代文化史》第2冊，第6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⑮ 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1997年。

## 從雲夢秦簡看秦社會有關捕盜概況

賀潤坤（陝西省廣播電視大學文經部）

秦自建國到統一全國，由於環境的逼迫和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一直處於同戎翟等少數民族及關東諸國的戰爭之中。戰爭帶給秦國統治者的是秦國由弱到強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但帶給廣大秦國勞動者的祇能是由於社會劇烈動蕩而導致的生命的犧牲和財產的損失。無數秦國勞動者作為秦軍的一員，在殘酷的戰爭中獻出了生命，其妻兒父母難免流離凍餓的厄運。天災人禍給廣大勞動者帶來了無盡災難，為了生存，不少人淪為盜賊。這些為盜者除少數窮凶極惡者外，大多數是被生活所迫的普通農民。在秦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和嚴酷的法律面前，這些為盜者並未形成如秦朝末年陳勝、吳廣等領導的農民起義（或奴隸起義），矛頭對準秦國統治階級，而多是分散的個體活動，所盜目標除地主階級成員外，還有普通的勞動者。其所盜數目雖不大，但已給被盜者造成一定的財產損失和精神負擔，擾亂了社會治安，造成了困擾秦國統治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捕盜一直是秦地方官吏的主要職責之一。在秦民間，對為盜者的厭惡情緒及捕獲行動，無疑是當時縣以下基層行政組織及廣大村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在這裏，我們應將被歷代統治者誣為“盜”、“賊”的農民反抗官府嚴酷統治的行為與真正以偷盜民間普通人家為業的盜竊者區別開來。自階級社會產生以來，這種純粹意義上的盜竊現象在歷代社會祇有程度的不同，但並未絕迹。毋庸諱言，盜竊現象無疑是社會的消極現象之一，它危害社會成員生命財產的安全，擾亂社會治安，為任何統治集團所不容。通過雲夢秦簡所載秦人捕盜方面的資料，對於考察秦官府及民間的捕盜情況，對於瞭解秦時社會民俗及秦律有關捕盜方面的內容很有必要，對於今天社會上的反盜竊鬥爭亦有借鑒作用。

關於捕盜方面的法律條文，最早見於史載的是李悝《法經》的“盜”、



“賊”兩篇，但具體內容不詳。據《晉書·刑法志》與《唐六典》注，商鞅變法制定的秦律條文中有“捕法”，其中無疑有捕盜方面的內容。雲夢秦簡的秦律簡文中有部分捕盜內容，集中在《法律答問》之中。很顯然，這是秦律中有關處理民間盜竊案的律文摘抄及與實際案例的對照，遠非秦律中捕盜律文的全部，但從中亦可窺秦捕審盜案實際之一斑。秦民間捕盜的狀況，不見於官方的記載，但在反映秦民間中下層選時擇日的《日書》中，載有當時人捕盜活動的較多資料。《日書》甲、乙種的各篇中不乏防盜與生子為盜等的記載，而在甲種《盜者》篇和乙種《盜》篇中，集中記載了民間關於捕盜的內容。

### 一、秦捕盜律的部分內容及案例分析

雲夢秦簡《秦律雜抄》載（有關雲夢秦簡的各篇引文皆出自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捕盜律曰：捕人相移以受爵者，耐。求盜勿令送逆為它，令送逆為它事者，貲二甲。”即不許將所捕之人轉交他人，以贖取爵位，否則處以耐刑。不許命令亭中專司捕盜的“求盜”去做送迎或其他事務，犯令者要罰二甲。“捕盜律”是秦律的主要內容，從這段律文可知，法律規定基層行政組織亭中有專司捕盜的官吏，而且這類官吏要專司其職，不準兼搞其他事務。

《法律答問》所載秦律關於捕盜的律文與案例對照較多，反映執法者根據以往判處的成例審理案件，在當時已成為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既反映出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重視律文與實際案例相互參照的務實態度，也反映了秦律律文內容與審案程序的相對成熟性。亦存在判案主要依據案例而與律文原意有較大差距者，這反映了執法者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在執法中也有一定的偏向。

依據盜竊者的身份定罪，是秦人審判盜竊案的特點之一。在當時的盜竊者，有執法的官吏，如“求盜”、“害盜”（或憲盜）；有的有爵位，如上造、普通入犯盜竊罪者有工匠、士伍等；還有罪犯行竊者，如司寇；有奴婢行竊者，如人臣、人妾等。在具體案例中，有直接依據盜竊者所盜物品定罪者，亦有據告發而捕審案犯者，情況比較複雜。

執法官吏犯盜竊罪者如：“求盜盜，當刑為城旦，問罪當駕（加）如害盜



不當？當。”即求盜盜竊，不管其所盜程度如何，都要判為城旦並附加肉刑，而且還要如害盜犯盜竊罪那樣加罪，可見對同為執法吏的害盜犯盜竊罪已有處置條文證明秦律對捕盜官吏知法犯法是從嚴懲處的。

罪犯盜竊的案例如下：“司寇盜百一十錢，先自告，可（何）論？當耐為隸臣，或曰貲二甲。”司寇所盜錢數並不大，自首後仍要受到耐為奴婢或罰二甲的處罰，顯然與其身份有關。

對私家奴婢犯盜竊罪的處罰，如“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買（賣），把錢僭邦亡，出徼，得，論各可（何）毆（也）？當城旦黥之，各界主。”對於盜竊主人牛而相攜想逃出秦國境的奴婢，被捕後的處罰是按城旦施黥刑，然後還要將其交給主人，主人對其懲罰尚不計在內。奴婢欲逃亡出秦國境，顯然與反抗主人壓迫、試圖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有關，盜主人牛不過是作為逃亡生活之資。但秦律對之處罰顯得格外重，顯然與其逃亡出境及奴婢身份有關。

在當時的盜竊案中，盜竊者除盜錢外，所盜者還有牛、羊、豬等六畜，其中以牛羊為多。六畜之外，還有衣服、桑葉及祭品等。這間接地反映了當時六畜飼養業的興旺及蠶桑業的發達。在對普通人進行盜竊的處罰之中，所盜物品不足一錢者皆要處罰，即輕罪重罰，這是秦律的主要特點之一。如“或盜采人桑葉，臧（贓）不盈一錢，可（何）論？貲繇（徭）三旬”。偷採他人不足一錢的桑葉，要罰徭三十天。又如“甲盜，臧（贓）直（值）千錢，乙智（知）其盜，受分臧（贓）不盈一錢，問乙可（何）論？同論。”乙顯然係知情不報、分贓致罪，但分贓款不足一錢而與盜千錢者同罪，亦失之過重。“工盜以出，臧（贓）不盈一錢，其曹人當治（笞）不當？不當治（笞）。 ”即工匠偷出不滿一錢之物，其同班工匠是否應該受笞也提到了法律實施的議事日程，可見連坐制在官府手工業中也行之於工匠。盜不滿一錢的工匠無疑要受到嚴厲處罰。

秦律對盜竊者的親屬是否參與或知情盜案的處置也有嚴格的區別，量刑標準視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例如：“夫盜千錢，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論妻？妻智（知）夫盜而匿之，當以三百論為盜；不智（知），為收。”這裏之“收”指收藏。“夫盜三百錢，告妻，妻與共飲食之，可（何）以論妻？非前謀毆（也），當為收；其前謀，同罪。夫盜二百錢，妻所匿百一十，可（何）以論妻？妻智（知）夫盜，以百一十為盜；弗智（知），為守臧（贓）”。

守即看守，以守贓論處，可能比收贓處理更重。“削（宵）盜，臧（贓）直（值）百十一，其妻、子智（知），與食肉，當同罪。”宵，《說文》：“夜也。”宵盜為夜間行盜。“削（宵）盜，臧（贓）直（值）百五十，告甲，甲與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與甲同罪。”另有一家五口或十口皆參與盜竊，都被判為城旦之刑。由上述案例可知，對盜竊者親屬的處罰，知情與否是量刑的基礎，對於知情而為盜竊者、窩贓者，要以盜竊罪論處，對於知情不報而參與分贓者，即使是沾一頓飯的便宜，也要重處。而對於不知情者則免於處罰，這也體現了秦律的法制原則。對於同謀或合伙進行盜竊的家屬成員，秦律是要對之嚴厲懲罰的。

對於告發盜竊者之人，如所告屬實，可得到官府的獎賞，如所告與盜竊者所盜錢物有出入，那麼告發者要承擔控告不實的責任。如純屬誣告，或告發者本人犯案又誣告他人，那麼對此類誣告者的處罰也是嚴厲的。如“告人盜百十一，問盜百，告者可（何）論？當貲二甲。盜百，即端盜駕（加）十錢，問告者可（何）論？當貲一盾。貲一盾應律，雖然廷行事以不審論，貲二甲。”“應律”即符合法律，秦律規定對此案應罰一盾，但法庭成例卻要罰二甲，顯然是偏重。但此類案例的處置也有例外，如“告人盜千錢，問盜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論？毋論”，即對所告不實者有時候也較寬容。“誣人盜千錢，問盜六百七十，誣者可（何）論？毋論。”這大概是被告者確屬盜竊者故對誣告者從輕發落。但從對此類案件的處理中也可看出秦法吏在執法中的不平衡性。

又如：“甲告乙盜直（值）□□，問乙盜卅，甲誣駕（加）乙五十，其卅不審，問甲當論不當？廷行事貲二甲。”“甲告乙盜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盜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端為，為誣人；不端，為告不審。”在上述兩個案例中，“貲二甲”應是對控告不實者的罰款數。但對故意誣告他人者，這裏雖無量刑記錄，但其性質與控告不實顯然有很大區別，在量刑上無疑要從重。

在處理告發盜竊者的案例中還有：“甲盜羊，乙智（知），即端告曰甲盜牛，問乙為誣人，且為告不審？當為告盜駕（加）臧（贓）。”“告盜加贓”即控告盜竊罪而增加贓數，和“誣人”、“告不審”等一樣應受懲處，但處分不同。又如“甲盜羊，乙智（知）盜羊，而不智（知）其羊數，即告吏曰盜三羊，

問乙可(何)論？為告盜駕(加)臧(贓)。”“甲告乙盜牛，今乙盜羊，不盜牛，問可(何)論？為告不審。”“誣人盜直(值)廿，未斷，有(又)有它盜，直(值)百，乃後覺，當并臧(贓)以論，且行真罪，有(又)以誣人論，當貲二甲一盾。”對這種誣人且自己又犯盜竊罪者，經濟處罰是較重的。同類案例又有“上造甲盜一羊，獄未斷，誣人曰盜一猪，論可(何)毆(也)，當完城旦。”“上造”是秦二十級爵中的二等爵，秦律對有低爵者犯有盜竊和誣告罪者並不庇護，反之從重處刑，這顯然含有對統治階級成員的警戒作用。

對於盜竊王室祭祀供品者，秦律規定對之要從嚴懲處。如“‘公祠未闌，盜其具，當貲以下耐為隸臣。’今或益盜一腎，益(盜)一腎臧(贓)不盈一錢，可(何)論？祠固用心腎及它支(肢)物，皆各為一具，一(具)之臧(贓)不盈一錢，盜之當耐。或直(值)廿錢，而被盜之，不盡一具，及盜不直(置)者，以律論。”這是對盜竊王室正在祭祀時供品者嚴懲，很大程度上有維護統治權威與其祭祀的神聖性的政治因素在內。盜取不值一錢之腎要被耐為奴婢，這是社會身份的改變，實則較處一般刑罰要重得多。而當時王室祭祀供品奢侈，飢寒交迫者為生計所迫，鋌而走險盜供品者絕非寥寥，故有該律文的出現。對於王室祭祀中已掩埋的祭品，也有盜取者，如“可(何)謂‘盜塚產’？王室祠，狸(薶)其具，是謂‘厓’”“薶”，《說文》：“瘞也。”即“埋”字。《爾雅·釋天》：“祭地曰瘞埋。”秦律文有此罪名，可見這類案件也是經常發生的。

在秦审理盜竊案的案例中，對所盜物品的追查相當具體、瑣碎，如：“士五(伍)甲盜一羊，羊頸有索，索直(值)一錢，問可(何)論？甲意所盜羊毆(也)，而索系羊，甲即牽羊去，議不為過羊。”秦律規定“挾籥(鑰)贖耐。”何為“挾籥”，挾義為撓，籥同鑰，指門鍵，“挾籥”即盜竊者撓入門鍵。“挾籥(鑰)者已挾啓之乃為挾，且未啓亦為挾？挾之弗能啓即去，一日而得，論皆可(何)毆(也)？挾之且欲有盜，弗能啓即去，若未啓而得，當贖黥。挾之非欲盜毆(也)，已啓乃為挾，未啓當貲二甲。”撓門入室盜竊，秦律規定要對之嚴懲，但對撓門者的動機是盜竊或是其他原因卻有嚴格的區別，並據之定罪與否，應該說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對於审理盜竊案之執法官吏，秦律亦有約束。法吏如對案情審理不



清，用刑不當，或因有所偏向而致處刑不公正，皆要受到懲罰，承擔一定罪責，如“士五（伍）甲盜，以得時直（值）臧（贓），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獄鞠乃直（值）臧（贓），臧（贓）直（值）百一十，以論耐，問甲及吏可（何）論？甲當黥為城旦，吏為失刑罪，或端為不直。”法吏對甲盜所盜估值過高，而判其為隸臣，經核實盜值後，甲被改判黥為城旦，法吏應以用刑不當論罪。倘法吏屬明知故犯，即應以不公從嚴論罪。另有一案例與此相類：“士五（伍）甲盜，以得時直（值）臧（贓），臧（贓）直（值）百一十，吏弗直（值），獄鞠乃直（值）臧（贓），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黥甲為城旦，問甲及吏可（何）論？甲當耐為隸臣，吏為失刑罪。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輕之，論可（何）殿（也）？為不直。”可見當時對於盜竊案中黥為城旦或耐為隸臣的贓值界限是一百一十和六百六十錢。法吏對贓值的估價，凡無心致誤者皆要承擔用刑不當即失職之罪責，故意從輕或從重判盜竊者之刑，要承擔不公之罪。

官府對於告發盜竊者是否獎賞，律文無明確記載，但對捕獲因盜竊應判為城旦刑者，官府是給予重獎的。秦律規定，告發殺傷人者一人，捕獲逃亡城旦一人，各獎賞黃金二兩。對於捕獲應判為城旦罪的盜竊者一人，官府亦賞其黃金二兩，如“捕亡完城旦，購幾可（何）？當購二兩。”“夫、妻、子五人共盜，皆當刑城旦，今中（甲）盡捕告之，問甲當購幾何（何）？人購二兩。”“夫、妻、子十人共盜，當刑城旦，亡，今甲捕得其八人，問甲當購幾可（何）？當購人二兩。”對捕獲私家奴婢盜竊者官府亦要獎賞，如“或捕告人奴妾盜百一十錢，問主購之且公購？公購之。”由上述案例可推知，告發盜竊者之人無疑要受到官府不同程度的獎賞。

上述有關秦捕審盜竊案的部分律文及案例，僅是秦捕盜律及案例的部分內容，但亦可窺秦處置盜竊案之一斑。據之可得出如下淺見：其一是秦對盜竊者的處理貫徹了輕罪重罰的重法精神，所盜物不足一錢即要判服勞役或處以重罰，百錢以上至六百錢要判“黥為城旦”等刑，贓值在六百錢以上或盜取王室正在祭祀的供品，皆要被“耐為隸臣”。對執法官吏及有爵者等犯盜竊罪皆要從嚴懲處，充分體現了自商鞅以來秦法的嚴酷性。其二，在處理告發盜竊者的告發人方面，貫徹了根據告發人的實際狀況而區別對待的原則。如告發人所告不實，一定程度上將告發者是無心致誤或是故意誣告作

為告發者是否承擔罪責的依據，基本體現了重證據、講程序等秦律實施過程中的一定合理性。其三，存在執法過程寬嚴不一的不平衡性，在執法過程中有重依據判例而違律文規定的傾向，這也是秦律在維持嬴氏統治中最後走向極端的主要原因。重法治的秦統治者本來就以嚴刑酷法治國，執法官吏又迎合上意，在壓榨普通百姓中無所不用其極，違法辦案者並不罕見。鼓勵及重獎告發者的舉措及對告發者相對寬容的作法，都是秦政府的重要統治手段之一，這足以令被統治者人人自危，以此來維護秦政權的統治秩序。

## 二、《日書》有關捕盜的內容 及秦民間的防盜與捕盜活動

按照當時的習俗，《日書》在對某日生子的預測中有所生子女將來為盜的記載，如《日書》甲種《稷辰》載：“陰，是胃（謂）乍陰乍陽，先辱而後又（有）慶，……生子，男女為盜。”甲種《到室》載：“凡數日，利以漁獵（獵）、請謁、責人、挾（執）盜賊。”關於某日某時盜竊者的形狀、隱藏地點、姓名，《日書》甲種《盜者》中據天干和地支所記日時為基礎，與民間捕盜內容相結合，組成了一幅相當嚴密的捕盜圖式，供時人在捕盜中使用。現將《盜者》內容錄之於下：

“子，鼠也。盜者兌（銳）口，希（稀）須（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於垣內中糞蔡下。多（名）鼠鼯孔牛郢。

丑，牛也。盜者大鼻、長頸，大辟（臂）臃而倮，疵在目，臧（藏）牛廐中草木下。多（名）徐善趨以未。

寅，虎也。盜者壯，希（稀）須（鬚），面有黑焉，不全於身，從以上辟（壁）臃梗，大疵在辟（臂），臧（藏）於瓦器間，旦閉夕啓西方。多（名）虎豺羆豹申。

卯，兔也。盜者大面，頤額（額），疵在鼻，臧（藏）於草中，旦閉夕啓北方。多（名）兔竈陘突垣義西。

辰，盜者男子，青赤色，為人不可殺（殺），要（腰）有疵，臧（藏）東南反（坂）下。車人，親也，勿言已。多（名）翟不圖射亥戌。

巳，蟲也。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疵在足，臧（藏）於瓦器下。名西



菟亥旦。

午，鹿也。盜者長頸，小脰，其身不全，長耳而操藜，疵在肩，臧（藏）於草木下，必依阪險，旦啓夕閉東方。名徹達祿得獲錯。

未，馬也。盜者長須（鬚）耳，為人我我然好歌無（舞），疵在肩，臧（藏）於芻藁中，阪險，必得。名建章丑吉。

申，環也。盜者園（圓）面，其為人也鞞鞞然，夙得莫（暮）不得。名責環絡豺于都寅。

酉，水也。盜者鵲而黃色，疵在面，臧（藏）於園中草下，旦啓夕閉。夙得莫（暮）不得。名多酉起嬰。

戌，老羊也。盜者赤色，其為人也剛履，疵在頰。臧（藏）於糞藁中土中，夙得莫（暮）不得。名馬童犇思長戌。

亥，豕也。盜者大鼻而栗（栗）行，馬脊，其面不全。疵在縶（腰），臧（藏）於園中垣下，夙得莫（暮）不得。名豚孤夏穀口亥。

甲盜名曰藉鄭壬贍強當良。乙名曰舍徐可不詠士惠（憂）。丙名曰韞可癸上。丁名曰浮妾榮辨僕上。戊名曰匿為勝祗。己名曰宜食成怪目。庚名曰甲郢相衛魚。辛名曰秦桃乙忌慧。壬名曰黑疾齊謹。癸名曰陽生先智丙。”

由上述簡文可知，《盜者》所載地支數中之動物名稱是現知中國最原始的十二生肖像，但與漢代至今的十二生肖有所不同，如“巳，蟲也”據所述該日盜者的形象為“長而黑，蛇目，黃色，疵在足，臧（藏）於瓦器下。”顯然說的是蛇，與今之生肖基本相同。而“午，鹿也”。“酉，水也”中之鹿、水，不見於今之生肖，大概與當時鹿在獵物中地位的重要有關，“水”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注中認為“以音近讀為雉。雉，野鷄”。似與今之生肖同，但水在人們生活中之重要性，亦可致時人以其作為生肖。“馬”、“羊”雖屬今之生肖，但其位置與今不同。今之生肖中之狗、雞、龍不見於當時之生肖，而“辰”日無生肖之名，可能屬漏載。從此生肖圖觀之，大概在社會上已流傳了相當長的時期，方能載諸《日書》，並非當時人所創，可見十二生肖圖的創立，當會更早。

《盜者》所載某時出現的盜賊形狀，皆與相應之生肖動物形狀相類，盜賊的性格也與之相似，盜賊的身體皆有“疵”，即缺陷，而疵

在其身體中的部位也有一定規定，盜竊者出現的方向、隱藏的地點都有較具體的規定。此外還標明了盜竊者姓名，這些姓名也多與生肖動物有關，如“子鼠日”出現的盜竊者“多(名)鼠、鼯孔午鄧”。鼠、鼯皆鼠類動物，孔即洞，與鼠類匿居處所有關。“寅虎日”出現的盜竊者名“虎豺羆豹申”，基本屬於貓科動物。天干更為直接，祇列當時盜竊者之名。這些盜竊者之名究竟如何理解，如何斷句，今人頗有難處。但簡文整理者不予其斷句，顯然不符合原意。其盜竊者名中，有的比較怪異，如“巳名曰宜食成怪目”。還有如“簫”“殳”“忌”“誼”、“詠”等字，皆為古代人名用字少見者。大概時人認為盜竊者屬於肢體不全或不齒於社會羣體者，故其名也與常人異。這種天干所列之盜竊者之名，與地支所載之盜竊者外形、習性及名相互配合，按照當時五行迷信的推算方式，主觀地確定了這樣一幅嚴密的捕盜圖式，供當時民間主要是社會中下層人們日常生活使用。

當時如何使用這個“捕盜圖式”？由《法律答問》所列的秦捕盜律文和案例可知，當時社會上的盜竊案具有種類多，發案率高等特點，官吏對於捕審盜竊者的程序也較為嚴密和成熟。可以想見，較大的盜竊案一般都要經過官府的審判。而在當時社會動蕩的背景下，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盜竊案遠較被官府發現和被人告發的案件為多。這些未經官府審理的盜竊案，大部分由各地約定成俗的鄉規民約來發現並審判。在這些不成文的習俗中，《盜者》這類捕盜圖式無疑是較通行的一種。若某處某時發生了盜竊案，被盜者及鄉村主事之人根據此圖式即可確定盜竊者來自何方，外形特徵如何，姓名也可據之查出。現實之中人的長相相似者甚多，圖式所列盜竊者的名字又較多，有一定的選擇餘地。因此，凡發生無頭的盜竊案，人們必用此法覓盜竊者，而且所覓基本上不會落空。被確定和被捉拿的盜竊嫌疑人，有時會碰巧是真正的盜竊者，但絕大多數是無辜者。因為據迷信理論推斷出的該捕盜圖式，本身即主觀的產物，具有隨意性、臆斷性和抽象性，缺乏科學性。故據此來破獲盜竊案，其本身就缺少證據。不管是否盜竊者，一旦據捕盜圖式被村民抓住，被抓者必然要受到包括退賠“贓物”和受到鄉間規定的懲治盜竊者手段的嚴厲懲處，名譽一落千丈。對於被抓獲的極少數盜竊者那是罪有應得，而對於多數含冤者來說，那真是飛來的橫禍，而在當時五行迷信充斥社會各個領域的情況下，受冤者又難

以為己辯解，祇能沉冤莫白。因此，這個捕盜圖式在輿論和精神上有震懾盜竊者和維護地方社會治安的作用，在實施中卻是造成民間捕盜中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之一，與秦政府經官吏審判的盜竊案相較，這種依據捕盜圖式所破之盜竊案的可信度和方式要落後得多。

《日書》乙種《盜》篇與甲種《盜者》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其內容如下：

“甲亡，盜在西方，一字間之，食五口，其疵其上得□□□□□其女若母為巫，其門西北出，盜三人。

乙亡，盜□□□□□□□□□方，內盜有□□人在其室□

丙亡，為間者不寡夫乃寡婦，其室在西方，疵而在耳，乃折齒。

丁亡，盜女子也，室在東方，疵在尾□□□，其食者五□，□

戊亡，盜在南方，故盜，其上作折其□齒之其□

己亡，盜三人，其子已死矣，其間在室。

庚亡，盜丈夫，其室在西方，其北壁臣，其人攢黑。”

《盜》篇以天干紀日，來推斷某日失盜時盜竊者所處的方位、居處情況及其家庭人口的結構狀況，將盜竊者的外形及性別也明確予以指出。在《盜》篇中，依據天干之數，尚缺辛、壬、癸三日，可能是原簡失落毀損所致。與《盜者》篇相較，無按地支十二生肖動物的形狀、習性覓盜竊者的內容。《盜》篇所指出的盜竊者外形與習性較少，不能與《盜者》活靈活現地類動物描述相提並論，亦無《盜者》以天干地支縱橫交錯所臆測的一長串盜竊者姓名。對盜竊者身分的臆測，《盜》篇偏重於社會性，如“其女若母為巫”、“為間者不寡夫乃寡婦”，“盜女子”“故盜”、“盜丈夫”等。所指盜竊者的身份多是社會上的普通成員，這較《盜者》僅是描述盜竊者的外形與生肖動物相類似，而不指出其社會身份的內容前進了一步。在關於盜竊者的隱藏地點方面，《盜》篇指出的是在一定方向下的普通社會成員居室，而非《盜者》所指出的盜竊者如動物般的抽象藏身地點。很顯然，《盜》篇亦是行之於若干地區的民間捕盜圖式。與《盜者》篇相較，其神秘性及臆斷成份有所減弱，社會性有所增加，但其本質仍與《盜者》篇相同，屬於先驗性的主觀預測，其可行性是值得懷疑的。《盜》篇對於盜竊者身份的指定，除過同於《盜者》篇的身上有“疵”外，其社會身份為巫、寡

婦、鰥夫、故盜（即犯過盜竊案者）、女子等，這些人在當時社會中存在被社會輿論和傳統道德所輕視或貶斥的因素。因此，該捕盜圖式，具有明顯的階級性。另外，對於生於“男女為盜”等所謂不吉日之人，其處境無疑相當艱難，動輒要為其所居村莊或附近村莊發生的無頭盜竊案負責任、落嫌疑。這說明，《盜》和《盜者》這種秦民間據之捕盜的圖式，其本質是抽象的神秘的，若依其來套現實社會中的盜竊案，顯然與可行性有相當大的距離。

綜上所述，從秦律有關捕審盜竊案的律文及案例可見，儘管秦律文及執法過程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已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合理的捕審制度，這對維護當時的社會治安無疑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而民間的捕盜圖式顯然是廣泛應用於民間的捕盜活動的，但這類圖式缺乏客觀性，而充斥着迷信預測的神秘性及對社會上身份低下或生理及長相有缺陷者的歧視性，即其階級性較秦律還要濃厚，由其導致的冤假錯案絕非寥寥。當時秦官府的捕盜與民間的自行捕盜民俗是相輔相成的，由此組成了一道嚴密的統治法網，鎮壓被統治者，維護秦政權的統治秩序和長期的戰時狀態，其核心仍是以法治國思想在捕審盜竊案中的體現。這對我們深入瞭解秦捕盜律的有關內容及秦民間維持治安的民俗有一定的意義。



## 秦簡《日書》與 秦漢時期的生殖文化

吳小強（廣州師範學院教務處）

### 引 論

睡虎地秦簡《日書》自1981年公布以來，中外學者對《日書》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獲得了可觀的成果<sup>①</sup>，特別是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一書<sup>②</sup>，具有基礎性意義。回顧《日書》研究歷程，人們對秦簡《日書》的性質及其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認識，大體與當年“《日書》研讀班”的分析相似<sup>③</sup>；但對《日書》的文化主體歸屬卻有不同看法。這些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一）認為睡簡《日書》為秦國和秦代秦人的文化載體<sup>④</sup>。（二）認為睡簡《日書》內相當篇幅屬於楚國《日書》<sup>⑤</sup>。（三）認為睡簡《日書》是“純”楚文化作品，放馬灘秦簡《日書》為“純”秦文化之作；或認為這兩批《日書》顯不出楚、秦兩種文化特點的不同<sup>⑥</sup>。（四）以為睡簡《日書》既是秦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也是秦楚文化融合的結晶<sup>⑦</sup>。（五）《日書》“應該是當時中國社會中中下階層共同的文化的一部分”<sup>⑧</sup>。近來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始終存在着以數術方技為代表的第二條基本線索<sup>⑨</sup>。如果讓我們把眼光從狹窄的地域性“秦楚之辨”中投向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時，就不難發現：秦簡《日書》不單純是秦文化或楚文化的代表，而是上溯春秋，下迄兩漢的文化座標之一，甚至可視之為更加古老的中國民間風俗文化長河的源頭<sup>⑩</sup>。例如，《日書》內有“衣”忌日，明代著名小說《金瓶梅》第三回：“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很顯然，明代“裁衣日”習俗源自悠久的古俗，如何準確地認識和利用



《日書》所蘊含的豐富價值，林劍鳴先生《秦漢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一文堪稱範例<sup>⑪</sup>。本文亦嘗試從秦漢文化的視角來考察《日書》涉及的生殖民俗。

## 一

當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之際，人類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生殖崇拜。例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都曾發現反映“生殖崇拜”的陶塑、石祖、木祖等。70年代在遼寧喀左縣東山嘴出土了陶塑女神像，其形態肥胖，性器官誇張外露，反映了五千年前遼河流域先民們對女性生殖力的崇拜。80年代初在內蒙古陰山、廣西左江等地發現了表現男根女陰、男女交媾、求生舞蹈、感生腳印等生殖主題的原始岩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新疆呼圖壁縣西南75公里處的天山大型岩畫的發現，轟動一時。該岩畫面積約120餘平方米，上繪數百個高低大小不等的男女形象，大的超過真人，小的祇有10餘釐米，許多男像清楚地顯示出生殖器及睪丸，有的作出交媾動作。女像多為裸體，臀部、乳房突出，作有規則的舞蹈狀，有的疊壓在男像身上，有的同男像和猴面人身呈性交狀。畫面下方是姿態不一的群體小人。岩畫明確表達了距今三千年前的人們對生命創造力的強烈渴望<sup>⑫</sup>。1991年陝西省扶風縣案板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距今約五千年裸體女性塑像，據認為這“可能與五千年前黃土高原流行的生殖巫術有關”<sup>⑬</sup>。趙國華先生曾在《生殖崇拜文化畧論》一文中詳細比較了中國和印度原始社會的生殖崇拜文化，提出，與儒家思想一樣，“道家的根本思想同樣生發於生殖崇拜。”<sup>⑭</sup>

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革，思想文化與科學技術空前繁榮，社會人口與物質財富有了驚人的增長。據人口史專家袁祖亮統計：“從戰國中、後期到公元2年，是中國人口急劇增長的時期，由前390年的10000000增長到59594978人。其人口自然增長率是4.5%。”<sup>⑮</sup>社會文明的進步雖然使原始社會晚期先民那種純真樸實的“男根女陰”崇拜從社會表象中隱逝，但是，“生殖崇拜”作為一種古老而幽遠的原始本能觀念，卻以較深的社會潛意識形式根植於民眾的頭腦中，並成為我們民族的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秦簡《日書》即是這種文

化積淀的載體之一。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專設《生子》《人字》兩章，乙種有《生》章；此外在甲種的《除》《秦除》《稷辰》《玄戈》《星》《吏》《字》《詁》《盜者》，乙種的首章、《秦》《見人》《除室》等章均有涉及“生子”的內容。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16：“平旦生女，日出生男。”<sup>①⑥</sup>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睡簡《日書》甲種《人字》章內附有兩幅人體圖，上下排列，在人體的不同位置分別標注干支及秋冬春夏四季。“人字圖”下方簡879—簡883的文字為：“人字其日在首，富難勝殿。女子以巳字，不復字。”“夾頸者貴，在足下者賤。”“在奎者富，在外者奔亡。”“在掖者愛。”“在手者巧盜。”<sup>①⑦</sup>簡文“奎”，指兩條大腿中間，《說文》：“兩髀之間也。”“外”，劉樂賢考證為“間”字，讀為肩<sup>①⑧</sup>。《人字圖》是日者推測出生孩子未來命運的依據。與《日書》時代相近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雜療方》《胎產書》、《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等均與生殖相關，其中《胎產書》所列“胎產圖”與《日書》中的《人字圖》十分相似，亦在人體不同部位標明干支。秦簡《日書》及馬王堆漢墓帛書無疑是秦漢生殖文化的展現，反映了當時生生不已的人口繁殖現象和人們對生命存在價值的某種認識。1990年，在陝西咸陽西漢景帝陽陵陵區一組大型從葬坑內出土了完整裸體彩色陶俑90件，俑頭537個。陶俑多數是男性，個別為女性，俑高62釐米，造型逼真，陽具、肚臍、竅孔齊備<sup>①⑨</sup>，筆者曾於1994年夏有幸赴陽陵漢陵考古隊駐地目睹漢俑豐采。這批彩色俑原本着衣，因年代久遠而絲衣朽落，其祥和生動的面容，栩栩如生的生殖器官塑造，令人感受到“珍惜生命”的秦漢文化價值取向。

秦漢時期的生殖文化包含了對生命的探索研究，對生命的過程形成比較理性的認識。《列子》為人所下的定義是：“戴髮含齒，倚而趨，謂之人。”<sup>②⑩</sup>管子認為“人，水也。男婦精合而水流，形二月而咀者，五味也。五味是五藏，酸生脾，咸生肺，辛生腎，苦生肝，甘生心。藏已具而後生五肉。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肉已具然後生九竅：脾為鼻，肝為目，腎為耳，肺為口，心為下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sup>②⑪</sup>《文子》也認為：“人之情欲平，嗜欲亂之；精氣為人，人受天地變化而生；

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成骨，七月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藏乃形。”<sup>②②</sup>《孔子家語》對人的身體發育成長過程及生育能力的形成作了較科學的描述：“人始生而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臍，然後能行。三年臍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十有六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sup>②③</sup>上引《列子》、《管子》、《文子》、《孔子家語》諸典，大多系後人偽托前代聖賢之名而作，其成書約在戰國至漢代時期，其中多數可能出自秦漢時期文人之手，應基本代表了秦漢時期的認識水平。

人的生命是怎樣產生的？秦漢時期已經發現，生命的延生原因是物質的“氣”在起作用。“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sup>②④</sup>母親的身體是生命得以孕育的載體和基本條件，母體對生命的產生起決定作用。“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腠，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為之也。”<sup>②⑤</sup>當時人們認為，男女陰陽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和氣”，是人的生命形成的直接源泉：“和氣生人……男婦聽口以施精神資和，以兆毓民之胎，含嘉以成禮。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以血脈。”<sup>②⑥</sup>“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sup>②⑦</sup>很顯然，漢代人關於“和氣生人”的觀點，與現代醫學揭示的精子與卵子結合而產生生命的理論是相當接近的。

## 二

秦漢時期生殖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是優生觀念的形成。請看睡簡《日書》乙種《生》章簡文。簡1133—1143：

甲子生，少孤。乙丑生，不武，乃工考（巧）。丙寅生，武聖。丁卯〔生〕，不正，不然必有疵於前。戊辰生，有寵。己巳生，凶，為臣妾。庚午生，貧。武有力，毋（無）終。辛未生，肉食。壬申生，有間（聞）邦。癸酉生，有終。甲戌生，好甲。乙亥生，利酉（酒），醴。丙子生，吉。丁丑生，好言



五(語)，有生(管)目。戊寅生，遠去女子於南。己卯生，去其邦。庚辰(生)，好(女)子。辛巳生，當吉。壬午生，穀於武，好貨。癸未生，長。甲申生，必有事。乙酉生，穀，利樂。丙戌生，有終。丁亥生，考(巧)。戊子生，去其邦北亟。己丑生，疾。庚寅生，女子為巫。辛卯生，不吉。壬辰生，必善醫，衣常(裳)。癸巳生，穀。甲午生，武有力，寡弟。乙未生，少疾，後富。丙申生，好室口。丁酉生，吉，昏(陷)酉(酒)②。戊戌生，姓楚。己亥生，小(少)孤。辛丑生，有終。壬寅生，不吉，女子為醫。癸卯生，不吉。甲辰生，穀。丙午(生)，疾。丁未生，不吉，貧，為人臣。戊申生，有寵，必事君。己(酉)生，穀。庚戌生，武，貧。辛亥生，不吉。壬子生，愚(勇)。癸丑生，好口。乙卯生，口口壽。丙辰生，必有疵於體。丁巳生，穀，媚人。戊午生，好田獵(猎)。己未生，穀。庚申生，愚(勇)。辛酉生，不吉。壬戌生，好室家。癸亥(生)，貧，毋(無)終。凡己巳生，勿舉，不利父母，男子為人臣，女子為人妾。庚子生，不出三日必死。凡生子北首西鄉(向)，必為上卿，女子為邦君妻。

《日書》甲種《生子》章與上列簡文內容相類。放簡《日書》甲種16：“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暮)食男。日中女。日西中男。”②秦簡《日書》表明，戰國秦漢時期中下層民眾相信出生的季節、日期和時辰決定了一個人的身體健康或殘疾、仕途命運、技能愚巧、性格嗜好、甚至是男是女，其中包含了人們對健康、靈巧、富貴和男孩的期冀與追求。

中國社會的優生觀念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周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認識是宗法制度下一種朦朧的優生觀。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經明確意識到成年男女體格強弱、年齡長幼的和諧婚配與生育的數量與質量之間的內在關聯。《國語·越語》載，勾踐令國中男子“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漢代亦認識到婚配男女在體格、年齡上相差懸殊，即不利於優生。《後漢書·循吏傳》載，任延為九真太守，“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齡相配。”秦漢時期，人們還注意到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關係，人的體質、性格都受到水土自然環境的制約。《淮南子·墜形訓》：“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癯，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癯。

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瘠，邱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壙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這些觀點發展了秦簡《日書》的認識，包含了明顯的“天人合一”、人應氣象的人地辯證關係色彩。

現代醫學證明，生命的質量取決於受精卵的質量，受精卵的質量又分別取決於夫婦精子與卵子的質量。秦漢時期人們將男子向女子的授精過程稱之為“施氣”，把女子受精懷孕稱為“稟氣”；認為孩子的健康長壽聰慧與否，關鍵在於其父母最初的“施氣”與“稟氣”如何。“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sup>②①</sup>“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而不傷，亦至百歲。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漏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強，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產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歲，雖非正，猶為命也。”<sup>②②</sup>秦漢社會人們注意到多育與多疾、多夭現象的內在聯繫，當時的確存在着嬰幼兒成活率很低的問題。例如：秦簡《日書》甲種簡818：“取妻多子，生子旬而死。”簡806：“生子三月死，不死毋晨。”簡804，“取妻妻為巫，生子不盈三歲死。”乙種簡1142：“庚子生，不出三日必死。”

秦漢時期人們認為，“稟氣”不僅決定了人的長壽與否，而且關係到人生富貴。《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故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論衡·



初稟篇》“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這種認識與秦簡《日書》將人的命運歸結於日期時長的觀點實質上是一致的。

在秦漢社會的生殖文化中，禁欲觀念是重要的內容。《日書》甲種《行》章，簡856：“凡且有大行、遠行若飲食、歌樂、聚畜生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凡是日赤帝（帝）恒以開臨下民而降其殃（殃），不可具為百事，皆毋（無）所利。”簡文中“夫妻同衣”當指夫妻同被行房事。《論語·鄉黨》：“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集解》引孔安國註：“今之被也。”從簡文行文規律及上下文意分析，解為房事較通。漢人認為，男女必須在每年二月仲春和十一月仲冬禁欲，不得同房。《禮記正義·月令》：“仲春之月……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鄭玄注：“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淮南子·時則訓》：“仲春之月……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高誘注：“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瘡聾通精凝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崔寔《四民月令》：“二月……春分中，雷乃發聲，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時人認為，在春雷震響時，夫妻必須暫停性生活，否則所生孩子必定染疾。在嚴冬季節同樣需節欲、禁欲。《禮記·月令》：“仲冬之月……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四民月令》：“冬十一月，陰陽爭，血氣散，冬至日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淮南子·時則訓》：“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從上引材料可知，秦漢時期在春冬季節禁欲的目的在於避免生育痴聾傻啞的孩子，保證生育質量。

### 三

對生命質量的追求，是秦漢時期生殖文化最有價值的內核，胎養、胎教是這種追求的體現之一。

秦漢時期形成了較為普遍的胎養、胎教觀念。當時政府一方面為了促進社會人口擴大再生產和社會力水平的提高，鼓勵人口繁殖，另一方面十分重視孕

婦養胎保體的需要，制定專門法令，優待孕婦。例如，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春下詔：“今諸懷妊者，賜胎養谷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並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其嬰兒無父母家屬，及有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sup>③</sup>對產婦也有獎勵，據《後漢書·仲長統傳》：“人有產子，厚致米肉。”

胎教觀念早在春秋時代已經萌芽，傳說“瞽瞍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sup>④</sup>。“大任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sup>⑤</sup>秦漢時期胎教觀念已發展到相當系統成熟階段，東漢犍為太守趙宣妻杜泰姬在其《戒諸女及婦》書中總結了個人胎教體會：“吾之妊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思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之，而無不善。汝曹庶几勿忘吾法也。”<sup>⑥</sup>杜泰姬實際提出了如何造就一個高質量高品質的人材問題。《論衡·命義篇》：“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博物志》：“又曰婦人妊娠，不欲見丑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欲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sup>⑦</sup>

由上所述，秦漢社會的胎教內容主要包括孕婦的心、坐、食、視、聞五個方面，即（一）心靈端正祥和寧靜；（二）坐姿自然莊重，“正席而坐”；（三）食當正味，講究飲食，“割不正不食”；（四）目視正色，不睹邪物，“不視邪色”；（五）聞須正音，不聽淫聲。所謂正聲，指“誦《詩》《書》諷詠之聲”。秦漢社會胎教觀念中的正心、正坐、正食、正色、正聲理論，包含了可貴的科學思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人們不僅注重胎教，更重視幼教，強調從小培養孩子良好的品德，為孩子選擇優秀的教師和適宜健康成長的環境，使孩子成為禮貌勤奮孝順忠信的人，這種觀點對今天的基礎教育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秦漢時期中，下層社會民眾對生命質量的追求與期盼，集中反映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例如，甲種簡741：“夫光日……以生子，男女必美。”簡761：“秀是胃重光……以生子，既美且長有賢等。簡801：“心……生

子，人愛之。”簡874：“庚辰生子，好女子。”簡875：“庚申生子，良。”簡820：“取妻吉，以生子，肥。”簡878：“癸未生子，長大善得。”簡文提到“美”、“賢”、“人愛之”、“好”、“良”、“肥”、“長大”，是一種理想的成人身體形象狀態，可見秦漢社會崇尚美好與賢慧，希望身高體長，身體肥壯，以身材矮短為恥。《史記·張丞相傳》載張蒼為美士，身長大，身長八尺餘，肥白如瓠。因長得漂亮而被免罪。《後漢書·鉅期傳》：“鉅期字次況，潁川潁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後漢書·馮勤傳》記載馮勤“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有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從馮勤祖父馮偃為兒子馮伉娶高個子媳婦的故事可知，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遺傳因素對子女身高的重要作用。

秦簡《日書》卜語所提“美好長大”是時人對生命外在價值的追求，“長有賢等”則是表達了對生命內在價值實現的期冀。例如：甲種簡800：“房……生子富。”簡805：“牽牛，……生子為大夫。”簡809：“生子為吏。”簡822：“張……以生子，為邑桀（傑）。”簡873：“戊申生子，寵事君。”簡876：“辛未生子，肉食。”簡875：“庚寅生子，女為賈，男好衣佩而貴。”

從戰國到秦漢，存在着兩個突出的生殖文化現象，其一，在生生不已的人口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先天性畸形兒，社會生育質量不高。睡簡《日書》甲種簡810：“以生子，不完。”簡815：“生子痊。”反面簡805：“生子不拴。”拴，《傳》“體完曰拴。”簡870：“乙卯生子，要（腰）不肅。”乙種簡1137：“乙丑生，疾。”簡1140—1141：“丙辰生，必有疵於體。”其二：由於某種風俗及“重男輕女”觀念，特別是經濟原因，社會上流行殺嬰、棄嬰陋俗。例如，《日書》甲種簡874：“己巳生子鬼（醜），必為人臣妾。”乙種簡1142：“凡己巳生，勿舉，不利父母，男子為人臣，女子為人妾。”《淮南子·齊俗訓》：“秦王之時，或人俎子，利不足也。”注：俎子，生子殺俎之。在傳統民俗中所殺棄的嬰兒，應當以女嬰占多數。《韓非子·六反》：“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後漢書·虞延傳》載：“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像虞年這樣幸運的女孩畢竟

是個別的。《史記·外戚世家》：“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衛子夫以美色而貴極一時，歌謠諷刺衛子夫，也從另一側面折射出“生男喜、生女怒”的社會生育價值觀。針對上述兩個社會現象，秦朝政府制定法律，禁止隨意殺嬰，但允許殺棄先天性畸形兒，以提高人口生育質量：“擅殺子，黥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殺之，勿罪。”<sup>①</sup>秦朝這項“優生法”令，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社會的進步，往往以對人自身行為規範限制為標誌。從西周“同姓不婚”，到秦漢政府允許殺棄先天性畸形產兒，表明傳統的生殖文化價值觀的不斷變化與發展，人自身行為的規範不斷嚴密與強化，實質上是古代文明社會進步的具體體現。

綜上所述，秦簡《日書》蘊含了秦漢時期生殖文化的大量信息，其內核是“重生厚育，優存劣汰”的生命發展價值觀。從鼓勵人口繁殖和提高生命質量的目的出發，秦漢時期重視婚配男女在體質、年齡方面的和諧，重視受精受孕的過程的禁忌，重視胎養胎教和幼教幼育，對新生兒實行類似於“斯巴達人式”的淘汰選擇，這些內容構成了秦漢時期生殖文化的基本特徵。

## 注 釋

- ① 參見林劍鳴《曲徑通幽處，高樓望路時——評價當前簡牘〈日書〉研究狀況》，張強《近年來秦簡〈日書〉研究評價》，分別載《文博》1988年第3期，1995年第3期。沈頌金《中日兩國學者研究秦簡〈日書〉述評》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9期。
- ②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
- ③ 《日書》研讀班《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載《文博》1986年第5期。
- ④ 參見《日書》研讀班《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同上）；林劍鳴《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李曉東、黃曉芬《從〈日書〉看秦人鬼神觀及秦文化特徵》，分別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3、4期；賀潤坤《從〈日書〉看秦國的穀物種植》，載《文博》1988年第3期；吳小強《秦人生育



意願初探》，載《江漢論壇》1989年第11期等。

- ⑤ 參見劉信芳《秦簡中的楚國〈日書〉試析》，載《文博》1992年第4期。
- ⑥ 參見何双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載《考古》1989年第2期；林劍鳴《睡簡與放簡〈日書〉比較研究》，載《文博》1993年第5期；《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10版。
- ⑦ 參見吳小強《試論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觀念》載《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3期；《論秦人宗教思維特徵——雲夢秦簡〈日書〉的宗教學研究》《秦漢史論叢》第5輯，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⑧ 蒲慕州《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四分第666頁，1993年4月版。
- ⑨ 李零《中國方術考》第13—14頁，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 ⑩ 參見〔日〕工藤元男《雲夢秦簡〈日書〉與秦史研究》，《秦漢史論叢》第5輯，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⑪ 載《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
- ⑫ 分別見《新華文摘》1988年第5期《新疆發現舉世罕見的“生殖崇拜”大型岩畫》、《中國文化報》1988年8月17日第二版《“生殖崇拜”研究方興未艾》。
- ⑬ 參見《文物》1992年第11期，劉志雄《黃河流域首次發現史前女性陶塑》載《光明日報》1993年1月10日版。
- ⑭ 見《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1期第156頁。
- ⑮ 引自袁祖亮《中國古代人口史專題研究》第68—69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 ⑯ 見《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秦漢簡牘研究論文集》第2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 ⑰ 本文所引《日書》簡文，均見《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9月精裝本。



- ⑮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第191—192頁。
- ⑯ 參見《文物》1992年第4期《漢景帝陽陵南區從葬坑發掘第一號簡報》。
- ⑰⑱⑲⑳ 轉引自《太平御覽》卷360《人事部·叙人·孕》。
- ㉑㉒ 《論衡·自然篇》。
- ㉓ 《潛夫論·本訓篇》。
- ㉔ 《論衡·論死篇》。
- ㉕ 白，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釋為旨，讀為嗜。鄭剛、劉樂賢釋為白，讀為陷，本文從鄭、劉說。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第397頁。
- ㉖ 《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同上）。
- ㉗ 《論衡·命義篇》。
- ㉘ 《論衡·氣壽篇》。
- ㉙ 《後漢書·章帝紀》。
- ㉚ 《異苑》，轉引自《太平御覽》卷360。
- ㉛ 《列女傳》，轉引自《太平御覽》卷360。
- ㉜ 《全後漢文》卷96《列女》轉引《華陽國志》卷10下。
- ㉝ 轉引自《太平御覽》卷360。
- ㉞ 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 秦簡偶札

劉 桓

《睡虎地秦墓竹簡》（簡裝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一書，所收的秦律等簡文釋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注釋尤精，讀後獲教益甚多。然秦簡文字古樸，亦頗有難於索解之處，個人讀此書試作札記數則，茲抄之於下，敬希方家匡所不逮。

1. 是以善斥（訴）事，喜爭書。（《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以下不再出以書名。）

按上文已言“惡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潔（潔），毋（無）以佐上，綸（倫）隨（惰）疾事”，注釋譯“綸（倫）隨（惰）”為“苟且懶惰”，甚是。“疾事”之“疾”則有憎嫌之義，《管子·小問》：“夫牧民者不知其疾，則民疾”，尹知章注：“疾，憎嫌之也”。故“疾事”有不願好好做事之意。而“斥事”實與“疾事”相承一致，斥有排斥推脫之意。《鹽鐵論·利議》：“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斥即排斥意。《廣雅·釋詁三》：“斥，推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十四引“《三倉》云：‘斥，推也’《說文》：‘斥，卻屋也。’卻與推同義。昭十六年《左傳》云：‘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其何饜之有？’”可為證。“喜爭書”則承上文的“易口舌，不差辱，輕惡言而易病人，毋（無）公端之心，而有冒抵（抵）之治”而言。“爭書”當指爭辯文書之是非。春秋時期有“爭車”、“爭政”等說法（分別見《左傳》隱公十一年和宣公十五年），漢代有“爭語”一詞，《急就篇》：“讒諛爭語相舐觸”，顏注：“爭語謂各持辯說也。”“一曰爭語謂交相譖毀也。”簡文的“斥事”、“爭書”意正相對，蓋謂惡吏善於推脫不做事，而喜歡與人爭辯文書（亦含有譖毀別人之意）。

2. 爭書，因恙（佯）瞋目扼掎（腕）以視（示）力，訐詢疾言以視（示）

治。(同上引)

注釋：“訐，《說文》：‘詭譎也。’詢，讀為謬，《說文》：‘詐也。’訐詢，詭詐。”按尋繹簡文文意，“爭書”之後第一句乃以“瞋目扼腕(腕)”形容惡吏“爭書”時的外在舉止，次句相對則以“訐詢疾言”形容其言談表情。詢，指詢問。《詩·大雅·板》：“詢于芻蕘”，鄭箋訓“詢”為“謀”，意為商量。《玉篇》訓詢為“咨也”，可知詢有詢問意。訐意為大，《詩·大雅·抑》：“訐謨定命”，毛傳：“訐，大。”“訐謨”即“大謀”。“訐詢”當指大聲詢問。疾言，後有“疾言遽色”(《後漢書·劉寬傳》)之成語，疾言即言語急之意。“訐詢疾言”，似是說大聲詢問言語，言語急迫。

3. 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蕒、麋(卵)麋。(《田律》)

注釋：“夜，疑讀為擇。夜草為灰，意為取草燒灰，作為肥料。《禮記·月令》：仲夏月‘毋燒灰’。”按夏月以草為灰做肥，不單有用火燒之法，還有水漚之法，故夜當讀為液，漬液之意。《考工記·弓人》：“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鄭司農云：“液讀為醴”，疏云：“先鄭液讀為醴者，醴是醴酒之醴，亦是漬液之義，故讀從之也。”“夜草”既讀“液草”，當釋為以水殄草的漚肥方法。《周禮·地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蕒之。”夏緯瑛先生在《〈周禮〉書中有關農業條文的解釋》一書中說：“‘夏以水殄草’，就是夏天裏用水把草泡死。這種方法，如今還有行之者。我曾有內蒙古地區的旅行，在五原一帶見過農民在夏天裏殺草事情。他們的辦法是：在一塊高低一致的田地的周圍，築成高約三尺的土堰，把渠水放入田中，水深約二尺有餘，這叫作放伏水。田中的雜草，在夏日的三伏天裏，經如此浸泡，全然腐爛於田中，化為肥料”①云云。《禮記·月令》季夏月“燒蕒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鄭玄注：“蕒，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蕒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則為用火燒雜草又用水漚之，兩者並用的一種肥地的方法。然從簡文看，似仍以用水漚草較合原意。

“取生蕒麋(卵)麋”，《廣雅·釋獸》：“麋，麋也。”《廣雅疏證》云：“《爾雅》：‘鹿其子麋。’《周官·迹人》：‘禁麋卵者’，鄭注云：‘麋，麋鹿子。’是麋為鹿子之名，麋子亦得借稱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三十一：“‘禁麋卵者’者，賈疏云：‘此謂四時常禁。案《月令》孟春云：‘不麋不’

卵。’又《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者，彼以春時生乳，特禁之。’案：賈說是也。《庖人》：‘禽獻秋行犢麇’，《士相見禮》注亦云‘禮有秋獻麇’，則麇非不得取，但非時及它獸之麇則有禁耳。”孫氏又指出：“《曲禮》孔疏云‘麇乃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稱’是也。”所言皆是。簡文說不到夏月，不准取麇，主要是指麇鹿子及其它幼獸。簡文“麇毆”應連言為一詞，王充《論衡·論死》云：“鷄卵之未（字）〔孚〕也，湏溶於毆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從文意看，毆指鷄卵殼甚明。簡文既以“麇（卵）毆”連言，毆亦為殼意。秦簡雖文言，卻多日常用語，卵指鳥卵，“卵”與“卵毆”一也，秦人語言習慣如此，猶今南方一此地區習慣將人的頭稱為腦殼。

4. 士五（伍）甲關，拔劍伐，斬人髮結，可（何）論？當完為城旦。

（《法律答問》）

鉞、戟、矛有室者，拔以關，未有傷毆（也），論比劍。（同上）

按漢律有“關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漢書·薛宣傳》引）可見秦律·漢律相因革之一斑，秦律記與人相關時，雖以刃斬人髮結甚至未有傷，皆“完為城旦”。秦律之重於此可見。

5. 孰道毋治。（《為吏之道》）

道指道路，《吳子·治兵》：“日暮道遠”，侯馬盟書有“行道”一詞。下文云“安而行之”，“使民望之。道傷（易）車利，精而勿致，輿之必疾，夜以接（接）日”等，皆以行車於道喻為政治民的道理，亦可證“道”指道路而言。“孰道毋治”，猶言熟路不必修治。

6. 聽有方，辯短長，困造之士久不陽。（《為吏之道》成相辭）

短長，或作長短。《漢書·主父偃傳》說“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注：“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又《張湯傳》說“邊通學短長”，均指縱橫之學。困造，困當是麇之省。《說文》十篇上：“麇，麇也，从鹿困省聲。麇，籀文不省。”造義為至。《書·盤庚》：“有眾咸造”，偽孔傳“造至也”。《左傳·昭公五年》：“求諸侯而麇至”，杜注：“麇，羣也。”麇至義即羣來。《文選》顏延之《釋奠詩》作“麇至”。“困造”意猶“麇至”，甚至今語“麇集”意亦相近。“困造之士”與“短長”聯繫起來看，顯然是指各諸侯國來到秦國的士人，蓋以其人數較多而如此稱。李斯《諫逐客書》：“士

不產於秦，願忠者衆。”在李斯上書以前，這類人物到秦國就已很多，陽，或通揚，有舉義，《說文》訓“揚”為“飛舉也”。《詩·王風·君子陽陽》：“君子陽陽，”正義：“《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則“久不陽”，就是久不見舉用，久不得志。

## 注 釋

- ① 《〈周禮〉書中有關農業條文的解釋》，36頁，農業出版社，1979年。



# 簡帛文字考釋札記

施謝捷（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 一、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五則

### （一）

《睡虎地秦墓竹簡》①的甲種《日書》“盜者篇”中有如下一條：

寅，虎也。盜者壯，希（稀）須，面有黑焉，不全於身……（71背）

按：“盜者壯”，與本篇“子，鼠也。盜者兌（銳）口……”（69背）、

“丑，牛也。盜者大鼻……”（70背）、“卯，兔也。盜者大面……”（72背）等描述不相若，江陵張家山漢簡《日書》中亦有相關內容，作：

寅，虎也。盜者虎狀，希須，大面，面有黑子，不……（《書法》1986年5期2頁）

據此，疑“盜者壯”當從張家山漢簡《日書》作“盜者虎狀”。“壯”“狀”古通用，《周禮·考工記·栗氏》“凡鑄金之狀”，鄭玄注：“古文書狀作壯。”《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四年“蜀相壯殺蜀侯來降”，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壯）一作狀。”可見此條的“盜者壯”，“壯”為“狀”之同音借字，“壯”上脫“虎”字。稱盜者“虎狀”，與本篇“巳，蟲也”條言盜者“蛇目”（74背）例同。又“面有黑焉”，“黑”下脫抄“子”字，本篇“子，鼠也”條有言“面黑子焉”（69背），可以比較。

附帶說明，《漢印文字徵補遺》②“孟”後一欄用為人名的“𤙖”（14.4F），實是“黑子”二字。《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③將此字形移入附錄，仍當作一字，出處誤作“漢印徵”（1722頁）。以“黑子”為名，與古人用“赤目”、“青臂”等為名，取意相類。④

(二)

睡虎地甲種《日書》“盜者篇”有如下一條：

卯，兔也。盜者大面，頭頰，疵在鼻，臧（藏）於草中……（72背）

“頰”，整理小組校作“頰”，註釋說：頰，《說文繫傳》：“頭惡也。”

（釋文註釋部分 220 頁）

按：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⑤及江陵張家山漢簡《日書》中都有相關內容，放馬灘秦簡作：

卯，兔毆（也）。以亡盜從東方入，復從出，臧（藏）野林草茅中，為人短面，出不得。（甲 33 簡）

張家山漢簡作：

卯，象（兔？）也。盜者大目、短頸、長耳、高尻，臧（藏）草木……

（《書法》1986年5期2頁）

三者可互相參照。盜者特徵“大面”、“頭頰”分別相當於放馬灘秦簡的“短面”、張家山漢簡的“短頸”。據此，疑“頭頰”可讀為“脰短”。“頭”“脰”二字均從“豆”聲，古通用。《儀禮·士相見禮》“左頭奉之”、“左頭如麇執之”，鄭玄注：“今文頭為脰。”《公羊傳·文公十六年》“大夫相殺稱人”何休注“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陸德明釋文：“頭，如字。本又作脰，音豆。”《儀禮·士虞禮·記》“取諸脰膾”，鄭玄註：“脰膾，為頭噬也。”均其相通之徵。“脰”為頸項之意，《說文》肉部：“脰，項也。”《爾雅·釋鳥》：“燕，白脰鳥。”郭璞註：“脰，頸。”“頰”，從其構形看，應是“从頁象聲”之字。古音“短”是元部端母字，而“象”及“从象”字也多是元部端系字，韻部相同且同為舌頭音，互相通借當是可能的。《周易·乾》“象曰”，陸德明釋文：“象，斷也。”又《象上·傳》註引劉瓛說：“象者，斷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秋有蜚”杜預註：“蜚，短弧也。”陸德明釋文：“短，本又作斷。”因此簡文中“頰”很可能應該讀為“短”。⑥綜之，“頭頰”為“脰短”，為短頸之意，與張家山漢簡所說相同。整理小組將“頭頰”改作“頭頰”，釋作頭惡，與本條所稱“兔”的外形特徵不甚相合，恐不妥。

(三)

睡虎地甲種《日書》“盜者篇”有如下一條：

酉，水也。盜者——名多酉起嬰。（78背）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⑦說：酉日下的“酉”可能是“卯”的誤寫。（277頁）

按：先秦古文字中“酒”往往借用“酉”字⑧，秦漢文字亦如此。《秦律十八種·田律》“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12），“酤酉”即酤酒；甲種《日書》“衣篇”有“以生而飲酉”（118背、122背），乙種《日書》“生子篇”有“丙午生子，者酉而疾，後富”（142正肆）、“戊午生子，者酉及田遺（獵）”（144正伍）、“丁酉生子，少耆酒”（143正叁），“耆酉”即“嗜酒”；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後語·伯有章》中“飲酒”作“飲=”，顯然是“飲酉”二字合文，亦以“酉”為“酒”。（《馬王堆漢墓帛書[叁]》⑨圖版4頁36、40行，釋文註釋9頁）均其例，漢印中數見以“多酒”為名者，如“韓多酒印”、“郭多酒”印（均見《印典》⑩2991頁），因此簡文“多酉”應即“多酒”，為二字人名。本篇“戌老羊也”條有名“馬童”（79背），乙日下有名“亡（無）憂”（81背），亦是二字人名，可資佐證。若依劉樂賢說，“酉水也”條末可能脫抄“卯”字，“酉”不必是“卯”的誤寫。

#### （四）

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盜者篇”有如下一條：

癸名曰陽生先智丙。（82背）

按：本書“生子篇”有“庚午生子，貧，有力，先冬（終）。 ”（146正陸）同出乙種《日書》此條作“庚午生，貧，武有力，毋（無）冬（終）。 ”（239）原整理小組據以校“先終”為“无終”；又有“癸酉生子，先冬（終）。 ”（149正肆）整理小組亦校作“无終”（釋文註釋205頁）。因此簡文“先智”很可能是“无智”之訛，“无智”即“無智”。古人喜用“無智”為名，亦作“亡智”。⑪《說文》亡部謂“无”為“𠄎（無）”之奇字。

#### （五）

睡虎地甲種《日書》“帝篇”有如下一條：

凡為室日，不可以筑（築）室。筑（築）小內，大人死。筑（築）右

邳，長子婦死。筑（築）左邳，中子婦死。筑（築）外垣，孫子死。筑（築）北垣，牛羊死。（100 正）

整理小組說：邳，《集韻》音土，在此疑以音近讀為宅。（釋文註釋 196 頁）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引鄭剛說讀邳為堵。（128 頁）

按：“邳”實應釋為“序”字。“予”作為偏旁往往因形近而混同“邑(阝)”，戰國古璽中屢見的“邕”字（《古璽文編》⑫ 157—158 頁），李家浩釋為“序”；⑬ 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其序為廂”的“序”作序（《文物》1989 年 2 期 24 頁圖一，甲 28），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篇”中“序行以——”的“序”字作序（《銀雀山漢墓竹簡〔壹〕》⑭ 圖版 40 頁 403 正），“序者所以厭（門也）”的“序”字作序（同上 42 頁 430 b），漢印中的人名“寬舒”、“溫舒”之“舒”字或作“郤”，“野王”的“野”字或作“野”，⑮ 均其比。又漢印文字中的“廕”、“廕”、“離”所從的“邑”也可作“予”（參《漢印文字徵》⑯ 7·20 上、9·8 下、4·6 下，《漢印文字徵補遺》7·6 上）。由此可見，“邳”釋為“序”字，從其構形來看應該可信。《集韻》上語：“序，《說文》東西牆也。或作序。序。”然則“序”亦即“序”字之異構。⑰

《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東西牆之序。”郭璞註：“所以序別內外也。”邢昺疏：“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所以次序分別內外親疏，故謂之序也。《尚書·顧命》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及《禮》經每云‘東序’、‘西序’者，皆謂此也。”《顧命》偽孔安國傳：“東西廂謂之序。”知“序”指堂屋隔開東西廂之牆，亦可指由序隔開之東西廂房（亦稱東堂、西堂）。⑱ 上揭“帝篇”的“右邳（序）”、“左邳（序）”即“右序”、“左序”，相當於《禮》經所云“東序”、“西序”，指堂屋的東西序牆。字作從“土”形，或為此用之專字。舊說讀“邳”為“宅”、為“堵”，均不確。或有釋“邳”者，⑲ 更是不妥。

又簡文“筑（築）小內，大人死”的“小”，原簡如此，整理小組徑錄作“大”，蓋涉下句“大人死”而訛。“小內”亦見“相宅篇”（23 背肆，19 背伍）均指小室。

## 二、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十則

(一)

《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執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開子，閉丑。（1）

按：天水放馬灘秦簡的圖版儘管祇有少量公佈，<sup>②①</sup>對於校讀甲種《日書》的釋文仍大有幫助。此簡“執”實為“摯”字誤釋，睡虎地簡亦作“摯”。下文除“行遠必執而于公”（19）中的“執”以外，其餘釋“執”字均當改釋為“摯”。“彼”，通“破”。何雙全說：“彼，應是破。破為輕唇音，‘古無輕唇音’，古讀破為彼，用重唇音讀出。”<sup>②②</sup>其說誤甚。事實上古代“彼”是幫母字，“破”是滂母字，幫、滂均屬重唇音，輕唇音指的是以“非、敷、奉、微”為聲母的字。

(二)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建日，良日矣。可為齋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六生，不可入黔首。（13）

按：據已公佈圖版，“矣”實“毆”字誤釋，睡虎地甲種《日書》此條作“也”（14正貳），“毆”通作“也”。下文除“其一人已死矣”（27）中的“矣”以外，餘“矣”字均當改釋“毆”，又下文“女子也”（23）中的“也”亦為“毆”字誤釋。“可以畜六生”，其中“六”為“大”字誤釋。“大生”即“大牲”，《易·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左傳·僖公十九年》載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是其例。

(三)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除日，逃亡，不得。癘疾，死。可以治齋夫，可以瘵言，君子除罪。（14）

按：據已公佈圖版，“瘵”實“徹”字誤釋。睡虎地甲種《日書》此條作：“除日，臣妾亡，不得。有癘病，不死。利市責（積）、勞□□□除地、飲樂。攻盜，不可以執。”（15正貳）其中雖字有殘損，但亦有“勞”，與“徹”



通。“有瘡病不死”與此條“瘡疾死”相反。

#### (四)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盈日，可築閭牢，可入生，利築宮室，為小畜夫。有疾，難療。(15)

按：“療”實為“瘳”字誤釋。睡虎地甲種《日書》此條作：“盈日，可以筑（築）閭牢，可以產，可以筑（築）宮室，為畜夫。有疾，難起。”（16正貳）“產”通“瘳”，上或脫“入”字，“入瘳”與“入生（牲）”同。又“瘳”與“起”義同，均指疾病痊愈。②

#### (五)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庚亡，其盜，丈夫矣。其室在北方，其悒扁也，其室有黑犢男子，不得。(28)

按：據已公佈圖版，“矣”當釋“毆”，“其悒扁也”當釋“其庑扁匪”。“庑”即“序”字，說見上文“一之（五）”，在此處簡文中疑與前引《尚書·顧命》同，亦指堂屋兩側的東西廂房。“扁匪”應讀為“匾匱”，“匪”通“匱”，猶地名“膚施”戰國貨幣文作“膚虎”、複姓“公施”秦漢印中作“公虎”，記時的“日施”秦漢簡帛中或作“日毗”、“日虎”，③均其徵。“匾匱”是疊韻連語，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纂文》云：匾匱，薄也。今俗呼廣薄為匾匱，關中呼婢匱。”亦寫作“婢槐”、“婢檟”等，有卑下之義。④“其序匾匪”指廂房低矮窄小。又“犢”原實作“犢”，“其室有黑犢男子”，睡虎地乙種《日書》此條作“其人犢黑”（259，整理小組釋文作“犢”，《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註釋255頁）可資比較。

#### (六)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丑，牛矣。以士，其盜從北方，憊大息。盜不遠，勇桑矣，得。(31)

按：此簡原公佈圖版不甚清晰，但同出乙種《日書》中亦有此條（《書法》1990年4期25頁），二“矣”字作“毆”，“勇”作“旁”，原釋文應據改。

“旁”的這種寫法在秦漢文字資料中屢見，過去亦往往誤釋為“勇”。②“旁桑”，指靠近桑林，在桑林附近。又“北方”後當有脫文。

(七)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已，難矣。以亡，盜者中人矣。臧困屋屎糞土中、蹇木下。其為人小面，長赤目，賤人矣。得。（35）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書法》1990年4期27頁），三“矣”均作“毆”，“屎”作“展”，“蹇”作“圈”原釋文應據改。“展”，《說文》尸部：“一曰屋宇。”段玉裁註：“與宀部宸音義同。”宀部：“宸，屋宇。”段玉裁註：“屋者以宮室上覆言之，宸謂屋邊。”朱駿聲通訓定聲：“宸謂屋檐。”“展”又見下文“酉鷄毆”條“甬在困屋東展水旁”（39），“甬”“展”原釋文誤，今據乙種《日書》圖版改正（《文物》1989年2期圖版陸，乙231，《書法》1990年4期39頁），用法相同，均指屋宇、屋檐。又睡虎地甲種《日書》“已”條說“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74背），疑此簡“長赤目”當作“長而赤目”，原脫“而”字。

(八)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午，馬矣。盜從南方入，有從之出，臧中廐廡多十□□□（36）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從原釋文看竹簡下端有殘損，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書法》1990年4期26頁），作“午，馬毆。盜從南方入，有從之出，甬中廐蜀橐中。為人長面、大目，喜疾行，外人□（毆）。”末一字圖版剪去未印出。“甬”在簡文中與“藏”義同（說詳下文），故原釋文“臧”是否有誤，因未見原圖版無法確定，而“矣”及“廡多十”以下未釋出字當據以補正。

(九)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未，羊。盜者從南方，有從出，尔在牢圈中。其為人小頸、大腹、出目，必得。（37）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文物》1989年2期圖版陸、乙229，《書法》1990年4期27頁），“有從出”作“有從之出”，“有”通“又”，寅下“有從之”（32，原脫“出”）、辰下“有從出”（34，原脫“之”）同此；“腹”作“復”，同音通借，阜陽漢簡《萬物》中魁蛤別名“復纍”（W049）也寫作“腹纍”（W011），<sup>②6</sup>例同；“尔”作“𠄎”，本書子、寅、辰、巳下皆稱“臧（藏）”，另午、未、申、酉、戌、亥下均稱“𠄎”（原釋文或誤釋為“尔”），從文例看，簡文“𠄎”顯然就是“藏”的意思，何雙全因誤釋而將此字屬上讀，<sup>②7</sup>殊誤。“𠄎”見《說文》聿部：“𠄎，并舉也。”又人部：“𠄎，揚也。”木部：“𠄎，銓也。”“𠄎”、“𠄎”本一字異構，後各有專用而分為二字，有揚舉意，文獻中往往借用“𠄎”字。而稱舉之“舉”古有藏義，《墨子·耕柱》：“鼎成，三（四）足而方，不飲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舉亦藏也。《周禮·夏官·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註：“賓客來朝聘布皮幣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舉藏，同義連用。<sup>②8</sup>蓋“𠄎”有舉意，而“舉”有藏意，“稱舉”又多連用，展轉相因滲透，“𠄎”也就有了藏義。“𠄎”之藏義，似僅見於放馬灘簡《日書》，目下諸辭書並未言及此義項。今釋出用作藏義的“𠄎”，可補辭書釋義之未備。又據《日書》文例，“羊”下疑漏抄“毆”字，“從南方”下疑脫一“入”字。

#### （十）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條：

申，猴矣。盜從西方，尔在山谷。為人美。不擒。名曰環。遠所矣，不得。（38）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文物》1989年2期圖版陸、乙230，《書法》1990年4期25—26頁），二“矣”字作“毆”，“尔”作“𠄎”，“擒”作“𡇗”，原釋文應據改。“猴”作“石”，睡虎地簡甲種《日書》“盜者篇”言“申環（猿）也”（77背），“十二支占卜篇”作“申石也”（91背壹）與此同，這可能反映了當時流行的兩種不同說法，其間關係待考。“不擒”，睡虎地甲種《日書》“十二支占卜篇”中“申石也”條下言：“其咎在二室，生子不擒。”（91背壹）寫法相近。原整理小組將“不擒”讀為“不全”，說：“生子不全，亦見《法律答問》。”（《睡虎地秦墓

竹簡》釋文註釋 222 頁。按《法律答問》的相關內容見 109 頁)“不全”亦見睡虎地甲種《日書》“盜者篇”，“寅虎也”條有言“不全於身”(71 背)、“午鹿也”條有言“其身不全”(75 背)、“亥豕也”條有言“其面不全”(80 背)，用法相同。又從上下文例看，“盜從西方”後當有脫漏。

### 三、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二則

#### (一)

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釋文<sup>29</sup>開頭部分有如下一段：

甲子之舍始東南以馮，行廿歲而壹周，壹周而刑德四通，六十歲而周，周於癸亥而復從甲子始。(4—5 行)

按：此《刑德》乙本的圖版被選入《馬王堆漢墓文物》<sup>30</sup>一書，其中“以馮”二字僅殘存部分筆畫，舊有釋文闕如，此處釋文蓋據同出《陰陽五行》乙篇補釋。“馮”字在《陰陽五行》乙篇圖版<sup>31</sup>中清晰可辨，實為一“左从川右从馬”的“馮”字，並不從“水”，釋文作“馮”當誤。今謂“馮”應即“馴”字異構，將左右偏旁互換位置這一現象，在秦漢文字中亦多有用例。漢私印有“張馮私印”，《漢印文字徵》把“馮”與“馮”字混同(10·3 上)，劉樂賢釋“馴”，<sup>32</sup>可信。印文寫法與帛書相同，可資比較。《說文》馬部：“馴，馮順也。从馬川聲。”《集韻》去聲二十四燮：“馴，順也。《易》馴致其道，徐邈讀。”“馴行”一詞，文獻數見，均指善行，與此《刑德》乙本文義不協。“馴行”當讀為“順行”，與“逆行”相對。《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張守節正義引《天官占》：“歲星順行，仁德加也。”《後漢書·天文志下》：“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慧。”庾信《象戲賦》：“取西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鐘而順行。”均其例。然則上引《刑德》乙本釋文“行”宜上讀。

#### (二)

帛書《刑德》乙本釋文中有如下一段：

朝日甲乙發；食時丙丁發。……行中，戊己發，日兇，庚辛發。夕，壬癸發。此皆至其日發。(76—77 行)

按：“日兕”之“兕”，在《馬王堆漢墓文物》圖版所附釋文中闕釋，此蓋據劉樂賢說補釋。<sup>③</sup>實際上，“日兕”之“兕”應釋為“兒”，睡虎地甲種《日書》“兕席”（《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166頁，157背），馬王堆帛書乙本《老子》“陵行不辟兕虎”（《馬王堆漢墓帛書[壹]》<sup>④</sup>圖版186上），《孔宙碑》“稱彼兕觥”（《隸辨》3·9下）中的“兕”字，寫法與《刑德》乙本“日兒”的“兒”有明顯的差異，可見原釋“兕”不確。

上引《刑德》文以五個時段占卜發兵的吉凶，“日兒”當讀為“日睨”，《玉篇》日部：“睨，日眚。”《集韻》上聲十一霽：“睨，日眚。”則“日睨”即指日眚。劉樂賢雖誤認“兒”字，但指出：“日睨”這一時段“就是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日眚，亦即賈誼《鵬賦》中的日施，都是日斜的意思”，非常正確。

《莊子·天下》：“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陸德明釋文：“睨，音詣。李云：睨，側視也，謂日中而景已復昃，謂景方昃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昃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為前後，始終無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也。”此文“中”、“睨”對言，分別指日中、日昃，作為時段名相當於睡虎地甲種《日書》的“晝”、“日昃”，放馬灘甲種《日書》的“日中”、“日失（眚）”，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篇的“晝”、“眚（眚）”<sup>⑤</sup>《刑德》乙本的“行中”、“日兒（睨）”，而先秦秦漢文字中“从目”與“从日”往往相混同，<sup>⑥</sup>因此作為日昃、日斜之稱的“睨”很可能是“睨”字形訛。

#### 四、羅泊灣一號墓《從器志》二則

##### （一）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sup>⑦</sup>圖版四一本牘《從器志》正面第五欄有如下一條：

揜、越築各一。

“築”通“筑”。“揜”，原報告將它隸定作“掬”，說：“掬字不識，從與越築并列看，可能是一種樂器名稱。”（82頁）

按：“揜”字右半偏旁與第二欄“金人二在中”、“金臚(?)一繒囊”及



第五欄“金壺繒緣其籃”諸條的“金”字寫法相同，釋為“揜”字應該沒有問題。《散見簡牘合輯》<sup>③⑩</sup>釋文改作“揜”（128頁），可信。《說文》手部：“揜，急持揜也。从手金聲。揜，揜或从禁。”上引木牘《從器志》中“揜”與“越筑”並列，且次於“大畫鼓——繒囊”條之後，可知原報告雖未識“揜”字，但認為是一種樂器名稱，則非常正確。今謂“揜”當是“琴”之同音借字。《說文》琴部：“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𦹇，古文琴从金”。以“禁”釋“琴”屬聲訓，古文“琴”从“金”為疊加聲旁，因此將“揜”讀為“琴”，顯然是合理的。《急就篇》卷三：“竽瑟空侯琴筑箏”，亦“琴筑”並列，可為佐證。

此墓出土的隨葬器物中確有三種樂器，其中標本M1：359，原報告稱“存一排十二隻弦孔……此孔向下，垂直橫向側出。此器因不同於一般琴瑟，暫名之為十二弦樂器。”（63頁）現在看來，此所謂“十二弦樂器”雖與通常的五弦或七弦琴不同，但顯然就是《從器志》所載的“揜（琴）”。戰國初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與戰國晚期的長沙五里牌楚墓均出土有十弦琴，<sup>③⑪</sup>秦漢之際的羅泊灣墓出十二弦琴，不足為怪。琴之十二弦當與十二律呂有關。

## （二）

木牘《從器志》背面第三欄“倉器志”下有如下一條：

燭徵一。

原報告說：“徵假為檠，燭檠即燈臺。”（84頁）

按：“徵”、“檠”二字古音不同，“徵”是蒸部端母字，“檠”是耕部群母字，原報告說：“徵假為檠”，顯然不妥。今謂“燭徵”實應讀為“燭鐙”，就是隨葬器物中標本M1：8銅燈（圖版二二：4）。“鐙”古音在端母蒸部，與“徵”同音。且古代“登”或“从登”字與“徵”或“从徵”字往往通假，《尚書·堯典》“舜生三十徵庸”，魏正始石經作“登”；《禮記·中庸》“雖善無徵”、“徵諸庶民”，鄭玄註：“徵，或為證。”《說文》水部“从水徵省聲”的“激”字，《玉篇》等字書或作“激”（此形亦見漢度恭等字殘石，《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794頁）、“澄”，複姓“登徒”，楚璽印中作“徵徒”，<sup>③⑫</sup>均其比。

《說文·金部》：“鐙，錠也。从金登聲。”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

鐙。”今通行字作“燈”。漢《鼎胡宮鐙》銘：“藍田鼎胡宮銅行燭登。”“登”即“鐙”之借字，④以“燭登（鐙）”連言，與木牘《從器志》一例，可見我們將“燭徵”釋讀為“燭鐙”，是可信的。

## 注 釋

-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② 羅福頤編，文物出版社，1982年。
- ③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 ④ 參拙文：《釋楚器中的人名“赤目”、“墨胥”》，《江漢考古》1995年4期。
- ⑤ 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秦漢簡牘論文集》1—6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原釋文無標點，均引者所加；又釋文誤釋字引用時均已據相關圖版作了更正。
- ⑥ 此字或以為即《說文》“頽”，見陳振裕等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97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又見於漢印“公頽加印”、“公頽析”印，《漢印文字徵》也釋“頽”（9·3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將後例改釋“頽”（1083頁），前例仍釋“頽”（634頁）。按釋“頽”於形不合，“公頽”為複姓，待考。
- ⑦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本文引用睡虎地甲、乙種《日書》分篇多據此書。
- ⑧ 參黃錫全：《汗簡注釋》49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 ⑨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3年。
- ⑩ 康殷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 ⑪ 參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之十二“無智”，《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277頁，中華書局，1989年。
- ⑫ 羅福頤主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⑬ 《先秦文字中的“縣”》一文有此說，《文史》第二十八輯，58頁注②。
- ⑭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⑮ 說見拙文：《漢印文字叢釋》之十四“釋鄧”，《西泠藝叢》1990年1期13頁。
- ⑯ 羅福頤編，文物出版社，1978年。
- ⑰ 朱德熙先生《長沙帛書考釋（五篇）》涉及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歇茅屋而塌(?)之”的“塌(?)”字，可能也應釋為“埒”即“序”字。見《朱德熙古文字

論集》207—208頁，中華書局，1995年。

- ⑮ 參業師錢小雲(玄)先生《三禮通論》170—171頁，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⑯ 說見陳振裕等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81頁。
- ⑰ 分別見《文物》1989年2期圖版伍、圖版陸，24頁圖一，《書法》1990年4期封面，21—35頁、38—39頁(剪貼釋文多有誤)。
- ⑱ 見《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秦漢簡牘論文集》10頁。
- ⑲ “起”字，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34頁注〔八〕。
- ⑳ 說詳拙文：《說先秦秦漢文字中的“虎”及“从虎”字》，待刊。
- ㉑ 參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補正》“五·卑虎”條，後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123頁。
- ㉒ 參拙文：《古璽印考釋五篇》之四“騏涉洋”，《印林》1995年2期(總92期)；《兩漢官印雜考》之九“納功旁校丞”及附記，《印林》1996年4期(總100期)。
- ㉓ 說詳拙文：《阜陽漢簡〈萬物〉補釋》，待刊。
- ㉔ 同⑲，13頁。原“環遠所矣”連讀亦誤。
- ㉕ 說參蔣禮鴻：《義府續貂》(增訂本)：7—18頁，中華書局，1987年2版。
- ㉖ 此處所引據陳松長《帛書〈刑德〉乙本釋文校讀》，《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83—8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㉗ 傅舉有、陳松長編著，湖南出版社，1992年。
- ㉘ 《陰陽五行》乙篇部分圖版，收錄於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中，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 ㉙ 見《秦漢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91年6期。
- ㉚ 劉說見《馬王堆漢墓星占書初探》，《華學》第一期，117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 ㉛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
- ㉜ 參⑲引拙文。
- ㉝ 參⑲引《古璽印考釋五篇》之二“長栢如”。
- ㉞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③ 李均明、何雙全編，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④ 參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384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⑤ 詳拙文：《釋戰國楚璽中的“登徒”複姓》，《文教資料》1997年4期。
- ⑥ 見容庚：《金文續編》附《金文續編採用漢器銘文》14頁下，商務印書館，1935年。

# 秦至漢初簡帛形近字辨析

黃文傑（中山大學中文系）

秦至漢初簡帛文字全面隸變，字形大量混同，給文字釋讀和內容理解帶來了不少困難。混同的字看似相同，但彼此字形往往有着細微的差別。同一個字在不同墓葬、或者由同一墓葬的不同寫手寫出或有不同，甚至同一寫手所作也可以互異。對它們進行認真區分和仔細辨析是很有必要的。其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是“同中辨異”的方法。<sup>①</sup>這一方法是通過對一組組形體相近的字進行仔細的辨析，區分出每組字的各個字之間形體的差別，進而糾正以往把形體近似的兩字混為一字的錯誤。

從古文字的發展史上看，字形的混同現象確實存在於古文字發展演變的各個階段之中。在先秦時期，由於人們靠手抄、憑記憶傳授文字，沒有字書可作依據，因此，發生字形的混誤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戰國中後期至秦漢時期，漢字隸變，字形的混同現象更為突出。簡帛文字使用於民間，在由篆文的圓轉綫條變為隸書的平直筆劃、字形抽象化、符號化的同時，混同的字和偏旁也大量出現。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了這現象，如陳夢家先生在《漢簡綴述》一書中談到武威漢簡時指出：“漢人寫字，竹頭的字往往寫成艸頭，此簡亦然。形近的字，筆劃寫得混淆不分，如人與入，告與吉，士與土，賓與賓、在與左、興與與，交、丈、立、文等字，往往混成一形。”<sup>②</sup>對秦漢簡帛文字中由於這種現象而出現的形近字加以分辨和研究，無論對正確理解簡帛文意，避免釋讀上的錯誤，還是對校讀古籍，都有着重要作用。本文試圖運用“同中辨異”的方法，對秦至漢初簡帛一些形近字加以辨析（兼及其它有關的戰國秦漢文字），並對釋讀中不同的意見進行商榷。

## 一、“衣”“卒”辨



“衣”與“卒”字形混同的現象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殷墟甲骨卜辭有“于𠂔卒”之語，“卒”寫作“𠂔”；③周原2號卜辭有“衣翼子”之語，“衣”作𠂔。④戰國文字中楚簡“衣”寫作“卒”字的現象比較突出，有的在衣上加一點，有的加一小橫，作為飾筆，如：《長臺關簡》第2組第5號簡“衣”或作𠂔，第5、第19號簡“裏”或作𠂔，第17、19號簡“裊”作𠂔；《仰天湖簡》第1、4、29、38號“衣”均作𠂔，第21、33號簡“衣”均作𠂔。⑤

《包山楚簡》197號簡有“盡𠂔歲”一語，中間一字作𠂔（簡199、簡201也有此形），其釋文釋作“卒”（32頁），注云：“疑為卒字異體。卒，《爾雅·釋詁》：‘盡也’。卒歲，盡歲，指一年。”（53頁）但在字表處卻釋作“𠂔”（圖版140），前後所釋不一致。研究者對此字也有隸釋作“𠂔”與“𠂔”二種意見。曾憲通老師將此字隸作“𠂔”，認為即“狄”字，在簡文中讀作“易”，“易歲”訓“次年”。⑥陳偉先生同將此字隸作“𠂔”，讀為“萃”，將“𠂔（萃）歲”解釋為周歲。⑦何琳儀先生把此字隸作“𠂔”，讀“𠂔歲”為“易歲”，指第二年。⑧袁國華先生從之。⑨筆者認為，以上意見所釋文意都通暢，祇是對字形的隸定不同，此字隸作“𠂔”更忠實於原字形，無須以“一”作為羨畫釋之。《包山楚簡》167號簡有𠂔字，釋文釋作“遂”。按，此字實從“𠂔”，應隸釋為“遂”，在簡文中作人名用。




燕系文字“卒”字有寫作“衣”者，如“萃”字，鄧王職戈作𠂔（《三代》19·42·2），但鄧王職戟作𠂔（《三代》20·15·2），後者從“衣”非從“卒”。


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中，“衣”加一點或一橫作為飾筆的例子似極少見。⑩有幾處寫作“卒”形的，有的被釋作“衣”，其實都有待商榷。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生篇”242號簡之𠂔字，整理小組釋為“衣”，與下一字𠂔并釋為“衣常”。從字形看，釋“衣常”是有問題的，且在所在文句“壬辰生，必善醫，衣常（裳）”中讀不通，與《日書》甲種異文“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劍”也絕然不同。劉樂賢先生對此有相同的看法，他指出：“此處‘衣常’二字的釋讀尚有可疑之處，前一字的寫法與‘卒’相同；後一字比‘常’少兩點，是否為‘常’的異體或壞字，還有待於進一步論證。”⑪劉先生的態度是謹慎的。據我們統計，睡虎地秦簡中有107個“衣”字，加上從“衣”的字共有200餘字，僅此一例寫作“卒”，餘者皆作“衣”，而27個“卒”，皆作“卒”，沒有例外。可以說，在睡虎地秦簡中“衣”和“卒”的寫法是涇渭分明的。

這說明“衣”寫作“卒”的現象在睡虎地秦簡中已不復存在。因此，此字釋“衣”確有問題。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278號簡：“倅險增（增）壘，諱戒毋動。第一字作倅。整理小組釋“倅”，注“疑當讀為萃，止也，處也。萃險猶言據險、依險。”<sup>⑫</sup>張震澤、李均明先生均從之，張震澤先生進一步解釋說：“蓋謂聚軍於險阻之處而增高壁壘。”<sup>⑬</sup>陳偉武先生從同形字的角度釋為“依”。<sup>⑭</sup>按，從文意看，此字釋“依”文從字順，比釋“倅”更勝一籌，但從形體考察，秦和漢初簡帛文字“衣”寫作“卒”的現象確實少見，釋“依”或可視為楚簡文字“衣”可寫作“卒”這一現象的孑遺。

## 二、“吉”“告”辨

“吉”字甲骨文作（《鐵雲藏龜》1591），于省吾先生認為象句兵之形。<sup>⑮</sup>在秦至漢初的簡帛文字中，“吉”字所從“士”二橫畫等長，起筆處稍為加重，但收筆處平平，無翹起之形，如吉（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30號）。而“告”字，甲骨文作（《殷虛文字甲編》1581），黃錫全先生認為此字上部屬“牛頭象形”。<sup>⑯</sup>“告”字發展到秦至漢初時，上部有的仍可看出牛頭之形，如告（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39號），上邊仍是二筆，從左右作弧形向中間聯結；但有的已將二筆連為一橫畫作一形，如告（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136號），然而上面這一橫畫一般比第二橫畫畧短，且收筆處畧為翹起。第一畫的長短和筆勢的平或翹可以看作“吉”與“告”兩字的區別性特徵。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24號簡背面有“詰咎”二字，“詰咎”在傳世文獻中常作“誥咎”，第一字究應釋何字？根據“吉”與“告”兩字的區別性特徵，睡虎地秦簡此處第一字作，字之右旁兩橫畫等齊，也無翹起之形，因此應釋“詰”而非“誥”，整理小組所釋不誤。關於這個問題以及文獻中“詰咎”常誤為“誥咎”的現象，劉樂賢先生在其所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一書中已有較為詳細的疏證，<sup>⑰</sup>茲不贅。

馬三堆帛書《六十四卦·蒙卦》15行：“【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參攢，攢即不吉。利貞。”通行本作：“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即不告。利貞。”有的研究者認為通行本兩個“告”


字應從帛書本改為“吉”，⑮有的則認為應以通行本為正，把帛書本的“吉”改為“告”。⑯按，這二字均作吉，上邊兩橫畫等齊，根據“吉”與“告”兩字的區別性特徵，應釋“吉”而非“告”。況且《六十四卦》是部數術書，用“吉”、“不吉”作為斷占詞是很常見的；廖名春先生《帛書〈繆和〉、〈昭力〉簡說》一文也指出：馬王堆帛書《繆和》第八段稱引和解釋此條卦辭，兩個字皆作“吉”，⑰由此可證卦文兩字以釋“吉”為是。



滿城漢墓銅杯銘文有“中山府第吉昌”之語⑱，後一字《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收在“鵠”字條（251頁），旁注“見爾雅”。裘錫圭先生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讀後記》一文中指出：此字“左旁寫法與249頁‘鵠’字條中欄所收‘相馬經’一例全同，應釋為‘鵠’”。⑲按，裘先生所指馬王堆帛書《相馬經》六八上之字作吉昌，根據上述簡帛文字“吉”“告”的區別性特徵，滿城銅杯此字左旁上部兩橫劃等長，與《相馬經》該字左旁第一橫劃比第二橫劃畧短且兩橫起之形稍異，故恐怕還以釋“鵠”為妥。

### 三、“勿”“彡”辨

“勿”“彡”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中形體近似。“勿”，先秦文字作𠄎（《殷虛文字甲編》640）、𠄎（孟鼎）、𠄎（石鼓文、吳人）等，郭沫若氏曰：“勿乃笏之初文。古人於笏上書事以備忘，字正象其形。”⑳在睡虎地秦簡的法律文書中，“勿”字及偏旁“勿”一般寫作𠄎，字中間的一撇較長且與彎曲一畫相接，左右二撇較短且斷開，筆序是先中間一撇，再左右兩小撇。這一寫法顯然是來自秦系文字的。然而個別被草寫作彡，左右二小撇與彎曲的一筆也相接上了，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這種寫法較為明顯，如《日書》乙種48號“陽”字所從、64號“勿”字等。“彡”，金文彡𠄎作彡，在睡虎地秦簡的法律文書中一般寫作彡，三撇等長且大多與彎曲的一筆相接，如《秦律十八種》55號“參”字所從、71號“繆”字所從等；有的被草寫作𠄎，在《日書》中尤其明顯，如《日書》乙種88號“參”字所從、157號“參”所從等。這樣，“勿”的草寫形體（數量很少）與“彡”就非常接近了。但兩者之間也有細微的差別。一般而言，前者的三撇較長，而後者的三撇較短。

睡虎地秦簡《效律》42號簡：“官府臧（藏）皮革，數飭風之，有蠹突者，貲官嗇夫一甲。”“風”前一字，整理小組隸定為“飭”，讀作“煬”，注

云“曝曬”。《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在“字表”部分釋為“楊”，旁注“見集韻”（486頁），在“文句”部分則釋為“楊（楊）”（1354頁）。裘錫圭先生指出：“既認為上引簡文本應是從‘易’聲的字，就不應把它釋為從‘易’聲的‘楊’。”<sup>②4</sup>吳振武先生根據昭明鏡“穆”字作等，認為《效律》42號簡這個字應該是“穆”字，考證曰：古“穆”是明母覺部字，“暴（曝）”是并母藥部字，二字音近，疑“穆風”應讀作“暴（曝）風”，即曝曬風吹的意思。<sup>②5</sup>筆者認為，這一意見似有可商榷之處。此簡所在的《效律》簡是睡虎地秦簡中寫得最為規範的一種書，其中的“勿”字及偏旁“勿”，其寫法一般作左右二小撇與彎曲的一筆斷開，此字所從也屬此例，故此字右下應是從“勿”。此字右下三撇較長，也可以看出是“勿”，而不是三撇較短的“夂”（“穆”字右下與“夂”形近）。筆者對有關的字作了統查，發現在睡虎地秦簡中，“易”及從“易”的字共出現24例，“楊”及從“楊”的字共出現87例，而沒有“穆”字。此字如釋“楊”，則在睡虎地秦簡中有大量相同的字形可資佐證，如釋“穆”，則是孤例。另外，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中，似未見到“穆”字是這樣寫的。從文意考慮，兩說均把此字讀作“曝曬”之“曝”，所釋相同。因此，筆者認為此字似仍釋“楊”為妥。

馬王堆帛書《明君》442行有“使地工”、444行有“使天下工”之語。“工”下一字，整理小組釋“畋”，注云：“工畋疑讀為攻畝，謂治田畝。銀雀山漢墓所出竹簡《孫子》佚篇《吳問》亦以畋為畝。《管子·乘馬數》：‘此齊力而功地’，功地尤攻畝，皆言修治田畝。”《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把此字列在“畝”字條，則認為是“畝”的異體。裘錫圭先生認為此字的右旁與該書“軫”字條中欄第一行諸例同，應是“畋”字。<sup>②6</sup>按，“勿”與“夂”在老子甲本及卷後佚書中字形已相混，但442行此字右旁還能看出中間一撇較長，左右兩撇較短的迹象。應該承認，從字形考慮，此字釋“畋”或釋“畋”均可。從字義方面考慮，整理小組把“工畋”讀作“攻畝”，訓“修治田畝”，在“使天下工畝”一句中讀起來文從字順，但在“使地工畝”中則扞格難通。如果釋為“工畋”，於文意看似更為順暢。“工”有精義，《後漢書·蔡倫傳》：“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畋”有界限之義，《小爾雅·廣詁》：“畋，界也。”“使地工畋”意即使土地得到精耕細作，井然有條。“使天下工畋”指使天下井然有序，即大治之象。又銀雀山漢簡《孫子



兵法》156、158、159等簡的“𠂔”均釋為“眈”，由此看來，上揭《明君》此字應釋為“眈”。

#### 四、“大”“六”辨

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中，“大”一般作𡗗，“六”作𠂔，雖均是四筆，但寫法不一樣。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13號簡：“建日，良日矣，可為齋夫，可以祝祠，可以畜父生，不可入黔首。”“生”上一字，《釋文》誤釋作“六”，《秦文字類編》也承其誤。<sup>⑳</sup>按，從字形看，此字明顯應釋為“大”，簡文“大生”當讀為“大牲”。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59行“用大生，吉”，今本“生”作“牲”。《論語·鄉黨》：“君賜生，必畜之。”《經典釋文》：“魯讀生為牲。”“大牲”意指牛、羊等大的牲畜。《左傳·僖公十九年》“小事不用大牲”。

在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中，“大”作𡗗，是三筆；“六”一般作𠂔，是四筆，個別又作𡗗，也是三筆。區別在於“大”的筆畫是連接的，字形較為方正；而“六”的撇與上面一橫一般是斷開的，捺則絕對斷開，且字形較為扁平。

馬王堆帛書《經法》第四章，釋文原題為“六分”，李學勤先生通過對字形和文義的分析，提出章題應改為“大分”之說。字形方面，李先生對“大”和“六”進行了詳細的分辨和研究。他認為，帛文28行下“主上者執六分以生殺”中“分”上一字，與28行上的“六順六逆”兩個“六”字頗有不同，上面是一橫，左面的撇是接連的，右面的捺則是斷的，總的說來，應是“大”字。他又指出，章末35行下的標題作“大分”的第一字，實是三筆，其末筆是接連的，無疑是“大”而不是“六”字。<sup>㉑</sup>筆者查看帛文28行下“分”上的那個字，認為此字寫法雖與28行“六順六逆”兩個“六”字稍有不同，但從筆勢看，此字撇和捺與上面一橫實均是斷開的，且字形較為扁平，似仍釋“六”為妥。

馬王堆帛書《十六經》篇末標題（142行上），究竟應釋“十大經”，還是“十六經”，尚未有定論。<sup>㉒</sup>帛書釋文發表時原釋為“十大經”，後改為“十六經”。裘錫圭先生在《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一文中說：“‘十六經’過去釋作‘十大經’，張政烺先生對帛書‘六’‘大’二字的字形作了仔細對比，認為‘經’上一字是‘六’而非‘大’，今據張先生的意見改正



(編按：細按字形，恐仍當釋為‘十大經’)”<sup>③①</sup>可見裘先生的最終意見是釋為“十大經”的。李學勤先生指出，此字“系三筆，末筆斷開，與上述《大分》章二八下的‘大’一樣。再看和此字距離不遠的一三七上、下有‘大’字，除末筆接連外，與此相似，而在一四二下的‘六’字殘筆，則作四筆，因此，此字仍應釋‘大’。”而且，李先生把此三字讀開，《十大》作為《經》篇最末一章的標題。<sup>③②</sup>按，此字字形寫作六，其先寫一橫後，次寫的一撇是從橫的上部撇下橫的下左，然而最後一捺筆確實是與橫和撇斷開的，雖然寫法與上述28行下“分”上那個字稍為不一樣，但仍以釋“六”為是。此字與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252行下“二千四百廿六”之“六”字寫法完全一樣。筆者進一步普查與《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出於同一寫手的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所有“六”字均與《十六經》142行上此字相同，無一例外，而“大”字無論在《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還是《刑德》乙本，三筆筆畫都是緊密連接的，沒有一例是分開的。再看字體與《老子》乙本相同的帛書《五星占》，（見《馬王堆漢墓文物》）“六”字除作六外，也作大。故此可以斷定，《十六經》142行上此應釋為“六”而非“大”。<sup>③③</sup>

上文對秦至漢初簡帛幾組形近字進行了辨析，並對有爭議的字談了粗淺的看法。除此之外，本時期簡帛文字還存在着大量形近混同的字，初步統計有：人與入、王與玉、七與十、氏與民、<sup>③④</sup>早與旦、卯與卯、先與无、赤與炎、周與田、久與夊、弘與引、己與乙、入與大、丹與舟、日與月、月與目、月與夕、月與勻、月與肉、肉與口、比與从、三與气、泉與宗、由與囟、父與又、夫與无、正與足、疋與足、兔與象、魚與焦、私與和、弋與戈、夏與憂、永與光、甚與是、士與出、出與土、出與之、土與士、之與土、夫與失、手與牛、生與主、束與夾、亦與夾、玉與壬、豐與豐、肯與骨還有日、曰、白與甘等等。這樣一組組的字，形近易混，但一般同中有異，可以辨別。如“卯”填實而“卯”中空，如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105行“鷄卵”之“卯”作北，而208行“辛卯”之“卯”作𠂔；“先”橫畫上短下長，而“无”二橫畫等長，如帛書《刑德》乙本42行“先舉事者”之“先”作𠂔，而44行“无後央”之“无”作𠂔。“出”字二橫畫等長，“之”字二橫畫上短下長，如《刑德》乙本62行下“主人出”之“出”作𠂔，而71行下“雨壓之”之“之”作土。

秦至漢初簡帛文字混同的原因，部分是自古已然，如“七”與“十”、“王”

與“玉”、“比”與“从”等；部分是漢字由篆變隸的過程中產生的，如“出”與“土”、“束”與“夾”、“私”與“和”等。許多字完全是由於形近而混同，在傳世文獻中也能找到相同的例子。如王念孫糾正《戰國策·齊策》誤“失”為“夫”例。《戰國策·齊策一》：“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王念孫曰：“（《齊策》）‘夫齊’當為‘失齊’，字之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曰：‘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sup>④</sup>

以下是筆者初步研究本時期簡帛文字混同現象的幾點認識：

1. 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中，絕對的同形字是極少的，形近易混的字則比較多，一般情況下它們是可以區分的。

2. 判斷兩字是否混同，一是要有時代觀念，比如戰國楚簡“衣”加羨畫寫作“卒”的現象，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中就很少見；二是對同個時代字形的混同現象要注意量的統計，看是普遍現象，還是個別現象。對個別現象宜以寫錯字處理為好，不宜用混同現象解釋之。辨析形近字，最終應以文義為依歸。

3. 在辨析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形近字時，我們要充分重視古文字資料的可靠性，如上述第二條《六十四卦·蒙卦》中的“吉”與通行本的“告”兩字，應以帛書為主要依據釋為“吉”，當然也要考慮其他方面的證據。<sup>⑤</sup>

## 注 釋

① 吉林大學吳振武教授曾以“論同中辨異的研究方法——以戰國文字為例”為題作專題報告，筆者有幸旁聽，深受啓發，並運用於研究秦至漢初簡帛文字。

② 見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第311頁。

③ 見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禕”》，《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裘先生認為，已發表的殷墟卜辭中的所謂“衣”，除去一些辭義不可解的，都應該釋讀為“卒”。

④ 見徐錫臺：《周原出土卜辭選釋》，《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5頁。

⑤ 上述楚簡引例均見商承祚先生編著《戰國楚竹簡匯編》，齊魯書社1995年。

- ⑥ 見曾憲通：《包山卜筮簡考釋（七篇）》，《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第405頁。
- ⑦ 見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53頁。
- ⑧ 見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
- ⑨ 見袁國華：《“包山楚簡”文字諸家考釋異同一覽表》，《中國文字》新20期，中國文字社（臺灣）1995年，第223頁。
- ⑩ 根據本人調查，睡虎地秦簡未見加一點或一橫畫的“衣”字。王貴元先生《馬王堆出土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打印本，1994年）對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及卷後佚書、《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四種材料進行調查，也未見寫作“卒”形的“衣”字，見該文“形位形體總表（表3）”第9頁“衣”字條。其餘秦和漢初簡帛文字也似未見寫作“卒”形的“衣”字。
- ⑪ 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臺灣）1994年，第397頁。
- ⑫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 ⑬ 見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載《新編諸子集成》（第1輯），中華書局1984年；李均明：《孫臏兵法譯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⑭ 見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打印本），1994年，第69頁；《戰國秦漢同形字論綱》，《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31頁。
- ⑮ 于省吾：《雙劍謬殷契駢枝三編》，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第28頁。
- ⑯ 黃錫全：《甲骨文“出”字試探》，載《古文字研究》第6輯。
- ⑰ 同見注⑪，第248—250頁。
- ⑱ 認為應釋“吉”的，如周立升《帛書〈易〉六十四卦芻議》（《文史哲》1986年第4期）一文認為：“《周易集解》和通行本此卦卦辭‘吉’字均作‘告’。惟《漢石經》殘字只存‘不吉’二字，當可推知‘初筮’之下亦為‘吉’字。從文義看，帛書作吉為長。因《周易》是部筮書，‘吉’、‘不吉’乃是斷占詞，且書中經常出現。唯‘告’、‘不告’只此一處，且與義不屬，疑‘告’

乃‘吉’之訛。當以帛書為是。”

- (19) 認為應釋“告”的，如：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王永嘉：《馬王堆帛書〈周易〉卦文校證》，《寧波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王建慧：《馬王堆帛書〈周易〉異文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卷，1988年。
- (20) 帛書《繆和》的圖片和釋文尚未刊布，廖名春先生文見《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2頁。
- (21)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三七。
- (22) 見裘錫圭：《〈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讀後記》，《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493頁。
- (23) 見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文求堂書店（日本），昭和十二年，第3頁下。
- (24) 同見注(23)第502頁。
- (25) 吳振武《古璽和秦簡中的“穆”字》，《文史》第38輯，中華書局1994年，第6頁。
- (26) 同見注(22)第498頁。
- (27) 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圖片見《文物》1989年第2期圖版伍；釋文見《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袁仲一《秦文字類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21-656頁。
- (28) 見李學勤：《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它》，《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第275—277頁；《論〈經法·大分〉及〈經·十大〉標題》，《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臺灣）1994年，第301頁。
- (29) 還有把《十六經》篇末標題釋為“十四經”者，如高正：《帛書“十四經”正名》，見《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第283頁。此說誤。
- (30) 見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1頁。
- (31) 同見注(28)，《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第279頁；又《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304—305頁。

- ③② 茲把帛書《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和《刑德》乙本中的“大”和“六”字的出處統計如下，作為本條說法的依據：

一、《老子》乙本及卷前佚書

大，《經法》24下、26下、27上、35下、41上、42下、61下(2例)、67上，《十六經》137上、137下，《稱》161上、161下，《道原》168下、173下，《老子》乙本178下、179上、179下、196上、197上(3例)、206下、240下、243下、244下；

六，寫作大者：《經法》23上、28上(2例)、28下、52下、53下(2例)、54下、57下、61下、62上，《道原》174上； 寫作六者：《十六經》142上，《老子》乙本252下。

二、《刑德》乙本

大，17、27、28、29、34、37、38、41、62、67、70、93；

六(均作大)，9(2例)、10(2例)、11(2例)、12(2例)、71(2例)、75、80、88、91、92。

- ③③ 對秦至漢初簡帛形近字“人”與“入”、“王”與“玉”、“七”與“十”的辨析，請參看拙文《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文字釋讀商榷》，《中山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對“氏”與“民”的辨析，請參看拙文《氏民辨》，載《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 ③④ 王念孫：《讀書雜誌·戰國策第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頁。
- ③⑤ 本文承導師曾憲通教授審閱，謹此致謝。



# 論簡帛文獻的詞彙史研究價值

## ——兼論其漢語史研究價值

張顯成(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提要〕本世紀以來，出土了大量的簡帛文獻，這批材料的文獻真實性大都很強，並且其中有不少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口語性文獻，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具有傳世文獻無可比擬的十分重要的語言研究價值。目前，漢語史學科對簡帛文獻的重視還很不够，成果甚微。本文以簡帛的主體秦漢簡帛中的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武威醫簡、江陵漢簡等為研究材料，從簡帛文獻可以訂正傳統訓釋、可以提供詞語語源、可以增補詞語詞義、可以彌補詞語用例闕如、可以提前始見書五個方面，論述了簡帛文獻在詞彙史研究方面的價值。從而指出，簡帛文獻的語言研究價值豈止限於詞彙方面，在整個漢語史方面，乃至漢字史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應該充分重視這批文獻的語言研究，這樣纔利於中國語言學的發展。

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出土了大量的簡帛文獻，大大地震動着學術界，不少科學紛紛涉獵於這一新興領域，並大都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果。然而，漢語史學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卻顯得太冷清，其成果也微乎其微，簡直無法與諸如歷史學、考古學、哲學、醫學、法學、軍事學等學科相妍美。這是不是因為簡帛文獻對於語言學來說，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呢？回答是絕對否定的！下面，我們首先簡畧地從理論上談幾句，然後再以漢語詞彙史的研究為例來說明。

同其它很多學科一樣，漢語史的研究價值，往往首先取決於其研究材料的價值，也就是說，選擇研究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研究材料選定得不好，

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做的無用功（例如偽材料）；反之，經過精心選擇反復論證而確定的材料，則會事半功倍。所以，首先應該選定能客觀地反映所研究時代的語言面貌的文獻材料，來作為研究材料，只有這樣的研究纔會具有科學性。日本著名漢學家太田辰夫先生有一段關於文獻材料的分類及其價值的精辟論述，這段論述見於他的很有影響的著作《中國語歷史文法》，書中把文獻分為“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兩種，他說：“所謂‘同時資料’，指的是某種資料的內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時期產生的。甲骨、金石、木簡等，還有作者的手稿是這一類。”“所謂‘後時資料’基本上是指資料外形的產生比內容的產生晚的那些東西，即經過轉寫轉刊的資料。”“中國的資料幾乎大都是後時資料，它們特別成為語言研究的障礙。”①

出土簡帛文獻，它們大都是“同時資料”或“準同時資料”，如睡虎地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簡帛醫書、遺策等。並且，有不少簡帛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口語性文獻，如簡帛中的帳簿、契約、文書、醫方等。所以，從理論上講，簡帛文獻必然具有極強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它們應該是漢語史研究的極其寶貴的文獻材料，必然具有傳世文獻無可比擬的重大的語言研究價值。

漢語史的三個分支，即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三個方面，其詞彙史研究顯得最為薄弱，有待解決的問題也自然最多。下面就以漢語詞彙史研究為題，選取簡帛的主體秦漢簡帛為研究材料，舉例說明簡帛文獻所具有的巨大的詞彙研究方面的價值，從而說明簡帛文獻具有十分重大的語言研究方面的意義。

就詞彙史研究而論，需要談的話題較多，然限於篇幅，下面僅以簡帛文獻可以訂正傳統訓釋，可以提供詞語語源、可以增補詞語詞義，可以彌補詞語用例闕如、可以提前始見書五個話題進行簡論。②

#### 訂正傳統訓釋例：

對一些詞語的傳統訓釋，原來認為已經是“定論”了，但今從簡帛文獻來看，卻不盡然，當修正為是。茲僅舉兩例：

“集大成”與“金聲而玉振之”③ 歷來都認為，“集大成”與“金聲而玉振之”（也作“金聲玉振”）這兩個成語的最早出處是《孟子·萬章下》：“伯夷，

聖之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並均受趙岐注、孫奭疏之影響，誤以為專謂孔子。諸辭書當然都持此說，例如《辭源·隹部》（新版）：“集大成：《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按：古代奏樂一篇為一終，亦稱一成。此以樂為喻，言孔子能集納先聖之道，以成己之聖德。後謂總結前人或各家成果而系統化為集大成。”《金部》“金聲玉振”條下，也先引《孟子》此段，然後曰：“謂孔子之德，猶作樂先撞鐘，以發衆聲，樂將止，擊以收衆音。後以喻名聲洋溢廣布。”④然而，馬王堆漢墓所出古佚書《五行》（儒家著作）卻否定了以上傳統“定論”：

(1) “君子雜（集）泰（太）成，能進之為君子，不能進，客（各）止於其（里）。”206。這裏已明確指明，“集大成”是對“君子”而言，是儒家崇尚追求的道德規範。

(2) “君子之為善也，有與始也，有與終也。君子之為德也，有與始也，無與終也。金聲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聲，善也；玉（音）言（音），聖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筭（後）能金聲而玉振之。”186—188。“德”是遠遠高於“人道”的“天道”，祇有修養達到得“天道”的“君子”，即“有德者”，方能“金聲而玉振之”。這“金聲而玉振之”的最高道德規範，也是針對“君子”而言的。

(3) “〔君子集大成也〕者，猶造之也，猶具之也。大成也者，金聲〔而〕玉辰（振）之也。唯金聲〔而玉振之者〕，然筭（後）忌（己）仁而以人仁，忌（己）義而以人義。大成至矣，神耳矣。人以為弗可為□□由至焉耳，而不然。能誰（進）之為君子，弗能進，各止于其里。能進端，能終端，則為君子耳矣。弗〔能〕進，各各止于其里。不莊（藏）尤割（害）人，仁之理也。不受許（呼）嗟者，義之理也。弗能進也，則各止于其里耳矣。終（充）其不莊（藏）尤割（害）人之心，而仁腹（覆）四海；終（充）其不受許（呼）嗟之心，而義裏天下。仁復（覆）四海，義裏天下，而成（誠）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304—310。此段更是反復申明，要成為君子，即要做到“集大成”、“金聲而玉振之”就得“己仁”而使“人仁”，“己義”而使“人義”，就得“不藏尤害人”

“仁覆四海，義襄天下”，等等這些，都是成為“君子”的條件——更是處處針對“君子”而言。

佚書《五行》中有關這兩個成語的用例還有，茲不贅引。總之，以上已充分說明，“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的所指，是儒家所崇尚的做“有德者”，即“君子”的共同標準，並非專屬孔子，這是確切無疑的。

學者們從儒家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考證出佚書《五行》“成書早於《孟子》甚至‘畧早於子思’”。其實，此點就從書中的“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本身也可說明：該書多次提到“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若像傳統觀點所說，這兩個成語源於專指孔子，那全書都洋溢着儒家思孟學派思想的《五行》，為何卻只字未提及孔子呢？所以這兩個成語本身就可說明，佚書《五行》成書早於《孟子》。同時也說明，“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是儒家思孟學派所共同追求的道德規範，至《孟子》方借之來喻贊孔子之德罷了。

佚書《五行》不祇一次出現“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孟子》也作“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由此可知，這兩個詞組結構固定，當時就已是流傳很廣的成語了；並且後者的最早形式就是“金聲而玉振之”，而不是“金聲玉振”。至此我們可以定論：一、“集大成”和“金聲而玉振之”絕非專指孔子而言，而是思孟學派泛指君子而言；其出處決非是《孟子》，現在至少可以將“始見書”提前到《五行》（其實際產生的時代可能還要早些）。二，這兩個成語的釋義應該修正如下：

集大成：古代奏樂一篇為一成，本指合衆音小成為一大成，儒家以之喻指君子集納聖道，以成己之聖德，是儒家所崇尚的道德規範。後世謂總結前人或各家成果而系統化為集大成。

金聲而玉振之：本指金石之樂音宣振而綱紀衆音，儒家以之喻指君子德行齊備、聲望很大，是儒家所崇尚的道德規範。後世以喻聲名洋溢，才學精妙。

**股** ⑤ 股，是個人體部位名稱。《說文新附·肉部》：“股，赤子陰也。”段注依陸德明《老子音義》引《說文》補入正文，認為《說文》本有“股”字，為是。歷來的辭書均因襲《說文》此訓，然而，此義之用例人們歷來祇找到一孤證，即今本《老子》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且此例並不能證明“股”祇能訓為“赤子陰”，釋作“男陰”又為何不可？馬王堆醫籍《十問》的問世，正說明《說文》之訓有誤，同時也為我們正確訓釋“股”義



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1) 王子巧父問彭祖曰：“人氣何是為精乎？”彭祖合（答）曰：“人氣莫如竣（股）精。竣（股）氣完（莞）閉，百脈生疾；竣（股）氣不成，不能繁生，故壽盡在竣（股）。竣（股）之葆愛，兼予成佐，是故道者發明唾手循辟（臂），靡（摩）腹從陰從陽。必先吐陳，乃翕竣（股）氣，與竣（股）通息；與竣（股）飲食，飲食完竣（股），如養赤子。赤子驕悍數起，慎勿出入，以修美理（理），軫（固）白（薄）內成，何病之有？……。”48—52 “帛書整理小組”釋上文“竣”通“股”，為是。

佚書《十問》屬《漢書·藝文志》所記“房中”類性醫學著作，主題是房中養生保健、房事氣功操練、房事技巧招勢等，即均指成人而言，與兒童（“赤子”）毫不相干。故這本身就說明這裏的“股”決非“赤子陰”。

下面再來具體看看此段文意。這裏彭祖的答語說的是：人體最重要的是股氣，要善於保護愛惜股，要施之以氣功導引，要輔之以飲食滋補，要如精心養育“赤子”般養治股。即使“赤子”（股）功能十分強健，“驕悍數起”，也須慎於房事。如是，方能肌理美，內臟健，而百病不生。很明顯，此段連續使用的九個“股”，均指“男子陰”。

“股”，《老子》河上公本及敦煌本作“竣”（傳奕本及帛書本同《說文》作“股”），而《五十二病方》又作“臘”，“醫心方”又作“最”。下面看這後兩種醫籍的例子：

(2) 《五十二病方》：“（治癰疽方）穿小瓠壺，令其空（孔）盡容癰者腎與臘，即令癰者煩（卷）夸（瓠），東鄉（嚮）坐於東垣下，即內（納）腎臘於壺空（孔）中，而以采為四寸杙二七，即以采木椎刺之……。”217—218。此方屬祝由方，大意思是說，將小壺盧穿鑿一個可容腎（外腎）與臘（陰莖）的孔，令患者握壺盧東嚮坐於陳垣下，即納腎與臘於壺盧孔中，而以采木製成的四寸長的小木樁十四個，以之象徵性地叩擊壺盧。此方“腎”與“臘”相對連用，“臘”之“陰莖”義甚明。

《醫心方》是日本丹波康賴（公元912—995）於公元982年編撰成的一部醫書，共彙集了中國現已失傳的醫籍204種，該書卷二十一“治婦



人陰大方”曰：

(3) “《延齡圖》云：療婦人陰竈冷，令急小，交接而快方：石流黃二分，青木香二分，山茱萸二分，蛇床子二分。右四物，搗篩，為末。臨交接，納玉門中少許，不得過多，恐最孔合。”恐最孔合，意即：恐陰竈孔開合。

由上可知，“股”義不光為“男陰”，且專指“陰莖”。實際上，“股”在“男陰（陰莖）”義的基礎上，詞義還產生了進一步的發展演變，引申擴大為泛指“動物陰莖”了。如：

(4)《鹽鐵論·散不足》：“狗脂馬股，煎魚切肝，羊淹鷄寒。”馬股，即馬陰，亦即馬陰莖。馬陰莖有“主傷中、脈絕陰不起，強志養氣，長肌肉肥健”，“益丈夫陰氣”之功⑥，故言。

綜上所述，今從簡帛文獻來看，“股”之本義當為“男陰”，非專為“赤子陰”，且專為“陰莖”，還泛指“動物陰莖”，《說文》及歷來的辭書對“股”的訓釋悉當修正如是。至於《說文》致誤之因，恐係許氏誤解諸如上引簡帛文字（“飲食完股，如養赤子。赤子驕悍數起”）類文意之所致，或為《說文》傳抄脫誤之所致。

### 提供詞語語源例：

由於文獻有限和古籍的流傳等原因，不少詞語的語源已難以明白，或者弄錯了，而簡帛文獻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這類詞語的語源。茲僅舉一例：關於“衣魚”、“白魚”、“蛎魚”的語源問題。

衣魚、白魚、蛎魚，三名同一物（此物還有“蠹魚”、“壁魚”、“蟬魚”諸名），均指一種小蟲，中藥以之入藥。可是，從清儒開始，對這三名的語源（即傳統訓詁學所說的“得名之由”）的訓釋就錯了。下面先看前人的論述：

《爾雅·釋蟲》：“蟬，白魚。”郭璞注：“衣書中魚，一名蛎魚。”郝懿行義疏：“白魚長僅半寸（8至9毫米——筆者），頗有魚形而歧尾，身如傅粉華色，可觀，亦名壁魚，一名蠹魚。”

《廣雅·釋蟲》：“白魚，蛎魚也。”王念孫疏證引《圖經本草》云：“今人謂之壁魚，白魚能嚙書及衣，故又名蠹魚。”又引《爾雅翼》云：“衣書中蟲，始則黃色，既老而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

李時珍《本草綱目·蟲部·衣魚》引宋冠宗《本草衍義》曰：

“衣魚生久藏衣帛中、及書紙中，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魚名。”接着，李氏又解釋“白魚”、“蛎魚”語源說：“白，其色也……丙，其尾形也。”

也就是說，傳統觀點認為，“衣魚”得名於該蟲似魚，生於衣帛及書紙中；“白魚”得名於該蟲色白似魚；“蛎魚”得名於該蟲的尾似魚尾（蓋受《爾雅·釋魚》“魚尾謂之丙”之影響）。⑦

然而，今從出土文獻來看，這些傳統訓釋都不盡妥當，應該修正。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有其語源的明確表述：

“（治癩方：）以冥蠶種方尺，食衣白魚一七，長足二七。熬蠶種令黃，靡（磨）取蠶種，治，亦靡（磨）白魚、長足。節三，并以醢二升和，以先食飲之。”215—216。

這裏的“食衣白魚”，也就是本方所說的“白魚”。從這裏名之為“食衣白魚”可知，其得名源於該蟲蠶食衣帛，又色白而形似魚。“白魚”顯然是它的簡稱。同時，由此簡稱也可知，其另一名“衣魚”顯然也是其簡稱。所以，“衣魚”、“白魚”二者都源於“食衣白魚”的簡稱。也就是說，“衣魚”、“白魚”二者之得名同出一源——均為“食衣白魚”的簡稱。《五十二病方》是現在所見到的最早的醫籍，掩於地下兩千多年而未經任何改動，具有極強的文獻真實性和可靠性，故以之為據來考求語源是極其可靠的。

以上是“衣魚”、“白魚”的語源。下面看“蛎魚”的語源。“蛎魚”就是“白魚”，是“白魚”的不同書寫形式，二者同為一詞。白，上古音並母、鐸部；中古音並母、梗攝（陌韻，《廣韻》博陌切）。蛎，上古還未見此字，該字從“丙”聲（上古幫母、陽部），與“白”聲韻皆近；曹憲音（《博雅音》）“步幸切”。由此可知，二字音近是可以通轉的。《淮南子·原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注：“丙，或作白。”所以，“蛎魚”與“白魚”實同為一詞，故“蛎魚”當然也是得名於“食衣白魚”。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蟲》“蛎魚”條下也說：“白與蛎聲之轉，蛎之為言猶白也。”王氏此說是正確的，但可惜王氏也誤認為“蛎魚”得名同於“白魚”之得名（即也是得名於“其色”）。

以上都充分說明，“衣魚”和“白魚、蛎魚”這三名都是“食衣白魚”的簡稱，它們的語源應該是“食衣白魚”。並且，該蟲是整體象魚形，絕非僅

尾似魚，且其尾是由左右兩根等長的尾須（歧）和一根較長的中尾須（歧）組成的，故若僅就其尾而言，還並非象魚尾，<sup>⑧</sup>所以，僅就此而言，對“𩺰魚”語源的傳統解釋也是靠不住的。總之，簡帛文獻為我們提供的語源纔是客觀的，靠得住的。

### 增補詞語詞義例：

簡帛文獻中，還有很多我們原來不知曉的詞語、詞義，若整理考釋搜集之，可大大豐富漢語詞彙，也可為漢語辭書編纂提供一些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以下僅舉幾例：

相養：相輔相成。《說文·食部》：“養，供養也。”故可引申出“輔助、成全”意，則自然可與“相”組合成“相養”一詞，表“相輔相成”意，此僅舉該詞在簡帛中的幾個用例為證：

(1)《十六經·果童》：“地俗（育）德以靜，而天正名以作。靜作相養，德瘡（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96下—97上。靜作相養，即靜與作相輔相成。“相養”與“相成”對文，更顯其意；下例亦然。

(2)《十六經·姓爭》：“夫天地之道，寒涅（熱）燥濕，不能并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110下—112上。動作，舉動興作。若易成，乃易成。

(3)又，“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彰）。”109上—109下。若成，乃成。

接：量詞，指兩手相捧着的數量。

(1)《五十二病方》：“（治肛門癢：）治之以柳葦一接、艾二，凡二物。”266。治之以柳葦一捧、艾二捧。柳葦，寄生於柳樹上的菌葦。艾，指艾葉。

(2)又，“蜀焦（椒）一委（接）。”殘1。蜀椒一捧。

以上“接”之“捧”義甚明，餘例不再贅舉。

𧄙：漆瘡病。漆瘡病，即漆瘡，是見了漆之後生的一種過敏性皮膚病。“𧄙”的本義是以漆塗飾物（《說文》），生漆病者，往往就是因以漆漆物而過敏的，故“𧄙”可引申出“漆瘡病”義。馬王堆醫書以治漆瘡病為專

篇，共有七個治漆瘡病的方劑。下面舉其兩例：

(1)《五十二病方》：“(治)𦘒：唾曰：‘噴，漆(漆)，’三，即曰：‘天帝下若，以漆(漆)弓矢，今若為下民疔，涂(塗)若以豕矢。’”380。治𦘒，即治漆瘡病。此為祝由方。

(2)又，“(治漆瘡病方：藥物)飲其□一盃(杯)，令人終身不𦘒。”

383。不𦘒，不得漆瘡病，這裏的𦘒，已用為動詞，指得漆瘡病。

簡帛中用字常常很不規範，但是由上引可知，“漆瘡”義祇用“𦘒”而不用“漆”，“漆”的名詞義和動詞義(以漆漆物)用“漆”而不用“𦘒”，說明這是特意為了區別“漆瘡”義。

以上是詞語例，以下舉詞義例：

中國：中等實力的中家，與“強國”和“小國”相對。⑨“中國”一般認為有三項意義，如《辭源·一部》(修訂本)：“(一)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國於黃河流域一帶，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而把周圍其它地區稱為四方。後成為我國的專稱。”“(二)指春秋戰國時中原各諸侯國。”“(三)京師。”而我們在簡帛中發現，“中國”還有一項意義：“中等實力的國家，與‘強國’和‘小國’相對。”此義顯然是由地域之“中”至實力之“中”這樣引申而來的，此僅舉簡帛中的一段文字即可說明：

《經法·六分》：“適(嫡)子父，命曰上瞋(悖)；群臣離志，大臣主，命曰雍(壅)塞，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謀臣[在]外立(位)者，命曰逆成，國將不寧，在強國危，在中國削，在小國破。主失立(位)，臣不失處，命曰外根，將與禍鄰，在強國憂，在中國危，在小國削。主失立(位)，臣失處，命曰無本，上下無根，國將大損，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主兩，男女分威，命曰大廢(迷)，國中有師，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24下—27上。子父，指子取代了父之權。臣主，指臣子有了君主之權。主兩，男女分威，指后妃有了君主之威權。此段論國家衰亡之因，“中國”所在句之意分別是：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被破；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力被削；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有危險；在中等實力的國家則國亡。在漢語詞義系統中，有指稱“實力強大的國家”的“強國”，有指稱“實力弱小的國家”的“弱國”(或稱“小國”)，而對於實力不



強也不弱處於中等的國家，即處於中間狀態這一客觀現象，也理應有指稱表示者，方纔合乎詞義的系統性和思維的邏輯性，所以，這個指稱中間狀態的“中國”是具有其客觀存在的理論依據的。同時這一詞義的發現，使“強國”、“中國”、“小國（弱國）”這一詞義聚合了圓滿的構成。

冶：粉碎搗爛東西。《說文·火部》：“冶，銷也。”即本義是“熔煉金屬”，故可引申出“粉碎、搗爛”義。此義使用頻率很高，在簡帛醫籍中處處可見，茲畧舉幾例：

(1)《五十二病方》：“（治癰疾：）取犬尾及禾在圜垣上〔者〕，段冶，湮汲以飲之。”114。犬尾，狗尾草。湮汲，地漿。此“段冶”連文，“冶”之“碎、搗”意甚明。

(2)又，“（治癰方：）熬鷲種令黃，靡（磨）取鷲種冶……以先食飲之。”215—216。熬，火乾、乾煎。此先熬使之乾脆，以便於碎。

(3)《養生方》：“陰乾牡鼠腎，冶。”89。先將牡鼠腎“陰乾”，以便於“冶”。

(4)《雜禁方》：“與人訟，書其名直（置）履中。取兩雌佳尾，燐，冶，自飲之，微矣。取東西鄉（嚮）犬頭，燐，冶，飲。”6—8。此為訴訟取勝之迷信方。所“冶”之物均先“燐”（燒），其“碎”意也甚明。

(5)《武威醫簡》：“冶金創腸出方：冶龍骨，三指〔撮〕，和以鼓〔鼓〕汁，飲之。”

(6)《雜療方》：“取著（礬）石、桃毛〔各〕一，巴叔（菽）二，〔三〕物皆冶，合，以棗膏和，丸〔之〕。”24。

產：生，鮮，活，為形容詞義。⑩在詞義的發展演變中，有一種“感染”（contagion）現象，即甲、乙兩詞因為原來有某一相同或相反的意義，在言語過程中，則有可能相互影響，產生出與對方相同或相反的意義，或祇是甲乙某一方產生出新的意義，這是詞義發展的一種方式。在詞義的“感染”現象中又以產生出與對方相同的意義者為多。馬王堆醫書中有一個“產”字，用例甚廣，而其意義諸辭書均未見載：

(1)《胎產書》“懷子未出三月者，呻（吞）爵（雀）舊二，其子



男也。一曰：取爵（雀）齏中虫青北（背）者，產呻（吞）之，必產男萬全。”21。

(2)《養生方》：“有氣則產，無氣則死。”196。

(3)《五十二病方》：“（治中箭毒：）飲小童弱（溺）若產齏（齏）尺。”71。

運用感染求義的方法可以認定，以上第一例的“產吞之”，即“活吞之”，“生吞之”；第二例意即：“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第三例的“產齏”，即“生齏，鮮活齏”。也就是說，以上三例的“產”是形容詞義“生、活、鮮”。因為“產”的這一意義是詞義感染的結果，其感染原理如下：“生”有“生（與‘死’、‘熟’相對），活，鮮”義。如：《詩·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生”與“死”相對。《荀子·禮記》：“飯以生稻，啗以槁骨。”“生”與“熟”相對。《詩·小雅·白駒》：“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生，即活，鮮。“產”與“生”共有“生育、出生”義。例如，產：《胎產書》：“禹問幼頻曰：‘我欲殖人產子，何如而有？’”1。“殖”（人）與“產”（子）同義，均“生殖”義。《孟子·滕文公上》：“陳良，楚產也。”趙岐注：“陳良，生於楚。”生：《詩·大雅·生民》：“不康堙祀，居然生子。”《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不光“產”與“生”共有“生育、出生”義，而且二者常常互訓：《說文·生部》：“產，生也。”《玉篇·生部》：“生，產也”以至後來“產”與“生”同義複合連用，作“產生”，也作“生產”。如：漢蔡邕《上封事陳政要七事》：“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三國志·吳志·駱阮傳》：“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民，亦多棄子。”⑪由於“產”與“生”常常互訓，所以，“產”便受到了“生”的影響，“感染”上了“生”的意義，便有了前面所舉的“生（與‘死’、‘熟’相對），活，鮮”義。下面再舉一點“產”的用例：

(4)《養生方》：“益產者食也，損產〔者色〕也，是以聖人必有法則”200—201。此句同墓同土的《天下至道》作：“故戴生者食也，孫〔損〕生者色也，是以聖人合男女必有則也。”40—41。故“產”即“生”、“生存”、“活着”。

(5)《陰陽灸經乙》：“（此病）灸則強食產肉。”13。產：肉，即：生肉，未煮熟的肉。

(6)《五十二病方》：“(治蛇咬：)以產豚豕(菽)摩之。”89。用“生”豬肉與食茱萸摩傷處。菽，食茱萸。

(7)《五十二病方》：“(治蜈蟲咬傷：)治之以鮮產魚，□而以鹽財和之，以傅……。”135。鮮產魚，即鮮魚，“活”魚，鮮活的魚。此“鮮產”同義連用。

(8)又，“(治瘡瘍：)以兔產腦塗之。”432。兔產腦，即：“新鮮”兔腦。

(9)《養生方》：“取車踐，產蒸之，大把二。”72。車踐，車前。產蒸之，即：車前“鮮活”時就蒸之。

(10)又，“取鷄纔能卷(謹)者，產搗，盡去毛。”77。取剛能鳴叫的鷄，“活”的就全部拔去其鷄毛。

(11)又，“取雄鷄一，產搗。”30。

(12)又，“(念完祝由詞，)即禹步三，曰以產荆長二寸周畫中。”189—190。產荆，即“活”荆條，剛從樹上摘下來的小荆條。

(13)《雜療方》：“取蘭(蘭)葉，產壽(搗)，蒸，熨之。”78。產搗，即“生”搗，“鮮活”時就搗之。

### 彌補詞語用例闕如例：

有不少詞語(或詞義)，往往祇見載於古代辭書，而未能找到其用例，後人編辭書也祇能照抄前代辭書的義項而不能提供書證，如新編纂的《漢語大字典》中就有不少祇有義項而無書證者。“一部沒有例子的字典就是一具骷髏”，<sup>⑫</sup>這一說法對於詞彙的研究也同樣適合。所以這一現象很使人困惑和遺憾，也給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帶來難以迴避的困難。實際上，這些未能找到其用例的詞語並非古人嚮壁虛造，因為在簡帛文獻中正有不少這類詞語的用例。茲僅舉幾例以見一斑，且例證盡量少舉：

州：肛門。《爾雅·釋畜》：“白州驢。”郭璞注：“州，竅。”邢昺疏：“謂馬之白尻者，名驢。”《廣雅·釋親》：“州，臀也。”王念孫疏證：“《內則》：‘驚去丑’鄭注云：‘丑謂驚竅也。’‘丑’與‘州’聲近而義同。‘豚’與‘州’亦相近。《玉篇》：‘豚，尻也。’”《山海經·北山經》：“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郝懿行箋疏引王引之曰：“‘川’似當為‘州’字，形相近而誤。”也就

是說，“州”之“肛門”義歷來都未找到貼切用例。而今簡帛中卻不乏其用例，如：

(1)《五十二病方》：“人州出不可入者，以膏膏出者，而到（倒）縣（懸）其人，以寒水澆（澆）其心腹，入矣。”263。膏膏，前者為名詞，後者為動詞。州出，即“脫肛”。

(2)《十問》：“（養生之法：）一曰垂枝（肢），直脊，撓（撓）尻；二曰疏股，動陰，縮州。”62—63。縮州，即“收緊肛門”。

忠：正直。此義最早見載於《玉篇·心部》：“忠，直也。”但一直未能找到用例，今簡帛中卻不乏用例，如：

(1)《縱橫家書》：“（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初，齊）召臣，臣欲毋往，使齊棄臣。王曰：‘齊王之多不忠也，殺婁逐子，不以其罪，何可怨也。’故強臣之齊。”39—40。

(2)又，“（蘇秦為燕間仕齊，人有惡言之於燕王者，蘇秦獻書於燕王以辯白：）今齊有過辭，王不諭（喻）齊王多不忠也，而以為臣罪，臣甚懼。”38。過辭，指對燕的過分無理之辭。喻，明曉。

浚：挹取。這是“浚”的本義，《說文·水部》：“浚，抒也。”段注：“抒者，挹也，取諸水中也。”而歷來人們祇找到其引申義“疏浚”之用例，卻未找到其本義的用例，今簡帛中即有不少其用例。並且，簡帛中不光多有“浚”之本義用例，而且還有“浚”與“取”（獲取）組成了聯合式複合詞“浚取”，更明確地表示“挹取”這一意義的用例（需要說明的是，“浚取”一詞諸辭書失收）。如：

(1)《五十二病方》：“（治爛者方：）煮秫米期足，纔孰（熟），浚而熬之，令為灰，傅（敷）之數日。乾，以汁升之。”309。期足，以够用為度。浚而熬之，即：挹而熬之。

(2)又，“取馬矢牖者三斗，孰析，沃以水，水清，止，浚去汁……。”193。牖，粗。浚去汁，即：挹去其汁。

以上是“浚”之本義例，以下看“浚取”例：

(3)《五十二病方》：“傷而頸（漣）者，以水財煮李實，疾沸而抒，浚取其汁，寒和，以飲病者。”34。以水財煮李實，以水煮適量的李子，浚取其汁。即：挹取其汁。

(4) 又, “以水一斗煮葵種一斗, 浚取其汁, 以其汁煮膠一延(梗)半。” 168。

瘍: 敗瘡。《說文·疒部》: “瘍, 目病……一曰蝕瘡。” 段玉裁注: “蝕者, 敗瘡也。” 但未找到用例。《廣雅·釋詁》: “瘍, 創也。” 王念孫疏證也未找到用例。而簡帛文獻中卻不乏其例, 如:

(1) 《五十二病方》: “[治瘍: 瘍]者, 癰痛而潰。瘍居右, □馬右頰骨; 左, □[馬]左頰骨, 燔, 冶之……以醃膏已煎(煎)者膏之……再膏傅, 而洒以叔(菽)汁。廿日, 瘍已。嘗試, 令。” 451-452。

(2) 又, “(治)瘍: 瘍者有牝牡, 牡高膚, 牝有空(孔)……” 454。

(3) 又, “(治)瘍: 瘍者, 癰而潰, 用良叔(菽)、雷矢……搗之, 以傅空(孔)中。傅[藥]必先洒之。日一洒, 傅藥。傅藥六十日, 瘍□。” 456-457。

蕡: 薏仁, 常指薏苡仁。屬草本。《說文·艸部》: “蕡, 草也。从艸, 贛聲。一曰薏苡。” 《證類本草·草部》(卷六)引《名醫別錄》: “(薏苡仁,)一名起實, 一名蕡。生真定平澤及田野, 八月采實, 采根無時。” 這是傳世文獻中用“蕡”的例子。《廣雅·釋草》: “蕡, 起實, 薏以(苡)也。” 王念孫疏證注意到了上引《名醫別錄》這條材料, 惜所用本子為宋劉甲“大觀”本未用“政和”本, ⑬而劉本作“贛”, 故王氏祇得言“‘贛’與‘蕡’同”。簡帛中卻不乏其例, 如:

(1) 《雜療方》: “(以上諸藥)皆治, 并合, 以蜜若棗膏和, 丸之, 大如蕡, 入前中。” 20-21。大如蕡, 即: 大如薏苡仁。

(2) 又, “取薔石, 桃毛[各]一, 巴菽(菽)二, [三]物皆冶, 合, 以棗膏和, 丸[之]大[如]蕡, 入[前中]。” 24。

蕮: 茜草。此詞歷來未找到用例。張自烈《正字通·艸部》: “蕮, 《神農本草經》有屈草, 生漢中川澤間……蕮當即屈。” 這裏, 張氏推論“當即屈”是在未找出用例的情況下作出的, 所以推斷錯了: 因為“蕮”並非“屈草”, 而是“茜草”。張氏之所以誤, 正是在沒有用例的情況下推論造成的, 這足以說明詞語用例對詞彙研究的重要性——詞語用例是詞義的靈魂之所在。下面僅舉簡帛中的一例以說明:

《五十二病方》: “為藥漿方: 取蕮莖乾冶二升, ……蕮者, 荊名

曰廬茹，其葉可亨（烹）而酸，其莖有刺。”250—252。廬莖，即：茵草莖。⑭

吹：吐氣；也指發出吐氣聲。《玉篇·口部》：“吹，呼氣。”《集韻·平戈》：“吹，吐氣也。”吐氣則有聲，故又指“發出吐氣聲”，《篇海類篇·身體類·口部》：“吹，吐氣聲。”“吹”的這兩個意義歷來均未找到用例，而簡帛中卻不乏其用例，如：

(1)《五十二病方》：“（治蛇咬方）吹：‘差（嗟），年，蒼殺人今茲。’有（又）復之。”91。此方為祝由方。

(2)又，“貴（噴）吹：‘伏食，父居北在，母居南止，同產三夫，為人不德。’已，不已。青傳（敷）之。”96。噴吹，同義連用，均指噴吐氣息。青，銅礦石的一種，可治蛇毒。此方也為祝由方。

以上為“吐氣”例，以下舉一“發出吐氣聲”例：

(3)《天下至道談》：“五音（音）：一曰候（喉）息，二曰喘息，三曰鼻哀，四曰痰（吹），五曰齟。”50。五音，指房中女性發出的生理性反應的五種聲音。齟，牙齒摩切發出聲音。

枚：收。“收”之“枚”與“樹榦”之“枚”各為一詞，祇文字符號相同而已。《廣雅·釋詁》：“枚，收也。”此訓歷來難以找到用例，故連王念孫疏證對是否有些詞都表示懷疑，正如“帛書整理小組”對《十問》第4簡“收”義之“枚”所注：“王念孫《廣雅疏證》認為‘諸書無訓枚為收者，枚當為救字之誤也’。簡文‘枚’字訓‘收’適合：可證王說不確。”現僅將此例引如下：

《十問》：“（房中養生氣功操練：）翕毋過五，致之口，枚之心，四輔所貴（歸）。 ”4—5。翕，吸也，此指采接女性陰氣。“枚之心，四輔歸”意即：將所采陰氣收之於心，再把周身四肢〔四輔〕的精氣收歸回來。

揆：措。此詞歷來不得其用例，而今簡帛中卻不乏其例，如：

(1)《引書》：“窮視者，反者（錯）手北（背）而俯，後雇（顧）踵，則比者，反昔（錯）手北（背）而卑（顛）揆肩。”這裏講的是導引術。反錯手背而顛揆肩，即：雙手相交，反背於後，傾首以措肩。

(2)又，“引腹角（痛）：縣（懸）纍版（板），令人高去地尺，足踐其上，手空（控）其纍，後足，前應，力引之，三而已。因去伏，足



距壁，固箬（着）少腹及股膝於席，兩手據，揆上，稍舉頭及膺而力引腹，極，因徐直之；已，有（又）復之，三而已。因力舉尻，極，三而已。”這裏講的也是導引術。揆上，即揩上面。

改：金或玉做的逐鬼器。《說文·支部》：“改，殺，大剛卯，以逐鬼魅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也祇據“予家藏小者一枚”以解說此物形狀，未能找到文獻用例。今簡帛中不光有其用例，而且還有其詞義發展演變為動詞義“逐鬼”的用例。以下各舉一例：

(1)《五十二病方》：“（治癰病祝由方：）操柏杵，禹步三，曰：‘貴者一襄胡……’必令同族抱□癰者，直（置）東鄉（嚮）竇道外，改椎之。”195—197。改椎之，指用改槌擊患處以逐鬼。此例的“改”是名詞義“逐鬼器”。

(2)又，“（治癰病祝由方：）以辛巳日古（祝）曰：‘貴辛巳日。’三。曰：天神下干疾，神女倚序聽神吾（語），某狐又非其處所，已，不已，斧斬若。’即操布改之二七。”203—205。操布改之二七，即：操起布以逐鬼，作十四次。這裏的“改”是動詞義“逐鬼”。

胙：肉之嘉善者。《集韻·宥韻》：“胙、胙，肉善者。胙，或从丑。”然“胙”、“胙”此義歷來均未找到其例，而今簡帛中卻不乏“胙”之用例，如：

(1)《五十二病方》：“（治狐臭方：）取牛胙、烏喙、桂，冶等，滑□，〔熏〕以□病。”67。取牛胙、烏喙、桂，即：取上等牛肉、烏喙、桂。

(2)《養生方》：“（益甘方：）□汁，以牛若鹿胙滑，令女子自探入其戒□。”53。以牛若鹿胙滑，即：用上等牛肉或上等鹿肉與汁滑混。

鑿：一種炊器。《說文·金部》：“鑿，鍍屬。”《廣雅·釋器》：“鑿，釜也。”羅振玉《古器物識小錄·鑿》也祇能以其家藏之鑿來解釋該物形狀，而未找到文例。而今簡帛中卻有其例，如：

《雜禁方》：“夫妻相去，取雄雉左蚤（爪）四，小女子左蚤（爪）四，以鑿熬，并冶，傅，人得矣。”10。夫妻相去未能團聚，取雄雉左爪四個，小女子左手指甲四個，以鑿乾煎，一并粉碎，傅附於身，則相聚矣。

搖：搖動。《說文·木部》：“搖，樹動也。”段玉裁注：“搖之言搖也，今俗

語謂煽惑人為招搖，當用此从木之字，謂能招致而動搖之也。”段氏未能找到“搖”字用例，故祇得以通假釋之。而簡帛中卻不乏其例，如：

(1)《脈書》：“（病）在腸中，小者如馬侯，大者如杯而堅痛，搖，為牡瘕。”腹中有搖動疼痛病症者，叫牡瘕病。

(2)《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令數□環，百姓搖戴乃難請。”14.5。百姓心中動搖疑惑，事情就難辦了。

### 提前始見書例：

始見書的問題，實際上是個新詞新義的問題，因為它反映的是對詞語產生時代的認識問題。有一些詞語、詞義，原來以為是兩漢六朝、唐宋、甚至明清纔產生，而今從簡帛文獻來看，實際上早在先秦就已產生了。這類可以提前始見書的詞語、詞義，在簡帛文獻中有很多而數以千計。下面，以體現當前辭書編纂最新成果的《漢語大字典》（簡稱《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簡稱《大詞典》）為參照係（frame of reference）畧舉數例以說明：

和（huò）：摻合，混雜。《大詞典·口部》：“和（huò）：①摻和；混雜”，書證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今以簡帛驗之，晚近1000年：

(1)《五十二病方》：“（治燒傷方：）取陳黍、叔（菽），治，以犬膽和，以傅（敷）。”326。犬膽，狗的膽汁。

(2)又，（治痂方：）“以水銀、穀汁和而傅（敷）之。”361。

(3)《雜療方》：“取蕃（礬）石、桃毛〔各〕一，巴叔（菽）二，〔三〕物皆治，合，以棗膏和，丸〔之〕。”24。

如：例如，譬如，表示舉例。《大字典·女部》：“如”：“⑪表示舉例”，書證為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今以簡帛文獻驗之，晚了1000多年。

《縱橫家書》：“（謂秦昭王：）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栖（接）收燕、趙，如經（涇）陽君，如高陵君。先於燕、趙曰：‘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217—218。涇陽君和高陵君為秦昭王弟，故為能聯合燕、趙之“可信者”。秦有變，指秦策畧有變。

到：用於動詞後，表結果，作補語。《大字典·刀部》：“到”：“⑤用作動詞的補語，表示動詞的效果。”書證為明何景明詩。比之於簡帛文獻，晚了1700年：

《雜療方》：“益內利中：取醇酒半杯，溫之勿熱。毀鷄卵，注汁酒中，撓，飲之。恒以旦未食時飲之。始飲，飲一卵，明日飲二卵，〔明日〕飲三卵；其明日復飲二卵，明日飲一卵。恒到三卵而〔卻，卻〕到一卵復〔益〕。恒以八月、二月朔日始服，飲□□□□□。〔服〕之二時，使人面不焦，口唇不干，利中益內。”43—47。中，中焦，胃，或胃內臟。二時，此指春秋二時。“恒到三卵而卻，卻到一卵復益”意即：如此固定不變地遞增，由每天服一卵到每天服三卵而後遞減，遞減到每天服一卵又遞增。這裏，“恒到”，“卻到”之“到”的意義是很清楚明確的，即分別補充說明動詞“恒”、“卻”的結果而作其補語。

把：1. 形容詞，一手所握持的粗細或多少。2. 量詞，指一手所握持的數量。《大詞典·手部》：“把”。②謂一手所握的粗細或多少”，書證為《文子》（漢人依托之作）比之於簡帛文獻至少晚200年；“⑤量詞。（1）用於一手握持的數量”，書證為漢劉向《新序》，比之於簡帛文獻，晚了400年：

（1）《五十二病方》：（治牝痔方）“取弱（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鮒魚如手者七……。”248—249。

（2）《養生方》：“（取車前）大把二。”72。

以上為形容詞例，以下看量詞例：

（3）《五十二病方》：“傷脛（瘡）者，擇薤一把，以敦（淳）酒半斗者（煮）……。”43。

（4）又，“（續斷）根一把，獨□長支（枝）者二廷（挺）。”17。

（5）《養生方》：“（草薺）四寸一把。”121。

大便：人屎。小便：人尿。《大詞典·大部》：“大便”：“②屎”，書證《西游記》，比之於簡帛文獻，至少晚1500年；又《小部》：“小便”：“②尿液”，書證《後漢書》，與簡帛文獻相比，至少晚400年：

（1）《武威醫簡》：“治金創內漏血不出方：……凡五物，皆治，和，以方寸匕一酒飲，不過再飲，血立出，不（否），即從大便出。”50—51。

（2）又，“（以上諸物）皆治，合和，以方寸匕酒飲，不過再飲，血立出，不（否）不，即大便血良禁。”14。不不，衍後“不”字。

(3) 又, “行小便時難。” 84 甲。

詞義具有極強的系統性, “大便”和“小便”同屬一詞義聚合(本義均為動詞, 分別為“人拉屎”和“人撒尿”), 當其一者獲得名詞義時, 另一者也當同時獲得名詞義。‘《大詞典》“大便”書證為《西游記》, “小便”書證為《後漢書》, 時代相距太遠, 這本身就說明了其“始見書”有問題。

瓣: 瓜內的子, 即瓜子。《大字典·辛部》“瓣”: “①瓜類的子”, 書證晉傅玄賦, 比之於簡帛文獻, 晚 600 多年:

(1) 《五十二病方》: “(治痂方:) 冶莖莢、苦瓠瓣, 並以鹿脂膏并傳之。” 352。

(2) 又, “善削瓜壯者, 而其瓣材其瓜。” 320。

脬: 人或動物的膀胱。《大字典·月部》“脬”: “①膀胱”, 書證《史記》, 比之於簡帛文獻, 晚 300 年:

(1) 《五十二病方》: “(瘡病,) 痛於脬及衷(中), 痛甚弱(溺)□痛益甚。” 161。此指人的膀胱。

(2) 又, “殺狗, 取其脬。” 262。此指動物的膀胱。

魃(91) 小兒鬼。《大字典·鬼部》“魃”: (一) “小兒鬼”, 書證漢張衡賦, 比之於簡帛文獻, 晚 500 年:

(1) 《五十二病方》: “(治小兒鬼病,) 祝曰: 責者, 魃父魃母……。” 443。

(2) 又, “(治) 魃: 禹步三, 取桃東枳(枝), 中別為□□□之倡而筭門戶上各一。” 442。此“魃”已引申為“魃病”(古人以為是小兒鬼所致之病), 說明“小兒鬼”之義當還更早。

顆: 量詞, 相當於“粒”、“枚”。簡帛文獻中寫作“果”。《大字典·頁部》: “顆”: “②量詞。1. 用於粒狀或圓形的物體, 相當於‘粒’、‘枚’”, 書證唐李紳詩, 比之於簡帛文獻, 晚 1000 多年:

(1) 《五十二病方》: “(治痂方:) 取慶(蜣)良(螂)一斗, 去其甲足, 以烏喙五果(顆)” 347。

(2) 又, “治烏喙四果(顆), 陵(菱)芰一升半。” 353。

(3) 《養生方》: “薑十果(顆), 桂三尺。” 126。

簡帛中的上引量詞用例甚夥, 且均寫作“果”, 由此可知, 作量詞的“顆”

實來自名詞“果”(《說文·木部》:“果,木實也。”),其演變過程當為:果(果子,果實)→量詞(粒,枚)→顆(區別字,即分別文)。也就是說,量詞“果”與“顆”實際上是古今字關係。《說文·頁部》“顆”字下段注以為量詞“顆”是“小頭”義的引申,今以簡帛來看,恐源於“果”(果實)為是。

手背:手掌的反面。簡帛中寫作“手北”。《大詞典·手部》:“手背:手掌的反面”,書證《宋史》,比之於簡帛文獻,晚1000多年:

(1)《脈書》:“耳脈:起於手北(背),出臂外廉兩骨之間,上骨下廉,出肘中,入耳中。”

(2)《引書》:“引脣者,反昔(錯)手北(背)而前俯,陽見者,反昔(錯)手北(背)而仰,後雇(顧)。”

(3)《陰陽灸經甲》:“肩脈:起於耳後,下肩……乘手北(背)。”

48。

簡帛中,“背”均作“北”,說明“背”為後起字,是分別文。<sup>⑮</sup>

手掌:腕關節與指之間的部分。亦指手心那一面。《大詞典·手部》:“手掌”:“①腕關節與指之間的部分。亦指手心那一面。”書證漢劉向《說苑》,比之於簡帛文獻,晚400年:

(1)《陰陽灸經甲》:“臂鉅陰脈:在於手掌中,出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內陰,入心中]。”67。

(2)《陰陽灸經乙》:“臂巨陰脈:在於手常(掌)中,出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內陰,入心中。”16。

腎:舉丸。《大字典·月部》:“腎”:“③中醫稱舉丸為腎或外腎”,書證宋宋慈文,比之於簡帛文獻,晚1600年:

(1)《五十二病方》:“(治癰疽視由方:)穿小瓢壺,令其空(孔)盡容癰者腎與臟,即令癰者煩(卷)夸(瓠),東鄉(嚮)坐於東垣下,即內(納)腎、臟於壺空(孔)中……。”217—218。此方“腎”所在二句意義為:使所穿瓢孔能容納舉丸和陰莖;即納舉丸和陰莖於瓢孔內。

(2)又,“(治癰疽方:)以奎(羹)蠶蓋其堅(腎),即取桃支(枝)東嚮者,以為瓠。”225。此方也是視由方。以羹蠶蓋其腎,即用大腹瓢蓋住舉丸。



(3)《養生方》：“陰乾牡鼠腎，治。”89。此已指動物的外腎。

節：量詞，相當於“段”、“單位”、“級別”等。《大字典·竹部》：“節”：“⑫量詞”，書證《淮南子》，晚於簡帛文獻：

(1)《養生方》：“(用)竹緩節者一節，大徑三寸。”114。竹緩節者一節，即：竹節間距離長的竹一節(相鄰竹節之間的那一段為一節)。“一節”之“節”為量詞，相當於“段”。

(2)《卻穀食氣》：“去(卻)穀者食石韋，朔日食質，日駕(加)一節，旬五而(止；旬)六始匡，日[去一]節，至晦而復質，與月進退”  
1 這裡的“節”相當於“單位”、“級別”。此段意為：欲卻穀者可以食石韋……每日增加一節，至十五日而止，從第十六日始每日減一節……。

分：量詞，常指搭配成組的東西。《大字典·刀部》：“分”：“⑫量詞。今也作‘份’”，書證《兒女英雄傳》；《大詞典·刀部》：“分”：“⑨量詞”，書證《水滸傳》，比之於簡帛文獻均晚近2000年：

(1)《五十二病方》：“嬰兒病間(癰)方：取雷尾矢三果(顆)，治，以豬煎膏和之。小嬰兒以水[半]斗，大者以一斗，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撓，以浴之。浴之道頭上始，下盡身，四支(肢)毋濡。三日一浴，三日已。”48—49。三分和，取一分置水中，即：將上述已混和的藥物分成三分，取其中一分置於水中。

(2)又，“取棗種粗屑二升，葵種一升，三分之，以水一斗半[煮一]分，孰(熟)，去滓，有(又)煮一分，如此以盡三分。浚取其汁，以蜜和，令纔甘，寒溫適，□飲之。”173—175。

甌：1. 名詞，“碗”、“杯”類盛器。2. 量詞。《大詞典·瓦部》：“甌”：“②杯、碗之類的飲具”，書證南唐李煜詞；“亦作量詞”，書證宋邵雍詩。比之於簡帛文獻，均晚1000多年(後者竟晚1500年)：

(1)《胎產書》：“(產後，熟洒胞，置胞)以瓦甌，毋令虫蛾(蟻)能入……使嬰兒毋(無)疔，曼理，壽□”16。此為名詞。

(2)《五十二病方》：“以續[斷]根一把……秋烏喙二□□□□□者二甌。”17—18。此為量詞。

從以上的例證可知，上舉詞語(或詞義)，都是西漢前就已產生了的，

而原來卻以為，這些詞語或在兩漢纔產生，如“把”、“手掌”等；或在六朝纔產生，如“和”、“辦”等；或在唐宋纔產生，如“甌”、“如”等；甚至以為元明清纔產生，如“手背”、“到”、“分”等。由此可知，可能我們原來對不少詞語的始見書的認識，都與客觀實際不符，甚至相差得太遠，因為我們原來所“認定”的始見書，大都是傳世文獻，而沒有怎麼涉及簡帛一類出土文獻。看來，太田長夫氏所說的“後時資料”，它們特別成為語言研究的“障礙”，的確不無道理。

以上我們分五個方面論述了簡帛文獻的詞彙史研究價值，以上所舉例證，祇是筆者所掌握材料的其中極少部分（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展開論述），而僅從以上所舉例證我們即可知，簡帛文獻在漢語詞彙史研究方面頗具研究價值。如前所述，漢語史的語音史、語法史、詞彙史三者中，詞彙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如前兩者而顯得最為薄弱，但是，通過以上論述可知，簡帛文獻給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極其寶貴的詞彙研究材料，若我們能充分利用這批材料，漢語詞彙史特別是先秦兩漢詞彙史的研究較為薄弱的局面是可以大大得以改觀的。

簡帛文獻的語言研究價值，豈止限於漢語詞彙史研究方面，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這批文獻無論是對於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還是對於漢語語法史的研究，無論是對於整個漢語史的研究，還是對於漢字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價值。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這批文獻的語言文字研究，花大力氣投入於這一領域中，祇有這樣，纔會有利於漢語史和漢字史的研究，纔會有利於描繪出漢語史和漢字史的客觀面貌，以促進中國語言學的更好發展。

## 注 釋

① 中譯本頁381—382，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② 本文引例所用簡帛文獻如下：

A.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包括三種：

《經法》，《十六經》。這兩種屬早已失傳的《黃帝四經》，其成書時間

為“公元前400年前後”。（詳見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1期。另見龍晦《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探源》，《考古學報》1975年2期）

《五行》。其“成書早於《孟子》”（詳見魏啟鵬《馬王堆漢墓帛書〈德行〉校釋·帛書〈德行〉研究札記》，巴蜀書社，1991），甚至“畧早於子思”（詳見上引魏書《龍晦序》）。

B.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戰國縱橫家書》（簡稱《縱橫家書》），文物出版社，1983。該書屬《戰國策》原始資料之一，即是劉向編輯《戰國策》所依據的那一類資料。（詳見：該函《出版說明》；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策〉的史料價值》，《文物》1975年2期；馬雍《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各章的年代和歷史背景》，《文物》1975年4期）

C.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1985。包括10種：

《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簡稱《陰陽灸經甲》）、《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簡稱《陰陽灸經乙》）、《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十問》、《天下至道談》，以上7種大都祇見灸法（或砭法）不見針法，而《黃帝內經》中，不但有針法，而且詳述有形制、用途不同的九種醫針，故其成書年代早於《黃帝內經》。《黃帝內經》的主體成書於戰國，故其成書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之際甚至更早”。（詳見：該函《出版說明》；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馬王堆帛書四種古醫學佚書簡介》，《文物》1975年6期；馬繼興、李學勤《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等。）

《胎產書》、《卻穀食氣》、《雜禁方》。以上三種的成書年代應該在漢前，因為帛書的下葬年代是漢初（文帝12年，即前68年）。

D. 《脈書》。釋讀主要依據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釋文》，《文物》1989年7期，其成書年代早於《黃帝內經》。（詳見：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初探》，《文物》1989年7期）

E.《引書》。釋讀主要依據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簡〈引書〉釋文》，《文物》1990年10期。其成書年代暫不可考，但至少在漢前即已成書，因為《脈書》的下葬時間是漢初（前186年）。

F.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簡稱《武威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其成書年代暫不可考，但至少在墓葬時間（東漢早期）之前即已成書。

G.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1990。其成書年代不會晚於秦。

以上簡帛引文，悉依慣例（但《脈書》和《引書》未公佈圖版，“釋文”也未標示簡號，故無法標注簡號）。另，為便於排印，個別生僻字改用通行字，個別生僻的通假字也改用本字。

- ③ 此條論述從簡，請詳見拙文《“集大成”與“金聲而玉振之”訓釋補正——帛書研究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2期。
- ④ 《漢語大詞典·佳部》“集大成”與《金部》“金聲而玉振”所訓同《辭源》。
- ⑤ 此條論述從畧，請詳見拙文《傳世經典匡謬三則——出土文獻研究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4期。
- ⑥ 馬蔞莖，古本草一般指“白馬蔞莖”，其主治功用可詳《神農本草經·中品·白馬蔞》、《證類本草·獸部·白馬蔞》（卷十七）和《本草綱目·獸部·馬》（卷五十）。
- ⑦ 盡管清儒曾有人認為“魴魚”得名同於上述“白魚”之得名（詳下文），但“魴魚”得名於“其尾形”之說一直佔據着統治地位。
- ⑧ 參見《辭海·衣部》（新版）和《中藥大辭典》（江蘇新醫學院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衣魚”條說解及插圖即可知。
- ⑨ 此條論述從畧，請詳見拙文《簡帛詞語札記》，《四川教育學院學報》1993年3期。
- ⑩ 此條論述從畧，請詳見拙文《“產”有“生、鮮、活”義——淺談詞義的感染》，《文史知識》1995年2期。
- ⑪ “產生”和“生產”的意義演變到了今天現代漢語中，則又有了新發展，茲不

贅述。

- ⑫ 法國《新小拉魯字典》(Nouveau Petit Larousse)卷頭語,轉引自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中華書局,1980,頁358。
- ⑬ 關於《證類本草》的版本源流,請詳見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所附《〈證類本草〉文獻源流叢考》,華夏出版社,1993。
- ⑭ 此方的“菰莖”當即“茵草莖”之訓,可參見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513—515,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
- ⑮ 詳見拙文《“手北”與“手背”——淺談分別文》,《中文自學指導》(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中文專業委員會主辦)1994年3期。

附：本文是筆者正在進行的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項目《秦漢簡帛詞彙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九七年度項目《秦漢簡帛詞語叢考》前期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此謹呈學界，敬望得以教正。



# 論帛書《要》篇巫史之辨

邢文（北京大學考古系）

帛書《周易》的傳文《要》篇，有一節關於巫、史之辨的文字：①

子曰：易，我復②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

可以看見，《要》篇巫、史之辨，在巫、史與贊、數、德三者之間的關係。

## 一 贊與巫

“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可知巫與贊的關係。這裏的“贊”，也即“幽贊而達乎數”中“幽贊”之“贊”。“幽贊”，見於《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說卦》“幽贊”，向有歧解。聚訟的焦點，在對“贊”字的解釋。以往的說法可以歸為下述：

1. 見。漢荀爽：“幽，隱也。贊，見也。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蓍者，策也，……上配列宿，下副物數。生蓍者，謂蓍從爻中生也。”③“贊”釋作見，同《說文》。

2. 求。晉干寶：“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於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④幽贊，於昧冥中尋求。

3. 明。晉韓康伯：“幽，深也。贊，明也。”孔穎達疏：“幽者，隱而難見，故訓為深也。贊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訓為明也。”⑤已將“佐助”之義參入韓說。但孔氏最終仍將“贊”落實到“明”，取義明達，則“幽贊”

即“深明”：“聖人作《易》，其作如何？以此聖知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著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也。”⑥

4. 介紹以傳命。《東坡易傳》：“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著龜為之介紹。”⑦項安世《周易玩辭》：“生著，謂創立用著之法，神不能言，以著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明。”⑧這裏的“贊”已有“佐助”之意。

5. 佐助。朱震：“神明，天地也，聖人贊天地以立人道，于是生著之法以起數，其用起於一。及其究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迹，故曰幽贊”，⑨“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迹”就是“贊天地”，即朱熹所謂：“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⑩按《禮記·中庸》：“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鄭注：“贊，助也。育，生也。”⑪

元人吳澄也持此說，但不是“贊化育”，而是“贊幽”：“幽，謂神明之理微而不顯也。贊，猶助也。……此言聖人肇創著法，代為神明告人以吉凶。所以贊助其幽而使其靈之顯也。”⑫

高亨先生又有新解，以“贊助”的賓語為“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言聖人作《易》，暗中受神明之贊助，故生著草，以為占筮之用。非聖人幽贊神明，乃神明幽贊聖人”。⑬

6. 耦。元王申子以“幽贊”之“贊”為“奇偶”之“偶”，所謂“幽贊之數者，奇耦之數也。”⑭

綜觀上述，除王、高二說外，各說均以“聖人”為“贊”的主語。確定主語，是辨明“贊”字本義的關鍵。高亨先生提出“神明幽贊聖人”一說，即從辨明主語入手。但高說以“舊注多誤”，“幽贊於神明而生著”之“於”為“表示被動之介詞”，⑮尚可商榷，但其所釋“於”字用例，與下文緊接的“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不合。

馬王堆帛書《周易》傳文《要》篇的發現，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明確的線索。《要》：“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贊”的主語，為“巫”無疑。《說文》：

巫，祝也。

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為口，為巫。

按《說卦》：“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很明顯，巫主贊詞，與“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相合。贊，為告贊。

《要》篇“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與“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史”相提并論，所以“幽贊”之“贊”必與“贊而不達於數”之“贊”同義，取義告祝、告贊。在《說卦》中，“幽贊”的主語就是“聖人”。“幽贊於神明”一語，目前僅見於《周易》傳文。傳本《說卦》以外，馬王堆帛書《易贊》<sup>①⑥</sup>第十四行也有：

-----贊於神明而生占也，參天兩<sup>①⑦</sup>地而義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

不難發現，《說卦》、《易贊》、《要》篇諸“贊”，釋作“祝告”，皆較前引各家釋說平易通順。

此外，陸德明《經典釋文》“幽贊”“或作讚”。<sup>①⑧</sup>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條：“《石經》、岳本、閻、監、毛本同《釋文》本，贊或作讚。”<sup>①⑨</sup>讚皆从言。

先秦時期的巫，從定義到角色，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學者們對於巫的探討，可見《燕京學報》第七期瞿兌之《釋巫》<sup>②①</sup>，第二十期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sup>②②</sup>，許地山《道教史》<sup>②③</sup>等。此外，又有藤野岩友《巫系文學論》，<sup>②④</sup>加藤常賢《巫祝考》，<sup>②⑤</sup>陳炳良(Chen Ping-Leung) *Chi'u Tzu and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sup>②⑥</sup>David Hawke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sup>②⑦</sup>和Remi Mathieu, *Chamanes et Chamanisme en China ancienne* 等。<sup>②⑧</sup>伯克利加州大學也有學者討辨其詳。<sup>②⑨</sup>張光直先生《商代的巫與巫術》<sup>③①</sup>是在《美術、神話與祭祀》之後，研究巫最富影響的著作，其初步結論或可歸為四點：

(一) 商人的世界分為上、下兩層，即生人的世界與鬼神的世界。這兩者之間可以互通：神鬼可以下降，巫師可以上陞。

(二) 商代的巫、政，是密切結合的。因為商人相信神鬼先知的智慧，可以獲得這種智慧的人便可以獲得政治的權力。

(三) 神巫的降陞是巫術的結果，法器在巫術中佔有重要地位。佔有法器是佔有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這在考古發現的各種藝術品中均有表現。

(四) 殷商巫術中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特別值得注意，這種關係包括兩種觀

念：一是人與動物可以彼此轉形，二是動物作為巫師的親昵伙伴是巫師作法的助手。<sup>⑤0</sup>

從上古醫學與浪漫詩歌、文學、樂舞的角度研究古巫，當推周策縱先生的《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為代表。<sup>⑤1</sup>然就古史研究而言，饒宗頤先生《歷史家對薩滿主義應重新作反思與檢討——巫的新認識》，<sup>⑤2</sup>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饒先生所論的中心，是“希望大家對‘巫’一概念正視，可否採用舊觀念的‘禮’，和有關的制度去細心探討來代替‘巫’的看法，換句話說，從制度史觀點來整理古史，”<sup>⑤3</sup>這無疑是深有意義的。

許地山先生將巫的職能概括為六項：降神、解夢、預言、祈雨、醫病、星占。<sup>⑤4</sup>這當然未局限於先秦時期。巫有祝告之職的記載可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sup>⑤5</sup>杜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sup>⑤6</sup>孔疏：“巫是禱神之人。”<sup>⑤7</sup>又《公羊傳》隱公四年：“於鍾巫之祭”，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sup>⑤8</sup>可見先秦古巫之職中，包括了祝告祈禱的內容。卜筮中的祝告，已有學者鉤稽於《春秋》內外傳。<sup>⑤9</sup>李學勤先生、王宇信先生在周原卜辭里釋出“思”字。<sup>⑥0</sup>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教授綜考傳世文獻和戰國楚簡，認為“思”是動詞，是卜人向鬼神表示祈求，“思”後的命辭，屬“祝辭式的尾語”。<sup>⑥1</sup>如此，起碼在周代的貞卜過程中，有告贊、祝祈之事是沒有問題的。

《周官》司巫15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所職並無祈禱祝告之事。祝祈之事，《周官》屬之大祝一系祝官。先秦古巫的角色與職能未能嚴格區劃或固定不變，可能是正常的現象。從《要》“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的角度來看，《要》篇巫的職能，似包括了《周官》中祝的一些工作。

## 二 數與史

《要》：“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說明史的工作是與數關聯的。《說文》：“史，記事者也。”王國維《釋史》有詳考。<sup>⑥2</sup>《要》篇之史，指卜筮之官。《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

韋昭注：“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sup>⑥3</sup>馬融言“筮短龜長”，有



“筮史短，龜史長”語。<sup>④④</sup>史，每與筮史連稱。筮，即數。《史記·日者列傳》記賈誼言：

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索隱》引劉氏云：“數，筮也。”<sup>④⑤</sup>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遇《歸妹》之《睽》。及惠公在秦，論及先君之占，韓簡侍曰：<sup>④⑥</sup>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孔穎達疏：“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筮以陰陽著策之數而告人”。<sup>④⑦</sup>這就涉及了陰陽五行生物、成物的層次，是知“滋而後有數”之“數”，並含生數、成數。

生數，一二三四五，五為生數之極；成數，六七八九十，十為成數之極。葉子奇《太玄本旨》：

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為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sup>④⑧</sup>這就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合五十之數；五十為極數，所以說“大衍之數五十”。五十居生數成數之極，所以能占筮，《繫辭》所謂“極數知來之謂占”。

占分卜、筮。卜屬生數，筮屬成數。肖吉《五行大義》：七、八，“靜爻之數，夏殷尚質，以用靜爻占之；”九、六，“動爻之數，周備質、文，故兼用動爻。”<sup>④⑨</sup>七、八、九、六皆屬筮得，是成數，饒宗頤先生從龜卜通例，大抵止於五卜，指出殷人觀念，已有“龜屬生數”。<sup>⑤⑩</sup>生數、成數，分歸卜、筮；史掌卜、筮，自當“達乎數”或“明數”。

筮必然達數。李學勤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即注意到記數刻辭與殷商卜辭的明顯不同，並聯繫到《周易》的九、六加以考察。<sup>⑤①</sup>1978年底，張政烺先生於長春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首次運用《周易》解釋周原甲骨上的紀數符號，開始了“數字卦”的研究。<sup>⑤②</sup>其後，有學者根據考古材料，將數字卦的上限明確至晚商。<sup>⑤③</sup>饒宗頤先生又根據考古新材料，論證了殷代契數卦象確實存在，並上溯到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契數。<sup>⑤④</sup>可見，筮、數有着古遠的傳統。筮達於數，是帛書《要》篇巫史之辨“明數”之說的術數意義所在。

上引公子重耳筮得國，先由“筮史占之”，知筮官可名作史。

宋人馮椅注《易·巽》九二：《周官》：史掌卜筮。<sup>⑤⑤</sup>按《周官》大史一系



史官，以掌典志法則為主，非專卜筮。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史官自古為要職，歷代學者多有考論。<sup>⑤</sup>商代卜辭中已見“大史僚”：《殷虛書契（前編）》五·三九·八：“令，其唯大史僚令。”<sup>⑥</sup>王國維《釋史》：“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sup>⑦</sup>就卜筮而言，《周官》所記史官所掌，約有二職：一為觀兆，一為記錄。《春官·占人》：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墨，鄭玄注：“兆廣也。”孫詒讓案：“墨蓋謂龜兆所發之大畫，如以墨畫物之界域明顯。”<sup>⑧</sup>史負責審視粗大的兆紋，也即《禮記·玉藻》所謂“史定墨”，<sup>⑨</sup>此其一。《占人》又有：“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注：“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sup>⑩</sup>史又負責記錄占卜的命辭和所占的吉凶，此其二。史的這兩項工作雖都是占筮之事，但由於並非筮者，所職似與數沒有直接的關係。

《儀禮·少牢》記史主筮：

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鄭注：“史，家臣主筮者。”<sup>⑪</sup>這就是“數而不達於德”的筮史之史了。《禮記·郊特牲》：<sup>⑫</sup>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祝史即史，詳下，史之事，“失其義，陳其數”，正合《要》篇“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

其實，如果脫離《要》篇的文義，對於“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的理解，可以不局限於卜筮。

古掌歷數之官也稱史。《周語》柯陵之會，單襄公對魯成公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sup>⑬</sup>瞽史是知道“天道”的。鄭玄《論語注》：“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sup>⑭</sup>《堯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七政，日、月、五星也。”<sup>⑮</sup>所以，史知日月五星的運數。《周官》史官馮相氏、保章氏類此，孔穎達有詳辨：

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有之虞，若今之司歷，處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有，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sup>⑯</sup>

不論主推步遲疾，還是觀度恒次，史官均須“達於數”。

鄭玄注《周官》：“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氏：‘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sup>⑥</sup>《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歷象’，《五帝本紀》訓以‘數法’。歷，《爾雅·釋詁》訓‘數’。<sup>⑦</sup>大史典知歷數，也是達於數。《繫辭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三、五并非‘代表較小而不定之數字’，<sup>⑧</sup>而是指代生數，這樣纔可以‘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極其數，兼括了生數、成數。馬王堆帛書《德行》以明數而知為有德。《德行》第三百四十二行：

鐵而知之，天也。鐵也者，賁數也。<sup>⑨</sup>

在《德行》中，天，就是德。第二百二十四行：

德猶天也，天乃德已。<sup>⑩</sup>

賁數，就是持數、明於數。所以，“鐵而知之，天也”，就已經是“明數而達乎德”了。

### 三 贊·數·德

帛書《要》篇中“德”字凡九見：<sup>⑪</sup>

1. 無德，則不能知易。故君子尊之。
2. 夫子曰：德薄而位尊，□□鮮不及。<sup>⑫</sup>
3.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蔡”。賜以為然矣。
4. 察其要者，不詭其德。
5. 子曰：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
6. 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之耳。
7. 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
8. 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
9.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簡言之，《要》篇之“德”約有二義：一為德行仁義之德，如第2、3、9例；一為天理德義之德，如第4至8例。

上述二義，都與“數”相關。

如仁義之德。《左傳》僖公十五年，韓簡蒯晉獻公筮嫁伯姬，先論象、數，繼而比德以數：“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

數乎？”<sup>⑮</sup>以為獻公之敗德，非筮數所生；敗德既定，筮數因而後知；數可以告吉凶，不能變敗德。這是一種德與數的關係。

又如天理之德。《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子大叔與趙簡子論禮，引子產：“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sup>⑯</sup>天地之經，就是一種天理德義。天經地義，散為萬物，生六氣，用五行，故有五味、五色、五聲。五為生數之極。因此，禮奉五味、五色、五聲，就是奉天道，奉天理德義。奉天道天德，當明數，所以“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sup>⑰</sup>這是另一種德與數的關係。

這後一種德與數的關係，正是“明數而達乎德”之德與數的關係，這種關係，或者說這種觀念，有着古遠的傳統。

舜繼堯位，攝行天子之政，首“觀天命”，察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東巡泰山，“修五禮、五玉”，贊以三帛、二生、一死。<sup>⑱</sup>從日月五星七政，到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在在明數以順天德，東巡燔柴，祭天而告，或告贊之濫觴。楚昭王時，先王祀禮中的贊、數、德之詳，已少有人知，觀射父明之：

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丑，非民經人，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適至，則無不受休。<sup>⑲</sup>

換言之，則其所適告（贊），奉以一純、二精以至百姓、非民經人咳數（數），聽之以和聲，昭之以明德（德）。先王之祀如此，百姓也類似：“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數），虔其宗祝，道其順辭（贊），以昭祀其先祖（德）”。<sup>⑳</sup>顯然，先秦古禮中，贊而數、數而德的關聯不僅淵源古遠，而且深入朝廷祭祀與平民祀禮。然而，至少在楚昭王時，祀禮中贊、數、德的古義，已瀕於湮沒。

值得注意的是，馬王堆帛書《要》篇所論贊、數、德的關係，在今本《周易·說卦》中依然存在。

《淮南·道應》開篇，記有太清問無為是否知道“道”之有“數”的一段問答：<sup>㉑</sup>

（太清）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

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無為所述道之數，在於柔剛、陰陽與天地之義。天地、陰陽、柔剛之義，今本《易傳》多有論及。《繫辭上》：“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淮南子》中道、德相通。《原道》：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sup>④</sup>所論“道之數”也應通於“德之數”。而陰陽、剛柔與天地之義，在今本《易傳》中，恰通於“神明之德”，《繫辭下》：“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說卦》中有一段文字與帛書《要》篇“幽贊而達乎德”層層對應，這種對應如果從《淮南·道應》中“數”的觀念來理解，就會更加明顯。《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幽贊），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數——天地、陰陽、剛柔），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德——道德、理義、性命）。

幽贊達數，明數達德，可謂環環相扣。

至此，帛書《要》篇幽贊、明數、達德的術數特徵已經非常明顯。檢討贊、數、德三者的關係，我們認識到：第一，不論從先秦卜筮的過程來看，帛書《要》篇“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都應該是先秦古義；第二，今本《周易·說卦》中“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的意義沉淪已久，賴帛書《要》篇的問世而得以昭明。這當然為帛書《周易》傳文與今本《周易》傳文兩者關係的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角度。

#### 四 巫、史之辨

帛書《要》篇詳論巫、史之辨，但在行文上，祝、卜、巫、史的用法，並不是如我們想象得那樣嚴格。在文例上，《要》篇有巫、史不辨例。

重讀《要》篇“子曰：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云云，可以將其“祝”、“史”、“巫”、“卜”的用法提出，如下：

-----祝卜-----，-----巫；-----史。史巫-----，-----史巫-----

不難看出，“巫”、“史”的單獨使用，僅在討論巫、史之辨之際：“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除此之外，則以祝卜



史巫來泛指占人，諸如“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之類。

說《要》篇有巫、史不辨例，是上引第一個“史巫”的用法：“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如前所述，筮達於數；“筮史”連用，前已說明。《要》篇之“巫”，應該是“贊而不達於數”之巫；《要》篇之巫“不達於數”，亦即無筮。《要》篇又稱“史巫之筮”，則以巫亦有筮，不合前句巫史相辨之義。這裏的“史巫之筮”，“史巫”之“巫”恐怕不是涉上而衍；“史巫”連用，是一種寬泛的巫、史不辨之例，應出於講經時舒緩語氣的遺痕，是帛書《要》篇的口傳之跡。<sup>⑧</sup>

然而，巫善筮法，文獻多有記載。《太平御覽》引《歸藏》：<sup>⑨</sup>

昔黃神與炎神爭斗涿鹿之野，將戰，筮于巫咸……

《路史·后紀》：<sup>⑩</sup>

……巫咸、巫陽主筮。

譙周《古史考》：<sup>⑪</sup>

庖犧氏作卦，始有筮。其后，殷時巫咸善筮。

饒宗頤先生更舉《周禮》鄭注與卜辭，以證巫與筮相通：<sup>⑫</sup>

予謂殷當有筮法，卜辭出字，以《詛楚文》證之，為“巫”字無疑。

巫與筮通，《周禮》筮人有九筮，曰巫更巫咸等，鄭注：“巫讀皆當為筮。”

卜辭有云：

丙戌卜貞：巫曰：集貝于帛用，若。一月。

（《零拾》二三，《續存》下二二八重）

“巫曰”讀為“筮曰”，於義可通。

綜上可知，文獻所記上古之巫也主筮。《要》篇既謂巫“贊而不達於數”，又稱“史巫之筮”，可能也是受這種古義影響的表現。

在帛書《要》篇中，巫、史之辨，是清楚的；巫史不辨，是存在的。巫、史之辨，是《要》篇成篇時的一種思想；巫、史不辨，是《要》篇中殘存的一種古代觀念。辨分巫、史時，“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不辨巫、史時，“史巫”連稱，泛指“祝卜”、“祝巫卜筮”之人。

在《要》篇中，根據巫、史之辨的思想，祝、巫、卜、筮與“祝卜”，說的就是“巫史”。



“祝巫卜筮”一詞，在《要》篇第七至八行，後有缺文近三十字。<sup>⑧</sup>如前文所述，《要》篇中的巫從事《周官》中祝的一些祝告之事。如此，“祝巫”連用即指巫，可無疑義。史掌卜筮，前述已詳：“卜筮”連用，也即是指史。那麼，《要》篇的“祝巫卜筮”如果是一個詞組的話，說的應該就是“巫”“史”。同理，《要》篇“祝卜”，也即“巫”“史”。這種聯繫與區別，是《要》篇的巫、史之辨之義決定的。

可以比較一下《周禮·春官》所記祝卜之官與《要》篇的史巫之職。《春官》所記祝卜之官如下：

“大卜”一系：大卜，卜師，龜人，巫氏，占人，筮人，占夢，眠視；

“大祝”一系：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

“司巫”一系：司巫，男巫，女巫；

“大史”一系：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

帛書《要》篇所稱相應官職如下：<sup>⑨</sup>

巫一系：巫，祝巫，巫之師；

史一系：史，卜筮，卜筮。

依據上述巫、史之辨的思想與《周禮》所記，《要》與《周禮》祝卜之官的對應如下：

《要》	巫	史
《周禮》	大祝	大卜、大史

可以發現兩個問題：

第一，《要》篇的“巫”與《周禮》“司巫”一系的巫官，在職掌上不能對應；

第二，《要》篇的“史”與《周禮》“大祝”一系的巫官，未有對應。後者，與我們理解的巫、史之辨是一致的；前者，或許關係到殷、周之制的傳承、交接問題。

商代有巫是沒有問題的。《殷虛文字乙編》有再氏巫(8165)、妥氏巫(4628)、周氏巫(7801)，據研究是從各個國族進貢來的女奴。<sup>⑩</sup>《周禮》“女祝”，鄭注以為“女奴曉祝事者。”<sup>⑪</sup>這樣，周代的女祝，在殷商是巫，也就是說，商代的巫，職掌一定的祝事；而周代的巫，不掌祝事，祝事全歸“大祝”一系祝官職掌。周代的巫，職掌比商巫專狹；而商代的巫，已經在《周禮》“司巫”一

系巫官之外。很明顯，這裏的考察標志就是巫是否職掌祝贊之事。

商巫不包括在《周禮》“司巫”一系巫官之內的意義，在於帛書《要》篇所辨之“巫”，與《周禮》“司巫”一系巫官無涉，而與商巫之制遙相承應。這也許說明了這麼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在一定的社會範圍內，尤其在卜筮界，仍有部分士人歷有周之世，在一定程度上傳續着殷人的文化傳統和禮官制度。這種制度與官方之制（或可以《周官》為代表）相應而不相同，並傳於世而有別，這或許是商巫、周祝與周巫之間存有上述複雜關係的原因。

當然，《要》篇孔子講論巫、史之辨的目的，並不是在講論殷制。孔子口中的巫、史之辨，目的是為宣言《易》之德義服務的。因此，《要》篇巫、史之辨雖可能存有殷制遺痕，但並不是在講殷制，所以其文既有巫史不辨之例，其巫也與筮不相關涉。這是理解帛書《要》篇巫、史之辨需要注意的一點。

## 注 釋

- ①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第435頁。
- ② 釋文“復”乃“後”誤。
-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第1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④ 《周易集解》卷十七，第1頁。
- ⑤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十三，第2—3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7冊。
- ⑥ 同上，第2頁。
- ⑦ 蘇軾：《東坡易傳》卷九，第1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9冊。
- ⑧ 項安世：《周易玩辭》卷十五，第1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14冊。
- ⑨ 朱震：《漢上易傳》卷九，第1頁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11冊。

- ⑩ 《原本周易本義》卷十，第1頁。
- ⑪ 《禮記正義》卷五十三，第404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按顏師古有別解。《漢書·匡衡傳》：“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顏注：“贊，明也。”
- ⑫ 吳澄：《易纂言》卷十，第1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22頁。
- ⑬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6月，第608頁。
- ⑭ 王申子：《大易緝說》卷十，第23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24冊。
- ⑮ 《周易大傳今注》，第608頁。
- ⑯ 《易贊》即《易之義》，說見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⑰ 釋文“雨”乃“兩”誤。
- ⑱ 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第30頁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
- ⑲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九，第84頁，《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
- ⑳ 瞿兑之：《釋巫》，《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第1327—1345頁。
- ㉑ 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第20期（1936年），第485—567頁。
- ㉒ 許地山：《道教史》，第159—167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 ㉓ 藤野岩友：《巫系文學論》，東京大學書房1969年修訂版。
- ㉔ 加藤常賢：《巫祝考》，《東京支那學報》1955年第一期，第2—48頁。
- ㉕ Ping-Leung Chan (陳炳良), *Ch'u Tz'u and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楚辭》與中國古巫)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2.
- ㉖ David Hawke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楚辭) Penguin Classics, 1985.
- ㉗ Remi Mathieu, *Chamanes et Chamanisme en Chine ancienne.* (中國古代的巫與巫術) *L'Homme* 27 (1987), 第10—34頁。
- ㉘ David Keegan, "A Translation of the Longest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chia-pien 2416, and a study of the Possible Antecedent of Wu", (最長的商卜辭——《甲編》2416與巫的

可能的始祖) *Early China* 3 (1977), 第119—120頁。

- (29)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第39—66頁,三聯書店1990年版。英文版見 Peterson, Plaks & Yu (ed.),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kong (1994) 第10—36頁。
- (30) 《中國青銅時代》二集,第65—66頁。
- (31) 周策縱:《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6年版。
- (32) 饒宗頤:《歷史家對薩滿主義應重新作反思與檢討—巫的新認識》,《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第396頁—412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 (33) 同上,第410—411頁。
- (34) 《道教史》,第160—164頁。
- (35)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四,第109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 (36) 同上。按杜注有所說,裴錫圭先生指出應從後說,見《說卜辭的楚巫魘與作土龍》。裴錫圭:《古文字論集》,第216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 (37)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四,第109頁。
- (38)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第11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 (39) 夏含夷:《試論周原卜辭凶字—兼論周代貞卜之性質》,《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第304—308頁。
- (40) 李學勤,王宇信:《周原卜辭選釋》,《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第245—257頁。
- (41) 《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第304—308頁。
- (42)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263—274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 (43) 《國語》,第362—36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 (44) 《周禮正義》卷二十四引,第167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 (45) 《史記》,第3216頁,中華書局點校本。按《索隱》此節,《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作:“劉氏云‘數,筮也’,亦通。筮必[用]《易》(用)大衍之數者也”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本與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均為：“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 ④⑥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四，第105頁。
- ④⑦ 同上。
- ④⑧ 葉子奇：《太玄本旨》卷九，第16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803冊。
- ④⑨ 蕭吉：《五行大義》第三，第7頁。《叢書集成》本。
- ⑤⑩ 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文史》第二十輯，第10—11頁。
- ⑤⑪ 李學勤：《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第16—17頁。
- ⑤⑫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第403—415頁。
- ⑤⑬ 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第155—163頁。
- ⑤⑭ 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諸問題》，《文史》第二十輯，第1—13頁。
- ⑤⑮ 馮椅：《厚齋易學》卷二十九，第7頁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第16冊。
- ⑤⑯ 如汪永《周禮疑義舉要》；孫詒讓《周禮正義》；王國維《釋史》；劉師培《古學出于史官論》、《補古學出于史官論》，《劉申叔先生遺書》；呂思勉《讀史札記》；徐復觀《原史》，《兩漢思想史》卷三；李宗侗《史官制度》；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1冊等。
- ⑤⑰ 羅振玉：《殷虛書契》卷五，第39頁下。
- ⑤⑱ 《觀堂集林》，第269頁。
- ⑤⑲ 《周禮正義》卷四十八，第83—85頁。
- ⑥①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第247頁。
- ⑥② 《周禮正義》卷四十八，第85頁。
- ⑥③ 《儀禮注疏》卷四十七，第252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 ⑥3 《禮記正義》卷二十六，第227頁。
- ⑥4 《國語》，第90頁。
- ⑥5 《後漢書·桓譚傳》注引。
- ⑥6 《尚書正義》卷三，第14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在《舜典》）。
- ⑥7 《周禮正義》卷三十二，第31頁。
- ⑥8 《左傳》桓公十七年服注，按孫詒讓疏“大史”：“此官掌正歲年以治曆，歲年皆積日所成，故謂之日官。”《周禮正義》卷五十一，第63頁。
- ⑥9 《爾雅注疏》卷二，第10頁，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本。
- ⑦0 《周易大傳今注》，第532頁。
- ⑦1 魏啓鵬：《馬王堆漢墓帛書德行校釋》，第73頁，巴蜀書社1991年版。
- ⑦2 同上，第29頁。
- ⑦3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第434—435頁。
- ⑦4 這句釋文有異本，見《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第27、42頁。
- ⑦5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四，第105頁。
- ⑦6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一，第405頁。
- ⑦7 同上。
- ⑦8 《尚書正義》卷三，第15頁。
- ⑦9 《國語》，第565頁。
- ⑧0 《國語》，第567頁。
- ⑧1 《二十二子》，第1257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⑧2 《二十二子》，第1206頁上。
- ⑧3 帛書《周易》口傳的特徵，請見李學勤先生《帛書〈易傳〉及〈繫辭〉的年代》，《中國哲學》第十六輯，第5—7頁。
- ⑧4 《太平御覽》卷七十九，第2—3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 ⑧5 賦秋山匯評：《路史》卷三，第6頁上，同治四年（1865年）刊本。
- ⑧6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卷七十五，第1頁下。
- ⑧7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40頁，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

⑧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第434頁。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第434—435頁。

⑩ 張亞初：《商代職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第90頁。

⑪ 《周禮正義》卷一，第5頁。

## 帛書《十大經》補箋

魏啟鵬（四川大學）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前古佚書四種的發現，曾經是激動學術界人士的盛事，唐蘭先生考證此即《黃帝四經》，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在1980年3月出版的8開精裝本擬定名為黃帝書。四種古佚書首次正式整理公佈，見於1974年9月文物出版社所出《馬王堆漢墓帛書（壹）》6開線裝本之第一冊圖版、第四冊釋文，迄今已經24年了。筆者近年重溫上述二種整理本，以及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所出32開簡化字橫排本《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不能不深深感佩整理者筭路藍縷，在艱難時事下的開創之功，學習研讀之餘，拾遺補苴，間或有之，現綴集其中《十大經》補箋數則，以求正於方家。

### 《立命》四則

■ 四達自中，前參後參，左參右參，踐位履參，是以能為天下宗。

案：參，即三。《廣雅·釋言》：“參，三也。”“前三後三”數句，言黃帝登基時以步履周行前後左右，即履踐南北東西四方十二位，行禮而執告天地。參看《左傳·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土而載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白虎通德論·禮樂》：“禮之為言履也，可履踐而行。”又，帛書整理小組指出，“四達自中”云云，與所謂“明堂”相似。其說是也。《太平御覽》卷五三三引《禮記外傳》：“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官，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唐虞為五府……，周人謂五府為明堂。夏后氏一堂之上為五室，……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心為天子明堂，或以明堂獨以一室耳。”雖唐人成伯璵撰述，文中猶可

窺見些許“四達自中”古義。

·吾受命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

案：整理本注，《鶡冠子·世兵》：“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補箋，《漢書·鼂錯傳》載錯對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數日，曆月，計歲，以當日月之行。

案：曆借為曆。《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曆猶算也。”參看《大戴禮記·曾子天圓》：“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

·允地廣裕，吾類天大明

案：整理本注云，“此文允字疑讀為循，允上疑脫一‘吾’字”。補箋，允讀為沿，《說文》載沈古文作沿，是允聲與沿聲相通之證。沿，有因循、依照之義，正與下文“吾類天大明”之“類”字對文而意近。

## 《觀》五則

·以觀無恒，善之法則。

案：斷句從1976年簡化字橫排本，正文開始，依次以“匿”、“國”、“則”協職部韻。所稱無恒，指後文提到的“天地已成而民生”但人民缺乏穩定而有規範的德行。恒：謂恒德、常德。《周易·繫辭下》：“恒，德之固也。”《論語·子路》：“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周易·恒卦》彖傳：“觀其所恒。”同卦象辭：“‘不恒其德’，無所容也。”皆可見古之聖賢對缺乏恒德的重視和憂慮。善：謂整治，據理引申。《易畧列》：“故有善邇而遠至。”邢注：“善，脩治也。”《釋名·釋言語》：“善，演也，演盡物理也。”王先謙疏證補：“《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演，引也。’其言引申物理，莫不曲盡，斯為善矣。”本文“善之法則”，指為民衆制定行為規範和法制準則，故後文復言“欲得逆順之〔紀〕，……以為天下正，靜作之時，因而勸之”云云。

·得天之微

案：天之微，猶言天之精。《荀子·解蔽》：“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楊注：“微，精妙也。”此指道、天道，《呂氏春秋·大樂》：“道也者，

至精也。”

·不靡不黑

案：1976年橫排本云：“靡黑，疑讀為徽纆。《周易·坎卦》：‘係用徽纆’”。1980年整理本云：“靡字疑讀為徽，黑字疑讀為纆，二者皆繩索之名。”補箋，1980年本“徽”字似為排印之誤，然“徽”、“徽”二字皆微有省聲，古音明母微部，與歌部字“靡”不易通假。靡疑借為縻，繫牛馬之韁索。《史記·司馬相如傳》：“其義羈靡勿絕而已。”索隱：“縻，牛韁也。”黑借為纆，說詳周祖謨先生《漢代竹書和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考訂》三之9曉母。纆，指糾纆，即兩股、三股合成之繩。《文選·賈誼〈鵬鳥賦〉》：“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李善注：“《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纆相附會也。”此句意為，不用韁索就不能約束和使民眾歸附，所以要用刑德教正、訓練民眾。

·地尤復收

案：1980年整理本注云：“尤當作氣，形近致誤，下文‘地尤不受’同。《淮南子·天文》：‘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補箋，“尤”當為“无”，帛書无作无，尤作无，因形似而訛。无讀為氣，二字古音為見、溪旁紐，同隸物部，故得通借。由无得聲的“既”字，古與“气”字相通，《說文》：“氣，從米气聲，或從既聲”，氣又作絜，是為佐證。後世道教鈔寫經籍，精氣、元氣之氣字，亦常以“炁”字為之，故《玉篇·火部》云：“炁，古氣字。”

·優未愛民，與天同道。

案：整理本注：“未，疑讀為惠。”補箋，未讀為閔，二字古音同為明母，其韻物、文對轉，故得通借。優，渥也、多也。閔，勉也。《尚書·君奭》：“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孔傳：“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孔穎達疏：“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顏氏云：我也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與帛書此句文意相近。

## 《五正》四則

·吾欲布施五正



案：正通政。《論語·為政》皇疏：“政，謂法制也。”五政，疑即五法。《禮記·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任大椿《深衣釋例》指出：“考《禮宗》云：‘黃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素風尚近，惟白布深衣，齊則緇之。’（案：任氏乃據《路史》卷十四注轉引）蓋黃帝之世，自祭服外，惟有深衣大帶而已。”由此可見，司馬遷《素王妙論》稱“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即《禮記·深衣》所述“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由此得到詳細的闡釋，故王充云：“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論衡·自然》）杜光庭亦云：“至道垂裳。”又，《鶡冠子·度萬》：“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變九道，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乃本於帛書此篇，但今本《鶡冠子》及陸佃注所論“五正”、“五明”，已與帛書文意出入甚大。

• 始在於身，中有正度

案：二句言黃帝始着深衣於身，應規、矩、繩、權、衡之制，以身作則，中正公平，垂示臣民以法度。此即“取稽於身”，“以身為法度”。《史記·夏本紀》亦載有類似傳說，謂夏禹“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璽璽穆穆，為綱為紀”。（《集解》引王肅曰：“以身為法度。”《索隱》：“又一解云，上文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出於其身。”《正義》佚文：“言出教命皆合衆心，是稱以出也。按：稱者，衣服也。”佚文據張衍田輯校本。）“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 五正既布，以司五明

案：此二句言，規、矩、繩、衡、權五政公佈之後，法度明確，可以治國。有規、矩則明圓、方，有繩則明曲直，有衡、權則明輕重，故稱五明。參看《荀子·王霸》：“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案：誣，欺騙。

《廣雅·釋詁二》：“誣，欺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荀子說，乃發揮本書五正、五明之旨。荀子所言禮，猶黃老之學言法也。

·上於博望之山。

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齊宣王時，“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其地在齊之博陵邑境內（今山東省茌平縣博平舊城西南），先秦時北臨黃河，乃要衝之地。唐屬博州，《通典》卷一百八十謂“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為衛、齊、趙三國之交”。據陳侯因資敦銘文可知，田齊既尊黃帝為高祖，稷下所傳黃帝之學，不免要指認黃帝怡卧自求之山亦在齊境。一說，此即安徽省當塗縣之博望山，在長江之畔，兩山對峙而起，東曰博望，西曰天門，又稱東梁山、西梁山。謹案，後一說地望，即《左傳·昭公十七年》所載楚敗吳水師處，地名長岸，晉司馬彪《郡國志》稱為天門山，亦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宋孝武帝劉裕詔稱梁山、天門，稱博望最早見於李白《天門山銘》“梁山博望，關雎楚濱”及其後的《元和郡縣志》，似為後起之地名。

《雌雄節》二則

·皇后屯曆吉凶之常

案：整理本注云：“屯曆，疑即洞歷。《論衡·超奇》：“上通下達謂之洞歷。”常，準則。”補箋：王充所論乃東漢周樹所撰《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記載，與太史公表、紀相類似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且屯、洞二字雖同為定母，但一隸文部，一歸東部，似難以通假。屯疑讀為推，二字古音為定、透旁紐，其韻文、微對轉，例可通借，《毛詩·小雅·采芣》：“嘽嘽惇惇。”《漢書·韋玄成傳》引惇惇作推推，又《老子》五十八章：“其民淳淳。”帛書《老子》乙本淳淳作屯屯。此微部之佳聲與文部之臺聲、屯聲互通之佐證。屯曆，即推曆。《呂氏春秋·貴因》：“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史記·曆書》稱“黃帝考定星曆”，《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亦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又云以曆譜

考寒暑殺生之實，“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蓋古人辨雌雄節之運用，似與星曆之術相關，故本篇有黃帝（即“皇后”所指）推曆吉凶之常的敘述，以求“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見《淮南子·原道》）。或謂推曆、推歷即推算，亦通。

### ·散德 誇德

案：本篇謂“凡人好用雄節，是謂方（妨）生。大人則毀，小人則亡。以守不寧，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戰不克，厥身不壽，子孫不殖是謂凶節，是謂散德”。《逸周書·文酌》注：“散，失也。”《淮南子·原道》：“不與物散。”注：“散，亂也。故‘散德’猶言失德、亂德。”凡人好用雌節，是謂承祿。富者則昌，貧者則穀。以守則寧，以作事則成。……是謂吉節，是謂誇德。”疑誇讀為夸。《廣雅·釋詁一》：“夸，大也。”《毛詩·唐風·椒聊》鄭箋：“大謂德美廣博也。”《禮記·少儀》鄭注：“大謂富之廣也。”又《文選·傅毅〈舞賦〉》李善注：“夸，猶美也。”故知“誇（夸）德”猶言大德也。

## 《三禁》一則

### ·天道壽壽，番（播）於下土，施於九州

案：整理本注：“壽壽，疑讀為悠悠，遠意。”補箋：疑壽讀為燾，或作幬。《逸周書·作雒》：“燾以黃土。”注：“燾，覆。”《史記·吳太伯世家》：“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此語，燾作幬。《說文》：“燾，溥普照也。”壽（燾）燾（燾），重言疊詞，其義為覆蓋、蔭庇。此句言天道普覆下土，盡施九州，即帛書《道原》“盈四海之內，又包其外”之意。

## 《十大經》一則

### ·大經

案：“大經”應為一詞，其義為常規、大法，指基本的原則或規律。《左傳·昭公十五年》：“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呂氏春秋·驕恣》：“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

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高注：“經，道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史記·貨殖列傳》：“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皆是其證。

本篇居全書之末，整個內容可以說就是十句話，十條具有“大經”性質的典則。借用叔向的話說，“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左傳·昭公十五年》），所以“大經”之言有相當精練而概括的特點。李學勤先生在《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他》一文中分析本篇，指出：

分析《經》篇這末一章，可以看出確可劃為十句雖互有聯繫，又各成格言的話，且能以韻腳來判定：

（一）“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形。”“名”“形”，古耕部韻。

（二）“形恒自定，是我欲靜。”“定”“靜”，耕部韻。此語與上同韻，但意義有別。

（三）“事恒自施，是我無為。”“施”、“為”，歌部韻。此語與上意聯，而韻腳已轉。

（四）“靜翳不動，來自至，去自往。”“動”、“往”，東、陽合韻。

（五）“能一乎？能止乎？”

（六）“能毋有己，能自擇而尊理乎？”以上句，“止”、“己”、“理”，之部韻，押韻同，但意義則兩者不同。

（七）“紓也毛（應為屯字之誤）也，其如莫存。”“屯”、“存”，文部韻。

（八）“萬物群至，我無不能應。”此句無韻。

（九）“我不藏故，不挾陳，鄉者已去，至者乃新。”“陳”、“新”，真部韻。

（十）“新故不琴，我有所周。”“琴”、“周”，幽部韻。

篇末書“十大經凡四千六□□六”，1976年簡化字橫排本作“凡四千□□六”，李學勤先生說，“經再三觀察，此處似以‘凡四千五十六’可能為大”，這顯然是全書十五篇的字數估計，而不是作為最後一篇《十大經》的字數。故很可能是原件鈔寫時，“經”字下脫一重文符號“二”，如果如此，原文殆為“《十大經》。《經》，凡四千五十六。”（標點乃筆者試加）可見，李學勤先生認為帛書《黃帝書》的第二種標題為《經》，是極有見地的。



## 帛書《刑德》丙篇試探

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

馬王堆帛書《刑德》丙篇因其殘破太甚，自出土20餘年來，基本上沒人對其作過介紹，筆者雖因工作之便，有機會隨時目驗原物，但亦因其殘缺不全，無法拼綴而一直不敢妄加評介。筆者曾在《帛書〈刑德〉畧說》<sup>①</sup>一文中附帶說了一句，“從殘存的片斷文字看，其內容與甲、乙兩篇亦大致相同”，現在看來亦是很不準確的。因為筆者去年有幸忝列重新啟動的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之列，得有機會看到了原帛書整理小組已經作過的整理拼貼樣本從而加深了對帛書《刑德》丙篇的認識。現不揣庸陋，僅就認識所至，淺述一二如下，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帛書《刑德》丙篇原件雖已分切為18塊殘片，但原帛書整理小組已經對其作了基本復原的拼綴工作，盡管其中尚有許多殘缺無法填補，但其基本面貌已顯現清楚：這是一卷呈長方形的帛書手卷，幅寬48釐米，幅長大約82釐米。其內容大致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位於帛書右上方并列的三個圖；第二部分則是位於三個圖下方及左側共約73行文字，這些文字雖因殘缺太多而句讀不易，但那些殘存的文句多少還能透露出其大致的數術類文獻意義，應該說，其圖其文當是互有關聯的有機組合，盡管我們現在還不能太確切地一一說清楚其中的關聯所在。

帛書右上方并列的三個圖，均見於帛書《陰陽五行》乙篇。居首的是“天一圖”。《陰陽五行》乙本上的“天一圖”較為完整，且已刊出過圖版<sup>②</sup>。《刑德》丙篇中的“天一圖”則殘缺得只剩下東西兩方中的十四個神名，但就是這殘存的十四個神名，正可補帛書《陰陽五行》乙篇上的殘缺，即西方七神，按序是“刑、德、小歲、斗穀、太一、大陰、太陽”。帛書《陰陽五行》乙篇中所殘的“小歲、斗穀”二神名，正可由此補出，從而使該圖得



以相應完整的識讀。其中“小歲”乃是“斗勺”之別名。《淮南子·天文訓》“斗勺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大（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斗數”或即“斗極”之別稱。《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為空桐”。疏曰：“斗，北斗也。極者，中空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云斗極。”帛書《刑德》丙篇殘存的文字中尚有“此用斗之大方也”的記載，所謂用斗之法，或許正與這“斗數”神有關。

第二幅圖是刑德小游圖，它與帛書《刑德》乙篇中的“刑德九官圖”<sup>③</sup>實質上相同，祇是刑德六神小游的排列方式不一樣，它是按照四方五行正奇宮排列法排列的，每一個宮內都注明其六神之神名和當日的干支，例如北方正宮內即分別注明：“壬午刑德，癸未豐隆，（甲申風）柏，乙酉大音，丙戌雷公，丁亥雨師”，這與《刑德》甲、乙篇中的刑德九官圖中的北方正宮所記之六神與干支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它沒有《刑德》甲、乙篇九官圖中的八方神有關日至的記錄。此外，其中宮亦是呈方形，分別注明戊子、戊午六神名及干支，這樣比《刑德》甲、乙篇九官圖中的刑德六神排列更易於識讀和瞭解。這幅刑德小游圖亦見於帛書《陰陽五行》乙篇，祇是該圖在《陰陽五行》乙篇中殘缺得更厲害，所剩僅是北宮、西北宮、西南宮和東北宮殘缺不全的幾行刑德六神的文字而已。

第三幅圖亦見於帛書《陰陽五行》乙本，該圖作正方形，中間畫有圓圈表示中宮，在四方及中宮分別注有：甲子、乙酉、東門；丙子、丁酉、南門；庚子、辛酉、西門；壬子、癸酉、北門；戊子、己酉、□〔門〕。在四個角上分別畫有兩個向正宮延伸擴展的棒槌狀圖形，這種圖形是否是代表八宮，或者八風還是八方，尚不清楚。但從其干支所記，乃是五子和五酉，其中五子所處之方位，正可與《協紀辨方書》中的“太歲已下神煞出游日”所記對應：

“歷例曰：‘太歲出游日者，甲子日東游，己巳日還位，丙子日南游，辛巳日還位，戊子日游中宮，癸巳日還位，庚子日西游，乙巳日還位，壬子日北游，丁巳日還位，共出游二十五日’。《考原》曰：‘出游日各以五子日干為所往之方。甲為東方木，故甲子日東游，丙為南方火，故丙子日南游，庚為西方金，故庚子日西游。壬為北方水，故壬子日北游。

戊為中央土，故戊子日游中宮。五者生數之極，故各出游五日，共五五二十五也。”④

如果這種對應可以成立的話，該圖或可稱為“太歲游日圖”。但是，這記日干支除五子之外，還有五酉日，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蓋忌”篇中，有“五酉、甲辰、丙寅，不可以蓋，必有火起，若或死焉”⑤的記載，但不知此圖中的“五酉”是否與此“蓋忌”有關？此外，圖中所標示的五門顯然與睡虎地秦簡中的“置室門圖”大不相同，亦與大六壬術中的天地、人、鬼、四門有別。有意思的是，在帛書殘存的“傳勝”游年的文字中，尚存有：“游于天門，十八日而去，反于其所長立者”，“游于鬼門，三日而去，反于其所長立者”的文句，遺憾的是，殘存的文句中僅存此大六壬術中的二門，而圖形中可識的則祇有東、南、西、北四門，且中宮究為何門，則無法知曉。因此，這五門在古代數術的五分系統中是代表五位、五行？或者與大六壬中的天地人鬼四門有什麼關係，暫時還說不清楚。至於這五門與五子、五酉的關係如何，亦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在這三幅圖的下方和左側是大約73行文字，這些文字雖然殘缺不全而句讀困難，但從殘存的文句中大致可以看出如下一些內容：

① 有關“傳勝”游年的內容：

“傳勝正月舍於□□□□□〔其〕日游，舍於亥，六日而去，反於其所長立者。〔二〕月傳勝舍於〔東宮〕，木分也，其日游，舍於寅，八日而去，反於其所長立者……”

“凡傳勝之神，五行各有長，恒陳長之，泰一長之，□□長之，勾刑長〔之〕”。

“傳勝”究竟為何神名，現尚無法確定。大六壬術的十二支神中有“傳送”和“勝光”二神名，它們分別是金神和火神的專稱，但不知“傳勝”是傳送、勝光二神的簡稱否？至於“五行各有長”的神名“勾陳、恒陳、泰一、勾刑”均見之於帛書《陰陽五行》的“天一圖”中，其中“泰一、勾刑”亦見於《刑德》丙篇殘存的“天一圖”帛片中。

② 有關刑德占的內容，如：

“迎刑倍（背）德，戰者不勝，亦毋（無）失也。”

“迎刑右德，戰者勝，三年將死。”

“迎刑左德，戰者不勝，失地，凡不出三年將死。”

“倍（背）刑右德，戰者勝。”

“〔倍（背）刑〕左德，戰者勝。”

“倍（背）刑迎德，戰者不勝，毋工，不出三年將死。”

“迎德倍（背），戰者勝，得地復歸，凡不〔出〕二年死。”

這些內容，在帛書《刑德》甲、乙篇中都有，但其文字畧有不同，例如《刑德》乙篇中記載：

“倍（背）刑德，戰，勝，拔國。倍（背）右刑，戰，勝，取地。左德右刑，戰，勝，取地。左德倍（背）刑，戰，勝，取地。倍（背）德左刑，戰，勝，不取地。倍（背）刑右德，戰，勝，不取地。右德左刑，戰，敗，不失大吏。……倍（背）刑迎德，將不入國，如入有功，必有後殃（殃），不出六年，運（逮）將君王。倍（背）德迎刑，深入，衆敗吏死。迎德右刑，將不入國……左刑迎德，戰，敗，亡地，左德迎刑，大敗。”⑥

很顯然，兩者文字可以互相補充，加深理解。例如《刑德》丙篇中的“倍（背）刑迎德，戰者不勝，毋工，不出三年將死”的“毋工”，其“工”字是讀為“攻”還是“功”，似乎兩者都可成立，但參照《刑德》乙篇上的“倍（背）刑迎德，將不入國，如入有功，必有後殃（殃）”來理解，那顯然是讀為“功”比較準確，所謂“毋工”也就是“無功”之意。

### ③ 有關用斗之法的記載：

衆所周知，在已出土的六壬式的天盤上，多以北斗居天盤中心，四周再環列十二月或十二神、干支、二十八宿⑦，但這天盤上所繪的北斗星怎樣使用的，多語焉不詳。令人欣喜的是，在《刑德》丙篇中則有一段明確的文字記述了用斗之法：

“此用斗之大方也。故曰左青（龍，而右）白虎，前丹蟲而後玄武，招搖在上，□□在下，乘龍戴斗，戰必勝而功（攻）必取，善者從事下”。

這段文字足可使我們迅速聯想到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上所繪的青龍白虎所環繞的北斗星圖以及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M1出土的漆木式天盤等，尤其是上海博物館藏的大朝銅式的背面銘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前一騰蛇，前二朱雀，前三六合，前四勾陳，前五青龍；后一天后，后二

太陰，右三玄武，右四太常，右五白虎，右六天空。”

這段文字中的四象正可與《刑德》丙篇中的這段文字對應，而四象即代表一種十二神的認識，早就由陳夢家先生在討論“漢代占時、測時的儀具”時已經指出<sup>⑨</sup>，至於何為用斗之法，恐怕要算帛書上的這段文字是最早的了。遺憾的是，這段文字的前面一部分殘缺，而且在《刑德》丙篇中並無北斗星圖或諸如阜陽双古堆漢墓M1出土的那種式盤可以參驗，唯一可以聯繫的是在“天一圖”的西方七神中有“斗數”之神名。

#### ④ 有關諸值神的記載

在三幅圖形的左側，在殘剩的帛書上有“大陽為建，大陰為衡”、“光日月，比四時，宜天地而順五行”、“沕昌柱矢四游”等殘存的文句，這些文句中的“大陽”、“大陰”、“日月”、“沕昌”以及“青龍”、“白虎”、“勾陳”等神名均見於《陰陽五行》的“天一圖”中，因此，這段文字是否與“天一圖”有關，尚值得研究，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還有“黃帝四戰四魁”的記載，所謂“黃帝四戰”，亦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

通過上述初淺的描述，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刑德》丙篇的內容與已發表的《刑德》乙篇<sup>⑩</sup>顯然不同。我們說過：《刑德》甲、乙兩篇雖亦有不同，但其圖形，內容文字基本相同，尤其是星占部分，很明顯地看出乙本是甲本的抄本<sup>⑪</sup>，因此，二者完全可以互校互補，是名符其實的甲、乙篇，其性質如帛書《老子》的甲、乙本一樣。但《刑德》丙篇無論在圖形上還是文字上都與甲、乙篇迥然不同，相反的是，其三個圖形均見於尚未發表的隸書《陰陽五行》的本子上，這就不能不令我們去重新審視其定名的正確與否。當然，這件帛書中確是還有關於刑德占的內容，但這一部分僅是該帛書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就是在三個圖形中，那刑德小游圖亦僅是三個圖中的一個。因此，簡單地將其稱為《刑德》丙篇，似乎並不準確。尤其是對那些沒機會接觸原始資料的學人來說，更有誤導之嫌。依筆者之淺見，從內容上的比較看，與其稱其為《刑德》丙篇，還不如稱其為隸書《陰陽五行》乙篇。當然，迄今為止，帛書《陰陽五行》的定名是否準確？因其尚沒發表，故無從討論，但就筆者目驗所及，所謂篆書《陰陽五行》和隸書《陰陽五行》實際上也是兩個不大相同的本子，至少在圖形上就僅有一個“鉤繩圖”可以對應，而見於《刑德》丙篇上的那三幅圖，在篆書《陰陽五行》中全不見影子。



因此，我覺得，就圖形來講，那祇有《刑德》丙篇和隸書《陰陽五行》纔可互校互補，故其定名至少要跟隸書《陰陽五行》相近纔是。

## 注 釋

- ① 拙文見《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 ② ③ ⑩ 見《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④ 見《中國方術概觀·選擇卷》第166頁，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 ⑤ 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第356頁，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 ⑥ ⑪ 見拙文《帛書〈刑德〉乙本釋文校讀》，載《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96年9月版。
- ⑦ ⑧ 見李零《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
- ⑨ 載《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



## 帛書《周易》《老子》虛詞札記

吳辛丑（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經典，每可與傳世經典相比照，其異文對古漢語訓詁、語法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筆者讀馬王堆帛書，於此類資料有所摘錄，今將帛書《周易》《老子》中的幾個虛詞條陳於下，以就正於方家。

### 一、“此”

《周易》《旅》卦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高亨先生《周易古經今注》<sup>①</sup>和李鏡池先生《周易通義》<sup>②</sup>均如此斷句，並訓“斯”為“離”，謂“斯其所”即“離開寓所”。按，帛書《周易》<sup>③</sup>《旅》卦初六作“旅瑣瑣，此其所取火”。帛易“此”與今本《周易》“斯”為異文，“此”為代詞，故“斯”亦當視為代詞，訓為“這”。“火”與“災”亦異文同義，均指火災，《公羊傳·襄公九年》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爻辭中“所”字亦非名詞，而是特殊代詞。“斯其所取災（火）”意即“這就是他遭災的緣故”。又，《周易》《解》卦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周易通義》訓“斯”為“則”，而黃壽祺、張善文先生《周易譯註》<sup>④</sup>則把“斯”看作介詞，從王引之《經傳釋詞》訓為“乃”。按，帛易《解》卦九四作“解其拇，備至此復”。“此”與“斯”互為異文，故今本《周易》“斯”字當訓為“這”或“這裏”。“斯”字在今本《周易》中僅出現兩次，兩個“斯”字在帛易中均寫作“此”，“此”、“斯”都是指示代詞。

### 二、“或”

帛書《周易》《隨》卦初九：“官或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今本《周易》《隨》卦作“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帛易《狗》卦五〈九〉五：“以忌枹

菰，含章，或墮自天。”今本《周易》《姤》卦九五作“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帛書《比》卦初六：“有復，比之，無咎。有復盈缶，冬來或池，吉。”今本《周易》《比》卦初六作“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按，帛書中的“或”字，今本祇有這三處作“有”字。鄧球柏先生《帛書周易校釋》⑤認為帛書《隋》卦、《狗》卦中的“或”通“有”，而將《比》卦中的“或”釋為“國”。筆者認為，鄧球柏先生將帛書《隋》卦“或”字訓為“有”是正確的，而將《比》卦“或”字釋為“國”，則不合《周易》通例，缺乏訓詁依據，此“或”字亦當訓為“有”，是動詞。至於帛書《狗》卦“或”字，本為無定代詞，不當訓為“有”。“或”作為無定代詞，可指人，意為“有人”、“有的人”，例如：

《坤》卦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損》卦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中孚》卦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或”字也可指物，相當於“有的”、“有某東西”，例如：《乾》卦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此“或”字指“有的龍”；《漸》卦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此“或”字指“有的鴻”。帛書《狗》卦“或”字亦屬此例，其意為“有東西”，“或墮（隕）自天”意為“有東西從天上掉下來”。

這裏要再談一下對《周易》《乾》卦“或”字的理解問題。《乾》卦九四：“或躍在淵，無咎。”帛書《鑿》卦九四作“或鑿在淵，無咎”。“或”字無異文。今本《易傳·乾文言》云：“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今人解《乾》卦“或”字多據《易傳》加以發揮，眾說紛紜。孫振聲先生《白話易經》⑥云：“‘或’是不定詞，有惑與似的含意。”劉大鈞，林忠軍先生《周易古經白話解》⑦云：“或，惑。古二字通用。”沙少海先生《易卦淺釋》⑧云：“或，表疑副詞，訓或許。”李鏡池先生《周易通義》云：“或：有人，這裏指貴族。”關於帛書《乾》卦中的“或”字，張立文先生《帛書周易注譯》⑨注云：“‘或’，疑也。”鄧球柏先生《白話帛書周易》⑩注云：“或：有。”按，《乾》卦“或”字位於一句之首，其無定代詞之特性顯而易見，李鏡池先生訓為“有人”，定性是對的，不過，從上下文看，“或”字非指人，而是指物，具體說是指“龍”，“或躍

在淵”意即“有的龍跳回深淵中”。《周易》《乾》卦的核心是“龍”，全卦有五爻寫“龍”，初九為“潛龍”，九二為“見龍在田”，九五為“飛龍在天”，上九為“亢龍”，用九為“見群龍無首”，九四“或躍在淵”承九二而言，亦寫了龍的一種活動，可見“或”字指“龍”是非常明確的。

### 三、“用”

帛書《周易》《訟》卦辭：“利用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今本《周易》作“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帛書“利”和“見”之間有一“用”字，今本無。帛書《離》卦尚九：“王出正，有嘉折首。”今本《離》卦上九作“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今本“王”和“出”之間有一“用”字，而帛書無。從“用”字在句中可用可不用的情況看，我們認為它是一個語助詞，沒有實在意義。過去或把動詞前的這種“用”字看作動詞，或把它看作介詞，似有不當。究語助“用”字在《周易》中的用法，主要有三種。其一是用在動詞“利”之後，“用”字後面再跟動詞、形容詞或動詞性詞組，例如：

《謙》卦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謙》卦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需》卦初九：“需於郊，利用恒，無咎。”

《益》卦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其二是直接用在動詞性詞組前，例如：

《泰》卦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復》卦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明夷》卦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謙》卦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卦初六爻辭，鄧球柏先生《帛書周易校釋》標點為：“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帛書為“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顯然，鄧先生是誤把語助“用”字解為動詞了。其三是用在名詞之後，動詞性詞組之前，例如：

《大有》卦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晉》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解》卦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

語助“用”前面的“王”、“公”、“康侯”等都是名詞，且是地位極高的人物。以上述諸例推之，《未濟》卦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中的“震”當為名詞，乃人名。孔穎達《周易正義》將“震用伐鬼方”解為“震發威怒用伐鬼方”，今人或解“震”為“動”⑪，或將“震”看作副詞⑫，均有失妥當。其實，“震”應為名詞，指高宗。《既濟》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伐鬼方”句與《未濟》卦“震用伐鬼方”句對應，高亨先生曰：“高宗，殷王也，名武丁，廟號高宗。”又云：“震，當是人名，周君或周臣也。”並認為《既濟》卦九三與《未濟》卦九四“所記為一事”。⑬我們覺得，既然兩爻所記為同一事，“高宗”與“震”當為同一人。

#### 四、“於”

帛書《老子》甲、乙本⑭與傳世《老子》諸本在用“於”不用“於”上頗有異同，今取王弼注本⑮與帛書本對勘，畧記其異。一般而言，帛書本多用“於”字，而王本則往往省之。例如：

帛書甲本：“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致堅。”

王本：“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帛書甲本：“無有入於無間。”

王本：“無有入無間。”

帛書甲本：“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於牖，以知天道。”

王本：“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

帛書乙本：“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

王本：“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帛書甲本：“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王本：“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以上諸例，帛書本多一介詞“於”字，使得句子語法結構發生了變化：王本不用“於”字，動詞與其後的詞語構成動賓關係，如“守中”；帛書本加了“於”字，“於”及其後的詞語作動詞的補語，如“守於中”。這類“於”字的有

無對詞義和文意影響不大。

帛書甲本：“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王本：“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帛書甲本：“〔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於無難。”

王本：“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帛書甲本“取於大邦”，王本作“取大國”，帛書乙本同於甲本。帛書本多一“於”字，不僅句子的語法結構不同，而且文意迥異：“取於大邦”是自己為大國所取，是被動的意義；“取大國”是自己取大國，是主動的意義。下文“或下以取”是指“取小邦（國）”而言，“或下而取”是指“取於大邦（國）”而言，“以取”與“而取”的差異就在於主動與被動的不同。由此看來，王本作“取大國”不及帛書本“取於大邦”之優，當從帛書本。帛書本“終於無難”，王本作“終無難”，帛書本有“於”字，“終”作動詞用，“終於無難”意為“以無難告終（結束）”，王本無“於”字，“終”作副詞用，“終無難”意為“最終無難”。兩者文意異同，似乎各有所長。

也有帛書本無“於”字，而王本加“於”字的情況，例如：

帛書乙本：“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有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丰。脩之天下，其德乃博。”

王本：“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帛書甲本：“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貴生。”

王本：“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兩相比較，於義以王本加“於”為長。

值得一提的是“復歸”一詞與“於”字的隱現。有時，帛書甲本、乙本與王本在“復歸”後面都出現“於”字，例如：

帛書甲本：“尋尋呵不可名也，復歸於無物。”

帛書乙本：“尋尋呵不可命也，復歸於無物。”

王本：“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有時帛書本有“於”字，而王本則無，例如：

帛書甲本：“天物雲雲，各復歸於其〔根〕。”

帛書乙本：“天物耘耘，各復歸於其根。”

王本：“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有時帛書本無“於”字，而王本則有，例如：

帛書甲本：“恒德不離，復歸嬰兒。”

王本：“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究竟“復歸”後面該不該用“於”字？從漢語發展史的角度看，介詞“於”字的應用是語法嚴密化的一種表現，是語法發展的大勢所趨，然而不用“於”字並沒有錯。對於這種名詞性詞語位於動詞後面表示處所的情況，王力先生稱為“關係語的應用”，他說：“對於這種關係語，一般語法書以為是省畧了介詞‘於’字。其實這祇是關係語的應用，無所謂省畧。”<sup>⑩</sup>王力先生所說的動詞後面的關係語，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補語。在動詞和名詞性詞語之間加進“於”字，好似加了一個標籤，可使名詞性詞語的補語地位顯現出來，而不致被當作動詞的賓語，如“復歸嬰兒”，不加“於”字易將“嬰兒”看作“復歸”的賓語。從這一角度而言，“復歸”後面加“於”字有其合理的一面。

## 注 釋

① 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② 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③ 見《文物》1984年第3期《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⑤ 湖南出版社1996年增訂本。

⑥ 臺灣星光出版社1981年版。

⑦ 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版。

⑧ 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⑩ 岳麓書社1995年版。
- ⑪ 周振甫《周易譯註》云：“震：動，指出動大軍。”中華書局1991年版。
- ⑫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註》云：“震，作副詞，猶言‘以雷霆之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⑬ 見《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版。
- ⑭ 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⑮ 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
- ⑯ 見王力《漢語語法史》226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 《阜陽漢簡·周易》概述

胡平生（中國文物研究所）

阜陽雙古堆竹簡《周易》，計有殘片700多個，已無一完簡，最長的幾片約在15.5釐米左右，寫有20字。據推測，原簡可能長約26釐米，寬約1釐米。現第135號簡殘存一簡頭，上編繩之上有1.5釐米的空白；第134號簡殘存一簡尾，下編繩之下有1.5釐米的空白。第48號簡、143號簡等有的字與字之間有較大的空間，有編繩殘痕，可知原簡冊大概有上、中、下三道編繩，而且是先將白簡編聯成冊，然後才抄寫的。書寫時，易卦的卦畫寫在簡頭的位置，殘存的卦畫有：

䷍ 大有

䷒ 臨

䷖ 賁

卦名寫在上編繩之下，接着再寫卦辭和爻辭。每一條卦辭和爻辭之後，都有附屬的卜事之辭。這種卜事之辭，多以“卜”字起頭，但也有一些不用“卜”字起頭。一條卦辭或卜辭連同所屬的卜事之辭寫完後，用一個圓點隔斷。竹書《周易》中未見《十翼》的內容。

### 一、竹書《周易》與別本《周易》之比較

歷代學《易》傳《易》之家甚多，研究《周易》著述更是不勝枚舉。1973年，馬王堆漢墓又出土了寫於漢初的帛書《周易》，1984年第3期《文物》月刊已發表《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和張政烺、于豪亮兩位先生的文章，這為我們整理竹書《周易》提供了重要的幫助，由於殘破嚴重，竹書《周易》已不能屬讀，六十四卦排列次序不得而知；但從殘文中仍能看出竹書《周易》同其它各種本子的《周易》在卦名、卦辭、爻辭等許多地方都不相同。現試將竹書《周易》與幾種本子作一比較。先比較卦名，我們用通行的唐石經本六十四卦順序排次，竹書《周易》的卦名有些是利用卦辭、爻辭裏的字補出的。

漢石經殘字  
乾川屯蒙～訟師比～履泰否～大有一豫～蠱～觀噬山賁剝復～～頤～欽

帛書《繫辭》  
鍵川肫～婦容師比蓄小履～婦～大有有謙余隋～林觀筮蓋～剝復孟无大過～

帛書《六十四卦》  
鍵川屯蒙襦訟師比藪少禮～婦同人大有有謙餘隋箇林觀筮繁剝復孟无泰頤泰賴

竹簡本  
～～肫～～～市比～履～～同人大有～豫隋～林觀筮賁僕復无亡～頤大過～

通行本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畜小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賁剝復妄无大頤大過坎

卦一  
卦二  
卦三  
卦四  
卦五  
卦六  
卦七  
卦八  
卦九  
卦一〇  
卦一一  
卦一二  
卦一三  
卦一四  
卦一五  
卦一六  
卦一七  
卦一八  
卦一九  
卦二〇  
卦二一  
卦二二  
卦二三  
卦二四  
卦二五  
卦二六  
卦二七  
卦二八  
卦二九

離 ~ 恒 ~ 泰 ~ 一家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 妹 豐 旅 巽 兌 ~

羅 ~ 恒 ~ 大 莊、大 牀、口 壯 ~ 明 夷 家 人 誅 ~ 損 益 ~ 均、句 ~ 登 ~ 井 ~ ~ 根 ~ 歸 妹 ~ ~ 說 與

羅 欽 恒 掾 泰 壯 晉 明 夷 家 人 乖 蹇 解 損 益 夬 狗 卒 登 困 井 勒 鼎 辰 根 漸 歸 妹 豐 旅 箕 奪 渙

離 ~ 恒 掾 泰 壯 ~ 明 口 ~ ~ 蹇 ~ 損 ~ ~ ~ 登 ~ 井 ~ 鼎 ~ 艮 ~ ~ 旅 ~ ~

離 咸 恒 遯 大 壯 晉 明 夷 家 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 妹 豐 旅 巽 兌 渙

卦 三 〇  
卦 三 一  
卦 三 二  
卦 三 三  
卦 三 四  
卦 三 五  
卦 三 六  
卦 三 七  
卦 三 八  
卦 三 九  
卦 四 〇  
卦 四 一  
卦 四 二  
卦 四 三  
卦 四 四  
卦 四 五  
卦 四 六  
卦 四 七  
卦 四 八  
卦 四 九  
卦 五 〇  
卦 五 一  
卦 五 二  
卦 五 三  
卦 五 四  
卦 五 五  
卦 五 六  
卦 五 七  
卦 五 八  
卦 五 九



卦六〇	節	節	節	～	節
卦六一	中孚	～	中復	～	～
卦六二	小過	～	少過	少過	小過
卦六三	既濟	～	既濟	既濟	～
卦六四	未濟	～	未濟	未濟	～

從以上的比較中可以看出，竹簡《周易》的卦名有的與帛書《周易》較接近。于豪亮先生的文章指出，帛書的卦名“欽”和“林”與《歸藏》有關，並認為《歸藏》不會是偽書。在竹簡卦名中，未見“欽卦”名，但是有“林卦”名，與帛書同，而且又有“僕卦”（通行本“剝卦”）名，也與《歸藏》有關。

竹簡《周易》經文與今通行本相比也有若干異文；異文大體可分幾種情形，下面試分類舉例加以討論。

#### （1）竹簡本文字勝於其他本者

第150號簡離之九四“其出如其來如焚如棄如”，通行本作“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帛書作“出如來如紛如死如棄如”。帛書整理者認為“出”與“突”為通假，甚是。解《易》家亦說“突”義為“出”。而竹簡以“其出如”與“其來如”呼應，意義更明晰完整，且同“焚如，棄如”成排比，似較優於諸本。竹簡“焚如”下接“棄如”，無“死如”，可能是脫漏，但也不排除原本即如此。

第133、134號簡頤之初九“舍而靈龜觀我端頤凶”，“端頤”，通行本作“朵頤”，帛書作“短頤”。“朵”與“端”一聲之轉，說為假借，自然也可，然另作別解亦可。“朵”，舊多釋為“動”；簡書作“端”可以釋為端首。本簡《說類雜事》有一簡背書一“揣”字，即是冊書之端首。舍棄自己的靈龜不顧，只盯住我的頤之端，乃凶兆無疑。又此為初爻，故以“端頤”應之。《釋文》云：“京作揣”。“揣”或作“揣”，疑從手或從禾皆為從木之誤，“揣”即“端”。

#### （2）竹簡本的異文，意義可能與其他各本有歧異者

第21號簡蒙之六三“〔見金夫不〕有躬”，通行本作“躬”，帛書作“躬”。《說文》：“宮，室也，從躬省聲。”竹簡與帛書作“躬”，皆可讀為“宮”，舊注釋“躬”為“身”；聞一多讀此句為“見金矢不有弓”。“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有利。”此爻之“躬”，倘據簡帛讀如“宮”，釋為“宮室”，

亦可通。

第69號簡豫之六三“歌豫”，通行本“歌”作“盱”，帛書作“村”，舊解歧見甚多。如依竹簡讀如字，似可與“初六鳴豫”呼應。而且六三處兩卦之間，不正不中，眾陰在下，卻歌樂喜悅，故象辭謂之“位不當也”。

第39號簡小畜之上九“〔尚〕得戴”，今通行本作“德戴”。“得”、“德”同音可通；“戴”、“載”音近可通。上九爻辭前云“既雨既處”，雨水為陰，既已蓄積；下承之辭如按簡文“尚得戴”解釋，《說文》：“戴，分物得增益為戴”，雨水已盛，但仍然還得繼續增益，陰至於極點，必使陰陽失和，陰以強凌陽，故“婦貞凶”。德，帛書亦作“得”。

第138號簡頤之六四“其猷遂遂”通行本作“其欲逐逐”。帛書“欲”作“容”，“逐逐”作“笛笛”。簡書“猷”左旁似谷形疊床架屋十分複雜，但右旁很清楚從犬，很像是“狝”字。《說文》：“狝，獨狝獸也，從犬谷聲。”又，“獨——一曰北囂山有獨狝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疑簡書之“猷”也可能指獸類。“遂”，《廣雅·釋詁》：“行也。”“遂遂”，或當為行貌。本爻辭前言虎視眈眈，繼之言某獸行行，看起來好像驚險，然而卻“無咎”。象辭指出，這是因為“上施光也”。《釋文》云：“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悠’，云‘遠也’。”

### (3) 竹簡本用古文古義者

第102號簡噬嗑（嗑）之九四“利難貞”，“難”為古“艱”字，《說文》云，籀文艱從“喜”。按，今所見商代甲骨文，“艱”即從“喜”，“難”字甚古。

第114號簡僕（剝）之初六“戴貞凶”，今通行本“戴”作“蔑”，帛書作“戴”，于豪亮先生文說“戴”是“蔑”之或體。帛書此字為從巾蔑聲。竹簡本卻很特別，把從蔑的字頭部分寫作“戠”，是蔑頭與戈形的合寫。字的下部，竹簡本與帛書本寫法也不同，目下從月，與“夢”字同。此字按從戈而言，實則即《說文》從目蔑省聲的“瞋”字，“瞋兒，目眇也”（據段改本）。段注云：宋玉《風賦》“中唇為眇，得目為瞋”；《呂氏春秋》“氣鬱處目則為瞋”，高注：瞋，眇也。按，瞋者假借，蔑者或體。舊說釋“蔑”為“滅”。高亨讀為“夢”，可備一說也。

今通行本之“悔”字，竹簡皆作“𪚩”，《說文》：“易卦之體也，《商書》曰：‘曰貞曰𪚩’，從卜每聲。”段注云：疑𪚩是壁中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然則𪚩本古文非小篆，因其從卜則系之卜部，亦勢然也。不曰篆文作悔，亦不於心部悔下列𪚩，云古文悔者，本非一字也。小篆無𪚩，而壁中古文有𪚩，不可以不存之於卜部。凡其存《尚書》古文之例如此……今按，𪚩或是易卦專用的古字，大概並非祇見於古文。

今通行本之“攸”字，竹簡皆作“𠂔”。傳本經傳常作“𠂔”或“適”：《說文》：“𠂔，氣行貌，從乃，𠂔聲，讀若攸。”段注云：隸作適。《禹貢》：“陽鳥攸居”，“豐水攸同”，“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皆作“適”，適之言於也。陽鳥於是南來得所也，與爰專義同。今竹簡“𠂔”，上部從乙，下部作“囟”，不從𠂔；形音演變軌跡待考；“乙”或為乃省，“囟”或為𠂔訛。

第31號簡比之九五“羸比”，“羸”通行本作“顯”。《說文》：“羸，眾微杪也，從日中規絲。古文以為顯字。”段注云：顯為頭明飾，羸為日中見微妙，則經傳顯字皆當作羸。羸字本義，顯者假借，載籍既皆作顯，乃謂古文作羸為假借矣。故曰古文以為顯字。頁部顯下曰，從頁羸聲，是則羸之讀如顯可知。《說文》：“顯，頭明飾也。”段注又云：引伸為凡明之稱。按羸謂眾明，顯本主謂頭明飾，乃顯專行而羸廢矣。日部羸下曰，古文以為羸字，由今字假顯為羸，乃謂古文假羸為顯也。此古今字之變遷，所必當深究也。

195號簡隨之上六“享於岐山”，“岐”，今通行本作“岐”。《說文》：“岐，郟或從山，支聲，因岐山以名之也。𡵓，古文郟，從支從山。”段注云：薛綜注《西京賦》引《說文》：“岐山在長安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此《說文》山部原文也。山有兩岐，當作山有兩枝。山有兩枝，故名岐山。今竹簡作“岐”，用“山有兩枝”本義之字。第80號簡隨之上六作“享於支山”，用同音通假字。通行本作“西山”。解《易》家或亦釋“西山”為“岐山”。

第148號簡坎卦“舊心”，通行本作“維心”。“舊”，帛書作“𦉰”、“𦉱”于豪亮文指出，𦉰與𦉱並為𦉰之異體字，假作維。《說文》：“𦉰，維綱中繩，從維聲，讀若畫，或讀若維。”𦉰字讀若維，自可假作維。因此𦉰與𦉱亦可假作維。于說當然可以解釋“𦉰”、“𦉱”與“維”相通假的關係。但是，讀簡




帛之“𦏧”、“𦏧”、“𦏧”為“系”（繫）亦可通。系，上古音是匣母錫部字；𦏧，是匣母支部字，支錫對轉相通。（維，上古音是余母微部字。）維，繫也；繫，維也，二字同義互訓。《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牛馬維羣。”何注：“繫馬曰維。”《類篇》：“繫，維也。”

第151號簡坎之上六“係用徽纆”“纆”，今經傳皆作“纆”。“纆”、“纆”古今字。

第180號簡睽之六三“見車溲其牛掣”，通行本作“見輿曳其牛掣”，帛書“曳”作“𦏧”；“掣”作“𦏧”。于豪亮文說，帛書“見車𦏧”即“見車折”；“其牛𦏧”即“其牛曳”，兩者字義各不相同。今按，竹簡“溲”是“溲”之訛變，與通行本“曳”相通；“掣”與通行本“掣”相通。《釋文》云：“掣，鄭玄作掣，云：‘牛角皆踴曰掣。’《說文》作𦏧，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契，云：‘一角仰也。’”（于文亦引此說。）以聲韻求之，帛書將“見車溲其牛掣”之“掣”、“溲”前後倒置，實為二字音義相近之故。《說文通訓定聲》“瘳”字條云：字亦誤作瘳，俗作掣。《西征賦》注引字書：“掣，牽也。”……《爾雅·釋訓》：“傳彘掣曳也。”《詩·抑》箋：“非但以手提掣之。”《釋文》：“掣也。”又，重言形況字。《海賦》：“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李注：“掣掣洩洩，任風之貌。”“掣掣洩洩”疊韻連綿，以聲韻形況狀貌，雖顛倒亦無妨。疑“見車曳其牛掣”之“曳”、“掣”，或是表示車與牛行放任隨意無序之貌。睽，乖也。其卦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以異而同，初睽違而終無咎。六三之爻，謂初之御車、牛，皆放任失當，但終亦無咎。

#### (4) 竹簡本異文有助於探討文字形音演變

第12號簡肫（屯）之六三“稷鹿無吳”，今本作“即鹿無虞”。上古音“稷”是精母職部字，“即”是精母質部字，韻部是不同的。但“即”在中古變為收-k尾的職韻字，《廣韻》裏“稷”和“即”都是精母職韻開口三等字。在竹簡中二字相通，可見漢初“即”字讀音已經發生了變化。

第60號簡同人之九四“乘高唐弗克”，“高唐”通行本作“其壙”；帛書“壙”作“庸”，前字殘缺。《釋文》云，壙，鄭作庸。按，“庸”與“壙”為古今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說文》：壙，古文壙。”簡文之“唐”字，可能是小篆的“庸”字訛變而成，二者形體很接近。竹簡本作“高庸”，大概有兩種可能：一是比照“九三升其高陵”，則此處也許應



作“升高庸”或“升其高庸”。孔疏解此爻云：“故乘上高墉欲攻三也。”或別本亦有作‘高庸’者歟！二是古文字里“庸”的字形，上部很像“高”字，所以也可能由“庸”而衍出一“高”字來。

第41號簡履之九二“敵入”，通行本作“幽人”。竹簡本之“敵”，應當是“幽”的假借，“敵”，從肖聲，上古音是心母宵部字；“幽”是影母幽部字，二字韻部宵幽旁轉可通，而聲紐一為齒音，一為喉音，可能心母發音較輕，與零聲母的影母相近，便用來通假了。《字匯補》有“邀”字，與糾切，音有。與“幽”音極近。

#### (5) 竹簡本有錯訛奪衍

第13號簡蒙之九二“老婦吉子克〔家〕”，今本“老婦”作“納婦”。這是竹簡本發生了錯誤。據下接第14號簡，補出殘文應為“利嫁〔女娶婦〕”，正與“納婦吉”相合。

第40號簡小畜之上九“月幾堅”，“堅”是“望”字之誤。望，從月從臣從壬，簡文從月誤為從又。

第38號簡小畜之九五“不富以其鄰”，今通行本無“不”字，竹簡本可能是由於泰卦之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之文，而於小畜中誤衍“不”字。

## 二、《阜陽漢簡·周易》卜辭初探

《周易》之卦辭、爻，舊視為“經文”；其餘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等皆視為“傳文”，西漢人稱之為“易大傳”。竹簡本《周易》有經文無傳文，在卦辭和爻辭之後有卜辭，這是今通行本所沒有的。馬王堆帛書《周易》也沒有卜辭。簡書卜辭內容十分廣泛，從與經文相連的殘辭看，卜辭判斷吉凶休咎禍福與卜辭、爻辭密切相關。試舉下列數例加以分析。

一是同人之九三的卜辭：

與卜有罪者凶（第50號簡）

戰鬥連（敵）強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瘡。九四乘高唐弗克（第51+52號簡）同人之九三爻辭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辭云：“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而卜辭所貞問諸事皆凶：罪犯無可幸免；遭遇戰鬥，敵人強大，不能獲勝；生病即使徵倖不死，也得癱殘……

二是同人之上九的殘辭：



(上) 九同人于郊(郊)无咎(悔)卜居法(廢)免(第57號簡)

此爻象辭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舊說此爻之意謂同人在郊野，居外無應，雖遠於內爭，可以無悔，但亦不能得志。卜辭說居官者得此爻將被罷免，正與“不得志”相應。

三是離之初九的爻辭帶卜辭殘辭：

• 初九履昔然敬之無咎卜臨官立(莅)眾敬其下乃吉(第146+147號簡)王注云：“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故宜慎其所履，以敬為務，辟其咎也。”本爻象辭云：“履錯之敬，以避咎也。”卜辭說，做官的人對待羣眾尊重恭敬“乃吉”，如不能敬慎便難避其咎，完全承接了爻辭之意。

竹簡本卜辭雖然殘缺不全，仍可看出包括了當時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史記》褚先生所補《龜策列傳》言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可與竹書本卜辭相參看。下面以褚文所述雜占卦體為綱目，列出竹書卜辭的占問事項。

1. 卜占病者，死不死

病者死、病者不死、病者病足、病者不死乃瘡、疾久、□[病]者起復之死、唯百病而非重厚之士死、□[壯]者不死老者□[死]、□者死壯者不死；

2. 卜繫者，出不出

繫(繫)囚者免、繫囚者罪益□、繫囚者桎梏不凶、□[繫]囚者久[繫]、□多久繫、繫人唯居家；罪人凶、罪人不吉、罪人不解、罪人復、有罪人不死、罪人無罪、小罪赦(赦)大罪不赦(赦)；

3. 卜求財物，得不得

求得、求不得、求盡得、求有得也後必□、求得之後惠、有求不得復求乃□[得]、[求不]得若得後必大凶、求不吉、有求也得少、□得美而不多、□[求]者得不喜；

4.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不得

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買賣臣妾馬牛者。

5. 卜擊盜，勝不勝

按，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擊盜勝不勝者。

6. 卜求當行不行

行者不行，行者言而不果、不利行非適堊(野)□、□行北、遠行不□。

7.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

按，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往擊盜當見不見者。

8. 卜往候盜，見不見

按，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往候盜見不見者。

9. 卜聞盜來不來

按，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聞盜來不來者。

10. 卜遷徙去官不去

□徙官去宅徙□不□。按，疑此條殘辭與褚文所列條目相近。

11. 卜居官吉不吉

居官者吉、居官者凶、居官法（廢）免、處（處）官者遷、□官冬（終）免、居官府百□、臨官立（莅）眾敬其下乃吉、居官不吉。

12. 卜居室家吉不吉

居家不吉、居家無咎、居家凶、不可居家、久居家者必穰（衰）、□家必穰（遷）有良臣者乃吉、富家吉貧家凶。

13. 卜歲中禾稼孰（熟）不孰

竹書卜辭殘存一“卜歲”辭，闕後文。又，另辭殘存一“旱”字，無上文。

14. 卜歲中民疫不疫

多疾病、百病不□（起？）。按，疑上列兩辭與褚文所陳條目相近。

15. 卜歲中有兵無兵

兵不起。按，疑此條與褚文所列條目相近。

16. 卜見貴人吉不吉

按，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貴人吉不吉者。

17.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

求官小官、求事君弗得、□（求）益祿不得。

18. 卜進亡當得不得

亡者得，亡者不得、逃者雖久無□、臣妾不逃亡、□也得大而亡小。

19. 卜魚獵得不得

田魚有獲、田魚不獲、田魚不得、田魚得而□（少）、田苗有□、田不得。

20. 卜行過盜不過

按，竹書卜辭無專門占問行過盜不過者。

21. 卜天雨不雨

雨雨、雨不雨、雨雨少、雨數星（姓，即“晴”）數星、雨久□〔雨〕。

22. 卜天雨霽不霽

齊（霽）齊、齊不齊。

褚文所說的命兆之辭，有些不能包括在上述條目中，竹書卜辭也有一些同褚文命兆之辭的內容相類似。

23. 娶婦嫁女

嫁女取（娶）婦不合唯合後必相去也。□〔取〕婦嫁女不合。

24. 憂不憂

憂患者解

25. 百事吉不吉

居事不吉、有為不成、〔小事〕吉大事敗、不利有為也、舉事後必敗、不利為外事、舉事者必有□、□利復故事、百事凶。

竹簡本中的卜辭另有若干辭例為褚文所無，但很具特色：

大人不吉小〔人吉〕、大人吉小人有吝、君子吉非善□、小人弗哀、□安靖靖不喜、有患難者解、戰鬥不吉、戰鬥適（敵）有勝、戰鬥適強不得志、□功（攻）戰□、用兵必死、軍旅（旅）不吉、軍關（旅）無咎、不利益土、半（伴）君非良、吏（事）君者小吉、不吏君者不吉、事君先進後退、事君者敬畏（畏）者吉、□宜之君無宜、大臣可以□、有土之君邑危而□、邑君吉、賢君吉、□其邑君凶、人君聚斂□、食稅者吉非食稅者□、勞苦吉、可以獄訟、訟者必□、妻夫相去不復、非出妻也必有□、出妻皆復、子產不孝、□子肖人皆抽(?)

□、□者產死、壽、賈無贏、擬不擬凶……

從褚文所記錄的占卜之辭中，我們可以看到漢代社會的某些側面，比如社會治安的問題，貞問逼盜的內容很多，奉命緝盜的官吏似乎特別希望不同強盜們遭遇，透露出一種怯陣怕事的心情。而在以上一些卜辭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時人所關心的一些完全不同的問題，他們問軍旅戰鬥，問事君伴君、問有土之君，問益土，問人君聚斂，問食稅，問商賈贏利，這些頗具時代特點的詞語及占問事項，向我們揭示，竹簡本《周易》卜辭成文的時代大約為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還應當指出一點是，第146+147號簡中，“臨官立（莅）衆”一語；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稷辰》裏有“臨官立正（政）”一

語，《入官》作“臨官立政”，那麼，“立政”、“立正”、“立衆”，它們究竟是不同意義的表述，還是本為一語而為避秦皇的名諱改了詞呢？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

### 三、竹簡《周易》屬著龜家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記有“《易經》十二篇”，而在《數術略》中另記有若干種屬於著龜家的《易》，大致有：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漢志》引《易·繫辭》論著龜家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顯然，竹書《周易》應當屬於此種數術類著龜家實用性很強的書籍，“全數術之學，無與《易經》正義也”。<sup>①</sup>然而，在《周易》流傳、發展過程中日漸被蒙上種種神秘色彩之前，原本也不過就是著龜家查尋占卜吉凶答案的工具。朱老夫子說：“且如《易》本祇是為卜筮。……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朱子語類》卷六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P1621）“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祇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象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P1622）“《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卻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P1626）以《周易》始創與發展的過程而言，我們贊成朱老夫子的話。

①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同壽昌《漢書注校補》文《任良易旗》評語。

## 銀雀山漢簡 《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釋證

胡文輝（羊城晚報社）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簡牘中，有題名為《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以下簡稱《天地》）的一種，釋文未經繫聯，被歸入“陰陽時令占候之類”。①至今為止，似乎祇有饒宗頤先生對此篇有專文探討。②但饒文祇探討了其中八風、五音之風的一些問題，並且引錄簡文也有疏誤，將好幾條其他篇目中的簡文當作《天地》了。③

以下準備對所有簡文進行梳理。先根據內容作出分類，列出簡文（有疑問的打問號），可能的話盡量進行校補（通假字以括號表示，增補的文字以〔〕表示）、繫聯、標點，並試釋其含義。

### 天 地

- 1234 天○正月五月九月 上旬天-----  
1425 地○二月六月十月  
1340 三月七月十一月-----  
3945 -----○二月-----  
3989 -----○六月-----  
2356 下旬天地在東方-----  
2376 -----中旬天地在西方  
2707 -----方，地在北方  
4710 -----北方，地在-----  
3096 ○天地所-----  
3820 -----之大敗○并天地-----



### 3897 并天地……

由以上簡文，祇能判斷“天”、“地”是以旬為單位，周期性地運行於四方。此處的“天”、“地”，文獻無徵，唯有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中有一節文字正可相印證，其釋文如下：

凡徙、〔取〕（娶）婦，右天左地，貧；右地左天，吉；怀（倍）地逆天，嫁；怀（倍）天逆地，死；并天地左右之，大吉。凡戰，左天右地，勝；怀（倍）天逆地，勝而有□關；怀（倍）地逆天，大貝（敗）；并天地而左右之，一穀十；并天地而逆□〔之〕，大貝（敗）；并天地而右之，王戰。④

此處的“怀”同“倍”，即背，“逆”即迎，“倍”、“逆”、“左”、“右”都是描述“天”、“地”所在方位的術語：背向“天”、“地”所在為背，面向“天”、“地”所在為迎，“天”、“地”在正面左側為左，在正面右側為右。“天”、“地”處於同一方位則謂之“并天地”。我原來猜想，“穀”或即“穀”，同“穀”，義為打擊，“一穀十”似指以一可以當十。承李家浩先生告知，“穀”直接可釋作“擊”，讀作“擊”，“一擊十”係古兵書中的常用語，他還舉出三條書證：《孫臏兵法·威王問》云：“威王曰：‘以一穀（擊）十，有道乎？’”《吳子·應變》云：“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六韜·龍韜·奇兵》云：“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由《陰陽五行》甲篇可見，“天”與“地”都是用以占候吉凶的神煞，運行於四方（或五方？），當時人們根據自己所在位置與“天”、“地”所在方位的關係，以判斷行事的吉凶宜忌。《天地》是講“天”、“地”運行的規律，而《陰陽五行》是講如何根據“天”、“地”的方位判斷吉凶，二者正可互相補充。由《陰陽五行》還可知道，“天”、“地”可用於占候不同的事項，包括遷徙、婚娶和戰爭——而在《天地》中，有“大敗”之語，聯繫到《天地》全篇的性質，可以確定“天”、“地”在此僅是用於占候戰爭勝敗的。

馬王堆帛書《刑德》（有甲、乙、丙三種寫本）中有“刑”、“德”兩種神煞，⑤與此處的“天”、“地”相似，其指稱方位的術語也是“背”、“迎”、“左”、“右”四種，也是占候戰爭勝敗——不同的是，“天”、“地”的運行是以旬為周期，“刑”、“德”的運行則是以年為周期，“刑”運行於四方，而“德”運行於五方（五行）。

## 八 風

4439 ----- 八風○ -----

0904 十一月○凡 哲 = 周、剛、大剛、凶風、皆利為客 生 梁(柔)弱風

0873 三月 風 周 風 -----

2958 ----- 析 哲 = 剛 -----

0932 ----- 風 凶 -----

2033 ----- 東 風 -----

0675 ----- 從 梁(柔)風來，疾而暴，擊之，破軍禽(擒)將。

0653 ----- 從凶風來，疾而暴，主人與 -----

3368 ----- 風從剛風來，疾 -----

3724 ----- 從生風來，疾而暴； -----

2528 ----- 梁(柔)

另有如下兩條文：

0787 利主人○弱風、梁(柔)風、生風，不可以為客，可以為主 -----

0795 利客○大剛風、哲風、剛風，可以為客，不可以為主 -----

這兩條簡以“利主人”、“利客”為題，而且其內容與上述0904簡重複，當不屬於《天地》此處的“八風”部分，而屬於下面的“主客”部分。事實上，此處“八風”的八風風名，與“主客”的八風風名是有所不同的。

對《天地》的八風風名，饒宗頤、李零、陳偉武幾位先生都作了復原，分別如下：

饒——嬰兒風(東)、柔弱風(東南)、大弱風(南)、周風(西南)、剛風(西)、哲風(西北)、大剛風(北)、凶風(東北)⑥

李——生風(東)、弱風(東南)、柔風(南)、周風(西南)、剛風(西)、哲風(西北)、大剛風(北)、凶風(東北)⑦

陳——所列八風風名與李零相同，但未細列方位⑧

以上三家尚有未周。饒先生漏掉“生風”一名。李、陳兩先生則未將屬於“主客”部分的0787、0795兩簡與“八風”部分區別開來，所以都列舉了0787簡的“弱風”一名。但細究簡文，“八風”此處的八風並無“弱風”之名，而另有“析風”之名。2958簡以“析”、“哲”、“剛”三名并舉可證“析”

亦是風名之一；又0904簡“凡哲=、周、剛、大剛、凶風”一句，“哲”字下有二短橫，陳偉武先生以為是無義符號，這是不對的，此二短橫在這裏當是合文符號，“哲=”即表示“哲”、“析”二字，所以0904簡也是以“析風”與其他各風名并舉。至於0904簡的“柔弱風”則當即“柔風”，其風名一繁一簡而已。所以“八風”部分的八風當作：哲風、析風、周風、剛風、大剛風、凶風、生風、柔（柔弱風），但各風的方位似難一一確定。

“八風”的內容，是以風的方向占候戰爭的宜忌——吹某個方向的風，則或有利於“主人”一方，或有利於“客”一方。唐代李淳風《乙巳占》卷十有“占八風知主客勝負法”，其內容與《天地》此處的“八風”部分十分相近，最能說明“八風”的性質：

乾，折風，從西北來，主將死，客勝。

坎，大罡風，從北來，客勝，主人敗。

艮，小罡風，從東北來，客勝，主人不利。

震，兌風，從東來，主人勝，客不利。

巽，小弱風，從東南來，主人勝，客不利。

離，大弱風，從南來，主人勝，客不利。

坤，諫風，從西南來，主人勝，客不利。

兌，冲風，從西來，客勝，主人不利。

又隋代蕭吉《五行大義》第十七“論八卦八風”也有云：

《太公兵書》云：“坎名大剛風，乾名折風，兌名小剛風，艮名凶風，坤名謀風，巽名小弱風，震名嬰兒風，離名大弱風。”……大剛、小剛，客勝；大弱、小弱，主人勝；凶，有凶害之事；謀，有謀逆之人；折，為將死；嬰兒風，主人強。此并兵家觀客主盛衰，候風從來也。至於“主人”和“客”的所指，詳見下文的“客主”部分。

## 五行

1310 ○五行，德行所不勝，刑行所勝。五歲……

1761 以報木 = 苦金乃生火以……

2059 ……乃生木以報土○毋以其子孫攻其大父敵人

2199 ……苦火乃生水以報火 = 苦……

4820 ----- 報水 = 苦土 -----

1345 兵陳(陣)○木陳(陣)直○土陳(陣)圓○水陳(陣)曲○  
金陳(陣)□□□ -----

1127 應東方以金陳(陣),司馬先應○西方以火陳(陣)-----

0945 □女以金應之,以火應之,以水應之,以□-----

根據五行相生相勝的規律及文例,上述 1761、2059、2199、4820  
四條簡可作繫聯和校補:

(土苦木,乃生金)以報木;木苦金,乃生火以[報金;金](1761)

苦火,乃生水以報火;火苦[水,乃生土以](2199)報水;水苦土

(4820),乃生木以報土○毋以其子孫攻其大父。敵人----- (2059)

五行相生的次序是: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五  
行相勝的次序是: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所以此處說  
“土苦木”、“木苦金”、“金苦火”、“火苦水”、“水苦土”。“毋以其子孫  
攻其大父”一句承上文五行而言,似乎是說:不要以所生的五行攻擊所由生  
的五行,如土生金,則金不可攻土。早期文獻講到五行,要麼祇講相勝,要  
麼祇講相生,而《天地》此處同時說明了五行的相勝及相生,并使相勝與  
相生兩種學說融合成一個相當完滿的解釋體系。

1310 簡的“德”和“刑”當是兩個運行於五行(五方)的神煞,與馬  
王堆帛書《刑德》中的“德”和“刑”的性質相同,並且二者的“德”都是“行  
所不勝”,即以木、金、火、水、土為序,與五行相勝的次序正相反——不  
同的是:《刑德》中的“刑”與“德”一樣也是“各徙所不勝”的,而此處《天  
地》的“刑”卻是“行所勝”,即按五行相勝的土、水、火、金、木為序。

以上是講五行運行的原理,而0945、1127、1345 三條簡就是講如何  
根據五行原理行軍布陣,以便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如1127簡“應東方  
以金陣”當是說對付東方之敵要布置“金陣”,因為東方屬木,而金勝木;  
“西方以火陣”當是說對付西方之敵要布置“火陣”,因為西方屬金,而火  
勝金。這就是說,要模仿五行相勝的方式打仗,此即《六韜·龍韜·五音》  
所謂:“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

這玄虛而僵化的軍事巫術在更早的時期就應當很流行。《孫子兵法·虛  
實》說:“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

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銀雀山簡《奇正》也有謂：“有勝有不勝，五行是也。”這些話正是針對上述根據五行相勝原理用兵的方法而言的，並對其抱着批判的態度。

## 客 主

- 0518 利主人：甲申、乙酉、丙戌、丁亥、主人一當客十六。  
0737 利主人：甲戌、乙亥、主人一當客之卅。  
0941 利主人○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  
1621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1667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  
3607 ……〔主〕人一當客之……  
3841 ……當客二  
4092 ……當客……  
0958 利客○壬子、癸丑，主人卅二不當客一……  
2302 利客○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2648 利客○戊子、己丑、庚〔寅〕……  
3703 ……利客○……  
2324 ……寅、辛卯、癸巳、主人八不如客……  
3803 ……□主人四不如客之一……  
0774 利客客主人勝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1434 主人客主人分日：甲子、乙丑、戊（丙？）寅、己巳、庚午……  
0787 利主人○弱風、柔（柔）風，不可以為客，可以為主〔人〕……  
0795 利客○大剛風、暫風、剛風、可以為客，不可以為〔主人〕……  
1859 ……多則主人勝  
1889 ……與客分禍風北多則客勝東……  
0912 □未、庚申、戊戌 主人  
4001 ……庚戌、辛亥，主〔人〕  
0740 丁巳、辛酉、壬戌、癸亥、己未，客……  
4826 ……主人……  
4788 ……丙子、丁……（？）



此處簡文的内容都是圍繞“主人”和“客”的，何謂“主人”和“客”？後世有種種繁複的說法。如北周庾季才原撰、北宋王安禮等重修的《靈臺秘苑》卷五“主客勝負風”云：“兩軍相當未明勝負，以所占時與來方為主，其日納音為客……”又“兵勝風”云：“風雲相交即急戰，風為主，雲為客。”《乙巳占》卷十“十二辰風占”云：“凡日辰納音為客，甲子乙丑商音是也；風從來五音為主人，子午為宮是也。”又“五音客主法”有云：“日辰為客，加時為主人。六甲為客，以其行本位不動為主人，十二辰皆主人也。……”唐代李筌《太白陰經》卷十“主客向背篇”引經云：“衆兵大同，則先舉者為主，後舉者為客。陳兵原野，則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天五音為客，地五音為主。……辰為客，時下為主。……”諸如此類，皆屬晚出的臆解，《天地》中的“主人”、“客”當此無關，而應直接從字面理解：“主人”指主軍，即防守本土一方；“客”指客軍，即外部來犯一方。《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僖公十八年皆有云：

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注云：“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可證“主人”和“客”的早期含義。——與《天地》同時出土的銀雀山簡《客主人分》，以及同屬西漢時期的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和《刑德》，也多以“主人”與“客”對舉，也足可以為旁證。

所以這裏“客主”部分的内容，是專門占候戰爭時本土軍隊與來犯敵軍形勢的相互優劣。方法有二：

一、根據風的方向。上文已經指出，0787、0795簡不屬“八風”部分，而應當屬此處“客主”部分——兩簡分別以“利主人”、“利客”為小題，與此處“客主”部分的其他簡文（如0941、0958、2302、2648）文例正相一致，可以為證。此處列出六種風名，除“弱風”以外，其他五種風名都與前面“八風”部分的八風相同，可見此處應當是一套略有差異的八風體系。另外1859、1889兩簡也屬於風占的内容。

二、根據六十干支（日）。不同的干支日，“主人”或“客”的形勢優劣大有不同。按照六十干支的次序校讀簡文，可見其規律並不複雜，是將六十干支以十二地支為單位分為六組（甲子至癸酉、甲戌至癸未、甲申至癸巳，甲午至癸卯、甲辰至癸丑、甲寅至癸亥），大致每組前面若干個干支日是“利主人”

的，而每組後面若干個干支日是“利客”的。例如，0518簡列舉甲申至丁亥這些干支日“主人一當客十六”，與此相對應的是2648、2324簡（後者正與前者銜接），列出丁亥以後的戊子至癸巳這些干支日“主人八不如客”。按照這一規律，又可校讀其他簡文：0737列舉甲戌、乙亥兩個干支日“主人一當客之卅二”，則可知與此相對應的4788、2340簡（後者也正與前者銜接）所記的干支日是“利客”的；記甲午等日的1621簡當是“利主人”的，而與記庚子等日“利客”的2302簡相對應；記甲辰等日“利主人”的0941簡，當與記壬子等日“利客”的0958簡相對應；記甲寅等日的1667簡當是“利主人”的，等等。

## 五 音

- 0931 角○角風：戊戌、己亥，戊亥（長）、己巳，庚……  
 0960 禹（羽）○禹（羽）風：壬辰、癸巳，壬戌、癸亥……  
 0984 商○商風：庚辰、辛巳，庚……  
 1198 宮○宮風：庚子、辛丑，庚午、辛未，戊申、乙酉……  
 1475 徵○徵風：丙寅、丁卯，甲戌、乙亥、丙申……  
 1982 ……戌、辛亥，壬寅、癸卯，壬申、癸……  
 ……戊寅、己卯……  
 1647 ○角風，當生長三日，宿戒五日，兵……  
 0869 不出三日，宿五日□□□……  
 1644 ……○是胃（謂）五勝之常。戒五日□……(?)  
 0973 不出七日，國□□□□……(?)  
 4721 ……生長□之□……(?)

以上簡文似乎仍是講根據風的情況占候戰爭的宜忌，但占風的方法不同，不是根據風的方向為占，而是根據有風的時間而占。其原理大約是：以五行納音之法，將六十干支（日）劃分為分屬宮、商、角、徵、羽五音的五組干支，凡某日有風的，即為所屬五音之風（如戊戌日有風，即為角風），然後再根據五音之風判斷用兵的宜忌——1647簡就是說如遇“角風”，則“當生長三日，宿戒五日……”云云

劉樂賢先生早已指出，0931、0960、0984、1198、1475五條簡正是嚴

格按五行納音法排比的(祇有0931簡的“戊辰”誤作“戊亥”)。⑨推算納音的原理和方法比較繁複，⑩這裏祇列出五行納音的商音所屬干支：甲子、乙丑，壬申、癸酉，庚辰、辛巳，甲午、乙未，壬寅、癸卯，庚戌、辛亥。按照這組干支(其中又分別兩兩組成六對)，則0984簡與1982簡正繫聯：

商○商風：庚辰、辛巳，庚(0948)戌、辛亥，壬寅、癸卯，壬申、癸[酉]，……(1982)

另外，4296簡“戊寅、己卯”與“主客”部分的2340簡有重複，亦當屬此處“五音”部分，根據五行納音法，戊寅、己卯屬宮風，故此殘簡應接着1198簡。

其餘0869、0973、1644、4721各簡，皆因文例與1647簡有些近似，所以也繫於“五音”部分。

《乙巳占》卷十“占風遠近法”有云：

凡五音，有納音中金、木、水、火、土定五音者，有十二辰配五音，有聽聲配五音。

可見以五音占候用兵的方法有多種，《天地》此處的納音法祇是其中一種。如《六韜·龍韜·五音》就記載了“聽聲配五音”之法：“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當耳……”。

除了以上五類內容之外，《天地》還有一些可以畧作歸類的殘句，例如：

0850 斗建○正月，斗昏建寅○食昔卯○少亡喪○□□……

1205 ○星 極星而馳天下，日夜不休，求不□……

1221 星旗○象鬻(龍)曰輿；南方，象鳥曰旌……

2131 ……旌=在七星後軍建斬=□……

這幾條都是講天象的，似可歸為一類。又如：

2211 ……可有索○三曰士可□……

4195 曰老○九曰死……

4203 ……□○七曰衰○八……

按文例這三條簡暫且放在一起，其中後兩簡肯定可以繫聯作：“……七曰衰○八曰老○九曰死……”辭義正連貫。又如：

0671 九道曰：木欲高，金伐之，金欲……

2283 九時○一道曰：傳禹未可與俱○……

0671 簡似可歸入前面的“五行”部分，但由文例可知屬於2283簡的“九時”，而“九時”未必屬於“五行”部分，所以單獨列出。

此外就全是難以歸類的殘文了。如：

0934 ○春三月，右日，吉；夏三月，逆日，吉；秋三月，左日……

按照文例，後面似可補足為：“……秋三月，左日，吉；冬三月，背日，吉。”這幾句當是說打仗時自己所在位置與太陽方位關係的宜忌：春季太陽在正面右側則吉，夏季面向太陽則吉，秋季太陽在正面左側則吉，冬季背向太陽則吉。

又如：

0957 兵忌○凡斗月咸池立用兵之失也○兵……

陳偉武先生以為此處“斗月”即斗建之月，此句“謂北斗星杓所指之辰(月)遇到咸池之日，就可用兵。如建寅之月遇卯，即為咸池”。<sup>⑩</sup>此說較含混，理解不確。我認為此處的“咸池”即《淮南子·天文訓》所記的“咸池”，又稱“太(大)歲”或“大時”：

……咸池為太(大)歲，二(正)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大)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大時者，咸池也；……

“咸池”另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尉繚子·武議》、《越絕書·外傳·記軍氣》以及其他漢簡材料中，是一種周期性運行於四方的神煞，其特徵是左行或右行，一月居一方，四個月圍繞四方一周，一年圍繞四方三周。“咸池”是凶煞，面向“咸池”則凶，背向“咸池”則吉。所以我懷疑0957簡的“月”字或系“背”字之殘，中間的文字當作：“凡斗，背咸池立(位)，用兵之訣也。”<sup>⑪</sup>

又如：

1357 釜法○此黃帝之見敵不段(暇)燁(灼)龜而卜□……

這裏是說打仗緊急時可用釜占法，托名由黃帝發明。

還有一些其他殘文，片言隻語，難知其義，附列於此：

0963 順之致利有功○以戰□□□□□……

2276 ……也卒(猝)，其已也勿(忽)，其折禍當……

- 2335 時之用晦一時□-----  
 2388 -----主 四月-----  
 2451 -----七月八月-----  
 2531 -----□所在，逆以戰，軍敗，不出三年，將  
 2604 -----前無後三日宿先二日□□□-----  
 2654 將軍之□□-----  
 2725 -----取將軍疾死□□-----  
 2803 (此簡此存一道朱色)  
 3041 -----是胃(謂)四  
 3405 -----□毋害菽地□-----  
 3417 -----其□薄-----  
 4099 -----堅葆-----  
 4198 死地-----  
 4215 -----○月□-----  
 4427 -----柔-----  
 4540 -----□□子○□□丑□□-----  
 4607 -----七月  
 4717 -----○ ○-----

最後，還有一條簡，寫在簡的正面，是全篇的篇題：

0860 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這個篇名是什麼意思？由上文，已可明白《天地》全篇的性質，是以占候為中心的戰爭巫術，在古代稱為“兵陰陽”（《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全篇講到了相當雜多的兵陰陽原理及方法，其中又以“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五種方法為主，故並舉這五種占候方法為篇名——但最末的“居”字在此用作何義？似不可解。是否最末四字“五音之居”自為詞組——“五音之居”即指五音之所在？李家浩先生則認為，“居”似應釋作居處之“居”，《天地》全篇內容都是根據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所在的方位或日辰來占候吉凶的，故名。

附記：此文承李家浩先生審閱並指正，特此多謝！



## 注 釋

- ①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② 《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 ③ 原簡號：0927、0773、0305、0218、0306。
- ④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P24。釋文第二字祇餘左上部分，第三字原缺，據下文“凡從……”及“凡取（娶）婦……”等語釋補。
- ⑤ 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P132—143。
- ⑥ 同注②
- ⑦ 《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P49—52。
- ⑧ 《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華學》第一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 ⑨ 《五行三合局與納音說》，《江漢考古》1992年第一期。又見劉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P168。
- ⑩ 參考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
- ⑪ 同注⑧
- ⑫ 詳見我的《釋“歲”——以睡虎地〈日書〉為中心》，《文化與傳播》第四輯，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 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

永田英正〈日本京都大學〉

## 前言

在中國，紙張普及以前，竹片和木片作為書寫材料被使用着。作為書寫材料的竹片被稱為簡，木片被稱為牘，兩者合起來被稱為簡牘。

作為書寫材料的紙張在中國的普及，通常被推定為公元二世紀後半期至三世紀之間，因此，中國古代的最鼎盛時期漢代是以簡牘為主要書寫材料的時代。這也意味着書籍當然不用說，凡上自政府官廳的官文書，下至私人之間的來往信函，無一不是書寫在簡牘之上的。從而，漢代的簡牘，與後世經過他人的手整理編纂而成的文獻等史料不同，它是漢代的原始史料，是第一手史料。這些史料，不用說，是漢代歷史研究中所不可缺的貴重史料。

具有如此史料價值的漢代簡牘，最初由英國人 A·斯坦因在本世紀初於中國西北部的敦煌地區發現以來，時至今日，已在中國各地陸續發現。其數量，包括未發表的在內，共在全國五十餘處發現了大約五萬枚左右。從發現地點來看，在中國內地，幾乎全部發現於墓葬或與墓葬相關的場所，與此相對，在甘肅省，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等所謂中國的邊疆地區，雖然也有出自於墓葬的事例，但大部份出自於漢代設置的包括燧燧等在內的監視哨所這種軍事性官署的遺址之上。由於上面所說的這種發現場所的不同，出土的簡牘在內容上也就隨之存在着明顯的特徵。這一特徵就是，出土於墓葬的簡牘，雖然也有若干的例外，但幾乎都是遺冊和書籍。所謂遺冊，是一種記錄隨葬品品名、數量的目錄。之所以墓葬中出土的簡牘其內容被限定在諸如遺冊和書籍之內，是因為這些東西均與被葬者有關，是一開始就有意識要留下來的東西。與之相比，邊疆地區的軍事性官署遺址中出土的簡牘，雖然以與政府相關的文書、記錄等所謂的文

書為主，但還涉及到私人的信件、書籍等，包涵着極其廣泛的內容。這些簡牘的大部份是作為無用之物被丟棄的，因此這些與出於墓葬的簡牘不同，它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意識地要保留下來的，而是完全出於偶然纔得以保存至今的。當然，雖說是官文書，但從遺址的性質上來看，其內容仍然偏重於軍事、軍制以及邊疆行政等方面，這一點是難以否認的。然而，即使有着這一制約，其內容仍然是涉及廣泛、豐富多彩的。

墓葬中出土的遺冊，將之與實際隨葬的遺物進行對比，能夠確定一些器物的名稱或形製，能為考古學的研究作出頗大的貢獻。同時，遺冊又是墓葬制度、葬禮等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貴重資料。還有，墓葬中出土的書籍，例如像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這樣的律令集和占卜用的日書等，作為貴重的歷史資料當然具有利用的價值，但是，一般說來它應該屬於書誌學或古寫本學的研究範疇。從而，作為歷史研究史料而值得寶貴的應該是出土於邊疆地區軍事性官署遺址的簡牘。近年以來，中國各地雖然相繼出土了不少漢簡，但是居延、敦煌發現的所謂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作為漢代歷史研究的貴重史料卻仍然佔有相當的比重，其原因就在於這些簡牘中有着與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豐富內容。

那麼，有着豐富內容的簡牘，我們怎樣纔能加以好好地利用呢？最近，居延新簡圖版的公佈使得資料的數量更加龐大了，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很有必要將簡牘研究的方法論進行一次整理。這裏，在進入正題論述之前想把過去我們是怎樣研究簡牘的這一研究史回顧一下。

### 一、迄今為止的簡牘研究

近代簡牘的研究是以敦煌漢簡的發現為契機，由法國的沙畹和中國的羅振玉、王國維等人開始的。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的烽燧遺址中發現了704枚漢代的簡牘後，沙畹對這批簡牘進行了釋讀並對之作了研究，將全部的釋文譯成了法語並加上了注解，於1913年出版了《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書<sup>①</sup>。當時，亡命於日本的羅振玉和王國維得到了沙畹發表的588枚簡牘的照片，開始了對這一批漢簡的考證研究。第二年的1914年，出版了《流沙墜簡》<sup>②</sup>。這樣，沙畹和羅、王三人的著作做為近代最初而且正式的簡牘研究書籍相繼出版了。這一出版，成了今天

簡牘研究的先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可是，這兩種著作中有着明顯的不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在簡牘的排列方法上存在着差異。沙畹基本上是按簡牘的出土地點來進行排版的，而羅、王二人是根據簡牘的內容來進行分類整理的方法，給後世居延漢簡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居延漢簡，指的是1930年至31年斯文赫定率領下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下，貝格曼在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上發現的約一萬枚左右的簡牘。1973年至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同一地區又新發現了大約兩萬枚左右的簡牘。現在，為了區別這兩者，將後者稱為居延新簡，而將前者稱為居延舊簡。在本書中，我們將新簡稱為居延新簡，舊簡逕稱為居延漢簡，不特別地稱居延舊簡。因此，如果沒有特別聲明的話，居延漢簡指的就是舊簡。

貝格曼發現的居延漢簡，最初是由中國和瑞典的研究者協力來進行釋讀的。其後，由於情況的變化，最終由勞幹來擔當了釋讀工作。1943年出版了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以下簡稱《釋文》）<sup>③</sup>。勞幹在整理居延漢簡時，採用的就是羅、王《流沙墜簡》基本上按簡牘的內容進行分類整理的方法。緊接着，繼《釋文》之後，1944年勞幹又出版了可以稱得上是研究篇的《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以下畧稱《考證》）<sup>④</sup>。這部《考證》，是一部將漢代政治制度中的事項個別地提出來，利用從簡牘中歸納出來的記事對這些事項進行實證的著作。《考證》中，勞幹將簡牘記事中能夠用來對漢代政治制度進行考證的材料已經幾乎網羅殆盡了，這樣說我想並不過份。勞幹以後的各種研究，其實都可以是在這一延長線上進行的。

居延漢簡與敦煌漢簡相比，數量上是其十倍以上，簡牘的內容也因此而極其豐富。因此，勞幹的《釋文》和《考證》公佈以後，引起了研究者們極大的關心。在中國，從四十年代後半期到五十年代初，漢簡的研究盛極一時。在此以後，勞幹的《釋文》也傳到了日本。在日本，例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1951年組織了以森鹿三為班長的居延漢簡共同研究班，五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居延漢簡的研究也迎來了極盛期。

可是，這一時期日本的居延漢簡研究中，有一個不得不注意的現象，這就是因為看不到居延漢簡的照片，祇能將勞幹釋讀過的釋文當作唯一的



材料來進行研究。並且，日本的居延漢簡研究，是在能够從簡牘記事中論述的題目已經為勞幹或其他中國學者幾乎做盡的情況下開始的。因此，日本的研究，要麼就是找出勞幹等中國學者沒有論及並且尚有文章可做的題目來，要不就是將中國學者已經研究過的題目進行更加歸納性的研究，從中得出新的觀點看法來。其實當時也祇能朝着這個方向來進行。

五十年代開始的日本居延漢簡研究，到了1953—1955年，其研究盛況已經超過了中國。但自1955年以後，除極少數的研究者外，研究熱急速下降了。其原因很多，其中，以勞幹釋文為唯一材料，而簡牘照片仍然看不到這一局面沒有改變，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更加根本的原因在於將簡牘作為研究材料進行利用的史料學的方法問題上。如果說得更加明確一點的話，也就是簡牘的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着問題。問題在哪裏呢？問題就在於我們的眼睛祇盯着簡牘上的記事。換句話說，即在簡牘研究中存在着的方法問題就是祇利用那一部份能够作為漢代史研究史料的簡牘，而對其他的簡牘或與簡牘本身相關的問題則置之不理。

眾所周知，能够保持原來的完整形狀保存下來的簡牘極其稀少，大多數的簡牘是斷簡，而且，字跡漫漶、難以釋讀的簡牘也非常之多。因此，能够作為歷史研究的史料而加以利用的簡牘，在數量上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居延漢簡雖說有一萬枚左右，遲早有被用盡的一天，這是當然的事。拿日本的例子來說，大約五年左右，這些能够作為史料的簡牘就差不多被用爛了。從而，我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這種現狀長此以往行嗎？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居延漢簡有一萬枚，而通過上述的研究方法能够利用的簡牘推測最多祇有數百枚至一千枚左右。這樣一來，剩下來的九千枚簡牘就祇能作為無法利用的東西而長期擱置了。

居延漢簡，不用說，是漢代貴重的第一手資料，即使是那些殘簡斷片，其史料價值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對居延漢簡，將之單純地分成能作為史料利用的部份和不能利用的部份，並且能够利用的祇有極少數的一成左右，而佔絕大多數的簡牘則被視為無法利用的東西而束之高閣，這難道可以說是利用了居延漢簡了嗎？這是筆者坦率的疑問。因此，面對這些現象，我們產生了這樣的反省：我們是不是祇重視了簡牘上的記事了呢？是不是過份看重了記事和歷史研究之間的結合了呢？是否有必要開創一個將簡牘本身所具



有的個性、特性也加以考慮的科學的簡牘研究體系呢？這裏，我想注重的是通過古文書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簡牘，這就是我想提倡的古文書學研究。

## 二、簡牘古文書學的探討

就日本學術界來說，過去對簡牘本身展開的研究並不是完全沒有，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創始者森鹿三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說就是屬於這一方面的<sup>⑤</sup>。在簡牘中，像通過許可證那樣可以單獨一枚使用的也有，但絕大多數是用細繩編綴起來的冊書。隨着時間的推移，細繩腐爛斷絕，原來是冊書散成了一枚一枚的亂簡。森鹿三的主張就是，作為簡牘研究的基本作業，是將散亂的簡牘恢復到冊書本來的狀態，如果這種恢復不可能的話，那首先得將它儘可能恢復到接近於冊書的形態，森鹿三將這種作業看作是簡牘研究的主要方向，特別是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以下畧稱《圖版》）公刊以後<sup>⑥</sup>，森鹿三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通澤第二亭食簿”、“卒家屬廩名籍”等簿（簿書）、籍（名籍）的復原上。以後繼承森鹿三的這種研究方法：試着完全復原了多種冊書的邁克爾·魯惟一（Michael Loewe）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sup>⑦</sup>。肇始的森鹿三，經邁克爾·魯惟一繼承發展的這一系列研究，給我們後來的漢簡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啟發。如果將他們的研究成果作一個總結的話，那就是：

（一）在居延漢簡中，從全體上來看，屬於簿、籍類的簡牘（以下畧稱簿籍簡牘）佔絕大多數。

（二）簿籍簡牘，與其記事的內容相應，各自具有固定的書式。

（三）這一事實意味着這些簿籍簡牘不是單純的筆記或紀錄，而是被編纂成冊書的。

（四）從而，即使一枚簡牘已經是斷簡，祇要它的書式的一部份能夠判明的話，我們就可以推斷出它應該是屬於何種簿籍的斷片了。換句話說，也就是如果以簡牘的書式為基準的話，大量的簡牘就有了歸類集成的可能性。

（五）然後，更重要的是，簿籍簡牘不單單是簿籍的殘簡斷片，隨着簿籍的移動，就有可能形成文書，這就開啟了通往對簡牘進行古文書學研究的道路。

站在上述觀點之上，筆者所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就是《居延漢簡集成》<sup>⑧</sup>。在《集成》中，以居延漢簡中的簿籍簡牘為對象，以不同的書式為基準，以出土地點為單位，將同形同種的簡牘作了歸類集成，並針對各類簡牘的書式，內容以及使用方法等進行了考察。筆者在進行這一歸類集成的研究之前，做的第一步準備工作是，從1957年公刊的居延漢簡的《圖版》上，將簡牘的照片一枚一枚地剪了下來，貼在卡片上，將居延漢簡做成了大約一萬張左右的照片卡，並將所有的卡片按編號進行了排列。在這一工作的基礎上，再按出土地點將簿籍簡牘抽出，花了多年的時間，對文字的書寫位置、文字的大小、記載的內容，還有簡牘的形狀等作了考察以後，對所有的簿籍簡牘進行了分類整理。《居延漢簡集成》就是在經過了這一基礎作業之後完成的。筆者在《集成》中，確認出了七十多種書式的簿籍。這些書式被確認以後，即使是一枚斷簡，祇要它還具備着書式上的特徵，那麼，這枚斷簡的性質就能確定。我相信，一條正確利用簡牘的道路被打開了。從此，簡牘的利用，再也不是像以前那樣個別地一枚一枚地利用，而是可以一組一組地加以利用了。其實這也是我的一個首倡。

然而，以簡牘的書式為基準對之進行集成，這最終不過是古文書學的第一階段，而決不是古文書學的全部。下一個階段，就要求我們對各種書式進行分析與考察了。接下來，想將對集成後的簿籍簡牘所作的分析考察的要點以及自己所得到的知識的一部份揭示如下。

### 三、簿籍簡牘的古文書學研究

首先，我們想揭示一條簿籍簡牘的標本為例。

史料一：

1. 始建國二年五月丙寅朔丙寅，橐他守候義 敢言之。謹移莫當燧  
守御器簿一編 敢言之。
2. ●橐他莫當燧始建國二年五月守御器簿。
3. 驚□□石 深目六 大積薪三
4. □□三糒九斗 轉射十一 小積薪三
- 5—21 (省畧)

22●橐他莫當燧始建國二年五月守御器簿。(EJT三七·一五三七～一五五八)⑨

這是1973年至1974年發現的居延新簡中的一部冊書，全冊書由22枚簡續編綴而成，發現的時候，細繩已經爛斷，冊書已成散簡，後經仔細收集，慎重地復原而成⑩。復原以後的冊書，我們稱它為“橐他莫當燧守御器簿”。

這裏，在分析“橐他莫當燧守御器簿”之前，有必要將漢代居延地方的軍事組織，具體說來就是漢代張掖郡下的統治機構作一個概畧的說明。

根據迄今為止研究可以知道，漢代河西四郡之一的張掖郡的地方長官張掖太守之下，設有軍政系統的兩大軍事基地，一個是北部的居延都尉，一個是南部的肩水都尉。各都尉府下配置有數個候官，候官之下設有部，然後部下有燧。都尉府的長官稱都尉，是一郡的最高軍事長官。像張掖郡這樣的邊郡，一個郡設有複數的都尉，他們的官秩僅次於太守，為比二千石。都尉下有次官丞，丞之下有閭下、諸曹掾史，還有作為武官的司馬、千人等等。如果將都尉府看成是一個郡防衛上的後方基地的話，那麼，位於防衛最前線的就應該是部和燧了⑪。每一個部，除候長以外，還設有作為書記官的候史，配有戍卒10人左右。一個燧，燧長以外，配置2～3名戍卒。他們擔負着一旦發現了緊急情況立刻向後方基地傳達的重要使命。在這些最前線的部、燧與後方基地都尉府之間，管轄着部、燧，承擔着將都尉府的命令傳達給前線，將前線的情況匯報給都尉府任務的就是候官。從居延漢簡上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候官，北邊的居延都尉府下有殄北候官、居延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等四個候官，南邊的肩水都尉府下有橐他候官、廣地候官、肩水候官等三個候官。這些候官的長官稱郵候或逕稱候，官秩為比六百石，這是照準民政系統的縣令而設定的。也可以這麼說，候官與民政系統的縣相當，部、燧則與鄉、亭、里相當。郵候之下有次官尉，還有作為武官的士吏，作為文官的掾、令史、尉史、書佐等若干名，除此之外再如上戍卒的話，候官的規模大致在百人左右。總起來說，都尉府——候官——部、燧這一整套的嚴密的軍事組織，組成了防禦匈奴的堅固障地。

接着，我們再回到“橐他莫當燧守御器簿”的話題上來。在史料一中，簡2和簡22的簡頭上有“●”記號，緊接着記號下的“橐他莫當燧守御器簿”，應該是這一冊書的標題簡，也就是這一冊書的題目，“●”是明確表示標題



的記號。橐他，就是橐他候官，它是前面我們提到的肩水都尉府下的候官之一。從而，所謂橐他莫當燧，也就是指橐他候官管轄下的莫當燧。另外，所謂守御器簿，是記錄守衛防禦中必要的設備、物件的帳簿。這樣看來，這一簿書的標題意味着這是一件屬於橐他候官的莫當燧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五月的防衛上必需的設備、物件的帳簿。夾在簡2和簡22之間的簡3至簡21，記錄了這些設備、物件的品名和數量，簡3中的深目是距離測定器，積薪是堆積起來的柴堆，是用來點燃後傳送狼烟烽火的。簡4中的轉射指的是弩床。也就是說，簡3至簡21是構成守御器簿內容的部份，與上述的標題相對，這一部份可以說相當於守御器簿的正文。在前一節裏，我曾經提到過自己做了簡牘的歸類集成，那些簡牘其實就是構成簿籍內容或者說是構成簿籍正文的簡牘，我們稱之為“簿籍簡牘”。從這一例中，我們知道了簡牘的簿籍是由標題簡和緊接着標題簡下的簿籍簡牘構成的。

這裏，“橐他莫當燧守御器簿”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這就是在守御器簿之前還有一枚簡——簡1連綴在上面。簡1的意思是：始建國二年五月一日，橐他候官的長官守候義（人名）向上級申報，並恭謹地上交一編莫當燧守御器簿。具體地說，簡1就是向上級進呈簡2至簡22的守御器簿時添附在上面的一封公函。而且，從官文書的書式來看，如簡1所示，這是一份來自於橐他候官的上報文書，所以，它的投送地必定是有水都尉府。從而，我們知道了莫當燧的守御器簿是通過橐他候官而上呈給有水都尉府的。從這一事實上，我們還可以知道，在某一個官署作成的簿籍，並不是留在這個官署的，而是要附上公函呈給有水都尉府的。還有，史料一中，作為公函的簡，是放在冊書的最前面的，或許還有將公函放在冊書最後面的，如果用史料一來作比方的話，那就應該在簡22之後了。

通常，在古文書學上，所謂文書，是指發出人為了向受取人傳達自己的意志或其他事情而作成的書信。也就是說，有發出人，有受取人，然後有傳達的事情。嚴格地說，必須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才能稱得上是文書。從這一古文書學上的定義來看，由一個個單項事情的記錄匯集起來的簿籍，我們不能說它就是文書，但是，簿籍一旦加上了發出人的上呈公函的話，馬上就轉變成了文書。以上面的“橐他莫當燧守御器簿”為例，雖然從簡2至簡22是守御器簿

的簿書，但是，附上簡1的轉送公函以後，發出人是臺他守鄣候義，受取人是有水都尉府或有水都尉，呈轉的事由是守御器簿，這樣，就完全具備了作為文書的條件了。因此，可以說，即使簿籍簡牘是殘簡斷片，我們都可以將之作為古文書學上的文書來加以對待。我們基於這種認識，將簿籍簡牘視作文書，從而開闢了運用古文書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簿籍簡牘的道路。

在這裏，我們綜合考慮了簿籍的標題，構成簿籍正文的簿籍簡牘，加上發送簿籍時添附的公函以及簡牘的出土地點等全部要素，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對燧、部、候官他們各自能作成什麼樣的簿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這裏，就祇能說一說考察的結論了②。

#### (1) 作成於燧、部、候官的簿籍

吏卒名籍（官吏與戍卒的名冊），病卒名籍（罹病戍卒的名冊），卒家屬在署名籍（官吏與戍卒的口糧支給名冊），廩鹽名籍（食鹽的支給冊），守御器簿（守備防禦上必需的設備、物件的記錄清單），兵簿（祇記錄兵器的清單），什器簿（日用生活用具類的記錄清單），折傷兵簿（損傷了兵器的記錄清單），被兵簿・被簿（官吏以及戍卒所有的兵器以及衣物的記錄清單），日迹簿（每天檢查表面平坦的被稱為天田的沙地上是否有足跡的勤務記錄），日作簿（官署的全部戍卒每天的工作記錄），卒作簿（戍卒個人每天的工作記錄），芟出入簿（馬匹飼料的出納簿）。除此以外，還有一些沒有標題名稱不詳的簿籍，應當有通過狼烟、烽火、旗幟等遞送信號的記錄簿和郵件遞送的記錄簿等等。

#### (2) 作成於部、候官的簿籍

吏受奉名籍（官吏的俸錄支給名冊）、吏奉賦名籍（官吏的俸錄支給名冊的一種）。

#### (3) 作成於候官的簿籍

賜勞名籍（每年秋天在候官的弓射比試中因成績優秀而加算勤務日數的官吏名冊），奪勞名籍（在弓射比試中因成績低劣而被削減勤務日數的官吏名冊），穀出入簿（糧食穀物的出納簿）



錢出入簿（現金出納簿）、伐閭簿（官吏功績數及勤務日數的記錄簿），其他，還有一些因沒有標題簡而名稱不明的簿籍，其中應當有燧長的名冊簿、騎士的名冊簿、官吏·戍卒的債務記錄簿、兵器·設備品的出納簿、官吏的人事調動的記錄簿、文書發送的記錄簿、文書受取的記錄簿、燧·候的官吏被傳訊問候官陳述的記錄簿、官吏·戍卒的罪狀及處罰記錄簿等等。

現在，通觀這些簿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燧、部、候官各官署都必須製作的簿籍有吏卒名籍、守御器簿以及日迹簿，作簿等。吏卒名籍是該官署的構成人員名冊，吏卒廩名籍是給這些構成人員發送口糧的支給名冊，另外，守御器簿，前面已經說過，是該官署守備防禦上必需的設備、物件的記錄簿，日迹簿或作簿是在該官署勤務的官吏戍卒的勤務記錄簿。這四種簿籍，不管官署的大小，都是最重要而且是最基本的簿籍。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簿籍的存在，纔能夠同時如實地反映各官署的基本性質。

與上述現象相比，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有一些簿籍不見於部和燧而僅見於候官，其中例如錢出入簿、穀出入簿以及其他一些物品的出納簿等。這一現象告訴我們，候官不僅僅作為一個軍事基地，而且還作為一個兵站基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前面也已經提到過，簿籍作成後，並不留存在簿籍作成的地方，而是提交給上級官署。也就是說，部、燧作成的簿籍，附上部、燧的上呈公函後，被送往候官，候官作成的簿籍，附上候官的上呈公函後，被送往都尉府。在這種情況下，各階段官署的報告書中，有一些值得注目的地方。首先第一點，部或燧作成的所有簿籍全部都得提交給候官。例如：

史料二

其一人養  
丁酉卒六人 一人病  
四人伐葦百廿束

（三一七·三一）

### 史料三

第廿四燧卒孫長 治墜八十 治墜八十 治墜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六一·七二=八六·二九)

上面的史料二是某部戍卒六人某一天的作業記錄簿，其內容包括一人養，即擔當炊事，一人病，剩下的四人共伐葦一百二十束。若從簿籍的種類上來說，這相當於日作簿。而史料三是第二十四燧的戍卒孫長這個人每天的作業內容的記錄，在簿籍的種類上，它應該是構成卒作簿的簡牘。治墜就是做土坯，一天的工作定額是80塊。除土是將堆積在城塞外壁的沙土清除的工作。史料三的簡牘，也就是戍卒孫長三天做土坯，六天清除沙土的每天的工作情況記錄。史料二和史料三都是部或隧每天做的記錄。這兩枚簡牘都在甲渠候官的所在地破城子出土的，非常明顯，這是部或隧向候官提交的東西。這樣，部或燧每天作成的記錄，也可以說是原始的記錄，就這樣原封不動地作為簿籍上交給了候官。這向我們展示了一點，那就是，部或燧作成的簿籍全部上交給候官這是一條原則。

與上述的情況相比，下一階段，候官向都尉府提交簿籍，也將部、燧送上來的所有簿籍或於候官作成的所有簿籍全部提交給都尉府呢？我想決不是這樣。我這樣講的理由，祇要看一下前述(3)中所列的候官作成的簿籍種類就可以領會得到了。例如，文書的發受記錄簿應該是作為一種存根留在候官的。還有，人事變動記錄簿，原本來自都尉府，這也是應該保存在候官的。上面的這兩種簿籍都沒有上報文書的性質。同樣，從部燧向候官提交的簿籍來看，譬如記錄何處戍卒某月某日從事何種工作等的簿籍，候官都得一樣一樣向都尉府報告，這樣的事，畢竟是難以想象的。由此看來，除特別重要的簿籍外，候官不會像部、燧那樣將所有的簿籍全部提交都尉府，所有的簿籍都應該是由候官進行整理集計，然後向都尉府匯報的。

部或隧的原始記錄全部上交候官，候官將經過集計後的東西提交給都尉府，這樣的一個程序，其實從各個官署的規模上也可以得到說明，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統轄着好幾個燧的部裏祇配置一名專門的書記官候史，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作成原始的記錄並將之作為簿籍提交給候官已經是一項相當繁重的工作了。但是到了候官，不僅有複數的掾

令史、尉史，甚至還配置着書佐，完全具備了文書作成的陣營，這裏，候官要求部或燧上交原則上由候史作成的各種原始材料，這些原始材料由候官獨力進行整理、集計，然後上報給都尉府，從而作為結論其實可以這麼說，候官是行政文書作成的最基層的行政機構。如果仍然停留在以往的那種單單追究簡牘記事的話，這一結論到底是難以得到的，而祇有將簡牘用古文書學的方法進行了處理，並且綜合考察了簡牘的整體情況以後，這一套行政文書的作成過程才得到了解明。

#### 四、簿籍制度與漢代的文書政治

前面我們看到的漢代各種簿籍的作成，實際上是基於上計制度而進行的。漢代的地方統治機構郡，在每個年度末的九月（邊郡則三年一次），必須將管轄區域內的戶數、口數、墾田面積、錢穀收支以及犯罪人數等等進行集計，並將集計以後的集計簿呈報給朝廷，這就是上計制度。為了上計，郡要求它的下級組織縣提出各種集計以後的簿書。因為朝廷通過郡的上計，一方面可以把握地方政治實情，同時也可以判定地方官吏的政績和能力，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漢代的上計制度是在極其重大的政治意圖下實施的。但是，漢代的簿籍到底是什麼形態呢？還有，這些簿籍是怎樣作成的呢？說到這些問題，從史書上則找不到絲毫痕跡，就像我們上面所看到的那樣，居延、敦煌等地的簡牘發現以後，我們纔有可能知道了它的實態。

關於漢代的簿籍，可說的東西太多了，這裏，我們祇想從與行政相關的方面來看一下簿籍的可信賴程度。《漢書》宣帝紀所載的黃龍元年（公元49年）的詔書中，有如下的幾句：

“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諂，以避其課。”

這裏揭示了上計簿往往不實，徒具空文，難以相信的現象，但實際上怎麼樣呢？我們想通過簡牘上的例子來看。

史料四

元延二年八月乙卯，累虜候長敞敢言之。官檄曰：累虜六石弩一傷右檢，受備以六石弩二，其一傷左檢，一傷右檢，遣吏持詣官，會



月廿八日。謹遣驩喜燧長馮育持詣官，敢言之。

(一七〇·五A)

這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0年)八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卅井候官所屬的累虜候長敬上呈給卅井候官的上報文書。上報的內容是：

從候官處下達的文書中，有如下的指示：累虜部有六石弩一張，右檢部(弩的部件，具體位置不詳)損壞。但是，累虜部裝備的是六石弩兩張，應是一張左檢損壞，一張右檢損壞。讓吏帶着弩機前去陳述。

從這一枚簡牘上我們可以看出，卅井候官對累虜部提出的簿書(可能是折傷兵簿)進行了檢查。對於部或隧提交上來的簿籍，候官是要嚴格地檢查的，同樣，對候官提交上來的簿籍，都尉府也是要進行嚴格檢查的。

#### 史料五

校甲渠候移正月盡三月四時吏名籍，第十二燧長宣史。案府籍，宣不史，不相應，解何。

這一簡牘的內容是

對甲渠候、亦即甲渠候官提交上來的正月至三月四時(三個月)的吏名籍進行了檢查，吏名籍上說第十二燧長宣是史(有書記資格者)但校對了府籍以後，宣不是史。名籍與府籍不符，有何申辦。

史料五中出現的府籍是都尉府的名籍，解何是帶有詰問意味的官場用語。也就是說，甲渠候官提交上去的吏名籍中有錯誤，都尉府在核對時發現了這一錯誤。從這一條簡牘上我們可以得知，候官向上級部門都尉府提出的簿籍在都尉府是要接受嚴格審查的。

從史料四和史料五的分析中，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這就是：部、燧向候官以及候官向都尉府提交的簿籍都要經過逐級嚴格審查。這裏引人注目的是，在對簿籍進行審查時，都是通過與其他簿籍的對照進行的。前述史料四中，在卅井候官處，必定有支給累虜部兵器的支付簿，在審查時，應該是將之與累虜部提交上來的折傷兵簿進行對照的。史料五中，對甲渠候官提交上來的四時吏名籍，很明顯是用都尉府持有的名籍來對照核查的。從這些文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種預防措施來，即，作出複數的簿籍來以防舞弊。因為祇要將各種簿籍一對照，其中的錯誤或不正當行為馬上就可以發現。史料二，

史料三就是最典型的事例。根據這兩條史料，戍卒每天的行動同時被記錄到日作簿和卒作簿這兩種簿籍上，這種徹底性，不能不讓人覺得驚異。這是因為舞弊之多而帶來的智慧呢？還是將它歸為一種徹底管理的方法呢？筆者覺得這兩面的原因都有。不管怎麼說，這裏所採取的態度是不放過一絲一毫的舞弊行為或蒙混過關行為。

不過，以上所說的簿籍內容以及制度，都是漢代邊郡軍事組織下的制度，在內地是否也有這樣一套制度呢？這一點並不清楚。但是，以簿籍為基礎的上計制度，無論是內地還是邊郡，都毫無例外地被執行着，因此，簿籍制度以及以簿籍為基軸的文書政治的構造與精神，應該說與各地組織的性質是沒有關係的，是同樣被貫徹執行的。如果這一想法可以站得住腳的話，那麼，有一個現象就值得注意了。這就是候官是行政文書作成的最基層的行政機構這一事實。前面已經提到過，部或隧作成的記錄，作為簿籍原封不動地上交給候官，從這一現象中我們可以覺察到，部或隧作成的各種簿籍全部提交給候官這應該是一個原則，候官將這些部或隧提交上來的簿籍進行整理、集計後，上呈都尉府。正是通過對這一現象的分析，我們才將候官理解成行政文書作成的最基層的行政機構的。這雖然是軍政系統的制度，但如果將之與民政系統進行比較的話，與候官相當的是縣，因此，我們推測縣與候官一樣，也具有同樣的機能。

在漢代的郡縣制度中，不用說，縣是地方行政的第一線，是直接管理着人民的官署，但是，從史書的文獻記載來看，地方行政的核心往往被看成是郡，而縣的地位顯得不是很重要。如果再想進一步了解縣的行政實態的話，那就更無從知曉了。軍政系統與民政系統，即使存在着差異，其在作為政治的基本精神——文書政治這一點上應該是沒有隔絕的吧。這裏，如果將在候官的研究中得到的知識來考察縣的行政機能的話，我們可以這麼說，與候官一樣，縣是擔負着收集、統轄作為地方最基層組織的鄉、亭、里作成的各種簿籍，處於地方統治第一線的官署。因此可以推測，到了第一年的年度末，縣要對這些簿籍作為行政文書上交給郡，郡再將各縣提交上來的簿籍進行整理集計，作為全郡的集計簿，向朝廷提出。這樣一來，通過簿籍制度，連地方最基層的行政組織也就和中



央聯繫起來了。這就是以簿籍為媒體的漢代文書行政，而縣就是這種文書行政的基礎行政文書作成的最基層的行政機構。

## 五. 結 語

以上，我們從漢代簡牘的出土狀況，簡牘的內容開始，回顧了特別是對歷史研究有着較高史料價值的敦煌、居延等邊郡出土的簡牘的研究史，對以往的簡牘研究中眼光祇盯着簡牘記事這種方法進行批評，發出了必須用古文書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簡牘的倡議。然後，將居延漢簡中數量最多的簿籍簡牘提了出來，對之作了詳細的分析。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了候官是行政文書作成的最基層的行政機構。在與候官的關係中，也談及了縣的行政機能，闡明了漢代文書政治的一個方面的特徵。這些問題，單憑經過後人整理編集的史書等文獻資料是無法解決的，而通過了對第一手史料簡牘的分析以後纔得到了解決。然而，講到對簡牘的分析，這裏想再一次特別強調的是，這樣的結論，如果祇注重簡牘記事的話，也是無法得到的。

過去，我們在利用簡牘時，祇注意到了簡牘上的記事，將簿籍簡牘也單純地理解成祇是構成簿籍內容的簡牘或斷片殘簡。但是，這不僅僅是簿籍，而是下級官署向上級官署，具體說來就是部或隧向候官，然後經候官的整理集計後再向都尉府提交的報告書。從而，簿籍簡牘即使是一塊斷片，它也是屬於某一項報告書的斷片，這就是古文書學上所說的文書了。正因為立足於這一視點，將簡牘用古文書學的理論方法進行處理以後，我們纔能夠解釋明瞭簿籍——亦即文書——作成的程序以及文書處理的程序。雖然，在見不到簡牘原物的現狀之下，要想建立完整的簡牘古文書學也還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簡牘的古文書學也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這一理由也就在這裏。

## 注 釋

- ① Edouard Chavannes (沙畹), «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ambo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

I vol Oxford 1913年。

- ② 羅振玉 王國維《流沙墜簡》，京都東山學社，1914年。
- ③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石印本，四川南溪，1943年。排印本，1949年。
- ④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石印本，四川南溪，1944年。排印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1960年。
- ⑤ 森鹿三《東洋學研究 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年。
- ⑥ 勞幹《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一，1957年。
- ⑦ Michael Lov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2 vols Cambridge 1967年。
- ⑧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集成— 三》《東方學報(京都)》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一期 1974～1979年。後收入永田英正著《居延漢簡研究》同朋舍，1989年，第一章、第二章。
- ⑨ 這裏的號碼均為原簡的號碼，下同。
- ⑩ 登載於《文物》1978年第1期。
- ⑪ 以往，將管轄幾個燧的部稱為候，居延新簡發現以後，證明將之稱為部是正確的，請參照永田英正“甲渠第四燧出土簡的分析”，永田英正編《中國出土文字資料的基礎研究》所收，1992年度科學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
- ⑫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三章。

原載《近江歷史·考古論集》畑中誠治教授退官紀念論集 1996年3月。

張學鋒(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東洋史研究室博士後期課程)譯

## 從簡牘看漢代的 行政文書範本——“式”

邢義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一、居延、敦煌簡牘中的文書範本
- 二、秦、漢文書範本稱為“式”
- 三、餘論：漢代以後的式

1993年撰〈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一文<sup>①</sup>，頗多未盡之處，內心一直不安。這幾年來陸續注意材料，發現可以作些增補。

拙文提到邊塞吏卒原本或多務農，不知文字。戍邊之餘，或竟有機會識字讀書、學算和認識國家法令。學習識字的方法，有《蒼頡》、《急就》字書為教本，也可利用廢棄的木牘竹簡，以簡牘上的文書為範本，作抄寫練習。

現在必須補充的一點是秦漢兩代都有一定的行政文書範本。這些範本的功用是多方面的，這有點像現在各機關辦理不同的事情，都有預先擬好的表格，使用者祇要照表上的格式填寫即可。漢代自然沒有先印就的表格，可是不同的文書都有一定的格式，文書的名目和格式極為細密繁雜。在敦煌、居延遺簡中，我們發現不少以“甲、乙、丙、丁……”或“某”代替特定個人和以“若干”代替特定數字的簡牘。這些簡牘歸結起來看，和在睡虎地發現的秦代文書——秦律十八種、封診式中以“甲、乙、丙、丁……”、“某”、“若干”代替特定人或數字的情形相同。漢簡中還有以“東、西、南、北”代替特定方位的情形。我相信具有這種特徵的簡牘，最少有某些部分是文書的範本。

這些範本一方面用以保證行政作業中，相同事務在處理上的規格化和一致化，另一方面也使司其事者對繁雜的業務，能依固定的模式，方便處理，提高效率。此外，對要學習吏職的人而言，這些範本就是不可或缺的教本。

邊塞吏卒學習文字，不僅僅為了識字，而是有需要瞭解和處理過往的文書。因此，在敦煌、居延的烽燧線上，不僅出現字書《急就》、《蒼頡》，更出現了文書範本。這些範本既和日常行政有關，也和學吏者的教育有關。

## 一、居延、敦煌簡牘中的文書範本

夏鼐似乎是最早指出這種範本存在的學者。1948年，夏先生刊佈他和閻文儒在小方盤城北郭小丘上發現的敦煌簡。<sup>②</sup>這批簡中有如下幾枚：

1. □牌一所壽某所隧通□ (敦十七新獲第三簡)
2. 甘露元年某□ (敦十七新獲第十簡)
3. □某年某月□ (敦十七新獲第二十簡)
4. □某郡某縣□ (敦十七新獲第二十一簡)
5. □某所獄□

在以上第3、4兩簡釋文之後，夏先生指出：“以上二片似為一簡之斷片。二片皆字體工整；年月郡縣之上，皆用不定稱之‘某’字，疑為供初學者練習寫字及草撰文稿之範本。”（頁86或252）此語誠具睿識。夏先生根據的祇是極少的幾枚殘簡，如果我們配合更多的材料，可以看得更清楚，這些確是某些文稿的範本。以下先錄出敦煌、居延前後出土，帶有“某”，“甲、乙、丙、丁……”、“東、西、南、北”和“若干”不定詞的簡：

6. 五石具弩若干 (18.15, 勞圖版530)  
(按：勞圖版清晰)
7. 延某里公乘王甲年若干 (38.2, 勞圖版246, 本文附圖一)  
(按：“某”，《合校》作“□”，檢查圖版，此簡殘左半，但殘字為“某”，無可疑)
8. □鐵錐弩若干，其若干幣絕可繕 (49.26, 勞圖版422)  
(按：勞圖版清晰)
9. 張掖居延甲渠戍卒居延某里大夫王甲年若干 見  
(61.2, 勞圖版129, 本文附圖二)  
(按：“某里”，《合校》作“某”，檢讀原簡，從字形及上下文義看，疑應作“某里”為是。)
10. [一]石字某公

□就〔多〕若干〔者〕月日 見 (188·5, 勞圖版310, 本文附圖三)

(按: “某”, 《合校》作“其小”, 誤。 “一”、“多”、“者”三字難定, 姑從《合校》。)

11. 始元三年九月某日以佐受均輸長甲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給始元三年正月  
盡八月積八月奉 (509·19, 勞圖版376, 本文附圖四)

(按: “某日”, 《合校》作“四日”, 誤; “以佐受均輸長甲”, 《合校》作“以從受物給長中”, 係因圖版不清而誤。我以紅外線檢讀原簡, 極明白無誤, 文義亦遂可通。)

12. 府從戍卒某等若干人□休某等, (560·24, 勞圖版30, 本文附圖五)

(按: 勞圖版大部清晰, “某等”之“某”字部分發黑難識)

13. 若干人畫天田 卒人畫若干里若干步 (《敦煌漢簡》1584)

(按: 圖版字跡清晰)

14. 月得若干斛斗從□ (EPT 43: 318)

(按: 圖版不清, 無法校讀)

15. • 凡入錢若干 留言 (EPT 50: 21, 原註: “留言”二字為硃筆書)

(按: 圖版約畧可辨)

16. 戍卒魏郡貝丘某里王甲 賞賣□皂復袍絮緒一領直若干千居延某里王乙□  
居延某里王丙舍在某碁 • 它衣財□

(EPT 56: 113)

(按: 圖版大字部分不可辨, 雙行小字部分可辨)

17. □賞賣雒卑復袍絮壯一領直若干千繅得□

□東西南北入任者某縣某里王丙舍在某里□

(EPT 56: 208)

(按: 圖版模糊不可辨)

18. 賞賣官復袍若干領直若干某所隨長王乙所□

□ 它財□ (EPT 56: 230)

(按: 圖版祇有若干字可識)

19. 某里王□

□ 若門東西南北□

(按: 圖版除“北”字較模糊殘缺, 餘可辨) (EPT 56: 233)



20. 戌卒魏郡貝丘某里王甲□

(EPT 56: 377)

(按：圖版模糊不可辨)

21. 第八卒東郡白馬里王甲等某干人名姓

(EPT 57: 67)

(按：圖版字跡清晰)

22. □□ 秩上大夫某年某月日除

(EPT 59: 118)

(按：圖版字跡清晰)

在進行進一步討論以前，必須先對以上各簡的字跡清晰、工整與否與簡的完整與否作些檢討。夏先生在判定文書範本時，提到字跡工整這一標準，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我們還得注意，既然名其為範本，則應該有依據範本格式而存在的實際的文書才對。我們雖然無法期望在出土的有限簡牘中，找到所有對應的實際文書；如果能找到愈多，愈能肯定範本的存在。

首先檢討1930年代出土，有勞書圖版可以覆按的居延簡，也就是第6—12例。非常幸運，這七簡的字跡除第9例的部分，都可以說十分清晰。7、9、11三枚字跡屬工整的隸書，第8枚有一二字近草書，餘為隸書，6、10、12三枚可歸為章草。其中較不清，辨識較為困難的是第10例。此例上引《合校》所作的釋文，不易通讀，以上簡完整的祇有第11例，其餘皆殘斷。

敦煌簡除了夏先生發掘的五枚，唯一入例的是第13例一簡。此簡幸好十分清晰、完整，字跡也屬工整的隸書。

1973—4年出土的簡第14—22例共9枚，這9枚簡的圖版祇有第21、22兩例可以說是清晰的，字跡為工整的隸書或在草隸之間。第14、20例圖版幾乎完全不可辨，第17、18例亦極不清楚。第15例約畧可辨，字跡尚屬工整；第16例上半部難辨，下半雙行部分尚可辨識，為工整的隸書。第19例部分不清，可辨的部分為工整的隸書。

總體言之，有圖版可據，字跡較清晰可識的為第6、7、8、9、11、12、13、14、16（部分）、19（部分）、21、22例共12簡。這十二簡就字體言，多為工整的隸書，少數為較簡畧草率的章草。如果它們都是範本，我們就必須承認當時文書是接受這兩種書體，或者說接受隸書工整與較不工整的兩種形式的。以敦煌和居延出土的簡牘來看，的確是以這兩種書體的文書為最多。<sup>③</sup>

以上所謂的文書“範本”因祇是文書冊中的零簡，當然無法完整呈現某種文書的全部格式，不過它們已足以表現文書的部分格式或文例。如果我們能找

到一些零簡上有類似或相同的格式或文例，我想就足以證明以上這些簡的範本性質。

漢簡存在的時間從西漢中期經王莽到東漢初，所謂的“範本”似不可能一無變化。這是我們在舉例之前，必須先瞭解的。其次，以上“範本”所顯示的格式或文例，有些實例甚多，以下將祇列舉較為接近的若干為代表；有些不一定完全相同，但類似的也舉出來供參考。第三，如性質相近的文例，如簡6、8的文例都是先書裝備名稱，再書數量詞；簡16、17、18、20也可歸為一類。

### 1. 簡6、8“裝備名稱十數量詞”

這祇是許多不同類文書中格式的一小部分。這樣的文例太多，僅舉一例，以概其餘：

(1) 第十隧五石具弩一絕費一 (57.14, 勞圖版134)

### 2. 簡8“某項裝備若干損壞十可繕”

實例如下：

(1) 官六石第一弩今力四石卅斤傷兩淵可繕治 (36.11 勞圖版32)

(2) 夷胡隧七石具弩

傷二無一淵二燕一弭

可繕今力三石卅六斤

六兩元康三

乙卯隧

(353.1, 勞圖版14)

### 3. 簡9“郡、縣十某單位十某吏卒職稱十某縣某里十某爵某人十年齡十見”。

這一格式並不完整，從可考的實際文書中可知，這似是“除書”格式的一部分。在“見”字之後，還有“某年某月某日除”的記事。或者先記“某年某月某日除”，再記“見”字，有時在“見”字之後，另注明“史”或“不史”，實例如下：

(1) 年三十 見 始建國五年三月丙子除 (《敦煌漢簡》2332)

(按：此簡不完整，上端有明顯斷痕，“年三十”之前應有此人的單位爵里姓名等)

(2) 卯除 見

(65.8, 勞圖版541)

(按：此簡不完整，“見”字稍大)

(3) 水門隧長屋蘭富貴里尹野 本始二年七月癸酉除 見  
(14.25, 勞圖版69, 本文附圖六)

(按: 此簡下端殘, 勞圖版末端不明, 經紅外線檢查, 確有一“見”字)

(4) 初元四年二月辛丑除 見不史 (37.39, 勞圖版425)

(按: 此簡殘, 簡上端有空白部分)

(5) 見史 (241.3, 勞圖版105)

(按: 此簡殘, 字清晰)

(6) 居延甲渠止害隧長居延收降里公乘孫勳年卅 甘露四年十一月辛未除

(按: 此簡勞圖版末端發黑) (173.22, 勞圖版273, 本文附圖七)

(7) 除 史 (185.33, 勞圖版265)

(按: 勞圖版清晰, 此簡明顯為一殘簡之末端)

(8) □夫苑處年廿六 永始二年五月甲辰除 史 (EPT50.41)

(按: 此簡上殘, 圖版部分難辨)

(9) 居延甲渠第二隊長居延廣都里公乘陳安國年六十三建始四年八月辛亥  
除 不史

(按: 此簡完整, 圖版字跡大致可辨, “不史”二字書法與它字不同)

(EPT51:4)

(10) 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長昭武長壽里公乘張忠年卅三河平三年十月庚戌除  
史

(按: 此簡完整彎曲, 圖版字跡大致可辨, “史”字稍大, 書法似與它字不同)

(EPT51:11)

(11) □始建國元年十月辛亥除 史 (EPT52:263)

(按: 此簡圖版清晰, 簡上半殘失)

(12) ... 八月壬申除 史故名赦之 (EPT52:513)

(按: 此簡圖版字跡大致可辨, 簡上半殘失; “故名赦之”四字墨色、筆跡與前文不同)

(13) □午除 史 (EPT59:299)

(按: 此簡圖版清晰, 簡上半殘失)

綜合以上各例, 這種除書上的“見”字是表示向新單位報到, 由新單位主管在除書上注記某人已“報到”、“見在”。這個“見”字有時注記在除官日

期之後的空白處；有時也出現在這日期和年齡之間的空白處；甚至在“除”字與“史”或“不史”之間。依簡61.2顯示的範例，“見”字應書寫在年齡之後。實際上顯然並不完全嚴格依照範本。此外，這樣的除書上還注明“史”或“不史”，亦即當事人是否有以隸書書寫的能力。以上6、7、8、9、10、11、12、13例不見“見”字，我認為這個“見”字應該是向新單位報到後纔加上，原來的除書上並沒有。因此，我們今天看見的除書中有些有“見”字，有些沒有。這種情形也見於其它居延簡。例如《居延新簡》EPT52:94，釋文作者特別注明：“‘見’字及諸符號皆後書”；EPT52:92、EPT52:93兩簡的“見”字很明顯也是後來寫上的。

### 3. 簡11“年月日十以佐受均輸長某十帛若干直若干十以給某年某月盡某月十積若干月奉”

此簡完整，字跡也工整，可惜圖版不夠清晰，過去的釋文都沒能釋出重要的“均輸”二字。這是居延簡牘文書首次印證了武帝以後的均輸法。此法在昭帝始元時，顯然發揮了支援邊塞軍餉的作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丞，不見有均輸長。唯《漢書·黃霸傳》謂黃霸曾“察補河東均輸長”，是郡有均輸長。此簡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之闕，也可與《黃霸傳》互證。可惜在居延、敦煌簡中沒有更多有關均輸長的資料。

須要注意的是這到底是不是一種文書的範本？簡上除了人名代以“甲”，帛的數量和所值錢數以“若干”表示，其它的年月沒有用“某”，而稱“三年九月”或“正月盡八月”，日則稱“某日”。這似乎和我們所說範本不全相合。當然類似的情形也見於例15、16、19、20、21。為什麼同一“範本”中有些地方用不定代名詞，有些地方又用特定的名詞（如魏郡貝丘、東郡白馬，不作某郡某縣；秩上大夫，不作秩某）？

其實這些看似特定具體的人名、郡縣名、或年月，仍然祇是舉例的性質。以上所列簡牘中的王甲、王乙、王丙就是最好的例子。王甲等初看似乎是真實的人名，但和其它的簡文比對，就清楚知道它不過是一個假設的人名而已。例證中的王甲可以是居延某里的公乘，可以是某里的大夫，也可以是籍屬魏郡貝丘某里的戍卒。他也和王乙、王丙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文件裏，這和以甲、乙、丙、丁……代替人名的意思並無不同。

王甲作為一假設的人名，還可以在王充的《論衡》中找到證據。王充熟於吏

事，他在〈效力篇〉提到一個故事：“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④這裏的“王甲某子”就是一個不定稱代名詞。“始元三年九月”接着卻書‘某日’，這就表明這不是一個實際的日期，祇在舉例說明這類文件年、月、日書寫的形式。因此，這些看似具體的人名、年月，並無礙其為範本的性質。

唯與範本後半文例“帛若干直若干十以給某年某月盡某月十積若干月奉”結構相類似的可找到兩例：

1. 都內賦錢五千一百

入 給甲渠候史利上里高何商

地節二年正月盡九月積九月奉 (111.7, 勞圖版102)

2. 布一匹直四百 凡直八百

入

始元四 (308.7, 勞圖版391)

絳絮二斤八兩直四百 給始元四年三月四月奉

4. 簡13 “若干人畫天田 率人畫若干里若干步”

實例如下：

1. 卅二人畫天田卅二里 率人日畫三步 凡四編 (《敦煌漢簡》1674)

2. 六人畫沙中天田六里 率人畫三百步 (《敦煌漢簡》1714)

5. 簡15 “凡入錢若干”

實例如下：

1. ● 凡入錢萬九千 (249.9, 勞圖版537)

2. □□

■ 凡入錢□百□十一 □

觀□ (EPT 50:250)

6. 簡16、17、18、20 “某職或身份 + 某郡縣里某人 + 貰賣某物 + 直若干錢 + [於] 某所 舍在 [東南西北某方向] 任者某……”

實例如下：

1. 終古勝卒東郡臨邑高平里召勝字游翁 貰賣九稷曲布三匹 = 三百卅三凡直千餘得富里張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門東入任者同里徐廣君

(282.5, 勞圖版263)



2. 驚廣隧卒東郡臨邑呂里王廣 卷上字次君 賈賣八縷布一匹直二百九十縷  
得定安里 隨方子惠所舍在上中門第二里三門東入  
任者閭少季薛少卿 (287.13, 勞圖版336)
3. 戍卒魏郡貝丘何里楊通 賈賣八縷布八匹 = 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卅 賈鄭富安里二  
匹不實賈知券  
常利里淳于中君 (311.20, 勞圖版367)
4. 戍卒東郡聊成孔里孔定 賈賣劍一直八百縷得長社里郭釋君所舍里中東家南  
入任者同里社長完前上 (EPT 51:84)
5. 第八隧卒魏郡內黃右部里王廣 賈賣莞阜綳囊絮裝一兩直二百七十已得二  
百少七十遮廣辟衣功所 (EPT 51:125)
6. 戍卒東郡聊成昌國里臧何齊 賈賣七縷布三匹直千五十屋蘭定里石平所舍在郭  
東道南任者屋蘭力田親功臨木隧 (EPT 56:10)
7. 第五隧卒馬救賈賣□□袍縣絮裝直千二百五十第六隧長王常利所  
今比平予救錢六百 (EPT 56:17)

以上這些簡有些可能屬於“戍卒賈賣衣財物爰書名籍”(10.34A)、“卒賈賣名籍”(44.23, EPT 56:263)、“戍卒賈賣衣財物名籍”(EPT 59:47)。以上範本很可能即為這些名籍的範本。範本中的“東西南北”，在實例中很清楚是以“舍在里中二門東入”，“舍在上中門第二里三門東入”，“所舍里中東家南入”、“舍在郭東道南”等表明事件發生地點方位的形式出現。

## 7. 簡22“秩上大夫十某年某月日除”

實例見以上第2節所列。上大夫為王莽時期官秩名，二千石曰上大夫。<sup>⑤</sup>所謂秩上大夫，係以上大夫為例，凡除官之除書之除書須載明其官秩等級及除官年月日。

漢代文書品類極為繁多，其格式有亦有別。以上我們在簡牘中見到的範本都不完整，已無法判明它們是什麼文書的範本。即使如此，在居延、敦煌出土的文書中還是可以找到不少雖然殘缺，無論在文例或格式上相同或類似的實例。

## 二、秦、漢文書範本稱為“式”

範本是今天的用語。漢代稱這樣的文書範本為什麼呢？這是要進一步討論

的問題。我們認為很可能就是漢代“律、令、品、式、科、比”裏的“式”。前文已經指出簡牘所見這類範本最大的特徵在以“某”、“若干”、“甲乙丙……”、“東西南北”等不定詞表示人物、數量及方向或方位。我們不妨以這些特徵作為標準，檢證相關的證據，找出它們在漢代的名稱。一個重要、但祇能當作旁證看的就是雲夢睡虎地出土秦律竹簡中的〈封診式〉。

〈封診式〉是原名（見簡98背）。所謂“封診式”，無疑是一種“式”；從內容看是秦代有關治獄、有鞫、封守、覆、盜自告、盜馬、爭牛、群盜、奪首、告臣、黥妾、遷子、告子、癘、賊死、經死、穴盜、出子、毒言、奸、亡自出等名目的文書程式。秦簡整理小組所編《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封診式的說明中提到：

《封診式》有九十八支簡，和《日書》甲種一同放在墓主頭部右側。從出土位置看，兩書原來都是成卷的……《封診式》全書的標題在最後一支簡反面。簡文共分二十五節，每節第一支簡首寫有小標題。《治獄》和《訊獄》兩節，根據出土位置圖，應當居於卷首……其餘各條都是對案件進行調查、檢驗、審訊等程序的文書程式，其中包括了各類案例，以供有關官吏學習，並在處理案件時參照執行。⑥

這段文字已明白說明了“式”的性質和作用。它在性質上是文書程式，作用則在供官吏學習，並在處理案件時供參照之用。我們再來看看〈封診式〉簡文的特色。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在各條中大量使用不定稱代名詞“某”、“甲、乙、丙、丁……”。幾乎條條如此，沒有例外。我們祇舉背面有“封診式”三字的一簡為例：

亡自出 鄉某爰書：男子甲自詣，辭曰：士五（伍），居某里，以過二月不識日去亡，毋（無）它坐，今來自出。問之名事定，以二月丙子將陽亡，三月中逋築宮廿日，四年三月丁未籍一亡五月十日，毋（無）它坐，莫覆問。以甲獻典之相診，今令乙將之詣論，敢言之。⑦

這一份有關“亡自出”爰書的式，並不針對特定的人，以“男子甲”代表，某里則曰“某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程式中也出現了特定的日期如“二月丙子”、“四年三月丁未”和特定的時間長度“五月十日”等。這使我們了解所謂的範本也可以出現特定日期，其作用很明顯祇是舉例的性質。這和前述漢簡範本中见到的情形可以說一模一樣。

由於秦律〈封診式〉的存在和表露的特徵和漢簡範本相同，漢簡中的文書範本很可能也應該稱作“式”。當然，這須要證明漢代也有所謂的“式”。

這樣的證據在文獻和簡牘中都可以找到。居延有一殘簡云：“□□如品式”（214·144，勞圖版383），圖版及原簡“品式”二字極為清晰。“品”、“式”的形式與內容都不相同。漢簡中已明確有不少各種名目的“品”，如：“罪人得入錢贖品”（EPT 56:35）、“右止城旦舂以下反復作品”（EPT 56:281）、“卒戰鬥品”（EPT 59:142）、“就品”（《敦煌漢簡》619·1262）、“郡都尉候都亭隧守禦器品”（《敦煌漢簡》1390）。漢簡中既明確提到單獨的品，則品式的式應是另一種東西。《漢書·孔光傳》：“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同書〈宣帝紀〉地節二年：“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元康二年詔：“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後漢書·秦彭傳》謂建初元年秦彭遷山陽太守，“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躍，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這裏所謂的“條式”意義較為廣泛，意指秦彭一套分別田地肥瘠，各立文簿登記管理的辦法。不過，可以確定“式”是漢制及法令的一部分。其所以稱為條式，是因為其分條例舉的形式，<sup>⑧</sup>其中應該包含他所建立的文簿的格式。

由以上可證，漢代有“式”應無問題。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程樹德《九朝律考》〈漢律考〉列律、令、科、比，又附科品、故事，獨不及式，是受資料之限。漢制多承秦，漢式和秦式在內容上不必相同；但在形式上，則如秦律〈封診式〉和漢簡中出現“某、若干、甲乙”等不定詞的文書，最少在特徵上有相同之處。

可是，還有兩點須要說明：第一，以上使用“某、若干、甲乙”等不定詞的文書並不全然都是所謂的“式”。其它文書也有利用這些不定詞的情形。睡虎地出土的律簡，除了〈封診式〉，在題為〈法律答問〉的部分也出現以甲、乙、丙等為人稱代名詞的情形。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初墓中出土的《秦獻書》中也有“新鄴甲、丞乙、獄史丙”。<sup>⑨</sup>在歸為秦律十八種的〈效律〉中有使用“若干”、“某”字的情形，例如：‘入禾，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籍之曰：“其庸禾若干石，倉嗇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睡簡》頁58）：……終

歲而為出凡曰：“某厓出禾若干石，其餘禾若干石”（同上，頁58）。以上〈效律〉的兩例，很清楚仍然是一種文書的“式”，和〈法律答問〉或稱之為〈律說〉的在內容上明顯有不同，並不難區分。

這樣的文書式，如果追溯起來，似已見於睡虎地秦墓所出〈為吏之道〉簡末所附屬於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的〈魏戶律〉。〈魏戶律〉末有一段說：‘乃〔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婿某叟之乃〔仍〕孫”’（《睡簡》，頁174），江陵張家山出土漢初《奏讞書》有一段徵引春秋魯國之法，有“今佐丁盜粟一斗”云云，⑩“丁”有可能是人稱代名詞。可見這樣的文書形式起源甚早。

其次，“式”字的原義本不單指文書程式。凡是當作標準、規範的都可稱作式。《說文》：“式，法也。”法式、儀式、常式、古式、舊式、通式等詞常見於古代文獻。文書的範本稱作式，但秦漢稱作“式”的並不限於文書或簿籍的範本。例如在秦律十八種的〈金布律〉中有一條說：“布袤八尺，幅（幅）廣二尺五寸。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睡簡》，頁36）。可見秦對布的品質和長寬有一定的規定，稱之為式；不如式即不准使用。敦煌簡中則提到鐵器有“鐵式”，木器有“木式”（《敦煌漢簡》1309）。此外相馬則有“馬式”，後漢馬援以駱越銅鼓鑄馬式即是有名的故事。（《後漢書·馬援傳》）

### 三、餘論：漢代以後的式

在漢代以後的法制發展中，式也僅僅指文書範本或格式。《晉書·食貨志》謂：“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女及次男為戶者，半輸……”云云，所謂的戶調式已然不是文書程式，而是有具體內容的法制規定。《隋書·經籍志》謂後周太祖命蘇綽撰《大統式》，這些式也不是文書程式而已。隋、唐以降的律、令、格、式的式，用“以軌物程事”（《舊唐書·職官志》刑部尚書條）。另從《唐律疏義》卷八〈疏〉中所引的〈主客式〉、〈職方式〉，敦煌所出〈水部式〉殘卷內容看，⑪式也是一些有具體內容的法規。

然而作為文書格式意義的式仍然存在。舉例來說，《宋書》卷十五〈禮志〉就錄有十餘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太子監國時所訂的儀注。這些儀注都是規定不同官署之間往來公文的文書式，稱作“儀”，也稱作“式”。



例如其中兩條：

1.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眾官署。

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頁381-2）

2.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頁383）

這些文書式用不定詞的特徵和秦漢時代一脈相承。到唐代似乎仍然如此。仿唐制的日本“過所式”，其形式至今仍然可考：

過所式

其事云云度其關往其國

其官位姓（以下有雙行義解，畧）三位以上卿資人位姓名（雙行義解，畧）

年若干庶人稱本屬從人其郡其里人姓名

年 奴名年 婢名年 其物若干其毛牝牡馬牛若干匹頭

年 月 日 主典 位 姓名

次官 位 姓名

此件存於日本的公式令中，可見這是諸多公式之一。<sup>②</sup>其形式特色很顯然仍是沿續過去的式。

當作文書範本用的式，在魏晉以後不一定再稱作式，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下，變成了書儀，內容上也不限於公文，而是社會各階層婚喪書信往來的範文，在敦煌殘卷中還留下不少它們的蹤影。<sup>③</sup>

## 注 釋

① 邢義田，〈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三〉，《大陸雜誌》87:3（1993），頁1—3；收入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頁273—278。



- ② 夏竦，〈新獲之敦煌漢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1948），頁235—265；同文後收入其《考古學論文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專刊甲種第4號，1961），頁73—93。
- ③ 鄭惠美，《漢簡文字的書法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73年），頁19〈近世發現漢代烽燧遺址漢簡表〉，漢簡書體欄；關於隸、草書的關係參張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年），頁105—109。
- ④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580。《宋書》卷十五〈禮志〉（中華書局標點本）摘錄的儀注文書式中也可見某甲、王甲、丙丁、李乙為人稱代名詞。例如：“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部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成允值。請臺告報。年月日 尚書令某甲上。”（頁382）
- ⑤ 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頁162—164。
-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47。
- ⑦ 同上，頁163。
- ⑧ 關於漢代的條，請參拙著，〈讀居延漢簡札記〉，《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蘭台出版社，1997），頁58—62。
- ⑨ 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一）〉，《文物》1993：8，頁25。李學勤在〈《奏讞書》解說（上）〉中說奏讞書“和雲夢睡虎地簡的《封診式》近似，其作用應為供官吏工作參考，或學吏者閱讀的文書程式。不過所輯案例均係實有，祇對少數人隱名，用甲乙等代替…”，見《文物》1993：8，頁26。
- ⑩ 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二）〉，《文物》1995：3：3，頁35。
- ⑪ 《唐律疏義》卷八，（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影印標點本），

頁178-179; Tatsuro Yamamoto, Om Ikeda, Makoto Okano eds., *Tun-Huang and Tu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al history*, vol. I, Toyo Bunko, 1980, pp. 40 (89)-44 (85)

- ⑫ 轉見內藤虎次郎，〈三井寺藏唐過所考〉收入萬斯年編譯，《唐代文獻叢考》，（香港：宏智書店影印自1947年開明書店本），頁45-46。
- ⑬ 參周一良、趙和平著，《隋唐五代書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以上相關資料由清連兄檢示，謹謝。

附圖一



38.2

附圖二



61.2

附圖三



188.5

附圖四



509.19

附圖七



173.22

附圖六



14.25

附圖五



560.24

## 簡牘文書稿本四則

李均明（中國文物研究所）

稿本乃指文稿與文本。文稿包括草稿、定稿、手稿；文本包括正本、抄本等。同一文件在撰寫制作的不同階段及應用的需要，可以形成各種稿本。同一文件的不同稿本，在形式、內容和作用上不盡相同。

### 一、草稿

草稿是簡牘文書的原始稿件，作為討論、修改的基礎，其稱謂古已有之，如《漢書·董仲舒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竊其書而奏焉。”但更多地是簡稱為“草”，如《新簡》EPT 31.1：“令史譚奏草”、①《合校》286.18：“掾褒奏草”、②《敦》206A：“與桓列書草”、③《敦》208A：“敦德尹書草”、《敦》715A：“不及寫草記”。古書亦常見，如《漢書·淮南王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師古注：“草謂文之藁草。”《漢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三國志·魏書·崔琰傳》：“琰以訓取表草視之。”《晉書·裴秀傳》：“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

草稿常常不是一次完成的，有時需經兩次或多次修改，今稱之為“初稿”、“二稿”、“三稿”。修定草稿之實踐，見於漢簡者，如《新簡》EPT 17.5：“告主官掾更定此草，急言府。”

前人王國維曾注意到簡牘草稿之存在，《流沙墜簡·簿書十三》考證云：“司徒、司空府此簡不云叩頭死罪，而但云敢言之，或係都尉與敦煌太守之公牘而出于都尉治所者，蓋具書之草稿也。”④



今見之簡牘文書，草稿（包括初稿及修改稿）所佔比例甚多，有明顯的特徵，主要表現如下：

1. 字體較草率，增補及塗抹較多。

簡牘文書字體之草率與否，不僅取決於抄寫者的書寫習慣，也與它是否為草稿有關。因草稿不是正式發出的文本，還有待修改，祇要起草人及參與修改的人能看懂即可，故其字體之工整程度常常稍差於正式文本，以敦煌馬圈灣遺址出土之《敦》40～175，又205、206、970、971、973～976等凡133枚木簡為例，這是一份上報朝廷的文書草稿，逐級上報，其中《敦》89B“正月戊辰移書敦德 草”，“草”即草稿，已自證其為草稿。文書的內容是向朝廷呈報天鳳三年至四年間新莽西域遠征軍失敗的情形，按理是非常重要的，但字體卻很草率，文字之大小差異很大，多有補字，也有塗抹，如：

《敦》40：“第一輩兵俱去以私泉獨為糴穀”，“俱去以”三字字形很小，僅與其前之一“輩”字相等。又“泉”為後補字，居“私”字右下側，字形小。

《敦》43：“恐盡死 欲還”，“死”與“欲”之間空三字位置。

《敦》48：“傳馬皆大齒”之“傳”字居“馬”字右上側，字形小，為後補字。

《敦》52：“誠恐後其時失戰利不敢入塞從報……”中之“不敢入塞從報”六字上有一黑墨豎劃塗抹。

《敦》63、67等簡皆不頂格書寫。

《敦》72：“貪狠 桀黠”句，“貪狠”與“桀黠”間空二字位置。

《敦》83：“臣謹寫欽檄記”之“記”字居“檄”字右下側，字形小，為後補字。

《敦》85：“故車師後亡侯虜支”之“虜”字居“侯”字右下側，亦為後補小字。

此外，《敦》89、104等亦有增字。草稿書寫較隨意的情形，亦見於《新簡》EPT 68許多“劾狀”冊中。當然，草稿亦不乏字體工整者，這是抄寫人的習慣決定的。但一般而言，發出的正本總比草稿工整。

2. 文件制發者名以“△(某)”或“君”字替代，如：

-----及不過界中如牒。謹已劾，△領職教勅吏毋狀，叩頭死罪。《新簡》

EPT 22·131

臣△前捕斬焉耆虜，地熱多阻險，舍宿營止宜於《敦》50

十月晦關書大泉都，△再拜言。《敦》60

皇帝陛下，臣△叩頭叩頭-----《敦》969

臣△幸得還，且從第一輩兵出 卒功從，即日未《敦》972

建武三年十月乙亥，甲渠候君移過所：遺城北隧長-----《新簡》

EPT 26·1

甲渠鄯守候君免冠叩頭死罪，奉職數毋狀，罪當萬死，叩頭死罪死罪-----《新簡》EPT 16·36、37

簡牘文書的起草人常常是文件制發者屬下的佐史之流。涉及文件制發者名以“△(某)”或“君”字替代，顯然是起草人所為，避免直書上級名，以示尊敬。“君”是下級對上級，或對他人的尊稱，通常用於他稱而不是自稱。凡有上述現象之文稿無疑皆屬草稿。

3. 空文件制發者名及發文日干支，如：

建武四年正月乙未，甲渠候 謂第廿三守 《新簡》EPT 27·7

二月甲申，甲渠鄯守候 敢言之。護□ 《新簡》EPT 40·31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鄯守候 敢言之-----《新簡》

EPT 22·51A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 ，甲渠鄯候 敢言之-----《新簡》

EPT 22·163

建世二年二月甲午朔 ，甲渠鄯守候□ 《新簡》EPT 43·67

草稿撰寫的時間不一定與發文日期一致，其間還有討論、修改、審批的過程，故先留空，而待發文時纔正式填入。空制發者名，不僅有避直書上級名的意義，也有待上級審閱定稿後親手簽名（見下文），許同華在《公牘學史》一書中云：“又文書除授，而具草缺其官號，以待長官之手書，亦曰署。”即此義。

## 二、定稿

草稿經修改審定，由負責人簽發的完成稿，即定稿。《論語·憲問》曾有

聲有色地描繪春秋時期鄭國文書的起草、修定過程，文云：“為命，裨湛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歷草創、討論、修飾、潤色的過程，而後三者為定稿過程。定稿的過程簡牘及史籍所載皆稱“定”，如《新簡》EPT 17·5 見“告主官掾更定此草”，又《漢書·朱雲傳》：“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簡牘常見之經負責人簽發，但未從本機構發出的文稿，當即正式文本所依據的底稿，舉例如（皆節錄）：

永始四年五月甲辰，甲渠鄯候護敢言之……《新簡》EPT 50·5

三月癸未，甲渠守候博移居延。寫移如律令……《新簡》EPT 48·7

漢元始廿六年十一月庚申朔甲戌，甲渠鄯候獲敢言之……《新簡》EPF 22·460 A

建世二年正月甲戌，甲渠守候誠……《新簡》EPF 22·335

建武四年十一月戊寅朔乙巳，甲渠鄯守候博叩頭死罪……《新簡》EPF 22·126 A

以上簡中，文件制發者名“護”、“博”、“獲”、“誠”之筆跡與同簡其他文字不同，皆為第二次、不同人的書寫手筆而致，無疑是制發者的簽發性署名，經簽發後的草稿，方可抄成正本發出，閔庚堯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公文簡史》一書中談到“簽名制始自商代。甲骨文中的前辭部分，除記錄占卜日期之外，還要寫上貞人的名字。由史官簽名制發展成為行政長官簽名制。簽名制不僅意味着一種權限，而且意味着對文書的實施負有一定的責任。”<sup>⑤</sup>說是，它表明：自公文產生的早期階段即有簽名制，而簡牘時代的簽名已發展至史官起草、行政長官簽署發文的階段。

### 三、手稿

手稿指文件制發者親筆寫的文稿，常常直接做為正本發出。《新簡》EPT 49·45 B 所見“手書大將軍檄”，乃指大將軍親筆寫的檄文。《新簡》EPT 65·458：“尉手記曉勸農曹掾得”之“尉手記”，乃指都尉的親筆信。古書之記載，如《漢書·薛宣傳》：“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奸臧。”《三國志·魏書·張邈傳》注引《英雄記》曰：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由於手稿沒有起草人與簽發人的區別，因此它可以是草稿，也可能是作為正本直接發出，二者在出土實物中不易一一分清。

#### 四、抄本

抄本是相對於正本而言。正本通常是按照定稿複製的，供向外發文使用。對某遺址而言，該遺址原所在機構的收文，絕大多數是正本。正本的特點是體式與內容完備，書寫字體也比較工整（非指書法藝術之秀美與否）。抄本是根據正本抄錄的，有的是全錄，而有的是摘錄，形式多樣。

##### 副

副，副本。《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漢書·魏相傳》：“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領尚書者發副封即可知正本內容，知二者當完全一致。此為發出文件之一式兩份或一式多份形式，以主送文為正本，以抄送文為副本。簡牘所見“副”如以下二例：

元康元年畫二年告劾副名籍 《合校》255·21A·B

候尉上書副 《新簡》EPT 59·578

以上二例為標題及標題後，指示卷宗的內容。

##### 別書。

別，另外、分別。依照正本另再抄錄的文書稱別書。《秦簡·語書》：“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以令、丞聞，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整理小組注云：“這一句是說本文書另錄一份，在江陵公布。”又漢簡所見，如：

——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以道次傳，別書相報，不報者—— / 掾雲、尉史褒 《合校》61·9

臚野王、丞忠下郡右扶風、漢中、南陽、北地大守，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以道次傳，別書相報。不報，書到言。



掾勸、卒史欽、書佐□ 《合校》203·22

七月癸亥，宗正丹、郡司空、大司馬丞書從事下當用者，以道次傳，別書相報，不報者重追之，書到言。 《新簡》EPT 50·48

五月戊辰，丞相光下少府、大鴻臚、京兆尹、定□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京兆尹以〔道〕次傳，別書相報。不報者重追之，書到言。 《新簡》EPT 48·56

以上四例中，“別書相報”前皆有“以道次傳”句，二者有直接因果關係。“道次”指不同的郵路及路段次第，一份文件通過一條郵路不能到達所有的收文單位，故需抄錄多份，然後分別送至各個郵路傳遞，故云“以道次傳，別書相報”。

### 寫移書

寫，抄寫、眷錄，《漢書·師丹傳》：“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抱朴子·遐覽》：“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新簡》EPT 52·219：“令史音再拜告令史△寫罷卒籍”，《新簡》EPT 40·166：“——謹寫白。願今所寫：仿照正本謄寫文書稱寫書。而寫移書是謄寫後使之運行的文件，即傳抄本，屢見於漢簡，如：

謂甲渠候官：寫移書到，會五月旦，毋失期，如律令。

／掾雲、守屬廷、書佐定世 《合校》42·20A

五月丙寅，居延都尉德、庫守丞常樂兼行丞事謂甲渠塞候：寫移書到，如大守府書律令。 ／掾定、守卒史奉親 《新簡》EPT 51·190A

以上二例為寫移書行下文，被謄抄的文書沒有同時出土，而以下一例則是行下文與寫移書同出者，可窺見其完整面貌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隧長黨敢言之。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膈丈滿，不耐食 《新簡》EPF 22·80

飲，未能視事，敢言之 《新簡》EPF 22·81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隧長黨病書如牒，敢言之。今言府請令就醫 《新簡》EPF 22·82

以上三簡為一冊書，同為一人筆跡所為，其中前二簡為隧長黨病書原文的抄本，故第三簡云“謹寫移隧長黨病書”，簡牘常見之“寫移書”即



如此之類。簡冊所見“寫移書”通常都以附件的形式存在。除上引簡例外，又見《新簡》EPF 22·70～79等。

### 錄

錄，記錄、抄錄。漢簡所見通行證“傳”大多為抄錄本，用於備查。《合校》36·3：“□道鳴沙里陵廣地為家私市張掖、酒泉……門亭鄯河津關毋許止，錄復傳，敢言之。——如律令。／掾不害、令史應。四月甲戌入。”“錄復傳”是指將當事人的通行證抄錄下來，然後放行。錄下通行證，為的是當事人返回時可以與之核對。漢簡所見通行證抄錄本，如：

永始五年閏月己巳朔丙子，北鄉畜夫忠敢言之。義成里崔自當自言為家私市居延。謹案：自當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謁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敢言之。

閏月丙子，解得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書到，如律令。  
掾晏、令史建。《合校》15·19

元鳳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庫令安國以近次兼行太守事、丞步遷謂過所縣河津請遣□官持□□□錢去□□取丞從事金城、張掖、酒泉、敦煌郡，乘家所占畜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掾勝胡、卒史廣。《合校》303·12A

以上二例皆為通行證抄錄本。由於通行證往往是一證過數關，不可能每過一關都留正本，所以必須逐關抄錄，以備返回時核查。晉令亦見過關留存通行證抄錄本的制度，如《太平御覽》598引晉令：“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過所，寫一通付關吏。”漢簡所見是把關門者抄錄過往人的通行證，而晉令所云則由過往人自備抄錄本呈送關吏。

公文副本的創立甚早，閔庚堯先生據《周禮·春官·內史》的記載，得其結論云：“文書副本制度始自周代。西周時期，凡重要文書大多有副本多份，分存各處。王命文書頒發之後，正本交受命者，副本交由內史保存。”此僅為見於史籍者，實際應用的年代當更早。

### 注 釋

-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中華書局1994年版。本文簡稱《新簡》。
-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簡稱《合校》。
-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版。本文簡稱《敦》。
- ④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版。
- ⑤ 閔庚堯：《中國古代公文簡史》，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

# 漢代文書的收發與啓封

汪桂海（北京圖書館）

文書的發送、收受、啓封是文書工作的重要環節之一。關於漢代這方面的具體情況，以前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祇知道尚書諸官是負責詔令文書的發送和章奏文書的收受、啓封之官，至於當時朝廷之外的百官官府對官文書的收發、啓封歸何種官吏掌管、如何收發啓封等問題，則幾乎是一無所知。而今，我們借助於大量出土的漢簡官文書，可以補上這一缺憾了。

漢代百官官府有專門負責文書收發啓封的小吏，小吏在收到來文或向外發送文書時，都要把所收發文書的有關情況記錄下來，一旦把這些登記收發文的簡札彙集起來，即是一份收文簿或發文簿。居延漢簡中便有不少此類木簡，通過這些木簡，我們可對漢代官府的收發文制度有一個基本的瞭解。先看有關發文登記簡文：

- (1) 卒胡朝等廿一人自言不得鹽言府●一事集封 八月庚申尉史常封  
136.44 ①
- (2) 卅井移驩喜暨卒鄭柳等責木中墜長董忠等錢謂候長建國等●一事一封 三月辛丑令史護封 214.34
- (3) ●一事一封 正月丙辰功曹□ 283.16
- (4) ●候長王彊、王霸坐毋辨護不勝任免移名府●一事集封●八月丙申掾彊封 317.21
- (5) 大守府書：塞吏、武官吏皆為短衣去足一尺，告尉謂第四守候長忠等如府書，方察不變更者●一事二封 七月庚辰掾曾、佐嚴封  
E. P. T 51: 79 ②
- (6) ●俱起隧長程偃等皆不宜其官，換如牒，告尉謂誠北候長輔●一事二封 八月丁亥士吏猛奏封 E. P. T 52: 18

以上的發文記錄簡全部出土於A8破城子，即甲渠候官治所。候官是縣道一級的官署，所以它們能夠反映漢代官府的一般發文制度。這些簡文所揭示出的發文制度可歸結為三點：

首先，官府對每次發送的官文書都要作記錄，每次記錄用一枚簡札。從圖版看，這些簡札似乎都未在事先編聯成冊，在簡札上登記時，這些簡札尚是單獨零散的，而不是某簡冊中的一支，因為許多簡的上半段應是編繩所在之處皆無空格。這說明當時作發文記錄，是隨時取簡札書寫，並無事先編制好的發文登記簿。

其次，發文登記的內容，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所發送文書的基本內容及發文對象。例如簡(1)裏的“卒胡朝等廿一人自言不得鹽言府”，即是說甲渠候官所移送的文書是士卒胡朝等廿一人關於未得到廩給他們的那份鹽的自言書，移送對象是都尉府；又如簡(6)所記錄的文書是甲渠候官發給障塞尉的，令其通知誠北候長輔關於撤換俱起隧長程偃等人之事。第二部分是所發送文書的封緘方式。在上舉簡文中，這一部分多記作“一事一封”、“一事二封”、“一事集封”。“事”，在這裡疑當指文書，一事即一份文書。一封、二封則指該文書封檢上所加封泥印信之數。集封的含意不很清楚，從它與一封、二封並稱來看，似也當指封檢上的封泥印信之數，大概是封泥印信之數超過二處者。在其他發文登記簡文裏還有作“二事一封”、“二事二封”、“二事集封”的，當屬於兩份文書合在一起封印。第三部分則記錄文書是何月何日何職務何人封印發送，如上舉簡(1)“八月庚申尉史常封”，簡(2)“三月辛丑令史護封”等等。一般情況下，官文書在印封之後即予發送，不會超過當天，所以，封印時間亦即發送時間<sup>③</sup>；而且封印人亦當即發送人，由他交付郵驛人員遞送。

再次，封印發送文書的小吏有掾，而更經常負責此事的是令史、尉史，因此，在發文登記簡中，這兩類小吏出現的次數最多，如下面的統計所示：

令史：35·11， 40·21， 45·24， 123·25， 123·28，  
136·39， 142·34， 158·6， 168·9， 176·21，  
214·34， 224·16， 258·3， 317·29， 317·30，  
E.P.T51:72； E.P.T51:304， E.P.T56:363。

尉史：58·11， 126·38， 136·44， 157·17， 158·16，  
258·15， 259·1， 311·6， E.P.T50:9， E.P.T51:25，

E.P.T51:340, E.P.T51:505, E.P.T52:158, E.P.T52:593。

掾: 264·19, 317·21, E.P.T50:192, E.P.T51:65,

E.P.T51:79, E.P.T52:60。

功曹: 283·16。

士吏: E.P.T52:18。

其中名弘的一個令史就出現了六次。以上諸簡均出自甲渠候官。研究表明，候的屬吏有掾、令史、尉史，因而可以推定，掾、令史、尉史是漢代縣道候官一級官府封印發送文書的小吏。

再看有關收文記錄的簡文：

(7) 王充印

甲渠候官

閏月甲寅第七卒會以來 30·17

(8) 印曰陳德昌印

甲渠候官

八月乙巳第八卒夏賀以來 38·7

(9) 張掖居城司馬

甲渠郵候以郵行

九月戊戌歷卒同以來·二事 E.P.T43:29

(10) 印破

甲渠官

正月甲辰門卒同以來 E.P.T6:36

此上四支簡祇是同類簡中的代表。從圖版不難看出，這些簡實際上皆為文書的封檢。漢代官文書的封檢通常有正面、背面兩枚，其上皆題署收文者名稱。所不同的是，正面的封檢較厚，上刻封泥槽，背面的封檢則畧薄，無封泥槽。上舉四簡及其它同類簡，絕大多數是無封泥槽的封檢。簡中間的大字“甲渠候官”、“甲渠郵候以郵行”、“甲渠官”等，皆發文者所題署；兩側的小字，筆跡與中間大字不同，當是收文單位的小吏所書。由簡文知道，負責收文的小吏在收到來文後，要在文書背面封檢的右側，將該文書的封泥印文照寫下來，記作“印曰某某”、“章曰某某”，或直接寫“某印”，如果封泥破碎造成印文不清，則記作“印破”、“封破”。在背面封檢的左側，記錄該文書收到的時間以及是由何



處何人送來的，有時還要附注該件文書內所封緘的文書份數是一份（“一事”）還是兩份（“二事”）。例如簡（8）“八月乙巳第八卒夏賀以來”，是說該文書乃八月乙巳這天由第八隧卒夏賀遞送來的；簡（9）“九月戊戌隧卒同以來·二事”，則表示該文書是九月戊戌日由隧卒同送來的，文書件內封緘了兩份不同文書。

負責收文的小吏是哪些呢？這從簡文裏還不能直接看出來。照理推測，負責辦理收文的官吏與負責發文的官吏應該相同，主掌收文的小吏很可能也就是上面提到過的掾、令史、尉史等。這一看法也有一定的根據。一般地講，文書在收到並作了收文登記後，就要啓封，然後交給專門辦閱文書的文吏或直接呈送本官署主管長吏（如候官的長吏是候）等去審閱批辦。而文書啓封也要有記錄，下面的居延簡即為這種登記之制的證明：

(11) 居延尉丞，其一封居延倉長，一封王憲印，十二月丁酉令史弘發  
136·43

(12) 書三封，其一封呂憲印，一封王建國，一封李勝，十月癸巳令史弘發 180·39 + 190·33

(13) 書二封檄三，其一封居延卅井候，一封王憲，十月丁巳尉史蒲發 214·51

(14) 書三封檄一，其一封居延都尉章，一封廣地候印，一封孫根印，十二月丁丑掾博奏發 E.P.T 51: 81

(15) □即日士吏襄發 E.P.T 59: 49 B

(16) 刑忠印

二月辛酉門卒賞以來。即日□ 132·32 B

(17) 從吏霸發 □□甲□ 146·68

(18) 董雲

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宋宗以來。令史博發君前 284·4 B

(19) 水肩塞尉印

十月壬戌卒周平以來。即日嗇夫□發尉前 506·9 B

以上諸簡，較完整者皆有“某某發”字樣。案：發，《廣雅·釋詁三》云“開也”。發書即拆開文書印封，雲夢秦簡《法律答問》有“有投書，勿發”的規定，即禁止拆看匿名書信。因此，可以認為這些簡皆屬於文書拆封的記錄。從

這些文書拆封記錄簡中，我們發現漢代官文書拆封制度大致可歸結為如下三點：

第一，官文書拆封均須登記。拆封登記的主要內容，首先是所開啓文書的件數，如簡(12)云“書三封”，簡(13)云“書二封檄三”等皆是；其次為各件文書上的封泥印文，如簡(11)云“其一封居延倉長，一封王憲印”，即是說所拆封的兩件文書中，一封的封泥印文為“居延倉長”，一封為“王憲印”；再次則為拆封時間以及何人拆封，如簡(11)“十二月丁酉令史弘發”，表示居延倉長和王憲發來的兩份文書是在十二月丁酉日由令史弘拆開印封的。

第二，負責文書拆封的小吏有掾、士吏，也有嗇夫、從吏，還有令史、尉史。而根據對所有文書啓封記錄簡的統計來看，仍以令史、尉史最為常見，如下所表示：

掾：70·14，E.P.T 51:81，E.P.T 52:73。

令史：136·43，180·39 + 190·33，214·24，284·4B  
95·2AB，E.P.T 25:25B

從吏：146·68

士吏：E.P.T 59:49B

嗇夫：506·9B

尉史：158·8，214·51，E.P.T 2:9B，E.P.T 4:48B，  
E.P.T 52:416B，E.P.T 59:158

以上所統計的諸簡中，令史弘的名字出現兩次，具體已見前揭簡(11)、簡(12)，這兩支簡與前文提到的有令史弘名字的發文登記簡均出自甲渠候官。雖然相同名字的人並不罕見，但面對令史弘的職任及所供職官府完全相同的事實，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不同性質的文書登記簡中的令史弘很可能是一個人，日本的森鹿三在一篇專門討論令史弘文書的文章中亦持此觀點<sup>④</sup>。此外，簡(13)啓封記錄中的尉史蒲曾在發文登記簡158·16出現過，也應該是同一人。這說明甲渠候的屬吏令史弘、尉史蒲不僅負責封印發送文書，同時還負責收受來文並予拆封。

收發文書與為文書啓封者屬同一類官吏，這從上舉諸簡中可取得進一步的證據。居延簡132·32背面有收文注記“刑忠印。二月辛酉門卒賞以來”，又有啓封記錄“即日□”這兩部分文字的字體筆跡完全相同，出自一人之手；簡284·4背面有收文記錄“董雲。三月丙戌有水庫嗇夫宋宗以來”，在此

之下則是啓封記錄“令史博發君前”，兩部分文字的字體筆跡也完全相同，當出自一人之手；再簡506·9背面也有收文記錄“水肩（案應作“肩水”，收文小吏誤將印文讀倒。）塞尉印。十月壬戌卒周平以來。”和啓封記錄“即日嗇夫□發尉前”，這兩部分文字從字體筆跡上判斷，同樣應出自一人之手。一句話，這些木簡文書再次表明文書的收受和啓封工作是一人經手辦理的。

總之，漢代官府文書的收發啓封工作是由專門的官吏統一負責的。

順便提一下，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有“署某官某發”之語，如奏讞書一“署獄史曹發”，奏讞書二“署如詹發”，奏讞書五“署獄如詹發”<sup>⑤</sup>，等等，有人認為此乃奏讞之辭中的“署文、發文獄史之名”，將“發”字理解為發文，即發送文書，這是不正確的。此“發”實應釋為開啓、拆封。“署獄史曹發”，即是說此奏讞書在奏呈到廷尉府之後，由獄史曹拆封。這些“署某官某發”一類的文字，當是負責拆封者在拆開文書印封之後簽署於該文書末尾的。奏讞書啓封後，先交由廷尉府僚屬討論，擬定判決意見，再交廷尉定奪，所以奏讞書簡文中緊接“署某官某發”之後便是“史當”云云，“廷報”云云，這些字眼的先後次序正反映了此類獄案文書的處理程序。

第三，一般的官府文書在收到後，皆由令史、尉史等小吏負責打開，然後呈送本官署主管官吏，而特殊的文書則需要在主管官吏面前拆封，甚至由其親手拆封。此類的啓封記錄多是直接書於文書簡的背面，位於收文記錄之下。具體例子如簡284·4B“令史博發君前”，簡506·9B“即日嗇夫□發尉前”，簡140·1A“候自發”。這麼做可能是遵照發文者的要求，比如簡55·1A是一枚封檢，發文者題署文字曰：“甲渠。發候尉前”，不僅題署收文單位名稱“甲渠”，還特別注明“發候尉前”，要求甲渠候官收到該文書後，不要仍按常規程序處理它，須在甲渠候官面前拆封。此類文書大約如同封事必須由皇帝拆封審閱一樣，帶有一定的保密性質，不準少吏獨自拆封。

官文書的啓封既然有專主其事的官吏，又要作啓封記錄，可見當時大致已經有了較為嚴格的規定，隨便拆文書印封的行為是不被準許的。《唐律·雜律》云：“諸私發官文書印封視書者，杖六十；制書，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洩坐減二等。”嚴厲禁止私有拆開文書印封，否則，依律懲處。

這一規定與漢律或許有一定的淵源。即使專主文書啓封的小吏，對所收受文書也不能貿然拆封，他首先必須審視印封的真偽。雲夢秦簡《法律答問》有如此的規定：“‘發偽書，弗知，貲二甲’。今咸陽發偽傳，弗知，即復封傳它縣，它縣亦傳其縣次，到關而得，今當獨咸陽坐以貲，且它縣當盡貲？咸陽及它縣發弗知者當皆貲。”秦律規定，打開偽書而不知其偽者，要罰二甲。我們知道，判別文書真偽的依據不外有二，一是印封的真偽，一是文書內容的真偽。文書的印封既然有專門的小吏拆開，則“發偽書”而未察其偽，自然要追究小吏的責任。然而秦律的嚴厲還不在於此，像傳這種在使用時沿途需經過許多縣廷查驗的文書，假如是件偽造物，而所經過的縣廷均未發現其偽，那麼所有經手此傳的縣廷都要按“發偽書弗知，貲二甲”的律條來論處。可見秦律打擊偽書罪所涉及的面很廣。漢律這方面的有關規定現在還未見到，但實際上一定會有。統治階級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原則立場是一致的，不會因時代先後而有所不同。

漢簡所反映的官文書收發和啓封之制在文獻中有無記載呢？《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屬吏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又，郡太守屬吏有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所謂“主上章表、報書記”、“錄記書”實際上就是負責把奏上君主的章表、答覆下級官署的文書都登記下來。“錄”本來就有登錄登記之意，如《廣雅·釋詁三》“錄，具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云：“凡財物之名數具於簿籍，故通謂之錄。”⑥錄記書，即把官府發送、收受的記書都登錄下來。太尉的記室令史負責登錄府中所收發的文書，主簿也是負責文書的收發工作，《續漢書·百官志》云“黃閣主簿，錄省眾事，”即是此意。這說明太尉府中主簿、記室令史都是職掌文書收發之事的官吏；不過，二者似應有所區別，從工作場所講，主簿是在閣下，記室令史則應在太尉府諸曹之間，至於二者具體職掌之差別，則因史料缺乏，無法究知。此外，尚書臺有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司隸校尉出行時有別駕從事負責“錄眾事”，居署時則有主簿“錄閣下事”。他們也都是主管文書收發啓封登記的小吏。

除了“主記室史”外，漢代文獻、碑刻中太守的屬吏與主記室史相似者還有“主記史”、“記室史”，見於謝承《後漢書·袁閔傳》；有“記史”，見《金石萃編》卷十《蒼頡廟碑》；有“主記掾”，見《隸釋》卷五《巴郡太守張納碑》，他們大概也是這種性質的小吏，惟名稱時有不同而已。不僅太守有這



種屬吏，縣令長也有，如《隸釋》卷二《西嶽華山亭碑》有“主記史”，卷五《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及卷九《堂邑令費鳳碑》均有“主記史”，卷十六《中部碑》則提到“主記”、“主記史”，《隸續》卷十九《尉氏令鄭季宣碑陰》有“記室史”、“主記書佐”、“記室書佐”、“記室□□”。縣令長有主記的史、令史、掾，在漢代官志中缺乏記載，從官職名稱上推測，其職掌當與太尉、郡守的主記室史、記室令史等相同，也負責主掌文書收發啓封。

綜合以上論述，漢代已形成較規範的發文、收文和啓封制度，每道手續皆有文字記錄；掌其事者主要是令史、尉史等，掾、書夫、從史亦偶爾為之；文獻和漢碑裏的記室令史、主記室史之類的太守、縣令屬吏也是這種小吏。為防止偽書擾亂統治秩序，統治階級制定了嚴格的規定，掌管啓封的小吏有責任發現並舉報偽書，若偽書經手而未能發現其偽，當事者需受一定的懲罰。

## 注 釋

- ①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下文所引同類型編號的簡文均引自此書，不另作注。
- ② 《居延新簡》。下文所引同類型編號的簡文均引自此書，不另作注。
- ③ 漢簡官文書中，有個別的文書在末尾寫着“書即日鋪時起候官”(E.P.T56:6A)、“書即日桑榆時起官”(E.P.T56:336)、“檄即日下鋪時起官”(282·13)、“即日起府”(E.P.T50:16B)之類的字樣，表明文書在撰制封印完畢後即發送。
- ④ 森鹿三《關於令史弘的文書》，載《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
- ⑤ 《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一)》，載《文物》1993年第8期。
- ⑥ 《周禮·天官·職幣》孫詒讓注。



## 居延漢簡吏卒“廩名籍”探析

李天虹（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漢代居延邊塞的廩食制度為傳世文獻所未詳，瞭解它的唯一資料是居延邊塞地下出土的漢簡，而居延漢簡中與廩食制度密切相關的文書當首推廩名籍。本文試圖通過對居延漢簡吏卒廩名籍的排比、分析，並結合相關簡文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對當時邊塞有關吏卒的廩食制度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以期拋磚引玉，有助於深入這一問題的研究。

“廩名籍”這一名稱是居延漢簡所固有的：

- (1) ● 甲渠候官永光五年正月廩吏卒名籍 EPT 52: 262
- (2) ● 肩水候官元康元年五月郵卒廩名籍 109.1 (地)
- (3) ● 第四部建始五年正月吏卒廩名籍 EPT 53: 2
- (4) ● 第廿三隧倉河平四年七月吏卒廩名籍 176.38, 190.10, 193.7

上引四簡是廩名籍的標題。簡(1)、(2)中的廩名籍是由候官編製的，(3)由部編製，(4)由倉編製。邊塞廩食一般按月發放，廩名籍也是按月編製。但是：

- (5) 肩水候官地節三年十月以來盡四年九月吏卒廩食名 13.1 (地)

簡(5)是對整個候官一年間廩名籍的彙總。漢代有上計制度。《周禮·天官·小宰》：“歲終則令群吏致事。”鄭注：“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又《續漢書·百官志》：“太守歲盡遣使上計。”劉昭注引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也。”關於計簿的內容，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從起止月份來看，簡(5)所載極可能與上計有關。連雲港尹灣漢墓出土的《集簿》，是迄今所見唯一完整的上計簿實物，讀者可以參見。<sup>①</sup>

從現有資料看，吏卒廩名籍正文有兩種形式。第一種以破城子簡 24.2 為

代表，列舉了每個廩食者的燧別、身份和姓名：

- (6)
- |          |        |        |         |
|----------|--------|--------|---------|
| 第廿三部卒十二月 | 第廿三卒李嬰 | 第廿四卒張猛 | 第廿六卒壽安  |
| 廩名       | 第廿三卒蘇光 | 第廿五卒曹逢 | 第廿六卒韓非人 |
| 廿二人      | 第廿三卒郭長 | 第廿五卒韓意 | 第廿七卒張願  |
|          | 第廿四卒成定 | 第廿五卒張肩 | 第廿七卒石賜  |
|          | 第廿四卒石關 | 第廿六卒張建 | 第廿八卒曾相熹 |
- 第廿八卒羊實 箕山卒鐘昌  
 第廿八卒馬廣 箕山卒高關  
 第廿九卒□□  
 第廿九卒復贛  
 第廿九卒左儻

24.2

簡24.2是一枚牘。如果將每個廩食者各寫在一枚簡上，就成為下面的格式：

- (7) 執胡燧卒司馬樂 55.22  
 (8) 侯南燧卒馬忠 257.2  
 (9) 第泰燧卒梁多 EPT4:14

如果每一枚簡上多寫幾個，就是下面的格式了。

- (10) 第一燧長秦恭 第二燧長史臨 第三□ 231.6  
 (11) 臨木燧長陳陽 木中燧長張勳 武賢燧長張忠 EPT22.259  
 (12) 毋傷燧長荻嚴 武賢燧長沐得 窮虜燧長王寢 EPT27:1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在《居延漢簡集成》里，將簡(7)、(12)這樣形式的簡文均劃歸吏卒名籍，顯然有誤。<sup>②</sup>這樣形式的簡文均不載吏卒的籍貫，和吏卒名籍不應混為一談。

第二種形式的廩名籍以謝桂華先生復原的簡冊為代表，<sup>③</sup>是在第一種的基礎上，再注明每個廩食者應廩食的種類和數量，並寫明某月某日由何人領取。

- (13) 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廩名籍 203.6  
 (14) 令史田忠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有取 133.7  
 (15) 右吏四人 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 203.10  
 (16) 鄣卒□□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286.12  
 (17) 鄣卒李就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254.24

- (18) 鄣卒張竟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203·14  
 (19) 鄣卒史賜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292·1  
 (20) ●右鄣卒九人 用鹽二斗七升 用粟卅石 286·9  
 (21) 執胡燧卒張平 鹽三升 十二月食□ 55·8  
 (22) □ (鹽) 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27·10  
 (23) ●右省卒四人 (用) 鹽一斗二升 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 176·18, 176·45  
 (24) ●凡吏卒十七人 凡用鹽三斗九升 用粟五十六石六斗六升大 254·25  
 (25) ●建□□年十二月吏卒廩名籍 203·25

這種格式的廩名籍，散簡多見：

- (26) 臨之縣卒樂護乙 三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月甲子卒王尊取 EPT 52:436  
 (27) 第八縣卒馮宣 十一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癸巳自取 EPT 7:1  
 (28) 第十八隊長上官隆 七月食三石 七月丁巳自取 EPT 22:109

上舉諸例均是一枚簡記一位廩食者。此外還有一枚簡並記一燧廩食者的時候：

- (29) 第廿三縣長李忠八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 ==  
 卒孫壽八月食三石二斗二升自取——  
 卒周雅八月食三石二斗二升孫壽取—— EPT 51:303

- (30) 四月壬戌自取以付卒□□  
 第四縣長張臨五月食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  
 卒成竟五月食粟三石三斗三升 四月癸未卒魏羽取 ==  
 卒魏羽五月食粟三石三斗三升 四月癸未自取 ==  
 卒張常五月食粟三石三斗三升 四月癸未卒□□取  
 □□ 180·2, 180·3

正文中吏的廩名籍少數祇記名，不記姓：

- (31) 第一縣長萬年 □ 33·18  
 (32) 俱起縣長光 □ EPT 52:159  
 (33) 萬年縣長武 糒二石卒魏聖取 38·19  
 (34) □長朱 九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3·29

另外，居延簡中還有如下兩簡：

- (35) 廣田 隧長葆 宋以 董辰久  
卒四人 李況 單 信

160.13

- (36) 次各隊長徐當時卒四人 卒 蘇利親 卒 祝自為 用粟十石 57.15  
卒 崔利 卒 吳道

也可能是廩名籍，但格式比較特殊，特附記於此。

從謝桂華先生復原的簡冊及有關簡文可知，一冊文書中通常有“右……”、“凡……”的簡文。云“右……”的，可能是文書的小結，也可能是總結；云“凡……”的，則祇能是總結。下面的簡文，可能與第一種形式的廩名籍相關：

- (37) ● 右誠北際卒四人 EPT 58:34  
(38) ■ 右餅庭部吏卒十三人 EPT 17:7  
(39) ● 凡吏十人 □ EPT 21:7  
(40) ● 凡卒十人 □ EPT 65:348

而下面的簡文，應屬於第二種形式的廩名籍：

- (41) ● 右卒十一人 用穀卅 □ EPT 44:2  
(42) ● 右吏八人 用粟十六石 177.11 (地)  
(43) 凡吏卒 用粟百七石八斗 □ 266.31  
(44) 最凡吏卒廿人用穀卅石 □ 332.6 (地)

一般來說，一冊文書還會有一枚可以稱之為“呈報”的簡文。呈報簡或居於文書的起始，如下文所引 EPT 68 出土的“當食者案”；或位於文書的末尾，如著名的“永元兵物簿”（128·1 查）。居延簡中保存比較完整的吏卒廩名籍的呈報簡有：

- (45) 建平三年六月庚辰朔戊申萬歲候長宗敢言之謹移部吏卒  
廩七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EPT 43:6  
(46)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辛巳第十五際長 □  
□ 廩三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EPT 65:123  
(47) 建平三年八月己卯朔乙 □  
廩名籍一編敢言之 EPT 65:410  
(48) 元延三年四月丙戌朔甲寅南部 □  
五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75.9 (金)

推測上述第一種形式的廩名籍是申請廩食的名籍，第二種形式的廩名籍

是實際發放的名籍。申請廩食的名籍，大概是由部編製而上報到候官的(簡(46)是目前所見唯一的燧長所報的廩名籍)。而實際發放地點除了候官所在之地的倉外還有候官所轄的其他倉：

- (49) □□受候官倉□ EPT4:57  
(50) 第十四燧長鳳將部卒詣官廩六月癸丑平旦入 89.11  
(51) 收虜燧長政 將卒一人詣官廩 三月辛酉日中入 EPT59:71  
(52) 馬病至戊辰旦遣卒之廿三倉取廩…… EPT43:2  
(53) □吞遠隊廩還詣隊 EPT43:44  
(54) ……五人省作候官二人受閭二人廩廿三燧 EPT53:44

何時在何倉發放由候官統一部署：

- (55) □□廩 吞遠廩 吞遠廩 EPT6:31  
(56) □官廩 官廩 官廩 EPT6:34  
(57) □五燧長濁戎 廩廿三 廩廿三 廩廿三 廩廿三 廩部 廩部 EPT65:64  
(58) 元延二年十月壬子朔甲渠候隆謂第十候長張忠等記到各遣將廩 214.30

第二種形式的廩名籍大概是由各倉在實際發放時編製的。謝桂華先生復原的簡冊看來是甲渠候官倉編製的發放名籍。而簡(4)則屬於第廿三燧倉編製的發放名籍。該簡出土於破城子，表明候官轄下各倉的發放名籍最後還要上報到候官。

從廩名籍正文可知，邊塞吏卒每月廩食量以三石三斗三升少為最多見。逢小月時吏不變，而卒減為三石二斗二升少。但是，同樣擔負戍邊任務的“弛刑”口糧標準可能低於普通戍卒。檣 26.21 是甲渠候官鄭吏卒的廩名籍。其中吏和鄭卒的月食量均是三石三斗三升少，而唯一的施刑桃勝之祇有三石。這恐怕是因弛刑本是罪犯所致。<sup>④</sup>

徐楊杰根據文獻推算：“日食米五升或日食粟一斗，是漢代一個青壯年的食量。”而居延簡裏吏卒的月食量三石三斗三升少及家屬中大男的月食量三石，“合日食粟 6.6 升和 6 升，祇相當於人們食量的 60—70 %”。所以“漢簡廩名籍所記口糧，並不是按照人們可以吃飽的食量發給的，它的性質是廩給邊塞士卒和家屬的勉強維持勞動和生命的基本口糧”。<sup>⑤</sup>從下面的簡文來看：

- (59) …… · 謹問武叩頭死罪對曰誠食乏私歸取食…… EPT59:240



(60) 第卅二縣長況叩頭死罪死罪對曰誠食乏毋所食…… EPT 22:339

邊塞的確存在食糧不足的情形，同時也說明吏（卒）除公家供以廩食外，還有其他的糧食來源。

謝桂華先生根據簡冊指出：吏的食鹽不像戍卒那樣由公家供給，而可能是用自己的俸祿購得。⑥今據下簡：

(61) 吏員百八人 其二人候尉不食 百四人見□  
二人有劾數

271.22

推測候官內像候、尉這樣的高級吏員，食糧也不由國家供給，而可能亦需用自己的俸祿購買或者有其他來源，所以目前的資料中未見有候、尉的廩名籍。

在簡冊中，食糧和鹽是一起發放的。類似的情形在其他廩名簡中僅一見：

(62) □ 七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鹽三升 六月癸巳高霸取 257.26

絕大多數的廩名籍簡祇記食糧。居延簡裏有單獨的“廩鹽名籍”和“鹽出入簿”：

(63) 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北部候長光敢言之□

廩鹽名籍一編敢言之

141.2 (地)

(64) □言之謹移三月盡六月鹽出入簿□

EPT 7:13

推測多數情況下食糧和食鹽是分開發放的。

簡(45)、(46)、(48)完整保存了呈報時間，茲排比如下：

何時廩名籍	上報月朔	上報日期	簡號
建平三年七月	六月庚辰	戊申(第29天)	EPT 43:6
建平三年三月	二月壬子	辛巳(第30天)	EPT 65:123
元延三年五月	四月丙戌	甲寅(第29天)	75.9 (金)

通過排比可知，部（縣）呈報廩名籍的時間似乎具有規律性，即均於每月的月底呈報下個月的廩名籍。但從簡(47)殘留的干支來看，建平三年某月的廩名籍的上報時間卻沒有遵循這一規律。由於可供排比的資料較少，廩名籍的上呈時間是否具有一定之規尚不能斷言。

另外，簡文所見與廩食有關的還有“當食者案”。茲錄EPT 68出土的一冊當食者案如下：

(65) 始建國天鳳三年六月甲申朔丁酉三十并郵候習敢言之謹移三月盡六月當

食者案敢言之

EPT 68:194

- (66) •三十井候官始建國天鳳三年三月盡六月當食者案 EPT 68:195  
(67) 三月餘戍卒二十一人 三月盡六月積六十三月 EPT 68:196  
(68) 出戍卒二十一人 三月二十日盡六月晦減積三十九月 EPT 68:197  
(69) 入戍卒十九人 三月盡六月積五十泰月 EPT 68:198  
(70) 出戍卒十九人 三月盡五月三日減積二十月二十泰日 EPT 68:199  
(71) 入戍卒三十一人 三月盡六月積百二十三月 EPT 68:200  
(72) 出戍卒三十一人 三月盡五月三日減積三十一月 EPT 68:201  
(73) 入戍卒泰人 三月盡五月三日積二十一月 EPT 68:202  
(74) 出戍卒泰人 三月盡五月三日減積泰月口日 EPT 68:203  
(75) 入戍卒二十八人 三月盡六月積八十三月 EPT 68:204  
(76) 出戍卒二十八人 三月盡五月晦減積五十六月 EPT 68:205  
(77) •凡戍卒百一十六人 三月盡六月定積百泰十三月五日 EPT 68:206  
(78) •三十井候官始建國天鳳三年三月盡六月當食者案 EPT 68:207

從當食者案的內容來看（簡(73)的“五月三日”應為“六月”的筆誤），它所記錄的戍卒處於流動之中，與平時駐守在候官及部縣的戍卒顯然不同。疑記入“當食者案”的戍卒是剛剛到達邊塞的新卒。在等待分配的過程中，新卒的廩食情形記錄於當食者案。也就是說，當食者案的性質與廩名籍相似，祇不過當食者案的當事人是新卒，廩名籍的當事人是已經駐紮於部縣的戍卒。

綜合上述，本文的主要論點有三：

1. 通過對廩名籍簡的排比、分析，認為漢代邊塞的廩名籍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申請廩食的名籍，由部編製；一種是實際發放的名籍，由倉編製。兩種廩名籍都要上報候官。部編製的廩名籍的呈報時間可能是預先規定好的。

2. 邊塞廩給吏卒的月食糧多是三石三斗三升少，低於常人的實際食量。而且候官內的最高級吏員候、尉的食糧可能不由公家供給。邊塞存在食糧不足的情形。

3. 當食者案和廩名籍性質相似。平時駐守於烽燧的吏卒的廩食情形記入廩名籍，剛剛到達邊塞的新卒，在等待具體分配期間的廩食情形則記入當食者案。

在整理吏卒廩名籍簡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除謝桂華先生復原的簡冊外，尚

有一些散簡可以聯綴成冊，祇不過這些冊子都很不完整，有的甚至祇殘存兩枚簡，茲附錄於後。

A

- ① ☐梁習 第九隊長上官宗☐☐☐ 231.4  
② 第一隊長秦恭 第二隊長史臨 第三☐ 231.6

B

- ① 第一隊長秦恭 第二隊長史臨 第三隊長趙匡☐ EPF22:258  
② 臨木隊長陳陽 木中隊長張勳 武賢隊長張忠 EPF22:259

C

- ① 城北候長竇何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匡 十月丙寅掾譚取尸 EPT65:84b  
② 第二十三隊長董放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舒 十月乙亥守尉史王陽取尸 EPT65:9  
③ 推木候長王宏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司 十月丙寅掾譚取尸 EPT65:10  
④ 甲溝第三十二隊長張護 十一月食☐斛☐斗 十月甲子嫂難取尸 EPT65:12  
⑤ 第二十隊長陳尚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三十 十月乙丑母取尸 EPT65:13  
⑥ 甲溝當曲隊長趙翕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今☐☐ EPT65:14  
⑦ 士吏馮匡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十月☐ EPT65:15  
⑧ 甲溝第二十八隊卒王敢 食一斛五斗 泰十 十月☐☐嫂之取尸 EPT65:16  
⑨ 第十五隊長晏戎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三升 十月乙丑妻☐取尸 EPT65:97  
⑩ 士吏孫習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十月丁卯妻☐☐ EPT65:294  
⑪ 第十泰候長趙彭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十月丙寅妻取尸 EPT65:11  
⑫ ☐ 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十☐ EPT65:298

D

- ① 第六隊長皇隆 正月食三石 正月辛巳自取 EPF22:83  
② 第十三隊長王習 正月食三石 正月辛巳自取 EPF22:84  
③ 不侵隊長石匡 正月食三石 正月辛巳自取 EPF22:85  
④ 鉗庭候長陳宗 正月食三石 正月壬午自取 EPF22:86  
⑤ ☐食三石 正月壬午付士吏習 EPF22:635  
⑥ ☐☐彭 正月食三石 ☐ EPF22:495

E

- ① 第一隊長召浦 二月食三石 二月辛亥自取 EPF22:87

- ② 第三隊長薛寄 二月食三石 二月辛亥自取 EPF 22:88  
 ③ ☒ ----- 二月食三石 二月辛亥自取 EPF 22:623  
 ④ ☒ 二月食三石 ☒ EPF 22:844

F

- ① 誠北候長王褒 乙 三月食三石 三月丙戌自取 EPF 22:90  
 ② ☒ 乙 三月食三石 三月丙戌自取 EPF 22:91  
 ③ ☒ 三月食三石 三月丁亥自取 EPF 22:92

G

- ① 令史夏侯譚 四月食三石 四月辛亥自取 EPF 22:93  
 ② 第八隊長梁習 四月食三石 四月辛亥自取 EPF 22:94  
 ③ 三堆隊長張業 四月食三石 四月辛亥自取 EPF 22:95  
 ④ ☒ 四月辛亥自取 EPF 22:96

H

- ① 止害隊長徐歆 四月食三石 四月辛巳自取 EPF 22:97  
 ② ☒ 長王詡 四月食三石 四月丙戌自取 EPF 22:98  
 ③ 第十六隊長召仲 四月食三石 ☒ EPF 22:99  
 ④ 木中隊長陳陽 四月食三石 ☒ EPF 22:100

i

- ① 第三隊長趙匡 五月食三石 五月癸未自取 EPF 22:102  
 ② 當曲助吏宋普 五月食三石 五月癸未自取 EPF 22:103  
 ③ 萬歲候長何憲 五月食三石 五月癸未自取 EPF 22:104  
 ④ 臨止隊助吏王敞 五月食三石 五月癸未自取 EPF 22:105, 118, 121

j

- ① 第九隊長單官 十月食三石 十月甲寅自取 EPF 22:106  
 ② 臨桐隊長孟賞 十月食三石 十月甲寅自取 EPF 22:107  
 ③ ☒ 十月甲寅自取 EPF 22:108, 122

K

- ① 餅庭守候長陳宗 十一月食三石 十一月乙未自取 EPF 22:110  
 ② ☒ 十一月食三石 ☒ EPF 22:111

- ① ☐ ☐ 燧王習 十二月食三石 十二月丙辰自取 EPF22:113  
 ② 第卅燧長馮長 十二月食三石 十二月戊午自取 EPF22:114  
 ③ 第□燧長趙彭 ----- 十二月壬戌自取 EPF22:115

M

- ① ☒ 燧長王望 五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四月甲午卒曹放取 286·8  
 ② ☒ 五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四月甲午卒徐壽取 P 55·17  
 ③ ☐ ☐ 候長王昌 五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四月戊戌卒韓有取 P 39·6

N

- ① 吞遠守候長陳友 八月旦乙卯守盡晦積一月食用穀三石 EPF22:436  
 ② ☒ ☐ ☐ 八月旦乙卯守盡晦積一月食用穀三石 EPF22:437  
 ③ 城北守候長王衰 八月旦乙卯守盡晦積一月食用穀三石 EPF22:438

O

- ① 故武成燧長趙竟 糲粟三斛 EPT59:351  
 ② 故終古燧長高嚴 糲 ☒ EPT59:353  
 ③ 故制虜燧長莊宣 糲粟三斛 EPT59:354  
 ④ 吞遠候長吳誦 糲粟三斛 EPT59:352  
 ⑤ ☒ 斛 EPT59:355

P

- ① 吞遠燧卒宗叔 閏月食三斛 ☒ EPT65:252  
 ② ☒ 政 閏月食三斛 ☒ EPT65:210  
 ③ ☒ 閏月己酉自取 EPT65:212  
 ④ ☒ 閏月己□□ EPT65:211  
 ⑤ ☒ 閏月食三斛 ☒ EPT43:227

Q

- ① 第三燧卒王譚 十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九月己卯自取 P EPT5:2  
 ② 收虜燧卒薛猛 十月食三石三斗三升 九月庚辰自取 P EPT5:3  
 ③ 收虜燧卒□並 十月食三石 ☒ EPT5:11

R

- ① ☒ 正月食三石 正月戊辰自取 EPT65:213



② 第十七燧卒鄭習 正月食三石 正月戊辰自取 EPT 65:7A

S

① ☒ 傷燧卒射勇 五月食二斛二斗二升少 五月甲子自取 EPT 59:179

② ☒ 卒朱並 五月食二斛二斗二升少 五月癸未 ☒ EPT 59:182

t

① ☒ 孫翁 六月食三石 448·1(宗)

② ☒ 閏月己亥自取 448·2(宗)

③ ☒ 六月食三石 閏月己亥自取 止姦燧卒繼 ☒ 448·4(宗)

④ ☒ 六月食三石 ☒ 448·6(宗)

u

① 燧胡燧卒橋陵 六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五月壬辰橋霸取 ☒ ESC:36

② ☒ 左定 六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五月丁亥自取 ☒ ESC:39

## 注 釋

-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文物》1996年第8期。
- ②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研究》，日本同朋舍1989年。
- ③ 謝桂華：《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
- ④ 薛英群：《說弛刑簡》，《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
- ⑤ 徐楊杰：《居延漢簡廩名籍所記口糧的標準和性質》，《江漢論壇》1993年第二期。
- ⑥ 謝桂華：《漢簡與漢代西北屯戍鹽政考述》，《秦漢史論叢》第六輯。

# 漢簡中有關印章的資料

趙平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漢簡中有不少關於印章的資料，內容涉及印文、印制和印的使用等方面，也許由於隔行的關係，未能引起印章研究者的注意。對於這些資料，本文將分四個部分進行分析介紹。

## 一、印文

在漢代的屯戍組織中，經常有文書和實物的傳遞，在傳遞之前，東西先由寄件者封好，填入封泥，鈐上印章。收件者收到以後，把有關內容記下來，作為存檔之用。這在當時，成了一種制度。這類文字有人稱之為“行書”文書<sup>①</sup>。它實際上包含兩類，一類直接書於封檢，一類用新簡另行書寫。在這種“行書”文書裏，保存了大量的印文資料。

這些印文資料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的直錄印文，如：

師就印

甲渠官

□卒同以來

(《居新》② EPT 8.10)

居延丞印

甲溝候官以郵行

十二月辛巳門卒同以來(《居新》EPT 14.1)

有的以“印曰……”、“章曰……”、“印章曰……”的形式，如：

印曰居延都尉印

甲渠候官

四月丙子臨桐卒禹以來(《居新》EPT 53.55)

章曰張掖都尉章

肩水候

四月丙辰驛北卒宗以來□(《合校》⑤ 54.25)

□印章曰犧和農楊丞(《居新》EPT 59.497)

有的以“以……封”，“封……以……”的形式，如：

□□以居延倉長印封寫移移居延書到□

(《居新》EPT 68.209)

降歸義烏孫女子

復得獻驢一匹驛壯

□兩祛齒二歲封頸以

敦煌玉都尉章

(《敦》④ 1906)

由於封檢上所錄印文有一定的程式，因而辨認起來並不困難。

需要注意的是，文書中的印文有時是簡畧抄下的，並不代表原來的面目。如“北書一封 大守章詣府”(《居新》EPT 5.104)“五月丙戌東書一封都尉印詣大守府日旦中時□”(《敦》2380)中的“大守章”和“都尉印”，但這類例子不多，絕大多數的印文是一字不漏地照錄下來的。

這些印文有官印也有私印，數量都不小。先介紹官印。

(一) 丞相府印(《敦》513)

(二) 大將軍章(《居新》EPT 6.41)

(三) 大將軍印章(《居新》EPT 49.11A)

(四) 犧和農楊丞(《居新》EPT 59.497)

犧和即羲和，《漢書·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犧和農丞，新莽犧和屬官，分部主郡國，《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犧和農丞當為大司農部丞之繼續。簡文‘犧和農楊丞’之‘楊’字，當為部丞之姓。”⑤

(五) 居延農令印(《居新》EPT 50.207A)

(六) 驛馬農令印(《合校》513.21)

農令為大司農的屬官。

(七) 肩水倉長印(《合校》317.1)

(八) 居延倉長(《合校》136.43)

(九) 城倉長印(《居新》EPT 52.16B)

(十) 廣倉印(《敦》1353)

漢在京師及郡國各地設糧倉，倉有倉長；掌糧儲出納，隸屬大司農。

(十一) 園延水丞(《合校》58.29)

第一字殘缺，當為居字。“水丞”見於“南陽水丞”印(《陳盦齋手拓印集》)和“琅邪水丞”封泥(《再續封泥考畧》)，據王人聰先生考證，水丞為都水丞的省稱，是大司農的屬官⑥

(以上朝官及其屬官印)

(十二) 張掖大守章(《合校》19.22)

(十三) 張掖都尉章(《合校》54.25)

(十四) 張掖有水司馬印(《合校》14.3)

有水司馬為有水都尉的屬官。

(十五) 有水塞尉印(《合校》506.9B，原作水有塞尉印，實際應為有水塞尉印。)

陳直先生認為距離五里左右險要的地方設壘，大的叫障，小的稱塞。塞置塞尉。障尉、塞尉和候官組織系統不同，但同歸太守、都尉府管轄⑦。

(十六) 張掖有候印(《居新》EPT 52.39)

有候即有水候，是有水候官的首長。

(十七) 張掖甲渠塞尉(《合校》133.1、《居新》EPT 65.328)

(十八) 甲渠塞尉印(《合校》552.3、552.4，原作渠甲塞尉印，實際應為甲渠塞尉印。)

(十九) 張掖廣地候印(《合校》214.12)

(二十) 廣地候印(《居新》EPT 51.81)

(二十一) 橐佗候印(《合校》502.1A)

(二十二) 珍北候印(《合校》30.4)

候為候官之長。

(二十三) 尉史勝之印(《居新》EPT 56.283B)

據《居新》EPT 56.283A、56.283B簡文，尉史為甲渠候官尉史。勝之為人名。

(二十四) 居延都尉章(《合校》33.16、《居新》EPT 51.14)

(二十五) 居延塞尉印(《合校》127·25)

(二十六) 居延千人(《居新》EPT 51·161)

《漢書·馮奉世傳》注引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

(二十七) 張掖居城司馬(《居新》EPT 43·29)

居城即居成。《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下：“莽曰居成。”

(二十八) 張且麋尉印(《居新》EPT 51·379)

無考。

(二十九) 牂得丞印(《合校》317·1)

(三十) 氏池長印(《合校》317·1)

(三十一) 氏池右尉(《合校》甲附14A)

(三十二) 昭武長印(《合校》317·1)

(三十三) 昭武丞印(《合校》47·6B)

(三十四) 居延令印(《合校》132·28, 《居新》EPT 51·37)

(三十五) 居延丞印(《合校》127·25, 《居新》EPT 49·27)

(三十六) 居成尉(《居新》EPT 40·177)

(三十七) 居延左尉(《合校》317·1, 《居新》EPT 48·147)

(三十八) 潘和尉印(《合校》506·6)

潘和即潘和，潘通蕃。

(以上張掖郡及其屬官)

(三十九) 敦煌長史印(《合輯》⑧17)

長史，邊郡太守的屬吏。邊郡無郡丞，以長史代丞，總領兵馬諸事。

(四十) 敦煌玉都尉章(《敦》1906)

第三字原釋王，不確。敦煌簡中玉常作王，印文玉中橫右邊雖不很清晰，但筆意猶存，可定為玉字。玉都尉即玉門都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下“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四十一) 文德大尹章(《敦》1893)

王莽時初改敦煌郡為文德，繼而改為敦德⑨。又改太守為大尹。

(四十二) 文德長史印(《敦》1893)

(四十三) 中部司馬(《敦》2144)



中部司馬為中部都尉屬官。《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下：“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

(四十四) 魚澤尉印(《敦》2228)

《漢書·孫寶傳》：“哀帝即位，征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朕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印文魚澤即此魚澤障。後改為效穀縣，顏師古在《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效穀”下注：“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四十五) 冥安長印(《敦》1291)

(四十六) 龍勒長之印(《敦》1975A)

(以上敦煌郡及其屬官)

(四十七) 酒泉大守章(《敦》1291)

(四十八) 酒泉大尹章(《合校》350.40)

(四十九) 酒泉庫令印(《合校》303.12B)

漢代邊郡有庫令，掌武備等的儲存。

(五十) 祿福獄丞印(《合校》495.12、506.20B)

獄丞為縣佐吏，掌獄訟。

(以上酒泉郡及其屬官印)

(五十一) 河東大守章(《合校》502.9A、505.22A)

(以上河東郡官印)

(五十二) 新成丞印(《敦》1296B)

(五十三) 雒陽丞印(《合校》334.20B)

(五十四) 偃師丞印(《合校》334.40B)

(五十五) 宜禾丞印(《敦》2233)

(以上河南郡屬官印)

(五十六) 阿陽丞印(《居新》EPT 59.233)

天水和平原兩郡都有阿陽縣，從地域看，此阿陽屬天水郡可能性較大。

(五十七) 金城守城印(《敦》1353)

金城郡有金城縣，因金城關而得名。金城因有關隘，係顯要之地，置守城。

(五十八) 廣德內史章(《合校》113·18)

廣德，王國名。《漢書·諸侯王表》夷王雲客王國，成帝鴻嘉二年始封，王一年而薨，無後國除。又靜王劉榆王國，平帝元始二年始封，王莽篡位，劉赤被貶為公，第二年廢。內史為王國官職，掌民政。

(五十九) 毋都相印(《居新》EPT 52·118)

(六十) 毋都家丞(《居新》EPT 52·118)

毋都即“武都”。上古漢語中，母和武同聲母同韻部，兩聲字常有通假之例。如《禮記·曲禮上》：“鸛鵒能言”。《釋文》鵒作母，云：“本或作武鵒”。《說文·鳥部》鸛鵒作鸛鵒。母可通武，而毋為母的分化字，因此毋武亦可通用。《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和五原郡下有武都縣，“毋都”當屬其中之一。相、家丞為王國或侯國官名。說明此處曾為封地。可補史書缺佚。

(以上封國官印)

和現有印章相比，這批官印有其顯著的特點：

它只有印文，沒有印體，也沒有印蛻。其內容和價值祇從記錄的印文中反映出來。

它均為實用印。不象現有印章有相當多的明器。

它的時間和地域比較集中。主要是漢代中期到東漢建武初年張掖、敦煌、酒泉數郡的遺物，屬於建武初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很少。

它的絕大多數為現有印章所未見。除了“居延丞印”(《文博》1984年2期)等極少幾種以外，其他都可以豐富現有印章的內容。

它多為邊郡屯戍組織的軍印。這類印過去所見甚少，祇有從簡牘印文纔能獲得較為全面的瞭解。

這批印文還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啓示。

譬如說，“大將軍章”和“大將軍印章”，“張掖甲渠塞尉”和“甲渠塞尉”，“張掖廣地候印”和“廣地候印”，同一官印印文字數多少不同。它們可能屬於不同的時期，是前後繼替的關係，也可能是同一時期同一官署有兩枚以上的官印。

有一枚“尉史勝之印”見於下面一簡：

神爵二年五月乙巳朔乙巳甲渠候官尉史勝之謹移

衣錢財物及毋責爰書一編敢言之(《居新》EPT 56.283A)

印曰尉史勝之印

五月乙巳尉史勝之以來(《居新》EPT 56.283B)

尉史勝之是甲渠候的屬吏。這類小官，為數很大，然而官印卻十分罕見。也許本來就不給他們頒發官印。為了行事的方便，他們有刻印章，這類“官名+私名”的形式也許就是這樣刻出來的。這當然祇是一種推測。但是這類印作為實用印出現，很明顯既有官印性質，又具有私印特點，值得注意。

我們再來看看私印。先把例子抄錄下來：

殷通光印(《敦》1162A) 薛章印(《居新》EPT 51.127)

恭彭印(《居新》EPT 6.129) 單充(《居新》EPT 51.159)

師就印(《居新》EPT 8.10) 王建國印(《居新》EPT 51.164)

樊循印(《居新》EPT 10.31) 孫猛(《居新》EPT 51.168)

周並私印(《居新》EPT 26.7) 牟政印(《居新》EPT 51.176)

何建印(《居新》EPT 27.71) 霍辟兵印(《居新》EPT 51.226)

格譚印(《居新》EPT 40.1) 楊褒私印(《居新》EPT 51.333)

馮方印(《居新》EPT 48.145) 紀音印(《居新》EPT 51.410B)

侯賢印(《居新》EPT 50.24) 董至印(《居新》EPT 52.389)

東門輔(《居新》EPT 50.146) 楊齊印(《居新》EPT 52.405)

□充印(《居新》EPT 50.197) 王輔私印(《居新》EPT 52.613B)

孫根印(《居新》EPT 51.81) 孫商印(《居新》EPT 52.625)

李鳳印(《居新》EPT 56.176) 趙安漢(《居新》EPT 56.314)

楊褒印(《居新》EPT 59.263) 徐尊印(《居新》EPT 59.317)

徐闔印(《居新》EPT 59.362) 蕭宣印(《居新》EPT 65.325)

范昌印(《居新》EPC 1.40)

關武印(《合校》4.15)

楊音印(《合校》4.29)

朱千秋(《合校》5.2)

關達私印(《合校》5.19)

韓猛印(《合校》46.4)

張並印(《合校》55.19.137.1)

李忠印(《合校》58.1)

辛闔私印(《合校》74.5)

蘭禹(《合校》10·34 B)	趙廣之印(《合校》88·14)
莊賁印(《合校》10·38)	張宗印(《合校》122·2)
王充印(《合校》30·17)	刑忠印(《合校》132·32 B)
蘇當印(《合校》33·23)	楊放印(《合校》133·3)
王彭印(《合校》133·4 A)	陳德昌印(《合校》38·7)
王憲印(《合校》136·43)	李贊印(《合校》39·5 A)
呂憲印(《合校》180·39、190·33)	
李充印(《合校》42·10)	
王建國(《合校》180·39、190·33)	
李勝(《合校》180·39、190·33)	
孫猛印(《合校》214·24)	王疆印(《合校》214·24)
成宣印(《合校》214·24)	李充印(《合校》258·18 A)
趙千印(《合校》259·6)	秦忠(《合校》264·22)
符普印(《合校》401·2)	牛慶(《合校》562·14)

傳世私印很多，但在斷代上存在諸多困難，不利於全面科學地利用，而年代明確的發掘品又極少，這批私印大多屬於西漢中期到東漢建武初年，年代集中，彌足珍貴。

在形式上，這批私印多為姓名加“印”，少數加“私印”、“之印”，不加“印”的例子不多。

這批私印用字有比較明顯的取向，多以充、忠、憲、猛、疆、音、宣、褒、並為名。

## 二、印制

漢簡中可供研究印制的材料是封泥槽。封泥已經不存，封泥槽做在簡牘上，和簡牘一同保存下來。這些封泥槽，對研究相關印章、甚至整個漢印印制有一定參考價值。

封泥槽往往鑿在封檢的上、中、下等部位，呈方形。為了綑綁的方便，有時也因為簡面狹窄，其橫向（即左右）往往鑿通。這種情況佔了絕大多數。橫向沒有鑿通的，不多。對於橫向鑿通的封泥槽，橫長對了解印制作用不大。因此我們調查封泥槽（匣）的尺寸時，一般祇記縱長，橫向沒有鑿通的纔記下橫長。

現將對《居延漢簡》甲乙編、《敦煌漢簡》、《居延新簡》三書中封泥槽（匣）的普查數據彙集於下：

《居延漢簡》甲乙編：

簡 號	封泥槽（匣）縱長（釐米）	橫長（釐米）
甲 453	1.8	1.6
甲 782	2.5	
甲 1082	3.0	
甲 1026	2.0	
甲 1130	3.0	
甲 1150	2.7	
甲 1264A	2.5	
乙 8.4A	3.2	
乙 14.1B	2.0	
乙 22.3B	2.6	
乙 21.1B	2.6	
乙 30.11A	3.0	
乙 34.15B	2.4	
乙 45.1B	2.7	
乙 49.2A	2.9	
乙 51.1B	2.8	
乙 55.1A	2.4	
乙 66.2B	1.9	
乙 67.26A	2.4	
乙 100.1	3.0	
乙 112.18C	3.0	
乙 112.17B	2.4	
乙 162.1	3.4	
乙 175.11	2.5	
乙 179.2B	3.1	
乙 183.18	2.9	



乙 199·21 A	3.0	
乙 209·2 A	2.8	
乙 209·2 A	2.6	
乙 214·1 B	2.8	
乙 214·2 B	2.2	
乙 257·1	2.0	
乙 262·1 B	3.4	
乙 275·24	1.7	
乙 278·7 A	2.5	2.0
乙 278·7 B	2.5	
乙 393·5	2.6	2.6
乙 305·17 A	2.6	2.6
乙 311·28 A	2.7	
乙 326·8 A	3.2	
乙 363·1 A	2.6	
363·2 A		
乙 438·1	2.4	
乙 526·1 A	2.8	
乙 526·1 A	2.3	
乙 524·1 B	2.8	
乙 199·20 B	3.0	
乙 259·5 A	2.8	

《敦煌漢簡》：

1	2.2
12	3.1
516	5.2
881	2.8
884	3.1
1068	3.2
1124	2.3

1125	2.5	
1189	2.4	
1218	3.0	
1467	3.0	
1823	3.0	
1906	2.6	
2126	4.6	
《居延新簡》：		
EPT 6.37	2.8	
6.42 B	2.8	
EPT 25.1	2.5	
EPT 40.4	2.3	
EPT 40.7	1.6	
EPT 40.8	1.9	2.2
EPT 40.208	3.0	
EPT 43.34	1.9	1.6
EPT 48.120	2.6	
EPT 48.122 A	1.5	1.2
EPT 49.68	2.7	2.1
EPT 49.70 A	2.3	
EPT 50.205	2.9	
EPT 50.239	2.9	
EPT 50.245 A	2.9	
EPT 51.149	3.1	
EPT 51.167	2.2	
EPT 51.297	3.0	
EPT 51.329	4.0	
EPT 51.331	2.0	
EPT 51.438	2.5	
EPT 51.441	2.8	

EPT 51.440	2.3	
	2.5	
	2.5	
EPT 51.442	3.0	
EPT 51.443	2.3	
EPT 53.208	3.0	
EPT 56.64	3.2	
EPT 56.167	3.0	
EPT 56.174	2.6	
EPT 56.176	2.4	
EPT 56.179	3.0	
EPT 56.180	4.4	
EPT 57.16	1.8	
EPT 58.115	3.0	
EPT 59.361	2.8	
EPT 59.360 A	2.2	
EPT 59.367	3.8	
EPT 59.368 A	3.0	
EPT 59.370	2.2	
EPT 59.371	3.0	
EPT 59.375	2.5	
EPT 59.379 B	1.9	
EPT 59.381 A	2.5	
EPT 59.603	2.8	
EPT 59.676	3.0	
EPT 59.677	3.0	2.4
EPT 59.678	2.7	
EPT 59.687	1.6	
EPT 61.13	2.7	2.7
EPT 65.118	2.8	

EPT65·159	3.4
EPT65·329	2.6
EPF19·13	2.7
EPF19·12	2.7
EPF22·151A·B	2.7
EPF22·152(1)	2.4
EPF22·467	1.6
EPF22·472	3.3
EPF22·473A	2.5
EPF22·474A	2.5
EPF22·475B	3.0
EPF22·476	3.0
EPF22·698A	3.4
EPF22·709(1)	3.2
EPS4T2·129	2.4
EPS4T2·130	2.4
EPS4T2·131	1.7
EPS4T2·160	2.8

三書中封泥槽的平均縱長是2.73釐米，其中《居延漢簡》甲乙編2.53釐米，《敦煌漢簡》3.07釐米，《居延新簡》2.66釐米。最小的縱長1.5釐米，最大的縱長5.2釐米。封泥嵌在槽中，印文鈐在封泥上，因此，印面應小於封泥槽。這些封泥槽的數據，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這些印章個體尺寸，平均尺寸的上限資料。在沒有實物、沒有封泥留傳的情況下，要瞭解這些印章的印制，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 三、印的使用

關於印的使用，漢簡也有一些新的信息。如官吏可以私印代行公事。

(一) 二月庚辰甲溝候長戎以私印行候文書事敢言之謹

寫移敢言之 ● 候君詣府 尉史陽

(《居新》EPT48·25)

- (二) □年六月己巳朔丁丑甲渠候破胡以私印行事敢言之謹  
移戍卒朱寬等五人  
賁賣候史鄭武所貧毋以償坐詐□□名籍一編敢言之  
(《居新》EPT 51.199)
- (三) □□以私印兼行候事謂第十候長霸候史敞  
(《居新》EPT 51.342)
- (四) □長良以私印兼行候事謂不侵候長宗□  
(《居新》EPT 51.401)
- (五) 八月庚戌甲渠候長以私印行候文書事告尉謂第四  
候長憲等寫移  
(《居新》EPT 22.158)
- (六) 七月丁未敦煌中部士吏福以私印行都尉事謂平望破胡  
吞胡萬歲候官寫移檄到  
(《合輯》180)
- (七) 二月丙子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敢言之郭□  
(《合校》10.4)
- (八) 閏月庚子肩水關嗇夫成以私印行候事  
(《合校》10.6)
- (九) 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承書從事下  
常用者如詔書／令史得  
(《合校》10.31)
- (十) 地節五年正月丙子朔丁丑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敢  
言之都尉府 = 移大守府所移敦煌大守府書曰故大司馬博  
(《合校》10.35A)
- (十一) 元康二年六月戊戌朔戊戌肩水候長 = 生以私印  
行候事寫移昭武獄如律令  
(《合校》20.11)
- (十二) 四月丙子肩水驍北亭長敞以私印兼行候事謂關嗇夫吏寫移書  
□如律令 令史臺√光√博 尉史賢  
(《合校》29.7)



(十三) ☒ 日甲□□□□以私印行事敢言之謹戌卒

☒ 言之

(《合校》38·20 A)

(十四) 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己卯甲渠士吏彊以私印

行候事敢言之候長鄭赦父望之不幸死癸巳

予赦寧敢言之

(《合校》57·1 A)

(十五) 十二月戊辰甲渠候長湯以私印行候事告塞尉謂士吏輔候長

段賢等

(《合校》82·38)

(十六) 三月丙戌甲渠士吏彊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士吏□章

候長毋害

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令史充

(《合校》160·15)

(十七) 五月丙戌殄北隄長宣以私印兼行候事移甲渠寫移

書到如律令／尉史并

(《合校》206·9)

(十八) ☒ 長政以私印兼行候文書事下尉部士吏□候長□等

下當用者明☒

☒ 知之如詔書書到言 據相

(《合校》240·2 A, 240·22 A)

(十九) 甘露四年七月甲子甲渠候長充以私印行候事敢言之府移左農右

(《合校》267·20)

(二十) 七月丁未敦煌中部士吏福以私印行都尉事謂平望破胡吞胡

萬歲候官寫移檄到

(《敦》1367)

還可以以小官印行大官事。如：

(一) ☒ 元年十一月壬辰朔甲午肩水關嗇夫光以小官印兼行

候事敢言之☒

☒ 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合校》199.1A)

(二) 初元五年四月壬子居延庫曹夫賀以小官印行丞事敢言  
□

(《合校》312.16)

#### 四、關於封泥的名稱

封檢如有壞裂，收件人收到後，要在題署中對它的狀況進行描寫。如：

印破

(一) 甲渠官

正月甲辰門卒同以來 𠄎𠄎𠄎

(《居新》EPT 6.36)

(二) □北行詔書一封 封破 □ □ □

(《居新》EPT 7.31)

(三) 北書一封章破樂官丞 □ 虜封 詣居延

十二月丁丑 □

二分當 □

三時 □

(《居新》EPT 51.197)

(四) 北書一封章破不 □

(《居新》EPT 51.621)

印破

(五) 甲渠候官以郵行

四月己未日舖時第一燧長巨老以來

(《居新》EPT 56.47)

(六) 合檄二章皆破摩滅不可知其一詣刺史趙掾 □

合檄一張掖肩候印詣刺史趙掾在所•合檄一 □

(《居新》52.39)

其一封大守章詣府

(七) 北書四封 不校 一封居延司馬詣府 □

二封章破

(《居新》EPT 52.168, “不校”二字乃後書)

其一封詣居延千人

(八) 北書二封 一封章破詣□□ 趙卿治所  
(《居新》EP T 59·156, 以上第一欄)

(九) 丁丑到留遲封破毋旁封記到各推□  
(《居新》EP T 59·504)

(十) 書一封 = 破宋詡  
(《居新》EP W 1.53)

(十一) □ 一封張掖大守章 詣府 · 一封 = 破張尊為旁封  
□ 一封張掖都尉章 詣府 詣居延  
□ 一封不可知 詣居延千人彭君治所  
(《居新》EP C 1.24, 以上第一欄)

印破

(十二) 肩水候官吏馬馳行

十二月丙寅金關卒外人以來

(《合校》20·1)

其中提到封破、印破、章破，很明顯，印破和章破是指鈐在封泥上的印章壞裂，而封破應與之有所區別，程度應更深，可能指整個封檢壞裂。這就告訴我們，封泥上的印文稱印或章。《周禮·秋官·職金》“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鄭玄注說：“璽者印也，既揭書捕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禮記·月令》有“固封璽”一語，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入禾石，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粟者各一戶以氣，自封印。”這些記述表明用封泥封和在封泥上蓋上璽印是兩個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過程，不能混為一談。這和漢簡中把“封”與“印章”加以區別是相對應的。

在封泥剛剛問世的時候，有人稱之為“漢世印範子”<sup>⑩</sup>。劉喜海據《後漢書·百官志》守宮令下本注“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sup>⑪</sup>，定名為封泥，後來沿用至今。其實守宮令本注的“封泥”是指沒有鈐印的備用的封泥，與鈐印的封泥是有本質的不同的。

根據漢人的習慣，我們認為鈐印的封泥應稱之為“封印”或“封章”較為合適。先秦因印多稱璽，封泥可稱之為“封璽”。

## 注 釋

- ① 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畧》，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 ② 《居延新簡》的簡稱。
- ③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的簡稱。
- ④ 《敦煌漢簡》的簡稱。
- ⑤ 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
- ⑥ 《西漢郡國特設官署印畧考》，載《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0年。
- ⑦ 《〈關於居延漢簡的發現和研究〉一文的商榷》，《考古》1960年8期。
- ⑧ 《散見簡牘合輯》的簡稱。
- ⑨ 王國維：《敦煌所見漢簡跋》，載《觀堂集林》卷十七。
- ⑩ 吳榮光：《筠清館金石》。
- ⑪ 《泥封印古錄》胡琨序。

（本文是作者博士後研究報告中的一部份，蒙中國博士後基金會贊助和李學勤先生指導，復蒙裘錫圭、謝桂華先生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漢簡草書辨正舉隅

謝桂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漢簡的書體，僅就居延和敦煌等西北邊陲漢簡而言，其絕大多數大體可以分為隸體和草體兩大類。經過海內外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對隸書的釋讀雖不能做到完全正確辨認，但應該說遺留的問題不算太多了。而對草書的釋讀雖亦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不僅不能準確釋讀的數量尚多，且難度亦較大，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艱巨任務，是一個亟待着大力氣解決的關鍵問題。本文擬就筆者在閱讀漢簡釋文的過程中，所發現的草書釋讀方面的問題，提出商榷和質疑，以期拋磚引玉，通過大家共同切磋和反復琢磨，力爭早日攻破這個難關。

## 一、敦煌漢簡

例(一)：六月戊午府下制書曰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等謀反已伏辜崇季父蒲及  
聲解印授肉袒自護 書丁卯日入到

(《敦》四九七①)

“蒲及”之“及”，簡文寫作“反”，與此簡上文“謀反”之“反”同。  
“蒲及”乃“蒲反”之誤釋。“蒲反”，縣名，西漢時屬河東郡。《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縣條師古注：“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又注引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謂秦名之，非也。”臣瓚曰：“秦世家云‘以垣為蒲反’，然則本非蒲也。”師古曰：“應說是。”“崇季父蒲反令聲”，應標點為“崇季父、蒲反令聲”，意即劉崇的叔父、蒲反縣令劉聲。“印授”之“授”，簡文本寫作“綬”。



印指官印，綬指繫印的絲帶。《史記》卷八九《張耳陳餘列傳》：“（陳餘）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肉袒”之“肉”，簡文本寫作“月”，讀作“肉”。“肉袒”，脫去上衣，裸露肢體。古代人在謝罪或祭祀時，常脫衣露體，以表虔誠和惶恐，如《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自護”之“護”，意不可解，疑“護”為“詣吏”之合文。《漢書》卷九九《王莽傳上》：居攝元年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關自歸，莽赦弗罪。”由於張竦和劉嘉“詣關自歸”，且張竦還為劉嘉向朝廷起草了一篇劾忠王莽和痛斥劉崇謀反的上奏，頗得王莽的歡心。於是，“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帥）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為奏。’”既然劉嘉和張竦“詣關自歸”，不僅被王莽赦免無罪，而且以“忠孝著焉”，相繼得到封侯。正是在劉崇和張紹反莽，“已伏辜”的政治背景下，劉崇的季父、蒲反令劉翬纔採取“解印綬，肉袒自詣吏”，即向當地官府（很可能是河東郡太守府）請罪的。因於史無徵，故可補載籍之缺。

關於安眾侯劉崇起兵反莽的事件，除此簡外，1976年還在內蒙古額濟納旗漢代三十井候官次東廕發現了如下兩枚簡文：

- 南陽大守、掾史、宛邑令聞安眾侯劉崇謀反，欲入宛邑城，先發吏民杜關城門距射，崇等  
76·ESC·1 A
- 十 六  
76·ESC·1 B
- 以故不得遂其逆亂者  
76·ESC·2 A
- 十 七  
76·ESC·2 B ②

亦可與史籍互相印證。

例（二）：……中不得方循行嚙察相二千石以下不懸犯毋狀

（《敦》九八〇）

此簡為下行文書。“廉察”之“廉”，原簡如此作，似應改作“廉”。“廉察”，意即查訪。居延簡一〇·四〇：“襍予閣，謹以文理遇士卒，毋令冤失職，務稱令意，且遣都吏循行，廉察不如護大守府書致。案毋忽如律令。／掾壽、屬壽、給事佐明。”③《後漢書》卷四一《第五倫附曾孫第五種傳》：“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相。”其“廉察”均與此簡文意同。“不惠”之“惠”，同“憂”，意即“不憂事邊”。居延漢簡四五五·一（《圖》一一五④）：“入毋憂燕長胡賜錢九百 永□”，“憂”字正如此作。居延漢簡一二·一（觚）：“得倉丞吉兼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詔書：清塞下，謹候望，備薰火，虜即入，料度可備中，毋遠追，為虜所詐。書已前下。檄到，卒人遣尉、丞、司馬數循行，嚴兵□。（以上為A面，《圖》四六四、四六五）□禁止行者，便戰鬪具，驅逐田牧畜產，毋令居部界中。警備毋為虜所誑利，且課毋狀不憂者，劾尉、丞以下，毋忽，如法律令。敢告卒人。／掾延年、書佐光、給事□。（以上為B面，《圖》四六二、四六三）都尉事、司馬丞登行丞事謂肩水候官，寫移檄到，如大守府檄書律令。／卒史安世、屬樂世、書佐延年。（以上為C面，《圖》四六八、四六九）此簡屬三面觚，A面和B面為張掖太守府下達給各都尉府的檄書。C面為肩水都尉府下達給肩水候官，貫徹執行張掖太守府檄書的命令。D面中的“循行”和B面中的“課毋狀不憂者，劾尉、丞以下，毋忽，如法律令”，不僅和簡文意同，且文例亦相類。“犯”寫作“尤”，應讀作“尤”，居延漢簡二九·一四（《圖》六〇）：“萬世庶皆廢置不能發遣卒叢詔已可見矣尤毋狀遷已□”；簡三三六·二〇，三三六·三八（《圖》四一）：“□不捕得，尤毋狀，記到，行罰□”；《敦》七八二：“所犯尤桀黠，當以時誅，恐黨與竊多，為吏民害，願比建平三年詔書。”其“尤”字均如此作。《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注：“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與簡文意同。

例（三）：河南郡新成當利里乾亢字子游 神爵五年正月王成溫東下

(《敦》一二九六 A)

章曰新成之印

(《敦》一二九六 B)

此簡屬於出入名籍，正面依次記錄了出入者的籍貫、姓名、年月日和走向等。誠如饒宗頤、李均明《敦煌漢簡編年考證》一書已正確指出的，“乾克”應作“乾充”，迺出入者的姓名，“字子游”之“游”，應作“游”，“子游”為“乾充”的字。“王成”應改作“壬戌”，是指通過的日期。背面所記錄的屬於乾充通行證上面所蓋的印章。“章曰新成之印”的“之”字，應是“丞”的誤釋。因從居延簡中所記錄的有關通行證實物的文字資料考察，所蓋的印章通常為縣級官署的長吏。例如：

簡1：奉明善居里公乘丘誼，年六十九。

居延丞印。方相車一乘，

用馬一匹，騂，牡，齒十歲，高六尺。

閏月庚戌北

(五三·一五《圖》八二)

簡2：三月壬午朔己酉，丞勝移守河，遣令史李逐人。

李子威，金城、武威、張掖、居延界中，從者如律令。

(八一·四A 失照)

延丞印。

(八一·四B《圖》三七七)

簡3：年六月丁巳朔庚申，陽翟邑獄守丞就兼行丞事，移函里男子李立第臨自言取傳之居延，過所縣、邑、侯國，勿苛留，如律令。候自發。

(一四〇·一A《圖》四一二)

陽翟獄丞

長二丈二尺，直千六百錢。具曼用乃予之。

(一四〇·一B《圖》四一三)

簡4：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亭長王豐以詔書買騎馬酒泉。

敦煌、張掖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守令史詡、佐襄，七月丁亥出，

(一七〇·三A《圖》一〇九)

居延令印，  
七月丁亥出。

(一七〇·三B《圖》一一〇)

簡5：元延二年八月庚寅朔甲午，都鄉嗇夫武敢言□。  
褒葆俱送證女子趙佳張掖郡中。謹案：戶□，  
留，如律令，敢言之。●八月丁酉，居延丞□□。

(一八一·二A《圖》六二)

居延丞印。  
八月庚子以來。

(一八一·二B《圖》六三)

簡6：元康二年正月辛未朔癸酉，都鄉嗇夫□，  
當以令取傳，謁移過所縣道河□。  
正月癸酉，居延令勝之、丞延年□。

(二一三·二八A，二一三·四四A《圖》三六)

印曰居令延印。

(二一三·二八B，二一三·四四B《圖》三七)

簡7：元鳳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庫令安國以近次兼行大守事、  
丞步遷謂過所縣河津，請  
遣□官持□□□錢去□□取丞從事金城、張掖、酒泉、敦煌郡  
乘家所占畜馬二匹，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掾勝胡、卒  
史廣。

(三〇三·一二A《圖》六)

十月壬辰卒史解，  
章曰酒泉庫令印。

(三〇三·一二B 失照)

簡8：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甲辰，西鄉有秩□□□。  
王武案：毋官徵事，當為傳致□□。

□□□六月雒陽□。

(三三四·二〇A《圖》五八)

印曰雒陽丞印。

(三三四·二〇B《圖》五九)

簡9: □□□□□□□謹移□過□侯國邑□  
當為傳,敢言之。八月戊子,匭師丞憲移縣邑□  
(三三四·四〇A《圖》五九)

章曰匭師丞印。

(三三四·四〇B《圖》六一)

簡10: □敢言之□。

九月辛卯,長安令□。

(三四〇·二〇A《圖》一四五)

印曰長安右丞。

(三四〇·二〇B《圖》一四六)

簡11: 章曰雒陽丞印。

(三四〇·四六A《圖》一四五)

□丞□

(三四〇·四六B《圖》一四六)

簡12: 建平五年十二月辛卯朔庚寅,東鄉嗇夫護敢言之。嘉平□

□□□□□。案: 忠等毋獄徵事,謁移過所縣邑門亭河津關,  
毋苛留,敢言之。

十二月辛卯,祿福獄丞博行丞事移過所如律令。 ) 掾海,守令  
史衆。

(四九五·一二,五〇六·二〇A《圖》二三)

祿福獄丞印。

(四九五·一二,五〇六·二〇B《圖》二四)

上述十二枚簡記錄所蓋的印章,依次為“居延丞印”、“□延丞印”、“陽翟獄丞”、“居延令印”、“居延丞印”、“居令延印”、“酒泉庫令印”、“雒陽丞印”、“匭師丞印”、“長安右丞”、“雒陽丞印”、“祿福獄丞印”。其中簡3所蓋的印章為“陽翟獄丞”,是因為“陽翟獄丞就兼行丞事”;簡12



之所以為“祿福獄丞印”，亦因“祿福獄丞博行丞事”。唯簡7為“酒泉庫令印”，是因為“酒泉庫令安國以近次行太守事”，由代行太守事務的酒泉庫令蓋章發給通行證，是非常特殊的事例。儘管如此，但所有記錄沒有一個是加蓋官署的印章的。且仔細審視圖版，“之”字寫作“𠂔”，應讀作“丞”。居延簡一一·一〇（《圖》三九）、八四·二一（《圖》二七六）和一一八七·八A（《圖》三七四）中的“丞”字均如此作。又從上述十二簡的文例來看，簡11的三四〇·四六A和三四〇·四六B，即正面和背面的順序應該互換。簡12因縱裂，四九五·一二，五六〇·二〇A第二行簡文中的“□□□□□”等五個無法識出的字，經過綴合以後，可以補作“願以令取傳”。與此簡相類，下述居延簡文中所蓋的印章，亦有可補正者。例如：

簡13：河平二年七月癸丑□

張掖郡中占物危□

□□□如律令

（一四〇·一一A《圖》四—二）

□奉自取卅

（一四〇·一一B《圖》四—三）

簡14：□□□陽□

（三三四·二五《圖》五八）

簡15：建平五年十月丁卯朔乙酉，鄉嗇夫□。

□

（四九五·一八A《圖》二三）

□□之□

（四九五·一八B《圖》二四）

簡16：建平五年八月戊□□□□，廣明鄉嗇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張自言，與家買客田居

延都亭部，欲取檢。謹案：張等更賦皆給，當得取檢，謁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

（五〇五·三七A《圖》二三）

□放行

（五〇五·三七B《圖》二四）

其中簡13雖為殘簡，且B面四字僅保留左半部筆跡。但因該簡出土於有水金關，A面的文例亦與記錄通行證的文字相類，故從殘留左半部筆跡的B面四字“奉自取下”，似應改釋作“奉即丞印”。

簡14：亦為殘簡，且亦出土於有水金關。“□□□陽□”，疑可補釋作“印曰雒陽丞”。果真如此，該簡亦應為記錄通行證文字之背面，可惜正面文字已經佚亡。

簡15亦為殘簡，但出土於大灣，四九五·一八A，雖僅可識開頭的簡文，從文例來看，當屬於記錄通行證的文字，不會有錯。四九五·一八B，則屬於記錄所蓋的印章，因B面簡文僅殘留左半部筆跡，故誤作“□□之□”，從殘留筆跡來看，似應補釋作“閑田丞印”。其中“之”字，亦屬於“丞”字的誤釋。

簡16亦出土於大灣，屬於廣明鄉喬夫宏、假佐玄為所管轄善居里男子丘張，因“與家買客田居延都亭部”，向縣級長吏請求批准丘張取檢的上呈文書記錄。五〇五·三七B面於頂端還記錄了所蓋的印章“□□丞印”，故B面的釋文應改作“□□丞印，放行”。

例(四)：出錢二千五百，買大杖木蓋亭屋。

(《敦》五五三)

此簡屬於現錢出納簿。“大杖木”，究竟指何物，不得其解。“杖”寫作“林”，應改作“材”。《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斬伐材木斫株根，其‘材’字正如此作。居延簡四六·二九(《圖》三四五)：“不，戶關雄樛皆故有，新未。非子曰：故隧長有新關雄材在三樛隧，未作，毋累舉”，簡九五·五(《圖》二八〇)：“制詔納言：其宜官伐材木取竹箭。始建國天鳳□年十一月戊寅下”。其“材”字亦如此作，以往釋文皆誤作“林”。居延簡中亦出土了購買木材的簡文，如簡一四二·二八A·B(《圖》二三八·二三七)：“受(?)叩頭言：子麗足下□白，過客五人□不□，叩頭叩頭。謹因子麗幸許為賣材，至今未得蒙恩。受(?)幸叩頭。材賈三百，唯子麗□□決賣之。今霍回又遷去，唯子麗必為急賣之。子麗校圖圖□□，必賜明教。叩頭幸甚幸甚。謹圖圖□奉錢再拜子麗足下，塞當曲□。張君長。”簡EPT六五·一二〇：“尉史並白：教問木大小賈。謹問木大四韋、長三丈，韋七十。長二丈五尺，韋五十五。●三韋木，長三丈放

百六十。椽木長三丈，枚百。長二丈五尺，枚八十，毋櫚槩。”均是其證。

例(五)：東書二封。其一封，大煎都候，詣府。一封□□□□□。

正月己亥昏時受關佐楊籌。

(《敦》八〇三A)

言卻適卒候薪留維。日失中過顯明。

(《敦》八〇三B)

“籌”寫作“𦵏”，應改釋作“禹”。居延簡一〇三·二(《圖》一三五)“□月廿八日禹償陽□”；簡三〇六·二五(《圖》四二)：“檄到禹等詣城尉官”。其“禹”字均如此作，“楊禹”，關佐的姓名。

“候薪”之“候”寫作“𠂔”，應改釋作“取”。居延簡四四八·二(《圖》五六)：“□閏月己亥自取”；簡四四八·四(《圖》五六)：“六月食三石。閏月己亥自取，止姦隲卒繇□”。其“取”字均如此作。“留維”之“維”，寫作“𦵏”，疑當改釋作“緝”，迺“遲”字的別體。居延簡一三三·二三(《圖》二一六)：“臨木卒戎付誠勢北隧卒則。界中八十里，書定行九時，留遲一時，解何？”其“留遲”文義與此簡同。“日失中”之“日”誤釋。“日失中”，時段名，居延簡一三二·二七(《圖》一四八)文中有“十月甲辰日失中時誠北卒”一句，即是其證。又簡五六·四一(《圖》四四二)和簡七八·四四(《圖》二一三)中則作“日失”。從文獻記載考查，“日失”又作“日昃”、“日跌”、“日昃”、“日仄”、“日側”等，指太陽開始偏西，相當於未時，即下午兩點左右。故《敦》八〇三B，應改作“言卻適卒取薪留緝。日失中過顯明”。背面的這段記載，旨在說明正面的“東書兩封”，為何到“正月己亥昏時”，纔從關佐楊禹手裏收到。

例(六)：戍卒潁川郡郊邑子長里狐柱。

(《敦》八一七)

此簡屬於戍卒名籍。“郊邑”之“郊”，寫作“邲”，應改釋作“郊”。居延簡三八七·七，五六四·一五(《圖》四二)：“□夷狄貪而不仁，懷俠二心，請偽”中之“俠”字右半部，和“邲”字左偏旁相類。《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潁川郡條屬下有“邲”縣，根據此簡方知“邲”縣當為“郊邑”，可補載籍之缺。又《敦》八二九A·B：“富貴隧戍卒潁川郡陝業丘里張丁四石具弩一，射百六十步”。其“陝”字亦當為“邲”字之誤，但係原簡誤書。

例(七): 五鳳三年三月丁丑朔癸卯, 士吏帶敢言之候官。隧和吏妻子, 私從者三月廩名籍一編敢言之。

(《敦》九九八)

此簡屬於上呈文書。“隧和”兩字, 不通且費解。有同志主張將“候官”與“隧”連在一起讀, 亦與此類文書格式不合。因簡文筆跡模糊, 誠難辨認, 經過仔細觀察圖版殘留筆跡, 反覆揣摩和推敲文意, “隧和”兩字應當改釋作“謹移”。這樣, 此簡便文從字順了。

與此簡同時出土的, 還有“始建國二年泰月盡三年二月候舍私從者私屬廩致”(《敦》三五八)的標題簡和一大批吏妻子和私從者廩名籍的帳簿本文。如《敦》三四四: “門下史馬剛, 米三斗。從者一人, 麥一斛。□”; 《敦》三四五: “從掾位田褒, 米三斗。私從二人, 麥二斛”; 《敦》三四九: “賀子使男嘉, 六月食麥一石八斗八升半升”; 《敦》三五〇: “賀妻大女君經, 六月食麥一石八斗八升半升”; 《敦》三五二: “良妻大女君敬, 十一月食麥一石八斗八升半升”; 《敦》三五四: “臨子使女廉, 十一月食麥一石五斗二升”等均是其證。

例(八): □□□□□東西遷界毋擊人民越塞其曰出入者

(《敦》一二七九)

簡文筆跡嚴重漫漶不清, 確難辨認。“遷”似應改釋作“盡”。“毋擊人民”, 似應改釋作“毋殺人與(?)”。“其曰”兩字筆跡比較清楚, 寫作“天田”, 應改釋作“天田”。《敦》一七一四: “六人畫沙中天田六里, 率人畫三百步”, “天田”兩字即如此作。居延簡中屢見, 如簡二四·一五(《圖》二一七)候長武光、候史拓: “七月壬子盡庚辰積廿九日, 日迹從第卅隧北盡鉗庭隧北界, 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簡EPT五八·一七: “收降候長賞、候史充國: 四月乙巳日迹積一日, 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 遇丙午日出一干時, 虜可廿餘騎萃出塊沙中, 畧得迹卒趙蓋衆; 丁未日迹盡甲戌積廿八日, 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sup>⑤</sup>均是其證。且簡二四·一五中的草體“天田”兩字, 亦如此作。“者”, 根據上述此類簿錄正文體例, 疑當改釋作“迹”。

例(九): 永始四年五月癸卯朔癸丑 □

佐昌謹其御王寵樂詡 □



(《敦》—二九四)

此簡為兩面觚。其寫作“𠂔”，應改釋作“與”。居延簡一五八·七(《圖》一九一)文中“願毋與令史王敞言”；簡二六〇·二〇B(《圖》四三一)文中“幸與”。其“與”字均如此作。

“御”寫作“𠂔”，應讀作“御”。“御”在簡文中相當於“御者”，即指駕馭車馬的人。“寵”寫作“忠”，應改釋作“忠”，即指御者的名。

“襍詗”兩字，寫作“襍詗”，應當改釋作“襍診”。《敦》一七二二：“隧長常賢レ充世レ綰レ福等襍度索部界中，問戌卒王韋等十八人，皆相證”；居延簡二五五·二七(《圖》九三)：“□案捕，驗亡人所依倚匿處，必得。得詣如書，毋有令吏民相牽證任爰書，以書言。謹襍與候史廉、辭北亭長歐等八人，戌卒孟陽等十人，搜索部界中，驗亡人所依匿處，爰書相牽”；其“襍”字正如此作。且文例和文義亦同。

“襍”與“雜”通，《漢書》卷四四《衡山王傳》：“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說文·言部》：“診，視也。从言，殸聲。”其“診”字右半部正如此作。“診”，意即察看驗問。這一句應當讀作“佐昌謹與御王忠襍診”，意思便一目瞭然了。

例(一〇)：所賣布疎。□厭郭成，買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始樂尹虎，買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索卿以萬貫范融買□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長生趙伯二石；九斛。前付卿為人。

(《敦》—四六四A·B)

此牘為賣布的帳簿簿錄。“萬”寫作“𠂔”，與同牘背面的“前”字，完全相同，故亦應改釋作“前”纔是。居延簡一七八·一四A·一九〇·三六A(《圖》二九〇)文中“前子淵佳君⑤，幸哀家孫”；簡五〇六·九B(甲一九九六B)：“水肩塞尉印，十月壬戌卒周平以來。即日嗇夫□發尉前。佐相”。其“前”字均如此作。但“前”和“萬”字的草體形近，如《敦》一三〇〇：“尚書臣昧死以聞。制曰可。賜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人三萬；校尉史、司馬、候丞，人二萬；書佐、令史，人萬。”即是其證。所以，如何準確辨認，還需結合前後文義。在此牘中，“索卿以萬貫”，則讀不通。“買□”之“□”，從殘留筆跡和上下文義，可以補釋作“布”。如果將“萬”釋作“前”，則讀作“索卿以前貫范融買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便讀通了。“為人”，疑應當改釋作



“為入”。前兩筆帳，屬於現在賣出的，直穀二石八斗，後兩筆帳，直穀六石二斗，雖然屬於以前賣帳賣出的，但也在記帳以前已付給了索卿。故索卿所賣出的布，共計直穀九斛，也就是九石。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所賣布踈”的全部內涵。

## 二、居延漢簡

例(一)：𠄎 律與作

(二八二·一四 《圖》二六二)

此簡屬殘觚，《考釋》⑦、《甲乙編》⑧、《合校》⑨均作如是釋，非是。于豪亮先生曾指出，“律與作”迺“辭具此”之誤釋⑩，甚是。

居延漢簡中的“辭”字，隸體通常寫作“𠄎”，左偏旁“受”，草體寫作“失”，如簡一四二·三五（《圖》二三八）：“𠄎 石，五月辛亥，甲渠令史誼受當遂里張容”；簡二二五·二一（《圖》三〇八）：“𠄎 入，立和受薰火不起𠄎”；簡二八六·二八（《圖》三〇〇）：“●元壽六月受庫錢財物出入簿”；均是其證。故此簡中的草體“辭”，寫作“𠄎”，下述簡文中的“辭”，如簡三·二（《圖》五六九）：“收責報，會月十日，謹以府書驗問子都名親辭：故居延令史喬子功”；簡一四六·一七（《圖》五三六）：“●右戌卒張固辭”；簡二二〇·一七（《圖》二八七）：“𠄎 後以衛卿檄驗問卒函 等六人，辭皆曰”；均如此作。又簡一二四·一三（《圖》五五二）：“𠄎 拜”，其“拜”字，亦可能是草書“辭”字的誤釋。

“具此”兩字的隸體，如簡三九·二五（《圖》三四六）：“𠄎 死 = 罪 = 對具此”；簡三一·一九（《圖》三六七）：“𠄎 以行塞，令吏卒射，折傷兵，不以時付折傷簿，叩頭死罪對具此”；均和今天的楷體相同。此簡中的“此”字左端筆跡已經脫落，簡二七·二六（圖三三五）：“𠄎 子，甲渠守候 謂第四候長建等，檄到，傳寫此”。其“此”字寫作“𠄎”，正與此簡相同。

“辭具此”，迺劾狀等文書結尾時的習慣用語。如簡EPT五二·二二一：“𠄎 毋長吏使劾者，辭具此”；EPF二二·三八七：“詣官。往來積私去署八日，除往來日，積私留舍六日，辭具〔此〕”；EPF二二·三九四：“以何日到止害，言已，毋所復聞，辭具此”。均是其證。又簡EPT六八·二八、

三九 — 四〇、七六、一五六等劾狀文書中的結束語“狀具此”，均亦與此文例相類。

例(一二)：尉史□再拜言□□□□叩頭言□□萬□死尚欲  
□治家願取急 □□死罪再拜謁

(三·一六《圖》五七六)

此簡出土於A8(破城子)，屬於上呈文書的草稿。簡文筆跡漫漶不清，經過仔細辨認，尉史後面之“□”，作符號“△”，代表尉史之名，讀作“尉史某”。“□□□□”，疑應補釋作“□□候史□”，“候史”前面之“□□”，雖不能確認為何字，但應為某部之名稱；“候史”後面之“□”，雖亦無法確認，但應為候史的名字。“叩頭言”後面之“□□”，疑應補釋作“父妾”。“萬”字後面之“□”，亦作一符號“△”，“萬”為姓，“△”為名，讀作“萬某”。“尚”，疑應改釋作“詣官”，“欲”後面之“□”，疑應補釋作“去”。“死罪”前面之“□□”，疑應補釋作“叩頭”。現將經過補正後的簡文並加標點如下：“尉史△(某)再拜言：□□候史□叩頭言，父妾萬△(某)死，詣官欲去治家，願取急，叩頭死罪再拜謁。”大意是說，甲渠候官屬吏尉史某報告說，某部候史某因其父妾萬某身死而來到候官，要求請假回家治理喪事，請予批准。“取急”，或作“取寧”。《漢書·高帝紀》：“漢高祖嘗告歸之田。”注引《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居延漢簡中記錄候長、候史、隸長等因親屬包括父親、母親、父姊、嫂、妻子不幸死亡而請假(即“取急”或“取寧”)回家奔喪的簡文頗多。如簡三·二二，三·二三(《圖》五二六)、簡三三·二二(《圖》一八三)、簡五二·五七(《圖》一九〇)、簡五九·三九(《圖》三二九)、簡一〇〇·一〇(《圖》四〇)、簡一八一·一一B(《圖》六三)、簡一八五·二九(《圖》二六一)、簡二三二·一二(《圖》八三)、簡二六四·一〇(《圖》二一九)、簡三一·二·二四(《圖》二五四)、簡EPT四八·一三八、簡EPT五〇·九、簡EPT五〇·九三、簡EPT五一·五六三、簡EPT·五二·二一三、簡EPT五二·三六七、簡EPT五三·七一A·B、簡EPT五四·三、簡EPT六五·五四、簡EPT六五·三六八、簡EPS四T二·一四四A等均是其證。特別有興趣的是，還保存了一份異常珍貴的完整冊書，如簡五七·一A、B：“永光

二年三月壬戌朔己卯，甲渠士吏疆以私印行候事敢言之。候長鄭赦父望之不幸死，癸巳予赦寧敢言之。 / 令史充。”與此事密切相關的簡文還有簡一四五·三〇（《圖》一八七、二一五）：“渠候長、樂得萬歲里、公乘、鄭赦，年卅七□”，簡一六〇·一四、一五（《圖》五一二）：“移樂得萬歲里、鄭真自言：夫望之病不幸死，子男赦謚甲渠候長，願以令取寧，即日遣。書到日盡遣如律令。”又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六號漢墓所出《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木牘五正）載云：

“郊令華喬，十月廿一日母死，寧；  
襄贛左尉陳襄，十一月廿日兄死，寧；  
□□丞□□□，□月廿八日伯兄？死，寧；  
利成丞兒勳，八月十九日父死，寧；  
厚丘左尉陳逢，十月十四日子男死，寧；  
曲陽尉夏筐，十月廿五日伯父死，寧；  
•右六人寧。”⑪

亦可資佐證。

例（一三）：臨桐縣長□仁 九月奉錢六百以償朱子文。自取

（六·一七《圖》一九三）

簡文漫漶不清，經過仔細辨認，“□”，寫作“趙”，似應補釋作“趙”，姓。草書簡七一·一（《圖》一六九）：“第三隧長趙匡”；簡五六〇·二五B（《圖》六五）：“樂得騎士常利里趙湯”；其“趙”字均如此作。此簡係臨桐縣長趙仁，用他某年九月應領取的俸錢六百，以償還其所欠朱子文的債款，由朱子文本本人領取。簡二八二·九A·B（《圖》四九七、四九六）：“初元四年正月壬子，箕山縣長明敢言之：□趙子回錢三百，唯官以二月奉錢三□以付鄉男子莫，以印為信，敢言之。”屬於上行文書，乃箕山縣長明於初元四年正月壬子日上呈甲渠候官的報告，請候官准予用他二月應得的俸錢三百，以償還其所欠趙子回的債款。又簡二八五·一二（《圖》三七一）：“□官告第四候長徐卿：周利自言當責第七縣長季由□百，記到，持由三月奉錢詣官，會月三日，有”；屬於下行文書，即甲渠候官下達給第

四部候長徐卿的記，大意是說，周利曾借給第四部下屬第七縣長季由錢數百，請收到官記後，携帶季由三月應得的俸錢，於月三日來候官，以歸還季由所欠周利的債款。

例（一四）：□毋又世以府書召禹詣官先以證不

（一三三·一二（《圖》五八四）

此簡出土於A8（破城子），即甲渠候官所在地。“毋又”兩個字寫作“𠂇又”，疑筆跡有脫落。如草書簡一六一·一二（《圖》二九三）：“尉史李卿，六月盡八月奉二千七百。”其“尉史”兩個字寫作“𠂇丈”，與此簡相近，故“毋又”疑應改釋作“尉史”，讀作“□尉史世以府書召禹詣官，先以證不”，則文從字順了。“尉史世”，乃甲渠候官負責文書的屬吏。“府書”，可能是居延都尉府或張掖太守府下達文書的畧稱。簡EPF二二·一二：“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都鄉嗇夫官以廷所移甲渠候書召思詣鄉，先以證財物故不以實，臧（贓）五百以上，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言請（情）者，以辭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與此簡文例相類。

例（一五）：□□始梧實先鋪食吞五丸

（二六五·二A《圖》一四七）

此簡屬於如何服食丸藥的藥方。“□始梧實”，不能通讀。經仔細辨認，“始”字乃“如”字之誤釋；“□”，可補釋作“大”；“梧”字，應隸定作“梧”。“梧”，木名，即梧桐。《詩·大雅·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禮·雜記上》：“暢白以掬，杵以梧。”“大如梧桐”，乃指所服用的丸藥猶如梧桐樹結的果實一般大。簡文應讀作：“□大如梧實，先鋪食，吞五丸。”係交待每枚丸藥的大小；應在飯前服用，每次吞食五丸⑫。

例（一六）：各持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其印綬吏五萬又上子一人  
人名尚書卒長□

奴婢二千賜傷者各半之皆以郡見錢給長吏臨致以安百姓也  
早取以見錢□

（二六七·一九《圖》二六八）

簡文共兩行，下端有斷缺，第一行“卒”字和第二行“也”字以下已漫漶不清。從殘留筆跡來看，“卒”下“長”字，似為“民”字之誤釋。另



外，第一行“印綬吏”前之“其”字，似應改釋作“與”字。此簡係對遭受羌人殺傷的吏卒、庶民和奴婢，進行撫卹的下行文書。具體來說，根據被害者身份、地位和受害程度（是被殺死，還是被殺傷），分為以下五種情況：第一，“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所謂“下吏”，是與下文的“印綬吏”相對而言的，疑指沒有印綬的低級官吏。《左傳》哀十五年：“弔君之下吏。”《淮南子·主術》：“大臣專權，下吏恃勢。”第二，“與印綬吏五萬，又上子一人名尚書”；“印”指官印，“綬”，指繫官印的絲帶。《漢書·匈奴傳下》：“授單于印綬，詔令上故印綬。”《文選》張平子（衡）《西京賦》：“降尊就卑，懷璽藏綬。”對於被羌人殺害的“印綬吏”，不僅賜予葬錢五萬，而且準予上子一人的名字於尚書，這明顯比對“下吏”撫卹的待遇要優厚得多；第三，對“卒”和“民”被羌人殺害所賜的葬錢，雖因簡文漫漶不清而不詳，但推測它比“下吏”所賜的葬錢三萬要低，而比下文“奴婢”所賜的葬錢二千要高；第四，“奴婢二千”，即對於被羌人所殺害的奴婢，賜葬錢二千；第五，“傷者各半”，對上述“下吏”、“印綬吏”、“卒、民”和“奴婢”等四類人，僅被羌人殺傷而沒有致死的，則分別按各類人所賜葬錢的一半賜給，如“下吏”賜錢一萬五千，“印綬吏”賜錢二萬五千，其餘以此類推。並且特別強調，不僅要求全部發給郡府現錢，而且都讓長吏親自送去，為的使百姓迅速得到安定。

例（一七）：□紀哀 今調為第十候長代刑忠

（二八二·一二《圖》二六三）

“為”，因筆劃不太清晰，但排除干擾，仍可看清，寫作“𠄎”，應改釋作“守”。簡二六四·一六B（《圖》二一九）：“府所移大守府所移囚鍾武貴候長齊事，言府，會月十七日。”其“守”字正如此作。官吏試職稱守，《漢書·尹翁歸傳》：“（翁歸）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簡二八五·三（《圖》三七〇）：“修行孤山里公乘范弘，年廿一，今除為甲渠尉史代王輔”；簡EPT五八·二：“居延令史臨仁里孫定國，今居延甲渠候長代箕勝之”；均與此簡文例相類。據上引《尹翁歸傳》記載西漢守官需試守滿歲稱職，方可為真官。但居延新簡下述三冊有關吏調動的牒書所記載的情況，又顯然與此不同。



牒書(一)：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壬午，甲渠守候博謂第二隊長臨，書到，聽書牒署從事如律令。

EPF二二·二四七A

掾譚

EPF二二·二四七B

第二隊長史臨，今調守候長。真官到，若有代罷。

EPF二二·二四八

萬歲候長何建，守卅井尉。

EPF二二·二四九

牒書(二)：建武五年四月丙午朔癸酉，甲渠守候謂第十四

EPF二二·二五〇A

隊長孝，書到，聽書從事如律令。

EPF二二·二五一

掾譚

EPF二二·二五〇B

第十四隊長李孝，今調守第十守士吏。

EPF二二·二五二

第十士吏馮匡，斥免缺。

EPF二二·二五三

牒書(三)：建武五年四月丙午朔癸酉，甲渠守候謂第十守

EPF二二·二五四A

士吏孝，書到，聽書從事如律令。

EPF二二·二五五

掾譚

EPF二二·二五四B

第十守士吏李孝，今調守萬歲候長，有代罷。

EPF二二·二五六

萬歲候長何憲，守卅井塞尉。

EPF二二·二五七

牒書(一)，因甲渠候官所轄萬歲部候長何建遷為“守卅井尉”，於是甲渠候的長官守候博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乙亥朔(初一)壬午(八

日)下達牒書,調第二隊長史臨任萬歲部守候長,且特別注明:“真官到,若有代罷。”似乎應理解為第二隊長史臨,從調任萬歲部守候長時,即已成為真官,如果在此以前有代理該職務的,即同時免去。

牒書(二)和牒(三),均屬於有關李孝調動職務的牒。牒書(二),因甲渠候官所轄第十部士吏馮匡被“斥免”,於是甲渠候官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四月丙午朔(初一)癸酉(二十八日)下達牒書,調第十四隊長李孝任第十部守士吏。“斥”,意即驅逐、廢棄。《漢書·武帝紀》:“興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注:“斥謂棄逐之。”所謂“斥免缺”,係因廢棄免官而該官職空缺。特別巧合的是,第十部士吏馮匡因“軟弱不任吏職”而被“斥免”的史實,原原本本地保存在下述“劾狀”和“●狀辭”中:

“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乙亥朔(初一)丁丑(三日),主官令史譚敢言之。謹移劾狀一編敢言之。

甲渠塞百石士吏、居延安國里公乘馮匡,年卅二歲,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三月己亥除署第四部,病歿(咳)短氣,主亭隧七所咋呼,七月國除署第四(第十)部士吏,匡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

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丁丑,主官令史譚敢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

●狀辭:公乘、居延戛汗里,年卅九歲,姓夏侯氏,為甲渠候官斗食令史,署主官以主領吏備盜賊為職。士吏馮匡,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七月壬辰,除署第十部士吏,案匡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

五月丁丑,甲渠守候博移居延,寫移如律令。/掾譚

EPT六八·一 —— 一二

值得注意的是,因萬歲部候長何憲,遷任為“守卅井塞尉”,於是甲渠候官又於同年同月同日下午達牒書(即牒書(三)),調尚未赴任的第十部守士吏李孝,遷任萬歲部守候長。從後面特別注明“有代罷”來看,亦應理解為第十部守士吏李孝,從調任萬歲部守候長時,即已成為真官。但不知這種情況屬於西北邊郡地區的常制,還是屬於臨時的特例。

例(一八): 廿斤      廿斤      廿二斤半      十斤  
廿一斤半      廿七斤半      廿五斤      ●凡肉五百卅一斤直二  
廿九斤      廿六斤半      廿斤      千一百六十四脂六十三

廿三斤半	卅斤	廿九斤	斤直三百七十八脂肉并
廿六斤半	卅斤	廿一斤半	直二千五百卅二
卅斤	廿五斤	十八斤	凡并直三千二百一十二
卅六斤	廿七斤	廿三斤	脂肉六百四斤

(三八六·一九A《圖》二四三)

頭六十	肝五十	乳廿
肺六十	迹廿	舌廿
胃百□百錢	頸十錢	界十
寬卅	心卅斤	□十
二百	黃將十	

腸益卅 賣雉直六百七十·凡四百五十

(二八六·一九B《圖》二四四)

此簡屬於“賣雉”直錢帳簿。“雉”，亦作“售”，《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酒雉數倍。”《集解》引《如淳》曰：“雉亦售。”《索隱》引《樂府》云：“借‘雉’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貰飲，且雉其數倍價也。”簡號“三八六·一九A”，應改作“二八六·一九A”，係排印之誤。此簡為木牘，正反兩面均記載，但根據先分計、後總計的順序，“二八六·一九A”似應改作“二八六·一九B”反之，“二八六·一九B”應改作“二八六·一九A”。牘的正面分別記載頭、頸以及心、肝、肺等“內臟”的名稱與價錢的分計、總計。“胃百□”之“□”，寫作“𦰩”，筆跡很清楚，下部為木，疑應補釋作“葉”。“百葉”乃牛羊等之胃，多皺褶，故名。《周禮·天官·醢人》：“羸醢·脾析”，漢鄭玄注：“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準“胃百葉，百錢”之例，“二百”之上尚缺品名；“心卅斤”乃“心，卅錢”之誤，係原簡誤書。“界十”，下部筆跡稍有剝蝕，寫作“𦰩”，通作“脾”。“□十”之“□”，上部筆跡漫漶不清，下部筆跡似有多餘的筆劃，乃後來添加上去的，經過辨認和剔除，“□”係上下結構字，下部寫作“月”，上部寫作“𦰩”，松章本《急就篇》“辭窮情得具獄堅”，其“堅”字上部正如此作，故“□”疑可補釋作“腎”，俗名腰子，亦稱內腎，左右各一。《難經·三十六難》：“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經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簡二五八

一三(《圖》二三六):“出錢廿,買腎二具給御史”,其“腎”字寫作“腎”,亦與此簡相類,且價錢亦相近。又簡二三三·一A·B:“胃,百(錢),候長王卿取;述,百卅(錢),候長王卿取;凡,五十(錢),候長王卿取;腸,八十(錢),董子恩取;脯,八十(錢);董子恩取。”其所載內容亦與此簿相類。脾、肺、腎、肝、心,合稱五藏(臟)。《管子·水地》:“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又《書·盤庚下》:“今予其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唐孔穎達疏:“以心為五臟之主。”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可總稱之為“雜碎”。木牘反面第一行“廿斤”起至第四行“十斤”止,為肉重量之分計;“•凡肉五百卅一斤,直二千一百六十四(錢)”,為全部肉重量和價錢的總計。但肉重量之分計加起來應為“五百卅一斤半”,比總計“五百卅一斤”多半斤,可能是在計算總數時,有意抹掉多餘半斤的尾數,共計肉五百四十一斤,直錢二千一百六十四,平均每斤肉合四文錢;“脂六十三斤,直三百七十八”,平均每斤脂(油)合六文錢。脂和肉錢合計,價錢為二千五百卅二。如果再加上木牘正面所記載的“雜碎”錢六百七十,正好總計值錢三千二百一十二。脂、肉共重六百零四斤。根據此簿所記脂、油的總重量和脂、肉、“雜碎”的總價錢,很可能是一頭整個的牛。簡二三七·二六(《圖》一七):“正月丁未,買牛肉十□□”;“十”下之“□”,日本學者永田英正教授補釋作“斤”,甚是。又簡二六九·五(《圖》八):“四月辛酉,買牛肉百斤治脯,付功房內畢。”“脯”,乾肉。《詩·大雅·鳧鷖》:“爾酒既滑,爾殽伊脯。”《玉臺新詠》三國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治脯”,意即製作牛肉乾。簡二三七·四六(《圖》五四七):“二月壬寅,買脂五十斤,斤八十□”。簡文漫漶不清,準以此簿脂價每斤值錢六文律之,“斤八十”,疑應改釋作“斤十(錢)”,比較合理。簡四一三·六A(《圖》一〇九):“出羊一頭,大、母,子程從君巨買,賈(價)泉九百;出羊一頭,大、母,子程從君巨買,賈(價)泉九百泰十五;出羊一頭,大、母,勒君兄買,賈(價)錢千;出羊一頭,大、母,君巨去時與巨相用紉伯通,今子程買,賈(價)泉千”。“紉”,寫作“饅”,可能是原簡於“饅”字的誤寫,《甲乙編》改釋作“饅”,似可從。饅有兩義,其為一祭享鬼神,另一為饋贈,即以食供人,通“饋”。此



簿似為後者。

例(一九):曹宣伏地叩頭白記

董房馮孝卿坐前萬年毋恙頃者不相見於宣身上部屬亭  
迹候為事也毋可憂者迫駒執所辱故不得詣二卿坐前遣

(五〇二·一四A,五〇五·三八A,五〇五·四三A《圖》二四)

毋狀願高賞卿到自愛怒力加意慎官事叩頭幸甚  
宣在驢喜鰲去都倉四十餘里獨第六際卒杜程李侯  
常得奏都倉二卿時時數寄記書相問音聲意中快也實中兄

(五〇二·一四B,五〇五·三八B,五〇五·四三B《圖》二三)

此簡屬於曹宣給董房和馮孝卿兩人的書牘，非常完整，殊足珍貴。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有多處釋文隸定有誤，以致不能通讀。如A面第三行“為事”後之“也”字，疑應釋作“它”字，連下讀作“它毋可憂者”。“迫駒執所辱故”中之“辱”字，應釋作“屬”，第一行倒數第二字“屬”正如此作。“故”字疑應改釋作“吏”，果真如此，這一句應讀作“迫駒執所屬吏”，做為解釋“不得詣二卿坐前”的原因。第三行最末所釋的“遣”字，顯然是“甚”字的誤釋，B面第一行倒數四個字“叩頭幸甚”中的“甚”字正如此作。且將“遣”字改釋作“甚”字後，和緊接B面第一行開頭的“毋狀”兩字，構成“甚毋狀”一句，便文從字順了。“毋狀”、“數毋狀”、“甚毋狀”、“尤毋狀”一詞，居延簡中屢見。如簡三三·五A(《圖》一七八):“頭死罪死罪，職事毋狀，當坐，罪當□”；簡二一〇·三二(《圖》二九三):“□(毋狀)，記到，遣昌詣官”；簡二七·二(《圖》五〇三):“□數毋狀，當坐，罪當死□”；乙附四七:“城北候長充職事數毋狀，詣官自繫，八月甲申平旦入”；簡五五·一三，二二四·一四，二二四·一五(《圖》二五三):“任小吏忘為中程，甚毋狀，方議罰。檄到，各相與卻校定吏當坐者言，須行法”；簡一五六·三五(《圖》一七〇):“虛積八日。解何？甚毋狀。檄到□”。均是其證。上述簡文中的“毋狀”大都是指職事無善狀。《史記》卷二《夏本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注引《索隱》:“言無功狀。”又同書卷八四《賈誼列傳》:“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書牘中的“甚毋狀”，應當理解為甚無禮。《史記》卷七《項羽本紀》:“諸侯吏卒異時故鯨使屯



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過之多無狀”，與書牘中的“甚毋狀”意同。

例(二〇)：入南書五封。

三封都尉印一詣府一詣□□太守府六月九日責戍屬行謹□在尉所詣□壽掾草

一合渠甲塞尉印詣會水塞尉六月十一日起一□史候史印詣官六月十八日起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平旦時囊他賡長萬世受破胡弛刑孫明。

(五五二·三，五五二·四《圖》一〇三)

此簡出土於查爾科帖，屬於傳遞郵書的記錄。所謂南書，係指從北面的居延都尉府寄往南面的肩水都尉府和張掖郡太守府等的文書。“入南書五封”，意即收到寄往南面的五封文書。整個簡文的下半段異常難認，尤其是第二行從“六月九日”以下完全無法釋讀，目前祇好存疑。“三封”之“三”，應當改釋作“二”，所多的一劃，是“入南書五封”之“封”字的末筆。“都尉印”是指寄發文書的居延都尉的印章。“一詣府”之“府”，是送往肩水都尉府。“一詣□□太守府”，應指送往張掖太守府，但怎麼看“□□”兩字，既不像張掖，也不像設屏，姑且存疑。“一合”，迺一封合檄的畧稱，簡EPT49·29、EPT49·45A、EPT51·379、EPT51·416A等均是其證。

簡一五七·一四(《圖》三六二)：“北書三封，合檄、板檄各一。其三封、板檄，張掖太守章，詣府。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太守府牛掾在所。九月庚午下舖七分，臨木卒副受卅井卒弘，鷄鳴時當曲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三分，□行一時二分。”即是其證。“□行一時二分”，以往釋文讀作“實行七時二分”，非是。因為“實行”和“定行”語義相同，均是指實際行書的時間。仔細審視圖版，“□行”應當補作“疾程”。按照當時步行傳遞郵書的速度規定，每小時當行十里，簡EPT五〇·一〇七：“□八分，臨木蔭卒僕受誠勢北隧卒。□隧卒世。去臨木蔭十七里，當行一時七分。□中程”；EPC·26：“□正月戊午夜半，臨木卒實受誠勢(北)卒勝。己未日入，當曲卒□付收降卒海。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二時，過程二時二分。”均是其證。故“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三分，〔疾〕程一時二分”，將定行(實際行書)八時三分加上疾程(提前到達)一時二分，正好是九時五分，這就是當時所

規定步行傳遞郵書，“界中九十五里”所“當行”的時間。“渠甲塞尉”，即“甲渠塞尉”，係記錄時將“渠甲”兩字顛倒。“一□史”應改釋作“一單”，即一封為單檄的畧稱<sup>③</sup>。所謂“單檄”，與上述所舉出的“合檄”相對而言。“單”寫作“𠂔”，《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單衣蔽膝布無尊”，“單”字正如此作。居延簡中的“單”字隸體，如簡EPT四〇·六九：“窮虜勝長單立”之“單”，寫作“𠂔”，而在簡二八八·三〇（《圖》一一三）：“橐他莫尚卒單崇”、簡五六二·四（《圖》八八）：“匈奴呼韓（邪）單于”、簡EPT四〇·五和簡五一·一五九中的“單充”、簡EPT四三：“鉶庭卒董憚、單昌、沐渾”之“單”字，均已簡化寫作“𠂔”，故知此簡中的“單”字，迺是在上述簡文中的隸體“單”字的基礎上，進一步簡化演變而來的。“六月十八日起”一句之“八”，雖因筆跡模糊難以辨認，但因下行記載這些郵書均於六月十七日平旦時已經收到，故單檄一封最遲也應當於六月十七日平旦前發出，纔合情理。“橐他勝長”一句，應當改作“橐他弛刑”。“弛刑”兩字，緊接於下面文中的“破胡弛刑”亦如此作。由“弛刑”負責傳遞郵書，亦見於簡EPT四九·二七：“入北第一橐一封。居延丞印，廿六日寓中……，弛刑唐陽行”；簡EPT四九·二八：“入北第一橐書一封。居延丞印，十二月廿六日日食一分受武彊驛卒馮斗即，弛刑張東行”。“即”疑應改作“昌”，“馮斗昌”，武彊驛卒姓名。“破胡弛刑孫明”之“明”，寫作“𠂔”，應當釋作“外”。簡EPT五七·三A、B：“蔡良買襲一領，直九百；絳一兩，直四百，凡千三百。出三百，償第八卒鄧外，今餘見千”；簡EPW·一二三：“□卒孫外人”；《敦》九八三：“捕律：亡入匈奴外蠻夷守棄亭鄣逢虜者，不堅守，降之；及從塞徼外來絳而賊殺之；皆要斬。妻子耐為司寇作如”；《敦》一二七二：“步廣候官破虜隧戍卒宋外，承弦二”。其“外”字均如此作。儘管前面已經指出，第二行從“六月九日”以下，因簡文嚴重漫漶不清，完全無法釋讀，所以，現在釋讀的“責戍屬行謹□在尉所詣□壽掾革”這一大段文字，其中肯定錯誤很多，但目前亦無法更正。不過根據整個簡文的格式和體例，我們還是可以推測它的大概內容。據我推測，“六月九日”下面第一個字，很可能是“起”字，緊接下面的文字應為：一封，某某印，詣某某，六月某日起。這祇有待將來用紅外線拍照原簡方能辨認。

## 注 釋

- ① 《敦》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上下（中華書局1991年6月版）一書的畧稱。“四九七”，通該書所編的釋文和圖版順序號，下同。
- ②⑤ 參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渠候官》上、下，中華書局，1994年12月版；下同。
- ③ 參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版，下同。
- ④ 參看勞幹編：《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1，臺北1957版，下同。
- ⑥ 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上、下，1980年7月版，下同。
- ⑦ 《考釋》指勞幹《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0，臺北1960年版）一書的畧稱，下同。
- ⑧ 《甲乙編》指《居延漢簡甲乙編》一書的畧稱，下同，參見注⑥。
- ⑨ 《合校》指《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的畧稱，下同，參見注③。
- ⑩ 參看《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版。
- ⑪ 參看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
- ⑫ 《武威漢代醫簡》簡三一五“治久欬（咳）上氣喉中如百虫鳴狀，卅歲以上方：茺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烏喙、薑各一分。凡六物冶合和，丸以白蜜（蜜）大如嬰（櫻）桃，晝夜含三丸，消咽，其汁甚良。”簡二九：“石鐘乳三分，巴豆一分，二者二分，凡三物皆冶合，丸以蜜（蜜），大如吾（梧）實。宿毋食，旦吞三丸”；簡七六：“相得丸之大如吾（梧）實。先鋪食，吞二丸，日再服藥一”；八三甲、乙（牘）：“樊石二分半，禹餘糧四分，藥米三分，厚朴三分，牡蠣三分，黃芩七分，凡六物皆冶合和，丸以白蜜（蜜）。丸大如吾（梧）實，旦吞七

丸，舖吞九丸，莫(暮)吞十一丸。服藥十日，知小便數多；廿日愈。公孫君方。”均與此簡文例相類。

- ⑬ “單檄”亦於大灣出土簡中一見，如簡五〇五·一九(《圖》七七)：“二月十四日，南單檄，詣城官，都吏郝卿印。受沙頭卒張翊，人定時”，即是其證。“南單檄”，是指向南傳遞的單檄。

# 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

高 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 目 次

- (一) 祠 令
- (二) 功 令
- (三) 祿秩令
- (四) 尊老、養老
- (五) 會計
- (六) 婚姻
- (七) 絮令
- (八) 行書令
- (九) 關津令
- (十) 知令
- (十一) 擊匈奴降者賞令
- (十二) 吏民毋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
- (十三) 禁鑄作錢、發塚、販賣衣物於都市
- (十四) 禁屠殺馬牛
- (十五) 吏民毋得伐樹木
- (十六) 管理無業者
- (十七) 罪人入錢贖品
- (十八) 守禦器品
- (十九) 烽火品約
- (二十) 伏虜品約



## 一、前言

漢代令文繁多，有“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之說。為便於查閱實施，當時就曾依次編輯成篇。如魏人如淳言，漢“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之分<sup>①</sup>。可惜早已佚失。清代以來，曾有人對散見的漢令爬梳整理，然因史料所限，輯錄多令名目而已，具體條文極少。半個多世紀以來，陸續出土的漢代簡牘，為研究這一時期的律令，提供了豐富資料。其中明顯屬於漢律的條文，筆者曾有論考<sup>②</sup>。今再將簡中所見令、品、品約等法規，輯錄成篇，畧作注考，以備研究者參考。文中所引簡文限於《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居延新簡》以及《敦煌漢簡釋文》。所列令文名稱，部分為原有名稱，部分迺筆者據其內容擬定。不當之處，望專家指正。

### （一）祠令（祠社稷）

1. 建武八年（公元32年）三月己丑朔，張掖居延都尉譙行丞事，城騎千人躬告勸農掾禹謂官縣令以春祠社稷<sup>③</sup>令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修治社稷，令鮮明。令、丞以下當……

掾盛、守屬業、書佐官<sup>④</sup>

〔附〕牒：三月廿六日甲寅齋<sup>⑤</sup>

2.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初五），張掖居延城司馬以近秩次行都尉文書事，以居延倉長印封，丞郎告勸農掾張、史尚謂官縣以令秋祠社稷，令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修治社稷，令鮮明。令、丞以下當侍祠者齋戒<sup>⑥</sup>，務以謹敬鮮潔、約省為故。張、尚考察不以為意者輒言，如律令。

掾陽、兼守屬習，書佐博<sup>⑦</sup>

〔附〕牒

八月廿四日丁卯齋<sup>⑧</sup>

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sup>⑨</sup>

以上兩文書是張掖郡、居延都尉逐級下達的關於春、秋祠社稷令。據說漢曾有專門規定祭祀社稷的法令《祀令》<sup>⑩</sup>，然而早已佚失。上述兩令或即《祀令》。顯然，它為我們瞭解漢代如何祭祀社稷，提供了珍貴資料。從中可以看出：

1. 據說，漢先立官社，後立官稷。但史籍語言不詳，學者莫衷一是。該簡證實，東漢初社與稷在一處並祭。

2. 漢簡說明，不僅雒陽以及各郡縣置有社稷，縣以下的各鄣也置有社稷。與上述兩令同一探方出土的一則文書云，令各塞治社稷，即是一證⑩。

3. 《後漢書·祭祀志》云，太社稷“一歲，三祠，皆太牢具”。郡縣“牲用羊豕”。而漢簡中的令文對此未作具體規定，僅原則上指示，祠社稷應“鮮絮約省”，即整齊清潔，節約簡省。“約省”也作省約。

4. 關於祠社稷的時間，按此令規定，春（三月）、秋（八月）兩祭的具體日期，所謂“吉日”，均由上級統一規定。

5. 從附件“牒”中得知，侍祠者，須兩天前“齋戒”。漢時重視“齋戒”。“齋戒不謹”為一罪。如《漢書·功臣表》載，孝景二十一年，嗣侯蕭勝坐不齋耐為隸臣。《百官公卿表》載，元狩五年：“衛尉充國坐齋不謹棄市”。

## （二）功令

有關《功令》的簡有十餘枚。先將署名《功令》第四五的簡抄錄如下：

1. • 功令第卅五：候長、士吏皆試射，射去墀⑫，幣⑬，弩力如發。弩發十二矢，中幣矢六為程，過六矢賜勞十五日⑭。

2. • 功令第卅五：候長、士吏、墜長皆試射⑮，射去墀幣□

《合校》45·21

3. • 功令第卅五：士吏、候長、蓬隧長常以令秋試射，以六為程，過六賜勞，矢十五日⑯。

《合校》285·17

4. • 功令第卅五：候長、士吏、墜長皆試射，射十□

《新簡》EPT 51:417

5. • 功令第卅五：士吏、候長、蓬（烽）墜長常以□

《新簡》EPT 51:466

6. • 功令第卅五：士吏、候長、蓬（烽）墜長常以令秋射，發矢十二□

《新簡》EPT 53·34

7. □墜長常以令秋射，發矢十二，以六為程，過六賜勞，矢十五日□

《合校》270·23

8. 蓬(烽)隧長常以秋試射，發矢十二，以六為程，過六

《合校》142·16

9. 中帶六為程，過六及不滿六賜、奪勞，矢各十五日

《新簡》EPT 11:1

10. 弩，發矢十二，中帶，矢六為程，過六若不帶六，矢賜、奪勞各十五日。

《新簡》EPT 56:337

參之以上諸簡文，可以認為《功令》第四五的內容，大致如下：

《功令》第四五：候長、士吏、燧長試射。射去墦帶，弩力如發，弩發十二矢，中帶矢，六為程，過六矢及不滿六矢，每矢賜、奪勞各十五日。

《功令》，漢令篇名，見於史籍。《史記·儒林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之嘆也”。《漢書·儒林傳》載，公孫弘為學官，“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何謂《功令》？諸家解釋不一。《史記·儒林列傳》索隱：“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學令是也”。《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沈家本《漢律摭遺》卷一：“當以《索隱》之說為是。《玉海》列功令於各令之中。今人言功令者，若云公家之令，不知何所本？《通俗篇》以為非”。筆者案，《漢書·儒林傳》所記為選拔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等文官的令文。本文所錄簡中所見《功令》第四十五，為考核邊塞軍官的令文。參考這兩處的令文，可以認為《功令》當是選拔、考核官吏的令文集，其中有若干條。王應麟《玉海》卷六十五說“太常著功令”，此說不確。《功令》作為一種令集，不可能是某一機構所頒佈。

附：居延簡中有都尉府下達的關於開展“秋射”的“府書”一件和關於記錄“秋射”成績的若干支，現抄錄如下，便知道《功令》第四五條是如何貫徹執行的，同時也有助於瞭解漢代所謂“積功勞昇遷”的官吏選拔制度。

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九月庚辰朔己酉，甲渠候漢疆敢言之。

府書①曰：“候長、士吏、蓬(烽)隧(燧)長以令秋射署功勞②。

長吏雜試⑩。臬□封⑪，移都尉府。謹移第四燧(燧)長奴□□□□  
□□□敢言之。《合校》6·5

這一則都尉府書說明：

第一，漢代邊塞烽燧每年秋季舉行“試射”，故稱“秋射”。此令明書“秋射”，與此制相應。

第二，各邊塞烽燧的秋射，由都尉府領導。到時，都尉府“移府書”於所屬候官。試射後將考課成績上報都尉府。如以下各簡所記：

(1) 居延甲渠候官當曲燧(燧)長公乘關武，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以令秋試，射發矢十二，中帶□□ 《合校》133·14

(2) 張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長公乘樊立，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以令秋試，射發矢十二，中帶矢十二 《新簡》EPT 50:18

(3) 居延甲渠候官第廿七燧(燧)長士伍李宮，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以令秋射，發矢十二，中帶矢六，當

《新簡》EPT 52:95

有關簡文說明，各塞官吏秋射成績，最後可能上報郡太守審覈、獎懲。如：

(1) ·右以令秋射，二千石賜勞名籍及令。《合校》267·11

這是對秋射成績優秀者賜勞的名冊，及命令。

(2) ·右秋射二千石以令奪勞名籍及令。《合校》206:21

這是對參加秋射成績不及格者奪勞名冊，及命令。

第三，“秋射”須由各有關機構負責人共同主持，所謂“長吏雜試”。

第四，射前須檢驗靶場是否合格。下有爰書一則，載明檢驗靶場的情況：“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九月壬子朔辛巳，令史充敢言之。爰書□□辟丈埽道，帶皆應令，即射。行候事、塞尉□□”(《合校》甲附16)。辟，通關。丈，丈量。埽道經過平整測量。一切皆符合法令規定。是由候長、塞尉負責檢驗的，並錄於爰書。

第五，因故未參加試射者，可以補試。以下兩簡可證：

(1) 各遠候長放昨日詣官上功，不持射具。當會月廿八日，部遠不及到部。謹持弩詣官射，七月丁亥蚤食入。《合校》203·18

(2) 臨木候長□昨日詣官上功，不持射具。□會□□□□□遠不及到部。謹持弩詣官射，七月丁亥蚤食入 《合校》203·24



以上兩簡的內容相同，即為未能按時參加試射者，開具補試證明，大意如下：香遠、臨木兩塞的候長前往參加秋射，即“上功”時，未攜帶射具，且路途遙遠，不能按時（本月二十八日）到部參加試射。特此證明，令其攜帶弩具於七月丁亥日蚤食（約上午10—11時）入場試射。

第六，試射成績要載入個人檔案。例如，以下一燧長的簡歷中就明確記有他三年參加秋射的情況及因此獲得的勞績：

居延甲渠候官第十燧（燧）長公乘徐譚功將，中功一、勞二歲。其六月十五日（係）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三年、四年秋試射以令賜勞。□令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居延鳴沙里，家去大守府千六十三里，產居延縣。為吏五歲三月十五日，其十五日，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陽朔元年（公元前24年）病，不為勞。居延縣人。

《新簡》EPT 50:10

### （三）祿秩令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四月丁巳朔辛巳，領河西五郡大將軍、張掖屬國都尉融，移張掖居延都尉，今為都尉以下奉②各如差。司馬、千人、候、倉長、丞、塞尉職間②都尉以便宜財予②，從史②田吏②如律令。

六月壬申，守張掖居延都尉贖、丞崇告司馬、千人官、謂官縣寫移書到，如大將軍莫府書律令。

掾陽、守屬恭、書佐豐

已讎②

居延都尉 奉穀月六十石

居延都尉丞 奉穀月卅石

居延令 奉穀月卅石

居延丞 奉穀月十五石

居延左右尉 奉穀月十五石

• 右以祖②脫穀給，歲竟②一移計③

居延城司馬、千人、候、倉長、丞、塞尉

• 右職間，都尉以便宜財予從史令田③④

這冊居延都尉以下俸祿秩別，是東漢建武初年，竇融佔據河西，稱河西



五郡大將軍時頒行的。漢代有關吏秩俸祿皆著於“律”<sup>②</sup>，故將此俸祿冊稱為“都尉以下吏俸”令。該令對吏俸祿的規定可分為三級，第一級，居延都尉至居延左、右尉，“奉月穀”若干石。第二級，居延丞司馬至塞尉，未規定月俸具體數額，而是由“都尉以便宜裁予”，即靈活掌握。第三級，從史等小吏，不發俸祿，而是令其從事田間勞動，自食其力，所謂“令田”。領取“俸穀”者所領穀數額，與常制相比，也很少。如簡中所見，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八月奉祿簿，候一人六千。尉一人二千，士吏三人三千六百。令史三人二千七百。尉史四人二千四百。候史九人（其一人候史拓有劾）五千四百<sup>③</sup>。此令雖名為都尉以下“吏俸”，實際上是發放生活費，是一種臨時措施。

#### （四）尊老、養老令

1959年、1981年於甘肅省武威市先後兩次發現有關“王杖”的詔令簡冊，主要內容是關於尊老、養老的法令。此外，在漢簡中還另有尊老養老令文若干枚，茲分別錄下：

##### （甲）王杖十簡

1959年秋，甘肅省武威縣磨嘴子第十八號墓中出土木簡十枚，史學家稱為“王杖十簡”。實為一法令集，其中包括兩道有關尊老的詔令和一則案例。簡上原有署名“《蘭臺令》第卅三”和“《御史令》第卅三”。現按原編次錄下：

制詔丞相、御史：高皇帝以來，至本（始）<sup>④</sup>二年（公元前72年），勝（朕）甚哀（憐）老小，高年受王杖<sup>⑤</sup>，上有鳩，使百姓望之比於節<sup>⑥</sup>；有敢妄罵詈、毆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節）第、行馳道<sup>⑦</sup>旁道；市賣，復<sup>⑧</sup>毋所與，如山東復。有旁人養謹者常養扶持，復除之，明在蘭臺<sup>⑨</sup>石室之中。王杖不鮮明，得更繕治之。

河平<sup>⑩</sup>元年（公元前28年），汝南西陵縣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類部游徼<sup>⑪</sup>吳賞，使從者毆擊先，用（因）訴，地太守讞<sup>⑫</sup>廷尉，報<sup>⑬</sup>；罪名明白，賞當棄市。

制詔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趨；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徵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sup>⑭</sup>二年

(公元前31年)九月甲辰下。

《蘭臺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卅三。尚書令減受在金。

孝平皇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幼伯生,永平<sup>⑮</sup>十五年(公元72年)受王杖<sup>⑯</sup>。

(乙)王杖詔書令

1981年9月,甘肅省武威縣農民袁德禮獻出一份近年在磨嘴子漢墓出土的題名“王杖詔書令”,共有木簡二十六枚。茲按原編次序抄錄如下:

制詔御史: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手)殺傷人<sup>⑰</sup>,毋告劾,它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鰥<sup>⑱</sup>,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寡,賈市毋租,比山東復。復人有養謹者扶持,明著令。《蘭臺令》第卅二

孤、獨、盲、珠(侏)孺(儒),不屬律人<sup>⑲</sup>吏毋得擅徵召,獄訟毋得繫(系)。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夫妻俱毋子男為獨寡,田毋租,市毋賦,與歸義同<sup>⑳</sup>;沽酒膠列肆。尚書令臣咸再拜受詔。

建始元年九月甲辰下<sup>㉑</sup>

汝南太守獻廷尉,吏有毆辱受王杖主者,罪名明白。制曰:獻何,應論棄市。

雲陽白水亭張熬,坐毆挫受王杖主,使治道。男子湯告之,即棄市。

高皇帝以來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憐耆老。高年賜王杖,上有鳩,使百姓望見之,比於節;吏民有敢罵毆詈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節第,行馳道中;列肆賈市,毋租,比山東復。

長安敬上里公乘臣廣昧死<sup>㉒</sup>上書:

皇帝陛下:臣廣知陛下神靈,復蓋萬民,哀憐老小,受王杖、承詔。臣廣未嘗有罪耐司寇以上。廣對鄉吏趣未辨,廣對質,衣疆吏前。鄉吏(以下第十五簡缺佚)下,不敬重父母所致也,郡國易然。臣廣願歸王杖,沒入為官奴。臣廣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制曰：問何鄉吏，論棄市，毋須時，廣王杖如故。

元延<sup>⑤</sup>三年（公元前10年）正月壬申下。

制詔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趨；吏民有敢毆辱者，逆不道，棄市。 令在蘭臺第卅三

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坐桀黠<sup>⑥</sup>、擊鳩杖主，折傷其杖，棄市。

南郡亭長司馬護，坐擅召鳩杖主，擊（系）留，棄市。

長安東鄉嗇夫田宣，坐擊鳩杖主，男子金里告之，棄市。

隴西男子張湯，坐桀黠，毆擊王杖主，折傷其杖，棄市。

亭長二人，鄉嗇夫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毆辱王杖功，棄市。

右王杖詔書令 在蘭臺第卅三

綜合上錄兩篇令文，可以看出，受鳩杖者享有以下特權：

1. “王杖十簡”《本始令》規定，受杖主可“行馳旁道”。“王杖詔書令”寫為“行馳道中”。兩冊令集有“旁道”與“道中”之別。有關史料說明，二者並不矛盾。准許持王杖者“道中”，也祇能行馳道的旁道。《漢書·鮑宣傳》：“官屬以令行道中，宣出逢之，沒入其車馬。”注引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2. “王杖十簡”《本始令》：“市賣，復毋所與，如山東復。”“王杖詔令集”更明確寫道：“列肆賣市，毋租，比山東復”，即持王杖者允許在市場經商買賣，不納稅，如山東一樣。凡能扶養老人者，也享受免除賦役的待遇。

3. “王杖十簡”《建始令》：“年七十受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趨<sup>⑦</sup>；犯罪耐以上毋二尺<sup>⑧</sup>告劾，有敢徵召<sup>⑨</sup>侵辱者，比大逆不道。”“王杖詔令集”寫作“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手殺傷人，毋告劾，它毋所坐”。兩令冊中的令文，明顯為同一詔令，但文字有異。注釋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為二者並不矛盾。“王杖十簡”所說的雖犯罪耐以上，但未被告劾（因未“手殺傷人”）不得徵召。這與“王杖詔令集”所說的“非手殺傷人，毋告劾，它毋所坐”是一個意思。七十以上，若“手殺傷人”，仍可以告劾。

4. “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趨。”這是一項政治上的待遇。持王杖者與六百石官吏的地位相等，入官府不趨俯、禮拜。

此外，法令還規定，雖非持王杖者，但年六十以上的鰥、寡可享有“賈市毋租，比山東復”的特權<sup>⑤</sup>。孤、獨<sup>⑥</sup>、盲、侏儒等殘疾人，也享有“吏毋得擅徵召，獄訟毋得繫”<sup>⑦</sup>的權利。

### (丙) 賜酒肉簡

1. □酒一石，丞致，朕且時使人問存 □ 《合校》5.13

2. 月存視其家，賜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寵。郡太守、諸侯相、內史所明智(知)也。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智。

《合校》126.41、332.23、332.10A、B

兩漢歷朝時有賜酒肉、行糜鬻、賜高年帛、以及遣使存問耆老之舉。茲錄漢初的一道詔令如下，以供參考。《漢書·文帝紀》：“元年(公元前19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令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據此可見，以上所錄兩簡，當是有關“存問致賜”的養老令。

### (五) 會計

調給，有書，今調如牒。書到，付受相與校計同月出入。毋令繆(謬)，如律令。

以上令文見於批准發放糧食的有關文書。大意：“茲發調撥文書，請按附件‘牒’照發。收到文書後，由受付雙方共同計量、核校。並登記於糧食月出入簿，不得有誤。請依照章程辦理”。現將有關簡文抄錄幾則供參考：

1. □□官奴婢捕虜，迺調給，有書。今調如牒，書到，付受相與校，計同月出入，毋令繆(謬)。如律令 《新簡》EPF22:580

2.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壬子朔壬申，守張掖□曠，丞崇謂城倉，居延甲渠、卅井、殄北官：吏當食者三月食。調給，有書，為調如牒。書到，付受(相)與校，計同月出入，毋令繆(謬)



如律令。

掾陽、守屬恭，書佐參

《新簡》EPF 22: 462

3.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公元 22 年）五月丙辰朔乙巳，裨將軍輔平居成尉假，丞謂城倉，閭田、延水、甲溝、三十井、殄北卒未得□□……付受相與校，計同月出入，毋令繆（謬），如律令。

甲溝

掾閭、兼史憲、書吏獲 《新簡》EPT 65: 23

4. □□月祿，調給，有書。令調如牒，書到，付受相與校，計同月出入……

《新簡》EPT 65: 50 A

#### （六）婚姻

1. 建武<sup>⑥</sup>四年五月辛巳朔<sup>⑦</sup>戊子，甲渠<sup>⑧</sup>塞尉放<sup>⑨</sup>行<sup>⑩</sup>候事敢言之<sup>⑪</sup>，詔書曰：“吏三百石、庶民嫁娶毋過萬五千。關內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娶（娶）各如令，犯者沒入所齎<sup>⑫</sup>奴婢財物縣官<sup>⑬</sup>。”有無。

掾譚

《新簡》EPF 22: 45 A·B

#### 2. □石至庶民嫁娶□

《新簡》EPT 10: 43

以上兩支簡的內容相同（第 2 支是殘簡），均是關於婚姻的令文，明確規定，無論庶民或王侯，娉娶均不得奢侈踰制。有關這個問題，史書中多有記載。漢朝常有詔令禁止。如《漢書·成帝紀》載，永始四年詔：“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二年詔：“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今自三公，並宜糾非法，宜振威風。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其它如和帝、安帝時也頒佈有類似禁令。<sup>⑭</sup>西漢時郡守也可以制定“嫁娶喪祭儀品”。昭帝時，韓延壽任潁川太守，召郡中長者“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sup>⑮</sup>。但是，所有



這類稱作“科條”、“科品”、“儀品”的禁令，均未載具體條文，而建武四年簡則彌補了這一空白。詔令明確規定“三百石”的低級官吏和一般庶民，嫁娶不得超過一萬五千。至於“關內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甥娶”則另有規定。犯法者將沒收陪嫁的奴婢、財物。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簡中的有關資料說明，當時對於這道詔令的貫徹非常認真。各地方基層機構按時（所謂四時言）向上級報告所轄吏民是否有違反嫁娶令者。如《新簡》EPT 4:45：“□案部吏卒毋嫁娶過令者，敢言之”。相同內容的簡文還有《新簡》EPF 22:44、EPF 22:690、EPF 22:826等。

### （七）掣令

漢簡中有署名“掣令”或“挈令”的令文五枚，現分別輯錄、考證如下：

#### 1. □龍勒<sup>⑪</sup>寫《大鴻臚<sup>⑫</sup>掣令、津關》

《敦煌漢簡釋文》2027

這條簡文云：“龍勒寫《大鴻臚掣令、津關》，不是簡單記述一件事情。很可能是上級機構對龍勒縣的指示，令其抄錄遵守、執行的法令。秦律有一條規定：“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寫其官之用律”。<sup>⑬</sup>就是說，各縣應通知在該縣的都官<sup>⑭</sup>及時抄錄自己應遵守、適用的法律。龍勒縣地處西陲，所屬玉門關、陽關是通往西域的重要關隘。《大鴻臚掣令》中有關“津關”條文，與該縣有重要關係，所以法令規定，應將這些條文抄錄保存，以備適用。

#### 2. 《太尉掣令》：“盜縣官縣□□”

《敦煌漢簡釋文》982

太尉，秦漢中央政府主管武事的最高官員。東漢初，改西漢末三公中大司馬為太尉，與司徒、司空共同行使丞相職能，與西漢初年之太尉名同實異。《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云：“T12（即《太尉掣令》簡的原編號）的時代最早、內涵最豐富，多屬宣帝時期，有元康、神爵、五鳳、甘露等年號”。<sup>⑮</sup>據此可以認為簡文中的太尉是主管武事的最高長官。太尉的“掣令”當與武事有關，但由於簡文有缺，難解其意。

#### 3. 《北邊掣令》第四：候長、候史日跡及將軍吏勞二日皆當

三日<sup>⑦</sup>

4. 《北邊掣令》第四：北邊候長、候史跡二日當三日

《合校》562·19

5. 《北邊掣令》第四：候長、候□

《合校》198·7

以上三簡均為“《北邊掣令》第四”。其中《合校》10·28簡字數多，意思完整。綜合三簡來看，《北邊掣令》第四的大意是：凡在北邊地區守戍的候長、候史，每巡視邊界二日，按三日記勞。到此地工作的將軍、吏，也按勞二日當三日計算。

為了瞭解此令的意義，特將漢時的邊防制度作簡要說明。一，邊防設施。沿邊界一般均布置有“天田”，即用沙土平整一定寬度的地帶，若有人畜踏上，即能發覺。《漢書·鼂錯傳》顏師古注引蘇林曰：“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再者，沿邊防成排埋置柃柱，上懸索等等。簡中所載“日跡”，即官卒每日巡視邊防設施的記錄。如《新簡》EPT 59:23：“第三隧長見，卒一人見，候史見。天田皆畫，懸索完，柃柱完。”“日跡”線路、距離均有規定。<sup>⑪</sup>吏、卒參加“日跡”的天數，均作統計。<sup>⑫</sup>因病未參加巡視者也有記錄<sup>⑬</sup>。各塞均需按月將參加“日跡”的人數、天數總結一次，向上報告。以下一簡即誠北候史報告“十月吏卒日跡簿”的文書：“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十月丙戌朔癸丑，誠北候史章敢言之：謹移十月吏卒日跡簿一編敢言之。”<sup>⑭</sup>對於候長、候史參加“日跡”的情況，應向都尉府備案。有都尉府“賜勞名籍”一編，可證。《合校》159:14：“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十月甲辰朔甲辰（有誤），居延都尉德、丞延壽敢言之。甲渠候漢疆書言：候長賢日跡積三百廿一日，以令賜賢勞百六十日半日。謹移賜勞名籍一編敢言之。”其中所說“以令賜勞”，此“令”即上述《北邊掣令》第四。所賜勞數“百六十日半日”，此數是“日跡積三百廿一日”的二分之一，正好是按“勞二日當三日”計算的。此處的“賜勞”，應寫成“增勞”或“另賜勞”。新莽時期一枚賜勞的簡牘，行文準確。《敦煌漢簡釋文》1884：“敦德<sup>⑮</sup>步廣<sup>⑯</sup>尉曲，平望塞有秩候長敦德亭間田東武里五士<sup>⑰</sup>王參秩庶士<sup>⑱</sup>，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公元20年）十月乙未跡盡二年九月晦，積三百六十日。除月小五日<sup>⑲</sup>，定三百五十五日。以令‘二日當三日’，增勞百泰十泰日半日，為五月（當為‘百’）二十泰日半日。”<sup>⑳</sup>

現在再談談“繫令”，何解。“繫令”一詞見於史籍。《史記·酷吏列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楊主之明。”《漢書·張湯傳》寫為《廷尉挈令》。《漢書·燕刺王旦傳》：“又將軍都（試）郎羽林”。顏師古注：“漢《光祿繫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又：《說文解字·糸部》：“紕，《樂浪繫令》：織，从糸从式。”以上所錄諸條，也是“繫”、“挈”兩種寫法。由此看來，“繫”與“挈”作為漢令名，可通假，互借用。但是，這畢竟是兩個含義不同的字。作為法令名稱，原本是“繫令”，還是“挈令”呢？有必要考證清楚。

日人大庭脩先生引用《說文》及段注、《集韻》、《廣雅·釋詁》、《方言》諸字書對“挈”字的解釋，證明此令原本應是“挈令”。並據此而對此令的性質、特點、適用範圍等方面談了自己的認識。他說：“在《說文解字》中，認為‘繫’是‘懸持’的意思，即舉手。在《張湯傳》關於《廷尉挈令》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具有使屬下有屬的治獄官常常能夠參照的特點，使人得到恰似今天的手冊的印象。因此，解釋為‘所轄官所懸持的令’，也是一家之說。”“此外，與段玉裁同樣，將‘挈’解釋為‘契’。那麼，這是採取《張湯傳》中顏師古的理解：‘契，獄訟之要也。’相當於《漢書·溝洫志》中：‘令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這樣的‘租挈’，顏師古注釋為：‘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這一解釋與‘所轄官所懸持的令’的意義並無太大的差別。”大庭脩氏又說：“我以為《方言》中所講的‘持’的意義是最好的。因此，我想把它（指繫令）解釋為僅適用於一個官署，一個地區等的特令。”⑤上述這些議論，可備一家之說。

筆者認為，此令原本很可能是“繫令”，而不是“挈”令。從字義上來看，“繫”，束也。《說文解字·糸部》：“繫，麻一耑也。”段注：“一耑猶一束也。耑，頭也。束之必齊其首，故曰耑。《人部》係下云：‘繫束也。’是知繫為束也。”繫束者，圍而束之。據此而論，所謂“繫令”，通俗一點說，就是“令集”。漢簡中的“北邊繫令第四”，就是有關“北邊”法令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彙集一起，就稱作“北



邊繫令”，也可以叫作“北邊令集”。另外，《張湯傳》載，張湯為“揚主之明”而編輯的《廷尉繫令》，也決非收錄了受皇帝贊許的某一件案件，而是將“上所是”的許多案例彙集為冊的。“繫令”，可以按問題分類編輯，如將有關租稅的令文編為《租繫》。可以按適用地區編輯，如《北邊繫令》。各機構編輯的本機構的法令集，署本機構的名稱，於是就出現了《廷尉繫令》、《光祿繫令》、《太尉繫令》等等。為什麼有“繫”與“掣”兩種寫法呢？這是因為如段玉裁所說：“掣當作繫。繫，刻也。”樂浪郡繫於板之令”，故名《樂浪繫令》。所以將“繫”字寫作“掣”也通。且字形相近，故常假借。

何謂“北邊”？也有不同說法。筆者認為，“北邊”是指地區，但不是指某具體地段。它常用於泛指漢王朝與匈奴等少數民族接壤的北部邊陲<sup>⑧</sup>。如《史記·平準書》：“匈奴數侵盜北邊。”《漢書·匈奴傳》上：“匈奴，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漢書·武帝紀》：“令中國一統而北部未安，朕甚悼之。”明白這點，就知道，所謂《北邊繫令》是適用於匈奴接壤的北部地帶的有關法令集。

#### （八）行書令

為保證官府文書傳送的及時，秦漢時已頒行有關於行書的專門法令，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的《行書》和張家山漢簡中的《行書律》<sup>⑨</sup>。漢簡中也見有“行書”的具體令文，在這一件追查傳送文書“留遲”的公文中所引用的法令，當即是關於“行書”的專門條令：

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

不中程百里罰金半兩，過百里至二百里一兩，過二百里二兩。不

中程，車一里，奪吏主者勞各一日，二里奪令□<sup>⑩</sup>各一日<sup>⑪</sup>。

此令所說的“書”即文書，如詔書、制書、敕書、府書、舉書、應書等等。令文明確規定了對“行書”者的要求，及不能按時送達的處罰。《周禮·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鄭玄注：“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簡中以日、時、分記郵程，與鄭氏之說相合。簡中見到有許多專門名詞、術語，也反映出當時關於“行書”的立法已很完善。茲擇其主要的，輯錄如下，畧作說明，以現漢代“行書”制度的鎮密、嚴謹。

## 一 傳遞方式

簡中有關資料表明，在漢代，文書傳遞方式多種多樣：

1. 燧次行，或即逐燧傳遞。這種方式傳遞的文書，可能是一些需要通知各燧的事情，即依次傳閱，令其辦理。如《合校》458·1A、B 署明需“燧次行”的文書，當是一件令各燧知曉，或公佈的通緝令。它當然不祇通知某一個燧。

2. 以亭行、亭次走行。

此處的亭，指亭燧、或大於燧，置於烽燧間的邊防哨所。“以亭行”在漢簡中多見。但大多是各塞內傳送文書的方式<sup>②</sup>，也就是說在近距離內傳遞文書的方式。

3. 以郵行

即通過傳送文書的機構傳送。郵，後改名為置<sup>③</sup>，即驛站。《漢書·黃霸傳》顏師古注：“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驛站備有馬匹、驛童、供傳送文書用<sup>④</sup>。“以郵行”，多是傳遞遠距離的文書<sup>⑤</sup>。

4. 走與馳行

漢簡反映出，在如何傳送文書方法方面，有“走”與“馳行”之不同。不需要快速遞的文書，步行送達即可，署明“行者走”<sup>⑥</sup>，需要快送的，則寫明為“急”、“急行”、“疾”，“故行”<sup>⑦</sup>，要求“馳行”、“馬馳行”。如《合校》259·5A：“莫府吏馬馳行，以急為故□”。《新簡》EPF 22:713：“□馳行，以急疾為故□”。

此外，簡中還有一種“寫傳”，也可算做“行書”方式的一種，即發文機構“要求某處收到文書後抄錄一份，將抄件再傳某處或依次再傳數處”<sup>⑧</sup>。例如，“獲虜寫傳至斥地”<sup>⑨</sup>、“廣武寫傳至步昌陵胡以次行”<sup>⑩</sup>。此種“行書”，或承襲秦時“行書”中的“別書”。《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載，將“語書”在各縣依次傳閱，並“別書江陵布，以郵行”。

## 二 “行書”用語

簡中有許多屬於“行書”的專用名詞、術語，對於瞭解漢代行書制度很有幫助，茲擇其主要的，抄錄如下：

1. 當行

當行，即法定行書所需時間。如，《合校》4.23：“廿五里，檄，當行



二時五分。”《新簡》EPT 57:30:“毋傷燧長徐霸界中二十五里，人，當行二時五分□□。”此兩簡中所說：“二十五里，當行二時五分”，即根據前述“晝，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而定的（順便說一句，漢時里制，時制，均與今制不同，本文不作論述）。傳送文書的題檢中，一般都寫明“當行”時間，以便考課。為了保密或其它原因，有些文書的“當行”時間，不寫在外面，而是寫在檢中。如《新簡》EPF 22:474 B:“甲渠鄯候回即日癸酉鋪時遣。之官日時在檢中，到課言”，其中的“之官日時”，即法定“當行”時間。

## 2. 定行

定行，指行書實際所用時間。《新簡》EPW:1:“書一封，居延都尉章，詣大守府。三月癸卯鷄鳴時，當曲卒便受收降卒文。甲辰下鋪<sup>⑩</sup>時，臨木卒得付卅井城勢北卒參，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時，中程。”此“定行十時”，即行書實際所用時間。

## 3. 過程

過程，行書超過規定時限。《新簡》EPC:26:“□正月戊午夜半<sup>⑪</sup>，臨木卒賞受城勢卒勝。己未日入，當曲卒□付收降卒海，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二時，過程二時二分。”“界中九十八里”，祇需九時八分即可送達，卻用了“十二時”，即為“過程二時二分”。

## 4. 不及行

不及行，未將文書送傳指定地點。《新簡》EPT 51:357:“□詣橐它候官。正月戊申食時<sup>⑫</sup>，當曲卒王受收降卒澈。臨木卒僕付卅井卒得，界中八十里，定行五時，不及行三時。”八十里的路程，祇走了五十里，還有三十里路沒走，停止了，就為“不及行”。

## 5. 留遲

留遲，即未按時送達行書。如《合校》133·23:“臨木卒戎付誠勢北燧卒則，界中八十里，書定行九時，留遲一時，解何？”此簡所說：“留遲一時”，即遲到一時。

## 6. 郵書刺

郵書刺<sup>⑬</sup>，通報收發，傳送文書情況的簡冊。簡中所見“郵書刺”的“檢”可證。其中，專門記載發生差錯郵書的，稱“過書刺”。各驛站對所

傳送文書作記錄，逐月通報有關機構，是為了追查行書“留遲”、丟失、損壞的責任。如《合校》20·1：“印破。有水候官吏馬馳行”，其中的“印破”，即收件人發現文書函封上的封泥毀壞，印文有損，故記錄在案，以備追查失密之類的問題。簡中有一件文書，即追查某“府”主管行書人員的“舉書”：“十一月郵書留遲，不中程，各如牒。晏等知郵書數留遲，為府職不身<sup>⑨</sup>拘校，而委<sup>⑩</sup>。”此處所說的“牒”，當是以十一月的“郵書刺”為根據的。

### (九) 關津令

漢承秦制，出入關津有嚴格制度。然而有關律令多佚失，故不詳其具體內容。因而簡牘中所見到的幾條令文及有關制度的資料很是珍貴，茲抄錄如下：

1. 令曰：所賣<sup>⑪</sup>操諸匿不自詣<sup>⑫</sup>吏者要斬<sup>⑬</sup>。

《敦》791

2. 凡出入關傳<sup>⑭</sup>致籍<sup>⑮</sup>

《合校》50·26

3. 轉穀輸塞外，輸食者出關致籍

《敦》682

案：第1簡所寫令文說明，出入關津者須申報攜帶物品和隨從人員，隱匿不報者處斬刑。《敦煌漢簡釋文》有一支“致籍”簡（795）反映出關者所應申報的內容。“元始三年（公元前14年）七月玉門大煎都萬世候長馬陽所賣操妻子、從者、奴婢出關致籍”。

第2簡中的令文是關於“傳致籍”的原則規定。該令要求各關津按時上報出入關人員的名籍，所謂“致籍”，以便上級瞭解出入關津情況。從簡牘中有關資料可以看出“傳”的具體記載，以及取“傳”的手續。

1 當“以令取傳”。簡中有關“傳”的資料，多有“以令取傳”的記載<sup>⑯</sup>。“取傳”的條件有法令規定，“傳”上須寫明持傳者姓名、籍貫、出入關事由。“毋官獄徵事”<sup>⑰</sup>攜帶物品、牲畜，以及隨從等。

2 辦理“取傳”手續，一般庶民需先向鄉嗇夫申請，鄉同意後，上報縣令（長）批准，經縣掾、令史簽發。茲抄錄一件供參考。

永始五年（公元前12年）閏月己巳朔丙子（初八）北鄉嗇夫忠敢言之

義成里崔自當自言為家私市居延。謹案：自當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謁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敢言之。

閏月丙子，鑾得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書到如律令<sup>⑭</sup>掾晏、令史建<sup>⑮</sup>。

3 各關津按持傳者的身份、事由、出入關時間等分別登記。簡中有各種出入關名籍冊的題簽可證。如《卒出入簿》、《出入關傳籍》、《各遠倉過關出入簿》等等。

4 各關津須按時將出入關名籍冊上報郡。《敦》1900 簡可證：“□適士吏閏月丁未持致籍詣尹府<sup>⑯</sup>。

第三簡中令文，當是對於糧食出入的特別規定。《漢書·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這就是說，運送官吏捐獻的救濟糧入關，可“毋用傳”，說明糧食的出入關的制度非常嚴格，需皇帝下詔作專門規定。至於穀物出關當會更嚴格。故該令規定，凡穀物出關不僅需用“傳”，還要“致籍”備案。

#### (十) 知令

知令<sup>⑰</sup>，重寫令移書到，各明白大扁<sup>⑱</sup>書市里官所、寺、舍、門、亭、燧、候<sup>⑲</sup>中。令吏卒民盡訟（誦）知之，且遣郵吏循行問吏卒凡知令者。案論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sup>⑳</sup>。

這則文書，從內容來看，應是一件“佈告”、“明告”<sup>㉑</sup>政令的法規。姑名為“令”，列於此。漢簡中有多例，凡須“令民盡知之”的政令，則引用此令文，令有關機關將文書公佈之。茲抄錄數件，以供參考。

1. 《合校》16·4 A、B：“十一月丙戌宣德將軍張掖大守苞，長史丞旗告督郵掾□□□□□都尉官□寫移書到，扁書亭，市里顯見處，令民盡知之，商□起察有無四時言，如治所書律令。掾習、屬沈、書佐橫、實、均。”

2. 《合校》139·13：“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庫丞登兼行丞事下庫、城倉□用者。書到，令長、丞、尉明白大扁書鄉市里門亭顯見□。”

3. EJT 31·64：“閏月乙亥，張掖肩水都尉政，丞下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明白扁書顯處，令吏民盡知之。嚴敕如詔書律令。

掾豐、屬政、書佐鳳”。

(十一) 擊匈奴降者賞令 (附科別)

為抗擊匈奴入侵，漢王朝曾採取過種種措施，其中有兩項重要措施，一是承襲秦制，實行斬首授爵，所謂“上首功”。一是採取懷柔手段，重賞降者。有關這兩方面的情形，史籍中不乏記載<sup>②</sup>。如何獎賞，當有具體法令規定。史書中有“中率為侯”<sup>③</sup>的說法。“率”，就是軍功封賞的具體規定。另有稱之為“軍法”的《斬捕單于令》中當也有獎賞軍功的規定<sup>④</sup>。然而有關這方面的法令早已散佚。漢簡中所見《擊匈奴降者賞令》、《捕斬匈奴虜反羌購償(賞)科別》等令冊，彌補了史料之不足。

(甲) 擊匈奴降者賞令

1. 《擊匈奴降者賞令》 《敦》 1357

2. □□者眾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戶)，賜黃金五百

(斤) 《敦》 1358

3. 取故君長以為君長，皆令長其眾。賜眾如燧長，其斬□

《敦》 1359

4. □□賊二千石 □□識 □□言反武功者賜爵共分采邑

《敦》 1360

5. 二百戶，五百騎以上賜爵少上造<sup>⑤</sup>，黃金五十斤，食邑百戶，百騎 (A)

二百戶，五百騎以上賜爵少上造，黃金五十斤，食邑五百  
卅八 (B)

《敦》 1361

以上五支簡是一令冊的殘篇，1981年3月出土於甘肅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第一支簡《擊匈奴降者賞令》是該令令名。它說明此令應該包括兩項內容。一是關於斬首捕虜者拜爵賜金的有關規定。一是對匈奴降者賞賜的規定。第二簡是關於對率民眾八千的首領投降者的具體獎賞規定。其中“二千石”的“石”係“戶”之訛。率眾來降則封為列侯。史籍中有此記載。如《漢書·宣帝紀》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萬餘來降，封列侯。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封為列侯”。與此令相合。第三



支簡是關於如何安排投降官長的規定。“君長”，指匈奴的行政長官<sup>②</sup>。按此令規定，君長來降，仍為君長，管轄原來的庶眾。此簡下半段缺損，難詳其意。漢王朝對來降者的安置工作很鄭重、優待。如有大批降者，除賜賞之外，還對其國號、疆土均有具體安排。如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聚合四萬餘人來，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師古注“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國”。第四簡缺字過多，難解其意。或是與武帝時制定的《武功爵令》有關的規定。第五簡A、B的文字基本相同。B行中的“食邑五百”有誤，應是“食邑百戶”。“百騎”當屬另一條文。“卅八”不明其意，或係此令條文的編號。

（乙）捕斬匈奴虜反羌購賞科別

1.《捕斬匈奴虜反羌<sup>③</sup>購<sup>④</sup>償（賞）科別<sup>⑤</sup>》

《新簡》EPF 22: 222

2. 其生捕得酋豪、王侯、君長、將率者一人，☐吏增秩二等。  
從奴與購如比。

《新簡》EPF 22: 223

3. 其斬匈奴將率者，將百人以上，一人購錢十萬，吏增秩二等。  
不欲為☐

《新簡》EPF 22: 224

4. 有能生捕得匈奴閒候<sup>⑥</sup>一人，吏增秩二等。民與購錢十☐☐  
人命者，除其罪<sup>⑦</sup>。

《新簡》EPF 22: 225

5. 能與眾兵俱追，先登陷陣，斬首一級，購錢五萬如比。

《新簡》EPF 22: 226

6. ☐有能謁言吏<sup>⑧</sup>，吏以其言捕得之，半與購賞。

《新簡》EPF 22: 227

7. ☐追逐格斗有功，還畜參分以其一，還歸本主<sup>⑨</sup>

《新簡》EPF 22: 228

8. ☐……能持☐奴與半功

《新簡》EPF 22: 229



9. 諸有功校皆有信驗及行購賞

《新簡》EPF 22: 230

10. 右捕匈奴虜購科賞

《新簡》EPF 22: 231

11. 有能生捕得反羌從傲<sup>⑮</sup>外來為間候動靜中國兵<sup>⑯</sup>，欲寇盜、殺畧人民，吏增秩二等，民與購錢五萬，從奴它與購如比。

《新簡》EPF 22: 233

12. 錢三萬，吏增秩二等，不欲為官者與購如比<sup>⑰</sup>。

《新簡》EPF 22: 232

13. □言吏，吏以其言捕得之，購錢五萬，與眾俱追先登□□

《新簡》EPF 22: 234

14. 右捕反羌科賞

《新簡》EPF 22: 235

15. 諸有功校皆有信驗乃行購賞

《新簡》EPF 22: 692

16. 各持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其印紱吏<sup>⑱</sup>五萬，又上子一人名尚書<sup>⑲</sup>。卒長□奴婢二千，賜傷者各半之。皆以郡見錢<sup>⑳</sup>給。長吏臨致，以安百姓也。早取以見錢□

《合校》267·19

17. □絳百匹、雜繒百匹。又以其所捕斬馬牛羊、奴婢、財物盡予之。

《新簡》EPF 52: 569

以上所錄《捕斬匈奴虜反羌購賞科別》令冊（第1～15簡，係根據1972～1974年出土於甲渠候官（破城子）22房屋遺址的部分簡牘綴合而成，另錄第16、17簡，按其內容，當也屬於獎賞立軍功將士的條令，故附於此令之後，供研究者參考。

上述令冊中有兩條令文（第9、第15簡），從法制角度來說，值得特書一筆。這兩條令文內容完全相同：“諸有功校皆有信驗，乃行購賞。”該令文強調，立功者所報戰功均應檢校、核實。確實無誤，方可獎賞。據史料記載，軍中謊報戰功之事時有發生。如漢武帝時，“捕降者以為虜，搃死人以為獲<sup>㉑</sup>”之事有之；“擊匈奴增首不以實”<sup>㉒</sup>之事有之。為了防止這類弄虛作假，謊報戰績的事情發生，故在獎勵軍功的條令中，特別規

定：“諸有功校皆有信驗，乃行購賞。”

這冊令之頒行時間，注釋者有一種說法，認為是西漢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的獎賞條例。筆者發現，與此令冊同一遺址（EPF 22）出土的另兩簡，和該令有密切關係，可證明它頒行時間。

等三人捕羌虜斬首各二級，當免為庶人<sup>④③</sup>。有書：今以舊制律令為捕斬匈奴反羌購賞各如牒。前諸郡以西州書免劉玄及王便等為民，皆不當行。書到，以《科別》從事。官奴婢以西州<sup>④④</sup>。

書若郡農如玄、便等捕斬反羌免者不應法令，皆收還玄、便等及其妻子其本官。已畀<sup>④⑤</sup>，言所畀官名、年籍毋有所遺脫。會五月朔<sup>④⑥</sup>從事，督察如律令<sup>④⑦</sup>。

以上兩簡經綴合，可以認定是一件文書的殘篇。其大致意思是要求糾正一桩獎賞不當案。即按“西州書”對參戰有功的官奴隸“劉玄及王便等免為民，皆不當行”。應按“舊制律令”，即《捕斬匈奴虜、反羌購賞科別》從事，將該官奴隸劉玄、王便等發還給官署。何謂“西州書”？明於此，可判斷出《科別》頒行的時代。

據史籍記載，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隗囂起兵反莽。後攻下隴西、武都、酒泉、敦煌、張掖、武威等郡。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歸附更始，後又反。“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東漢初，光武帝曾正式“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後又叛朝廷，建武九年（公元33年）病死。隗囂為西州大將軍時，雖曾“北御羌胡之亂”，但也曾多方勾結羌族酋長與漢相拒<sup>④⑧</sup>，所以滅隗囂後，廢“西州書”。簡中所言改“前諸郡以西州書免劉玄、王便等為民”一案，令其“以舊制從事”。此“舊制律令”即《捕斬匈奴虜反羌購賞科別》，當制定於西漢，不會有誤。順便說一句，東漢立國後，立即廢除地方軍閥舊制，恢復漢代法制，乃是維護法制統一的大事。此文書的發見，對於了解東漢法制的歷史頗有意義。

（十二）吏民毋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

此令載於官文書，即甲渠候官上呈報告的存稿之中。這套完整的文件由破城子房屋二二（EPF 22）遺址中出土的，內容相關數簡連綴而成。它包括：

1. 文件題簽：

甲渠〔塞〕言：部吏毋作使屬國<sup>⑭</sup>秦胡<sup>⑮</sup>、盧水<sup>⑯</sup>士民<sup>⑰</sup>者。

## 2. 大將軍莫府書及甲渠塞應書：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鄼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將軍莫府<sup>⑱</sup>書曰：屬國秦胡、盧水士民從兵起以來□□因愁苦，多流亡在郡縣，吏匿之。明告吏民，諸作使秦胡、盧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遺，有無？四時言。

謹案：部吏毋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者，敢言之<sup>⑲</sup>。

案：幕府文書所引禁令未署明是中央法令，但與東漢初年光武帝所頒佈的禁止官吏役流民為奴婢的詔令的精神一致。如“建武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sup>⑳</sup>。再者，這則文書與同時出土的幾件署名為“詔書”的法令，同稱為“四時禁”，故姑視其為中央頒佈的法令，一併抄錄於此。這條令文也反映出了東漢初，光武帝注意團結西北各少數民族的方針政策。

（十三）禁鑄作錢、發冢、販賣衣物於都市。

1. 禁鑄作錢、發冢、販賣衣物於都市。

2. 禁鑄作錢

以上兩令分別見於下列兩則文書：

第一件文書：

1. 文書題簽：

甲渠言：部吏毋鑄作錢、發冢<sup>㉑</sup>、販賣衣物於都市者。

椽譚、令史嘉

## 2. 府書與應書：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鄼<sup>㉒</sup>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將軍莫府書曰：姦黠吏民作使賓客<sup>㉓</sup>私鑄作錢、薄、小不如法度，及盜發冢，公<sup>㉔</sup>賣衣物於都市，雖知莫謹苛百姓患苦之。書到，自今以來獨令縣官<sup>㉕</sup>鑄作錢，令應法度，禁吏民毋得鑄作錢及挾不行錢<sup>㉖</sup>，輒行，法。諸販賣發冢衣物於都市，輒收沒入縣官、四時言犯者名狀。

謹案，部吏毋犯者，敢言之<sup>㉗</sup>。

第二件文書：

1. 文書題簽：

甲渠言：部吏毋鑄作錢者。

## 2. 文書及應書：

-----不如舊時行錢法□自政法罰，令長吏知之，及鑄錢所依長吏豪彊者名。有無四時言。

謹案：部吏毋鑄作錢者，敢言之<sup>⑬</sup>。

### (十四) 禁屠殺馬牛

毋得屠殺馬牛

此令見於下列文書：

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sup>⑭</sup>候事敢言之：府移使者□所，詔書曰：“毋得屠殺馬牛，有無四時<sup>⑮</sup>言。”謹案：部吏毋屠殺馬牛者，敢言之。掾譚<sup>⑯</sup>。

案：漢人認為“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sup>⑰</sup>至於馬，勿論對於戰爭，還是交通，都很重要，故嚴加保護。關於漢律禁殺盜馬牛之事，史籍中多有記載。如《鹽鐵論·刑德》：“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淮南子·說山》高誘注：“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後漢書·第五倫傳》：“有屠牛，輒行罰。”此簡表明，東漢初，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故重申禁屠殺馬牛之令。並下發文書，令基層機構嚴格管理，發現違法者立即報告。此件文書即基層組織接到命令，經過檢查，向上級彙報，所謂“謹案，部吏毋屠殺馬牛者”。

### (十五) 吏民毋得伐樹木

吏民毋得伐樹木

此令見於下列兩件內容相同的文書：

1. 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詔書曰：“吏民毋得伐樹木，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伐樹木者，敢言之。掾譚<sup>⑱</sup>。

2.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鄴候敢言之，府言曰：“吏民毋得伐樹木，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伐樹木。

掾譚，令史嘉<sup>⑲</sup>

案：以上兩文書，分別頒發於不同年代，都是轉發“吏民毋得伐樹木”令。它說明當時對於保護樹木之事很重視，當局者常抓不懈。



(十六) 管理無業者令

管理無業者令(殘篇)

1. 無部署，須具伍任<sup>(17)</sup>乃予符<sup>(18)</sup>。盜符者，數請其罪。任者<sup>(19)</sup>皆為不從作<sup>(20)</sup>。其無任者，勿予符。惡子<sup>(21)</sup>為不從作<sup>(22)</sup>。

2. 諸惡子受符，即欲夜出，皆詣近所<sup>(23)</sup>抑官亭吏<sup>(24)</sup>，言欲夜出，報<sup>(25)</sup>乃得夜出<sup>(26)</sup>。

3. 貧民羸謹<sup>(27)</sup>，無作庸不能常離者<sup>(28)</sup>。

4. 此三牒。無作業，其任把關傳。言若它作事，各以便宜作事之。皆如附托詔書，為官當取庸驗治。及它作，皆須所受隨。羸民<sup>(29)</sup>不迫，乃取它庸。其<sup>(30)</sup>

5. 不可作事者，冗食<sup>(31)</sup>於倉<sup>(32)</sup>

以上所錄五簡，發現於1979年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據考學者說這幾支簡從形制、木質、書體、墨色來看，當為同一簡冊。根據同出紀年簡，時代可定為王莽時期<sup>(33)</sup>。考其內容，當是一冊“管理無業者”令的殘篇。由於簡損缺，雖將其綴合成篇，但其次序難以斷決。僅作以上試排，供讀者參考。該令將無業者分為兩類，一類為不務正業者，所謂“惡子”。一類為病弱、勞動能力差，不能經常找到僱主的貧民。對這兩類人規定了不同的管理辦法。對於不務正業者，此令規定了種種行政措施。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該令規定，政府對喪失工作能力者在生活上給予幫助，所謂“不可作事者，冗食於倉”。

(十七) 罪人入錢贖品

1. 大司農廷<sup>(34)</sup>奏“罪人得入錢贖品<sup>(35)</sup>”。

2. 贖完城旦舂六百石，直(值)錢四萬<sup>(36)</sup>。

3. 贖髡鉗城旦舂九百石，直(值)錢六萬<sup>(37)</sup>。

4. (贖)右止(趾)城旦舂以下及復作<sup>(38)</sup>。品書到言所<sup>(39)</sup>□<sup>(40)</sup>。

案：據上述第4簡所說，此“贖品”的條文應包括“右趾城旦舂以下”到“復作”以上的各類刑徒的贖刑規定。現僅發現以上抄錄的第2、3兩條，還缺有關鬼薪、白粲、隸臣妾、罰作、復作，以及最高徒刑“斬右趾城旦舂”的贖刑條文。據四枚散簡綴連成冊的“贖品”，顯然是一卷殘篇。

所謂“贖刑”即允許罪犯繳納一定數量的金、粟、或練，贖免已判決的刑



罰。還有一種是出錢買爵，再以爵抵罪。《漢書·惠帝記》載，元年（公元前194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師古注：“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漢代贖刑制度的複雜性，還表現在其制度有偶行和常制的區別，有就某種犯罪而規定的專項贖刑和適用於一切罪犯的贖刑等，並且史料不全，記載又互相抵牾，以至於律學大家沈家本在考察此問題時也感嘆道：“以漢人言漢事，神爵又距天漢不遠，何以所言之舛錯如此，不可解也。”簡中所見到的這冊“贖品”的發現，也有助於此問題的解決。現僅介紹一點與此“贖品”有關的情況。據記載，宣帝神爵年間，朝中對於是否實行贖刑制曾進行一場大爭論。當時因“西羌反”，朝廷興兵征討，需軍費。京兆尹張敞提出：“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隴西以北、安定以西，涼州的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他並解釋道：“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sup>④</sup>張敞此議，遭到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等大臣的反對而作罷。元帝初年大臣貢禹又提出廢除贖罪法，據沈家本考證貢禹所要廢除的贖罪法，即《漢書·食貨志》所載，令民得“贖禁錮免（減）罪”。<sup>⑤</sup>以上兩次討論制定和廢除贖罪法時，為什麼都沒有涉及到漢簡中所見到的這冊“贖品”呢？

於居延縣甲渠候官遺址發現的這冊“贖品”既然下發到邊疆基層政權機關，不會是某一大臣提出的法律草案，而是要下級貫徹實行的正式法令。如果該令是昭帝元鳳六年至宣帝本始二年任大司農的“延”奏請實行的，那麼，在其後十二年的張敞，就不會奏請頒行贖罪法，因為此法早已有之。如果此“贖品”是宣帝五鳳元年至元帝初元時任職大司農提出的，那麼，與他同時任職的諫大夫貢禹提出的廢除贖罪法時，為什麼祇說要廢除七八十年前武帝時實行的贖罪法，而對於現行的“贖品”，卻又一字未提呢？

#### （十八）守御器品

郡、都尉、候、鄣、亭隧守御器品<sup>⑥</sup>

此簡於1981年發現於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它表明漢代各級地方政權機關，甚至邊塞的守御器械配備均有相應規定。此簡是守御器品冊的檢署，其具體條文尚待新的發現。出土簡牘中有新莽年間一烽燧的“守御器簿”一篇，即“橐他莫當隧（燧）始建國二年五月守御器簿”，從中可瞭解燧“守

御器”配備的大致情況，因篇幅過長，不便全錄。對此問題有意進一步探討者可參考1978年《文物》第1期，圖四一、四二。

### (十九)烽火品約

#### 一、《塞上烽火品約》

1.匈奴人<sup>(197)</sup>晝入殄北<sup>(198)</sup>塞，舉二烽<sup>(199)</sup>□□烽一，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sup>(200)</sup>上離合苣火<sup>(201)</sup>，毋絕至明。甲渠、三十井塞上和如品<sup>(202)</sup>。

2.匈奴人晝(入)甲渠河北塞，舉二烽，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二苣火，毋絕至明。殄北、三十塞上和如品。

3.匈奴人晝入甲渠河南道上塞，舉二烽，塙上大表<sup>(203)</sup>一，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二苣火，毋絕至明。殄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

4.匈奴人晝入三十井、降虜燧以東，舉一烽，燔一積薪。舉堠上苣火，毋絕至明。甲渠、殄北塞上和如品。

5.匈奴人晝入三十井、候遠燧以東，舉一烽，燔一薪，堠上煙一。夜入，燔一積薪，舉堠上一苣火，毋絕至明。甲渠殄北塞上和如品。

6.匈奴人渡三十井，縣索關門外道上燧，天田<sup>(204)</sup>失亡，舉一烽，塙上大表一，燔二積薪。不失亡，毋燔薪，它如約。

7.匈奴人入三十井、誠勢北燧、縣索關以內，舉烽燔薪如故。三十井、縣索關、誠勢燧以南，舉烽如故，毋燔薪。

8.匈奴人入殄北塞，舉三烽；後復入甲渠部，累舉旁河烽；後復入三十井以內部，累舉堠上直烽。

9.塞上亭燧見匈奴人在塞外，各舉部烽如品，毋燔薪。其誤，亟下烽滅火，候、尉吏以檄<sup>(205)</sup>言府。

10.夜即聞匈奴人及馬聲，若日且入時見匈奴人在塞外，各舉部烽，次亭晦不和。夜入，舉一苣火，毋絕。盡日，夜滅火。

11.匈奴人即入塞千騎以上，舉烽，燔二積薪。其攻亭障塙壁田舍，舉烽，燔三積薪。和如品。

12.匈奴人入塞，承(乘)<sup>(206)</sup>塞中亭燧，舉烽燔薪□□□□烽火品約，官□□□舉□□烽，毋燔薪。

13.匈奴人入塞，候、尉吏亟以檄言匈奴人入，烽火傳都尉府，毋絕如品。

14.匈奴人入塞，守亭障不得下燔薪者，旁亭為舉烽薪燔，以次和如品。

15.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傳檄，告人走馬馳以急疾為〔故〕。

16.縣田官吏，令，長，丞、尉見烽火起，亟令吏民□□□□誠勢北燧部界中，民田畜牧者□□ ----- 為令。

17.右塞上烽火品約<sup>(207)</sup>

## 二《烽火品約》散簡

除上述《塞上烽火品約》以外，已發現而較完整的“烽火品約”條文，尚有下列諸簡：

1. 於居延都尉境內發現的有：

• 虜守亭障，不得燔積薪，晝舉亭上烽，一煙，夜舉離合苣火，次亭燔積薪，如品約。  
《合校》14·11

2. 於肩水都尉境內發現的有：

• 匈奴人入塞及金關以北，塞外亭燧見匈奴人，舉烽，燔積薪；五百人以上，晝舉二烽。  
《合校》288·7

3. 於敦煌郡中部都尉境內發現的有：

望見虜一人以上入塞，煩（燔）一責（積）薪（薪），舉二烽，夜二苣火。見十人以上在塞外，煩（燔）、舉如一人□□

望見虜五百人以上，若功（攻）亭鄣，煩（燔）一責（積）薪（薪），舉三烽，夜三苣火。不滿二千人以上，煩（燔）舉如五百人同品。

虜守亭鄣，煩（燔）舉；晝舉亭上烽，夜舉離合（苣）火。次亭燧和，煩（燔）舉如品。  
《敦煌漢簡釋文》2257

4. 於敦煌郡玉門都尉境內發現的有：

• 《敦煌郡烽火品約》  
《敦煌漢簡釋文》520

• 望見虜塞外及入塞，虜即還去，輒下烽，止煙火。如次亭未下烽止煙火，人走傳相告。都尉出追未還，毋下降。

案：《塞上烽火品約》1974年發現於甘肅居延破城子（原甲渠候官遺址）房屋16，出土時甚完整，順序排列置於房內地面。無紀年，就房中共存物，地層關係綜合分析，可能是新莽時期或東漢初期遺物。

此《品約》的具體條文說明，該條例應是甲渠、殄北和三十井塞的上級，居延都尉府頒佈的。從以上所錄於肩水都尉、敦煌郡中部都尉、玉門都尉等處發現的“品約”來看，各都尉制定“品約”時，當有統一的法律依據。如敦煌郡所屬各都尉的“烽火品約”應是《敦煌郡烽火品約》為依據。各都尉的“品約”是郡“烽火品約”的細則。

關於頒發“烽火品約”的機關，學者有多種意見。有一種推測認為，“品約”均是由都尉府一級軍事機關頒發的<sup>②</sup>。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除郡太守府頒發之“烽火品約”外，據居延各地點出土的蓬火品約簡，各部都尉似根據其隸屬單位的分佈情況和具體地望，尚制訂有適用於本轄區的實施細則。<sup>③</sup>還有一種看法與此大致相同，說得更具體，即可制定烽火品約的最低級別是都尉。然而一郡有數都尉，其上“郡太守必然有高一級的烽品加以統調，而全國亦當有統一的條例、規定”。<sup>④</sup>沒有統一、劃一的“烽品”，烽火就不可能迅速無誤地傳達，並互相交流。筆者基本上同意這一觀點。不過，作為法律形式，“品”、“約”以及“品約”之間有何區別？是否可以認為，中央頒發者，稱“品”，郡、部都尉頒佈者，稱“品約”呢？此問題有待考證。目前資料有限，且論證不充分，尚難以釐定。

漢代邊塞“烽火品約”，不是一紙徒托空言的條文。簡牘中有大量資料說明，這些法規當時是認真貫徹實行的。實施“品約”有嚴格制度。將這些實施“品約”的珍貴史料輯錄於此，不僅有助於對“烽火品約”的理解，而且也有助於對漢代法制的認識。例如：

### 1. 邊塞吏卒應“讀烽火”、“明烽火”。

所謂“明烽火”，即通曉“烽火品約”，戍卒應“知讀（讀）烽火品約”、“讀烽火品約”<sup>⑤</sup>。各都主管有責任“教勅吏卒烽火”<sup>⑥</sup>。

### 2. 設職負責“通烽火”。

所謂“通烽火”，即傳遞烽火<sup>⑦</sup>。有一件“狀辭”提到：“居延水里上造年四十二歲，姓匡氏，除為卅井士吏，主亭烽候望、通烽火備盜賊為職”。<sup>⑧</sup>



據此可知，“通烽火”是該士吏的重要職責。

### 3.發出、傳遞警戒信號必須記錄。

簡牘中有關發出、傳遞警戒信號的簡文很多。上面清楚記錄着發出、傳遞信號的形式、時間、次數等。如：

樂昌燧長己戊申日酉中時，受並山燧塢上表再通，夜人定時，

苜火三通，己酉日□（《合校》332·5）

塢上旁烽一通，同時付並山，丙辰日入時□（《合校》349·11）

不言而喻，要求將傳遞的警戒信號記錄下來，以便檢查、核對。如有差錯，將追究主事者的責任。如《新簡》EPT65:228：“鉞庭候長王護坐隊（燧）長薛隆誤和受一苜火……”此簡反映出候長要對燧長“誤和”，即錯傳信號承擔責任。再如EPF22:414：“□□以為虜，舉火，明旦踵迹野馬非虜政（攻），放舉火不應□”。誤將野馬當成虜，故舉火不應，這也要追究其責任。

### 4.置督烽掾監督“烽火品約”的執行。

各塞一般置有督烽掾，循行所轄烽燧，檢查工作，發現問題即舉劾有關士吏。如《新簡》EPF22:423、424：“復漢<sup>②</sup>元年十一月戊辰，居延都尉領<sup>③</sup>甲渠督烽掾敢言之，誠北燧長侯倉、候長樊隆皆私去署，誠教教吏毋狀，罪當死。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在軍事要塞，擅離職守，迺大罪，故舉劾之。

據記載，早在西周時期已有烽燧設置。《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但由於此事涉軍事機密，有關烽火具體制度，史籍多不載。甚至歷代法典也不明確寫出“烽式”。《唐律·衛禁·烽候不警》疏云：“放烽多少，具在式文，其事隱秘，不可具引。”甲渠候官為邊防軍事機構，故存有完整的《塞上烽火品約》，因而今天我們能得以見到這一珍貴資料。筆者在考釋此“品約”時，曾參考、引用考古學者徐蘋芳、吳初驥、初師賓、薛英羣諸先生的文章，特此致謝。

## （二十）伏虜品約

□府。府為《伏虜品約》，捕□ 《敦煌漢簡釋文》783



《伏魔品約》，僅見一令名。其中的“府”，當指敦煌郡太守府。從敦煌簡中所見“敦煌郡蓬火品約”<sup>⑩</sup>一例得知，所謂“府為《伏魔品約》”即敦煌郡頒行的《伏魔品約》。

## 注 釋

- ① 《漢書·宣帝紀》如淳注。
- ② 拙著《漢簡中所見漢律論考》，載《簡帛研究》第二輯。
- ③ 社土神、稷穀神。《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後漢書·祭祀下》：“《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故有國者必立社稷，以社稷之存亡，示國家之存亡。西漢初，高祖二年就“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東漢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又“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
- ④ 《新簡》EPT 20·4A·B。
- ⑤ 《新簡》EPT 20:25
- ⑥ 齋戒，祭祀前整潔身心。齋必有所戒，故稱齋戒。
- ⑦ 《新簡》EPF 22:153、154。
- ⑧ 《新簡》EPF 22:155。
- ⑨ 《新簡》EPF 22·156。
- ⑩ 見《漢書·郊祀志》（下）臣瓚注。
- ⑪ 《新簡》EPF 22:158、159、160：“八月庚戌（初七），甲渠候長以私印行候文書事，告尉謂第四候長憲等寫移檄到，憲等循行修治社稷，令鮮明，當時祠者齋戒以謹敬鮮潔約省為故，如府書律令。”“八月庚戌（初七）”是根據上引EPF 22:153簡中所說“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而推算出來的。

- ⑫ 埽(音準),箭靶的中心、靶垛。
- ⑬ 帛,靶心,據考證,帛“以紅、白絲織品相間縫製而成,懸掛於木板之上,目的是醒目易認,便於瞄準,然後將帛板置於埽上,此即‘埽帛’”(薛英羣《居延漢簡通論》第297頁)。
- ⑭ 《合校》45·23。
- ⑮ 試射,即秋射。漢世有“立秋驅鷹”之制。是日為國家大典。京師舉行閱兵,官兵演習戰陣、射御,名“驅鷹”。諸郡於八、九月舉行“都試”,操練、檢閱材官、騎士。所謂“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書·韓延壽傳》)。應參加都試者,優者賞,不參加者免職。《漢書·燕刺王劉旦傳》:“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現從出土簡牘中得知,漢邊塞烽燧每年舉行秋射,考課吏卒。
- ⑯ 日,計量成績的單位名稱,如現計量學習成績、工作成績的“分”,如“學分”、“工分”。以“日”、“月”、“年”作為計量勞、績的單位,係秦制。《睡虎地秦墓竹簡·廄苑律》中的“賜牛長日三旬”、“罰冗皂者二月”等條文,即以“日”、“月”記勞績。
- ⑰ 府書,都尉府下發的公文。此府書是居延都尉府下發給所管轄的甲渠塞的文書。
- ⑱ 署功勞,記錄“秋射”考核成績。
- ⑲ 雜試,共同考試。雜,合、共。《睡虎地雲夢秦簡·倉律》:“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漢書·雋不疑傳》:“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注:“雜,共也。”“長吏雜試”,由有關機構的負責人共同主持考課。
- ⑳ 臬□封,臬,麻。這裏指纏繫簡冊的麻繩。□,當是一“蒲”字。蒲,水楊,用作牘版的原料。“蒲封”,漢簡常見的連用詞,指檄,或其他官文書。如《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83·15:“六月辛未府告金關嗇

夫久，前移檄逐辟彙他令史解事，所行蒲封一至今不到，解何？……“此簡中的“臬蒲封”移都尉府。

- ②① 奉，通俸，即俸祿。
- ②② 職間，各級官吏。職，品秩。
- ②③ 財予，財，裁之通假。“都尉以便宜財予”即由都尉酌情給予。
- ②④ 從史，散吏名。《漢書·兒寬傳》：“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顏師古注：“從史者，但祇隨官僚，不主文書。”即不列入郡縣諸曹的散吏。
- ②⑤ 田吏，或指經管田地的小吏，無俸祿，詳見本文“令田”注。
- ②⑥ 《居延新簡》EPT 22:70、71 A、B、72、73、74、75、76、77、78、79
- ②⑦ 讎，校讎。已校對、核實。
- ②⑧ 祖，始。《易·小過》：“過其祖”注：“祖，始也”。“祖脫穀”，未經加工的原糧。
- ②⑨ 竟，通盡。歲盡，年終。
- ③⑥ 計，上計。秦漢時郡國行政長官向朝廷申報一歲治理狀況的制度。“歲盡一移計”，歲終一併上報。
- ③① 從史令田，從史自己從事農田勞動，無俸祿。前文“田吏”，也是從事農田管理之意。不發俸穀。
- ③② 如《史記·汲黯傳》注：“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六千”。《漢書·宣帝紀》注：“律，百石俸月六百”等等。
- ③③ 《新簡》EPT 5:47。
- ③④ 本始，西漢宣帝年號。
- ③⑤ 王杖，即鳩杖。《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 ③⑥ 節，秦漢時皇帝行使權威的憑證。《漢書·高帝紀》上顏師古注：“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漢代大臣如司隸

校尉或使者持有節杖，即被賦於特殊權力。

- ③⑦ 馳道，專供皇帝馳行的道路。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治馳道。漢代皇帝行經的道路亦稱馳道。臣民不得騎乘車馬行駛道中。如經皇帝特許，也祇能行馳道兩旁。
- ③⑧ 復，即免除徭役。
- ③⑨ 蘭臺，漢代宮中收藏圖書秘籍之處。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書秘籍。”《後漢書·王允傳》：“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
- ④④ 河平，西漢成帝年號。
- ④① 游徼，秦漢地方官吏，掌巡察緝捕“盜賊”之事。隸屬縣功曹。
- ④② 獻，即“讞疑獄”。漢代審處疑案件的一種制度。凡地方官吏難以判決的疑案，均應逐級上報廷尉，直至由皇帝親自裁決。
- ④③ 報，斷獄，判決罪人。
- ④④ 建始，西漢成帝年號。
- ④⑤ 永平，東漢明帝年號。
- ④⑥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載《考古》1960年第9期。
- ④⑦ “首殺傷人”，無解。“首”或為“手”之誤。“手殺傷人”，即親自殺傷人。《周禮·秋官·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注：“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它皆不坐。’”
- ④⑧ 鯢，即鰓。《爾雅·釋魚》郝懿行義疏：“鯢，鰓古通用。”
- ④⑨ 律人，魁偉的人。《集韻》：“律魁，大貌。”
- ⑤⑨ 歸義，漢少數民族由邊塞外而內附者，稱“歸義”。《史記·滑稽列傳》：“遠方當來歸義。”
- ⑤① 據《二十史朔閏表》，成帝建始元年九月辛酉朔，無甲辰日，疑“甲辰”或為誤寫，或“元年”為“二年”誤，同“王杖十簡”。參見《武威新出王杖詔令冊》，載《漢簡研究文集》第43頁。
- ⑤② 昧死，言冒昧而犯死罪。秦漢羣臣上書多用此語，以表敬畏之意。《獨斷》：

“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

- ⑮ 元延，西漢成帝年號。
- ⑯ 桀黠，兇猛而狡黠。《漢書·馮奉世傳》：“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 ⑰ 趨，小步快走，表示恭敬。《史記·蕭相國世家》：“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 ⑱ 二尺，指寫有關於劾舉罪犯法令的板牘。常用為法令的代稱。《急就篇》：“持二尺板以戒賊。”
- ⑲ 徵召，傳喚到法庭。司法方面的徵召，大致有三種情況：一、因本人犯罪。二、因他人犯罪而連坐，受徵召。三、需到庭作證，而受徵召。
- ⑳ 《漢書·刑法志》景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詔對鰥寡已有規定：“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
- ㉑ 《孟子·梁惠王》：“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 ㉒ 毋得繫，即不得縛綁、拘繫。《漢書·平帝紀》：“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
- ㉓ 建武，東漢光武帝劉秀年號。建武四年，公元28年。
- ㉔ 朔，農曆每月初一。辛巳朔戊子，即初一為辛巳，以干支序推算，戊子即本月初八。
- ㉕ 甲渠，塞名，屬居延都尉。主管吏稱候長，下有尉、丞等屬吏。
- ㉖ 放，甲渠塞尉名。
- ㉗ 行，漢代官制。指官缺未補，暫由他官兼攝其事。行候事，兼攝候長職務。
- ㉘ 敢言之，原為下屬對上級言事的行文中的習慣用語。後漸流行為官府的客套語。簡牘中多見。
- ㉙ 齎，隨身攜帶。所齎奴婢財物，陪嫁的奴婢財物。
- ㉚ 縣官，漢代對天子的一種稱呼。《漢書·霍光傳》如淳注：“縣官謂天子。”也稱官府為縣官。
- ㉛ 參見《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和同書卷五《安帝紀》元初五年秋七月丙子詔。



- ⑩ 《漢書·韓延壽傳》。
- ⑪ 龍勒，縣名，屬敦煌郡。地處敦煌郡西部，境內有通往西域的陽關、玉門關等重要關隘。
- ⑫ 大鴻臚，官名，位列九卿。漢承秦制，大鴻臚曾名典客，大行令。漢武帝改名大鴻臚。職掌接待少數民族君長及諸侯王的事務。由此可以推斷《大鴻臚案令》中有關“津關”的令文，當涉及少數民族君長和諸侯王過往關卡的規定。
- ⑬ 《睡虎地秦墓竹簡·內史雜》
- ⑭ 都官，中央列卿所屬諸官署。
- ⑮ 《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⑯ 《合校》10·28。
- ⑰ 如《新簡》EPT 51:396：“候長宣、候史拓八月乙巳盡甲戌積卅日日述，從第卅燧（燧）南界盡鉗庭燧（燧）北界□。”
- ⑱ 如《新簡》EPT 51:286：“□卒未央述盡乙卯積十日；□卒候游述盡乙丑積十日；□卒許敢述盡甲戌積九日。”
- ⑲ 如《新簡》EPT 51:206：“病，不積——。”
- ⑳ 《新簡》EPT 51:207。
- ㉑ 敦德，即敦煌郡，武帝後元分酒泉置。新莽時改敦德。見《漢書·地理志》下。
- ㉒ 步廣，屬敦煌。《漢書·地理志》下：“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
- ㉓ 五士，士伍之誤。漢承秦制，指無爵位的成年男子。
- ㉔ 庶士，官秩名。《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更名秩百石曰庶士，東漢復故。”
- ㉕ 小月廿九日，這一年五個小月，故扣除月小五日。
- ㉖ 按：355日加177·5日等於532·5日。簡中寫為“五百二十泰日半日”，計算有誤，少五日。

- ⑧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中文版，第75、76頁。
- ⑨ 《新簡》52：15：“秣（墾）田以鐵器為本。北邊郡毋鐵官，印器內郡。令郡以時博賣予細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販賣細民。”此“北邊郡”不是某一具體郡的名稱，而是與文中的“內郡”相對，泛指北邊地區相關的郡。
- ⑩ 見《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載《文物》1985年第1期。該簡的釋文尚未發表。
- ⑪ 簡中的缺文“□”，當是一“丞”字。
- ⑫ 《新簡》EPS4·T2：8A·B。
- ⑬ 參見《合校》33·28、39·12、133·3；《新簡》EPT59：18、EPT59：360A。
- ⑭ 《漢書·文帝紀》師古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宋祁曰：“傳，傳舍，置，厩置。”《風俗通》：“漢改郵為置。”
- ⑮ 《漢書·文帝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新簡》EPT49：11：“□□大將軍印章。詣中郎將，驛馬行，十二月廿二日起□，□年燧長育受武彊驛卒□□。”
- ⑯ 《睡虎地秦墓竹簡·田律》有一律文規定：“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
- ⑰ 見《合校》21·4A、21·3A·B、74·18等。
- ⑱ 參見大庭脩《再論“檢”》，載《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出版。
- ⑲ 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畧》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⑳ ㉑ 《敦煌漢簡釋文》1540、1809。
- ㉒ 雞鳴、下舖均時辰名稱。雞鳴，即丑時；下舖即申時。
- ㉓ 夜半、日入，時辰名稱。夜半，子時。日入，酉時。
- ㉔ 食時，時辰名稱，辰時。

- ⑩ 刺，通報情況的一種文書形式。《文心雕龍·書記》：“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牘。”“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參考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畧》，載《秦漢簡牘論文集》。“郵書刺”也稱做“郵書課”。《新簡》EPT 51:264：建始二年十二月甲寅朔甲寅，臨木候長憲敢言之，謹移郵書課一編，敢言之。”
- ⑪ 身，親自。《韓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來畝以為民先。”
- ⑫ 《合校》55·11，137·6，224·3。
- ⑬ 賡，行路時隨身自帶物品。
- ⑭ 詣，往。不自詣吏，不向官府申報。
- ⑮ 要，腰。腰斬，刑名，死刑的一種。
- ⑯ 傳，出入關津憑證。《周禮·地官·司關》鄭注：“傳，如今過所文書。”周公彥疏：“過所文書，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
- ⑰ “致籍”一詞不見於史籍。王國維曰：“致籍未詳”（《流沙墜簡·考釋》二卷）。其後諸家考釋也不得要領。今人薛英厚《居延漢簡通論》云：“致籍就是各關塞河津上報出太守府的出入者之名籍”，可備一說。
- ⑱ 如《合校》213·28、213·44 A、B、218·2等。
- ⑲ “毋官獄徵事”即無未決的訴訟問題，不拖欠賦稅、徭役。見《合校》15·19，218·2等。
- ⑳ “如律令”，漢公文中用語，意為請依法辦理。此簡中的“如律令”，即請依法放行。
- ㉑ 《合校》15·19。
- ㉒ 尹府，即大尹府。《漢書·王莽傳》（中）載、新莽始建國元年，“改郡太守曰大尹”。
- ㉓ 知令，或指告知庶民的政令。
- ㉔ 扁，《說文》：“扁，署也，署門戶之文也。”大扁書，或即以題署門庭較大文字書寫，或寫於大木板之上。《墨子·號令》：“為守備程，而署之

曰‘某程’置署街衢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效）。又：“人自大版書，著之其署隔，守必有課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漢時“大版書”於官所、寺舍等處，以廣告眾人，似淵源於此。

- ⑪ 堠，邊塞瞭望敵情的土堡。
- ⑫ 敢告卒人，漢時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行文用語，表示禮貌。漢簡中多見。如《新簡》EPT 53:33A：“□長丞拘校，必得事實，牒別言與計偕，如律令，敢告卒人。”《敦煌漢簡釋文》1365。
- ⑬ 見《合校》65·18，225·31。秦時有“明佈”之語。《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令吏明佈，令吏民皆明智（知）之。”
- ⑭ 如《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載，景帝時，因功封侯者18人（不包括《王子侯表》中8人。《列戚恩澤侯表》中的1人）。其中以匈奴王降而受封者八中。武帝時因軍功而封侯和降者而封侯者就更多。
- ⑮ 如《漢書·李廣傳》載，李蔡於“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注：“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
- ⑯ 《漢書·陳湯傳》。
- ⑰ 《敦》，《敦煌漢簡釋文》簡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⑱ 少上造，秦漢爵名，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五級爵。
- ⑲ 君長，酋長。《史記·匈奴列傳》：“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
- ⑳ 反羌，羌，古族名。漢時分佈於今甘肅西北、新疆南部、青海西南、西藏東北、四川西部。以游牧為主，與漢人雜居，漸習農耕。反羌，指曾降附漢朝，遷徙塞內，而又反畔的羌人。
- ㉑ 購，懸賞。《說文》段注：“懸重價以求得其物也。”
- ㉒ 科別，科，法令條文。《後漢書·酷吏傳》：“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別，類別。科別，此處意為法令細則。
- ㉓ 間候，即間牒。
- ㉔ “人命者，除其罪”，或指有人命案的罪犯捕獲間牒一名，可將功抵罪。史籍

有類似記載可參考。《漢書·趙充國傳》，神爵年間，充國告種豪：“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

- ⑮ “謁言吏”，指向官吏檢舉，揭發。參閱以下抄錄第13簡。
- ⑯ 該簡文字有缺，意思不完整。“追逐格鬥有功”云云，或指匈奴人如參與反擊匈奴主的戰鬥有功，即將其所有的牲畜三分之一，還歸本人。
- ⑰ 傲，傲之假借字，即塞。“傲外”，即塞外。
- ⑱ 動靜，即情況。“動靜中國兵”，探測漢軍的軍事情況。
- ⑲ 此簡或為獎賞反羌庶民有功者的部分條文。
- ⑳ 印綬吏，綬，即繫印的綬帶。印綬亦作官印的統稱。漢制，凡治事命官皆頒有印綬，以示職權受命於天子，及代表官階，級別。另外，一般不治事的加官或散官，無印綬，故有“印綬吏”、“無印綬吏”之分。
- ㉑ “上子一人名尚書”，即尚書台推舉一人任官。
- ㉒ 見錢，見，即現。見錢，即現錢。
- ㉓ 《漢書·楊僕傳》。
- ㉔ 《漢書·功臣表》載，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賞，當斬，贖罪，免”。師古注：“增加所獲首級之數也。”
- ㉕ “當免為庶人”當指官奴隸因抗擊匈奴立功受獎而免除奴隸身份，為庶民。
- ㉖ 《新簡》EPF22:221。
- ㉗ 畀，給與。此處指已將官奴隸交給某官署。
- ㉘ 朔，每月初一。
- ㉙ 《新簡》EPF22:691。
- ㉚ 《後漢書·西羌傳》：“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另見《竇融傳》。
- ㉛ 屬國，指張掖屬國。
- ㉜ 秦胡，胡，胡人，指漢以外諸民族。一說秦胡是秦時的胡人，漢時已被同化的胡。



- ⑮ 廬水，張掖廬水，即今黑水中上游。
- ⑯ 士民，指具有某種品質或某種技能的庶民。《後漢書·仲長統傳》：“以才智用者謂之士。”
- ⑰ 莫府，即幕府，指河西五郡大將軍竇融官府。
- ⑱ 《新簡》EPF 22: 696、42、322、43。
- ⑲ 《後漢書·光武帝紀》。
- ⑳ 發冢，盜墓。《淮南子·汜論訓》：“天子縣法曰：發墓者誅。”
- ㉑ 守，試署。漢代官製，官吏有試守之制，期限一年，滿歲轉正，得食全俸，即為“真”。
- ㉒ 賓客，也稱客、私客、食客等，外來寄寓或依附本地豪強，從事某種活動的人，此處指專門從事鑄錢幣者。
- ㉓ 公，公然。賈誼《論積貯疏》：“殘賊公行”。
- ㉔ 縣官，漢代通稱天子為縣官。《漢書·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注：“縣官謂天子。”又常引申稱官家、國家。
- ㉕ 不行錢，禁止通行的錢。此處主要指王莽時所鑄的錢幣。
- ㉖ 《新簡》EPF 22: 37、38、39。
- ㉗ 《新簡》EPF 22: 40、41。
- ㉘ 行，漢代官制。凡官缺未補，暫由他官兼攝其事，就為之行，如張湯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 ㉙ 有注釋者解“四時”為春、夏、秋、冬四季，不當。此處“四時”宜理解為隨時。“四時言”即隨時報告。《合校》16·4、161·1以及與該簡同時出土的簡牘中，多枚有“四時言”、“四時禁”句，可參考。所謂“四時禁”即任何時候都禁止。此乃漢時習慣用語。《漢書·元帝紀》載，初元三年六月詔：“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之說。
- ㉚ 《新簡》EPF 22: 47。
- ㉛ 《風俗通義》。
- ㉜ 《新簡》EPF 22: 48A、B。

- ⑪ 《新簡》EPF 22: 53。
- ⑫ 伍任·伍，指什伍之人。《後漢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任，擔保。《漢書·哀帝紀》“綏和二年，除《任子令》”，師古注“任，保也”。伍任，由同伍的人擔保。
- ⑬ 符，符傳，通行憑證。
- ⑭ 任者。任，能力。《韓非子·定法》：“因任而授官。”任者，有勞動能力的人。
- ⑮ 不從作，不從事勞動。
- ⑯ 惡子，不聽教誨，不務正業，無賴。《漢書·尹賞傳》：“雜舉長安中輕薄少惡子。”師古注“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漢書·昭帝紀》師古注：“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
- ⑰ 《敦煌漢簡釋文》214。以下引文僅注簡號。不注書名。
- ⑱ 所，處所，指官府。
- ⑲ 官亭吏，指縣尉所屬的亭吏。《後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
- ⑳ 報，答復。
- ㉑ 386簡。
- ㉒ 謹，小。《路史後記》：“顓頊，祖曰昌意，生帝乾荒，擢首而謹耳。”注：“謹耳，小耳。”
- ㉓ 215簡。
- ㉔ 窳民，懶惰的貧民。《商君書·墾令》：“愛子情民不窳，則故田不荒。”
- ㉕ 213簡。
- ㉖ 冗食，不勞而食。《後漢書·劉瑜傳》：“今女嬖令邑，充積閭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無事而食，謂之冗食。”
- ㉗ 216簡。

- ⑩ 參見吳初驤《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一組律令冊》，載《簡帛研究》第一輯，199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
- ⑪ 大司農延。兩漢時期，擔任大司農一職名延者有二人，一是田延年。他任大司農的時間是昭帝元鳳六年（公元前75年）至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共三年。另一位大司農名延者，《漢書·百官公卿表》僅記其名，而未記姓。任職時間是宣帝五鳳元年（公元前57年）至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共九年。
- ⑫ 品，又名品令，法律形式，即律令細則。《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若廬，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廬，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新簡》EPT 56:35。
- ⑬ 《新簡》EPT 56:36。
- ⑭ 《新簡》EPT 56:37。
- ⑮ 復作為最低徒刑。《漢書·宣帝紀》李奇注“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輒弱不任守，令復作於官，亦一歲”。《漢舊儀》“男子戍罰作，女子為復作，皆一歲到三月”。
- ⑯ “書到言所”，下缺字應是“下部官名”，即接到此“品書”後，應向上級報告，將此“品書”下發到哪些機關。參見《新簡》EPT 56:39、297、300等。
- ⑰ 《新簡》EPT 56:281。
- ⑱ 《漢書·蕭望之傳》。
- ⑲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卷一，第439頁。沈云：“終西漢之世，贖法抵桀鉅，坐贓二事，其它未嘗行。”案：沈所說的“贓罪”，中華書局標點《漢書》認為是“減”罪之誤。
- ⑳ 《敦煌漢簡釋文》1390
- ㉑ 匈奴奴，當是“匈奴人”之誤。
- ㉒ 殄北，塞名。以下所見甲渠、三十井等塞為殄北鄰塞，均屬居延都尉。

- ⑪ 烽，即烽燧，本指烽火，邊防報警信號。《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前書音義》：“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 ⑫ 堠，瞭望敵情的土堡。漢簡中有作“堆”、“塢”者。
- ⑬ 苣，或苣火，即火把。烽燧遺址發現有葦苣和芨芨草束成的苣。“離合苣火”，苣火使用的一種方式。或以兩苣，時分時合的舉起。
- ⑭ 和如品，按“品”規定，與鄰塞相應的點燃薪、苣烽火，向下一烽燧傳遞信號。
- ⑮ 表，報警標誌。以赤、白繒相間連接而成，掛於堠、塢牆頂上，垂直地面。
- ⑯ 天田，一種防禦工事，沿邊塞布置沙土帶，經常耕耙，使其松軟，定時巡視，觀察是否有人馬經過的痕跡。《漢書·晁錯傳》蘇林注：“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無田。”此說雖誤將“虎落”與“天田”為一事，但對“天田”的解釋基本正確。
- ⑰ 檄，即檄文，檄書。多用於徵召、曉諭、申討等。如事態緊急，則插上羽毛，稱為羽檄令急傳之以檄言府，即以檄書急報都尉府。
- ⑱ 乘，登、升。《史記·高祖本紀》：“與關內卒乘塞”。
- ⑲ 本《品約》1~17簡，見《新簡》EPF 16:1-17。
- ⑳ 徐蘋芳《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蓬火品約”》，載《考古》1979年第五期。
- ㉑ 吳初驥《漢代蓬火制度探索》，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㉒ 初師寅《居延烽火考述》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㉓ 《新簡》EPT 52:33、EPT 52:45、EPF 22:459 《合校》118·4、206·26等。

- ②③ 《新簡》EPT 22: 459: “府告甲渠、卅井、殄北鄯候方有警備，記到數(速)循行，教勅吏卒明烽火。謹候望……。”
- ②④ 通，即傳達。《穀梁傳·僖二十八年》：“通王命也。”
- ②⑤ 《合校》456·4，另見《新簡》EPT 52: 260: “□主燧七所，以候望、徼(徼)迹、通烽火。”
- ②⑥ 復漢，王莽亡敗後，隗囂於西北起兵後使用的年號，史稱“漢復”。
- ②⑦ 領，漢代官制，即兼領。指已有主官主職，又領它官它職，而不居其位者。
- ②⑧ 《敦煌漢簡釋文》520



## 漢令甲、令乙、令丙辨正

徐世虹（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

令是漢代僅次於律的重要法律載體，皇權的至高無上賦予它獨立的法律品格，使之直接成為法律的淵源。法律淵源於王者之命，並非肇始於漢。《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則杜之”，簡明扼要地透露出令所具有的威嚴內涵與法律特質。《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所附魏國《戶律》律文：

•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棄邑墜（野），入人孤寡，徵人婦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來，段（假）門逆呂（旅），贅婿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三葉（世）之後，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婿某隻之乃（仍）孫。

此律頒布於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律名為《戶律》，但載體則是以“告相邦”形式出現的“令”。這說明王者之命直接入律，至少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是法律的組合體之一。

漢初的立法活動，使漢代的基本法典《九章律》應運而生。然而《九章律》畢竟還祇是一部以刑法為主的法典，漢律六十篇也難以涵蓋紛繁複雜的犯罪行為，社會的發展與變革不斷呼喚法律提供新的調整對象與原則，而與此相矛盾的是，法律自身對穩定性的要求及傳統習慣的定性依附，使統治者對法律的釐改總是舉步維艱。於是漢代的統治者便更多地利用自己掌握的最高權力，發布詔令，增減法律，使令在權力的鋪墊下上昇為法律規範。《漢書·宣帝紀》註引文穎曰：“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漢書·杜周傳》亦載：“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說明令與律同存，而令又是比律更靈活甚至隨意的法律載體，統治者的意志隨時可以通過不定

時的令得以實現。相對於律的穩定性而言，兩漢對法律的補充，大量地是在令的範疇裏進行的。

伴隨着漢令的大量產生，漢令的種類體系也漸呈清晰的輪廓。例如以甲、乙、丙為名者，有《令甲》、《令乙》、《令丙》；以內容性質為名者，有《金布令》、《官衛令》、《秩祿令》；以地區為名者，有《樂浪掾令》、《北邊掾令》；以官署為名者，有《大鴻臚掾令》、《廷尉掾令》、《光祿掾令》等。在上述諸令中，《令甲》、《令乙》、《令丙》的性質一直較為人們關注，見解也各有不同。

首先關於《令甲》，所見有以下諸條：

《漢書·吳芮傳》：“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諸令。”《贊》曰：“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著於《甲令》而稱忠也。”

《漢書·叙傳》：“務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康寧，述《景紀》第五。”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註引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

《漢書·哀帝紀》綏和元年詔註引如淳曰：“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

《漢書·平帝紀》註引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

除《漢書》所見外，《令甲》又見賈誼《新書·等齊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乙是也。”《晉書·刑法志》：“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其次為《令乙》，所見有：

《漢書·江充傳》註引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

《漢書·張釋之傳》註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晉書·刑法志》引《魏律序》：“《令乙》有呵人受錢。”

再次為《令丙》，見知者有：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

《晉書·刑法志》：“《令丙》有詐自復免。”

對以上諸令的認識，歷來不同。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諸說：

1. 年代先後說。宣帝地節四年詔註引文穎曰：“《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

2. 篇目次第說。同上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評論文穎、如淳之說為：“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後漢書·章帝紀》註亦云：“《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3. 諸令各有甲、乙、丙說。沈家本直指問題的關鍵：“惟令之名可考者尚多，在當時必更多，則所云：《令甲》、《令乙》者，諸令皆在甲篇、乙篇中乎？抑各令各有甲篇、乙篇乎？”其後他在為《令丙》所作的按語中述道：“《箠令》定於孝景之世，此言《令丙》者，當謂《箠令》之丙篇也。”①可見他已經傾向諸令各有甲、乙、丙篇說。此說亦可獲得顏註的支持。《漢書·蕭望之傳》：“……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4. 集類為篇說。六十年代，陳夢家先生在分析居延漢簡所出詔令目錄簡時，也考證了《令甲》、《令乙》、《令丙》，並得出結論：“令分甲乙丙不是因時代先後相承而分的三集，而是依事類性質不同而分的三集，即《晉書·刑法志》所謂‘率皆集類成篇，結事為章’。”②

以上諸說中，1、2說就年代、篇次而言似無大礙，但對3、4說尚有幾點似解釋有礙。

首先，根據前引各令條文，其內容互不一致，難以同類。如《令甲》五條的內容分別為稱忠、勉勵農桑、除肉刑、限占名田、贖山（適用女性囚徒的贖刑），如果除肉刑尚可歸入刑名，劃為《具律》，限占名田則屬於《盜律》。《具律》、《盜律》本為二章，更難與稱忠、勉勵農桑同類。《令乙》三條，前二條為行馳道中、犯驛罰金，第三條詐僞。沈家本

將前者歸入《傍章》，後者納入《雜律》，二者明顯不屬同類。《令丙》二條，一屬箠令，一屬詐僞。將甲、乙、丙的內容作一比較即可發現，無論是甲、乙、丙本身所出各令，還是甲、乙、丙三者之間，都缺乏集類成篇的標準。

其次，如果諸令各有甲、乙、丙篇，理當明言令名。以目前所知的漢令見之，漢令的調整對象相當寬泛，如官吏法有《秩祿令》、《宮衛令》、《品令》、《任子令》、《予告令》、《功令》，經濟法規有《田令》、《水令》、《馬復令》、《金布令》、《緡錢令》、《租絮令》，交通法規有《津關令》、《符令》，司法法規有《廷尉絮令》、《獄令》、《箠令》、《贖刑令》，禮儀法規有《祠令》、《齋令》、《五時令》，軍事法規有《戍卒令》、《捕殺單于令》，此外還有《公令》、《賣爵令》等。這些令對象清楚，適用範圍明確，除《金布令》僅見一例“金布令甲”外，餘皆未見甲乙。如果甲、乙、丙是某令的篇次，該令令名為何，令人茫然。漢令原本就“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sup>③</sup> 整理者既“集類成篇”，定名應當準確簡約。

再次，如果甲、乙、丙是同一令或同類令之篇名，至丙而止尚可理解，然而其他令是否也是皆至丙而止？以漢令的繁雜而言，似乎不大可能僅出現一種令的篇次。

總括上述疑點，3、4說尚缺乏成立的依據。那麼所謂甲、乙、丙，究竟依據什麼標準來整理排列的呢？根據1、2說，認為《令甲》、《令乙》、《令丙》是前代帝王的詔令總集，甲、乙、丙為其篇次，這樣解釋無礙大體，更何況這樣的詔令集，還非常難得地在居延漢簡中得到了反映：

縣置三老二，行水兼興船十二，置孝悌力田廿二，征吏二千石以上

符卅二，郡國調列侯兵卅二，年八十及孕朱需頌系五十二。<sup>④</sup>

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索隱》引劉昫曰：“三代系表旁行斜上，并放周譜。”“旁行”即橫行，由此他橫讀豎簡，將這些簡編冊，即可知該簡為編冊中的第二支，隨後又考證了每句簡文，逐條找出相應的詔書內容，確認數字前的文字均為詔書內容的概括，推出“一”至“五十二”的年代為上至高祖二年（前205），下迄景帝後三年（前141），而且該札長三尺，符合《史記·



酷吏列傳》孟康註“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之漢制，因此該冊書為詔書目錄。他又據《漢書·刑法志》“孝武即位，……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章”之記載，認為該詔書目錄編定於武帝初年。<sup>⑤</sup>大庭脩先生也認為該冊書為《令甲》目錄，稱之為“居延出土的《令甲》目錄”。<sup>⑥</sup>

根據上述考證，再比較前述《令甲》佚文的可考年代，如吳芮稱忠詔頒布於高祖五年（前202），<sup>⑦</sup>除肉刑詔頒布於文帝十三年（前167），<sup>⑧</sup>勸農詔頒布於景帝後三年（前141），<sup>⑨</sup>年代跨度正與詔書目錄兼容，因此上述目錄簡當是《令甲》目錄無疑。以此推測，《令乙》、《令丙》也應當有這樣的詔書目錄。1989年出土的甘肅武威旱灘坡漢簡6號簡記：“民作原蠶，罰金二兩，在乙第廿三。”<sup>⑩</sup>此“乙第廿三”，當意為“編號為《乙令》第廿三”，可證漢令甲乙丙皆有目錄編號。

不過將甲乙丙解釋為漢令的篇次序列，仍不能排除這樣一個疑問，即為何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詔令會交叉出現於詔令集中？如果它既不是“集類成編”，也不是某一個令的篇次，就祇能從甲乙丙的另一個含義——等次之分考慮其編纂標準。武帝時始設《五經》博士，置弟子員，歲末課試，高第為甲科，次為乙、丙科；元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sup>⑪</sup>此甲科為經考試錄用官吏的最高等級。《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為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興造甲乙之帳……而居其中。”《太平御覽·服用·帳》：“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上述“甲”例，均有第一、優秀或重要之義。以此類推，《令甲》、《令乙》、《令丙》也不會僅是篇目之次。

以《令甲》詔令目錄及《令甲》、《令乙》、《令丙》佚文所反映的內容與年代可見，《令甲》、《令乙》、《令丙》是漢初皇帝的詔令集，所收詔令在內容上不具有同類性質，排列方式採用序列法，按年代順序列為第一、第二、第三……。又根據文帝、景帝不同時期的詔令交叉出現於甲、乙、丙三令之中，可知甲乙丙除表明篇次外，還反映了整理者對詔令非單



純年代劃分，而取其重要程度的選擇結果。如此，纔可以解釋為何同令而不同類，為何不明言令名，為何不同時代的詔令交替出現等疑點。《周易·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王弼注：“甲者，創制之令也。”孔穎達疏：“甲為十日之首，創造之令為在後諸令之首，故以創造之令謂之為甲。故漢時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則此義。”沈家本認為孔疏異於如淳說，當以如說為長。但據上述分析，孔疏亦非毫無道理。大庭脩先生指出根據詔令目錄簡所見令的簡稱，再結合與之相關的內容，可以認為這就是先帝的“第一級令”，這是比較謹慎的看法。<sup>⑫</sup>

關於《令甲》、《令乙》、《令丙》的分類標準，尚有待更深一步的論證。不過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這就是它們是經過立法程序後被編入令典的天子詔令，在性質上屬於由國家統一頒布、適用全國的法規。

## 注 釋

- ① 《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卷一。
- ②、⑤ 陳夢家《西漢施行詔書目錄》，收入同著《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
- ③ 《漢書·刑法志》。
- ④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3，10·1，13·8，126·2。
- ⑥、⑫ 《漢簡研究》第二篇第三章“居延出土的令甲目錄”。日本同朋舍1992年。
- ⑦ 見陳夢家《西漢施行詔書目錄》一文考證，《漢簡綴述》第278頁。
- ⑧ 《漢書·刑法志》。
- ⑨ 《漢書·景帝紀》。
- ⑩ 武威地區博物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載《文物》1993年10期。
- ⑪ 《漢書·儒林傳序》。

## 收孥法的變遷

于振波〈吉林文史出版社〉

所謂“收孥”，也就是一人有罪，家屬要沒官為奴婢，屬於“連坐”之一種。“收孥”之法早在先秦即已存在，祇是文獻不足，難以做深入考察。雲夢秦簡為這一問題的探討提供了可能，於是而有于豪亮的《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①這篇文章提出了許多精闢見解，但仍有疏畧之處，故在此加以補正。

從秦律看，收孥並非針對所有犯罪。比如隸臣妾雖然終身服刑，他們的家屬卻不因此而收為官奴婢。有一種觀點認為：“隸臣的妻子雖可以是平民，但是他們的子女必須是隸臣或隸妾。”②其實這是誤解了秦簡《法律答問》中的一段文字：“女子為隸臣妻，有子焉，今隸臣死，女子北其子，以為非隸臣子毆（也），問女子論可（何）毆（也）？或黥顏頰為隸妾，或曰完。完之當毆（也）。”③其實這段文字祇是說，隸臣之子在其戶籍中必須注明是“隸臣子”，不許改變。但是“隸臣子”不等於就是“隸臣”，也不必一定要繼承“隸臣”這一身份，祇是可能在某些方面（如賦稅、徭役、授田、為吏等）會受到一定的歧視。這可以從《為吏之道》後面所附的“魏戶律”得到印證：“自今以來，段（假）門逆呂（間）、贅婿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三葉（世）之後，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處贅婿某叟之乃孫。”經營商業與客店的人以及贅婿，並不是罪犯，其子孫尚且受到如此歧視，隸臣之子不許改變戶籍上的出身或與此相類似，而說隸臣之子必須繼承“隸臣”這一刑徒身份，則證據不足。因此，本文認為隸臣妾的家屬不在收孥之例，同樣刑等低於隸臣妾的司寇與候的家屬也不會沒官為奴婢。

鬼薪白粲的刑高於隸臣妾，也沒有直接材料證明其家屬是否被收孥。秦律中爵位在上造以上的人以及葆子等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犯有“刑城旦舂”或

“完城旦舂”之罪時，往往降為鬼薪白粲。如《秦律雜抄》：“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法律答問》：“葆子□□未斷而誣告人，其罪當刑城旦，耐以為鬼薪而鋸足。藉葆子之謂殿（也）。”藉通藉，見《漢書·游侠郭解傳》“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注：“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藉”在此當指對葆子的寬大處理，據此，則鬼薪白粲的家屬也不在收孥之列。

因此，就刑等而言，收孥主要針對城旦舂以上的犯罪。如《法律答問》：“隸臣將城旦，亡之，完為城旦，收其外妻子。”張家山漢簡《秦獄書》之十七記錄了秦王政元年、二年時的一個案例：④一個名叫講的人被毛誣告“謀盜牛”，因此，被黥為城旦。後來講請求重新審理（“乞鞫”），結果證明講無罪，於是“（講之）妻子已賣者，縣官為贖；它收已賣，以賈（價）畀之”。文中曾提到講的父親名叫處，然而從“妻子已賣者，縣官為贖”一語來看，則講的父親處不在收孥之列，而祇涉及妻、子。而且犯人家屬被收為奴婢後，往往被賣掉，不一定都充當官奴婢。至於在刑等上高於城旦舂的犯罪是否要收及父母，兄弟，則有待於新材料的發現才能得出結論。

以上祇是就刑等所做的分析，實際上是否要實行收孥，還要看犯罪的類別。例如《法律答問》：“律曰與盜同法，有（又）曰與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當坐之；云與同罪，云反其罪者，弗當坐。”據此，則“誣告反坐”之類的犯罪即使處以城旦舂以上的刑罰，犯人的妻、子也未必被收為奴婢。

需要說明的是，在涉及妻、子被收的情況時，已出嫁的女兒大概也不能幸免。《晉書·刑法志》載：“及明帝（司馬師）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後經大臣建議，纔根據“嫁從夫”的原則，改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曹魏之法，係承自前代。大逆之罪既然要“誅及已出之女”，收孥法未廢除之前“收及已出之女”也很有可能。

《史記·孝文本紀》元年“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在此之前，漢律的收孥法當仍沿用秦律。裴駰《集解》引應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從上面分析可知，秦律是根據犯罪的類別和量刑的等級而使用收孥法的，絕不是對所有罪犯的家屬都一律收孥，應劭之說過於籠統。

文帝所廢除的祇是與收孥有關的相坐法令，于豪亮與高恒對此均有論述。⑤實際上，收孥法並沒有完全廢除。《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赦吳

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師古注引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據此，則景帝時仍有“收孥”之舉，主要是針對同姓諸侯的反叛行為。《後漢書·殤帝紀》延平元年詔：“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官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官人，皆為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據此則東漢自光武時期即有“宗室沒入”之事。《漢書·景帝紀》三年師古注引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則上述沒官為奴婢的事例大概是對犯有“大逆不道”罪的宗室成員等的一種優待。

于豪亮認為收孥法“自漢文帝宣布廢除以後直至西漢末始終沒有再執行”，王莽時期曾一度恢復，東漢明帝時又再度恢復，直到東漢末。但通過上述考證可知，即使在文帝宣布廢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以後，收孥法仍在一定限度內繼續實行——主要是針對宗室成員等有特殊身份的人犯有“大逆不道”之類重罪而採取的寬恤政策。實際上除王莽時期以外，自文帝宣布廢除收孥法以後直到東漢末，這一做法並沒有什麼變化，也不存在東漢明帝時又“再度恢復”的事實。據《東觀漢記》載：光武帝時，鮑昱為沘陽長，“沘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鮑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①趙堅殺人，犯有死罪，而其妻及父母均未被收孥，這是明帝以前的情況。我們發現，同樣的事例也發生在明帝以後。據《後漢書·吳祐列傳》：“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而亡”，後被抓獲。吳祐知其有妻而無子，便允許其妻入獄，“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毋丘長投繯而死。此案發生於吳祐被梁冀表為長史之前不久，大約在順帝時期。這一案例說明即使在明帝以後，普通死刑罪犯的妻子父母仍然是自由民，不被收為奴婢。至於死罪以下的刑徒，就更不會有家屬被收孥的可能了。于豪亮大概忽略本文所引的幾條史料，因此某些結論不夠準確，也可謂千慮一失了。

## 注 釋

① 見《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版。146—156頁以下引用于豪亮觀點均出於此文。

- ② 見栗勁《秦律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頁。
- ③ 見《睡虎地秦墓竹簡》（平裝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所引秦簡文字均出於此。
- ④ 見《文物》1995年第3期。
- ⑤ 見高恒《西漢王朝前期的法制改革》，《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頁。
- ⑥ 《後漢書·鮑昱列傳》李賢注引。



# 試論居延“酒”“麴”簡： 漢代河西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王子今〈中央黨校歷史教研室〉

居延漢簡中所見有關“酒”的文字遺存，應看作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河西社會生活風貌的重要信息。

輯錄居延漢簡中有關飲酒風習的史料，首先可以看到如下簡例：

- (1) ☐酒一石丞致朕且 時使人問存☐ 5.13
- (2) 伏地再拜拜請具酒少賜子建伏地再拜請具 10.25 A  
伏地再拜伏地請具酒少酒少且具拜 10.25 B
- (3) 賞伏地再拜請  
子卿足下善毋恙甚苦事謹道☐  
毋憂也萬未有取之者☐ 34.7 A  
葦冬寒願調衣進酒  
病☐長聞毋恙☐  
再拜子卿足下 34.7 B
- (4) 戎具少酒  
謹請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謝教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臨EPT51.224A  
戎戎叩頭幸甚幸甚第七三大夫第六三大夫第五三大夫第四三大夫  
第三三大夫謹會月廿四日日中毋忽何君刑褚刑房 EPT51.224B
- (5) ☐最置酒中 EPT65.281
- (6) ☐張偃酒☐ 34.19
- (7) 三月甲辰☐酒次☐  
出酒一石四☐☐☐ 146.78
- (8) ☐☐孫次翁幸賜酒少少席☐

☐☐受若欲復使☐

☐

228.22

(9) 元康三年六月乙卯朔乙卯東郡白馬平武里

董德 謁如君倡不得見君君有

EPT57.55A

薄酒少少謁官掾☐前溺

EPT57.55B

(10) ☐所得酒飲之拓奴對曰從廢徒周昌取酒一石昌私沽酒一石拓奴198.13

(11) 此酒縣東下飲酒兩杯從迹盡界還謂忠曰為候長取酒 264.40

(12) 田卒淮陽郡長平平里士五李進年廿五 酒 509.18

(13) 田卒淮陽郡長平西陽里公士邊結年廿三 酒 509.27

(14) 酒☐ 519.16

(15) 死罪死罪今年八月中候繆忻密男子賈襄持酒① EPT20.6

(16) ☐孝信到上亭飲酒 EPT50.92

(17) ☐☐見不云云因道欲飲藥元毋酒願 ☐ EPT59.270

(18) ☐倚庭侍酒 EPT22.724

(8)(9)“酒少少”，可能是漢時習用語，《後漢書·度尚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所謂“少少”，或許與此意近。“酒少少”，這里似乎是置酒者自謙語，(9)“薄酒少少”語義更為明朗。(2)“酒少”、(4)“少酒”語亦大畧涵意相同。

(10)(11)(12)(13)等，都是河西邊塞戍守官兵飲酒生活的記錄。(12)(13)可能出於同一文簿。(16)“到上亭飲酒”，似乎說明當時軍營中可能存在專門經營酒業的機構。又如：

(19) 出二百五十買羊一

出百八十買鷄五隻

●凡出八百六錢

受甲渠君錢千 出七十二買駱四于

今餘錢二百

出百六十八糴米七斗

出百卅沽酒一石三斗

EPT51.223

(20) ☐肉五十斤直七石五斗

☐酒二石五斗直四石六斗

☐凡直十二石一斗

EPF22.457A

☐ 候長竇☐P

☒ 候長王恭尸

☒ 候長孟憲

EPF22.457B

(21) ☐ ----- 起居毋恙甚善舍中兒子牛馬皆

☒ ----- 見到□□□一□具□□□□□□

EPF22.565A

----- 未有

----- 家寧持酒三石犬一

EPF22.565B

(22) 月存視其家賜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寵郡太守諸侯相內史所明智也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不智

126.41.332.23, 332.10A/B

這幾則簡例都反映了當時與飲酒有關的食物構成。(20)可能是三位候長分別領取“酒食”的記錄。

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涉及“酒食”的簡文，不過其中有些內容或許未必直接反映河西飲食生活。例如：

(23) ☒ □於□勝不☒

☒ □謹之慎候☒

☒ 強奉酒食察事☒

(24) ☒ □官動欲西起居延□藉不得入有可☒

☒ 子廣卻願自□譚酒食忽邑時邑時來記詣□□時□□□叩頭

☒ 不☒

257.32

(25) ☒ □拜

☒ 下善毋恙甚苦官事☒

☒ 君卿足衣善酒食出入遠辟☒

283.39

(26) ☒ 不和願君進酒食近衣毋有易長☒

332.7A

(27) ☒ 步步□財□之叩頭死☒

EPF54.18A

☒ 彊□□御酒食忍☒

EPF54.18B

(28) ☒ □孫少君遺粳米☒ 肉廿斤

☒ 府幸長卿遺脯一☒ ☒ 御史之長安□□以小筭盛之●毋以□脯野羊脯  
賁之也

信伏地再多問

次君君平足下厚遺信非有二信幸甚寒時信願次君君平近衣彊酒食察事  
毋有易信幸甚薄禮

□絮一信再拜進君平來者數寄書使信奉聞次君君平毋恙信幸甚伏地再拜再拜

次君君平足下 ●初叩頭多問

丈人寒時初叩頭願丈人近衣強奉酒食初叩頭幸甚甚初寄□贛鉢布二兩  
□□者丈人數寄書

使初聞丈人無恙初叩頭幸甚丈人遺初手衣已到

乙附51

(29) / 省元至今叩頭□□□

酒食郭丈人倡飲□□心除小

EPT 5.252

(30) □□□事酒食事 □

EPT 65.543

(28) 為帛書，出土於大灣。(23) “強奉酒食”，(25) “足衣善酒食”，(26) “進酒食近衣”，(27) “彊□□御酒食”（或許即“彊進衣御酒食”），(28) “近衣強酒食”，“近衣強奉酒食”，其實祇是一般的祝語。②不過，我們從中也可以體味到“酒”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祭祀用酒也是相當普通的。例如：

(31)

對祠具 鷄一 酒二斗  
黍米一斗 鹽少半升  
稷米一斗

10.39

(32) □□肥豬社稷□□□酒曰昔

EPT 22.832

(33) 始建國三年十二月丙辰朔丁丑不侵候長茂敢言之官檄曰部吏九人一人一  
鷄重六斤

輸府遣候史若祭酒持詣官會月二十日 ●謹案部吏多貧急毋□

EPT 59.56

(34) □ 祭酒□從事主事術令史霸

EPT 22.825B

(32) “酒”與“肥豬”用途當與“社稷”有關。“昔”，是陳年之酒。《周禮天官·酒正》：“二曰‘昔酒’。”鄭玄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賈公彥疏：“言‘昔’為久，‘酋’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酋久白酒’況之。”從簡文看，漢代民間仍然沿用“昔酒”之稱。(33)所謂“祭酒”亦當是指祠祭用酒。(34)所謂“祭酒”從字面看，究竟是指酒，或祇是職任稱謂，似乎難以確定。然而，EPT 22.825A簡文為“□月甲午朔己未行河西大將軍事涼州牧守張掖屬國都尉融使告部從事”“□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大守

張掖酒泉農都尉武威太守言官大奴許岑”，可知當以後者為是。漢代河西軍政系統中有“祭酒”職任，也是值得注意的。

除前引(12)(13)外，如下簡例似乎可以更明確地反映軍中配給酒的情形：

(35) ☐奉延所☐盡☐賜河東☐卒吏餘半月酒直 300.6

反映居延當地酒的買賣關係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

(36) ☒☐☐酒二☐直六十肉廿☐ 45.29

(37) ☒置長樂里樂奴田卅五畝買錢九百錢畢已丈田即不足計畝數環錢旁  
人淳於次孺王充鄭少卿古酒旁二斗皆飲之 557.4

(38) ☒十日視事盡二月約已縣官事買錢四月☐

☐☐☐☐☐約沽酒勞二斗☐ 564.7

(39) ☐☐☐☐三人買酒☐ 113.29

(40) 斗予麥計廿又斗酒 274.25A

☒斗穰麥 274.25B

(41) ☒從及樂君筵……葦席茨內中☐☐

☒為沽酒小方函諸器可欲持者以令樂君牛車☐

☒持歸

EPT51.459B

(42) ☒陳襲一領直千二百五十居延如里孫游君所約至

☒☐朝子真故酒二斗 EPT59.555

(37)“古酒”，(38)(41)“沽酒”，(42)“故酒”，均應為“酤酒”，即(39)所謂“買酒”。(37)“古酒旁二斗”與(38)“沽酒勞二斗”同，“旁”很可是“勞”的誤寫。所謂“酒勞”，應即酒醪。酒醪是混合汁滓的酒，為通行於下層民衆的飲品。《漢書·文帝紀》：“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顏師古注：“醪，汁滓酒也。”下引(53)(54)“酒勞”，可知“勞”是“醪”的民間簡字。

還有一種頗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即(37)和(42)簡文的內容，似乎反映在當時民間的經濟交易過程中，酤酒、飲酒，很可能已經被作為標誌成交的一種習慣性的儀禮。

體現當時河西地區酒價的簡文，有(19)“出百卅沽酒一石三斗”，可知為1斗10錢。

這是相當珍貴的經濟史料。《九章算術·盈不足》：“今有醇酒一斗，



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十。”(19)很可能即所謂“行酒”，可知河西邊地酒價，與內地並沒有很大的差別。(36)“酒二□直六十”，則可能是與“醇酒”類似的優質酒。③ 關字當為“斗”。

又(20)所見“酒二石五斗直四石六斗”，則是以穀物直接與酒交換。(40)也反映了同樣的情形。

居延漢代軍人飲酒酗酒情形可能並不罕見。我們從作為法律文書的簡冊中，看到一起因酒後爭言械鬥造成殺傷的特殊案例：

(43) 建武五年九月癸酉朔壬午令史敢言之謹劾劾狀 EPT68·13

建武五年九月發酉朔壬午甲渠令史劾移居延 EPT68·14

獄以律令從事 EPT68·15

上造居延累山里年卅八歲姓周氏建武五年八月中除為甲 EPT68·16

官

渠斗食令史備寇虜盜賊為職至今月八月審民不審 EPT68·17

□讓持酒來過候飲第四守候長原憲詣官候賜憲主官譚等酒酒盡讓欲去 EPT68·18

候復持酒出之堂煌上飲再行酒盡皆起讓與候史候□□ EPT68·19

夏侯譚爭言鬥憲以所帶劍刃擊傷譚匈一所廣二寸 EPT68·20

長六寸深至骨憲帶劍持官六石具弩一棗矢銅鏃十一枚持大 EPT68·21

□棗一盛糲三斗米五斗騎馬蘭越隧南塞天田出案憲鬥傷 EPT68·22

盜官兵持禁物蘭越于邊關傲亡逐捕未得它案驗未竟 EPT68·23

迺九月庚辰甲渠第四守候長居延市陽里上造原憲與主官 EPT68·24

一所

人譚與憲爭言鬥憲以劍擊傷譚匈騎馬馳南去候即時與令史 EPT68·25

立等逐捕到憲治所不能及驗問隧長王長辭曰憲帶劍持官弩一箭十一枚大 EPT68·26A

橡譚 EPT68·26B

草棗一盛糲三斗米五斗騎馬蘭越隧南塞天田出西南去以此知而

EPT68·27

劾無長史教使劾者狀具此

EPT68·28

起先邀請飲酒的是“客民”，然而飲酒的現場則在軍營中，即所謂平民“持

酒來過候飲”，這種情形在當時可能相當普遍。“第四守候長原憲詣官候賜憲主官譚等酒”，然而又在酒後以劍擊夏侯譚，造成胸部重傷，後畏罪出逃。

居延漢簡中還可見酒以為醫療之用的實例，如：

(44) ☐酒中令如夏水以灌之☐☐☐☐☐☐☐ 311.24

(45) ☐☐☐酒一杯飲大如鷄子已飲傅衣☐☐ EPT 53.14 1

(46) ☐一分栝樓莢睪四分麥丈句厚付各三分皆合和以方寸匕取藥一置杯酒中飲之出矢鏃 EPT 56.22 8

(47) ☐☐皆父且以淳酸漬之壹宿

☐費藥成浚去宰以酒飲

EPS4T2.65

“醫”字從“酉”，原本正是酒名。《周禮·天官·酒正》寫道：“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醑’。”賈公彥疏：‘二曰醫’者，謂釀粥為醴則為‘醫’。”《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說：“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是酒用於醫療之例。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也多見用“清”④、“酉”⑤、“酒”、“淳酒”、“醑酒”、“敦酒”、“善酒”、“美酒”、“苦酒”、“溫酒”、“熱酒”治病的情形。⑥

(46) “取藥一置杯酒中飲之出矢鏃”一例，也可以與《五十二病方》對照讀，《五十二病方》中《諸傷》條下，所謂“令金傷毋痛方”中，有飲“溫酒”(24)、“醑酒”(26)的內容。

居延漢簡又有反映酒用於工藝制作的簡文，例如：

(48) 漆一升☐膠一升醇酒財足以消膠膠消內漆撓取沸 265.41

漢代酒政史中可以看到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漢文帝後元年（公元前163年）頒布的詔書，曾經對所謂“為酒醪以靡穀者多”，與“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著”相並列，提出嚴厲指責（《漢書·文帝紀》）。漢景帝中三年（公元前147年），“夏旱，禁酤酒。”而後元年（公元前143年）夏，“民得酤酒”（《漢書·景帝紀》）。顏師古注：“‘酤’，謂賣酒也。”《漢書·武帝紀》記載：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初權酒酤。”顏師古注：“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為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居延漢簡中也有關於“禁酤酒”的簡文：

(49) ●甲日初禁酤酒羣飲者 ☐

EPT 59.40 A

----- ☐

EPT 59.40 B

(50) 監之勅于酒□□

EPT59.492

雖然政府有“禁酤酒”的法令，但是實際上民間酒業經營仍然難以真正禁止：

(51) □博受□賣酒二石

237.9

(52) □隧私為酒醪各亭□

111.4A

(53) □事方可知欲小為酒勞

EPC1.16A

(54) 教遣卒來言辨渡道謹即時往辦之教欲為酒勞夫子願□

立上算叩頭幸甚 • 即欲取釜釜在第九燧長徐卿所欲□ 231.13A

郅嚴叩頭白 / 卒俱往取之叩頭

夏侯掾坐前善毋恙獨勞疾起居毋它甚善□

231.13B

“為酒醪”、“為酒勞”，也是釀酒。(52)所謂“□隧私為酒醪各亭□”，指出當時甚至存在軍事單位違抗禁令有組織地從事釀酒的情形，而其中“各亭”字樣，可以和(16)“□考信到上亭飲酒”對照讀，可以說明“□隧私為酒醪”不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需要，而有冒險牟利的性質。又如：

(55) □三老畢貨錢□

103.39A

□自言鄣酒□孰□

103.39B

似乎體現了“鄣”釀酒出醪的情形。“孰”即“熟”。

我們還發現了可能與此有關的書寫製酒工藝程序的漢簡：

(56) □□掌酒者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醅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六物大酋

EPT59.343

所謂“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醅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當作“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醅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原文脫寫“水泉必香”的“必”字。這裏所說的“兼六物”、即必須使製酒的六種主要條件得以完備，方能成就佳釀。《禮記·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醅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鄭玄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也寫道：“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醅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高誘注：“‘大酋’，主酒官也。”《禮記》和《呂氏春秋》“秫稻必齊”，簡文寫作“秫稻必齊”，究竟何者更接近古義，似乎還值得研究。

“麴蘖必時”，正是釀酒成功的必要條件“六物”之一。

有關“麴”的簡文，也能够體現居延製酒技術的普及。例如：

(57) 不未敢去唯子真告使因叩頭所許麴五斗故令使□

事謹叩頭再拜 白

35.20B

(58) □麴十石 出廿五毋菁十束

出十八韭六束

□□□卅二束 出百□□□□十枚

175.18

(59) 自言賁實糸一升直三百五十又麴四斗直卅八驚虞隧長李故所 206.3

(60) ----- 出錢百一十五糴麴

五斗斗廿三

-----

214.4

(61) 麴六斗 二月乙未□

237.5

(62) 出錢二百六十四餘五斗 糴麴二石四斗

254.14

(63) 陽朔三年正月丁卯朔乙亥置佐敢博言之謹移糴粟麴

269.1

(64) □以□小麥麴二斗

284.17B

(65) 青黍三石 梁粟一石五斗□月□日□□邑中夏君壯多問

麴四斗 葵二斗-----

EPT44.8A

(66) □□共釀二斗麴

EPT65.365

(59) (60) (62) 都是提供了當時麴的價格資料的簡例。(59)與(62)價格較為接近。

此外，若干其他簡例也值得我們注意。例如：

(63) □余公伯惠小前張長卿與唐少卿其四人同飲唐少卿卒再□

345.2, 345.3

(64) 卮五枚 直廿三

EPT48.150

“卮”是酒具，購置多件同樣的“卮”，正是為了諸人“同飲”。這些簡文雖然沒直接出現“酒”、“麴”字樣，但是也依然能够反映當時河西邊塞地區社會生活中飲酒風習的普及。

一般酒的計量，多用“石”、“斗”，然而我們又看到以“斤”計量的情形如：

(65) 酒十斤

503.18

這可能是酒以“斤”計的較早的實例。這種情形與以“石”、“斗”相計或者以

盛酒容器相計⑦的區別，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 注 釋

- ① “密”，《居延新簡》釋作“客”。
- ② 類似簡文又有“近衣裘自愛”（EPT 51.233B），“近衣視養食”（EPT 53.183），“強飡食”（EPT 43.56），“加飡食”（EPT 44.4B），“加強飡食”（EPT 44.8B）等，可以參考。
- ③ 簡（48）可見所謂“醇酒”。
- ④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據《周禮·天官·酒正》注：以為“清”是去滓的醴酒。
- ⑤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以為“酉”即“酒”。
- ⑥ 《五十二病方》所見酒作藥用諸例，為：“清”（133），“酉”（189），“酒”（64，73，87，100，149，159，172，182，185，203，223，272，276，293，317，341，412，439），“淳酒”（5，141，176，259，300，301，410），“醇酒”（26，30，158，287），“敦酒”（43），“善酒”（123），“美酒”（178，344），“苦酒”（330），“溫酒”（6，8，24，24，237），“熱酒”（417）等。
- ⑦ 以《史記》為例，有以“卮”計者（《項羽本紀》、《楚世家》、《樊鄴滕灌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匈奴列傳》），以“杯”計者（《魏其安侯列傳》、《韓長孺列傳》），以“盃”計者（《滑稽列傳》）。



## 漢簡中所見的鬼神迷信

吳榮曾〈北京大學歷史系〉

敦煌、居延所出的漢簡，其內容大多為官府文書。但也有一些私人的書札或抄件。抄件中有些為陰陽迷信方面者。王國維為《流沙墜簡》作考釋時已經注意到，並將其列入術數類。後來勞幹的《居延漢簡釋文》，也把一些陰陽迷信的放入術數裏面。上述兩書中這類簡數量極少。在《居延新簡》中又出現一些。現在將其滙集起來，以便對漢代民間迷信作些初步的探索。

上述三書中的這部份簡，都是些不見首尾的殘文，其中有的現在很難判斷其性質或內容。如《流沙墜簡》中有：“旅。間盜事，有凶事，有客從遠所來，有所得。”王氏云：“此不知為何書也。”又如《居延漢簡》119·33：“今人不宜子孫、六畜、五穀。”這是有關禁忌者，因字數太少，現在對其具體內容無法得悉。還有如第269·9簡云：“耳鳴得事，耳鳴望行事，耳濡有來事。”這可能是通過耳鳴來占吉凶者，《漢書·藝文志》的雜占類中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簡文或許就是這類書中抄錄出來者。其餘的若干條，盡管也是殘篇零簡，但還能看出些問題，特別是和秦簡中的某些內容比較的相近似。由於有了旁證的材料，研究起來就要稍為容易些。下面就對簡文的內容作些初步的粗淺探索。

### 1. 風占

敦煌馬圈出土的簡中有如下的關於風的內容：

東北來則逆根傷生，民多疾病。風從東方來，則逆震，五穀傷於震。風從東……（1179）①

文前應有“風從”二字，文後應有“南來”二字。古人對許多自然現象如霜雪風雨之類，都賦予了神秘的色彩。《漢書·天文志》先記星長、日月，接着講如何望雲氣和風，以為年成好不好，往往根據風而作出推測，並引用魏鮮

所作的占候，說每年正月旦日，“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所謂八風是指東、南、西、北和東南、東北、西南、西北所來的風。在《呂氏春秋·有始覽》中已對八風作了解釋。古人對風很敏感，從來自不同方向的風，即能判斷它對自然界或社會能產生不同的作用。《漢書·天文志》說“迅雷風妖”往往是“政失於此”的徵兆。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所出的陰陽一類之書，裏面也有和風有關者，如云：“風主旱，殺馬牛。”還有是“田疇穢，國多衝風折樹”<sup>②</sup>。這表明西漢時從中原到邊塞，占風之俗非常普遍。

## 2. 生子和首向

古人對人的生育也有不少的迷信，生子時頭向就是一例。《流沙墜簡》94頁中有下面一段材料：

生子東首者富，南首者貴，西首者貧，北首者不壽，生子見天者

-----。

王國維以為此“乃述產子時方位宜忌”。“此均當在班《志》五行家中”。這類迷信在秦的《日書》中已有，如湖北雲夢出土的《日書》乙種裏有如下的話：

凡生子北首西嚮，必為上卿，女子為邦君妻。<sup>③</sup>

生東嚮者貴，南嚮者富，西嚮壽，北嚮者賤，西北嚮者被刑。<sup>④</sup>

戰國到秦的不少迷信習俗在《日書》中保留了不少。後來又為西漢所承襲下去。甚至更晚的時候還有，《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中有《產經》、《雜產書》等，和此一起的還有《解夢書》、《祥瑞圖》等，可見這類的《產經》和醫書無涉，當是有關迷信的書。

## 3. 日忌

《韓非子·亡徵》指責當時人“用時日，信鬼神”。“用時日”是指人做各種事幾乎都要選吉日而避開忌日或凶日。漢代和戰國、秦沒差別，人們一舉一動似乎都要受到時日約束。漢簡中見到的時日迷信有以下幾個方面。

### ① 殺忌

《居延新簡》E·P·T 58: 20有關於哪些日子不可宰殺六畜的忌諱：

三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八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八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九月三日、十九日、廿四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月朔日、廿日、廿二日、廿九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一月四日、廿六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十二月十一日、廿四日、卅日不可以殺六畜見血

與此類似的內容，也見於《漢晉西陲木簡》：

日利以□□反行，壬子者，不可殺牛。

某些日子不能宰殺牲畜，秦的《日書》中也有，《日書》甲種“星”：

牽牛……不可殺牛。

東井……以殺牲，必五牲死。

另在“牛良日”、“犬良日”中，云是“戊午不可殺牛”，“壬寅殺犬，有殃”。可見，哪些日子忌殺六畜，漢以前已有這種習俗。漢人以為殺牲則見血，以見血為不吉。王國維云：

血忌見《論衡·四諱篇》，祭祀言觸血忌。又《譏日篇》：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又《陰陽書》：

日凶占法血忌，忌針灸，穿牛殺馬血□割六畜。宋《會天曆》及今曆記每日所值神殺，尚有血忌，知由漢訖今不改也。⑤

王充所說，是指東漢人祭祀時殺牲應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但“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東漢時屠家似不必忌諱，避忌者乃祭祀之家。

## ② 入官

漢代官吏上任須擇吉日，不吉利的日子一定要避開，《居延新簡》(E·P·T 40: 38)：

車祭者占牛馬毛物黃白青駟以取婦嫁女、祠祀、遠行、入官、

遷徙……。

《漢晉西陲木簡》也有一條：

壬癸亥子入官視事及舉百事凶。

這種迷信在秦《日書》中頗為常見，如雲夢秦簡中《日書》甲種的“稷辰”云：

秀，是謂重光……臨官立正相宜也，利徙官。

危陽……以為齋夫，必三徙官，徙官自如，其後乃昌。⑥

陰……為齋夫，久。

又有“入官良日”

入官良日：丁丑入官，吉，必七徙。寅入官，吉。戌入官，吉。

亥入官，吉。申入官，不計去。酉入官，有罪。卯入官，凶。未、

午、辰入官，必辱去。⑦

在關於門的禁忌部分，提到每年十二個月中各有一天不利於入官，以為“凡此日不入官及入室，入室必滅，入官必有罪”。

在《日書》乙種裏面有“入官”一節，說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三個月中各有幾天“利入官”。另外也說某些日子入官“凶”或“有罪”。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中也出有《日書》，裏面有“入官”的時日。⑧

雲夢及天水秦墓的墓主都是地方的小官，他們對入官選擇合適的時日當然非常的重視，墓中出土不少涉及入官迷信的資料是不奇怪的。在雲夢秦墓出土的《大事記》中有墓主喜的一些經歷。如記喜於秦王政七年“正月甲寅為鄢令史”，又記十二年癸丑，“治鄢獄”。現從《日書》乙種查得，癸丑、甲寅都是入官、見人的吉日，這證明當時人搜集這類材料，具有很大的使用價值。西漢時西陲邊塞，有不少的文職或武職官員，入官要尋找什麼時日，對於他們也是必須掌握的一種知識。《隋書·經籍志》陰陽類中有《拜官書》一種，漢簡簡文可能就是從這類書中抄錄而來者。

### ③ 出入奴婢

《居延新簡》中有一簡，文曰：“出入奴婢良日，乙丑、辛……”（E·P·T·65：165A）

這當是《日書》中的內容之一。秦《日書》出入“人民”、“臣妾”的例子甚多。“出入”指買賣，如《日書》中有“利以出貨，不可以入”，可以為

證。良日是買賣奴婢的吉日，秦《日書》中有馬、牛、羊、犬、雞等良日，其中有“人良日”。⑨這裏的人是可以買賣的，當然是指奴婢而言了。人良日中包括“良日”和“其忌”兩部份。良日包括：乙丑、乙酉、乙巳、己丑、己酉、己巳、辛丑、辛酉、辛巳、癸酉、癸巳。“其忌”是指不利於買賣奴婢的時日，包括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子。最後還注明，“男子龍庚寅，女子龍丁”。龍日是忌日的意思，則奴當避開庚寅，婢則避開丁。前引漢簡簡文，以乙丑為買賣奴婢的吉日，而秦的“人良日”就有乙丑，可見漢代的有些日忌和秦相同，表明這類迷信有繼承關係。但簡文所本不是秦《日書》，應是漢《日書》，這主要從奴婢這一稱謂而看出。因為秦《日書》中稱奴隸為“人民”、“臣妾”、“臣徒”。單稱奴或婢者有之，“奴妾”連稱者也有，奴婢連在一起則不見，而西漢時與戰國或秦不同，祇見奴婢而不見臣妾、人民，表明秦與漢在某些習慣上有如此的差異。

秦、漢《日書》中“出入”奴隸的話很常見，當是當時買賣奴隸極為頻繁的一種反映。

#### ④ 劾鬼

簡文中有驅除鬼魔的內容，如《居延新簡》中有這樣一條：

厭魅書，家長以制日疏魅名。魅名天牧鬼之精，即滅亡。有敢苛者，反受其殃，以除為之。(E·P·T 49:3)

文中的魅字，按《說文》解釋，為厲鬼之意。此字也見於馬王堆所出的醫書，如云：“禹步三，祝曰：魅父魅母，取桃東祝。”又《山海經·西山經》：“剛山是多神魃。”這裏寫法不同於簡文所見者，實際是一個字。漢代的醫仍和巫有密切的關係，故醫師治病時還須採取除魔劾鬼之術。即通過禹步、唸咒等法術，以達到驅鬼療病的效果。

簡文稱“厭魅書”，很明顯這是一道厭劾魔的文書，驅鬼者為家長。制日見於《抱朴子·登涉》：

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

據《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下云：“制日，支于上尅下之日，戊子、己亥是也。”可見驅鬼也須挑選有利的時日。⑩

“疏魅名”是指寫上厲鬼之名字。疏有抄錄之意，如《漢書·蘇武傳》：



“初桀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顏注：“疏謂條錄之。”簡文中已言明鬼名為“天牧鬼之精”。疏鬼名即將此名寫上。按照古人的迷信，一是以為各種鬼怪都有名字，二是如果能叫出其名字，鬼怪就會感到畏懼。這當然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想法。秦《日書》甲種中有制止人做惡夢的祝辭，一開頭就是呼夢神之名。呼鬼神名以起到厭劾作用的做法，一直延續到後世，《抱朴子·登涉》提到過此事：

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間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跂，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

《抱朴子》又說為了能辟“山川廟堂百鬼”，辦法是“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白澤圖》早已亡佚，但《太平御覽》卷886妖異部中保存了幾條，如云：

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夜見堂下有小兒被髮走，忽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即無咎。

呼鬼怪名以起到厭劾作用的做法，在漢代相當普遍。如過去江蘇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中曾出土一朱書陶罐和一方木簡，罐上寫有“玉池坤神”，簡上有符，簡文內容是：

乙巳日死者鬼名為天光，天帝神師已知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南山□□令來食汝，急如律令。⑪

上述簡文，是東漢實物。這和前引居延出土的西漢木簡，屬同一類型。即先呼鬼名，然後下令驅趕之，稍有不同者，驅鬼者一為家長，一為天帝神師。漢魏時巫覡驅鬼的法術漸被道教所吸取，從《抱朴子》就能明瞭這點。

從漢簡中的鬼神迷信內容看出以下兩點：

一是近幾十年來，山東、河北、安徽、湖南等地漢墓中，都出土過一些《日書》或其他陰陽迷信的作品，表明在內郡地區迷信思想頗為盛行。現在從西北等地的漢簡發現，當時在邊塞一帶，人的思想信仰和內郡很少差異。當然，墓中出土迷信書的抄件和節錄，也可以看出於殉葬的需要。而從西北的漢代遺址中，迷信作品和公文、典籍等同出，證明這類內容在當時有很大的實用性，成為人們的居家的必備之物。從此也看出，當時人的許

多行動都會受到各種禁忌的限制。這種迷信習俗受到官府的重視和保護，東漢時就有這樣的實例，《後漢書·王景傳》說：“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云。”作為地方官的王景，曾為這類迷信著述做了整理和編定的工作，社會對這類書的認可是沒問題的。實際上從兩漢到魏晉，這類著作也獲得了發展，因此，《隋書·經籍志》中著錄的品種、數量都比《漢書·藝文志》更多。

二是西漢的鬼神迷信，和戰國、秦有密切的承襲關係。最明顯的是，見於漢簡的諸多迷信內容，在秦的《日書》等作品中也有，能看出其前後的連續性。漢的不少迷信習俗甚至影響到唐宋或明清，這表明迷信本身的保守性極強，往往可以長時間的流傳下去。

## 注 釋

- ① 《敦煌漢簡釋文》第122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② 《銀雀山漢簡釋文》第111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③ 《雲夢睡虎地秦簡》第254頁。
- ④ 同上書第236頁。
- ⑤ 《流沙墜簡》第90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 ⑥ 《雲夢睡虎地秦簡》第184—185頁。
- ⑦ 同上書第208頁。
- ⑧ 《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文物》1989年第2期。
- ⑨ 《雲夢睡虎地秦簡》第194頁。
- ⑩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第317頁注23，中華書局1985年版。
- ⑪ 《江蘇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 田章簡補釋

裘錫圭（北京大學中文系）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簡中，有一枚寫有“田章對曰”等文句的木簡，原始編號為T·XX111·1·i·7。1931年張鳳在他所編的《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中首次發表此簡，列為51頁第11號。張氏名之為“田章簡”，今襲用此名。斯坦因第二、三兩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本來都委託法國漢學家沙畹進行研究。沙畹祇發表了第二次所獲漢簡等文書就去世了，第三次的由其弟子馬伯樂繼續研究。馬伯樂在二次大戰中死於納粹集中營，其研究成果在他去世多年後纔得到發表，即1953年在倫敦出版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田章簡在此書中的編號為28。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林梅村、李均明編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下文簡稱《疏勒》），此簡編為730號。1991年中華書局出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敦煌漢簡》，此簡編為2289號。

張鳳對田章簡的釋文如下：

為君子田章對曰臣聞之天之高萬萬九千里地之廣亦與之等山  
岳谿谷南起江海裏

“山岳”二字簡文原作𡵓茲。張氏所釋顯然與字形不符。馬伯樂釋為“岳並”，勞榦《漢晉西陲木簡新考》改釋為“岳茲”（釋文12頁，此書為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七，1985年出版於臺北），《敦煌漢簡》從之，其實也都不可信，《疏勒》比較審慎，對此二字缺釋。“谷”上一字簡文原从“系”，所以《疏勒》改釋為“谿”，《敦煌漢簡》從之。從文義看，此字似祇能釋為“谿”，簡文从“系”可以看作譌體（漢簡从“奚”聲之字多寫作从“系”，脫去上部的“爪”便成“系”了）。“谷”下之字，各家皆釋為“南”，其實也有問題。簡末一字原作震，張氏釋“裏”，馬伯樂釋“裏”，勞氏釋“裏”，

皆不可信。《疏勒》釋“震”，《敦煌漢簡》從之，應該是正確的。

要想正確釋出上舉被誤釋的字，必須先明瞭田章簡簡文的性質。容肇祖在《馮夢龍生平及著作》一文中談到了田章簡。他指出田章的故事見於敦煌寫本句道興《搜神記》，應為漢魏六朝間通行傳說，其故事中有從晏子故事演變而成的內容（如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章類似的内容，就見於田章故事），“田章”可能就是見於《晏子春秋》的“弦章”的謠傳，敦煌寫本《晏子賦》中正有與田章簡相似的内容，二者當從同一個故事模型而出（容文載《嶺南學報》二卷三期，今據陳槃《漢簡賸義再續·拾玖·田章及其所言之天地高廣》所引撮述其大意。陳文已收入其《漢晉遺簡識小七種》，為史語所專刊之六十三，1975年出版於臺北）。容氏的意見很精闢，可以信從。

現將《晏子賦》的有關內容引錄於下，以供對比（引自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上冊 245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王乃問晏子曰：“汝知天地之綱紀，陰陽之本姓（性），何者為公？何者為母？何者為左？何者為右？何者為夫？何者為婦？何者為表？何者為裏？風從何處出？雨從何處來？霜從何處下？露從何處生？天地相去幾千萬里？何者是君子？何者是小人（原校：此兩句原作“何者是小人？何者是君子？”據乙卷互易）？”晏子對王曰：“九九八十一，天地之綱紀；八九七十二，陰陽之本性。天為公，地為母，日為夫，月為婦，南為表，北為裏，東為左，西為右，風出高山，雨出江海，霜出青天，露出百草。天地相去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富者是君子，貧者是小人。出語不窮，是名君子。”（此文似以“紀”“母”“右”“婦”“裏”“來”“里”“子”“海”為押韻字。這些字都屬於上古至漢的古韻的之部。魏晉以後，字音已多有變化。由此看來，此文可能保留了不少從漢代傳下來的內容。）

陳槃在《漢簡賸義再續·拾玖·田章及其所言之天地高廣》條中指出，類似的問答還見於敦煌寫本《孔子項託相問書》（上引陳書 129 頁上）。現將《相問書》中的那段問答也引錄於下（引自《敦煌變文集》



夫子問小兒曰：“汝知天高幾許。(原校：丙卷“許”作“里”)地厚幾丈？天有幾樑？地有幾柱？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霜出何邊？露出何處？”小兒答曰：“天地相卻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原校：己卷“以天等同”作“與天共同”)。風出蒼吾(梧)，雨出高處(原校：己卷“處”作“山”)，霜出於天，露出百草(原校：甲卷以上四句作“風起於山，雨出江海，霜出河邊，露出百草”)。天亦無樑，地亦無柱，以四方雲而乃相扶，故與(原校：戊卷“與”作“以”)為柱，有何怪乎！”

上引《晏子賦》和《相問書》所提問題，大概多數在田章簡原來所屬的田章故事中也提了出來，不過有些問題的內容稍有出入，提問的次序也有所不同。田章簡開頭的“為君子”，顯然是“何者為君子”一問的殘文(參看上引勞書 72 頁)。《晏子賦》問“天地相去幾千萬里”，《相問書》問“天高幾許，地厚幾丈”。田章簡已佚失的上文當首先問及天高和地廣，所以田章對曰：“臣聞之，天之高萬萬九千里，地之廣亦與之等。”在句道與《搜神記》田章故事中，向田章提問的是天子(《敦煌變文集》下冊 885 頁)。從簡文“臣聞之”語看，此處問田章的也應是一個君王。

簡文“□□谿谷，□起江海”兩句，從《晏子賦》和《相問書》所提的問題以及簡文文義看，無疑是回答“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這樣的問題的。所以“起”上一字不應釋“雨”而應釋“風”。簡末“震”字的“雨”頭，中豎稍微出了一點頭，寫法與此字基本相同。《晏子賦》和《相問書》甲卷都說“雨出江海”，這是簡文“□起江海”句首字必為“雨”字的確證。“谿谷”上二字寫法甚怪，但結合文義和字形來考慮，可以斷定必是“風發”。第一字上部寫法與“風”字完全相合，下部寫法譌變，與簡文“谿”字左旁譌作“系”同例。漢簡“發”字簡體，上部往往作 𠂇 𠂈 𠂉 等形(見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241 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第二字上部寫法跟它們相同或相近。其下部右半的“爿”，寫法比較特殊，所从的“又”的第二筆寫得既粗又平，並與左面的“弓”旁下端相接，看起來好像全字底部的一道橫畫，所以這個“發”字就不好認了。《晏子賦》說“風出高山”，《相問書》甲卷說“風出於山”。谿谷是在山中的，“風發谿谷”意與“風出於山”



相近。簡末的“震”似當指雷。《詩小雅·十月之交》“燂燂震電”《毛傳》：“震，雷也。”但《晏子賦》和《相問書》都祇提到霜、露，而沒有提到震雷，此字意義尚可進一步研究。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把田章簡的釋文寫定如下：

-----為君子？”田章對曰：“臣聞之：天之高萬萬九千里，地之

廣亦與之等。風發谿（谿）谷，雨起江海，震-----

從字體看，此簡時代當屬西漢無疑。

容肇祖指出了田章簡與敦煌寫本《晏子賦》的關係，還指出漢魏六朝時的田章傳說與更早的晏子傳說有關，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發現。勞榦在討論田章簡時說：“晏子賦為唐人話本，較此簡為後，則自戰國以還，歷經六代。而民間遺說，在唐代尚存，亦足珍矣。”（上引勞書74頁）近年在尹灣漢墓中發現了在題材和體裁上都跟敦煌寫本《燕子賦》相近的《神鳥賦》（參看拙文《〈神鳥賦〉初探》，《文物》1997年1期），近來我又在已發表的漢簡中發現了其內容與敦煌寫本《韓朋賦》的部分內容大體相合的一枚韓朋故事殘簡（有關論文待刊），看來漢、唐兩代的俗文學之間的確存在着很密切的關係。晏子傳說當起於春秋晚期或戰國時代，韓朋傳說當起於戰國晚期。有學者指出，《神鳥賦》、《燕子賦》從民間故事角度看同屬“禽鳥奪巢”這一類型（劉樂賢、王志平《尹灣漢簡〈神鳥賦〉與禽鳥奪巢故事》，《文物》1997年1期）。《詩·召南·鵲巢》和《豳風·鸛鳴》說明這類民間故事在先秦時代早已存在。所以上面提到的那些漢代俗文學作品，一方面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一方面其源頭又都可以追溯到先秦。它們在中國古代俗文學研究上的價值，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

## 河北定州出土西漢簡本 《論語》性質新探

王素(中國文物研究所)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村40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包括《論語》、《文子》、《日書》、《太公》、《保傅傳》、《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以及蕭望之等人的奏議、其他有關孔子和弟子言論的佚名古籍。據整理者研究，墓主為西漢中山懷王劉脩。按：“脩”一作“循”。《漢書》卷五三《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條：“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同書卷一四《諸侯王表》中山靖王勝條：“地節元年（前69），懷王脩嗣，十五年薨，亡後。”由地節元年順推十五年，則劉脩卒於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墓中出土古籍及奏議，均為是年以前寫本，自然彌足珍貴。而其中《論語》，作為現存最古的寫本，意義當然更為重大。據介紹：簡本《論語》二十篇，保存最少的為《學而》，祇有20字；最多的為《衛靈公》，有694字。全書共存7576字。雖然不足傳本《論語》的二分之一，但僅此已經可以對《論語》的源流進行若干新的研究了。然而，關於這部簡本《論語》的性質，研究者的見解卻各不相同。大致有三說：

（一）古本《論語》說。此說由整理組最早提出。他們認為：“這次發現的簡本不僅是時代最早、保存文字最多的古本《論語》，而且還是《魯論》、《齊論》、《古論》三論并行時的一個本子。它的發現為研究三論流傳、演變的情況，校勘傳本《論語》，都是極好的依據。”①

（二）《齊論》說。此說由李學勤先生隨後提出。李先生作為原整理組的負責人，對簡本《論語》有很深的研究。他首先根據墓主的生活時代，認為：“《張侯論》在中山懷王時恐怕還沒有形成，八角廊《論語》不可能是張禹的本子。”然後根據簡本《論語》分章與傳本《論語》多不相同，文字與傳本《論語》更

多歧異，認為：“這也說明竹簡不會是《魯論》系統的本子，考慮到《古論》流傳不廣，《齊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②

(三)《魯論》說。此說似乎由承擔具體整理工作的劉來成先生最後提出。他根據簡本《論語》的章節、詞句、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而似乎與《魯論》相近，認為：“在簡本中發現《魯論》所具有的文字則應當是《魯論》本來的東西，這是從今本《論語》中所看不到的。在定州漢簡中和《論語》一起出土的，還有蕭望之的奏議。蕭望之在當時是皇太子的老師，是傳授《魯論》的大師。劉脩死後把《論語》同蕭望之的奏議放在一起，應不是偶然的。”③

這三說，古本《論語》說較為含糊，《齊論》說和《魯論》說都較明確。而所謂古本《論語》，很容易讓人認為就是《古論》④。為此，我以為首先應將《古論》排除。這一方面因為，在宣帝五鳳三年（前55）前，《古論》實際上並沒有流傳⑤；另一方面因為，《漢書·藝文志》論語類明言：“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注引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而簡本《論語》祇有二十篇，《堯曰》“子張問”章並未分出單獨為篇。其次，《齊論》也可以排除。因為前引《漢書·藝文志》論語類又明言：“《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注引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而簡本《論語》也未見此二篇。然則，當時的《論語》，祇有《古論》、《齊論》、《魯論》三種，《古論》、《齊論》都被排除，是否就一定為《魯論》呢？我以為，也不能就此簡單論定。這不僅因為劉來成先生祇是提出見解，並未就此進行論證；而且因為，簡本《論語》實際上也不完全是《魯論》（見下文）。由於李學勤、劉來成二先生均將簡本《論語》與傳本或今本《論語》比較，劉來成先生更以《魯論》學者蕭望之的奏議與簡本《論語》同出作為簡本《論語》為《魯論》的證據，我想在此談談有關傳本或今本《論語》的性質問題，以及齊學、魯學之爭和《齊論》、《魯論》的融合問題。

根據我的理解，所謂傳本或今本《論語》，應主要指曹魏何晏的《論語集解》。在漢、唐各種《論語》注本都相繼亡佚的情況下，何晏的《集解》獨存，並經梁皇侃作《義疏》，唐陸德明作《音義》，宋邢昺作《疏》，流傳廣遠，自然成為後來所有《論語》的底本。整理者對簡本《論語》進行校勘，用了三個本子，即：《論語注疏》及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康有為《論語注》、黃焯

《經典釋文匯校》，即均為《集解》系統的本子。但根據《集解》系統的本子，對簡本《論語》進行校勘，祇能比較二者的異同，並不能確定簡本《論語》是《齊論》或是《魯論》。因為，《集解》本身既非《齊論》，又非《魯論》，而是一個融合各家的本子。根據張椿蓀、陳金木等先生的最新研究：《集解》收有孔安國、馬融、包咸、周氏、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及何晏自己九家注。其中孔安國、馬融注的是《古論》，包咸、周氏注的是包含《齊論》在內的張侯本《魯論》，鄭玄注的是三論的融合本。由於注文是注解經文，經文與注文需要配合，《集解》引用孔、馬注文，就必須用孔、馬所據的《古論》經文；引用包、周注文，就必須用包、周所據的張侯本《魯論》經文；引用鄭氏注文，也必須用鄭氏所據的三論融合本經文。因此，《集解》實際是孔、馬、包、周、鄭五家的融合體，亦即《古論》、《齊論》、《魯論》的融合體⑥。這種見解是可以成立的。祇是需要強調，這五家，包、周所據為《張侯論》，鄭氏所據亦主要為《張侯論》，即《集解》這個融合體，實際是以《張侯論》為主。而在這種情況下，劉來成先生根據對《集解》系統的本子所進行的比較，明知二者存在很大的差異，卻未加任何解釋，便認為在簡本《論語》中發現了《魯論》的文字，顯然是不具備說服力的。

另外，根據敦煌、吐魯番新出《論語鄭氏注》，特別是鄭氏注本中的“從《古》改《魯》”，也不能得出上述結論。我們知道，何晏《集解叙》說鄭玄是“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而實際上，鄭氏注本是篇章主要根據融合《齊》、《魯》的《張侯論》，字句主要根據《古論》。陸德明《釋文》說“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也實際上是“從《古》改《魯》”。但這個《魯》並不是單純的《魯論》，也是融合《齊》、《魯》的《張侯論》。我們可以用簡本《論語》的存文，與今本亦即《集解》比較，並與鄭本的“從《古》改《魯》”進行對照。如：

(1) 簡本《雍也》：“賁而[殿]。”“殿”，今本同，日本清家正和本《集解》引《釋文》：“魯讀‘殿’為‘振’，今從古。”

(2) 簡本《述而》：“……以學，亦可以毋大過矣。”“亦”，今本作“易”，屬上。《釋文》：“魯讀‘易’為‘亦’，今從古。”

(3) 簡本《述而》：“印為之不厭。”“印”，今本作“抑”，“印”為“抑”之譌。日本清家正和本、嘉慶本、建武本《集解》引《釋文》：“魯讀‘抑’為‘意’，



今從古。”

(4) 簡本《述而》：“誠為弟子弗能學也。”“誠”，今本作“正”。《釋文》：“魯讀‘正’為‘誠’，今從古。”

(5) 簡本《述而》：“君子坦蕩。”“蕩”，今本同。《釋文》：“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

(6) 簡本《泰伯》：“備而不願。”“願”，今本同。日本清家嘉曆本《集解》引《釋文》：“魯讀‘願’為‘亂’，今從古。”

(7) 簡本《先進》：“舊貫而可。”今本前多一“仍”字。《釋文》：“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8) 簡本《先進》：“咏而歸。”“歸”，今本同。《釋文》：“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9) 簡本《衛靈公》：“服周之綯。”“綯”，今本作“冕”。唐寫本《鄭注·子罕》經文：“弁衣裳者。”“弁”，今本亦作“冕”。注云：“魯讀‘弁’為‘綯’，今從古。”例與本條同。

(10) 簡本《衛靈公》：“好行小惠。”“惠”，今本作“慧”。《釋文》：“魯讀‘慧’為‘惠’，今從古。”

(11) 簡本《陽貨》：“古之[矜]也廉。”“矜”，今本同。《釋文》：“魯讀‘矜’為‘貶’，今從古。”

(12) 簡本《陽貨》：“天何言哉。”“天”，今本同。《釋文》：“魯讀‘天’為‘失’，今從古。”

(13) 簡本《陽貨》：“惡果敢而窒者。”“窒”，今本同。《釋文》：“魯讀‘窒’為‘室’，今從古。”

(14) 簡本《堯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章，今本有。《釋文》：“魯讀無此章，今從古。”

上列十四條，簡本《論語》與鄭玄所據《魯論》亦即《張侯論》同者僅五條（即二、四、八、九、十），不同者達九條（即一、三、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此外，還有一條。即：簡本《公冶長》：“可使治其賦也。”“賦”，今本同。《釋文》引梁武云：“《魯論》作‘傳’。”也不相同。顯然，我們也不能據此認為簡本《論語》就是《魯論》。因此，我以為，由於鄭氏注本以及傳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誰也沒有見過真正的《齊論》和《魯論》。



根據這種比較是無法確定簡本《論語》的性質的。但簡本《論語》的性質也不是完全無法推定。這就需要瞭解當時存在的齊學、魯學之爭，以及有關《齊論》、《魯論》的融合背景。

西漢時代，儒家經典有經、傳之分。經指先王之書，有五種，即《易》、《書》、《詩》、《禮》、《春秋》，號稱“五經”。傳指孔子所說之書，《論語》、《孝經》等均在其中。齊學、魯學之爭，經、傳均有。但比較而言，經的齊學、魯學，有的內容完全不同，而又涉及到能否立為“五經博士”，爭得較為激烈；傳的齊學、魯學，內容普遍並無太大差別，而又與政治地位關係不大，爭得較為緩和。譬如：《春秋》的《公羊》和《穀梁》，《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內容完全不同，爭得較為激烈<sup>⑦</sup>。相比之下，《齊論》和《魯論》，內容並無太大差別，爭得較為緩和。梁皇侃《義疏叙》引劉向《別錄》稱：“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這應是早期情況。隨着傳習範圍的擴大，此二論不久就呈現融合的趨勢。而且，由於《魯論》更具正宗意義，這種融合，實際上是以《魯論》為主。

前引《漢書·藝文志》論語類記有關解說著作共四種，為：《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齊論》僅一種，《魯論》有三種，可見傳習《魯論》的人已較傳習《齊論》的人為多。又云：

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即王吉）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其中，傳《齊論》者的籍貫：宋畸屬東海，庸生屬膠東，王吉、貢禹均屬琅邪，均為齊人；唯五鹿充宗為晉人。傳《魯論》者的籍貫：夏侯勝、韋賢、扶卿均屬魯，為魯人；蕭望之屬東海，為齊人；張禹屬河內，龔奮不詳，應均為齊、魯以外之人。可以看出，當時傳習《齊》、《魯》二論者，已不限齊、魯二地之人。不僅如此，融合的趨勢也越來越向《魯論》發展。

首先，王吉既為齊人，又為《齊論》大家，其子王駿却傳習《魯論》，並且頗有建樹。如《漢書》卷七十二《王吉傳》云：“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梁丘賀也是琅琊人，崇尚齊學。王吉令王駿從賀受《易》，顯然也是

希望王駿傳習齊學的。但王駿後來卻改習魯學，並著《魯王駿說》二十篇，成為《魯論》名家。其次，蕭望之本為齊人，據同書卷七八本傳記載，他原“治《齊詩》”<sup>⑧</sup>，崇尚齊學，後來纔“從夏侯勝問《論語》”，成為《魯論》大家。至於張禹，雖然既非齊人，亦非魯人，無拘無束，活動空間更大，但他治學，也是先傳《齊論》，後轉《魯論》的。同書卷八一本傳云：

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宣帝）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元帝）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賢）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王陽（即王吉）、庸生均為《齊論》大家。張禹先後從二人學，自是先傳《齊論》。何時改轉《魯論》，無考。但決不可能如《集解叙》所說：“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sup>⑨</sup>所以產生此說，大概是因為，張禹融合《齊》、《魯》的《張侯論》，實際上是以《魯論》為底本，以《齊論》為校本，“善者從之”（《集解叙》）而成。而根據本傳，張禹編撰《論語章句》，也就是前述《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曾參考王陽、庸生、扶卿、夏侯勝、蕭望之、韋玄成（賢）六家之說。此六家，二家為《齊論》，四家為《魯論》。這也證明，所謂《張侯論》，是以《魯論》為主，以《齊論》為輔。《漢書·藝文志》將張禹作為《魯論》大家，將他的著作作為《魯論》系統，也是出於這種考慮。但顯然不能因此就推測張禹是“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認為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是對當時存在“由《齊》轉《魯》”風氣不瞭解造成的一種誤會。

王吉、蕭望之均為宣帝時人，王駿、張禹均為宣帝末至成帝時人。據此，可以推測，這種“由《齊》轉《魯》”的風氣，應該在宣帝時已經形成。當然，從整個齊學、魯學遞嬗演變的角度看，還有可能更早。《漢書》卷八八《儒林傳》說：武帝“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

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這是武帝時期，太子不僅公開傳習齊學《公羊》，還私下兼習魯學《穀梁》的一個例證。太子作為齊、魯以外之人，對齊學、魯學本無成見，而不滿足於被迫瞭解正統的齊學《公羊》，主動喜愛非正統的魯學《穀梁》，成為後來魯學《穀梁》大盛，齊學《公羊》漸衰的一個預兆。中山懷王劉脩也為齊、魯以外之人，他對待《齊論》、《魯論》的態度，亦應與武帝太子相同。劉來成先生曾以《魯論》大師蕭望之的奏議與簡本《論語》同出作為簡本《論語》為《魯論》的證據。其說雖然不能成立，但有很重要的提示，即：如前所述，蕭望之作為“由《齊》轉《魯》”的代表人物，他的奏議與簡本《論語》同出，是否顯示簡本《論語》不僅是《魯論》，其中也包含有《齊論》呢？答案應是肯定的。我認為：簡本《論語》實際上是一個比《張侯論》更早的融合本。而且，這個融合本也是以《魯論》為底本，以《齊論》為校本。關於這一點，我們有明確的證據。這就是簡本《論語》對《堯曰》及其最後一章的處理。

我們知道：《堯曰》在《集解》系統的《論語》中，屬於最後一篇。該篇共三章：“堯曰”為第一章，“子張問”為第二章，“孔子曰”為第三章。“孔子曰”這一章，原始的《齊論》、《魯論》是否有，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知道，《張侯論》沒有，《古論》卻有。這就是前引鄭氏注本所說：“魯讀無此章，今從古。”《集解》有，也是根據《古論》。這從《集解》此章所引為《古論》孔安國、馬融的注釋即可證明。而簡本《堯曰》有此章，但它作了這樣的處理：一方面在篇末注明“凡二章”，顯示本篇實際祇有二章；另一方面將此第三章用二個圓點間隔，用雙行小字寫在簡的最下部，顯示此章原來不屬本篇，在這裏也僅作附錄。很顯然，簡本《論語》在本篇用了二個本子。如前所說，當時《古論》並沒有流傳。如此，這二個本子，祇能一個是《齊論》，一個是《魯論》。《張侯論》以《魯論》為底本，沒有此章。據此推測，本篇正文二章應是《魯論》，附錄的第三章應是《齊論》<sup>⑩</sup>。也就是說，本篇也是以《魯論》為底本，以《齊論》為校本。此前十九篇，情況應該相同。我們可以試從其中章句情況進行分析。

關於分章，我們已知簡本《堯曰》從《魯論》為二章，《齊論》有三章，《齊論》之章多於《魯論》。整理者另外介紹：

《鄉黨》“食不厭精”至“鄉人飲酒”，今本分為二、三、五章的都

有，而簡本祇是一章：“雷風烈必變”與“升車”，今本分為二章，簡本也是一章。《陽貨》“子貢曰：君子有惡乎”，今本別為一章，而簡本則同上面“子路曰”合為一章<sup>⑪</sup>。

可見簡本分章一般亦較今本為少。關於字句，情況亦同。譬如：簡本《為政》：“先行其言從之。”今本作：“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簡本《述而》：“老之至。”今本作：“老之將至。”又：“君子艱蕩，小人長戚。”今本作：“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簡本《鄉黨》：“怠若也。”今本作：“怡怡如也。”又：“六者式。”今本作：“凶服者式之。”還有很多，不贅舉。可見簡本字句一般亦較今本為少。按何晏《集解叙》說：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皇侃《義疏》解釋為：

其二十篇雖與《魯論》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

可見《魯論》的特點是章句較少，《齊論》的特點是章句較多。據此，我們對簡本《論語》及所謂《張侯論》，又有了新的認識。這就是：

(一) 簡本《論語》確以《魯論》為底本，並且以《魯論》原文為主。因為，簡本《論語》不僅祇有二十篇，篇數與《魯論》同，而且章句較少，正是《魯論》的特點。至於簡本《論語》以《齊論》為校本，其中究竟包含多少《齊論》，目前還不太清楚。這是今後需要對照研究的課題。

(二) 《張侯論》雖然也以《魯論》為底本，但由於張禹本人是先傳《齊論》，後轉《魯論》，其中章句應主要根據《齊論》。今本《論語》的主體，不論是新出的鄭氏注本，還是傳世的《集解》系統的本子，均由《張侯論》演變而成，章句均較簡本《論語》為多，也正是《齊論》的特點。至於《張侯論》以《魯論》為底本，其中究竟包含多少《魯論》，目前也還不清楚。這也是今後需要對照研究的課題。

我以前研究《張侯論》和《論語鄭氏注》，常有這樣一些疑問：張禹先從名師傳習《齊論》，為何“數典忘祖”，後來竟以《魯論》成家？鄭玄分明僅“從《古》改《魯》”，《集解叙》為何說成是“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釋文》又為何說成是“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sup>⑫</sup>？現在終於明白：張禹的《張侯論》，實際上是：篇目完全根據《魯論》，章句主要根據《齊論》。而當時判斷屬於何種本子，主要根據篇目。如前引《漢書·藝文志》論



語類談《古》、《齊》、《魯》三論的區別，就舉《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為例。《張侯論》根據《魯論》排列篇目，自然被劃屬《魯論》。《張侯論》根據《齊論》安排章句，反而沒有引起重視。後來，甚至不知《張侯論》原是《齊》、《魯》二論融合體，更誤認為《張侯論》就是《魯論》。前引《集解叙》及《釋文》，談到鄭玄考讀，特別提出《齊論》，以與《張侯論》的《魯論》對應，便是出於這種誤會。而鄭玄本人對《張侯論》的性質是很清楚的，故而僅從《古》改《魯》，從未從《齊》改《魯》。當然，由於《魯》中本就含《齊》，也無法從《齊》改《魯》。

綜上所述，可作如下小結：簡本《論語》是一個比《張侯論》更早的融合本。這種融合本與《張侯論》相同，也是以《魯論》為底本，以《齊論》為校本。不同的是，簡本《論語》的章句保存《魯論》原貌更多，而《張侯論》的章句主要是根據《齊論》。簡本《論語》的章句與以《張侯論》為主體的今本《論語》的章句頗多差異，蓋源於此。西漢時代，不僅存在“由《齊》轉《魯》”的風氣，而且存在融合《齊》、《魯》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相信當時的《論語》傳習者曾經編撰不少類似融合本。區別在於，張禹的《張侯論》是為成帝編撰，並且幸運地流傳了下來；而簡本《論語》是為中山懷王編撰，非常不幸地成為了隨葬品。二千多年後的今天，簡本《論語》重新出土，使我們對西漢時代有關《齊》、《魯》的融合問題，以及《張侯論》的性質問題，有了新的認識，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

## 注 釋

- ①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四〇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8期，11頁。
- ②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4年，408頁。
-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劉來成執筆）《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文物》1997年第5期，61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劉來成執筆）《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4頁。



- ④ 譬如，陳金木就認為：該文實際上“斷定其（指簡本《論語》）為《魯論》、《齊論》、《古論》并行時代的《古論》”。見《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研究——以考據、復原、詮釋為中心的考察》上冊，文津出版社，1996年，61頁。
- ⑤ 按：據《漢書·藝文志》尚書類記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據同書卷三六《楚元王劉交附劉歆傳》記歆移書太常，有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前100～前97）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閎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我們知道：這批古文經典，由孔壁出土後，直到武帝天漢之後，纔由孔子的後人孔安國獻入宮中。巫蠱之難，發生於征和元年（前92），結束於征和二年（前93）。這批古文經典，因為此難，無人整理傳授，未能列於學官。此後，一直藏於宮中祕府，完全無人過問。直到成帝（前32～前7）當政，有感於經典失真，纔派人進行整理。顯然，在成帝當政之前，這批古文經典的大部分是不可能流傳的。後人懷疑《古論》在此之前曾經流傳，是因為孔安國不僅整理過《古論》，還整理過《古文尚書》，根據《古文尚書》在此之前確曾流傳，推測《古論》的情況應該相同。但實際上，二者的遭遇有很大的區別。孔安國整理《古文尚書》，當時已為人所知，司馬遷的《史記》並曾著錄。孔安國整理《古論》，當時卻無人知道。何晏《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大概東漢以後，纔為人所知。因此，《古論》在宣帝五鳳三年（前55）前，實際上並沒有流傳。
- ⑥ 張蓓蓓《關於〈張侯論〉的一些問題》，《孔孟學報》第26卷第3期，1987年，41～43頁；前引陳金木《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研究——以考據、復原、詮釋為中心的考察》上冊，47～48頁。還有一些相關的見解，此處不贅。

- ⑦ 據《漢書》卷八八《儒林傳》記載：董仲舒為廣川人，地屬齊，通齊學《公羊》；江公為瑕丘人，地屬魯，通魯學《穀梁》。“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喑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後來，宣帝好《穀梁》，令蔡千秋等講《穀梁》。“有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
- ⑧ 按：同書卷七五《翼奉傳》亦云：“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蕭望之與翼奉、匡衡均為齊之東海人，三人同門，共習《齊詩》也。
- ⑨ 皇侃為生實其事，在《義疏叙》中稱：“安昌侯張禹就（夏侯）建學《魯論》，兼講《齊》說。”陸德明《釋文·叙錄》亦稱：“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但張禹先從夏侯建傳習《魯論》之事，於史無徵，且與當時“由《齊》轉《魯》”風氣不合。張蓓蓓認為：這“也可能祇是皇侃看到張禹‘左右采獲’的作風近似夏侯建而產生的奇怪聯想罷了”，又推測實際情況可能是：“張禹雖然先從王、庸兩先生受《齊論》，後來又曾從師或自修而兼通了《魯論》；而結果是他大體服膺了《魯論》，祇拿原來的師說來補益魯學，也因此他取法多門而勝過了諸多的魯學前輩。”見前引《關於〈張侯論〉的一些問題》，38—39頁。我以為原則上是可以成立的。
- ⑩ 按：康有為《論語注》稱：本篇“《魯論》本二章，其末一章《齊論》也”。如果是說簡本《論語》，則非常正確。但他是說《集解》，就顯得不正確了。因為如前所述，《集解》末一章是根據《古論》。

- ⑪ 前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59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2頁。
- ⑫ 參閱王國維《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原載《觀堂集林》卷四，現收入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157—161頁。

# 尹灣六號漢墓 6 號木牘所書其它文字初探

李解民

## 一 問題的提出

尹灣六號漢墓 6 號木牘記載了《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標題是原來就有的，書於牘正面第一欄右起第 1 行。《兵車器集簿》的內容，依次分寫在木牘正、反面，正面文字分為上、下六欄，背面文字分為上、下五欄。《尹灣漢墓簡牘》（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97 年 9 月第 1 版）《前言》介紹 6 號牘文說：“所記分乘輿兵、車器 and 庫兵、車器兩大部分，逐項記載武庫所收藏兵、車器的名稱和數量。兩部分之末均有兵、車器種類及物件的統計數字，最後還有總的統計數字，共計二四〇種二三二六八四八七件。”接着說：“此牘正面第三欄右下部 and 反面第五欄後部所書文字，內容特殊，跟兵車器集簿是什麼關係，尚不清楚。”本文所探討的，就是這兩部分文字。

## 二 第一部分文字考釋

這裏所說的第一部分文字，就是 6 號牘正面第三欄右下部所書 4 行文字。《尹灣漢墓簡牘》所作釋文（見該書 105 頁）為：

戶□□

一適子男

二孺子男

三良人子男

第 1 行應有 3 字，首字作“戶”，二、三字未釋。筆者有幸參加整理工作，

於1996年春曾到上海復旦大學，利用該校裘元勳、許志正兩教授聯合開發的紅外攝像與計算機模糊圖像處理技術，對釋文作最後釋義。當時，我提出二、三字應釋為“代者”，但未能得到整理組其它同志認可。現在筆者撰文，純屬個人行為，可以直抒己見，堅持個人意見。在赴上海前，筆者根據照片和文意，已有此見；待在復旦大學文博學院看到經紅外線和電腦技術處理而顯現於熒光屏上的這行文字，由於圖像較為清晰可辨，感到第一行釋成“户代者”在字形筆跡上有着可靠的實體依據，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第1行應補釋為“户代者”，意同下一部分裏的“代户者”，指户主的繼代者。

第2行“一適子男”。“適”，“嫡”之古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嫡”字下指出：“按俗以此為嫡庶字，而許書不尔。蓋嫡庶字古祇作‘適’。適者，之也，所之必有一定也。《詩》‘天位殷適’，《傳》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凡今《經》、《傳》作‘嫡’者，蓋皆不古。”尹灣簡牘時代明確，寫於西漢成帝元延年間。此作“適”正是保存了古字。《詩·召南·江有汜》《序》云：“《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釋文》云：“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本行“適”字，正當此意，謂嫡妻、正妻、正夫人。“適子男”，指嫡妻所生的兒子。古時言“子”，相當於今天的“孩子”，既可指男孩，也可指女孩，不限性別。“子男”，在“子”後加一“男”字，標明性別，特指男性，即兒子。

第3行“二孺子男”。“孺子”，秦漢時或謂幼兒，或謂少男少女，或謂妾。這裏應是最後一義。“孺子”指妾，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左傳·哀公三年》有“南孺子”，杜預《注》曰：“南孺子，季桓子妻。”但俞正燮《癸巳類稿》云“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章炳麟《左傳讀》云“君之孺子尊亞夫人”，都認為南孺子係季桓子之妾，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孺子”的這種用法屢見典籍。《戰國策·齊策三》云“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事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云：“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



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齊王的正妻稱“夫人”，則“孺子”為眾妾無疑。《戰國策·趙策四》云：“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也。”類似文句也見《韓非子·八姦》，云：“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按《戰國策·秦策三》有“去貴妻，賣愛妾”之語，“妻”對“夫人”，“妾”對“孺子”，互相關係，一目瞭然。《列女傳·貞順》云：“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直呼傅妾為“孺子”。又《戰國策·秦策三》云：“守閭姬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此“孺子”則泛指一般人家的妾。

漢代，“孺子”演變為太子、王、侯姬妾的名號。《漢書·外戚傳》云：“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漢書》《宣帝紀》顏師古《注》和《武五子傳》顏師古《注》引韋昭語均同。太子有名號為“孺子”的妾，諸侯王也有。《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歌詩有《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顏師古《注》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同時，我們發現諸侯之妾的名號也有稱“孺子”的。《漢書·王子侯表上》云：“東城侯遺，趙敬肅王子。六月甲午封，十一年，元鼎元年，為孺子所殺。”顏師古《注》曰：“孺子，妾之號也。”

此外，《春秋繁露·爵國》敘述貴族妻妾制度中兩次出現“孺子”。一處在諸侯伯的妻妾裏，云：“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另一處在諸侯子、男的妻妾裏，文字全同。文中謂“此周制也”，當然不可信。它祇是西漢公羊家的一種設計而已。但其中或多或少有西漢及此前一些名物制度的折射，如“孺子”作為諸侯之妾的名號，就不是憑空杜撰的，而是現實社會中已有的。

第四行云：“三良人子男。”“良人”與“孺子”一樣，在漢代也是貴族之妾的稱呼。《漢書·外戚傳》云：“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嬪娥、倢倢、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良人”被排在第九等，“視八百石，比左庶

長”，此“良人”為皇帝之妾有名號者，有位有爵。《漢書·元后傳》云：“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命，乃諸娣良人更祝詛殺我。’”則此“良人”當指太子之妾，且為無名號者。據《漢書·外戚傳》“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之語，可知“良人”作為太子之妾，不是正式名號，祇能納入地位較低的眾妾之列。但我們發現，當“良人”作為諸侯之妾的稱呼時，卻是作為名號的。《漢書·外戚傳》云：“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顏師古《注》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安即上官安，其父上官桀，爵封安陽侯，這裏的“良人”指的是安陽侯上官桀之妾。又《漢書·趙充國傳》云：“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敎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良人習作為營平侯趙欽之妾，其子有資格繼承爵位，表明“良人”作諸侯之妾稱呼時，是一種名號，不同於一般沒有名分的賤妾。

按《春秋繁露·爵國》所述天子、世子、公侯、伯、子、男的妻妾配置，均有“良人”。《爵國》云：“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婦，四姬，三良人。”世子、公、侯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伯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子、男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這同上面所揭示的天子、太子、諸侯之妾中均有稱“良人”的情形是相吻合的。

在補出第1行“代者”兩字，探明第2、3、4各行關鍵詞“適”、“孺子”、“良人”的含義之後，就比較容易對這部份文字的意義進行綜合考察了。

第1行可以說是標題，點明了以下三行文字的主題。如前所述，“戶代者”意即戶主的繼代者。

第2、3、4行依次列出繼代者的身份，形成一個戶主合法繼承人的系列。各行之首字——“一”、“二”、“三”，是序數，標明了各繼代者在繼代系列中的位次。具體說來，第一繼承人為嫡妻所生的兒子，第二繼承人為孺子所生的兒子，第三繼承人為良人所生的兒子。

現在，我們可以領悟到這些文字實際上記載了有關繼承法方面的內容。

它所適用的對象，當然不是一般的平民，但也不是皇帝、太子。從戶主配偶為一妻二妾而成嫡、孺子、良人三等的情況分析，我們認為適用於此項戶主繼承法的應該為諸侯一級的貴族。在關於“孺子”、“良人”的考釋中，可知皇帝的配偶品級多至十四等，且無“孺子”，而太子妻妾三等中有“孺子”而無“良人”，諸侯王妻妾名號也祇見“孺子”而不見“良人”，唯獨諸侯妾的名號既有“孺子”又有“良人”。關於妻妾的數量，《白虎通·嫁娶》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列女傳·明賢》云：“鮑女宗曰：‘大夫三，士二。’”按照禮數法度的規定，漢代卿大夫應娶一妻二妾。除王以外的諸侯相當於卿大夫，其有名分的妻妾數也應該是一妻二妾。至此，我們已有充分理由來肯定這裏記錄的是關於諸侯繼承法的條文。

上引《漢書·趙充國傳》的資料，很可用來對這段文字作些具體的詮釋。營平侯趙充國的爵位，在本人死後傳給了兒子，兒子死後又傳給了趙欽。但趙欽的後代出了問題，他的嫡妻敬武公主沒有養兒子，看來妾也未能養出兒子，面臨後繼無人即沒有“戶代者”的危機。敬武公主唆使良人習假裝懷有身孕，用別人的兒子冒名頂替。這樣，趙欽死後，爵位便傳給那個兒子。不料事情敗露，假兒子侯爵被免，營平侯國也被削除。這都印證了上述條文所表達的兩條原則：一是諸侯爵位的承傳嚴格限制在諸侯嫡妻、孺子、良人所生之子的範圍內，二是爵位傳承必須遵循第一嫡妻子—第二孺子子—第三良人子的次序。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的一則材料，也頗能與本節文字互相印證。該《表》孔鄉侯傅晏條云：“四月壬寅封。六年，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貴族妻妾的位次，原有固定的序列，屬於禮法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擅自變更，便是犯法。這位孔鄉侯正是因“亂妻妾位”的罪名而受到嚴厲懲治的。牘文“一嫡子男，二孺子男，三良人子男”，既是繼代系列，同時也包含了妻妾的位次系列，具有法律效力。孔鄉侯傅晏的“亂妻妾位”，具體來說就是亂了嫡妻—孺子—良人的位次。

《漢書》言及諸侯爵位賜封傳承時，經常用到一個“代”字。如《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潁陰懿侯灌嬰條云：“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嬰代後者誼爵關內侯。”昌國侯旅卿條云：“六世，子賜代，死，無子，絕。”煮棗端侯革朱條



云：“六月壬辰封，七年，孝惠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義陽侯傅介子條云：“七月乙巳封，十三年，元康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顯然，其含義與本節簡文中的“代”字完全相同。

考察六號墓主的身份及其社會聯繫，可以發現這份關於諸侯繼承人法律條文的抄錄是件自然而合理的事。墓主為東海郡功曹，又稱作“主吏”、“卒史”。《漢官儀》云：“督郵、功曹，郡之極位。”《續漢書·百官志》謂功曹“主選舉功勞”。東海郡下轄38個縣、邑、侯國，侯國有18個，佔了將近一半。如此眾多的侯國，由於諸侯的自然死亡，侯國的繼嗣是時不時會遇上的，繼承人的資格審查、身份確認，一些具體事宜的操作，要由郡府來承擔。作為郡府主要屬吏的功曹，免不了充當這類事務的經辦人。事實上，墓主生前和侯國之間的確也保持着較為密切的聯繫。該墓出土10枚名謁，其中有2枚來自郡轄侯國，一枚為容丘侯國的（牘20），一枚為良成侯國的（牘21）。容丘侯、良成侯都派遣屬吏送上名謁向墓主問候病情，功曹秩百石，屬少吏，品級相當低，但諸侯如此屈尊問候，想必是有其中道理的。因此，我們認為：墓主抄錄這些文字，是有其用處的，是處理有關事務的一種依據。

### 三 第二部分文字考釋

第二部分文字，指6號牘反面第五欄後部兩行文字。《尹灣漢墓簡牘》寫定的釋文（見該書118頁）為：

臣請寡代戶者得以同居

毋次以不同居長者代

此節文字的中心詞是“寡”。“寡”言寡婦。《孟子·梁惠王下》云：“老而無夫曰寡。”《禮記·王制》云：“老而無夫謂之寡。”《管子·入國》云：“婦人無夫曰寡。”《釋名·釋親屬第十一》云：“無夫曰寡。”“代戶者”意同上節文字中的“戶代者”，指繼代戶主的人。“代戶者”一詞也見於著名的《漢侍廷里父老儼買田約束石券》（見黃士斌《河南偃師縣發現漢代買田約束石券》，1982年《文物》第12期），云：“迺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儼，斂錢共有六萬一千五百，買田八十二畝。儼中其有嘗次當給為里父老者，共以客田借與，得收田上毛物穀實自給。即嘗下不中，還田轉與當為父老者，傳後子孫以為

常。其有物故，得傳後代戶者一人。”“寡代戶者”，當指寡婦家繼代戶主的人。由此可知，本節文字實際在談寡婦人家的繼承問題。

“同居”，可以說是本節關鍵性的一個詞。《雲夢睡虎地秦簡》對“同居”有明確的法律性界定。《法律答問》部分云：“戶為同居。”又云：“‘同居’，獨戶母之謂也。”唐人顏師古對《漢書》中的“同居”也有解釋。《漢書·惠帝紀》云：“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顏師古《注》云：“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這與《唐律疏議》是一致的，該書卷一六云：“稱同居親屬者，謂同居共財者。”秦律和顏《注》對“同居”的解釋存在較大差異。前者謂同戶中同母的人，當屬小家庭；後者謂同住共產的人，當屬大家庭。秦律限定較嚴，範圍較窄，顏《注》限定較疏，範圍較寬。這些不同，一方面體現了時代差異，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對象的差異。秦律的對象為一般平民，顏《注》的對象卻是俸秩六百石以上的高級官員。本節文字中的“同居”含義，我們認為比較接近秦律的解釋。因為它的對象為下層的平民百姓，而且專門對寡婦之家，所以“同居”不但要同戶，而且要同母。

寡婦當戶主，死後存在繼承人問題，這在不少人眼裏覺得不好理解。但在秦漢時期，它確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考之文獻，並不鮮見。最出名的，恐怕要算秦始皇時的巴寡婦清。《史記·貨殖列傳》云：“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這位寡婦清在家中是一戶之主當是不爭的事實。值得注意的，在一些地區女尊男卑形成風氣，變為習俗。《漢書·地理志》明確告訴我們：齊、陳之地均有女子主持家庭祭祀的習慣。“始（齊）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為俗。”“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鳩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公羊傳·哀公六年》何休《解詁》也說：“齊俗，婦人首祭祀。”在古代社會，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對於家庭，祭祀權代表了宗主權。誰掌握祭祀權，也就表明



誰享有宗主地位。這些婦人在家中執掌祭祀，自然就是一戶之主、一家之長了。

與此相映成趣的，便有秦漢時期成為社會問題的“贅壻後父”現象。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贅壻》已對此作過揭示和探討。七十年代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裏又有這方面史料的重要新發現。這就是《為吏之道》內抄錄的兩條魏國律文，一條屬《戶律》，一條屬《奔命律》。《戶律》云：“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棄邑居壻，入人孤寡，徵人婦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來，段門逆呂，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鼠田宇。三葉之後，欲士士之，乃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壻某之乃孫。”《奔命律》云：“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將軍：段門逆關，贅壻後父，或衛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殺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從軍，將軍勿恤視，享牛食士，賜之參飯而勿鼠殺。攻城用其不足，將軍以堙壕。”不難理解，贅壻後父一度曾成為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以致需要有專門的律令來對付。筆者曾撰《睡虎地秦簡所載魏律研究》（載《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1期）作過討論。既然有一部分婦女在當家做主，那就必然有一部分男子去做贅壻後父，這是一個問題互為條件的兩個方面。

以婦女為主的家庭，在古代一些地區，比如齊東、淮南一帶較為盛行。這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察覺。當然，就整個社會來說，這種家庭畢竟還屬局部，它祇佔少數。正因為它和一般以男子為主的家庭不同，解決此類家庭繼承問題就不能援用常規法律，而需要另外製定一套辦法了。這節文字就是為此提出來的對策。

按照上述思路，本節文字加上標點應該如下：

臣請：寡代戶者，得以同居，毋次以不同居長者代。

意思說：臣下建議：寡婦家的戶主繼代者，應選擇同一戶籍的子女，不應按年次選擇不同戶籍的年長子女來頂替。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蘇揚州儀徵胥浦10號漢墓中發現一份寫在17枚竹簡上的墓主遺書（詳見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徵胥浦10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遺書口述者是位嫁過三個男人生下六個子女的老婦，內容主要談子女對田產的分配繼承情況，同本節文字極有關係，很說明一些問題。茲據《文物》1987年第1期發表的竹簡圖版，參考《散見簡

牘合輯》(文物出版社, 1990年7月第1版)將這份遺書加標點後逐錄如下: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口高都里朱凌。凌廬居新安里, 甚疾其死, 故請縣、鄉三老, 都鄉有秩、佐, 里師田譚等為先令券書。凌自言: 有三父子男女六人, 皆不同父, 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子方、仙居, 父為朱孫; 弟公文, 父吳衰近君; 女弟弱君, 父曲阿病長實。嫗言: 公文年十五去家, 自出為姓, 遂居外, 未嘗持一錢來歸。嫗予子真、子方自為產業。子女仙居、弱君等貪毋產業。五年四月十日, 嫗以稻田一處、桑田二處分予弱君, 波田一處分予仙居。於至十二月, 公文傷人為徒, 貪無產業。於至十二月十一日, 仙居、弱君各歸田於嫗, 讓予公文。嫗即受田, 以田分予公文, 稻田二處、桑田二處。田界易如故, 公文不得移賣田予他人。時任知者里師伍人譚等及親屬孔聚、田文、滿真。先令券書明白, 可以從事。

“先令券書”, 就是生前留下的遺書。《漢書》《景十三王傳》“病先令”顏師古《注》曰: “先令者, 預為遺令也。”《何並傳》“疾病, 召丞掾作先令書”, 顏《注》曰: “先為遺令也。”從遺書看, 這位名叫朱凌的老婦分明是一家之主。六個子女的父親, 由她來宣佈; 子女的田產, 由她來分配; 子女間田產的再分配, 也由她來主持; 這一切, 最後還請縣、鄉、里各級官吏及親戚鄰居來作公證。墓中沒有發現關於她繼承人的資料, 但這並不難推定。按照上述對本節文字的詮釋, 老婦朱凌的繼承人(即“代戶者”)應該是其長女以君。從遺書可知, 六個子女中以君最長, 祇有她沒有分過田產並另立門戶, 她是戶主老婦朱凌唯一的“同居”子女, 繼承人自然非她莫屬了。此份遺書年代為漢平帝元始五年(5), 而6號木牘書寫年代不會早於漢成帝永始四年(前13), 兩者在時間上先後相距不到20年。我們將它們聯繫在一起來考察分析是科學合理的。

最後, 這段文字中的“臣”, 是否指墓主, 無法落實, 因為既不能排除墓主提此建議的可能, 也不能排除他人提議而被抄錄於此的可能。

#### 四 幾點結論

綜上所述，可將我們的看法歸納為這樣幾點：

一、6號牘第一部分其它文字是關於諸侯爵位繼承人的。

二、6號牘第二部分其它文字是關於寡婦家庭戶主繼承人的。

三、兩部分文字在內容上有共同性，都是有關於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下家庭繼承人的，祇不過前者針對諸侯，而後者針對平民。

四、這兩部分文字與牘文主體的《衣車器集簿》，在內容上沒有什麼關係，應是墓主後來隨手記上的。

五、如果我們的考釋能夠成立的話，那麼這兩節文字在西漢史料上是個新發現，很值得重視。它對於揭示、研究漢代社會的遺產繼承、婚姻制度、家庭結構等，具有直接的意義和特殊的價值。

# 八十年來漢簡的發現、整理與研究

張春樹〈美國密西根大學〉

## 前言

在近代所發現的大宗的地下出土的文字記載而足以重寫或修正一代歷史的資料中，漢代之簡牘具有獨特之地位，自1900年以來，共有四萬五千多片之竹木簡出土，因之對漢代史上之甚多環節與關鍵問題均可有新的認識或重大之修正。其中最重要者約有五端：（一）漢代早期之發展過程；（二）漢代社會經濟與政治基石之法律之結構的形態；（三）漢代精神文明與物質世界之面貌；（四）漢代軍制結構之細節；（五）漢代拓邊制度之發展與邊塞組織之狀況。復就此五端而言，有關後兩項者之漢簡出土最早，而七十年代所發現者卻又是八十年來所出土之漢簡中之最大宗者，並且也是在所有自古以來所發現之簡牘中之最大宗者。有關前三端之漢簡，主要者皆是五十年代以後所出土的，而最重要的又多集中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因此從研究之成果來說，自然也是以後兩端者最具成績，而在前三方面來說，重要之研究尚有待起步，並且有些材料尚未公開，故難能對全部材料之價值有一具體之認識。

本文之目的在對自1900年至1986年間各地所出土之漢簡之發現過程，整理情形與研究成果作一系統性之綜述，並分析其所具之特殊價值，然後再用比較方法來試論這些漢代簡牘對研究漢代河西與西域地區發展的應用價值與其限度。因為八十多年來所出土的漢簡中，有關史事或具歷史性者絕大部分實皆出自河西與西域，所以我們可用這些珍貴的史料對這一廣大地域作歷史之沿革分析，同時也可進一步對這一個大地區的文化作宏觀的比較與微觀的探討，而這一重要工作正有待我們擬就研究方針、擴大研究範



圖、改進分析技術向前邁進。

## 序 說

漢簡的研究法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實居創始之功,然而促成漢簡成為一門重要之學問研究領域者實為王國維(1877—1927)與羅振玉(1866—1940)二人。王、羅二氏於1914年以其在中國學術上之地位與學問之精深淵博遂使其《流沙墜簡》成為漢簡研究之基石,並引發無數之當時及以後之學者對漢簡之興趣;而這些學者便又進一步對王、羅兩人所提出的問題與漢簡本身資料作出進一步之研究。如此,漢簡與漢簡研究便逐漸成為一般人所謂的“顯學”,而與“甲骨學”和“敦煌學”並為近世之三大顯學。

我們所談的漢簡是有固定的範圍的,即是指地下出土的各類漢代(非是有關漢代)的竹木簡;就出土地域來概說,可分以下幾個地區:

一、西北地區出土的漢簡——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境內各區域所出土的簡牘等等。

二、南部地區出土的漢簡——廣西、湖南、湖北境內各區域所出土的簡牘等等。

三、中原地區出土的漢簡——山東、河南、河北、江蘇、安徽、陝西境內各區域所出土的竹木簡等等。

四、古樂浪地區出土的漢簡——今韓國平壤大同江南面南井里漢墓出土木簡。

這些地區內總共出土的竹木簡共約四萬五千片以上,而其內容畧可分為四大類:

(一)有關開邊屯戍者,這是漢代開邊、軍事組織與活動、邊地之日常生活、邊地民族等等各方面的材料;(二)有關漢代之政制者,這包括政治組織與事件、制度結構與運作等各方面的資料;(三)有關社會狀況、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之材料;(四)有關文書與文獻者,這包括漢代之文書、律文、法規、曆法與先秦書籍和文獻等方面遺籍。

漢簡資料的內容既是如此複雜與豐富,故在研究之範疇來說也就相當廣泛,



簡而言之則可包括以下幾個範圍：(一)出土歷史；(二)考古的田野工作與出土實況；(三)漢簡之形制、材料與書寫過程；(四)漢簡之藝術；(五)釋文問題；(六)漢簡與古文書；(七)漢簡與歷史研究，即以漢簡為歷史研究中的史料來作對漢代政制、軍事、邊疆制度、交通、生活習俗、社會、經濟、法律、科技、地理、帝國發展、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探討。不過就實際的研究情況來說，大部分漢簡研究的學者是以第七項為主，即以漢簡的材料作為歷史資料來應用，而其中又以邊疆制度中之屯戍為研究之中心課題。

## 漢簡的發現與整理

關於古代簡牘的發現自中古時期即已有之，如西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於汲郡（今河南汲縣西南）所出土之兩千五百多枚之竹簡，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在襄陽（今湖北襄陽地帶）出土之十餘枚楚簡，北周靜帝大象年間（公元597—580年）在居延（寧夏之居延地區）出土之漢代竹簡等等皆是例子。但這些古籍皆已不存，我們所說的古代的簡牘與漢簡實指近八十多年來所發現的而言，而其數量之多實又過於古者，但其中最大宗者（如以上所言四萬五千片以上）是漢代所書寫的簡牘。我們以下即以出土地區與性質將這些漢簡的發現過程與整理結果作一有系統的探討和敘述。

### 一 新疆與甘肅西部所發現的漢簡

近世出土之漢簡以新疆、甘肅地區所發現者為大宗，約佔全部之四分之三以上，而第一次之發現大宗漢簡也是在這兩個地區，這就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所率領的印度考古調查團三次“中亞探險”中所發現的簡牘。斯坦因的三次中亞與中國西北部之探險與考古調查的年代如下：

第一次：1900—1901年

第二次：1906—1908年

第三次：1913—1916年

在這三次探險過程中，1901年首次在今新疆和闐境內之尼亞古址發現一批木牘，為數四十四片，是東漢末期至隋唐之際之物。尼亞位於和闐之北，塔里木盆地之中，此處原為一聚居地，至晉之中葉始被放棄而成為一荒地。

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亞探險中於1907年發現了大批(兩千號)簡牘文書(古紙、帛書);在其第三次的探險中又得古簡與紙文書九百三十號。故斯氏三次在中亞與西北部的探險調查中所得之古簡與古紙文書已近三千件,而以第二次所獲最豐。就各次簡牘文書出土之地來說,是由新疆之西南部再及甘肅之敦煌與酒泉地帶;就年代來說,敦煌、酒泉所出土者為兩漢之物,而羅布淖爾北地所出土者為魏末以迄前涼,和闐所出土者雖無年代可考,但由字跡與其他相關資料觀之,當為東漢至隋唐之際者,而其中十餘簡隸書精妙,確似漢末人書。這三批簡牘之內容與其年代斷限可由以下我們對釋文工作之討論中再作進一步之認識。

斯坦因第一次探險所得之簡牘由法國之漢學大師沙畹氏從事整理與釋文,其書於1913年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刊印: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書可譯為“斯  
坦因中亞所獲中國古簡與古文書”)

沙氏全書共收九九一件資料(包括簡牘與紙寫文書)。以出土地點分三編(不分類),其中敦煌漢簡共七〇五號,有年代者與可考年代者共九十八枚;年代約為自公元前98年(漢武帝天漢三年)至公元137年(漢順帝永和二年),但有一簡可考證為漢桓帝永興元年,即公元153年。

沙畹所錄釋之簡由王國維、羅振玉二氏選錄五八八片又作了更詳細之考釋,於1914年出版:

《流沙墜簡》。(1914年)

此為國人第一次對西域與河西出土古文書之考釋和介紹,亦為近世國人研究簡牘之第一部大著作,為這門學問奠基,而距羅、王二人之見沙畹原著僅數月而已,這種精神實令後學者無限敬佩。

斯坦因第三次探險所得資料由法國另一位漢學大師馬伯樂(馬伯祿, Henri Mas-pero, 1883-1945)整理考釋。這批資料有古簡219號,紙文件711號,共930號。1920年由馬氏開始考釋,其工作至1936年完成,全稿共六二八頁,由巴黎寄倫敦,由英國之印度部與大英博物館聯合刊印。1945年馬氏在抗德過程中殉國。至1953年,其書始印出: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England: British Museum, 1953. (書可譯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得中國文書考釋”)

此書錄漢簡一六〇枚，其中出自敦煌者八十，出自酒泉者八十；以年號計之，敦煌出土者有東漢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等；酒泉出土者有西漢成帝陽朔四年（公元前21年），新莽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東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等。

馬氏之書中又錄晉簡59號，出土於古樓蘭遺址。

在馬伯樂氏整理斯坦因所發現材料的過程中，國人張鳳留學法國，曾為助力兩年，後張氏歸國，迺寫成：《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一書，於1931年刊印（上海：有政書局）。其中初編翻印沙畹印本之古簡（《流沙墜簡》未考釋全者），二編則為斯坦因第三次探險所得後為馬伯樂氏所收者。然諸簡皆出土於敦煌與樓蘭兩地，樓蘭出土者四十餘枚，其他兩百多盡為敦煌所出土者。

此處應附帶一提者為樓蘭出土之簡牘。早期外人在樓蘭所發現之簡牘一般言之為期均較遲些，多為魏晉以後者。斯坦因於其第二次中亞探險中（1906年）曾於其地得木簡一百七十三枚，第三次探險中曾得四十八枚，故共得木簡二百二十一枚，其中大部分為木簡（並有木牘八十三件）；其年號則自魏景元四年（公元263）至晉建興十八年（建興為晉愍帝年號，始自公元313年，但立四年而國亡，邊地尚不改年號，建興十八年實相當於東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而其中又多西晉之泰始年號者（公元265—274年）。在斯坦因之先，又有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曾自1894年起七次至中亞考古調查，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間於樓蘭地區發現大批木牘、紙文書與鐐帛文件，其中木牘有一百二十一件，為西晉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泰始五年（公元269年）間者。另外，1902—1914年間的日本大谷光瑞考查團團員橘瑞超於1909年在樓蘭發現晉簡五枚。

有關樓蘭出土之簡牘除以上所述之各書外，尚可參考以下各書：

August Conrady 孔拉第, Die Chine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m.

Stockholm, 1972. (斯文赫定所發現的樓蘭中國文書與其他資料)

(日本)《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1931年(卷三)

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向達氏，他曾將孔拉第書中各類文書錄出，共簡牘一二〇件，縑素三十五件，悉依孔氏原排列方式刊載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向達，〈斯文赫定樓蘭所獲縑素簡牘遺文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四期(1931年，七八月刊)頁二十五至六十四(附書影)。

按向氏所錄孔氏簡牘中，原第120a與120b兩號闕抄，因其係佉盧文版書。

國人在西北疆域發現漢簡者首推黃文弼氏(1894—1966年)，他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簡稱“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於1927年)之成員，該團於1927年春間自北平出發，由斯文赫定與徐炳昶氏同任團長，而黃氏於1930年與1934年兩次在羅布淖爾北岸獲漢簡七十一枚，詳見其所著：

《羅布淖爾考古記》。北平：北京大學，1948年。(按本書又標為：《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之一》；而黃氏書中亦言“西北科學考察團”而非“西北科學考查團”，是“考察團”與“考查團”在當事者心中可互用。今人有以“考察團”為錯用而特作考證文章者，故贅數語於此註明。)

1944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戰時之後方出發，由夏鼐(1910—1985)等率領去西北作考古調查，在甘肅敦煌之玉門關遺址(即斯坦因之敦十四號)附近掘得漢簡四十八支(其中竹簡三支，餘皆為木簡)，其可釋文者共四十一枚。

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九期(1948年)，頁二三五至二六五。

夏鼐，《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年。頁七十三至九十三。

這些漢簡的釋文與以前斯坦因在敦煌和酒泉等地區所發現的漢簡的釋文經由林梅村與李均明二人集合於一冊，於1984年三月刊印：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此書祇錄釋文，無圖版。斯坦因所得漢簡之釋文係取自沙畹，馬伯樂之書，但



亦參考了王國維、羅振玉之《流沙墜簡》，張鳳之《漢晉西陲木簡彙編》與同類之釋文、校文等等；書後又附〈漢簡出土地點編號與漢簡著錄編號一覽表〉，對沙畹書中所列原出土地點編號錯誤者亦加改正。

在河西西部所出土的另一大宗漢簡為1979年在敦煌縣城西北之玉門關(小方盤城，即斯坦因之敦十四遺址)以西十一公里之馬圈灣烽燧遺址所發現者，共一千二百一十七支，發掘者為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簡的年號為自西漢至東漢均有，最早者為西漢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歷元、成、哀各朝都有，最多者為平帝至新莽時期者(公元元年至23年)。有關新出敦煌簡的發掘與內容，可見下文：

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縣文化館：〈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簡報〉，載《文物》，1981年第十號，頁一至七。

1981年三月敦煌縣文化館在敦煌縣西北五十七公里的酥油土以北之漢代烽燧遺址採獲七十六枚漢簡。這些簡全為木質，內容大致有詔書、律令、檄書、屯戍簿冊、字書、兵書、曆書、私人書啓等；年代上來說，紀年之簡雖僅有西漢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一簡，但據簡牘上所記朔閏干支推算，其下限為新莽時期，而昭、宣兩代者較多。關於發掘報告、研究與釋文，可見下文：

敦煌縣文化館：〈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木簡〉，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所編之《漢簡研究文集》(甘肅，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頁一至十四。

另外，甘肅酒泉地區之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於1977年八月在今玉門市轄屬之花海東北三十公里處之一座漢代烽燧遺址中獲得九十一枚簡牘，其有紀年號者為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但據推測又有武帝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者。

嘉峪關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頁十五至三十三。

以上是新疆(古代西域)與甘肅西部地帶所出土的漢代簡牘與一些相關問題的大致情形。以下來談近代漢簡出土之最大宗，居延漢簡。

## 二 居延地區出土的漢簡



“居延”一詞細言之實有兩義：一為“居延漢簡”一詞中的“居延”，此適泛指甘肅省金塔縣沿黑河而下之鼎新（舊又稱毛目）區域起，順弱水（額濟納河）而下，東枝分為伊肯河（在東）與納林河（在西）兩支，西枝即為穆林河，以至於居延海，這一塊狹長地帶約長三百五十公里左右，這可說是廣義的“居延”。另有一狹義的居延是僅指額濟納河下游以至入居延海的一段。我們在本文中所說的“居延”，是單指廣義的“居延”。

居延除去其南端鼎新一區的小部分外，舊屬寧夏省，後又入甘肅省，近又歸內蒙古所轄。

上面已經提到過的西北科學考查團於1927年春三、四月間分批離北平，五月再由內蒙去甘肅、新疆作考古調查，該團之中國團員有黃文弼、袁復禮、丁道衡、詹蕃勳等十人；瑞典及德國團員共十八人，包括Folke Bergman（貝格曼）Erik Norin, David Hummel, Waldemar Haude, C. Hempel, H. Dettmann等等。（一年後又增中外團員十數人。）團長由徐炳昶與斯文赫定二人分任，但就工作與報告之撰寫而言外人似係實際主事者，而團人中是以黃文弼之成就最高。該團之工作直至1933年，共歷六年之久，而其最大之發現為在1930—1931年於居延得漢簡一萬五百二十九枚（主其事者為貝格曼）。

這一萬多片漢簡真是個驚人的大發現，實在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考古大發現之一。今所實存並有釋文者共一萬二百多簡，其年代大致集中於西漢武帝末到東漢光武帝末這一百五十年間，最多數之簡則為昭、宣兩代至西漢末年，最晚者則可至東漢中期，和帝年間（公元89—105年）。其出土地共三十個，以主要之發現地來說，破城子（漢之甲渠候官所在地）出土五千二百多，紅城子（地灣，漢之肩水候官所在地）出土三千五百餘。

這批漢簡出土後，1931年即運北平。1934年於北平由北京大學與北平圖書館合作，由馬衡（叔平）、向達（覺明）、賀昌羣（藏雲）、余遜（讓之）和勞幹（真一）等共同負責整理和考釋，後因對日抗戰而日人又於1938年佔據北平，工作人員適分散，而其所成之初步釋文（即所謂曬藍本釋文）亦隨之而去，最後輾轉由勞幹先生一人據反體照片完成釋文之工作，此為1942年，明年六月即由中央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四川南溪縣李莊出版，稱《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四卷四冊，手寫，石印，線裝）；考證之部則

於1944年完成印出(九月),稱《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二卷二冊,手寫,石印,線裝),此二部為居延漢簡之第一個刊印本。其後又印過幾次,主要者一為1949年之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排版鉛印本(兩冊,附索引,無考證);一為1960年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印之《居延漢簡:考釋之部》(無索引,一冊)。其後各家對釋文之誤印錯釋多有改正。就以上三個版本來說,一與二版為分類編排,第三版則不分類而按1957年所印之圖版葉次排之。由於第一與第二版係分類編排,居延簡之內容亦可於其項目名稱中概畧見之:

卷一 〈文書〉:“書檄”“封檢”“符券”“刑訟”

卷二 〈簿錄〉:“烽燧”“戍役”“疾病死傷”“錢穀”

卷三 〈簿籍〉:“器物”“車馬”“酒食”“名籍”“資績”“簿檢”  
“計籌”“雜簿”

卷四 〈信札〉

〈經籍〉:“歷譜”“小學”“六藝諸子”“律令”“醫方”  
“術數”

〈雜類〉

居延簡的圖版在勞書第一版時未刊;至第二版時,圖版已製好,但未及刊印即散失;至1957年適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首次在臺北南港印出,共三冊(硬版一冊),至1977年又重印一次。這個圖版為利用抗戰開始時在1940年原簡由北平運到香港由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所做的照像製版。原簡於香港陷日前夕,1941年運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至1965年十一月運臺灣臺北南港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今仍存其處。

有關居延漢簡釋文刊印的工作尚應提出以下兩部專書:一為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56年編成的《居延漢簡甲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全書共錄兩千五百九十六號簡(圖版共一百八十九版),但實際之漢簡數目與此有異,如〈永元兵物簿〉之七十七簡祇算一號,圖版一七四上之七簡(編號為二四三六至二四四二)為羅布淖爾出土者。是編先錄圖版(據馬衡所藏之一百四十八版之照片),後附釋文之部,又附索引;所錄各簡照片與釋文以阿拉伯數字排之,由“1”至“2555”,次序係由各簡之原編號大小定之;原簡失編號者則為附編,共四十一簡,皆以中文數字列之,由“一”至“附四一”(圖版中則仍為阿拉伯數字,由“附1”至“附41”)。在索引中先列簡

號，次列出土地點，再列原編號，再列同簡在勞幹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一書之頁數，最後為同簡在上列勞書中之分類（見本文上引勞書之分類項目）。《甲編》在圖版與釋文兩部之間並附一〈額濟納河流域畧圖〉。

《甲編》出版後，《居延漢簡乙編》的初稿於1962年完成，但編者於1962年三月中旬獲得了前西北科學考查團所編的居延漢簡全部出土地點之清冊，因此便對《乙編》之編輯體例、釋文的排定等等又作較大之更訂與改動，因此《乙編》之定稿到1963年纔完成。但因各種原因（如七十年代新出土的居延簡，新的出土地點資料等），《乙編》至1980年迺首次刊印，然所出版者已不單是《乙編》，而是《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編輯者具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共分兩冊，上冊為圖版，下冊為釋文。《甲乙編》之圖版共為四七五版，包括原《甲編》之一八九版（其中第一七四版雖知為羅布淖爾簡，但未除去），全照印（依阿拉伯數字“1”到“2555”並“附1”至“附41”，無原編號）；屬於《乙編》者二九三版，與《甲編》重版者有四十一簡，《乙編》各簡按原編號順序排列，如第一簡為“3.21”最後一簡為“586.8”（另一簡為“796.5”），後附補入之簡（圖版二八六，二八七，二八八，二八九），最後為失號之四十九簡（圖版二九〇，二九一，二九二；各簡以阿拉伯數字排之，由“1”到“49”），最後之七張照片（圖版二九二與二九三）為帛與泥塊等等。《甲乙編》之釋文一律根據原簡號順序排列，由三·二號簡至五八六·八號簡（一律用中文數目字，不用阿拉伯數目字），原在《甲編》之簡亦納入此一大系統中不再如圖版中之分別，另外在每一簡號下列圖版頁數於括號中，如三·二簡為“（甲三）”（即《甲編》圖版第三頁），五八六·八下為“（乙貳捌伍版）”（乙指《乙編》圖版）；失號之簡盡列入〈附編〉中，在一般無號之簡之後（即五八六·八簡之後）。細為比較圖版與釋文，其中甚多為有釋文而原件失照者。《甲乙編》之釋文部分曾參考了賀昌羣的《釋文稿本》十五冊，馬衡的《釋文稿冊》三冊，以及《釋文叢》四八七七頁，賀、馬二氏為最初負責居延漢簡釋文者，其所釋文係據原簡所錄，自有其特殊之價值與重要性。基本上來說，《甲乙編》的釋文是根據了各家釋文而取其長的，是編之下冊於釋文後又附錄：“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編號”，“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額濟納河流域漢代亭障分佈圖”；其後又有附表五：（一）居延漢簡

出土地點表，(二)居延漢簡標號表，(三)居延漢簡竹簡、木觚、札屑表，(四)釋文未收簡號表，(五)木作、木檣表。其中表(三)是根據賀、馬二氏之釋文稿、簽上所記的材料作成的，也有其特殊之價值；表(一)中先列出土地下繫出簡之標號，表(二)則為先列簡之總標號再示出土地，此二表對研究出土地來說，極為重要。

居延漢簡之釋文另有臺北馬先醒、吳昌廉、劉欣、陳鴻琦、張壽仁、朱楠、張慧娟等七人之共同工作，完成《居延漢簡新編》，於1981年出版（臺北：簡牘學會）。本書共錄有編號的漢簡一萬零一百二十八枚，其中包括勞幹1960年《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之九千二百九十號實際所錄漢簡（即除去勞書中因種種原因贅出與加入漏釋者所淨得之數），再加上以下之簡：

(一)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中特有之六十八簡：

(二)勞幹之曬藍本《漢簡釋文》中特有之七百三十簡：

(三)《居延漢簡甲編》中特有之四十簡。

是以總數共為一萬零一百二十八簡。此外，本書又錄現藏臺北中央圖書館之原裘善元所得之三十簡（無號）、金匱室庋藏之四簡（無號）、與原勞書中已錄但未編號之〈永元兵物簿〉七十七枚簡。如此，《居延漢簡新編》所錄漢代簡牘之總數是一萬零二百三十九枚。該書是以簡牘之原編號之大小次序排列，無號者則列在最後；書後並附〈居延漢簡中接合簡及其同號異簡表〉（劉欣）與〈居延漢簡諸版本中原編號正誤表〉（吳昌廉），另外又複印了四頁地圖與漢代亭障分布圖，但這些地圖與《居延漢簡甲乙編》者比較則用處不大，且係錄自別人者。

有關西北科學考查團所發現之居延漢簡之釋文與圖版的編輯刊印工作大致是如此，下邊應再舉出有關的考古工作的報告：

Folke Bergman 等 *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Mongolia Sinkiang*, Stockholm, 1945.（此書主要為貝格曼在居延之考古概述，可譯為“蒙古與新疆考古與調查紀實”。對於發現漢簡之數目，此書所記有與下書相異者。）

Bo Sommarströ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m-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2 parts. Stockholm, 1956-1958.（此書一般可譯為“內蒙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實



為居延漢簡出土之詳細考古田野工作紀錄，對漢簡之出土地點與數目皆有詳細記載。這是根據貝格曼的田野工作紀錄寫成的。)

居延漢簡於1930年出土後，四十多年後居延地區竟又發現大批漢簡。自1972年至1976年間，甘肅博物館與酒泉地區之有關單位合組居延考古隊，去居延地區(時屬甘肅省)考古，於1973年開始陸續於破城子(漢代之甲渠候官)、其南五點三公里之保都格(漢甲渠塞之第四隧)，與金塔縣天倉北二十五公里額濟納河上游谷地北口東岸之遺址(漢肩水金關)等地發現了兩萬三千多片漢簡，可釋文者約兩萬一千多片，有紀年者一千二百二十二枚，其所知年代為上有西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101年)下迄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後31年)，而以有西漢宣帝之年號者居多數。這批漢簡為歷年來出土之古代簡牘中之最大宗者，且有完整之簿冊七十餘，在研究漢代社會、文化與制度各方面皆為極珍貴之資料，可惜至其出土已十年之今日尚不見釋文之刊印。

有關居延出土之新漢簡的簡報，可參考下文：

(一)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一期，頁一至二十五。

(二)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河下游漢代烽隧遺址調查報告〉。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前引)，頁六十二至八十四。

七十年代這批新出土的漢簡在內容上可作以下幾方面來討論：首先就簡文之性質類別來說，這些簡與老居延簡甚至敦煌簡基本上是相同，這是因為它們同是邊地戍所之生活遺物；次就簡文所涉史事與制度、社會面來說，新簡則比較廣深許多，且能澄清許多舊簡所不能解決之問題與加深對某些關鍵性的老問題之認識；第三方面所可論者，為新簡中也有些特別資料，如有關自帝都長安至河西張掖之氐池的驛置里程簡與土地分配簡等，但它們也不能解決這些方面的關鍵問題，因為所具的資料仍是不够齊全。另外，新簡中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之簡，有人以為這把居延地區之初開年代提早了許多年(過去一般學者認為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為居延初開之年代)，但我認為這是由於對歷史不太熟悉而導致對這兩簡之誤解所致，非是這兩簡原屬居延地區者。

### 三 甘肅東部出土的漢簡



在甘肅東部所發現的漢簡以武威地區為主。1959年七月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於武威縣城南十五公里之磨咀子地方之第六號東漢墓中發現漢代寫的儀禮簡四百六十九枚（原為五百一十四簡，今存僅四百六十九枚），共兩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字。同年秋天，該隊又於同地之第十八號漢墓中發現了“王杖”木簡十枚，為東漢明帝年間者。1972年甘肅省博物館與武威縣文化館於武威城郊十公里之旱灘坡之東漢墓中發現醫藥簡牘九十二枚，其中簡七十八枚，牘十四枚。1981年九月，武威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又在磨咀子之漢墓中得一〈王杖詔書令冊〉，共木簡二十六枚（原冊當為二十七簡），為東漢明帝年間者。

以上所言為四次發現的武威漢簡：1959年兩次，1972年與1981年各一次。這四批漢簡與以上兩節所討論的敦煌簡與居延簡有根本上之不同處：第一，這些簡是從墓中發掘出來的，不是邊地戍所之遺物；第二，這四批簡是有關古文書之簡，制度之簡、科技之簡，敦煌與居延簡中雖然也有同類之簡，但其在集中點（量的）方面以及簡之特殊價值方面則不能與這些簡比較，如以儀禮簡之特殊價值來說，敦煌與居延都無如此完整古書之發現。

有關武威漢簡發現與整理的資料，可看以下各文：

(一)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考古》，1960年第五期，頁十一至十二。

(二)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發掘〉，《考古》，1960年第九期，頁二十二。

(三)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出土大批醫藥簡牘〉，《文物》，1973年第十二期，頁十八至二十一。

(四) 武威縣博物館，〈武威新出王杖詔令冊〉，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與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頁三十四至六十一。

(五) 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九月印。（儀禮簡。按臺灣已有翻印本。）

(六)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十月印。

1971年十二月間，甘肅省文化組、甘肅省博物館、天水地區與甘谷縣文教部門所合組之專業人員隊於甘谷縣之渭陽（鄉）劉家山坪上之漢墓中獲得二十三枚漢簡，簡上字數平均應可有六十字，最多的有七十四字，為東漢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的詔書。全詔書應有九百六十四字，但現因殘損僅有五百六十九字，其釋文與研究可見下文：

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與甘肅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頁八十五至一百四十一。

甘肅各地時有漢簡發現，個人亦時有藏簡，但因尚未刊佈，故不能一一述錄，他日當陸續見載。

#### 四 各地有關漢代社會的重要漢簡

(一) 青海省大通縣漢簡：1978年七月青海省博物館考古工作隊在大通縣上孫家寨之西漢晚期一一五號墓中發現了四百枚漢簡，時代大約為漢宣帝神爵年間或稍後者。其內容主要為四類：一為軍事方面之律令文書；一為有關軍隊之編制與標幟；一為軍事戰術（陣法）；一為與《孫子》有關的兵書。按大通縣一一五號漢墓墓主名馬良，可能是趙充國於宣帝神爵元年至二年（公元前61—60年）用兵西羌時的部下。大通縣在漢代為臨羌縣北塞。有關漢簡發現之簡報與釋文，可見下文：

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二期，頁十六至二十一。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文物》，1981年第二期，頁二十二至二十六。

(二) 湖北省江陵縣漢簡：自1973年以來，湖北江陵之鳳凰山數次發現漢簡，如1973年自九月中至十一月中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隊人員訓練班即於其地發現三批漢簡，其中出土於第八號西漢墓者共竹簡一百七十六枚（完整者一百六十五枚），殘簡十一枚；出土於第九號西漢墓者竹簡八十枚，木牘三方；第十號西漢墓出者竹簡一百七十二枚，木牘六方。這些簡牘年代推斷為自西漢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至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期間者；其內容所可釋者共三千二百九十七字，包括研究西漢前期政治、文化與經濟（租稅、商業、借貸、徭役、奴隸）等各方面之重要材料。其發掘簡報與釋文之主要參考資料如下：

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工作隊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報告〉，《文物》，1974年第六期，頁四四至四六，五四。

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第六期，頁六九至七五。

弘一，〈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簡牘初探〉，《文物》，1974年第六期，頁七八至八四。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七期，頁四九至六二。

1975年三月末至六月中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在江陵鳳凰山第一六八號西漢墓中獲竹簡六十六枚，時代為漢文帝初年（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者。1975年十月至十一月間，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整理小組又於鳳凰山之第一六七號西漢墓中得木簡七十四枚，為西漢初年之文、景時代者（公元前179—141年）。第一百六十七與一百六十八兩號墓中所得之西漢簡皆為一般通稱之“遺冊”，共一百四十一枚，其中一百四十為木簡，一為木牘，全部共五百八十三字（一六七號墓中者三百五十字，一六八號墓中三百四十六字），對於研究漢初之宗教觀念與儀制甚有價值。有關釋文與簡報可見下文：

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十期，頁三十一至三十七。

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赴紀南城關門辦學小分隊，〈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遺冊考釋〉，《文物》，1976年第十期，頁三十八至四十六。

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九期，頁一至七，二十二。

〈關於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座談紀要〉，《文物》，1975年第九期，頁九至二十。

1983年十二月至1984年一月間，湖北省之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湖北省江陵縣之張家山（在城西北約一公里半之地）清理了西漢初年之三座古墓：M247，M249，M258（編號），獲得竹簡一千六百餘枚。其中M247所出簡為最大宗，共一千兩百餘枚，計〈遺冊〉四十餘枚，〈曆譜〉十九枚，〈脈書〉八十餘枚，〈引書〉一百三十餘枚，〈算數書〉一百八十餘枚，〈蓋廬〉五十餘枚。

《奏獻書》約二百枚，《律令二十六(八)種》五百四十枚。M 249號墓出簡四百餘枚，主要為《日書》。M 258號墓出竹簡五十八枚，為《曆譜》。

張家山漢簡(全為竹簡)在研究漢代社會與文明來說是有其特殊重要性的。按三座墓葬據考證皆為西漢初期呂后至文帝初者，M 247墓之墓主死於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M 249墓主之死年與此相同，M 258墓主之卒年為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在這一確切之年限內，三墓所出土之竹簡是研究漢初高祖、惠帝與呂后三朝之法律、政治、經濟、思想、宗教、醫學與天文曆法的最珍貴的原始資料。《律令二十六(八)種》與《奏獻書》共七百四十餘簡，集漢律與斷案議罪比例之大成，補足了今見漢律之殘缺，而成為研究漢代社會結構與政法運作最完整之材料，同時比較雲夢睡虎地出土之秦律亦可見秦漢社會制度上之因襲細節。M 247與M 258兩墓所出土之《曆譜》包括自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四月至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十一月，為迄今考古發現中之最早的曆譜，是研究漢初曆法極為難得之資料。《算數書》早於《九章算術》兩百多年，而為其源，是一數學巨著，且含無數經濟資料。其他各書《蓋廬》、《引書》、《脈書》、《日書》等則為研究西漢初期之兵陰陽家、醫學與宗教信仰之重要文獻資料。

有關張家山漢簡的發掘簡報與初步研究，可見下列各文：

荊州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一期，頁一至八。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一期，頁八至十五。

(三)湖北省雲夢縣漢簡：1972年十二月初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化局、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在雲夢縣大坟頭一號西漢墓中發掘西漢初年之木方一枚，上有二百二十二字，是一〈遺冊〉。發掘簡報與釋文可見下文：

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化局、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九期，頁二十四至二十九。

陳振裕，〈雲夢西漢墓出土木方初釋〉，《文物》，1973年第九期，頁三十七至三十九。

(四)湖南省長沙漢簡：1951年至195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隊在



長沙二〇三號漢墓發現木簡九枝；同隊又在長沙楊家大山四〇一號漢墓發掘得木簡一枝。1972年湖南省博物館在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中得簡三百一十二枚（其中木簡四十八枝），盡為〈遺冊〉。1973年湖南省博物館在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中得簡六百一十枚，其中四百一十枝為竹簡之〈遺冊〉，二百枝為醫書簡（其中木簡十枝，餘盡為竹簡）。長沙馬王堆之漢簡盡為西漢初年者，其年限約為上不早於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下可晚至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其中一枚上有年月：“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可斷定為文帝十二年者。有關長沙漢簡之簡報與研究，可見：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八月出版。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下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七期 頁四十三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馬王堆漢墓》。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八月出版。

唐蘭（遺著），〈長沙馬王堆漢軾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遺策考釋〉，《文史》，第十期（1980年），頁一至六十。

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遺策考釋補正〉，《文史》第十期（1980年），頁六十一至七十四。

（五）廣西省出土漢簡：1976年六月下旬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於貴縣羅泊灣之一號漢墓中發現木牘五件，其中三件文字可釋，稱“從器志”（隨葬物品清單，即一般通稱之〈遺策〉），一件（M1:161）正面五欄，背面三欄，共三百七十二字，十九個符號，列日用品七十多種；另一件（M1:163）殘缺，一面有字，可見二十四字；一片（M1:162），殘缺，兩面皆有字，面各四行，共三十四字；其他二件字跡漫漶。該墓出土木簡共十餘枚，均殘斷，可識之字僅十六個左右而已。發掘簡報與釋文可見下文：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九期，頁二十五至三十四，五十四。

（六）江蘇省出土漢簡 1957年二月，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江蘇省博物



館合作在江蘇高郵縣城北約八公里之邵家溝漢代遺址中得一“符籙木片”(長二十八釐米,寬三·八釐米),上有硃寫之“符”與“咒”,另有四十字左右。墓為東漢末期者,此一木符為研究東漢道教之重要史料。

1962年七月,南京博物院之尤振堯於江蘇連雲港市之海州網疇莊西漢末東漢初墓中得木方兩枚,其一長二十三釐米,寬六·七釐米,上有衣物名,但數行皆不清楚,當為“從器志”。

1963年十一月,江蘇文物管理委員會(與南京博物院)於江蘇鹽城縣三羊墩之一號東漢早期墓中得木方(“衣物券”)全長二十二·八釐米,寬三·五釐米,厚零點五釐米,然半邊殘缺,正面寫字由上而下分為四排,字跡大都不清,背面字跡很少,字形亦不清楚。

1973年三月,南京博物院與連雲港市博物館於連雲港市海州網疇莊的小礁山北麓之西漢晚期之霍賀墓中得木方七枚,其中一塊長二十二釐米,寬六·五釐米,正背面共列三十餘件隨葬物。1973年十二月南京博物院又在網疇莊北小礁山之東麓之侍其繇墓中得木方兩塊,各長二十三釐米,寬七·五釐米,厚零點五釐米。其一塊字跡已消失;另一件則保存尚好,字跡大都可以辨認,共一百八十六字,列各類衣物三十件以上。墓為西漢中晚期者,簡當為“從器志”。

1974年八月,南京博物院於江蘇盱眙縣東七十華里之東陽古城北之第七號漢墓中得一“木札”,長二十三·六釐米,寬四·二釐米,墨書三行,共三十二字,為一祈禱書,是一研究宗教與一般信仰之資料。墓為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者。

1978年七月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之雲台磚廠於取土燒磚時得了一批漢代簡牘,其中十三枚可辨成文,十七枚甚為殘缺,文字不可識或無字跡。這批簡皆為木質,大小因所記事而異,有的為二十釐米長,六·四釐米寬,有的為六·二釐米長,四·五釐米寬,狹義言之為有簡有牘。內容甚為豐富,與前述各江蘇之簡牘有異,其中有治獄案例(類似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之秦簡中者),有《日書》、(曆忌),《朔閏表》,貨物價格與其他資料。這些簡據推斷為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時代之物。

1980年四月中旬,江蘇省揚州博物館與邗江縣圖書館於邗江縣胡場村西漢宣帝時代之木槨墓中得木牘十三件,木觚七件,木簽六件。木牘一

般長約二十三釐米，寬三點五至三點七釐米，其中有文字可辨者共六塊，包括〈神靈名位牘〉、〈日記牘〉、〈文告牘〉、〈喪祭物品牘〉等極珍貴之資料。木觚則記各種穀物名。該墓主為王奉世夫婦，其卒日為宣帝本始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計之當合於陽曆公元前70年一月二十三日），葬於本始四年；所得之簡牘等物皆為隨葬者。細讀各簡與其釋文，我們以為這些簡在研究西漢中期宗教與一般信仰以及生死之世界觀方面是一宗極有價值之材料，而其中“日記”簡當又為現可實見之“日記文體”之最早之資料。

有關江蘇省出土之漢簡可詳知者如此，除去一般之“從器志”之類者外，仍有多宗甚高價值之各類簡，這是應該特別注意的。有關發掘簡報與釋文、圖版之論著可見下列各文：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十期，頁十八至二十三，四十四。

南京博物院，〈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網疇莊漢木槨墓〉，《考古》，1963年第六期，頁二八七至二九〇。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江蘇鹽城三羊墩漢墓清理報告〉，《考古》，1964年第八期，頁三九三至四〇二。

南京博物院、連雲港市博物館，〈海州西漢霍賀墓清理簡報〉，《考古》，1974年第三期，頁一七九至一八六，一七八。

南波，〈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三期，頁一六九至一七七。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1979年第五期，頁四一二至四二六。

李洪甫，〈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出土的漢代簡牘〉，《考古》，1982年第五期，頁四七六至四八〇。

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十一期，頁十二至二十。

(t) 樂浪漢簡：1931年朝鮮古蹟研究會繼先前之朝鮮古蹟調查會續在朝鮮之平壤地區之漢代樂浪郡故址發掘（原已在1924年開始發掘漢墓，主事者為藤田亮策、小場恒吉、小泉顯夫、藤田整助等人），小泉顯夫與澤俊一兩人在大同江南面之南井里發掘第一一六號墓（即著名之彩篋塚），得一木

札，長二三·七釐米，寬七·二釐米，厚零點七釐米，上有十七字（共三行）：

謙三匹

故吏朝鮮丞田肱謹遣吏再拜奉祭

墓為東漢末期者。我以為此當為喪祭品牘（專稱為“贈方”）。其發掘報告與圖版等可見下書：

小泉顯夫、澤俊一，《樂浪彩篋塚》。京城（漢城）：朝鮮古蹟研究會，1934年（昭和九年）出版。（又名《古蹟調查報告之一》）圖版第七十九；本文頁五七與五八。

駒井和愛，《樂浪》。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年出版。頁一一七至一一八。

#### （八）各地出土價值待定之漢簡

甲、河南：1956年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於河南省陝縣劉家渠二十三號漢墓中得木簡兩枚，但字跡不清（一簡有三字，一簡無字）。

乙、湖北：1973年湖北省博物館於湖北光化縣五座墳西漢墓中得竹簡三十枚，但僅有五簡可畧見墨跡。

丙、陝西：1975年二月陝西省咸陽市馬泉鄉之西漢墓中得三枚竹簡，皆殘缺字跡不清。又據李遇春報導，1980年在今西安之漢代未央宮前殿遺址一房內發現一批西漢木簡，但未對其內容作任何分析，祇言其為“研究西漢歷史的珍貴資料”。

丁、江蘇：1976年江蘇連雲港市海州小礁山之漢戴盛墓發現木方一件，為衣物券，但未見報導。

以上五處所發現漢簡之資料，因字太少，或因字跡不清，或因尚未正式報導，其價值皆不能肯定或作肯定性之討論分析，故單列為一類。有關報告可見者如下：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1956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群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75第四期，頁十三。

湖北省博物館，〈光化五座墳西漢墓〉，《考古學報》，1976年第二期，頁一四九至一七〇。

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馬泉西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79年第二期，頁一二五至一三五。

林言椒等，《中國歷史學年鑑，一九八一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頁三二八至三二九（李邁春，〈漢代未央宮前殿遺址初步探明〉）。

### 五 經籍文獻之漢簡

在各地所發現的各批漢代簡牘中，有許多是抄寫先秦與秦漢之經籍與文獻資料的。這些簡牘的內容祇有古籍與文獻一類，幾乎別無其他紀事之材料，這是與其他之漢簡中之夾有部分或片斷之古籍或文獻之情形大不相同的，所以我們把這類的簡牘專分一項來討論。

(一)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漢簡：1972年四月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文物組在臨沂縣城南一公里之銀雀山發掘兩座西漢墓，得竹簡四千九百七十四枚，其中一號墓出四千九百四十二枚，二號墓出土三十二枚。一號墓中又得木牘兩塊（其一完整，一殘缺）。另外也有些細碎的殘簡出自一號墓中。就墓葬年代來說，一號墓（墓主姓司馬）之上限不早於西漢武帝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不晚於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二號墓（墓主姓召）之上限斷定為漢武帝之元光元年（公元前114年），下限似不晚於武帝末年。

銀雀山這大批漢簡盡為古書、古曆之類文獻，內容極為豐富，一號墓出土者大致包括現今仍有傳本與已佚之書籍兩大類，今有傳本者有：《孫子兵法》及四篇佚文，《六韜》十四組，《尉繚子》五篇，《晏子》十六篇；已佚之書類有：《孫臏兵法》十六篇，《守法守令十三篇》（部分有傳本），論政論兵之類雜著共五十篇，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共十二篇（包括《曹氏陰陽書》、《占書》、《陰陽散》等），其他雜著十三篇（包括《相狗經》等）。二號墓出土者為包括三十二簡之完整的《元光元年曆譜》（第一簡紀年，第二簡紀月，以十月為歲首，順序排列至後九月，共十三個月）。由這些書目可見這批漢簡在古籍整理研究與前漢早期曆法之探討上之重要性，其中《孫臏兵法》為自漢代以來即佚之兵法經書，最為可貴。

有關臨沂漢簡之發現簡報與其研究整理之大致情形可見：

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第二期，頁三十二至三十五。

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年第二期，頁十五至二十。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十二月出版。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一月出版，出齊共十冊，（本書包括《孫子兵法》（一至四冊）與《孫臏兵法》（五至十冊）二書之圖版、釋文、注釋。）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第二期頁二十一至三十四，第三期頁三十至三十五。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年第十二期，頁三十六至四十三。

同上，〈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四期，頁二十七至三十六。

(二)安徽省阜陽縣雙古堆漢簡：1977年七月至八月間，安徽省文物工作隊與阜陽地區博物館與阜陽縣文化局合作在阜陽縣羅莊之雙古堆的一號漢墓中得大批漢簡（有竹簡、木簡和木牘），大部分相當破碎，但內容卻相當豐富，已清理出十多種古籍：《蒼頡篇》，《詩經》，《周易》，《年表》與《大事記》（自西周至漢），《雜方》，《作務員程》，《行氣》，《相狗經》，《刑德》，《日書》，辭賦殘簡；中有木牘三塊，為書籍篇題。這些古籍資料雖皆為殘句，有的或僅存篇名，但對古籍之校勘與認識來說是甚有價值的。如《孔子家語》一書，舊說皆以為魏王肅之偽造，今以木牘之篇題證明早在西漢初期已有類似之書籍，故此一問題亦應重作討論。又如阜陽漢簡中所見之《詩經》亦與齊、魯、韓、毛四家詩有異，故有人認為這可能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種本子。阜陽漢墓之時代據推斷下限不晚於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因此這批漢簡之特出內容可使我們對西漢武帝以前之文化加深許多瞭解。

有關阜陽漢簡之發掘報告與釋文可見下列各文：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陽侯墓發掘報告〉，《文物》，1978年第八期，頁十二至二十四。

阜陽漢簡整理小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二期，頁二十一至二十三。

阜陽漢簡整理小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二期，頁



二十四至三十四。

阜陽漢簡整理小組，〈阜陽漢簡詩經〉，《文物》1984年第八期，頁一至十二。

(三) 河北省定縣漢簡：1973年五月至十二月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發掘了河北定縣西南四公里之八角廊村西南部的四〇號墓，得大批竹簡，包括許多典籍。這批簡已多破碎，完整之簡甚少，字跡亦十分難辨，經整理後認出八種古籍之佚文：《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日記》與〈占卜〉之殘簡。出這些殘簡的四十號墓墓主據研究斷定為西漢宣帝時期之中山懷王劉修，卒於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因此這批資料肯定了某些歷來懷疑為偽造的古籍實於西漢中期以前業已存在並且有不同之本子，其中《文子》便是一例；而簡文《論語》（約有今傳本文字之一半）在文字上與傳本不同之處甚多，明示其為與魯論、齊論與古論併行之另一早期《論語》傳本，為今所見時代最早、保存文字最多的一個古本，在校勘《論語》的工作上是一個極為珍貴的依據。《儒家者言》在研究儒家學說與思想上是一個富於獨特地位的新發現。《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記載六安國繆王劉定於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到長安入朝的途中生活與入朝過程中的各項活動，對沿途地名與里數與朝謁儀禮各端紀述甚為詳細，是研究歷史地理與西漢中期朝制和貴族生活的極珍貴之資料，我以為這種史料之發現實相當於重新發現了西漢宣帝時期的一部分國家檔案，其價值亦應由此一角度去作估量。

有關定縣漢簡之出土簡報與部分釋文可見下列各文：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八期，頁一至十。

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40號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八期，頁十至十三。

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儒家者言釋文〉，《文物》，1981年第八期，頁十三至十九。

## 漢簡研究的問題與瞻望

八十多年來所出土的漢簡真是一個驚人的數目，而就年代次序來說，其發現之大宗皆集中於三十年代以前與六十年代以後，前期所得萬餘片，後期所獲竟是三萬以上。這種特殊現象不僅說明三十、四十年代之戰爭動亂對中國學術之巨大影響，也顯示了六十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工作之興盛，發現之豐富，同時前期者均為外人或中外合作之發現，而後期者則為國人自己的成果。從漢簡發現的歷史中也可發現中國近代學術與歷史上的一些大的潮流與問題，可以說是中國近八十年來的歷史的一個微觀的寫照。

再就漢簡的整理來說，早期斯坦因所得者皆是由外人來擔承的，即法國的沙畹與馬伯樂二人，國人所做者僅為考證與補釋之工作，其中尤以王國維、羅振玉與張鳳三人之貢獻最偉。以及三十年代開始時貝格曼所發現之漢簡則由國人自己整理與釋文，先在1934年由馬衡、向達、賀昌羣、余遜與勞幹等人共同整理和釋文，至1938年初稿已成，而因抗日戰爭工作中斷，至1942年勞幹先生完成其功，時距發現居延漢簡之年僅十年左右，而距實際整理開始之年尚不到八年，如不算因戰亂而遷徙之年則僅四、五年而已，這是何等之速度與何等之貢獻。正因為在釋文上先有了這樣的成就，國際上——特別是在日本——纔能在五十年代開始推起了漢簡研究的巨潮，這不但引起了青年學者研究漢簡與漢代史的興趣，也增加了國際上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深切認識。因此，大家更是殷切期待七十年代所發現的兩萬三千多片新居延漢簡釋文的刊印，又再掀起一股漢簡與漢代研究的巨潮；據計，如印刷工作者充分合作，在1988年新居延簡釋文的破城子地區的部分即可問世，我知道這部分簡的內容是不會有失畧望的，而且這部分釋文已經大家合作修改過七次之多，其巨大貢獻是可肯定的。當然部分釋文已在個別文章中刊出過，但很多具有極大關鍵性之與河西歷史、地理、民族以及與漢代軍事制度和郵驛組織里程相關之簡尚在這部待刊之書中。按此次刊印者先為釋文，考古田野工作報告後發。

另外，在漢簡釋文整理的過程中，有些學者的工作也是值得我們在此特別提出稱許的，如林梅村與李均明二人之編集斯坦因、夏鼐等人在敦煌、酒泉等地所發現的漢簡（《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吳九龍之集合銀雀山漢簡釋文於一冊，馬先醒等之編彙舊居延漢簡釋文成《居延漢簡新編》，這樣的

工作對研究漢簡者與一般學者之貢獻太大了，是值得特別表揚的，又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之迅速刊印《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並注釋）之類的工作也是值得讚揚與效法的。所以我覺着應該通過學者間的合作完成一部“漢簡合集”，就如《甲骨文合集》一樣，那是多麼便惠學界：

第二個有關漢簡整理的大問題是對其內容之分類與索引的工作，這方面的系統工作可說尚未起步。漢簡的材料雖是多方面的，但從大處着眼實在可以分為六類：屯戍紀錄、律令條文、宗教信仰資料，經籍與文獻材料、生活記載、物質文明存遺；總說起來，這些都可認為是漢代文明與思想信仰的檔案，所以我覺着應有一個統一性的索引，包括下列各項：

- (一) 漢簡實物之出土地；
- (二) 漢簡實物之保存地；
- (三) 曾否已攝製照片，照片與底片今存何處，是否可複製；
- (四) 是否已有釋文與其發表處；
- (五) 以性質分類之索引。

這一漢簡統一索引可分一年出版一次，如新簡出土不多則可每二、三年刊印一次。

第三個有關漢簡的大問題是研究方向與材料利用的課題。截止目前，漢簡的主要研究大都限於屯戍制度考釋、邊地生活論述、漢代軍制探討，與對一些秦漢制度方面某些細節的考證；而主要的漢簡研究工作還仍是集中在考校補正釋文方面。

目前從事漢簡研究者多半都是專家型的學者，一般專治漢代研究（考古、歷史、社會……）的學者常常不對漢簡的資料作充分利用與討論。舉個例子來說，最近出版的有關漢代考古學的一本重要著作，王仲殊的《漢代考古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一書中竟對新居延漢簡隻字未提；就我們以上所言，新簡為1973—1976年所得正式簡報和相關之討論刊於1978年第一期之《文物》，而王書據其〈後記〉（頁一〇九）自言為1979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在美國三所大學之講稿，故在時間上是應包括新居延簡在內的。（王書已有英譯本，見張光直等譯 *Han Civilization*，1982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刊印。）相比之下，林劍鳴、余華青、周天游、黃留珠四人合著的《秦漢社會文明》（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刊印）則好得多，無論在注

中或在本文中都引用與討論了簡牘資料，這大概是因為作者們之處地而對簡牘材料特別注意之關係。但是其他這兩三年來所刊印之中文方面之秦漢史與漢史之專著中都沒有充分利用漢簡中之新材料。

近十多年來新出土的漢簡能使我們對漢代研究的架構重新塑造，這在我們以上的討論中已言之甚詳。又如出土之先秦經籍與秦漢典籍來說，是集中以下各點：先秦六經與諸子已佚或傳本不全，不同之冊籍，秦漢之史冊，一般個人著作，兵書，陰陽家著作，科技與宗教信仰之通行書籍和冊子；這些冊籍的出土使我們對漢代之研究有了以下之新認識與新看法：

(一) 漢初（高祖至武帝前）之知識界的世界應比我們現已所知之領域廣博與複雜。

(二) 漢初各家思想之交互影響與變化之實際途徑已可作出更具體之研討追溯。

(三) 由秦至漢與漢初宗教世界之重新綜合構述。

(四) 漢初先秦經籍之流傳派別與傳本異同之重新估評。

(五) 漢初學者與思想家著述之廣泛性與討論問題之博深。

(六) 對今傳漢初流傳書籍之重新校訂與增補。

(七) 對《漢書·藝文志》之重新校注與增補；並可有新漢代藝文志之編寫。此七端皆為大者，其他項目甚多，不能一一細述於此。

近二十年來所新發現的漢簡實為漢代史的研究與古文獻之研討打開了新天地，但是如何在這一新天地中開創一漢代研究的新世界那就要仗着考古學家、文字學家、史學家、文獻學家以及思想家等來共同努力而通力合作了，如考古學家要與史學家、文字學家同力儘快將新出漢簡之釋文完成刊印，史學家與文獻研究者再與思想家分工將各方面之問題作細入研討，最後大家再同力作綜合論述性之著作。截止目前，這一巨大之工作可以說是剛剛起步，重大之成果尚有待未來之努力，不過一些大的獨特的發展方向已可看出，並且已很明確。

## 漢簡與漢代地域文化研究

四萬五千片以上的漢簡於八十多年來在幾個廣大不同的地區出土，而又



各具不同的文化地理特色。就大類型來說，新疆、青海與甘肅之中部和西部為一型，是漢代邊塞屯戍地區型，而這一地區以外又是一大類型，是漢帝國之常態類型。在前一地區中所出土之漢簡有兩個共同特點：

- (一) 皆出自屯戍烽燧與居所中
- (二) 絕大多數為木製，輔以竹材。

在後一地區中所出土之漢簡也有兩個共同特點：

- (一) 皆出自墓地中；
- (二) 絕大多數為竹製，輔以木材。

就出土之漢簡總數而言，三萬五千片左右出自邊塞屯戍地區，一萬左右出自一般地區。就出土資料之性質而言，前者基本上是屯戍紀錄，集中在軍事與日常邊地生活以及邊塞制度和組織方面；而後者則是反映漢帝國之一般高度物質文明、上層之精神文化面貌與經濟生活，以及社會階級結構之特徵，所以這類地區所出土的漢簡大體上是顯示了漢帝國文明的不同面貌。這兩大類型之所以不同，就是因為產生於兩種不同的文化地理環境中的緣故。因此我們可以由這些資料進一步來研討漢帝國之地域文化之多元性與多層性，而對漢帝國文明之廣度與深度有一具體與微觀之認識。

就現有材料來說，最適合於這種研討方法的個案研究是漢代河西與西域，其所延續年代之長久與所包括地域之廣濶，皆極突出，故可藉以作縱面與橫面、宏觀與微觀併行之分析，以見其與帝國文明一般形態之異同，並見其地域在發展過程中所具之特點，而增進對漢代河西與西域史上的某些關鍵性問題之認識。而對漢帝國之文明的研究來說，這樣的分析更可以對其地域文明之多元性與複雜面貌加深許多新的認識。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定稿於宿州、安城



## 羅振玉、王國維與流沙墜簡

羅 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近世簡帛研究已日益成為顯學，其形成與近百年的發現和研究密切相關，《流沙墜簡》則是其中的一部開山之作。

從上一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於對外擴張的目的，紛紛向亞洲腹地派出探險隊，搜集歷史、地理、氣象、風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資料和情報。如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明言，他是為了“新的地理佔領”，而多次進入我國西北邊陲。1901年沿塔里木河順流而下，到達羅布泊北，發現了古樓蘭遺址，他說自己不是考古學家，所以對沿途發現的古城祇是詳記地理位置，採集地上遺物，“替古代研究開拓一個新的領土”。但在樓蘭，卻懸賞要給“首先發現一點文字的人很多獎金”，大肆進行破壞性的挖掘，取得了數以百計的簡牘等漢文文書<sup>①</sup>。與此同時，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也三次進入中亞考察，發掘了尼雅、樓蘭及疏勒河流域的漢代長城遺址，獲漢晉簡帛數以千計。後，日本大谷考察隊也發掘了樓蘭遺址，獲一批漢文文書。斯文赫定關於樓蘭考察的報導於1903年公諸於世，正式報告《羅布淖爾》於1905年出版；1907—1908年斯坦因也發表了三次中亞考察的報告。他們所獲的簡帛等漢文文書分別委托希姆萊（德）、沙畹（法）等漢學家整理研究<sup>②</sup>。

然而對於這一切，國人曾經一無所知，直到1908年羅振玉才獲知消息，他說“光緒戊申，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sup>③</sup>開始了長達5年的搜求過程。這些數以千計的簡牘等漢文文書藏入外國博物館以後，當時，一位從歐洲歸來的日本學者曾介紹說“諸國典守森嚴，不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sup>④</sup>要想了解文書內容或取得其副本，是極其困難的。對於那些能夠“縱覽”這些資料的漢學家，羅振玉雖有耳聞，都無緣相見，他寫道：

予不通殊方語言文字，故雖生梯杭大通之世，年至三十尚無域外之交。但聞泰西諸儒近日講求大東學術者日益衆，又聞有沙畹博士者猶精博，熟讀太史公書，嘗游我國，徧履史遷所游名山大川，著述至富，心儀雖有年，未由接其聲教也。<sup>⑤</sup>

後來，還是邂逅伯希和纔與沙畹建立了聯繫。那是1909年，伯希和在中國獲大批敦煌古文物，希望結識中國學者，以確認其價值，返國前托董授經（康）為之介紹<sup>⑥</sup>，約見在學部供職、為籌建京師大學堂農科剛從日本考察歸來的羅振玉，後者在《集蓼編》中回憶說：

光緒季年，歐人訪古於我西陲者為英法德三國。宣統紀元，法國大學教授伯希和博士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軸已先運歸，尚有在行篋者。博士托其友為介，欲見予，乃以中秋晨驅車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寫本及石刻，詫為奇寶，乃與商，影照十餘種，約同志數人觴之……<sup>⑦</sup>

羅氏搜尋刊佈敦煌遺書自此而始，他將在伯希和處所見，編為《莫高窟石室秘錄》，同年公諸於世，並通過伯希和“宛轉通問”沙畹，沙畹遂將所著《河朔訪古圖誌》見贈，“由是郵使往來，寒暑無間，三年以來，遂成夙好”<sup>⑧</sup>。在這過程中，羅氏曾為沙畹《漢兩京石刻圖象考》作序，沙畹則在《斯坦因東土耳其斯坦沙漠發現的漢文文書》一書刊行本面世前，將“手校之本”寄往中國。

但對中國學者來說，這仍是一個漫長的期待過程，在1914年羅振玉《流沙墜簡序》中寫道，從1908年獲悉斯坦因將我國漢晉簡冊載歸英國後，“越二年，鄉人有自歐洲歸者，為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為考釋，云且版行，則又為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又二年，將伯希和陸續郵致的敦煌石室唐人卷軸寫本隸古定尚書殘卷等編為《鳴沙石室佚書》，即刊定，“而兩京遺文猶未寓目，爰遺書沙君，求為寫影，嗣得報書，謂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數夕之力，讀之再周”，深感其學術價值的重要，然而“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考訂，析為三類，寫以邦文”。遺簡出土於甘肅敦煌至新疆羅布泊一綫，文獻所載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的周圍地區，與敦煌郡同屬河西四郡的

張掖郡，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sup>⑨</sup>，地即有流沙之名，簡又是屯戍烽燧之餘，故稱為“流沙墜簡”。無論是《流沙墜簡》，還是《鳴沙石室遺書》、《莫高窟石室秘錄》收錄的西陲古文物不及流落海外的“百分之一、二”，為了更多了解其內含，羅氏曾表示“欲至英德法各國閱覽，沙畹博士聞之欣然，方聯合英德學者，欲延予至歐洲為審定東方文物”，當時準備約王國維一同前往，不料“未幾而巴爾幹大戰起，乃中止”<sup>⑩</sup>，與王國維共赴歐洲審定，搜集資料的計劃未能實現，這是羅王關於簡帛研究僅及斯坦因部分所得，資料範圍有局限性的主要原因。

伴有出土記錄的近代簡帛發現，至今已有百年歷史，就研究水平而言，近人的所見所識顯然要遠超過前人，但在這紀念百年發現的世紀之交，重讀84年前的這部奠基之作，還是有意義的。

羅振玉、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包括圖版一卷，考釋三卷，補遺（圖版）一卷，補遺考釋一卷，附錄一卷，收錄了沙畹《斯坦因東土耳其斯坦沙漠發現的漢文文書》公佈的533簡及斯坦因《古于闐廢址考》公佈的44簡，在正、補兩編作了分類考釋。附錄為對日本大谷探險隊所獲前涼長史李柏文書所作的考釋，書末附斯坦因紀行書中發表的各烽燧地點示意圖，又按烽燧編號將其漢時名稱及所出木簡列為一表，“非獨供觀覽之便，亦以彌考釋之闕”<sup>⑪</sup>。

正編三卷考釋包括：一、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收65簡（紙）；二、屯戍叢殘考釋，收390簡（紙）；三、簡牘遺文考釋，收86簡（紙），共計541簡（紙）。因沙畹書中尚有數簡僅存釋文，流沙墜簡考釋或照錄之，或據文理畧加訂正<sup>⑫</sup>，所以考釋收錄的簡數超過圖版的簡數。其中一、三卷考釋羅振玉有任，第二卷及補遺、附錄為王國維分任。祇要畧畧翻閱，就可以看到考釋涉及了相當廣泛的內容。

第一卷65簡中，包括了小學類的蒼頡篇、急就篇、術數類的力牧篇、曆譜、干支譜和九九術等算術書、吉凶宜忌等陰陽書、占書、相馬經、方技類的獸醫方等。其前言寫到：“往聞伯希和君言，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簡中有字書、曆書、占書、醫方，意其中或尚多古佚書，乃今詳檢諸簡”，僅得以上諸書。“始悟屯戍所用，得此已足，故不復有他籍”<sup>⑬</sup>。這時羅氏正致力於搜集流傳包括敦煌遺書在內的古籍和佚書，所以很注意漢晉木簡中的古籍，



校理結果雖未檢出重要古佚書，卻仍有所創獲，包括在整理研究方法方面對後來有很大影響。

例如斯坦因所獲古簡中有字書是人們早已知曉的，但在沙畹書中，祇公佈了原始材料，其編號為 299、567、639、313 ⑭，編排分散，使讀者難以窺見其書概貌。《流沙墜簡》考釋則將一整三殘的四簡集中起來，“再三審諦，知為蒼頡篇”，先從文獻記載考證蒼頡篇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再考“秦漢間字書約有二系，一以七字為句，一以四字為句。”以七字為句者，凡將、急就；“以四字為句者，為蒼頡、訓纂諸家”，今此諸簡，第一簡五句，第二簡存二句，并四字為句，有韻可尋，第三、四句亦然。“且第一簡五句廿字，合三簡則得十五句，六十字，正為一章，若以三棱之枒寫之，則一枒正得一章，”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相合，故為蒼頡篇無疑。對於蒼頡篇殘簡發現的重要意義，考釋指出，近世學者採輯古文獻中的蒼頡佚文，“所得皆單字，罕有成文句者”，此殘簡雖僅存 40 字，卻文句相屬，其珍貴可知。最後，考釋還將簡本蒼頡諸學，與《說文》、《集韻》等字書進行比較，列出通假或別構之字。顯然，這正繼承了古代對汲冢竹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⑮的整理方法，所以能比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更加深入。

對急就篇殘簡也作了同樣考釋，由於簡存整殘五章，119 字，故與皇象本、顏師古注本進行互校，列出簡本與二傳世本互有得失之字，得出“古人寫書多隨意用世俗通行之字，雖字書且然，不似後人點畫之嚴”的推論。值得注意的是考釋聯繫實物對書寫所用“觚”（枒）進行了考證。作為古代文字的載體觚的形制古說不一，《通俗文》稱“木四方為稜，八稜為觚”，《史記·酷吏列傳》司馬貞索隱《急就篇》顏師古注也以六稜或八稜木釋觚，而《說文》卻釋“枒，稜也”，“枒稜，殿堂上最高處也”，徐鍇引字書有“三稜為枒”之說，作三稜正與《急就篇》之觚形相同。考釋引班固《兩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聯繫“今中州新出漢畫石刻圖函谷關東門，畫兩爵分棲兩觀屋脊”，正與《說文》相印證。從而悟出：

枒稜者，蓋謂上自屋脊，下訖前後簷際，以次斜削，正成三角形，作書之觚與枒稜之枒，其形正同。枒以三稜為初形初義，故

傳世古代酒器之觥亦皆為三簾。其後由三稜而六，而八，寢失厥初，此孔子所嘆觥不觥歟。

此外，前人還將觥釋為方、方策；方，又釋為版，考釋引述了《漢書》、《後漢書》、《文選》、《中庸》、《禮記》等記載或注釋，“初不能決其得失”，通過仔細觀察書寫急就篇之木觥的形制，遂明

(觥)為方柱之半，從方柱之兩頂角剖而為二，則為兩觥，故三面之中，二狹而一廣，又觀觥上有穿，明為聯屬之用，初由一方而析為二觥，復以二觥為一方。古“方”字又訓為“并”……蓋“并”則為方析為觥，本是一物，然不由目驗，然千餘年之疑未由取決也。

最後，還聯繫《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帛，不及百名書於方”，論觥是記簡短之文的，不一定將三面書滿，如急就篇的第十、十八章，均以兩面書一章，“蓋下面著席覆視不便，但書兩面則不需轉移之勞，且聯而為方，則四面宛轉成文”。以上考證可見，《流沙墜簡》考釋繼承了傳統的研究、整理方法，還充分利用近世出版物照像制版技術提供的實物圖形，解決文獻記載不詳、前人未能解決的問題。

在術數類中，較為重要的資料是6件漢代曆譜，這是今人第一次見到的漢曆實物，沙畹考訂分別為元康三年、神爵三年、五鳳元年、永光五年、永元六年、永興元年。流沙墜簡考釋分別用兩漢不同時期通行的太初術、四分術，依術推算該年各月朔望及大小盡，進一步證實了沙畹的考訂。同時還注意到漢代通行曆譜的不同形式。如元康三年曆譜存15簡，復原後當三十簡“具載十二月中由朔及晦每日干支為譜，橫讀之”。神爵三年曆譜存11簡，復原形式同上，“是年閏十二月，故各簡背記閏月每日干支”。永興元年曆譜也應屬這種形式。第二種形式如五鳳元年八月曆譜，每月一簡，正背“分寫八月朔至二十九日每日所值干支”，“縱讀之”。第三種形式如永光五年曆譜，不詳記每日干支，而載此年十二個月的朔日，“於簡兩面分書之，並記四時節日”，包括二分二至四立伏腊，“於六月記八日庚辰初伏，十八日庚寅中伏，於七月記八日庚戌後伏”，考釋列舉了古代文獻中關於伏日的記述，考證了漢代朝野“最重伏日”的習俗。此外還訂補了簡文誤字和闕字，“簡上三月十九日壬辰立



夏，考是月甲辰朔，十九日得壬戌，簡作壬辰，殆繕寫之誤。簡背第三行十七日丙戌下所闕當是‘臘’字，《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對於永元六年曆譜，考釋以為“凌亂無序，不可解”，未能歸類，該譜也書於一簡之上，正面存三列，背面存二列，書十二月、七月、閏月的一些干支，“每日下紀建除並及所值神殺”，所謂建除，是曆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凡十二日週而復始，觀所值以定吉凶”，考釋遍舉建除之載在古籍及王莽銅量銘。漢孟詵碑銘等金石文字中的資料，又論“所值神殺有血忌、反支、八魁等”，與散見於史書及子書中的有關記載相參證，考證了漢代某些禁忌習俗。

方技類有醫方11簡又一紙，主要是獸醫方，除聯繫古醫書對其性質進行探討外，主要考證了藥物之名，如醫簡中有“茈菀”，《說文》作“茈菀”，《本草經》作“紫菀”，考釋援引古文獻及刻石文字論證“古茈與紫、菀與菀通”。又簡文中有“亭磨”，《本草經》作“葶藶”，釋文考“古書歷字多作磨，從麻從石”，而包括《周禮》《逸周書》等很多古籍皆傳訛作從麻從石之磨，“漢時封泥有‘磨城丞印’，磨城即漢志之歷城，其字尚從麻從石，可證諸書及此簡之為謄字也。

第二卷屯戍叢殘考釋是全書精華所在，斯坦因所獲古簡主要集中出於三處，一為敦煌西北的古長城，二為羅布泊北的古城，三為和闐東北，絕大部分是邊塞的屯戍遺存，其內容的豐富與史料價值是其它兩卷所不能相比的，《流沙墜簡》王國維序中記述了他分任該卷考釋的緣起：

癸丑歲暮，始於羅叔言先生處讀斯坦因博士所得之漢晉簡

牘及沙畹博士考釋之書，時先生方寫定《殷虛書契後編》又

以世人亟欲先睹是簡也，迺屬國維分任考訂……

這時寓居日本京都的王國維，正處於“生活，在一生中最為簡單，唯學問變化滋甚的時期”<sup>⑥</sup>，學術活動的重點由哲學文學轉向經史小學，1912年作《簡牘檢署考》，自春徂秋，四易其稿，可見用功之勤，1913年更精讀三《禮》、《說文》，編輯《齊魯封泥集存》，常與國內外學者研討經史考據之學<sup>⑦</sup>，加上原有的國學功底，無疑是整理簡牘的極好人選。屯戍

叢殘考釋共分六類：簿書、烽燧、戍役、稟給、器物、雜事，分類排比，與典籍相互參證，進行考釋，纔寫定大半時，又獲斯坦因紀行之書，遂結合各簡出土地點對烽燧次第等問題作了訂補，由於屯戍資料內容集中而豐富，又綜合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考古記錄，融匯貫通，因而多有創獲，證實了：

遺文所記，裨益至宏，如玉門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遺闕<sup>⑩</sup>。

由於屯戍烽燧遺存與古地理、古道路交通關係極為密切，所以這一卷的研究是從考證出土地入手。

首先論出土於敦煌西北的漢簡，斯坦因推斷出土地為漢長城。王國維同意這一觀點，並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他說秦長城西訖臨洮，漢武帝時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後又分置張掖、敦煌郡，列四郡，據兩關，築長城，令居以西，是見於文獻的，但未見漢長城西訖何地的記載，而據法顯《佛國記》、《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唐《沙州圖經》等記載，“今木簡出土之地在北緯40度稍北，準其地望，正唐沙州圖經所謂古長城也”。“斯氏所探得者，敦煌迤北之長城，當漢志、龍勒二縣之北境，”“實漢代屯戍之所，又自邊郡通西域之孔道也”<sup>⑪</sup>。

同時對漢時沿長城的軍事設施及官制進行探討，據文獻記載前漢於敦煌郡緣邊置四都尉，其下各置候官分統其衆。《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考都尉名秩與校尉相當，候官當即校尉下的軍候<sup>⑫</sup>。據屯戍叢殘研究可知，當時由西而東置玉門都尉之大煎都候官、玉門候官；中部都尉所屬之步廣候官、萬歲候官；宜禾都尉所屬各候官。“又東入酒泉郡，則有酒泉西部都尉所治之西部障，北部都尉所治之偃泉障。又東北入張掖郡，則有張掖都尉所置之遮虜障，疑皆沿長城置之”。同時在烽燧類考釋中探討了玉門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各候官所屬烽燧次第。後來又據出土地點，補正說“步廣、萬歲乃一候官之異名”，改名“當屬王莽時事，是時候官或稍東徙治萬歲顯武燧，而中部都尉仍治步廣”，而第二候官實為平望。玉門都尉下二候官，初疑玉門候官與都尉同治，而追索有關木簡出土地點得知，都尉治所在敦十四地點，玉門候官治所在敦十五甲，並非同治。大煎都候官治所很可能是敦

六乙即凌胡燧<sup>④</sup>，參證出土地考察諸簡，證以漢志，烽燧次第更為明確，“知中部都尉所轄障塞在漢敦煌境，其東則效穀縣境，其障塞為宜禾、為魚澤。又東則廣至縣境，其障塞為昆侖、為美稷、為廣漢，皆宜禾都尉所轄”<sup>⑤</sup>。

進而探討玉門關方位，《漢書》及其後文獻皆證玉門關在敦煌西北，但《史記·大宛列傳》述及的相對位置“玉門”在敦煌以東，據此沙畹認為太初二年以前玉門關在敦煌之東，斯坦因在東經94度以西小鹽湖和東經93度30分發現的兩處長城遺址，分別為太初以前和以後的玉門關。王國維同意漢玉門關曾遷徙之說，但認為斯坦因發現的兩處廢址皆在敦煌西北，與《史記·大宛傳》之文不合，應即近人所述之大方盤城及西湖邊牆遺址，其中東經94度，北緯40度之間的遺址證之地理書，“疑為漢太初後之玉門關”。“太初以前之玉門關，當即酒泉之玉門縣”。據屯戍叢殘所收木簡，武帝太始三年已有玉門都尉護眾文書<sup>⑥</sup>，關城當已西徙，西徙之年必在李廣利太初四年克大宛後。

王國維對樓蘭、海頭兩古城的考訂有獨到的見解，《流沙墜簡》收錄有出土於“蒲昌海北”的漢魏木簡殘紙，沙畹據喀爾亨利、孔拉第對俄人希亭所獲古書札研究成果，認為這些木簡殘紙出土地為古樓蘭之墟，但王國維經排比研究提出“其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之居廬倉，《水經注》之龍城皆是其地也”。他提出三點論據，第一，該地出土的簡牘有來自樓蘭的書信，如《屯戍叢殘·簿書類》第31簡，簡牘遺文第54、57簡，“其書既自樓蘭來，則此地不得為樓蘭矣”。第二，該地與文獻所載樓蘭地望不合。據《水經注·河水》塔里木河“東逕樓南城，而東注……又東逕於泐澤（蒲昌海）”，知樓蘭在塔里木河入羅布淖爾處之西北。還引證文獻論東方人稱羅布淖爾為泐澤、鹽澤、蒲昌海，而自西方來者大抵先經樓蘭城而後至羅布淖爾，故名此淖爾為牢蘭海。這些都證明樓蘭在羅布淖爾西北，所以“蒲昌海北”的古城不是樓蘭。第三，日本大谷探險隊於該地獲李柏二書，是前涼西域長史李柏上張駿表文一通、表稿三通的殘紙<sup>⑦</sup>“其中所言之事同，所署之月日同，所遣之使者同，實一書之草稿，可決其為此城中所書”；“其一書曰今奉臺史來西，月二



日到此。此字旁注海頭二字，其二日……月二日來到海頭”，“此地在前涼時名曰海頭，故無可疑”，又引《水經注·河水》“蒲昌海水積鄯善之西北，龍城之東南。龍城，故姜賴之墟；”“其所記龍城方位，正與此城相合。”“姜賴”之名雖不見史書，但“兩漢之際，由玉門出蒲昌海孔道以達樓蘭、龜茲，中間有居廬一地。”從字音看“居廬、姜賴皆一音之轉”。從地望看，考以《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水經注》等記載的方位，渾爾以北僅有兩城，西者均謂之樓蘭，東者必為居廬（姜賴）。總之，此城之稱，居廬姜賴為漢時舊名，海頭為魏晉以後新名，龍城則又西域人所呼之異名。

根據李柏二書及出於蒲昌海北的簡牘，王國維考證海頭是西域長史的治所。將中央政權力量的強弱與長史之官的興廢、治所之地的安排作綜合考察。他說，後漢時“西域長史實屯柳中，以行都護之事”，魏晉間中央政權“威力已遜於兩漢盛時，故近治海頭與邊郡相依倚”，至前涼，置“三營”：“戊己校尉屯高昌、玉門大護軍屯玉門，而西域長史則屯海頭，以成首尾之勢，則自魏晉暨涼，海頭為西域重地，蓋不待言。”而且推斷“周隋以前，磧道未開，往來西域者尚取道於此”，“逮魏滅鄯善、蠕蠕，據高昌，沮渠氏亡，此城當由是荒廢”。

關於道路交通，王國維還探討了西域二道之分歧。《漢書》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二道。《元和志》言南道出陽關，北道出玉門。稟給類第1.2簡考釋據出於同一地點，記稟給莎車、車師者粟的木簡，提出“此二簡出玉門，而往返南北道之使皆過此”，論證“漢時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樓蘭”。

地理和官制是屯戍叢殘考釋的重點，此外也牽涉十分廣泛的內容。如簿書類編排從詔書開始，大抵按上告下之文，下達上之書的順序，對簡文涉及的人名、官制、內容等參證文獻進行考釋。如簡3有“四月庚子丞吉下中二千石”，簡25有“尉融使告”，考釋分別推定此二人為丙吉、寶融，結合史書所載二人的活動，對簡文的時代，內容作出考證。簡23為虎猛候長言邊事之文，上署“玉門官燧次行”，考釋從漢時文書有封緘、露布二種，論此為露布不封之書，告玉門所屬諸燧，以次傳聞，“足見漢代文書之簡易”。又如考7.8.9三簡為促期會之書，論漢代對期會的

重視；簡42為計資勞之書，提出“令二日當三日”為邊郡增勞之制，“疑漢制已如斯矣”。簡41有“本始六年”之文，查其曆朔同地節三年，而本始僅四年，考釋提出，很可能是“本始之元初因昭帝之制六年而改，後更用四年遷改之制，遂以地節元年為三年，而減本始為四年”。簡30、31有“從掾位”“帳下將”等職官，考釋聯繫漢魏題名，考其人數品秩；又有“守堤兵”，推論“當時寬車河或塔里木河之水當東逕樓蘭直抵海頭之北，以其有堤防觀之，則似人工所為，非自然之道也”。簡49至56“皆爰書之屬”，遂聯繫漢唐刑律進行了考釋，並提出“此種獄訟與邊戍無關，而皆出塞上，殆塞上軍吏兼治民事歟”。此外簿書類還包括了郵書之簿，如簡59至62，考釋不僅論及官名、地名、檢署，更提出“漢時郵遞之制即寓於亭燧中，而書到日時與卒吏姓名均有記錄，可見當時郵書制度的精密”。

如烽燧類考釋主要探討了烽燧制度，除官制、烽燧次第外，還提出了烽與燧的區別。在7至9簡考釋中，據文獻推導出烽用火，燧用烟，聯繫簡文有“晝不見烟，夜不見火”，證《漢書·賈誼傳》顏師古注曰“晝則燔燧，夜乃舉烽”，是為卓識。又指出簡中所記烽少而燧多，所見燧名已有數十，從燧數和地域考察，相距大約十里許，記烽名者僅三簡七烽，其中簡9所記綿亘廣至、放穀二縣北界，其地不下二三百里，自東而西僅廣漢、美稷、昆侖、魚澤、宜禾五烽，“可見烽燧疏數之比”，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35至38簡考釋則論烽、表的關係，提出，“漢時塞上告警烽燧之外，尚有不燃之烽”，“然而舉謂之烽，不燃而舉之謂之表”。後來，陳夢家在《漢簡綴述》中，專立一節“烽燧的設置”，進一步闡發這一問題，他認為“燧之初義為火”，“烽火、烽煙乃兼日夜而言”，《賈誼傳》的顏注未必是卓識，但是王氏提出的表為不燃之烽，卻是“很敏銳的推測”<sup>④</sup>。

戍役類考釋探討了屯戍制度，對簡文中戍卒、適卒、騎士、養卒等身份、來源、職責等聯繫文獻進行了考察。此外，簡31記海頭屯田乘堤之事，考釋不僅以簡文內容與文獻互證，而且據所記屯田人數、畝數、作物論及當時生態環境，說“海頭左右水勢頗盛，築堤人夫多至五百餘，則當日塔里木河與羅布淖爾之水，非如今日之枯竭矣”。



第三卷簡牘遺文多是斷簡殘紙，考釋方法仍同前兩卷，通過與傳世文獻互證，以求“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遺闕”，對於斷爛之餘難求義理者，則考簡牘之體式，書體的變遷。如簡6殘文中的衣字和褚字的偏旁均用篆體，“知此書出於西漢人之手，其實隸法尚未備也”。簡20考釋指出漢印中有“大利長幸”，幸字上部從犬，與篆書不合，前人不敷論定其為幸字，然石刻中的幸字皆從犬，今證以諸簡，知漢人隸書幸字無一與篆書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67紙考證提出，諸簡牘中唯此與第75紙，屯戍叢殘簿書類32至35簡為草書，與祕閣所載晉以來尺牘書體相同，此外皆章草，否則亦存章草及隸書遺意。其章草具年月日者，如稟給類第11、14簡，分別有後漢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可見前人關於章草始於章帝（公元76—公元105年）之說是不盡然的。又神爵四年簡（烽燧類簡26，公元前58年）與二爨碑相近，為今楷之濫觴，至永和二年簡（簿書類簡23，公元133年）則楷七而隸三，魏元帝景元四年簡（雜事類簡56，公元263年）則全為楷書，“此卷魏晉以後諸書楷法亦大備，昔疑鍾太傅諸帖為傳撫失真或贗作者，以此卷證之，確知其不然矣”。

《流沙墜簡》收錄的資料僅為近百年來外國探險家在中國所獲的一小部分，但截止到1930年以前，這是唯一一部介紹和研究那批資料的中文著作。缺陷與不足之處當然是有的，如就編輯而言，第二卷雜事類第46、50、87簡釋文注應分列入器物、簿書類和簡牘遺文卷，“誤列此”，第三卷也有一簡應入第一卷。就考釋內容看，1915年8月王國維自己已訂正三十餘處<sup>②</sup>，此外，論述仍有不够嚴密之處，如考海頭樓蘭有東西之異，前言“魏晉木簡殘紙則出羅布淖爾涸澤之北稍西”，而後“求地理上的證據”時，卻立足於樓蘭“在羅布淖爾西北隅”，“此城（出魏晉木簡殘紙之地）則當淖爾東北隅”<sup>③</sup>，對海頭方位的論定顯然有誤，從樓蘭地區遺址分佈圖看無論樓蘭（LA）還是海頭（LK）均在羅布泊以西<sup>④</sup>。書中的疏闕顯然與著述初衷有一定關係，當時就是要用最快速度“使吾國人知世間尚有此物”<sup>⑤</sup>，至於內容“尚冀博雅君子為之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sup>⑥</sup>。這個目的顯然達到了，癸丑歲暮得沙晚手稿，次年正月校理完成，三月作補遺，四月完成附錄，同年先後以宸翰樓印本和永慕園叢書兩次印刷行

世。就內容看，這一成果也被認為係“當時東西方研究者所望塵莫及”<sup>⑧</sup>。《流沙墜簡》考釋中提出或探討過的問題，如漢曆研究、玉門的方位、西域長史治所、李柏文書出土地等等，都有更多的研究者根據更多的新資料“補闕糾違”，推進了這門學科的發展。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在研究方法方面，這部書對後世的啓迪。

《流沙墜簡》與沙畹之書的區別之一是採取分類考釋的方法，對於分類研究，羅振玉《集蓀編》曾有這樣的記述：

本朝經史考證之學冠於列代，大抵國初以來多治全經，博大而精密畧遜，乾嘉以來多分類考究，故較密於前人，予在海東與忠愍論，今日修學宜用分類法。

畧畧翻閱羅王在日本的著述年表可知確是如此。採用這種方法編輯的《流沙墜簡》，資料編排眉目清楚，考釋不僅以同類數簡一起研究，還往往聯繫列於其它類的有關內容，如前述烽燧類1至5簡考釋官制，還援引了簡牘遺文卷的簡15、屯戍叢殘簿書類簡59、烽燧類簡8、9及沙氏書中簡448釋文加以論證，類似現象各卷都存在，說明研究工作仍是立足於全部資料的融匯貫通，再與文獻比勘，這樣對簡文中人名、官名、事類、書體等問題的論證較為深入細緻。這不僅便於進一步綜合研究，全面復原簡牘資料所反映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也有利於對某些專題的深入探討，如王國維《流沙墜簡》補遺，曾着重對簡文中“袴褶”進行考釋，一年後又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胡服考》（《袴褶服考》），遍引文獻資料使“袴褶得確釋”<sup>⑨</sup>。

《流沙墜簡》的整理研究還借鑒了傳統的對古代佚文的整理方法。對記載於簡帛上古代佚文的搜集整理，在我國有悠遠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sup>⑩</sup>，即將收集到的佚文編排整理。至漢，又大力搜尋過躲過焚書之劫的簡帛文字，據記載有“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從壁中“發掘”出來的，還有孔氏家傳的古文尚書，“舊書潛於壁，歟爾復出”，孔安國進行了“以今讐古，隸篆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的整理<sup>⑪</sup>。顯然晉武帝咸寧五年汲冢竹書出土<sup>⑫</sup>，太康二年，“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sup>⑬</sup>，正是繼

承了傳統的整理方法，這也是《流沙墜簡》使用的方法。

對簡牘佚文排比編次，恢復其原貌，追求其淵源，就要與傳世文獻比勘，為此，求得這些歷史遺存時間和空間的坐標是十分必要的。流沙墜簡的整理在粗具條理後，“乃畧考簡牘出土地”，這一操作程序與稍早羅振玉對殷虛甲骨的研究是一致的，反映當時羅王已形成一套以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法。1925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總結的“二重證據法”當基於這一階段的實踐。當然這批簡牘不同於殷虛甲骨，雖不是科學發掘，卻伴有發現地點的記錄，所以流沙墜簡的考釋不僅繼承了傳統的方法，還結合了出土情況，如“各烽燧之次第也，顧由各烽燧所出之簡以定其地之名”，“由是沙漠中之廢址，驟得而呼其名，斷簡上之空名，亦得而指其地，較前此憑空文考定者，依據灼然”<sup>⑤</sup>。

對前人成果的繼承和發展，不僅是研究方法，也體現在流沙墜簡的研究過程中，如簡牘遺文卷簡28至35“隸書至精”，其致問之人有王、大王、且末夫人，致問之物有琅玕、玫瑰、黃琅玕，考釋先引述了斯坦因、王國維的意見：“斯君謂此簡出土之地（尼雅城）當為精絕國；王君謂且末夫人當是且末之女女於精絕者，如齊姜宋子之類，其說均至確。”再引證《爾雅》、《山海經》、《本草》、《說文》釋琅、《子虛賦》晉灼注等考證“琅玕”、“玫瑰”，說“蓋二物並天生無圭角畧如珠形。今芒洛六朝古冢中，往往得色青而明之圓玉，中有穿，如珠，連屬以為釧，殆古之琅玕”，又指出“古書多言青琅玕，不言有黃者，賴此始知之”。在《流沙墜簡》自序中曾有此書之成“沙氏闢其蠶叢，王君通其衢術”之說，可見全書都是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即站在一個較高的起點，再發揮有深厚國學功底的優勢，應是這部書為同時代研究者“望塵莫及”的主要原因。

至今，對出土簡帛的挖掘、清理、保管、研究都有了一整套科學的方法，《流沙墜簡》的某些論斷也為更多的新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訂正，但它並沒有完全失去生命力。在這世紀之交重溫這部奠基之作，對於開創簡帛研究的第二個一百年，應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 注 釋



- ① 斯文赫定著，李述禮譯《亞洲腹地旅行記》上海書店 1984 年版。
- ② 參見林梅村等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前言，文物出版社 1984 年。林梅村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前言，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 ③ 羅振玉《流沙墜簡序》（1914 年）。
- ④ 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序》（1913 年）。
- ⑤ 羅振玉《漢兩京石刻圖象考序》（1914 年）。
- ⑥ 羅振玉《莫高窟石室秘錄序》（1909 年）。
- ⑦ 見《貞松老人遺稿》甲集。
- ⑧ 同⑤。
- ⑨ 《漢書·地理志》。
- ⑩ 羅振玉《集寥編》。
- ⑪ 見《流沙墜簡》圖表按語。
- ⑫ 如力牧篇第 2 簡“黃帝問……”，沙畹釋“黃肅”考釋按：肅字“依文理觀之當為帝字”。
- ⑬ 據考釋第三卷，尚有“史記滑稽列傳文，誤列此”，（13 號簡考釋），其簡出於敦六乙，大煎都候官治所（附表）。
- ⑭ 見吳初曠等釋校《敦煌漢簡釋文》附錄《漢簡編號索引》及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 ⑮ 《晉書·束皙傳》。
- ⑯ 王國維《丙辰日記》轉引自袁英光等《王國維年譜長編》140 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 ⑰ 參見袁英光等《王國維年譜長編》77—103 頁。
- ⑱ 同③。
- ⑲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1914 年 1 月）下同不再注。
- ⑳ 《流沙墜簡》附錄，圖表按語。王國維 1914 年 4 月。
- ㉑ 王國維《流沙墜簡後序》（1914 年 3 月）《觀堂集林》第三冊，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 ㉒ 見屯戍叢殘考釋簿書類第 12 簡。

- ②③ 見烽燧類 1—6 簡考釋。
- ②④ 見《流沙墜簡》附錄。
- ②⑤ 見陳夢家《漢簡綴述》171—172 頁。中華書局 1980 年。
- ②⑥ 見袁英光等《王國維年譜長編》134 頁。
- ②⑦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第三冊、中華書局 1959 年。
- ②⑧ 參見孟凡人《樓蘭古城的性質》附圖，《中國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 1986 年。
- ②⑨ 王國維《流沙墜簡》補遺考釋。
- ③⑩ 同 ③。
- ③⑪ 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前言，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 ③⑫ 見《羅振玉書札》致王國維，北圖藏轉引自袁光英等《王國維年譜長編》133—134 頁。
- ③⑬ 《史記·孔子世家》又參見劉起釪《尚書源流及傳本考》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 ③⑭ 《史記·儒林列傳》及索隱引孔臧與孔安國書。
- ③⑮ 《晉書·武帝紀》及中華書局 1974 年版校勘記。
- ③⑯ 《晉書·束皙傳》、《荀勗傳》。
- ③⑰ 同 ②①。



## 林劍鳴教授與簡牘學研究

王子今（中央黨校歷史教研室）

秦漢史研究專家、法律出版社原總編輯林劍鳴教授於1997年1月25日逝世，終年62歲。

林劍鳴教授1935年1月生於北京，曾就學於華北大學，1961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曾經在西北政法學院、西北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曾任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主任、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曾經赴日本關西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等高等學府研究、講學，任客員教授。曾先後擔任《中國文化史大辭典·秦漢卷》主編，《中國法制史·秦漢卷》主編、《中國經濟史·秦漢卷》主編。

林劍鳴教授自七十年代初開始致力於秦史研究，所著《秦史稿》及有關一系列論文具有開拓性的學術意義，曾經產生了較廣泛的學術影響。關於秦漢史的綜合研究，關於簡牘研究，關於秦漢考古與文物研究，關於中國法制史研究，林劍鳴教授也都有學術水準相當高的論文發表。林劍鳴教授學術生涯近40年間，出版學術著作10種，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主要有：《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3年）；《秦國發展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5年）；《簡牘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臺灣谷風出版社，1987年）；《秦漢社會文明》（合著）（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臺灣谷風出版社1990年，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雄才大畧的漢武帝》（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秦史》（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秦漢簡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呂不韋傳》（人民出版社1995年）；《新編秦史》（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秦漢史》（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

以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究竟何時形成〉（《學術月刊》1963年3期）；〈試論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學學報》1978年2期）；〈論秦漢時期在中國歷史的地位〉（《人文雜誌》1982年5期）；〈秦代官爵制度變化的奧秘〉（《光明日報》1983年5月25日）；〈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產生的兩條途徑〉（《歷史研究》1984年4期）；〈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歷史研究》1987年2期）；〈西漢時代生產關係的特點〉（《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2期）；〈秦王朝統一後社會各階級〉（《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2期）；〈西漢戊己校尉考〉（《歷史研究》1990年2期）；〈秦漢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歷史研究》1991年4期）等。

林劍鳴教授曾經積極參與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的籌建工作。後來歷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會長，擔任學會領導職務期間，曾經為加強秦漢史學者的交流，推動秦漢史研究的進步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到法律出版社工作後，仍然為《秦漢史論叢》和《簡帛研究》的出版貢獻了心力。

林劍鳴教授的逝世，是中國秦漢史學界的一大損失。

林劍鳴教授曾經從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陳直先生學習簡牘學。在陳直先生的《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校證》、《敦煌漢簡評議》、《居延漢簡文例》簡牘學專著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較早地接觸到其中的學術內容，領會了陳直先生“使文獻與考古合為一家”，“使考古為歷史服務”的學術主張，掌握了陳直先生重視簡牘等考古文物資料的研究和應用，“以〈秦漢時期古籍〉本文作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的研究方法，歷史考察的視界更為開闊，歷史分析的眼光更為深刻。

1979年起，林劍鳴教授開始在西北大學歷史系開設的“秦漢史”選修課中，增加了簡牘學基礎知識的內容。此後又編印了題為《簡牘學概論》的講義，發給學生閱讀。這一講義又經過加工，參考日本著名簡牘學者大庭脩教授《木簡》一書的體例，完成了《簡牘概述》一書。林劍鳴教授在該書《前言》中自謙地說：“所謂《概述》，無非是本門科學的概括介紹，談不到研究和創見，目的在於將前人研究成果通俗地、淺顯地介紹給讀者。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也決非易事。幸好筆者較系統地學習過夏鼐、勞幹、陳槃、王國維，尤其是陳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編寫過程中又收到日本著名簡牘學者大庭脩教授

寄來的《木簡》一書，使得編寫本書有較豐富的參考資料。大庭脩教授的《木簡》，出版於1979年，是專供初學者一般地了解簡牘的入門書。其內容雖不無可商榷之處，其編排方法和體系結構則是較可取的。因此，筆者在原來講義的基礎上，採取《木簡》一書的編排方法，重新寫成《簡牘概述》一書。”

《簡牘概述》列入“秦漢史研究叢書”中，1984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應當說，這是國內最早的一部較全面地介紹簡牘學基礎知識的專著。這部書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歡迎，臺灣谷風出版社1987年再予出版。

林劍鳴教授在秦漢史研究中充分重視簡牘資料的運用。他的最有代表性的學術專著《秦史稿》中《秦漢史》，都大量運用了秦漢簡牘中發現的新資料。林劍鳴教授稱此為“開闢新的史料來源”。他在《秦漢史》一書中專門撰寫了“對秦漢史研究的展望”一節，指出“文獻資料相對較少”，“是研究秦漢史中特有的困難”。他寫道，“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除加強史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以對原有的文獻資料從新的角度進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開闢新的史料來源。所謂開闢新的史料來源，無非是兩條途徑：一是對以前未被利用的資料認真加以鑒別、研究，發掘其中可供秦漢史研究的史料。如有一批古籍長期被視為‘偽書’，而被史學家棄之不用，事實上有些書並不‘偽’，祇不過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添進後人的作品，即使後人偽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祇要我們思想明確，細心耙梳，在這些古籍中亦不乏可利用的史料。”

林劍鳴教授還特別指出：“更重要的新資料來源應當是考古新發現。尤其是近十餘年出土的秦簡、漢簡、帛書及有銘文的禮器、兵器及其它文物。這些史料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它們數量多，如秦漢簡牘就數以萬計，內容豐富；而且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象現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樣，經過千百年無數次的輾轉傳抄，訛誤有所難免。考古出土的文字資料，多係第一手資料，保存着書寫時的原始狀態，其史料價值尤為可貴。所以，應當更加重視對考古、文物資料的利用。”（第42頁～第43頁）

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極有力地推動了秦史研究的深入。睡虎地秦簡的研究一時成為學界矚目的學術熱點。林劍鳴教授相繼發表了〈秦國封建社會各階級分析——讀《睡虎地秦墓竹簡》札記〉（《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0年2期）、〈秦國奴隸制社會形態的特點〉（《中國古史



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秦漢史論叢》第1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國法制史論文選》第一分冊，北京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秦代中央官制簡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1期）等高質量的論文，成為當時利用簡牘資料考察秦史卓有成就的先行者之一。

重視階級分析和社會基本形態的考察，是林劍鳴教授學術研究的特點之一。以睡虎地秦簡為基本資料，他相繼發表了〈“隸臣妾”辨〉（《中國史研究》1980年2期）、〈“隸臣妾”非奴隸〉（《歷史論叢》第3期，齊魯書社1983年）、〈三辨“隸臣妾”：兼談歷史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學術月刊》1985年9期）等有關“隸臣妾”身份研究的一組論文，在史學界引起了較熱烈的討論。現在看來，在得到更充分的研究資料的今天，這些論文中提出的若干觀點或許有可以修正之處，但是當時這種以積極探索、積極爭鳴的形式推動學術進步的貢獻仍然是應當肯定的。

林劍鳴教授撰著的〈論漢代“奴婢”不是奴隸〉（《學術月刊》1982年3期）、〈漢代法律管窺〉（《中國古代史論叢》1983年第1輯，福建人民出版社）、〈秦漢時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漢簡解讀筆記）〉（《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3期）等論文，則是利用居延漢簡進行研究的成功之作。

除了在自己的學術實踐中充分發掘簡牘的史料價值而外，林劍鳴教授還通過多種形式推進簡牘學的進步和普及。在前面說到的《簡牘概述》一書的基礎上，他還相繼發表了〈日本學者對中國簡牘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5年12期）、〈寫在竹片木版上的歷史資料：介紹我國秦漢簡牘〉（《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86年1期）、〈居延漢簡研究評價〉（《光明日報》1987年3月4日）、〈陳直《居延漢簡研究》評介：兼談歷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1期）等文章，總結和介紹國內外簡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呼籲學界重視簡牘學的發展。

林劍鳴教授在1985年赴日學術訪問期間，曾經在關西大學和日本著名簡牘學者大庭脩一起參加了“木簡研讀班”。隨後即着手組織一些學生翻譯大庭脩先生以簡牘作為重要史料的《秦漢法制史研究》一書，並親自承擔了該書第一篇《序論》的翻譯。這部書於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為中日簡牘學者學術交流與學術合作的一個紀念，也成為林劍鳴教授和他的學生師生間學術情誼的一個紀念。

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簡出土之後，林劍鳴先生以秦史學者的敏銳眼光，發現了其內容具有助於說明秦土地制度的重要價值，於是繼楊寬、黃盛璋、李學勤等先生之後，發表了〈青川秦墓木簡內容探討〉（《考古與文物》1982年6期）一文，論證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確實施行“轅（爰）田制”。對於簡文中涉及道、橋、陂堤維修的內容，也有所分析。

雲夢睡虎地秦簡中的《日書》，起初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饒宗頤、曾憲通先生出版《雲夢秦簡日書研究》（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之後，李學勤先生在1985年發表了《睡虎地秦簡〈日書〉與秦楚社會》一文（《江漢考古》1985年4期）。不久，由林劍鳴教授發起，以西北大學歷史系秦漢史研究生班為主體的一些青年師生和考古文物工作者，參考日本簡牘學者的研究形式，組織了《日書》研讀班。研讀成果之一署名“《日書》研讀班（導師：林劍鳴）”，在《文博》1986年5期發表，題為《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這兩篇論文相繼指出，睡虎地秦簡《日書》具有豐富的內涵，是認識當時的思想文化，考察當時的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於是，《日書》在大陸學術界長期受到冷遇的情形得以扭轉。這一形式新穎的學術集體以相繼發表的成果，如《從〈日書〉看秦人鬼神觀及秦文化特徵》（李曉東、黃小芬）、《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林劍鳴，《歷史研究》1987年3期）、《秦人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林劍鳴，《歷史研究》1991年4期）等，受到學術界的注目。林劍鳴教授所指導的《日書》研讀班的一些成員如吳小強、張銘治、賀潤坤等10年來仍然繼續在《日書》研究的土地上認真耕耘，分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林劍鳴教授又發表《曲徑通幽處、高樓望路時：評價當前簡牘〈日書〉研究狀況》一文（《文博》1988年3期），對《日書》研究進行了總結。1989年9月至11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講學期間，林劍鳴教授又曾經以“中國學者《日書》研究的現狀”為題發表了演講，講稿發表於《史滴》第11號（日本早稻田大學，1990年1月）。

1991年夏季在蘭州召開的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林劍鳴教授提交的論文為《秦漢簡牘〈日書〉與官吏》。此外，林劍鳴教授發表於



《文博》1992年1期的《秦簡〈日書〉校補》，以及發表於《簡帛研究》第1輯的《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也可以看作標誌秦簡《日書》研究得以推進的學術成果。

林劍鳴教授在法律出版社任職其間，主持出版了《秦漢史論叢》第5輯。向中國秦漢史學會第5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1991年9月，泰安）提交的質量較高的有關簡牘研究的論文，如謝桂華《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工藤元男《雲夢秦簡〈日書〉與秦史研究》等收入其中，於是得以較為及時地面世。

林劍鳴教授擔任副主編，為其編輯出版付出諸多心力的《簡帛研究》第1輯和第2輯，共收入簡帛研究論文67篇。《簡帛研究》的出版，成為促進簡牘學新的繁榮的條件之一。

筆者在林劍鳴教授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經常聽到他介紹陳直先生以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相結合下不斷取得新的成果的治學方法。簡牘資料，被林劍鳴教授看作重要的史料寶庫。他常常鼓勵學生努力發掘這一寶藏，為推進簡牘學的進步多作貢獻。任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期間，林劍鳴教授曾經發起組織部份學者實地考察秦漢長城遺跡，其行程包括調查出土漢代簡牘相當集中的居延遺址。當時作為學生，沒有能夠參加這次活動。不過，1991年蘭州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又曾經組織河西實地考察。回想當時在戈壁烈日下和林教授一同參觀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工地的情形，不能不使人感念萬千。近年來，簡牘資料不斷有新的發現，簡牘學的學術隊伍也越來越精幹成熟，可惜，林劍鳴教授已經不能和我們一起繼續從事簡牘的研究了！

#### 附：林劍鳴教授主要論著目錄

##### 學術專著：

1. 《從孔丘到曾國藩》（合著），陝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
2. 《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3年；
3. 《秦國發展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5年；
4. 《中國古代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5. 《簡牘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臺灣谷風出版社1987年；

6. 《秦漢社會文明》(合著), 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 臺灣谷風出版社1990年, 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
7.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秦漢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9. 《法與中國社會》,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10. 《秦史》, 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
11. 《秦漢簡史》(合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 《呂不韋傳》, 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 《新編秦史》, 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
14. 《秦漢史》, 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
15. 《長江文化史》(合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學術論文及其他學術文章:

- 〈批判《中國田賦史》〉,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8年3期;
-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究竟何時形成〉, 《學術月刊》1963年3期;
- 〈怎樣看待農民戰爭中的“偽降”〉, 《人民日報》1964年8月19日;
- 〈畧論杜文秀之死〉, 《歷史教學》1964年;
- 〈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生漆的發現和利用〉, 《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78年1期;
- 〈秦人早期歷史探索〉,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
- 〈試論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2期;
- 〈秦國封建社會各階級分析——讀《睡虎地秦墓竹簡》札記〉,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2期;
- 〈“隸臣妾”辨〉, 《中國史研究》1980年2期;
- 〈秦公鐘、鐃銘文釋讀中的一個問題〉, 《考古與文物》1980年6期;
- 〈論秦穆公〉(合作), 《考古與文物》1980年6期;
- 〈秦起源於東方和西遷情況初探〉, 《求索》1981年4期;

- 〈蕭將軍瓦和前將軍蕭望之〉，《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3期；
- 〈秦國奴隸制社會形態的特點〉，《中國古史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漢史論叢》第1期，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 〈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 〈漢甘泉宮瓦當文學考釋〉，《考古與文物》1981年4期；
- 〈論漢代“奴婢”不是奴隸〉，《學術月刊》1982年3期；
- 〈周公東征與嬴姓西遷〉，《文史知識》1982年11期；
- 〈論秦漢時期在中國歷史的地位〉，《人文雜誌》1982年5期；
- 〈青川秦墓木牘內容探討〉，《考古與文物》1982年6期；
- 〈秦代官爵制度變化的奧秘〉，《光明日報》1983年5月25日，《〈史學〉論文選》（光明日報專刊叢書，光明日報社1984年）；
- 〈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國法制史論文選》（第一分冊），北京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
- 〈漢代法律管窺〉，《中國古代史論叢》1983年第1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 〈怎樣看待農民戰爭中的“偽降”〉（合作），《關於李秀成評價問題參考資料》，遼寧省社會科學學會、遼寧省歷史學會；
- 〈秦代中央官制簡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1期；
- 〈秦漢時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漢簡解讀筆記）〉，《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3期；
- 〈“隸臣妾”並非奴隸〉，《歷史論叢》3期，齊魯書社1983年；
- 〈秦漢時代的市政〉，《歷史教學問題》1983年5期；
- 〈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產生的兩條途徑〉，《歷史研究》1984年4期；
- 〈秦俑發式和陰陽五行〉，《文博》1984年3期；
- 〈秦漢文明發展的特點〉，《學術月刊》1984年10期；
- 〈秦俑之謎〉，《文博》1985年1期；
- 〈張湯評傳〉，《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2期；
- 〈秦尚水德無可置疑〉，《考古與文物》1985年2期；
- 〈三辨“隸臣妾”（兼談歷史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學術月刊》

1985年9期；

〈日本學者對中國簡牘的研究〉，《中國歷史研究動態》1985年12期；

〈寫在竹片木板上的歷史資料：介紹我國秦漢簡牘〉，《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86年1期；

〈秦俑主題何處覓：《秦俑之謎》之二〉，《文博》1986年2期；

〈《三國演義》中豐富生動的情節都是虛構的嗎？〉，《文史知識》1986年4期；

〈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合作），《文博》1986年5期；

〈居延漢簡研究評價〉，《光明日報》1987年3月4日；

〈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歷史研究》1987年3期；

〈漢唐寺院經濟研究的精華：介紹何茲全主編《五十年來漢唐寺院經濟研究》〉，《光明日報》1987年7月22日；

〈以君主意志為法權的秦法〉，《學術月刊》1987年2期；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評介：兼談歷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1期；

〈秦人的開拓精神和秦國的開放改革〉，《陝西日報》1988年5月11日；

〈秦人價值觀與中國的統一〉，《人文雜誌》1988年2期；

〈曲徑通幽處，高樓望路時：評價當前簡牘《日書》研究狀況〉，《文博》1988年3期；

〈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寶雞師院學報》1988年2期，《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論文選》，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

〈秦趙同源新證〉，《河北學刊》1988年3期；

〈秦俑的價值〉，《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89年1期；

〈秦俑效應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4期；

〈西漢時代生產關係的特點〉，《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2期；

〈秦王朝統一後的社會各階級〉，《社會科學戰綫》1989年2期；

〈中國人學者による「日書」研究の現状〉，《史滴》第11號（日本早稻田大學，1990年1月）

〈西漢戊己校尉考〉，《歷史研究》1990年2期；

〈咸陽古道音塵絕：對秦始皇的評價問題介紹〉，《中學歷史教學參考》



1991年1.2期

- 〈中國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與婚姻家庭：從《孔雀東南飛》的愛情悲劇說起〉，《學術月刊》1991年2期；
- 〈秦漢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歷史研究》1991年4期；
- 〈“考察之功”與“獨斷之學”〉，《光明日報》1992年2月26日；
- 〈秦簡《日書》校補〉，《文博》1992年1期；
- 〈評何茲全教授《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史研究》1992年3期；
- 〈朱雀樓札記〉，《秦文化論叢》第2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尉繚子》與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研究〉，《秦文化論叢》第2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
- 〈臺灣秦漢史學者研究概況〉，《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3年4期；
- 〈《睡》簡與《放》簡《日書》比較研究〉，《文博》1993年5期；
- 〈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
- 〈我的兩部《秦漢史》〉，《深圳特區報》1994年7月9日；
- 〈將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漢史研究中〉，《史學家自述》，武漢出版社1994年；
- 〈求長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秦文化論叢》第3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 〈秦始皇會稽刻石辨析〉，《學術月刊》1994年7期；
- 〈中國古代國家統一的歷史過程〉，《求是學刊》1994年3期；
- 〈會稽淫風考〉，《歷史研究》1995年1期；
- 〈西漢史研究的又一碩果：《漢人秘史》（《西漢興亡史》）序〉，《固原師專學報》1996年1期；
- 〈一孔之見，借以續貂〉，《秦文化論叢》第4期，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
- 〈千年難解始皇謎：評《秦始皇評傳》〉，《文博》1996年5期；
- 〈秦始皇的悲恨〉，《人文雜誌》1994年3期；
- 〈漢樂府《焦仲卿妻》的愛情悲劇及中國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中國上古秦漢學會通訊》第3輯，臺北，1997年6月。



（附記：本目錄的整理核校，得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李淑萍同志的幫助，謹此致謝）

# 戰國時期國別文字構形系統研究的開拓之作

## ——讀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

蘇 瑞

戰國文字研究，是近年新興起的古文字學的一個新分支，而現已發現的戰國文字材料以楚國文字為最多；在楚國文字中又以簡帛文字內容最為豐富。本世紀中葉以來，楚國簡帛文字資料不斷出土，這些戰國時代的墨書真迹，內容豐富，價值重大，曾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並對楚國簡帛文字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是，應該看到，學術界對楚國簡帛文字的研究成就，主要體現在文字的考釋和文辭的通讀以及文字內容的闡述、有關歷史文化問題的討論等方面，而着眼於從文字學的角度對楚國簡帛文字進行形體結構分析，研究其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特點和規律，相對來說還很薄弱；特別是窮盡性的考察、系統性的分析與總體性的歸納，則幾乎是個空白。值得欣喜的是，李運富先生的近著《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岳麓書社1997年10月出版，以下簡稱《研究》。行文中凡引用此書者，均祇標頁碼）正是填補了這一空白的開拓之作。

李著的開拓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它是對漢字構形的系統性理論的一次全面而成功的實踐，同時又對漢字構形學理論有所完善和補充。

漢字構形的系統性理論是王寧先生提出來的。該理論認為，漢字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互有聯繫的整體；漢字構形具有理據，其理據不是孤立的，而是體現在整個系統之中；漢字構形系統是由若干個基礎元素按照一定

的結構模式分層次組合起來的有序網絡，任何一個個體漢字都應該能夠在這個網絡中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一旦位置序列變化失衡，構形系統就會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達到新的平衡。漢字的發展歷史，實際上就是個體漢字的不斷失衡和構形系統的不斷調整的過程。因此，階段性分區共時平面漢字構形系統的研究，實為整個漢字發展史研究的基礎。基於這一理論，李著選擇了戰國時代出土材料最為豐富的楚國簡帛文字作為試點，通過對楚國文字成批材料的系統分析和描寫，展示戰國時代國別文字的真實面貌、構形規律及其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從而為整個漢字發展史的研究提供科學的依據。李運富先生不僅成功地實踐了漢字構形的系統性理論，而且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對這一理論及其操作方法有所補充和完善。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有三點：

第一，從理論上貫徹了字形是文字本體的認識，在術語系上嚴格區分字與詞，從而使字形的分析、字群的類聚和字數的統計操作起來更為方便。

王寧先生指出：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它的音與義來源於漢語，字形才是它的本體。……誠然，漢語的推動，是漢字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對漢字規律的研究，不能用漢語的規律來代替。漢字的發展除了適應漢語外，還有它自身獨立的規律。惟有弄清漢字字形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才能對漢字的歷史、現狀中的諸多現象進行解釋，從而預見其未來的發展趨勢。（《二十世紀漢字問題的爭論與跨世紀的漢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

傳統的漢字研究由於產生於解讀文獻的實用目的，形成了“小學”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以義為出發點又以義為落腳點，忽畧了作為語言載體的文字的相對獨立價值，經常是“字”與“詞”混淆，文字學與訓詁學劃不清界限，在古漢字的考釋中祇求義通，不顧字形。這就嚴重影響了漢字發展的內在規律的探討和漢字發展史的科學研究。李運富先生在《研究》一書中，從理論上貫徹了字形是漢字本體的認識，在操作時，為區別字與詞設置了不同的術語，這就是“字形”與“字符”。作者指出：

全字實際上具有兩種身份，一是字形，二是字符。字形有字形的功能，

指的是直接構件的功能組合關係，也就是字形的構形理據；字符有字符的功能，指的是全字作為書寫符號應該用來記錄語言中的哪個詞，也就是字符的實際用法，包括本義和引申義。字形功能關係屬於靜態的漢字構形系統是漢字構形學所要考察的重要對象；字符功能關係屬於動態的漢字使用系統，是文獻詞義學和漢字學共同關心的對象。例如“取”，作為一個全字，其形體本身象以手持耳之事，“以手持耳”就是“取”這個字形的功能，亦即構形理據；而作為字符，“取”是用來記錄語言中以“割耳”為基本義項的“qu 214”這個詞的，實際上也還可以記錄與“割耳”義相關的“獲得、尋求、戰勝、奪取、佔領、拿來”等義項。既然全字具有雙重身份兩種功能，所以全字平面的字樣可以產生兩種性質不同的類聚。將字形功能相同的字樣類聚為一個位，我們把它叫做字形單位，簡稱為字位；將字符功能相同的字樣類聚為一個單位，我們稱之為字符單位，簡稱為符位。字位反映的是構件與構件的理據關係，而符位反映的是字符與詞項的對當關係。（28—29頁）

“字形”與“字符”的術語的設立與區分，比較徹底地避免了分析和統計字形時最容易產生的字詞混亂，同時也有利於克服在考據中祇求義通，不顧字形的弊病。

第二，從系統歸納的原則出發，層層設置了“位”的概念，並明確了各層概念的定義和歸納條例，使構形分析更具有可操作性，其論證過程條理清晰，邏輯嚴密。

作者將不同構形層次上沒有功能區別的形體歸納為不同級別的單位，分別用不同層次的“位”來指稱：

在構形分析的操作上，設置了“形位”的概念，以避免字樣整理時形體的外在特徵的干擾。作者指出，形體之間的差別有兩種不同的性質，一是形徵差別，二是功能差別。形徵差別指筆畫的有無，同樣筆畫的長短、粗細、曲直、走勢及交接點的不同，構件的多少、同異，相同構件的不同位置、方向以及所佔面積的大小，等等；它着眼於外部形態，不一定引起結構或功能的變化，因而是非本質的，不是漢字構形分析的主要對象。“形體分析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形體的功能，形體祇有結合了功能纔能體現自身的本質特徵”（27頁），構形分析的基礎工作就是將功能相同或相異的



形體類聚在一起。“如果我們把功能不同的形體區分為不同的單位，而把功能相同的形體集合為一個單位，那就會形成形體的類聚。”所謂“形位”，就是“類聚而成的同功能形體單位”（27頁），這是一個泛指的概念，實際上包含有不同的級別和層面，小到筆畫，大到全字和字符，中間有構件。例如在全字層面上，設置了“字位”與“符位”的概念，以區別字與詞（見上文）。在構件層面上，設置了“件位”的概念，以避免將形體相同而參構作用不同的構件混同為一。“我們把單字中拆分所得參構作用相同而且形體上有聯繫的構件抽象出來類聚為一個單位，稱之為件位”（51頁）。例如，構件“舟”，在“舟”中表“舟”之形，在“鯨”中表“舟”之音，在“逾”中表“舟”之義；在“顛”中表“鞋”之形；在“盤”中表“盤”之形。於是作者把“舟、鯨、逾”中的“舟”類聚為一個件位（舟1），將“顛”中的“舟”類聚為一個件位（舟2），將“盤”中的“舟”類聚為一個件位（舟3）。“件位”概念的設置，使構件的認同別異有據可依，便於操作。

筆位、件位、字位、符位都屬於“形位”。“位”概念的設置和下位概念的劃分，實際上確立了全書構形分析的總原則：任何層次的構形分析，都應以形體的功能作為類聚的基點，而不是以形徵差別。這就避免了構形分析過程中各種非本質的干擾，為形體單位的統計測查提供了便於操作的原則和方法，從而使漢字構形的系統性更清晰地顯示出來。

第三，從縱橫兩方面分析了漢字的結構關係，揭示出形體層次關係的加合遞增性質和功能層次關係的融合選擇性質，並堅持用層次分析法統一對結構關係的描述，形成了以層次結構包含平面結構代替層次結構與平面結構對立的格局。李運富認為，“所有漢字都是由少量的基礎構件分層次組合而成的”（60頁），通常所說的平面結構即多分單層結構，而事實上多層結構中也存在大量的多分現象，例如，《說文》正篆的“星”字，是個“從日晶聲”的形聲字，第一層拆分為“晶、生”，是二分的，第二層拆分為“日、日、日”就是多分。不管其它層次的多分現象而唯獨將單層的多分現象看成平面結構，處理原則就欠一致。因此李著將平面結構歸併到層次結構中，作為層次結構的一種，以層次結構的“多分”和“二分”的提法取代平面結構和層次結構對立的提法，使漢字構形學理論更趨完善。

以上三點，都使漢字構形學有所發展。



二、第一次對楚國簡帛文字進行了定性、定量的窮盡性的系統整理與研究，準確地描寫出了楚國簡帛文字的構形系統。

該書以漢字構形具有系統性的理論，以及漢字發展具有漸變性、階段性和區域性的理論為指導，運用系統分析、縱橫比較、全面測查、文化參照等方法，對信陽竹簡、包山簡牘、子彈庫帛書和仰天湖竹簡這四批戰國楚文字資料進行了窮盡性的系統整理與研究，從原始文本文字中提取了2810個異寫字樣，歸納出1960個單字，在考釋的基礎上，分析了單字的構件和構件功能、結構層次和構形模式，並逐一進行了量化統計，形成了反映共時的漢字構形系統的字表。經過窮盡性的考察和分析，總結出楚國簡帛文字的基礎構件有370個，直接構件有890個，構成的單字1960個，分別編制為《楚國簡帛文字基礎構件表》、《楚國簡帛文字直接構件表》和《楚國簡帛單字及構形分析總表》，在表中一一注明構形模式、構件的功能等等，使楚國簡帛文字的構形屬性第一次得到了準確而全面的調查，從而展示出楚文字構形系統的全貌。

作者對楚文字構形系統的描寫是非常準確、令人信服的。他指出：“戰國時代的楚文字已是相當成熟的具有嚴密規律的漢字系統，但仍處在發展之中。”他從基礎構件、直接構件的功能體系、功能組合的模式、結構層次、異寫字樣和異構字形的數量等五個方面闡述了這一論點（76—80頁）。在論證過程中作者是通過將楚文字構形系統同甲金文、小篆構形系統進行縱向比較，用窮盡性測查得出的數據作為論據的，因而言之鑿鑿，令人信服。例如，他在從基礎構件方面描述楚國文字的構形系統時，就採用了一系列準確的數據。“楚簡帛文字具有一批比較穩定而能產性較強的基礎構件”，“楚國簡帛文字共有基礎構件370個，其中成字構件260個，占70%；非字構件110個，占30%。”在實際作了構形分析的1887個字中，“成字基礎構件就參構了1875字，構字頻度為99%；非字構件參構了694字，構字頻度為37%。”同甲金文相比，“甲骨文的基礎構件的數量是相當高的，特別是象形構件，幾乎與成字構件各半。即使與楚國簡帛文字時代非常接近的春秋金文，其基礎構件約324個，但祇參構了不重複單字1158個，比率為1比3；而楚簡帛文字的比率是1比5。”同小篆相比，小篆有基礎構件416個，構字10422個；比率為1：25。其

中成字構件 291 個，占 70%，參構了 10422 字，頻度為 100%；非字構件 125 個，占 30%，參構 2434 字，頻度為 23.5%。“構件數量與單字數量的比差增大，就意味着構字頻率的提高；成字構件比率的上升，也是系統成熟化的標志。”通過上述數據，人們不難相信作者所得出的結論的可靠性：同甲金文相比，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已經相當成熟；同小篆相比，“這兩個構形系統已經非常接近；而非字構件構字頻度楚簡帛文字略高於小篆。說明前者的構形體系雖已成熟，但對非字構件的依賴性還比較強，沒有最有效地達到以字構字的程度。”（76 頁）作者就是這樣通過科學的描寫和嚴密的論證，準確地為楚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定了位：

楚國簡帛文字的構形系統是從甲骨文經由西周和春秋金文發展而來的，總體上已經基本趨於成熟，許多參數相當接近小篆字系，但最終還沒有達到小篆的完善程度。（80 頁）

作者利用系統描寫與單字整理的成果和量化的統計，論證了楚文字的特點、發展的共性與個性，為漢字史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新結論。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楚文字的構形系統及其在漢字史上的地位作出如此準確的、盡可能量化的描寫。應該說，這是本書作者對漢字史研究作出的重要貢獻。

三、用窮盡性測查第一手材料所得出的結論，從漢字的本體出發，澄清了戰國文字系、別的說法。

在漢字史的研究中，一般認為戰國時代的文字因國別地域不同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因而可以分成若干個“系”。這就意味着，漢字的發展是從商周的一系分化為戰國的多系，再由戰國的多系合併（或祇取秦系）為秦漢的一系。作者根據對楚國簡帛文字的窮盡性的調查與研究，提出了與傳統觀點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戰國文字作為語言的記錄符號來說，其實並不存在地域性的系別，其所謂系別“特點”往往並非從漢字形體結構及其記詞功能本身出發，而是文字資料的綜合性特徵。地下出土的各種具體文字作為資料來說具有綜合性，包括文字的形體風格，文字的使用習慣，文字的載體，文字所記錄的內容，文字的使用場合以及與文字出土有關的種種社會歷史和文化制度等情況，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可能形成某批文字資

料或某一範圍內文字資料的綜合性文化特徵。因此，從綜合性文化特徵出發，運用多標準、多角度的觀察方法來確認和鑑定某一或某些文字資料的地域範圍，甚至分出若干個“系”來，是可能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比較管用的。但文字資料的綜合性文化特徵並不等於文字符號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在談論漢字發展的時候，所謂文字，通常是指抽象化了的記錄語言的一種符號系統，具有很強的專業性。作為符號系統的文字可以轉化為脫離語用環境和載體存現環境的單字集合，這樣的文字是否存在地域的差別，應該由文字本身形音義方面的特點來決定，而不能根據文字符號之外的因素來判斷。常見的種種關於戰國文字分“系”和各系文字“特點”的論述，混淆了文字資料的相關性與文字符號的本體性這兩種不同的研究對象，不知不覺中用文字資料的某些非文字特點如器物形制、官職名稱、紀年方法、行文格式、措辭習慣甚至聲律韻腳等來作為文字符號本身分“系”的根據，其結果自然貌合神離，似是而非，難以反映戰國文字的真正面貌。誇大戰國文字地域之間的差異，無疑還受到封建割據的政治格局的影響，由於存在先入為主的偏見，就很容易將個體字符和局部風格的差異當作總體性質和整個體系的不同，這也是缺乏系統論思想指導所帶來的後果。

#### 四、在字表的編制上，比較徹底地貫徹了字本位的觀念，編制出了文字學意義上的字表

以往的字表，大都是以提供字形便覽、解決文獻閱讀為目的；而本書字表的主要目的，是“為構形系統的分析提供確實的對象”，其他祇是附帶功能。編制目的不同，決定了立目原則的迥異。前者的立目原則通常是着眼於字的用法，把功能相同的各種形體都歸為一條；或者並沒有明確的立目原則，時而以字形立條，時而以詞項和用法立條，從而容易造成字形、字符、字用的不分。本書字表的編制，立目時堅持同一原則，“這就是着眼於字的構形功能。嚴格區分形、符、用，以經過整理的字形單位為條目，從而避免將異構字、通假字都混為同一字形或者將同字形的異寫字誤分為異字符”。（44頁）在具體操作時，堅持按字形單位立目，使字樣直接跟字形對應，同時設立字符、字用兩欄，將字位的字符功能及文本中實際使用的記詞功能分別作出不同層次的



對應，比較成功地解決了字樣、字形、字符、字用的相互關係問題，從而清楚地反映字系中可能存在的異寫字，異構字以及通假字等錯綜複雜的形音義關係的實際面貌。因此，本書的字表，除了具有以往字表所具有的提供字形便覽、幫助閱讀等功能之外，最重要的是能準確、清晰地反映字系的構形實況，為漢字構形學提供科學的依據。

五、對前人考釋古文字的方法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評價，提出了構形系統分析考字法。

古文字的考釋，歷來是古文字學的重要內容，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使時代久遠的甲骨文、金文及戰國文字資料能為今人所利用。前人在古文字的考釋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許多切實可行的方法。李運富對學界前輩的方法和經驗作了全面的研究和總結，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也指出了前人在某些古文字的考釋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這就是：第一，孤立地就字論字，以字比形，缺乏相關形體的系列考察；第二，迷信《說文》、《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後世字書，凡考字都力求要與後世字書中的某字對應相當，找不到對應的字就認為該字不可識；第三，祇求講通辭例，忽視字樣本身構形理據的分析；第四，死守現成的古音音系；第五，無論是立論還是反駁，不是聯繫各種證據作綜合性的全面考察，而是抓住一點，以偏概全。作者對上述問題都逐一進行了分析，並指出了其產生的根源：

上述問題的存在，並不是因為有關古文字考釋方法的不健全，而是缺乏漢字構形系統思想的指導和約束。（97頁）

於是，在總結繼承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構形系統分析考字方法”，即“結合構形系統的描寫或者在已有構形系統的指導下來進行古文字考釋的方法”（98頁）。作者認為，甲骨文時代的漢字，都具有自己的構形系統，字形與字形之間不是毫無關係的個體，而是由一定的元素或單位按照一定的方式分層次分類別組合而成的網絡體。構形系統可能因時代、地域而不完全相同，在考釋古文字時，應首先弄清它所處的構形系統，用系統的規律來加以比較分析，從而確定它在該系統中所處的位置。前人考出了許多疑難古文字，主要採用的也是構形系統分析考字法。他們雖然沒有將構形系統描述出

來，但是這個系統在他們心中是存在的，因為他們對被考字同時代、同系統的文字材料相當熟悉。就好比許慎從來沒有用抽象的理論來描述小篆的構形系統，但是他的《說文解字》卻無刻不在顯示着小篆構形系統。由於時代特點的不同，百科全書似的學者已經不再是當代學者群的主流，因此，在考釋古文字時，正確理論的指導，對構形系統的明確和把握，將顯得更為重要。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作者提出了“構形系統分析考字法”：

（這種方法，）不是獨立於已有各種考字方法之外的新方法，而是在系統論思想指導下，綜合運用已有各種方法進行考字的一項工程。其要旨可以歸納為三句話：全面測查，系統比較，綜合分析，具體作法是：先確定一個共時材料範圍，將該範圍內的所有字樣整理為字位；再將已識的字位進行構件拆分，全面測查每個構件在不同層次上的各種變體、構件與構件之間各種關係、由構件組合全字的過程、全字表層的功能關係模式及形體結構模式等，從而初步建立起某個共時或共域範圍的文字構形系統；然後將不識的特考字或疑難字置於該構形系統之中，與所有相關的類項或單元進行全面系統的比較，從而認同別異，確定它的形體結構及其在該系統中應處的位置；必要時進行適當的外部比較（包括異域比較和異時比較）並聯繫辭例、書證、文化知識等，綜合分析字形本義及使用中的字詞對應關係，借以達到形義解析和文獻閱讀的双重目的。（98頁）

不難看出“構形系統分析考字法”的提出，是全面學習、繼承前人古文字考釋經驗和方法的結果。這也是古文字考釋方法和實際操作步驟的一次明確的總結。這對今後的古文字考釋工作具有重要的示範和指導作用。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不是泛泛地總結理論和方法，而是身體力行，運用這種方法對楚國簡帛文字中的疑難字進行了考釋，對前人已經作出的考釋，作者認為不妥當的進行了改釋。在考釋或改釋過程中，作者始終以系統論為指導，結合楚文字構形系統的描寫來進行，讓字詞的考釋既接受系統規律的指導提示和檢驗，又反過來豐富和完善該構形系統。由於理論明確，方法得當，作者的疑難字考釋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績，共考釋或改釋了32組約70多個字，其中多數考釋得到了專家的肯定。

最後還應指出的是，李著設置了一些新術語，較之相應的傳統術語，這



些術語更能準確地揭示所指稱的文字現象的實質。例如，作者用“同符位異構字”來指稱“異體字”，用“異符位同形字”來指稱“同形字”。這兩個術語，明確地揭示了上述兩種文字現象的對立關係，準確地概括了所謂異體字和同形字的實質：這兩種文字現象是記詞功能的問題，因而在研究它們時也必須從記詞功能入手，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些術語的設置，體現了作者對文字現象實質的準確把握。

綜上所述，李運富先生在《研究》中率先將漢字構形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運用到釋讀難度較大的出土文本的文字整理工作之中，第一次展示了楚文字構形系統的全貌，並從理論上總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文本單字整理方法和漢字構形分析條例；對疑難古文字的考釋，方法獨到，富有創見，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對戰國文字異形的實質、楚文字的構形規律及其在文字發展史上的地位等問題的認識，也大都發前人所未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因此，在戰國文字研究乃至整個古文字研究領域，這部書都不失為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著作。

當然，本書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個別地方的術語設置，在定稱和定義上尚有可斟酌之處，對有些傳統的術語的拋棄似嫌過於輕易，難為學界所接受，需要對術語系統再作更精密的規範；個別字的考釋也嫌不夠妥當。另外，利用所作的第一手材料和整理出的系統來研究戰國文字的規律、特點，還嫌不夠深入。這主要是因為缺乏可供對照的其他國別和時代的材料，待資料有所積累後，還可進一步進行研究。

## 讀《簡帛藥名研究》

苟曉燕 余濤（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出土了大量簡帛文獻，“其間各種書籍，無不是前人所謂驚人秘籍，有的甚至為司馬遷所未見，有很大的研究價值。”（李學勤《簡帛藥名研究·跋》）由於簡帛文獻中存在着大量的通假、異體，甚至錯、脫、倒、衍等現象，故其研究難度很大；而治簡帛醫籍的難度更大，“因為研究這類課題，不但要具備豐富的醫學知識，還要有造詣很深的語言文字功力，纔能勝任。”（劉又辛《簡帛藥名研究·序》）所以，長期以來，對簡帛醫籍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者甚少。

張顯成博士知難而上，先後發表了《簡帛醫書中的中藥異名》（1994）、《簡帛醫書釋讀續貂》（1994）、《“橐吾”即“鬼臼”——簡帛研究札記》（1995）、《〈馬王堆古醫書考釋〉補正》（1996）、《馬王堆醫書釋讀札記》（1996）、《馬王堆醫書藥名試考》（1996）等一系列頗有份量的論著，並在此基礎上，數易其稿，撰成《簡帛藥名研究》一書。該書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出土簡帛文獻二十一種》的前期研究成果，已於1997年10月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分精裝和平裝兩種形式出版。該書的問世，是簡帛文獻研究領域的一件幸事，它填補了系統研究簡帛醫籍藥名的空白，使簡帛醫籍的研究發展到了更深入的地步。

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學術專著，對出土簡帛醫藥文獻的中藥名稱進行了盡可能窮盡性的研究，“共得藥名717個，凡1236見，表示420味藥物”。全書結構謹嚴，層次分明，謀篇布局，匠心獨運。作者首先用一章的篇幅對該書所使用的“研究材料”進行介紹，以及對簡帛藥名進行宏觀的研究。接着，用四章的篇幅對簡帛藥名進行深入的微觀為主要的研究。作者把紛繁複雜的簡帛中藥名稱，以是否見於傳世典籍為標準，分為“已知名”（已見於傳

世典籍者)和“異名”(未見於傳世典籍者)兩大部分,然後把這兩大部分的藥名各分為礦物類、植物類、動物類、器物類四大類。再參古本草將礦物類藥名分為:水部、土部和金石部三小類;將植物類藥名分為:草部、穀部、菜部、果部、木部、五小類;將動物類藥名分為:蟲部、魚鱗部、介部、禽部、獸部、人部六小類,即共十四部。這既運用了現代藥物學的分類方法,又照顧了傳統本草學的分類習慣,使得林林總總的藥名不相雜廁,井然有序。

作者對每一藥名的全部出處都有清楚的交待。例如,指出“水銀”一藥,分別出現在“《五十二病方》的318、345、361~374、408(2見);《敦煌漢簡》563A”,即共出現於7處。又如,“桂”一藥共出現了31次,作者也一一標注其出處。書中還告訴了我們許多精確的數字(這些都是作者進行精密研究而得來的),例如,簡帛藥名的“異名共393個(含未詳藥名),凡557見。這些異名占簡帛藥名總數的54.8%”,“超過已知名(324個)69個,超過已知名比例(45.2%)近10%”(第37頁)。又如,“植物類異名193個,凡302見”,“占可考異名的58.3%”(第94頁)。再如“蟲部異名共34個(凡45見),占簡帛動物類異名的31.8%”(第269頁),等等。

在考釋“異名”時,作者不僅能考其所指,還能進一步指出該物通用名以外的已知名(即“又名”),並且,還對該藥物的原植物,或原動物,或基原都標明其科屬和國際通用名稱。如第四章第一節“草部”的“白衡”條(第109頁),在考釋出“白衡”即“白英”之後,作者指出:“白英,又名‘苳’(《爾雅》),‘穀菜’(《神農本草經》),‘鬼目草’(《爾雅》郭璞注),‘白草’(《名醫別錄》),‘白毛藤’(《百草鏡》),‘排風’、‘白幕’(《本草拾遺》)等;其基原為多年生半灌木茄科植物白英(*Solanum Lyratum*)的全草。”

在該書正文之後,附有三個很有價值的“附錄”:一是《簡帛藥名總表》,分類逐一列出420味簡帛藥物,通過此附錄,讀者可了解到420味藥的詳細情況。二是《簡帛方劑、本草文獻》,逐一列出本書所使用的十種原始研究材料(內中有不少是作者的釋讀新見,如將《五十二病方》的“𩚑”釋“然”,“泚”釋“澤”,“并符”釋“秉符”等等,都極有見地,解決了長期未得釋讀

的難題)。通過此附錄，讀者可查閱到正文所論的每一個簡帛藥名的原始出處。三是《簡帛藥名索引》，通過此“索引”，讀者可以查閱到任何一個簡帛藥名在該書正文中的論述。這些“附錄”不僅提供了迅速檢索書中所論簡帛藥名的方便，還提供了全部原始研究材料，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

有必要提及的是，簡帛藥名中有62個未詳藥名（簡帛殘脫名稱不全者甚多），作者在書中將它們一一列出，並說：“有少部分藥名，或因簡帛殘損太多，或限於筆者愚騃，而無法解讀，或不能確釋，現列於下，以盼高見。”（第69～70頁）這充分體現了作者小心謹慎、實事求是做學問的態度。

“異名研究”是作者重墨着筆的一部分。作者意在考名辨物，弄清簡帛醫籍中一個個中藥異名的來源。書中旁徵博引，對三百多個中藥異名進行了盡可能的逐條詳細考釋，其中多有發現，勝義紛呈，如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第432行：“（治療方：）以兔產齒塗之。”這是一個治療凍瘡的方子。“兔產齒”究竟是什麼？“齒”字古代辭書未見載，“產”在這裏是什麼意思，確是較難的問題。該書第五章第五節“動物類·獸部”是這樣考釋的（第322～325頁）：作者通過睡虎地秦簡的對比說明“齒”是“𪔐”的省筆變體，而“𪔐”又是“腦”的異體。接着，作者運用現代語言學詞義發展演變的“感染理論”，指出“兔產腦”的“產”的意義為“新鮮”，其“感染”原理為：“由於‘產’與‘生’共有‘生育、出生’義，‘產’還與‘生’常常互訓”，“以至同義複合連用”，“在言語過程中，‘產’便受到了‘生’的影響，‘感染’上了‘生’的形容義‘生、活、鮮’義”。作者還在簡帛醫書中找到了很多“產”為“生、活、鮮”義的用例，進一步證明了“兔產腦”即“新鮮兔腦”。在運用語言學理論考釋出“兔產腦”即“新鮮兔腦”之後，作者又從藥物學的角度進行論證：“《證類本草·獸部·兔頭骨》（卷十七）引《名醫別錄》：‘（兔）腦，主凍瘡。’又引《圖經本草》：‘（兔）腦，主凍瘡。’又引《聖惠方》曰：‘手足皸裂成瘡，兔腦髓生塗之’。與上引《五十二病方》以‘兔產腦’塗凍瘡正相符。”進一步證明了“兔產腦”即“新鮮兔腦”，屬“兔腦”。如是，使這一考辨信而有徵，無須擬議。

又如，馬王堆帛書《養生方》第146～147行：“（益壽方：）□谷名有泰室、少室、其中有石，名曰駢石，取小者□□□□□□□□□□病益壽。”此方的“駢石”為何物，一直未得解。該書第三章第四節“礦物類·金石部”



的“駢石”條的考釋首先云（第91～93頁）：

駢，通“艸”，二字同為“并”聲，故得相通，所以，“駢石”即“艸石”。艸，字亦作“頰”；本義指“絲織物的青白色”，故可引指“光潤之美色”。《說文·色部》：“艸，縹色也。”段玉裁注：“縹者，帛青白色也。……《玉篇》引《楚辭》：‘玉色艸以腕頰。’今《遠遊》作‘頰’，‘艸’與‘頰’同也。……‘玉色艸以腕頰’，謂光澤鮮好。”故“艸石”即“美石”。

接着，作者又論述道：方子裏的“泰室，即太室，與少室合稱為‘嵩山’”，《山海經》中正有嵩山產美石的不少記載。由《說文》及《山海經》郭璞注可知，“廣義的‘美石’包含‘玉’，狹義的‘美石’指‘次玉’”。《神農本草經》陶弘景集注、《名醫別錄》、《日華子本草》等古本草中“多有玉石補養人記載”。這樣，既從訓詁學的角度考其所指，又從中醫藥學的角度證其所指，把“駢石”一名徹底辦明了。李學勤先生在《跋》裏稱讚道：“張顯成博士論作的難能可貴正在於他既善於運用語言文字學的各種方法，又能夠結合中醫藥學的有關知識，因而左右逢源，多有創獲。”真是一語破的！

書中類似的精彩考辨，俯拾即是，難以備述。有的條目考辨之細，徵引之廣，多達三、四千字，如第四章第三節“植物類·菜部”的“樛、薑、薑、疆、樛”條（219～223頁）；第五章第三節“動物類·介部”的“僕、勃、羸、蚶、羸、蛄、蛄、蛄、蛄”條（第304～308頁）。實際上，每一條考釋都可以稱得上是一篇完整的論文。作者通過對這些中藥異名的考辨，揭去了蒙在它們上面的面紗，展示了其本質內涵。這不僅對於語言學來說，而且對於傳統中醫藥學來說，都具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誠如鄭孝昌先生在《序》中所說：“其大庇蒼生，廣濟黎庶，又豈規規校釋文字之異同，排比門類分合而已哉！”

劉又辛老先生在該書《序》裏深有感觸地說道：“我從二十多歲起就開始學習語言文字學，以後又曾對中醫着了迷。近年來在語言文字方面用力較專，但對中醫藥學卻未能忘情。可惜年過八旬，精力不及早年，無力兼顧。顯成同志在語言與醫藥兩個領域都有較高的修養，與我所好相同，得為忘年交；現在，讀到這部專著，感到異常欣喜。”（第4頁）這也是劉老先生對張顯成博士《簡帛藥名研究》的毫不誇張的讚美。作為這部專著的較早讀者，讀後，



我們更是有老前輩那種“異常欣喜”的感覺。也正如鄭孝昌老先生在《序》中所說：“《簡帛藥名研究》確屬一部有學術性、有開創性、有實用性的中藥學力作。”也可以這樣說，這部“研究簡帛藥名的集大成著作”，不僅是一部中藥學力作，同時，也是一部語言學力作。

當然，《簡帛藥名研究》也並非完美無疵，有些異名的考釋是可以進一步完善的。62個未詳藥名中，文字完整者有35個，考釋難題也有待於解決。

近些年來，張顯成博士不但在簡帛醫籍方面碩果累累，而且對整個秦漢簡帛文獻的語言文字研究，也用力甚勤，成果不斷。由於他敏銳地認識到簡帛文獻巨大的語言研究價值，從而對簡帛的語言研究起步早、用力專，現在他已實實在在地站在了簡帛語言研究（特別是詞彙的研究）的前列而居於領先地位。目前，他正從事國家教委“九五”社科規劃基金項目《秦漢簡帛詞彙研究》、國家社科基金1997年度項目《秦漢簡帛詞語叢考》、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出土簡帛文獻二十一種》三個項目的研究。我們期望着這些極有意義的課題成果問世，相信它們必將會為簡帛研究這一領域增光添彩。

# 尹灣漢墓簡牘學術研討會述畧

東 山

1998年8月20日至22日，由連雲港市人民政府主辦，連雲港市文化局、東海縣人民政府、連雲港市文管會、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等單位共同承辦的中國連雲港東海尹灣漢墓簡牘學術研討會，在座落於黃海之濱、花果山下的雲臺賓館中日友好會館裏隆重舉行。由於連雲港市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精心安排，並得到與會全體專家學者的積極參與和通力合作，會議自始至終洋溢着濃鬱的學術氣氛，獲得了圓滿成功。

參加此次會議的代表雖僅有近四十人，但他們來自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在內的全國各地，還有現正在日本岡山就實女子大學執教的海外教授，千里迢迢前來與會。秦漢史、簡牘學、文博、檔案等學術界的老、中、青專家學者，濟濟一堂，是我國簡帛學科世紀之交又一次名實相符的高層次盛會。且會議時間亦不長，僅開了三天，但由於連雲港市各級領導，在各方面均作了充分的準備，整個會議的議程安排得非常緊湊和周到，特別是為了配合此次會議的召開，還專門日夜兼程趕辦出《尹灣漢墓出土文物暨學術成果展》、《連雲港市歷史文物陳列》、連雲港市博物館長《館藏書畫精品展》，為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會議伊始，由連雲港市博物館周錦屏館長作了題為《尹灣漢墓簡牘整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主調報告，就尹灣漢墓簡牘和文物的發掘、保護、整理、研究，作了全方位的回顧，並對今後研究的主要方面，作了宏觀的展望，內容非常豐富和精彩。在此基礎上，與會代表緊緊圍繞着尹灣漢墓簡牘的主要內容，以及它所反映的相關問題，連續四次舉行大會，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某些問題還展開了幾種不同意見之間的熱烈討論和爭鳴。會議開得生動活潑，頗有成效，概括起來，

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收穫。

首先，自尹灣漢墓這批珍貴的簡牘和文物發掘出土以後，連雲港市博物館不視它們為單位私有物，而是迅速組織有關專家進行整理，及時公諸於世，和大家同步開始研究，已經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與會全體代表交口稱讚連雲港市博物館這種視珍貴文物為人類的共同財富，並將它們無私奉獻給整個學術界的高貴品質，譽之為連雲港精神，為我國的文物、考古和博物館學界，帶了一個好頭，其意義是巨大而深遠的。

其次，自《文物》1996年第8期公開發表尹灣漢墓簡牘的部分釋文以後，中華書局於1997年出版了包括全部尹灣漢墓簡牘的圖版、釋文以及文物、發掘報告、簡牘尺寸索引等在內的《尹灣漢墓簡牘》這部整理成果；1997年底，文物出版社還以尹灣漢墓簡牘的書體為主要內容，出版了《連雲港市古代書法藝術集萃》單行本；連雲港市博物館與中國文物研究所合編的題為《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的論文集，即將由科學出版社於今年12月出版。與此同時，尹灣漢墓簡牘，亦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高度重視的新的熱點，截至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除了已經和將要發表的近70篇論文外，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還於今年8月，出版了廖伯源研究員提交本次大會的題為《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這部專著。同時提交大會的學術論文，除已收入前面所提到的《尹灣漢墓簡牘綜論》這部論文集外的，另外還有十餘篇。在此次學術研討大會上宣讀論文和即席發言的，除前面已經提到的周錦屏館長外，按照先後順序分別有高敏（鄭州大學）、安作璋（山東師大）、廖伯源（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雲度（徐州師大）、李均明（中國文研所）、王子今（中央黨校）、陳文豪（臺灣中國文化大學）、龔留柱（河南大學）、高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劉樂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李開元（日本岡山就實女子大學）、陳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李解民（中華書局）、朱紹侯（河南大學）、孟祥才（山東大學）、劉洪石（連雲港市博物館）、滕昭宗（連雲港市博物館）、黎明釗（香港中文大學）、宋少華（長沙市文物考古所）等二十餘位代表。內容涉及到對尹灣漢墓簡牘的釋文和簡牘文意的理解，以及漢代的行政建置、上計制度、地方官吏仕進途徑、軍事武備、地理沿革、姓氏名字、數術、名數等諸多方面，都在前階段整理和研究成

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的新觀點和新見解，通過討論，有的問題達到或接近共識，但更多的僅提出了問題，其中有的問題甚至提出好幾種意見，這對於尹灣漢墓簡牘的深入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有不少代表在提交和宣讀學術論文或即席發言中，將居延、江陵、臨沂漢簡和馬王堆漢墓帛書與尹灣漢墓簡牘進行比較研究，拓寬了研究領域。特別是宋少華同志就本世紀末發現的擁有十餘萬枚的長沙走馬樓吳簡，向與會代表所作的介紹，使大家大開眼界，深受鼓舞。最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謝桂華研究員，代表大會主席團做了簡短的總結。總之，此次會議是我國簡帛學界世紀之交一次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盛會，它不僅標志着尹灣漢墓簡牘進入深入持久研究的新階段，而且對其他簡帛的保護、整理和研究，也將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和推動。